

[美] 梅尔文·P·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 著

孙闵欣 廖蔚莹 朱正 王敏 钟远 © 译

孙闵欣 © 校

人心之争

美国、苏联与冷战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凭借对细节的敏锐把握、对领导人个人决策的关注，以及一丝不苟的评论分析，莱弗勒为读者带来了引人入胜的重要新观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超越了诸多冷战研究中的常规论点，将笔墨聚焦于安全策略及优势转换的实质：斗争的焦点在于哪一种政体更能满足人民需求并构建更为美好的世界。

——罗伯特·杰维斯，哥伦比亚大学

此书以生动的语言和睿智的视角解读冷战的始末。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西方权威之一，梅尔文·莱弗勒探索了大量新资料，从美苏对抗史中截取了五个关键时刻，予以立意新颖又颇具启发的分析。他对冷战中历任领导人的刻画令人信服又言简意赅。正如莱弗勒所描述的，那些领导人所经历的内心挣扎、艰难抉择和最终成功显示了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中，领导层在维护和平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诺尔曼·M·奈马克，斯坦福大学

梅尔文·莱弗勒对冷战期间的关键阶段进行了出色的审视。他兼顾了对组织机构与执行部门的强调分析，这样的视角始终发人深省。本书不落俗套、旁征博引、引人入胜而又生动逼真，是既能让普通读者“好看”，又能让专家学者“看好”的上乘佳作，也定将成为冷战研究的经典文本。

——马克·克拉默，哈佛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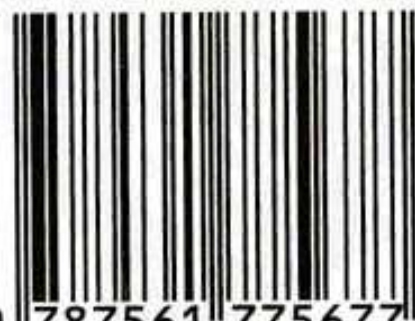


The UVA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is a cooperative projec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founded in 1819 by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is one of America's leading universities.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819年由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创建，是美国一流大学之一。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是华东师范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的合作项目。

上架建议：历史·政治

ISBN 978-7-5617-7567-7



9 787561 775677 >

定价：68.00元

www.ecnupress.com.cn

[美] 梅尔文·P·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著

孙闵欣 廖蔚莹 朱正 王敏 钟远 ©译

孙闵欣 校

人心之争

美国、苏联与冷战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merican Studies Series



上海市
著名商
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美)莱弗勒(Leffler, M. P.)
著;孙闵欣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
ISBN 978-7-5617-7567-7

I. ①人… II. ①莱…②孙… III. ①美苏关系—冷战—
研究 IV. ①D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5208 号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

撰 著 梅尔文·莱弗勒
翻 译 孙闵欣 廖蔚莹 朱 正 王 敏 钟 远
校 订 孙闵欣
责任编辑 夏海涵
审读编辑 李惠明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31.75
字 数 58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
印 数 2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567-7/K·323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 联系)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By Melvyn P. Leffler

Copyright © 2007 by Melvyn P. Leffl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496号

编辑委员会

名誉编委：

- 美方：约翰·卡斯廷(John Casteen)：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小亚瑟·加森(Arthur Garson, Jr.)：弗吉尼亚大学执行副校长兼教务长
卡伦·赖安(Karen Ryan)：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莫里·D·麦金尼斯(Maurie D. McInnis)：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项目主任

- 中方：俞立中：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张春柏：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陈 舒：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

执行编委：

- 美方：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布拉德利·里德(Bradly Reed)：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俞晓明(Xiaoming Yu)：弗吉尼亚大学非洲裔美国人事务副主任
- 中方：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刘 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利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
刘 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译丛序（一）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

我谨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向中国读者推出由弗吉尼亚大学相关作者撰写的一些美国研究最杰出的学术著作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弗吉尼亚大学的美国研究传统可追溯到她的创始人——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81至1782年间写的《弗吉尼亚纪事》是理解美国的第一次和最全面的尝试，这是当时他为了回答一位外国朋友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撰写的。后来在杰斐逊成为合众国总统之后，他发起了横越美国大陆的第一次探察活动——“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弗吉尼亚大学的师生一直努力沿着杰斐逊的脚步，试图更深刻地理解美国。

中美之间有着极大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差异，而这些差异为相互学习创造了机会。值得庆贺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有关美国的这套丛书，我期望弗吉尼亚大学在增强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也能够做出她的贡献。

约翰·卡斯廷
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译丛序(二)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以外世界的介绍纷至沓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使得我们对之倾注了更多的兴趣、更多的关注。但在许多时候,我们仍然发现,关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其实我们仍然了解得不多或很不深刻。许多时候,那一个我们看似十分熟悉的国度,深入其中之后又显得那么的新奇。历史轨迹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竞争,诸多因素的驱动,使得不同国度之间的合作交流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可能。

我们推出的这部“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是以美国研究为主题,选取了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历史系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涵盖了美国的历史、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社会现状以及外交政策等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美国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深层次的剖析与反思。本丛书为中国的美国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研究范式,为理解和贯彻执行中美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我相信这部丛书一定有助于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学习美国、批判美国,从而更加客观地对待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的出版,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VA)与华东师范大学(ECNU)合作交流的成果。弗吉尼亚大学是由美国第三届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杰斐逊创建的,她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并以激发学生在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过程中持久的自由探索精神,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为宗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取得了诸多优秀的成果。华东师范大学继承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几代人秉承“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坚持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己任,砥砺培育英才,致力服务社会,积淀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在国内外享有良好声誉。我们两所大学不仅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彼此之间有着良好的合

作交流关系。从新千年伊始,华东师范大学与弗吉尼亚大学深入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启动了若干国际合作项目,推进了人员的交流与资源共享,密切了两校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了将两校的合作成果惠及广大的读者大众和学术群体,两所大学决定合作出版“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这部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是两个大学之间合作交流的大事,也是中美文化合作交流事业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了推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交流,我们还会将这些著作的作者纳入正在进行的教师交换项目之中,努力为促进中美文化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的交流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弗吉尼亚大学美国研究”译丛的出版,倾注了弗吉尼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许多专家学者的热诚,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雨历程,出版了大量介绍其他国家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译丛以及众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并以此种方式承载着了解世界的责任和学术交流、文化传承的重任。借此机会,我代表丛书编委会对所有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立中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致谢

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准备本书的写作工作,许多研究机构和个人都为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当我需要从高校的管理职责中脱身进行本书的学术研究时,国家档案馆和马里兰大学向我提供了联合奖学金,我得以仔细研究存放于 Archives II 的众多美国官方资料。同年,即1995—1996年,我得到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旅游费资助,去调查馆藏的重要资料。此后不久,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邀请我访问奥斯陆。在奥斯陆访问的一个月间,我对本书的背景及涉及面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并开始撰写一些文章,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那些有待深入研究的相关学术命题。Geir Lundestad 所长和他的手下都是热情好客的东道主。他们主持的各类研讨会及与他们的多次交谈,使在奥斯陆的日子成为我一生中最愉悦的时光。

自我1997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起,本书的写作被迫搁置了四年。2001年我结束院长的任期,成功申请到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的访问学者项目。2001年9月的第一周,我到威尔逊中心报到,从罗纳德·里根大楼及国际贸易中心的电视机中,目睹了9·11惨剧的发生。虽然灾难过后的华盛顿动荡不安,让人难以专心治学,但威尔逊中心的工作人员及学者们提供的大量资源、支持和信任,依然让我受益匪浅。我尤其要感谢 Sam Wells, Rob Littwak 和 Christian Ostermann,他们使我的访问研究变得充满意义,让我有机会在担任大学管理职位四年后能顺利回归到严肃的治学状态。接下来的2002—2003年中,我被聘请为牛津大学的 Harmsworth 教授;教学之余,有幸聆听了大量讲座和研讨会,与当时最杰出、最知名的几位俄罗斯、苏联政治专家及国际关系、历史方面的作者进行交流,让我获益匪浅。



因此,在结束牛津大学的教职经历后,我觉得时机已成熟,应该把多年以来对本书的研究和思考付诸笔端了。幸运的是,我不久便被选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The John W. Kluge Center)的亨利·基辛格研究员(Henry Kissinger Fellow),并得到美国和平研究所的资助。对上述两家研究机构,我心存无限感激,是它们让我能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状态下从容写作,并与各领域的学者和实践家们进行交流。虽然术业有专攻,但各路专家对我的研究依然充满兴趣;他们的热情与关注激励我思考本课题对当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含义。和平研究所的 Ginny Bouvier 对我的工作表示了特别的兴趣,并对诸多章节作了颇具见地的点评。弗吉尼亚大学慷慨地授予了我多项研究基金。我还想感谢 Chuck McCurdy 和 Ed Ayers 的鼎力协助。

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让本书的出版变成了可能。Mark Kramer 和 Norman Naimark 阅读了本书手稿的倒数第二稿。他们细致的作风及对苏联外交史的深刻理解避免了文本中原有的若干重大错误。他们的概念性理解和分析能力迫使我更深入地对书中的大小概念进行思考。他们对本书手稿倾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让我感激不尽。我还邀请了几位工作中最早结识的朋友们审阅本书稿的全文或部分章节,他们是 Frank Costigliola, Robert McMahon 和 David Painter。这些朋友之前也多次帮我审阅书稿,对本部书稿,他们尽责细致依旧,指出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并发给我相关的新书和文章,供我参考。同时,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同事们也竭尽全力帮助我这个前任院长重返学术研究的道路,这让我深感幸运。Peter Onuf 是其中作用特殊、才能奇特的一位。他总是先聆听我的想法,再通过新颖的角度,对其中的观点进行概念化再处理;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的某些观点竟能变得如此妙趣横生。和 Peter 共进的每一次午餐都是围绕本书话题的一次研讨会,他会就议题进行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然后加以总结。他让我理解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价值所在,并鼓励我勇于承担风险。当 Peter 不在时,Brain Balogh 常常就代替 Peter,向我提供理论的养料;他反复告诉我,本书一定能够完成。在我老东家弗吉尼亚大学之外,我的好朋友、哲学家 John Arthur 不断地询问我的想法,并让我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John 是我认识的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教我如何从多个角度思考同一个问题。他的睿智提升了我的学术功力和分析能力。Odd Arne Westad 和 Chen Jian 两位学者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他们是苏联和中国问题的专家,虽然学术立场与我有异,但对冷战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大国在东亚及第三世界对抗等议题,他们的见地让我受益良多。此外,本书还得益于 Vojtech Mastny 的独到见解,他仔细阅读了本书的两个章节并提出了高质量的建议。本书手稿即将完成之际,Vlad Zubok 还发来了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戈尔



巴乔夫章节的宝贵点评。这些年来,我从 Vlad 那里获得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大量信息,本书的很多内容中都闪耀着他的智慧。

在规划本书的结构时,我希望能像从美国的角度关注冷战一样,也从苏联的视角观察冷战。但我也知道,自己缺乏俄语和其他相关语言能力。我努力地尝试弥补这一劣势,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克服,但在他人的帮助下,我依然获益良多。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和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都开始从冷战的“另一方”搜集文献资料,并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发给感兴趣的学者们。他们主办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会议召集各路学者和外交家参与历史讨论,也因此推动了各国政府提前解禁相关历史文献,否则这些文档要到几十年后才能公布于众。2001—2002 年还在威尔逊国际中心访问时,通过 Christian Ostermann 我有幸接触到“冷战国际史项目”历时多年搜集到的文献。还要提到 Tom Blanton,他鼓励我好好利用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家安全档案馆中搜集到的大量宝贵资料。要不是 Christian 和 Tom 的慷慨相助,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完成。Tom 的那些忠诚的同事们——Malcolm Byrne, Bill Burr 和 Svetlana Savranskaya——多次在关键场合伸出援手,并向我提供了他们一直在搜集的来自俄罗斯、中国、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和美国的文献。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宝贵的资料,我向多位翻译求助。Pierre Du Quesnoy 和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Melnikov 在 2001—2002 年中为我翻译了俄语的文献。我在美国和平研究所访学期间,乔治敦大学的两名热情的研究生 Isaiah Gruber 和 Anton Fedyashin 继续了翻译工作。他俩和 Svetlana 一道在国家安全档案馆搜寻最重要的资料;与此同时,Isaiah 还奔赴哈佛大学,在 Mark Kramer 的指导下,查询了哈佛大学的俄罗斯文献微缩照片馆藏。老东家弗吉尼亚大学的 Tim Naftali 慷慨地和我分享了他手中的苏联赫鲁晓夫时代各次苏共常委会的会议纪要的英文翻译版本。虽然这些材料不能取代对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档案的系统研究,但朋友们提供的翻译材料和帮助,使本书在窥探当年莫斯科的决策时,几乎能达到我分析华盛顿决策时的深度与广度。

许多朋友都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文献收藏,并指引我找到所需的文献。几年前 Kai Bird 把他收集到的 W. Averell Harriman 报告复印件借给我。四处搜寻原件下落后,我决定要前往国会图书馆,那里馆藏有全套的报告,我当年撰写关于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一书时,该报告还不对外开放阅览。Kai 还向我提供了他在研究 McGeorge 和 William Bundy 时搜集到的几份关键性备忘录,帮助我把越南战争



放到冷战这个更大的框架下去研究。在文献搜集方面,没有人比 Bill Burr 向我提供了更多宝贵的指导。他对冷战中后期美国方面的资料的了解无人能及。同时, Nancy Mitchell 告诉我,卡特图书馆(Carter Library)藏有一些我最需要的资料,当我忽略了某些关键性材料时,她还和我分享她收藏的复印件。本书因为朋友们的无私帮助而得到极大丰富。

我的学生们,过去的和现在的,也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前当我在撰写关于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那本书时, James Lewis, Laura Belmonte, Nick Cullather 和 Andy Morris 帮我完成了一项关于“民意对美国政府冷战前期决策的影响”的研究。我之前的几本书都引用了该项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本书第一章中,我依然引用了他们研究中的部分发现来充实自己的论证。Erin Mahan 和 Taylor Fain 也努力帮我捕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卡特政府时期民意的走向。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相关章节有所贡献。乔治敦大学一名才华横溢的本科生 Gregory Pope 希望能找机会丰富自己的研究经历,他帮我通读了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政府时期《时代》、《新闻周刊》和《国会季刊》等各大主要期刊。他提供的诸多短篇报告和文献复印资料大大提高了我对当年民意情况的了解。弗吉尼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 Seth Center, Josh Botts 和 Rob Rakove 也毫无吝惜地和我分享了他们对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卡特政府时期的认识和研究资料。此外, Seth 还提供了无可取代的帮助,整理出本书的参考书目,并帮助我挑选了配套地图和照片。还有一名工作努力的本科生名叫 Sarah Tuke, 她曾写了一篇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政府决策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并把她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重要文献信息赠送给我,尤其是她通过“解密档案参考服务”(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vice)获得的资料。看到学生们日渐成熟、并从他们的智慧中获得启发,这就是教书育人的快乐之处。我实在是幸运至极!

在本书写作的收尾阶段,我有幸得到 Elisabeth Sifton 在编辑方面的大力帮助。十多年前,她帮我确定了本书的概念框架,并在我担任院长及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提醒我不要忘记本书的准备。要求严格又善施援手的她驱使我对手稿中的几乎每个句子都仔细推敲。她提出的问题引导我不断澄清自己的想法、扩大解释的范围。那段日子也是她个人生活中非常艰难的时期,但她仍为本书倾注了大量时间,阅读书稿并提出文本改进意见。我对她感激不尽。

但不论笔者从同事、朋友和学生那里获得了多少帮助,这样一部作品的完成依然少不了来自家庭的爱与鼓励。Phyllis 批判的眼光和思辨的头脑强化了本书的论证并



***** 致谢 *****

让文字叙述更加严谨。她和我们的孩子, Sarah 和 Elliot, 大概都对冷战的话题产生了厌倦, 但他们的耐心、幽默和尖锐让我完成的远不止是一部书稿而已。我感谢他们提供了生活中的美好, 谢谢他们为我创造了如此这般的人生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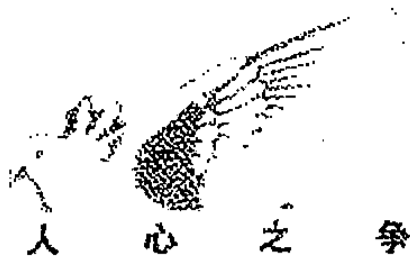
序言

“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总统乔治·H·W·布什在数年前写道，“这是一场对生活方式的斗争。”

十年前当我着手编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意识到自己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冷战。1989至1990年间，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有关杜鲁门当局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书，当时的事态发展令我震惊不已。东欧出现了自由政府。柏林墙倒了。德国统一了。苏美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减弱了。冷战结束了。我之前从未料想到这一切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在不到十年前，冷战还似乎刚进入严重的僵滞状态。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陷入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敌对状态。要员提出发动并赢取核战争。莫斯科与华盛顿的人们读到有关偷袭的报道。这两大意识形态迥异的敌对国心怀恶意，伺机而动，想抓住有利时机占据优势。如果官员没有警觉之心——这是莫斯科与华盛顿通用的语言——敌人便会利用其军事力量施以胁迫。一步退则步步退。同盟国会丧失信心，庇护国则会感到被出卖，世界大国平衡会被打破，而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也会遭受损害。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对民众表示其生活方式已危在旦夕。由此看来，冷战不在未知中延续，便在灾难中终结。

随后，1985至1991这六年间的风云变幻让多数人大为震惊，国际秩序重新进行了势力分布，一场席卷全球近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落下帷幕。

怎么会这样呢？重权在握的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历史的进程改头换面。但如果他们能如此决断地做这件事，我不禁要疑惑其他领导人是否也



该有此行动。冷战究竟为什么持续了如此之久？如果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这般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人都能奋力改善苏美关系，他们的前任不也该这样做吗？难道他们不曾想过走这一步？若是想过，为什么他们失败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成功了？

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档案和回忆录在莫斯科、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北京陆续问世。当我读到众多书籍和文章涉及这些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当我开始研究这些档案本身，我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惊人事实，该事实常被间谍行动、破坏活动、核震慑与傀儡战争等更为戏剧性的细节所淹没：莫斯科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往往认识到他们的竞争是事与愿违的。他们通常了解冷战的动态发展会有哪些不利因素。他们知道正因为这种全球范围的对抗，国内资源分配何者为重、何者为次也发生了变化，军备竞赛毫不明智。他们意识到冷战将他们卷入了亚非的内战和地区冲突，而这无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他们明白千里之外的区域危机可能令他们将应对措施升级，这或许会导致局面失控并引发核交火。

一方面，这些新档案指出，冷战中的领导要比我想象中更明断，或起码更有见识。他们清楚自己正在冒的险，也估量了自己所作的权衡。尽管耐人寻味，这同时也令人费神。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这样一场为全人类招致灾难的斗争？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某些资源是国民所需要的，但却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用军备竞赛和傀儡战争以外的方式展现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偶尔领悟到避免、缓解、脱离冷战将会让他们收获颇丰，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而为什么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事态又发生了转变？

人们就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的行为给出了诸多解释。这些解释多着重于位高权重的人，譬如约瑟夫·斯大林这样出奇残暴的人，或是像约翰·F·肯尼迪这样倡导自由与多样性的人，他们大权在握，对世界随时都可以翻云覆雨，这样的人都对我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另一些解释则聚焦于国际体系的势力分布。他们认为，所有政府对国际环境发展态势的反应都超出其控制。他们试图填补权力真空，要不就力争在遍布威胁的危险世界中立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天真的人受罚还算走运的，而不走运的话便会万劫不复。

但是，政府并不仅仅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管理政府的人们一方面足智多谋，而另一方面也不忘记历史。他们的信念与回忆左右了他们对世事的理解，构成了他们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激发了他们对在国内外有所建树的梦想。

然而这些人并不总能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和重大机



构的制约。倡导民主的政治家们对国内的选民，及立法与行政间的关系很为敏感，他们有时也会关注那些与其观点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集权主义甚至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和具有不同目的和关注的政府机构进行斗争。制定政策时毫不顾及国内选民、政府机构及利益集团，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般的权力真空中行事的领导人。

那些领导人也拥有国外的支持者、正式的同盟者，以及不时地非正式地受到庇护的人，对于有其利益所在的国家，他们极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时而奸猾诡诈，时而真诚无畏。这些同盟国与附庸国从不似表面上那般弱小，大国在谋求霸权时无法不予理会。

为了弄清冷战为何会持续如此之久，我就人类能动的作用进行了思考。我浏览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关注焦点是权力与生存，并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我研究了思想概念、意识形态与历史回忆的影响，思考官员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状况。我权衡了国内舆论、利益集团与政府机构的作用，在这其中军火业与工业也是相辅相成的。我尝试了分析同盟国与庇护国的角色。我渴望追随证据中的蛛丝马迹，时时考虑到那些对冷战中大国行为的种种看似有说服力的解释。当然，这种说法太过天真。这意味着我并没有刻意坚持某一理论，而是易于接受不同思路的解释权。我想考虑所有的理论，用它们与证据相抗衡。

文献资料吸引住了我。1989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新近公布的档案极为有趣，而多数学者在冷战期间从未想过能看到这些内容。它们当然并不完整，但撩人联想。过去15年间，接触俄罗斯材料的机会时有时无。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及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所翻译的文献。为了接触到美国的档案，我在总统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耗费了大量时间。通常情况下，25年之内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只有少量是对外开放的，而许多最为关键的内容如今则可见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及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收藏之中。这些组织及其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的成员组织保有“口述历史”会议，与会的都是冷战中的主要决策人。这些会议的重要文档得到了解密，我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利用。在本书的后几个部分中，我在考察70年代缓和政策失败及80年代冷战结束时用到了这些档案。其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会面的文字记录引人入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之间讨论的文字记录更是发人深省。倘若我能传达出这些资料的丰富含义，我便颇有成就感了。

可是，本书并不是冷战的叙事史。确切点说，本书研究了冷战中的五个“时刻”，也就是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官员在考虑避免或缓和美苏极端紧张与敌对状态时的短暂



间隙。通过探究他们的动机并分析他们之所以作出那些决策的原因，我希望阐明冷战全局中潜在的发展态势。

我所选取的五个作为例证出现的“时刻”是冷战中耐人寻味的段落。美国与苏联的领导人始终都在与纷繁交错的困扰作抗争。战后欧洲的动乱、亚非的非殖民化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德国(与日本)国力的复苏，这些总体的状况都受到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决策人的关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但他们认为可行的选择也深受他们那些思想观念与历史回忆的影响。形势往往超出哪怕世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控制，而由这些形势所引发的对于威胁与机遇的认识是在信念、意识、信仰及经验中形成的。

由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及偶然性很感兴趣，我把焦点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我回顾了斯大林与杜鲁门，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约翰逊，勃列日涅夫与卡特，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布什——在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作出选择之时。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呢？他们是怎样受到局势的限制、盟友或扈从的压力、国内偶发事件的打击、或是信念与历史回忆的禁锢？这些人所努力作出的抉择对他们的人民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至关重要。我希望能传达出他们在面对压力、思索选择、作出抉择时的感觉。他们那些往往令人感到痛苦的决定远不及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有前瞻性。

这些决策者无法控制根本的发展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超乎想象的破坏，激发了意想不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留下了国际舞台上未曾预见的力量分布，并促使了避之不及的原子能军备竞赛。在那之后的三十年间，亚洲与非洲的人民疾呼独立，向往迅速的现代化，提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言谈，而这无论是其过去的殖民宗主国还是莫斯科或华盛顿都无法轻易控制的。战后重建工作一旦展开，有关德日复苏的问题就萦绕在各国首脑的脑海中。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及欧洲各首都的决策人而言，德国的将来无疑是重中之重。德国是否仍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吗？德国会享有和平吗？

国际舞台发展的含义受到思想原则和历史经验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塑造了决策者的观点。莫斯科的领导人坚信他们的政府拥有引领美好生活的方案，而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实际上，新的档案资料揭示了，公众演讲与私下谈话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苏联与美国的官员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体现了更优越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观念与回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现实”的构建——他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对威胁与机遇的认识。领导人很难将自己从观念与回忆中解放出来，即使他们知道那样做是明智的。



因而，本书所谈的是人及其思想、恐惧和希望，是意识形态与回忆，是结构与偶然性。本书认为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官员们时不时地理解到冷战的后果，瞥见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们无法逃避自己的恐惧，也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全球各个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将来，也在争辩不同生活方式的益处，所以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要想理解冷战，就要认识到欧洲人在战争、萧条和种族灭绝后数十年来的幻灭，就要了解德国的可能复苏所引发的恐惧，就要领会亚非拉人民对于自主、现代化和物质进步的渴望。

伴随着如此多的动乱、恐惧与可能，自身的观念与回忆、同盟国与庇护国的压力、选民的要求、军方与民间机构的推动、对国家利益的理性分析都影响了苏联与美国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争夺人心的向背。然而，在他们探求解脱与辩白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自己所作的决定是自相矛盾的。

这段历史中充满了错失了的机遇，然而它也说明了，操纵大权的领导人是在陷入形势、思想和回忆的泥潭时才丧失了机遇。我们对他们的恐惧与希望表示同情，对他们的残暴和愚蠢表示谴责。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努力理解他们的行为，并赞赏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以及布什）的勇气、想象力和决断力，这使他们能够跳出那种曾经禁锢住他们的前任的势力体系。冷战如此结束并非必然。



Contents | 目录

致谢 1

序言 1

第一章 冷战的发端, 1945—1948: 斯大林与杜鲁门 1

革命者斯大林 1

二战中的斯大林 12

杜鲁门 28

斯大林与杜鲁门 38

国际性政治混乱 46

国内政治 57

同盟国与附庸国 63

意识形态、个性特点与国际体系 66

第二章 和平的机会, 1953—1954: 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 71

斯大林之死 71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 80

克里姆林宫中的动乱 98

和平的机会? 105

军备控制, 德国和印度支那 119

恐惧与权力 129

第三章	躲过大决战,1962—1965:赫鲁晓夫,肯尼迪与约翰逊	133
	千钧一发	133
	赫鲁晓夫的退让	140
	肯尼迪等待时机	156
	给和平一个机会	164
	崭新的开始与唐突的收场	176
	约翰逊的痛苦与选择	187
	从大决战回到冷战	208
第四章	缓和政策的远去,1975—1980:	
	勃列日涅夫和卡特	221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	221
	华盛顿的新面孔,莫斯科的老面孔	247
	附庸国、霸权国和同盟国	263
	中国牌	278
	伊朗和阿富汗	289
	维也纳峰会	300
	尼加拉瓜和阿富汗	307
	缓和期的结束	324
第五章	冷战的终结,1985—1990: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	327
	美利坚的清晨	328
	莫斯科的黄昏	353
	军备裁减	362
	撤军	389
	新思维,旧思维	400
	柏林墙的倒塌	411
	东西德的合并	420
	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	430
	结语	433
	参考书目	449
	译后记	479

第一章

冷战的发端, 1945—1948:

斯大林与杜鲁门

革命者斯大林

1909年,科巴走到妻子棺材的后面,手里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她使我的心变得柔软。”他对一个老朋友坦陈。“现在她走了,带走了我对人类的最后一丝情感。”科巴把手放在自己胸口,悲恸不已。“这里,就在这里面,一切都被掏空了,完完全全地掏空了。”^①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这个之后更名为斯大林的男子,青春时期非常喜爱科巴这个名字。在格鲁吉亚的民间传说中,科巴是个传奇式的革命者,一个一心想杀死沙皇的罗宾汉式人物。科巴被一个同伴所出卖,而他也杀死了那个叛徒。约瑟夫在妻子去世几年后逐渐把名字从科巴改成了斯大林,意即“钢铁汉子”。

^① 引自罗曼·布拉克曼(Roman Brackman),《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档案:隐秘的生活》(*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 A Hidden Life*),伦敦:弗兰克·卡斯(London: Frank Cass),2001,73。同样的引用,在翻译上有略微差别,出现于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斯大林:传记》(*Stalin: A Biography*);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70;黑宫广明(Hiroaki Kuromiya),《斯大林》(*Stalin*),哈洛,英格兰:培生出版公司(Harlow, England: Pearson),2005,18。



从传奇英雄到钢铁汉子，这就是斯大林自我形象的演变。^①

1909年，斯大林31岁。他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但充满着热忱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俄国的监狱和劳动营进进出出，不断躲避着警察和国内放逐。他没有知交，与他人也没有亲密的联系，或许他的母亲和妻子除外。他在格鲁吉亚长大，从小饱受父亲的拳脚，之后还被其抛弃，是母亲养育了他。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她把年幼的斯大林送去了哥里教会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他是个诚恳、聪明、有抱负的学生。那其实是他仅有的几年正规教育，而那几年也留下了显著的烙印。斯大林学会了在绝对中思考问题——比如在教条、仪式和奋斗中。^②然而他却很轻视宗教。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后来写道：“无穷的祷告和强加的宗教规诫使他对所有神圣、崇高的事物产生了偏激的怀疑。”^③

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了斯大林的宗教式的信条、仪式惯例和革命之道。当他还是名神学院的学生时，就已经精通俄语并开始偷偷阅读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899年，21岁的他离开了神学院，转而支持一小群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开始在第比利斯和巴库的工人阶级中进行鼓吹活动。斯大林从没有过任何真正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革命。^④

是什么激发斯大林成为一个革命者呢？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是他最权威的传记作家也几乎无法作出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过去几年后，那时距离他登上权力顶峰还有漫漫长路，他是这样回答这一问题的：“很难描述这一过程吧。首先人们确信眼前的形势是错误的、不公平的，然后就会下定决心去找出最好的补救方法。”^⑤

然而事实上，斯大林写到和谈到不公正这一问题的仅仅是只言片语。“他有颗冷

① 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斯大林:国家的毁灭者》(*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纽约:企鹅(New York: Penguin),1991,14;艾尔弗雷德·J·里伯(Alfred J. Rieber),“斯大林,边缘地带的人”(“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美国历史评述》(*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6(2001年12月):1651—1691。

② 有关年轻时的斯大林及这些宗教学校的影响,见瑟维斯,《斯大林》,13—31;黑官,《斯大林》,207;康奎斯特,《斯大林》,16—26;季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Dmitri Volkogonov),《斯大林:胜利与悲剧》(*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纽约:格罗夫·韦登菲尔德(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8,7,229。

③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仅仅一年》(*Only One Year*),伦敦:哈钦森(London: Hutchinson),1969,341。

④ 瑟维斯,《斯大林》,13—101;黑官,《斯大林》,1—25;康奎斯特,《斯大林》,16—49;亚当·B·乌拉姆(Adam B. Ulam),《斯大林:他和他的时代》(*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纽约:维京出版社(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73,16—126。

⑤ 康奎斯特,《斯大林》,22;黑官,《斯大林》,6。

酷的心。”谢尔格·贝利亚(Sergo Beria)这般说道,他是斯大林手下一个秘密警察头领的儿子,同样也是个内心冷酷的人。一位出色的斯大林俄语传记作者写道:“斯大林的思想中完全找不到高贵的特征,也没有人道主义的痕迹,更谈不上人类之爱了。”^①斯维特拉娜尖锐地指出她父亲参与革命运动“并不是作为憧憬美好未来的理想主义梦想家,就像我母亲一家那样……;并不是作为像高尔基那样热情洋溢的作家,用浪漫的夸张手法描绘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之所以选择革命者的道路,是因为他内心有一团反对社会的冰冷火焰在燃烧,在这样一团火焰中,他处于阶梯的底部并可能终其一生都停留在那里。他想要的多到数不清,而除了革命就没有其他道路是对他开放的了。”^②

身为一名年轻的革命者,斯大林对必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目烂熟于心。他是名积极的宣传员和作家。但是这些年里他从未写过任何实质性的内容,除了关于如何在一个革命的多民族国家中对待非俄罗斯的民族团体。在战俘集中营里和流放过程中,斯大林往往更喜欢与罪犯和强盗为伍,而非那些革命同志。他有极佳的记忆力和深刻的思想,可他选择的是规划、操纵、组织和行动。^③

斯大林凭其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自律精神在革命战友中声名鹊起。1917年2月沙皇统治被推翻时,列宁相信他能够依赖斯大林达成宏图伟业。4月,列宁就斯大林参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给予支持。^④

布尔什维克在11月夺取政权之后,斯大林担任了举足轻重的军事职位。新政府面临着国内外的众多敌人。英国、法国、波兰、日本和美国都派遣军队援助分布于各战线的众多反布尔什维克集团。斯大林完全成了军阀式的军事领袖。他征发食品供给,组织地方上的契卡分部和新的秘密警察,接管区域性的军事活动。他冷酷无情,狡猾残忍。他厌恶听命于人,在整场国民战争中都与红军总司令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争论不休。但斯大林非常听从列宁,后者的领导地位是从未受到挑战的。^⑤

① 谢尔格·贝利亚,《贝利亚,我的父亲: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之内》(*Beria: My Father: Inside Stalin's Kremlin*),弗朗索瓦斯·汤姆(Françoise Thom)(编),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译),伦敦:杰拉尔德·达克沃思(London: Gerald Duckworth),2001,148;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235。

②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341;另见黑官,《斯大林》,7。

③ 瑟维斯,《斯大林》,43—112;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5—12,225—236;康奎斯特,《斯大林》,27—57;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45;莫什·卢因(Moshe Lewin),《苏联世纪》(*The Soviet Century*),格雷戈里·埃利奥特(Gregory Elliott)(编),伦敦:威尔索(London: Verso),2005,19—20。

④ 瑟维斯,《斯大林》,113—153;乌拉姆,《斯大林》,47—157;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27—57。

⑤ 瑟维斯,《斯大林》,150—185;乌拉姆,《斯大林》,167—191;康奎斯特,《斯大林》,72—95。



1922年4月，布尔什维克挫败了国内的敌人，击退了国外的联盟干预，并且巩固了政权，这之后斯大林被任命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传记作家都认为，斯大林利用这一关键职位，逐步走向权力的垄断。列宁看到了这一切。1923年，正处弥留之际的列宁为党内的领导权问题焦头烂额，因为他意识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可能会分裂全党并破坏革命。他毫无解决方法。但是他警告道：“斯大林同志自从当上秘书长以后就将无限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而我不确定他将来是否能足够谨慎地利用那样的权力。”他把斯大林写成一个“过于粗鲁”的人，斯大林的工作应当转交给另一个“对待同志更为耐心、忠诚、尊重、关注，不那么反复无常”^①的人。

斯大林并没有被免职。他机敏地施展谋略，利用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嫌隙，比如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起初，斯大林并没有在管理经济、处理农民问题和实行快速的经济现代化上表明清晰立场。1924年，他撰写了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理论文章《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他的同志们一个也没有将其看作解决基本事务的理论依据。正当党内的左派和右派就市场角色、农业组织和工业化进程争论不休时，斯大林将矛头转向托洛茨基分子，在与左派的较量中以智取胜。他随后接受了后者所提出的消灭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计划，因为该人倾向于跟富农合作，还对迈向社会主义有了更为和平的革命过渡的展望。到了1930年，斯大林已经是飞速工业化和集体化最狂热的支持者了。^②

对斯大林和他在全党和全苏联内部稳步上升的支配地位产生影响的是他高明的两可态度、对实效的狂热注重，以及机会主义。一名杰出的斯大林传记作家写道：“他对于危机和改变的适应非常缓慢，这一点是很显见的。他在每个关键时刻的反应都是先敷衍一番，再深思一番，随后才是去适应新情况。”^③一个重要副官写道：“在艰难的政治局势下，他经常会变得不知所措，但他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迟疑，往往在事后

① 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78—82；有关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强烈反感，见卢因，《苏联世纪》，12—18；有关双方关系更微妙的观点，见瑟维斯，《斯大林》，190—218。

② 瑟维斯，《斯大林》，219—250；黑官，《斯大林》，50—100；康奎斯特，《斯大林》，96—170；罗伯特·C·塔克(Robert C. Tucker)，《掌权的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纽约：W·W·诺顿(New York: W. W. Norton)，1990，25—145；乌拉姆，《斯大林》，192—358。

③ 康奎斯特，《斯大林》，69；有关强调其狂热和实用主义的更值得称赞的观点，见瑟维斯，《斯大林》，94。

才采取行动,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①

任何人都不该对这些策略高超的转变感到过于惊讶。斯大林很喜欢引用列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识真正的生活”,将这句话看作不折不扣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不会也不能只在原地踏步”的科学。它的“主张和结论势必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势必会被针对新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新结论和新主张所替代。”^②斯大林的思维总是流畅、灵活、有序而得当。但是理论和思想对他而言还是相当重要的,尽管他的思想是简洁且变通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研究。社会是为一定的法律所统治的。共产主义象征着未来。变化无可避免。斗争必不可少。理当夺取和保持权力。

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理论和思想为理解世界和诠释事件提供了框架,为认识威胁和把握机遇提供了指导,使得人们能够清晰地看清阶级力量的万般联系,洞悉帝国主义强权的行动和阴谋。^③

斯大林相信“每场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权力问题”^④。共产党不得不在苏联国内保留其权力。由于还不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共产党只得动用国家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仅以此证明其权力。^⑤斯大林写道:“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将为世界历史开创一个新纪元。”^⑥

但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从里到外都在受到危害。思想和经验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使革命已经结束,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必须予以去除。斯大林说道,无产阶级国家应当摆脱法律的限制,动用武力镇压资产阶级。但这需要时间,

① 引自罗伊·A·梅德韦杰夫(Roy A. Medvedev),《关于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On Stalin and Stalinis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

②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短暂的生涯》(*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Short Course*),纽约:国际出版社(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335—358;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收录于布鲁斯·富兰克林(Bruce Franklin)(编),《斯大林选集:主要理论著作,1905—1952》(*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1952*),纽约:锚版图书(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102—105。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04—106;瑟维斯,《斯大林》,93—94。

④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21。

⑤ 约翰·古丁(John Gooding),《俄国的社会主义:列宁与其遗产,1890—1991》(*Socialism in Russia: Lenin and his Legacy, 1890—1991*),洪兹米尔:帕尔格雷夫(Houndmills: Palgrave), 2002, 142; 卢因,《苏联世纪》,37。

⑥ 苏共(布),《短暂的生涯》,273。



需要完整的历史时期。同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作为其依靠。党必须拥有“意志的统一，完全而绝对的行动的统一”^①。

国内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际舞台更是危机重重。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在于镇压革命。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斯大林开始相信布尔什维克已经不能坐等着革命在国外的胜利。他们必须“巩固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的专政，以此作为战胜在所有国家内的帝国主义的基础”^②。对于斯大林而言，资本主义的孤立政策是一个不间断的致命危险。苏俄是弱小的。然而，整个“俄国的历史就是她承受落后所致的鞭笞时不屈不挠的历史。她曾受蒙古可汗鞭笞，她曾受土耳其人鞭笞，她曾受瑞典的封建君主鞭笞，她曾受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鞭笞，她曾受英国和法国资本家鞭笞，她曾受日本男爵的鞭笞。她之所以受到鞭笞，只因她的落后”^③。

当务之急是让苏俄变得强大起来。迅猛的工业化迫在眉睫。“国家的工业化将能保证经济独立，加强防御力量，并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创造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斯大林声称他在国内的一些政敌，比如布哈林，会不知不觉地破坏革命。他们的政策会让苏俄继续停留在农业国家的层面上，生产农业食品，出口原材料，进口机械。这样的计划相当于“令苏联处于工业强国的经济奴役之下，这样的计划会使苏联在工业上永远处于落后状态，满足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帝国主义匪徒的利益”。^④

斯大林无法忍受这样的方法。他之后解释道，计划中的第一个任务是“确保社会主义经济不受资本主义孤立的独立自主。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一场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战斗”^⑤。1931年，斯大林告诫工业企业主：“步子不允许慢下来！……放慢步子就意味着落于人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是不想挨打的。不，我们绝不能挨打。”^⑥挨打就意味着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失败。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22—126, 172—183。

② 出处同上，157。

③ 苏共(布)，《短暂的生涯》，314。

④ 出处同上，276—277；瑟维斯，《斯大林》，253—264；黑宫，《斯大林》，74—100。

⑤ 伊桑·波洛克(Ethan Pollock)，“与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第33号工作文件(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33)，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ashington D. C.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2001, 6。

⑥ 苏共(布)，《短暂的生涯》，314。

为避免失败并迅速实现工业化,斯大林必须消除他的敌人们。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压制那些单干农民,因为共产党认为单干农民拒绝将粮食发送到城市中,并且反对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1928年到1929年,在斯大林下令实施农业集体化后,1500万人被迫加入集体农场;那些反对者遭到逮捕,被遣送去劳动营或被处决。然后他对国家的粮食运送提出了更高要求。1932年到1934年爆发了饥荒,他却毫不关心,数百万人死于饥饿。他要求所有人都缄口不言,稍提到饥荒就会丧命。^①

和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ezhda Alliluyeva)在一起时,斯大林表现得冷酷而专横。在抑郁、嫉妒和偏头痛的折磨下,她于1932年选择了自杀。斯大林感到羞愧,表现出少有的悲痛。“我不能再这样过日子了。”他悲叹道。他威胁要隐退,反复思考着要自杀。但是他活着并统治着。实际上,他变得更冷漠、更多疑、更偏执。历史学家罗伯特·瑟维斯写道:“寒冰进入了他的灵魂。”^②

在1932年到1938年之间,斯大林消除了政治局和克里姆林宫统治组织内所有反对的声音,尽管还存在仅有的一些反对者。他对权力的渴望是无限的。光击败政敌还是不够的;斯大林现在必须把他们全都处决了。他们可能公开认错;他们可能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必须得死。受尽折磨之后,他们可能错误地承认自己合谋反对斯大林、国家或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必须得死。他们可能承认自己与国外的敌人阴谋勾结,但是他们必须得死。他曾经的革命同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被枪毙了。朋友和亲戚被枪毙了。行刑者也被枪毙了。在1937年到1938年间,他签署了383份名单,立即把40000人送上了黄泉路。通过无处不在的下级干部,他鼓动了恐怖统治。总共有将近一百万人死于1937年到1938年的肃清;数百万人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和北极的拘留营,或被送去古拉格,人们在劳动、饥饿、疾病

① 黑官,《斯大林》,101—117;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159—173;康奎斯特,《斯大林》,156—165。

② 瑟维斯,《斯大林》,297;有关斯大林妻子之死和独裁者反应的具体内容,见西蒙·西巴格·蒙特费奥雷(Simon Sebag Montefiore),《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3,1—18;引言在第18页上。另见罗莎蒙德·理查德森(Rosamond Richardson),《斯大林的阴影:世界上最大暴君之一的家庭内部》(*Stalin's Shadow: Inside the Family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Tyrants*),纽约:圣马丁出版社(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3,119—135。



和绝望中死去。^①*

党内高级官员与斯大林有着相同的恐惧。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政策正在走向失败。数百万农民和城市业主感到愤怒和慌乱；另外的数百万人要么被杀，要么饿死。“没有人真正了解经济正如何运作或者该如何运作，甚至连新领导人都对此不得而知。”^②莫斯科的党内高层归罪于地方领导；地方领导指责他们在当地的敌人；基层的共产主义者则对他们鄙视的当地领导实施报复。1937年到1938年，结果是大规模的恐惧和大规模的谋杀，有些是从上层延传下来的，有些则是从底层激发上来的。但集合起这些罪犯的是他们的不安，是他们对政权安全的恐惧，以及他们对已与社会主义成功连为一体的自身前程的关切。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则反过来依赖于苏联革命实验能否继续，而后者则依赖于维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一致团结和高度纪律性，以及对一个时常对政权表现敌意的社会的控制”^③。

自此以后，党内的领导团结在斯大林这个掌控一切并维护革命的钢铁汉子身边。反之，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追随者们需要一个沙皇，一个超越所有凡夫俗子的、高瞻远瞩的沙皇。在那些了解他的人中，即使受到他迫害的人都没有质疑他镇压反革命的权力。在面临死亡之际，布哈林给过去的同志科巴写了一封信，请求他饶命，但同

① 康奎斯特，《斯大林》，171—209；黑官，《斯大林》，122—128；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古拉格：苏联集中营的历史》（*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伦敦：艾伦·莱恩（London: Allen Lane），2003，68—72，103—118；休·拉格斯代尔（Hugh Ragsdale），“革命社会历史的比较撰史：英国，法国，俄国”（“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Revolutions: English, French, and Russian”），《历史社会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3（2003年夏/秋）：348—352。

* 译者注：关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受迫害的人数至今未有全面、准确的统计，各种数据来自不同的文献资料和统计口径，因此有较大差异。据1956年苏共中央调查“大清洗”事项委员会和195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提供的材料，1935—1940年，因“反革命罪”被逮捕者为1920635人，其中被处死688503人；在“大清洗”高潮阶段，即1937—1938年，被逮捕者为1548366人，其中被处死681692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根据解密档案对“大清洗”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统计数据，如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根据大量档案资料得出的数字为：1937—1938年苏联共逮捕了3141444人，其中政治犯为近250万人。但这些数据仍然是不完整的，它不包括同一时期因“消灭富农”运动而受迫害的农民、因“强制民族迁移”而被流放的一些少数民族等。（参阅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马龙闪：《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 J·阿奇·格蒂（J. Arch Getty）和奥列格·V·诺莫夫（Oleg B. Naumov），《恐怖之路：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1939*），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573。

③ 出处同上，11。



时也无比真诚地承认, 他“非常明白的一点是, 伟大的计划、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利益高于所有的一切, 我也知道把自己的个人问题与世界历史任务相提并论显得太过狭隘, 而那些是您肩上最首要的任务”^①。

战争时期压在斯大林心头的问题是背叛。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都忧心忡忡, 怕国内一些持有异议且幻想破灭的工人、心怀不满的农民和少数受到侵害的人会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肃清和流放的重点对象是可能在战时成为“第五纵队”的国家和社会团体。^② 许多年后, 时任主席的维·米·莫洛托夫(V. M. Molotov)承认, 许多遭到清洗的人实际不是间谍。但是他们不可信任。^③

德国人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卷土重来, 莫斯科为此人心惶惶。斯大林料想会有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预言了战事, 但究竟会爆发一场克里姆林宫资本家与法西斯敌人(可能危害到苏联)间的战争, 还是会发起对苏联的直接攻击, 一切并不明确。意识形态提供了竞争的策略视角和未知的解决方法。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提出, 要和愿意与克里姆林宫合作的资产阶级政党及政府形成广泛战线。斯大林自己也对这一选择盘算了多年, 只是并没有太大的把握。直到 1938 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 他对这个想法的热情才戛然而止, 后来的西方同盟国在 1939 年的慕尼黑会议上采取绥靖政策, 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那部分地区。斯大林还对日本人的进攻担心不已, 又完全看不到英国对合力对抗希特勒表现出诚意, 因此斯大林掉转方向, 派他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于 1939 年 8 月与德国签署了声名狼藉的“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看到了新格局下的两大利益: 苏联避免了被立即牵扯进这场席卷全欧洲战争, 同时也能通过其在东欧

① J·阿奇·格蒂和奥列格·V·诺莫夫,《恐怖之路: 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 1932—1939》, 557。

② 见奥列格·赫列夫纽克(Oleg Khlevniuk), “‘高度恐惧’的原因: 外交-政治方面”(“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Terror’: the Foreign-Political Aspect”); 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西斯战争威胁与苏联政治”(“The Fascist War Threat and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30s”); 安德烈亚·罗马诺(Andrea Romano), “永久的战争恐慌: 动员, 军事化和农民战争”(“Permanent War Scare: Mobilisation, Militarisation and Peasant War”), 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和安德烈亚·罗马诺(编), 《战争年代的俄罗斯, 1914—1945》(*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1945*), 米兰, 意大利: 詹贾科莫·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黑官, 《斯大林》, 121—128; 瑟维斯, 《斯大林》, 346—356。

③ 格蒂和诺莫夫, 《恐怖之路》, 447, 490; 艾伯特·雷西斯(Albert Resis)(编), 《莫洛托夫回忆录: 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 对话费利克斯·楚耶夫》(*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芝加哥: 伊万·R·迪伊(Chicago: Ivan R. Dee), 1993, 256, 265, 339。



的势力范围着手寻求安全”^①。

斯大林利用与纳粹德国的结盟来表现其机会主义。他进攻波兰东部，并驻军于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为获取更进一步的防御地形而挑起了与芬兰的战争。他始终相信“要想摧毁国外资本主义干预，就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孤立政策”^②。

这些国家的人民命运非常悲惨。斯大林主义那时在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重复了在国内用过的那些手段。土地被征用没收，财产被收归国有，当地官员和商人被枪毙或囚禁。两百万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最荒凉的地方。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约有两万波兰军官遭到围捕，并在卡廷和其他地区的寂静森林中被有计划地枪决。任何可能的对苏联控制的抵抗都无法被容忍。^③

斯大林明白他将不得不与德国有一场战争，尽管他已经尽可能去延缓这场战争了。他猛然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野心勃勃地明确了在东南欧、伊朗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他的新安全观将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海峡和波斯湾都囊括在内。但是正如

①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俄罗斯战争》(*Russia's War*),伦敦:企鹅,1997,34—72;西尔维奥·庞斯,《斯大林与不可避免的战争,1936—1941》(*Stalin and the Inevitable War, 1936—1941*),伦敦:弗兰克·卡斯,2002,180—181,222—223,引自181;伦纳特·塞缪尔森(Lennart Samuelson),“战时观点与经济计划:图哈切夫斯基和军事-工业综合体,1925—1937”(“Wartime Perspective and Economic Planning: Tukhachevsky an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1925—1937”),庞斯和罗马诺(编);《战争年代的俄罗斯》,207—210。

② 苏共(布),《短暂的生涯》,274;瑟维斯,《斯大林》,399—409;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从世界大战到冷战,1939—1953》(*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7,30—60。

③ 简·格罗斯(Jan Gross),《来自国外的革命:苏联对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征服》(*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奥弗里,《俄罗斯战争》,52—53;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与卡廷屠杀”(“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收录于《斯大林与其时代》(*Stalin and His Times*),杰弗里·罗伯茨(编),科克:爱尔兰俄罗斯与东欧研究协会(Cork: Irish Association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2005;另见史蒂文·梅里特·迈纳(Steven Merritt Miner),《斯大林的圣战:宗教、民族主义及联盟政治,1941—1945》(*Stalin's Holy War: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Alliance Politics, 1941—1945*),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3,27—89;杰夫·斯温(Geoff Swain),《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德维纳上的阶级战争与种族战争》(*Between Stalin and Hitler: Class War and Race War on the Dvina*),伦敦:罗德里奇·柯曾(London: RoutledgeCurzon),2004。



一些作家所言,他还没有做好率先发动进攻或侵略战争的准备。^①

斯大林想要赢得时间,尽其所能利用他所认为的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冲突,也就是在列宁理论中早就预计到的斗争。与此同时,他知道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设法绥靖希特勒。经过大清洗,斯大林损失了大量军官,他的新同志需要时间训练部队,以及有效部署、形成兵力。他行事谨慎,唯恐挑起德国的进攻。1941年春天,他对入侵逼近的再三警告置若罔闻。一名德国士兵在战斗前夕临阵脱逃并警告苏联次日就会发动进攻,斯大林下令枪决了那名士兵。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都在猜想希特勒会在击败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手后,或是集结了麾下的所有军力后才会进攻苏联,或者要等到春天,距冬天时一场进攻战役不过数月。^②

1941年6月22日,德军146个师穿过一条非常开阔的战线入侵了苏联。希特勒的目的是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受他奴役的国家,只是斯大林完全没有认清这一点。^③意识形态歪曲了他对敌人的看法。然而那时,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革命爱国主义”,意即保护苏联。^④

①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34—72;更确切的描述,见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Gabriel Gorodetsky),《瞒天过海》(*Grand Delusion*),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斯大林的失策:二战东线的悲惨开端》(*Stalin's Folly: The Tragic First Days of World War II on the Eastern Front*),波士顿:霍顿·米夫林(Boston: Houghton Mifflin),2005,56—57,81—83,本书关于先发制人打击观点的说服力虽不尽如人意,但尚可参考;优秀的史料论文,见泰迪·J·乌尔德里克斯(Teddy J. Uldricks),“打破僵局的争议:斯大林是否计划袭击希特勒?”(“The Icebreaker Controversy: Did Stalin Plan to Attack Hitler?”),《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 58(1999年秋):626—643;最新综述,瑟维斯,《斯大林》,406—414;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61—81;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1941年6月:希特勒与斯大林》(*June 1941: Hitler and Stalin*),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庞斯,《斯大林与不可避免战争》,150—185;奥弗里,《俄罗斯战争》,34—72。

③ 斯大林的错误记述于戴维·E·墨菲(David E. Murphy),《斯大林所知道的:巴尔巴罗萨之谜》(*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普列沙科夫,《斯大林的失策》;黑官,《斯大林》,133—152,本处提供了出色的概括。

④ 庞斯,《斯大林与不可避免战争》,175—181;埃里克·范·雷(Erik Van Ree),《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20世纪革命爱国精神探究》(*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ary Patriotism*),伦敦:罗德里奇·柯曾,2002,211;戴维·布兰登伯格(David Brandenberger),《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群众文化以及现代俄罗斯民族性的形成,1931—1956》(*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



二战中的斯大林

1942年8月14日，在德国入侵一年多以后，《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特别的文章《让儿童杀手见鬼去吧》，第二天这篇文章就被苏联境内的各地方报纸转载了。文章的一开始就提到，战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希特勒那些法西斯恶棍和两足野兽所犯下的暴行。在他们占领的每一片土地上，卑鄙无耻的压迫者强奸妇女、折磨老人、虐待战俘、伤害无辜的儿童。同志们，读一读这些句子吧，惨剧还在继续；读一读这封信吧，这是身在斯摩棱斯克的姑娘写给她们身为红军的哥哥的。

薇拉和季娜写信告诉哥哥科利亚，她们难以描绘正在忍受的一切。希特勒的刽子手逮捕了瓦利娅·伊凡诺娃，地方革命委员会的秘书要她说出当地革命党人的名字。她们捆住她的双手，把她的孩子带进来并割去他们的右耳。然后他们剜去她儿子的右眼，又砍掉她女儿的五根手指。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这般摧残，瓦利娅心脏病发作而亡。那群纳粹人渣随后进军到邻村，抓住更多孩子和老人，强迫他们进入一个棚屋中，然后放火烧了那里。

文章的结尾处是一段长长的告诫。我们必须忍受，我们必须继续战斗，我们必须消灭德国纳粹。干掉德国人，干掉这些吞食儿童的野兽。要么就是我们打败德国佬，要么就是他们歼灭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苏维埃战士们，一步都不能退却！救救我们，红军的战士们，顿河和库班河的守护者。救救我们！孩子们的血债要血偿，让儿童杀手见鬼去吧！^①

痛苦，悲伤，死亡，这些无处不在。在战场上和德国集中营里，纳粹杀害了九百万苏联士兵。战场之外，纳粹丧心病狂，无恶不作。正如他们的一个将军公然宣称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消除意识形态的战争”^②。

① “让儿童杀手见鬼去吧”(“Death to the Baby-Killers”),《真理报》(*Pravda*), 1942年8月14日。季米特里·波贝达什(Dmitry Pobedash)和达吉亚娜·列昂诺娃(Tatiana Leonova)让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对此本人深表感谢。本文还发表在次日,即1942年8月15日的主要地方报纸上,如《乌拉尔工人报》(*The Uralian Worker*)。

② 凯瑟琳·梅里代尔(Catherine Merridale),《墓石之夜:20世纪俄罗斯的死亡与回忆》(*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Twentieth Century Russia*),纽约:古典书局(New York: Vintage), 2001, 227—228;杰弗里·P·梅加吉(Geoffrey P. Megargee),《毁灭之战:东线的战斗与种族灭绝,1941》(*War of Annihilation: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兰汉姆,马里兰州:罗曼和利特菲尔德(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在德国占领的苏联土地上,他们摧毁了超过 1700 个城镇和 70000 个村庄,令超过 2500 万人无家可归。在这些被占领地区,他们谋杀了 700 万平民,还有 400 万人在饥饿、疾病和冷漠中死去。德国人另外又俘虏、流放了 500 万成年人当作劳工,逼他们像奴隶一般干活。总的来说,战时苏方有 900 万士兵和 260 万至 270 万儿童死亡。可是,这些冰冷的数字根本无法描述出几乎每个受尽折磨和困苦的苏联人的个人悲剧。即便存在着新的档案、日记、回忆录和口头陈述,我们仍几乎无法想象那些年的悲伤和艰苦。“实际上每个人都被卷入了战争,又因战争经历受到了精神创伤。”^①

然而,伴随着悲痛的是熊熊的复仇烈焰。“要是你哪天没有杀死一个德国人,你就荒废了那天。”苏联最著名的战时通讯记者和战后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写道,“杀完一个德国人就再去杀一个:没有比德国人的尸体更让我们兴奋的了。你的母亲对你说:杀死德国人!你的孩子请求你:杀死德国人!你的国家带着呻吟低语:杀死德国人!不要放过他!不要让他逃走!杀!”^②

大规模屠杀对于斯大林来说并不新鲜。但现在他的社会主义实验岌岌可危,他的个人权力受到威胁,他的国家处境危急。他错误估计了他的敌人。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因而勃然大怒。当他听到对希特勒军队最初几天残忍行径的报道,他咕哝着:“列宁创建了这个国家,我们却把国家毁掉了。”^③1941 年 6 月底的那段骇人日子中,斯大林努力部署前线、支撑后防,但传来的消息总是令人泄气。^④数百个苏联师被歼灭。纳粹部队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德萨进军。他们进行战争的方法很

① 安娜·克里洛娃(Anna Krylova),“受伤灵魂的治愈者:苏联文学私密生活危机,1944—1946”(“Healers of Wounded Souls: The Crisis of Private Life in Soviet Literature, 1944—1946”),《现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2001 年 6 月):308—309;凯瑟琳·梅里代尔,《伊凡的战争:红军的生与死,1939—1945》(*Ivan's War: Life and Death in the Red Army, 1939—1945*),纽约:大都会书局(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和卢巴·维诺格拉多瓦(Luba Vinogradova)(编并译),《战地作者:瓦西里·格罗斯曼与红军,1941—1945》(*A Writer at War: 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纽约:众神书局(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5;杰弗里·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谢谢,斯大林同志:从革命到冷战的苏联公共文化》(*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163;埃琳娜·苏布科娃(Elena Zubkova),休·拉格斯代尔(Hugh Ragsdal)(译并编),《战后俄罗斯:希望、错觉与失望,1945—1957》(*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纽约:M·E·夏普(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20ff.

② 引自梅里代尔,《基石之夜》,222—223。

③ 引自奥弗里,《俄罗斯战争》,78—79;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405—412。

④ 普列沙科夫的《斯大林的失策》对此有逐日批评和描述。



快就一目了然了：战犯、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一律遭到屠杀。

6月27日，“斯大林突然停止了指挥”。他带着怒气独自躲回位于昆采沃的乡间别墅。当政治局成员6月30日到那里找到他时，斯大林看上去消瘦憔悴而又迟疑不决。他有点怀疑他们是来逮捕他的，于是问道：“你们来做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去找他指挥武装部队并激励人民的。除了斯大林，没有任何人能挽救濒临完败的社会主义实验。^①

7月3日，斯大林向全国发表正式讲话。他对爱国主义的向往比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更为急切，他告诉那些被他称为“朋友”和“兄弟姐妹”的听众，他们的国家是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遭受袭击的。祖国正岌岌可危。爱国主义需要牺牲。敌人虽然残暴，但一定会被击败。这会是一场不寻常的战争；这会是一场全面的战争。第二天，《真理报》称之为“卫国战争”^②。

可是，言语无法阻止纳粹军队。他们推进了三条战线，包围了列宁格勒，并向莫斯科方向前进了数百里。混乱充斥着前线，恐惧也接踵而至。斯大林下令撤离首都。妇女和儿童逃离了城市，留下的只是一些暴徒洗劫店铺家舍。斯大林告诉亡妻的妹妹：“一切都糟透了！你赶快撤离。谁都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别人眼里，斯大林看起来慌乱、甚至崩溃。^③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260万红军战士在战斗中牺牲，将近350万人被关入监狱，50万人被枪决。^④

平民承受着持续不断的痛苦。在明斯克，纳粹实施的是“永久恐惧”统治。随意的谋杀行为成为一种规范。在列宁格勒周边，纳粹断绝了食物和燃料的流入。在那个受困的城市中，每天都有数千人死于饥饿。在乡村，纳粹有计划地杀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⑤

但斯大林的钢铁意志浑然不动。毕竟，他仍是那个钢铁汉子。他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是亲自担任战争的全面指挥。对那些比他弱的人，他毫不心慈手软。他下令士

①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78—80；黑官，《斯大林》，152。

②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79。

③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352。

④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117；梅里代尔，《基石之夜》，227。

⑤ 尤韦·加滕施拉格(Uwe Garternschlager)，“在被占领的明斯克生活和生存”(“Living and Surviving in Occupied Minsk”)，罗伯特·W·瑟斯顿(Robert W. Thurston)和伯恩德·邦韦奇(Bernd Bonwetsch)，《人民的战争：苏联对二战的反应》(《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21；奥弗里，《俄罗斯战争》，107。



兵不准撤退;要是他们撤退,就要遭到枪毙。他下令士兵不准投降;要是他们投降,就永远得不到原谅。要是军官任凭自己被擒,他们的妻子就要被捕。当斯大林的儿子——那个他在第一任妻子的葬礼上怀抱着、紧接着就交给别人照顾的婴儿——被德国人捕获时,斯大林拒绝提出交换战俘。他的儿媳遭到逮捕,被送去一个劳工营里呆了两年。^①

斯大林清洗并枪毙了那些他认为要为苏联的悲剧负责的军官。他逮捕并流放了数百万日耳曼人、鞑靼人,以及另外一些他认为不够忠诚的少数民族。尽管他将红军的命运、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防御都寄托给了年轻的将军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一个天才的军人:顽强、勇敢、灵活、严格——他从未完全信任后者,甚至害怕朱可夫日益增强的声望。但斯大林足够精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一个决断力和想象力兼备的指挥官。1941年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外组织了一场反攻。他重整自己的部下,调集另外一些来自远东的师,利用了困扰敌人的严寒和暴雪。他的士兵在战斗中表现神勇,因为他们明白国家已危在旦夕。当他们前进好几公里进入德军占领的城镇,他们目睹了纳粹留下的暴行:被烧毁的房屋,饥肠辘辘的儿童,遭蹂躏的妇女。常能看到吊死在树上的共产党人,他们残缺的尸体早已结冻,在风中悬荡。^②

斯大林期盼着英国能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从而分散纳粹兵力,缓解俄军压力。与此同时,他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大量的军火、卡车和食物。1941年9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使者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会谈。12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也同样如此。他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指望苏联能够在纳粹的猛烈攻势下挺过来。大多数人认为苏联会投降,赶上波兰和荷兰、捷克和法国的后尘。斯大林心里不服,嘴上却恳求着。他极度需要西方的帮助,但他也意识到他们极度需要他继续战斗下去。

从一开始,斯大林就对英国和美国明确表示,尽管他非常需要对方提供物资和开辟第二战场,可无论战后布局如何,他都打算把1939年和1940年强占的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版图。眼看着德国人在他的国家大肆掳掠,威胁到他的地位,

①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给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20 Letters to a Friend),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Priscilla Johnson McMillan)(译),纽约:哈珀&罗(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185;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80—81; 黑宫,《斯大林》,152—154。

②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73—124; 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82—117; 关于斯大林和朱可夫,见普列沙科夫,《斯大林的失策》,188—189, 250—253。



使他更担心自己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了。他决意获取更多领地，由此使边疆安全稳定，但他也向往能与战时的盟友缔结持久的盟约。1942年6月，斯大林令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告知罗斯福，他与美国总统观点一致：“应由英、美、苏建立能够阻止侵略的联合军事力量，否则难以保障未来的和平。”^①

但是未来和平计划被战争的紧迫性所替代了。苏联人民能否战斗下去还不为人知。在波兰、波罗的海，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在苏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苏联人或叛逃，或与敌串通。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还在隐忍而又英勇地战斗着。他们自始至终都被夺回土地、房屋与国家的热情所驱使，当然还包括复仇的渴望。那个时代的报告、回忆录、诗歌和文艺作品都能证明深切的绝望与“诱人”的复仇。“俄国人民是伟大而不朽的。”另一位知名战时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写道，“伟大而不朽，同时又在愤怒中带着恐惧。我行驶在残破不堪的道路上，驶过烧毁的村落，驶过泛滥着痛苦的地方，而我仍然没有看到眼泪。一个人心中装满仇恨时是没有眼泪的。”^②

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想要实施报复并保卫国家。1943年11月6日，正值布尔什维克革命26周年纪念，他宣告了战场上最新的胜利。德国人仍占有着俄国的广大土地，但他们无法消灭共产主义战士们。斯大林表示，苏联将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社会主义已显示出优越性。可是，斯大林敏锐地发现了除强调社会主义主题之外该怎样才能对他的人民有感染力。他从来都不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即使在彼时彼刻他都称不上雄辩。可他了解人类的本性。他了解复仇的狂热。“在那些被占领的地区，”他说道，“德国人残杀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就像中世纪野蛮的匈奴游牧民族，这群德国恶魔践踏我们的土地，焚烧我们的村落，拆毁我们的工厂和文化机构……我们的人民不会原谅德国恶魔的罪行。我们要这些德国罪犯为此付出代价。”他用一段高谈阔论结束了他的演说：

① 奥列格·A·捷什夫斯基(Oleg A. Rzheshevsky)(主编)，《战争与外交：伟大联盟的缔造：斯大林档案文献》(War and Diplomacy: The Making of the Grand Alliance: Documents from Stalin's Archives)，阿姆斯特丹：哈伍德学术出版社(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6，204；杰弗里·罗伯茨，“意识形态、周密分析与应变对策：势力范围和苏联外交政策，1939—1945”(“Ideology, Calculation, and Improvisation: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39—1945”)，《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1999):657—665。

② 引自布鲁克斯，《谢谢，斯大林同志》，170；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苏俄文化：自由与管束，自发与觉悟”(“Soviet Russian Culture: Freedom and Control, Spontaneity and Consciousness”)，瑟斯顿和邦韦奇，《人民的战争》，180—182。

我们的红军万岁！
 我们的海军万岁！
 我们英勇的游击队员万岁！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德国侵略者必亡！^①

没有一个字是关于社会主义的。

然而,斯大林关于意识形态的思维并没有改变。怎么可能改变得了呢?他当时已接近66岁了。在他的信仰体系深处,有关资本主义包围的概念已存在了40年以上。他相信,纳粹的入侵验证了这一设想的正确。在大萧条的驱使之下,法西斯成了一种极端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正如列宁思想中所假设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此硝烟四起。但法西斯同时又设法要消灭共产主义以及破坏苏联,这也正是促使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与苏联结盟的契机。斯大林并不信任英国或美国,但相互的依赖、不断的磨难和个人的交往还是在他心中勉强地滋长出了尊重和欣赏,尤其是对于罗斯福。^② 斯大林公开表示,反对希特勒的联盟,是“各国人民的紧密联合,拥有坚实的基础”^③。他在1944年再次指出,这个联盟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观点”。^④

只是,那个联盟真的会持久吗?在余下的战争以及随之的战后岁月中,斯大林带着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陷入了平息安全顾虑的困境,同时他又迫切需要这项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革命事业能得到莫大的支持。他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用于评

①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6周年的演讲,1943年11月6日,富兰克林,《斯大林选集》,401—402。

② V·O·佩恰特诺夫(V. O. Pechatnov),“埃夫里尔·哈里曼赴莫斯科的使命”(“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哈里曼评论》(*Harriman Review*)14(2003年7月):26—27;另见黑宫,《斯大林》,159—163。

③ 斯大林的演讲,1943年11月6日,富兰克林,《斯大林选集》,403。

④ “I·V·斯大林同志和V·M·莫洛托夫同志与波兰教授兰格的谈话记录”(“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I. V. Stalin and Comrade V. M. Molotov with the Polish Professor Lange”),1944年5月17日,收录于“对话斯大林”(“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冷战国际史项目在耶鲁大学会议上传播的文献集,“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纽黑文,康涅狄格州,1999年9月,16—17。以上文献存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戴高乐将军与斯大林元帅的会面记述”(“Account of General De Gaulle's Meeting with Marshall Stalin”),1944年12月2日,出处同上,88;有关合作的主题,见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165—191。



估苏联在战后外交政策上的抉择。他的部下苦苦思索,大费口舌,不知道战争将会如何结束,不知道美国会否回到战前的孤立状态,也不知道阶级利益应当或将要会得到怎样的重申。但是,总体而言,比起革命抱负,安全顾虑的意义更胜一筹。意识形态仍然至关重要:理论和经验都指出,资本主义会东山再起,德国和日本会卷土重来,苏联会再陷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会重蹈内部战争的覆辙;因此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和英国进行了大量的谍报活动,即使是战时联盟期间也不例外。但要分清各个威胁的主次可不是件容易事。谨慎和戒备必不可少。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对此予以赞同,即使他们在威胁的定义、战略的概念以及意识形态的角色上还存有异议。可总的来说,他们对于防御的关切多过对革命的关切。因此他们渴望着能够在战后延续该联盟。这么做对苏联有好处。^①

斯大林往往不参与部下的这些讨论,尽管他明确授权于委员会,要求进行研究,思考他们得出的结论。在评估了最新的文件并对其中的不同意义进行仔细揣摩后,意大利学者西尔维奥·庞斯写道:“苏联安全至上的观念统治着全局,在这样的战略形势之下,苏联新近出现的扩张主义趋势会一直存在。”^②简而言之,那个斯大林心中超越一切的目标就是保卫苏联本土。世界革命曾是他宣誓效忠其意识形态的辩证过程,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这实际上就不再是他的首要目标了。国外的革命当时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苏联摆脱边境地区的敌人们:比如像波兰人那样的敌人,他们的软弱、动摇和敌意似乎已为希特勒的军队开了道;或是像捷克人那样的敌人,他们已经屈从了希特勒的要求;或是像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甚至保加利亚人那样的敌人,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与希特勒勾结或为其计划助上一臂之力。斯大林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声称:“他是一个准备毫无

① 西尔维奥·庞斯,“战争年代的后果:二战对苏联安全政策的影响”(“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ecurity Policy”),庞斯和罗马诺,《战争年代的俄罗斯》,277—307; V·O·佩恰特诺夫,“二战后的三巨头:苏联对战后与美英关系思维的新档案”(“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冷战国际史项目第13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1995;罗伯茨,“意识形态、周密分析与应变对策”,665—673。

② 庞斯,“战争年代的后果”,305;另见黑官,《斯大林》,180—191;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118—253;斯大林的作战过程,见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斯大林掌权下的外交政策制定”(“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Stalin”),收录于《帝国与社会:进入俄罗斯历史的新途径》(*Empire and Society: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History*),原造之(Teruyuki Hara)和松佐公孝(Kimitaka Matsuzato)(编),札幌,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1997,167—179。

保留、毫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准备毫无保留、毫无犹豫、毫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者……不保卫好苏联, 革命的前进就绝无可能。”^①

虽然斯大林在 1943 年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莫斯科仍是共产国际的总部。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共产主义者都纷纷逃亡莫斯科, 以躲避法西斯、纳粹和军国主义。若非如此, 他们就在自己国家参与抵抗运动, 成为该国游击队的核心, 或是因为他们反抗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英勇表现而大受褒奖和支持。此刻的共产主义代表了解放与改革。^② 斯大林站在了这场世界运动的顶峰, 这场运动将他宣告为一名淡泊、坚定且无畏的领袖, 永不向黑暗邪恶势力低头。这场战争使他获取了在和平年代所无法得到的崇高与威望, 而在和平年代, 他的形象则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独裁的粗暴首领。

斯大林对于正在交往的革命领袖关心甚少。不顾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热忱, 或者有时也正是由于这个因素, 斯大林对他们持有怀疑态度, 正如他看待过去的苏联同志和现今的战时伙伴那样。然而, 他也相信, 作为世界上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纳粹兵力部署最密集的国家的首脑, 外国的同志对他需要很多, 而他对他们的需要则少许多。因此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监控或者消灭那些可能会违抗他的人, 他对此得心应手而又残酷无情, 和当年他运用权力消灭国内敌人时如出一辙。他试图利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提高苏联的安全、力量和地位。^③

许多回忆录、传记和备忘录中都提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与共产主义领导人协商战略事宜。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们向他请教并听命于他。他下达命令并将特工派往海外。但斯大林的确切计划并不清晰; 实际上他并没有总体规划, 甚至没有类似总体规划的东西。许多国外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莫斯科表现出的模棱两可感到困惑和恼怒, 有时这也会让他们不再逞匹夫之勇。斯大林鼓励他们, 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 在与其他民主和社会党派建立广泛结盟时不要表现得太过追求权力以及将社会布尔什维克化。他告诉法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 要避免采取激进措施。这类措施将会疏远可能的支持者, 并危害到共产

① 引自雷,《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211—212。

② 有关此过程的出色例证,见布拉德利·F·艾布拉姆(Bradley F. Abrams),《国家灵魂的挣扎:捷克文化与共产主义的兴起》(*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Czech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兰汉姆,马里兰州:罗曼和利特菲尔德,2004。

③ 乌拉姆,《斯大林》,358—362。这些主题明确出现在保加利亚最近对苏联政策的分析中。见维塞林·季米特洛夫(Vesselin Dimitrov),《斯大林的冷战:苏联对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1941—1948》(*Stalin's Cold War: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mocracy, and Communism in Bulgaria, 1941—1948*),汉普郡,英国: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2007。

主义者“说服绝大多数人民的努力”。他表示，国家的战略需要“让步与妥协”。从长远出发，他希望共产主义者能够赢取权力，但比起联盟，这个目标还是其次的。他教导波兰的共产主义者，激进主义将会错误地“使波兰成为英、俄、美争论不休的核心”。^①

形势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是有利的，但谨小慎微仍很重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斯大林在1945年1月告诉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的领头人，“很容易生气，报复心也很强。你必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了——那你就输了。”他补充道，当你弱小时，你需要处于守势；当你强大时，你则必须处于攻势。^②

那会儿，共产主义者显然并不强大，但是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他们应当做到审慎，正如斯大林对自己的评价。他们需要调整策略以适应当前的形势。他反复告诉那些东欧和西欧的共产主义者，俄国夺取政权并将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这一榜样不可追随。社会主义能够以其他方法达成，处于其他的“政治体制——比如民主制、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③之下。一名重要学者经过对在意大利的详细调查后

① 引自爱德华·马克(Eduard Mark)，“逐步革命：斯大林在欧洲的国家阵线策略，1941—1947”(“Revolution by Degrees: Stalin’s National Front Strategy for Europe, 1941—1947”)，冷战国际史项目第31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2001，22；“I·V·斯大林同志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的谈话记录”(“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I. V. Stalin with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 French Communist Party, Comrade Thorez”)，1944年11月19日，收录于“对话斯大林”，84，冷战国际史项目；艾弗·巴纳克(Ivo Banac)(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3—1949》(*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350—351；西尔维奥·庞斯，“斯大林，陶里亚蒂，以及冷战在欧洲的起源”(“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3(2001年春)：3—27；另见黑宫，《斯大林》，182—184；诺尔曼·M·奈马克(Norman M. Naimark)，“冷战研究和斯大林的新档案材料”(“Cold War Studies and New Archival Material on Stalin”)，《俄罗斯评论》(*The Russian Review*) 61(2002年1月)：5—6；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② “摘自I·V·斯大林与A·赫布朗的谈话记录”(“From the Record of I. V. 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A. Hebrang”)，1945年1月9日，《冷战历史》(*Cold War History*) 1(2001年4月)：161—162。

③ “V·科拉洛夫在与J·斯大林的一次会议记录”(Notes of V. Kolarov from a Meeting with J. Stalin)，1945年1月28日，收录于“对话斯大林”，130，冷战国际史项目；“斯大林会见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发言”(“Notes on Stalin’s Statement from a Meeting with a Bulgarian Delegation”)，[1945年8月底]，出处同上，247—248；“工党赴苏友好访问团报告”(“Report of the Labor Party on its Goodwill Mission to the USSR”)，[1946年7月底]，出处同上，330—33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会面的记录”(“Report to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on Meeting with Stalin”)，1946年9月26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合集；罗伯茨，“意识形态、周密分析与应变对策”；诺尔曼·M·奈马克，“苏联人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一个东德‘资本主义’政党的挑战，1945—1949”(“The Soviets and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The Challenge of a ‘Bourgeois’ Party in Eastern Germany, 1945—1949”)，《东欧政治与社会》(*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9(1995年秋)：369—392。

以推断的口吻写道：“斯大林的含糊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共产主义称霸欧洲的真实战略发展。”^①

斯大林之所以不鼓励共产主义革命，是因为他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苏联的安全、自身利益和安康。为了这个目标，他希望能够保留现有的联盟，因为他相信这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将来还要有大量的重建工作。美国人或许能提供贷款。最起码，他们的合作及英国的首肯能够从德国索取巨额赔款——从鲁尔、莱茵兰以及他的部队将要占领的德国东部其他地区那里得来的赔款。最重要的是，与英、美的合作可以帮助控制和监督德、日的国力复苏。1944年6月，斯大林会见波兰国家解放委员会成员，即卢布林波兰人时，对他们说波兰“需要与西方国家、与英国、法国结盟，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②。

战争接近尾声时，斯大林首要关心的就是如何遏制德国再起。在与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东欧人和西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之后，德军巨大的魔影始终伴随左右。甚至“在德国战败之后，战争/侵略的危险(原文如此)仍然存在”，他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这样说道。“历史教会我们，”他对卢布林波兰人说道，“用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德国卷土重来。”“1871年，”斯大林回忆道，“德国袭击了法国……40年后，也就是1914年，德国再次袭击。上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养精蓄锐，又在1939年挑起了战争。德国拥有强大的复兴能力。”如果斩草不除根，斯大林认为，“我们将会 在15年后又迎来新的战争”。^③

无论德国在接踵而至的较量中会败得多么彻底，苏联都不会感到安心。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决定了苏联的视野。斯大林道：“德国并不相信人类的情感。”^④1945年3月，他说道：

-
- ① 庞斯，“斯大林，陶里亚蒂，以及冷战在欧洲的起源”，15；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 ②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建立波兰临时政府协议的欢迎会上的发言”(“Notes of Stalin’s Speech during a Reception at the Kremlin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greement to Create the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1944年6月23日，“对话斯大林”，21，冷战国际史项目。
- ③ “V·科拉洛夫随笔”(“Notes of V. Kolarov”), 1945年1月28日，“对话斯大林”，130；“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迎会上的发言”，1944年6月23日，出处同上，21；“I·V·斯大林同志和V·M·莫洛托夫同志与波兰教授兰格的谈话记录”，1944年5月17日，出处同上，15；斯大林对德国一直耿耿于怀，请参见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165—191。
- ④ “I·V·斯大林同志和V·M·莫洛托夫同志与波兰教授兰格的谈话记录”，1944年5月17日，“对话斯大林”，18。



我们现在正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很多人以为德国人再也不能威胁到他们了。其实,这完全不对。我恨德国人……要想永久消灭德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仍然到处都是。我们正在与德国人决战,我们就要结束这场恶战了。但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的是,我们的盟友会努力救助德国人并与他们合谋的。我们会对德国人毫不留情,但是我们的盟友会设法对他们从宽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斯拉夫人必须做好准备,以防德国人再次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发动袭击。^①

这样的观点反映出所有战争年代俄国人的观点,且不论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作何感想。当斯大林在战后拒绝交出波兰东部和比萨拉比亚时,当他拒绝任何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独立的提议时,当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坚持谋求一个主要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波兰政府时,当他试图与苏联周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时,当他要求德国对苏联进行巨额赔款时,当他提出在土耳其海峡建立战后基地时,当他推迟苏联军队撤离伊朗南部的日期时,他表现得一如俄国的沙皇,追寻着每一个机会增进国家的安全与实力。在刚刚经历完那样的艰苦与残忍之后,很少有俄国人对夺取这些目标表示异议。“如果曾有过一个国家有统领欧洲的正当理由,”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评论道,“那一定是 1945 年的苏联。三十年内,它被德国入侵了两次,每一次德国都让其受害者背负了难以想象的血债。任何有责任心的苏联领袖都不会放过二战结束时的任何称霸欧洲的机会。”^②

斯大林希望美国和英国能够理解并赞同他们对于安全的需要。作为回报,他也愿意接受他的西方伙伴所提出的一些强制要求。他愿意参与抗击日本的战争,保证击败日本,由此帮助罗斯福减少美国的人力损失,同时还能获取战略领地、港口、铁路,为苏联谋利。斯大林还愿意在能力范围内控制革命力量。比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中国内战中,他就愿意与国民党打交道,却并未承认中共政权。* 他愿意对希

① 引自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50 年之后——评述文章”(“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50 Years Later — A Review Article”),《欧亚》(Europe-Asia) 51(1999):1097—1098。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强权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纽约:W·W·诺顿,2001,198。

* 译者注:1945 年日本败降前后至新中国建立,苏联对华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达成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作为苏联出兵远东的交换条件,外蒙古可维持“独立”现状,苏联可获得原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1945 年 6 月—8 月,中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斯大林要求中国政府同意“雅尔塔协定”给与苏联的权(转下页)



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说,即使时机已经明显成熟,也要放弃夺取政权。总之,为了确保苏联的安全要求和国家利益得到满足,他调整了由萧条、战争和解放运动等条件而自发引起的革命力量。苏联政权中首屈一指的外交官员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写道:“斯大林操纵了国际主义,使之成为民族主义和帝国野心服务。”^①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前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使者宋子文前来与斯大林见面,以上的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次会见的意图在于取消有关远东的雅尔塔秘密协议,也就是斯大林与罗斯福之前所商议的内容。宋子文希望斯大林不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判,还要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以及承认中国对大连、旅顺港等港口和部分满洲铁路的控制权。关于这些会谈的详细且晦涩的记录反映出斯大林对安全和边境问题最为不懈的关心。他发出警告:“日本将会像德国一样再次雄起。”“我们希望能与中国结盟,以此遏制日本。”他在几天后再次阐述道:“那个国家是不会被摧垮的。”凡尔赛会议过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再也不会崛起了。过了15到20年,它恢复了元气。要是让日本也有机会翻身,它也会走相同的道路”。^②

尽管与安全需要相比,革命的吸引力只是屈居其次,但这两者有时也是不可分离的。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会谈中赞同了一项按百分比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实质上使苏联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了极大的影响力,而为此所付

(接上页)益和外蒙古“独立”。在苏联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苏方要求,苏方则承诺只承认国民政府而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双方达成妥协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此,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加入联合政府。但为了维持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抵制美国势力的进入,苏联又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因此同意中共军队进入东北。1946年苏军开始撤离,国共双方在东北形成军事对峙,并随即爆发全面内战。内战初期,苏联对国共双方采取双重立场。1947年美苏冷战正式展开后,苏联对华政策逐渐向中共倾斜,但仍维持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直到1949年中国内战大势已定,苏联才正式支持中共建立新政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率先承认。1950年2月,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参阅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

① 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体制:一位知情人在苏联政治界的生活》(*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纽约:兰登书屋(New York: Random House),1992,168。大多数研究苏联档案的历史学家予以赞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杂结合中,民族主义的成分有所发展。例如,见庞斯,“战争年代的后果”;罗伯茨,“意识形态、周密分析与应变对策”;布兰登伯格,《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黑官,《斯大林》,180—187;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② “宋子文与斯大林会见记录”(“Record of Meeting between T. Soong and Stalin”),1945年6月30日;1945年7月2、7、9、11日;1945年8月10日;“对话斯大林”,207,145,148,157,173,179,207,225,冷战国际史项目。



出的代价则是让国内保守派及积极支持保守派的英国任意宰割希腊共产党人。在他的部队行军于东欧之际，斯大林签署了休战协议，并且建立起了对苏联友好的、能够确保苏联军事边界安全的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据理力争，坚持他在波兰卢布林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管理委员会应当成为波兰临时政府的多数派。之后，他挑选出一些波兰对手，无情地逮捕、关押、杀害了他们。他明确表示，苏联所必需的是一个友好的、不会成为将来敌人入侵苏联通道的波兰。

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就是德国过去的盟友们，他实施了一项国家战线策略，即与那些共产主义者身居要职但非统治地位政府建立广泛同盟。^① 根据结束了东欧战争的休战协议条款，苏联有权代表联盟建立这些临时政府，这一权力甚至高于1943年英、美在意大利的权力。苏联的军方指挥官与当地领导人共事，旨在提高共产主义兵力以及压制那些非共产主义者。斯大林很乐意开出主张自由选举和民族自决的空头支票，一如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而事实上他决心确立能够永久保障苏联周边的势力范围。“苏联领导人不会相信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能对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绝对忠诚、友好。”^②

1945年春天，斯大林的军队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抵达柏林并希望歼灭纳粹德国。战斗仍然激烈，伤亡仍然惨重。但这一次，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英军和美军也从西线攻了过去。希特勒自杀了，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了。苏联军队大肆掠夺。他们强暴、虐待、羞辱德国妇女。那正是报一箭之仇的时候；那正是苏联士兵摆脱纳粹对他

① 有关斯大林在东欧的目标，基于最新的档案材料，见马克，“逐步革命”；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沃伊泰克·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冷战与苏联安全隐患：斯大林年代》（*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11—29；弗朗西斯卡·格里（Francesca Gori）和西尔维奥·庞斯（编），《冷战中的苏联与欧洲》（*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6；诺尔曼·奈马克和利奥尼德·吉比安斯基（Leonid Gibianskii）（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1944—1949》（*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9*），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景出版社（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1997；奥德·阿恩·韦斯塔（Odd Arne Westad）、斯文·霍尔马克（Sven Holsmark）和艾弗·B·诺伊曼（Iver B. Neumann）（编），《东欧的苏联，1945—1989》（*The Soviet Union in Eastern Europe, 1945—1989*），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4；强调安全，见托尼·朱特（Tony Judt）最新研究，《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117—121；关于斯大林和希腊共产党的最新分析，见约翰·O·亚特里德斯（John O. Iatrides），“革命还是自卫：共产党在希腊内战中的目标、策略和战术”（“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冷战研究杂志》7（2005年夏）：3—33。

② 雷，《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243；最新研究，见黑宫，《斯大林》，169—200；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们家人实施暴行而产生的无能感,重拾男子气概的时候;那正是德国人为他们的种族傲慢和残忍剥削付出代价的时候。短短几周内,将近十万柏林妇女因为遭受强暴而寻求治疗。而德国老少妇女的恸哭是何等悲惨:

俄罗斯人每晚都会来
 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尚未入境的
 亲爱的天主,我祈求您
 让我入睡并且忘却
 忘却……
 这般受尽屈辱
 每每醒来都带着新的伤痕
 忘却……
 女人只是为了被践踏或被奴役吗?
 没有任何人问及基本的权利吗?
 忘却……
 ……
 亲爱的天主,我祈求您让我入睡并且忘却
 也不要用在里发生的一切权衡我的生命。^①

斯大林用在柏林发生的一切来权衡自己的生命,他既不会忘却也不会原谅。这是他的决定性时刻了。击败德国人的胜利者、革命的救星、苏联人的沙皇、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数个国家命运的裁决者、无产阶级的独裁者。

1945年5月9日凌晨2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了战胜德国的消息。人们穿着薄薄的衣服,冲出家门,涌上通往红场的大街小巷。“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日子,喜悦与悲伤共同令那一天无与伦比。”伊利亚·爱伦堡回忆道。一名老妇人拿着张照片,边走边向所有人展示他那在战斗中死去的儿子。“她又哭又笑。”年轻人欣喜若狂。陌生人热情相拥。战争与痛苦,点燃了希望。“和其他每个人一起,”爱伦堡继续写

① 诺尔曼·M·奈马克,《俄罗斯人在德国》(The Russians in Germany),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114—116。



道，“我悲伤，我绝望，我痛恨，我热爱。”^①

整整一天，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在美国大使馆前高喊“罗斯福万岁”。那种喜悦“难以描绘”，一名美国外交官写道。^②到了晚上，两三百万人聚集到了红场听斯大林演讲。他并没有像1941年7月3日那样用“兄弟姐妹们”开头，而是说“同胞们”。敏感的诗人、作家爱伦堡认为“这过于冷淡”。但是人们并不在乎，他们的国家夺取了胜利，斯大林是他们的英雄。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令人信服的”。礼炮齐鸣，如同众人齐声祈福。^③

斯大林正处于事业顶峰。他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统帅，他的权威无可置疑。他的权力足以只手遮天，人们为他歌功颂德，正因为如此，他藐视游行也抗拒公众的奉承。他穿着朴素，举止低调。历经战争后，他苍老了。他已经67岁了，矮小且日益粗壮，头发明显稀疏，灰黄的脸上留有痘痕。他不再是那个好战、激进的革命者了；时间的磨砺让他懂得如何倾听、如何深藏不露、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观点。与罗斯福、丘吉尔这样的外国首脑在一起时，他能够面带笑容，亲切而又谦逊；与下属在一起时，他能够表现得欢快、热情、慷慨。谢尔格·贝利亚写道：“斯大林有使人着迷的能耐……他能够给人留下那种犹如朱庇特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印象……他能和每个人找到共同话题……他在每一次与人交谈后都能令对方产生再次见到他的迫切想法，那感觉就像是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永久的联结。”^④斯大林在昆采沃乡间别墅花的时间越来越多，工作到很晚才睡，并且希望在晚间随时都能找到所有人。他常常邀请政治局的高层共进晚餐。他们大吃大喝；他则不会那样。觥筹交错之际，斯大林却不会喝太多酒。他们谈论政治、外交和国家事务。然后他们便闲谈、唱歌、看电影，有时甚至跳舞。作为主人的斯大林希望大家尽兴。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他们。^⑤

① 伊利亚·爱伦堡，《战争，1941—1945》(The War, 1941—1945)，伦敦：麦吉本 & 基(London: McGibbon & Kee)，1964，187—188。

②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280；黑官广明，《顿巴斯的自由与恐惧：乌克兰-俄罗斯边界，1870年代—1990年代》(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 A Ukrainian-Russian Borderland, 1870s—1990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97—298。

③ 爱伦堡，《战争》，187—192。

④ S·贝利亚，《我的父亲》，142—143；布鲁克斯，《谢谢，斯大林同志》，205；瑟维斯，《斯大林》，438，461—468。

⑤ 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162—163；阿利卢耶娃，《二十封信》，199—207；约拉姆·戈尔里兹基(Yoram Gorlizki)和奥列格·赫列夫纽克(Oleg Khlevniuk)，《冷和平：斯大林和苏联的统治层，1945—1953》(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49；蒙特费奥雷，《斯大林》，454—471。



斯大林的下属尊重他并完全服从他。他有震慑力、会羞辱人、杀人不眨眼。对党内高层的大清洗在战争中早已结束,可斯大林仍对身边的人存有疑心。他们深谙于此,因而生活得胆战心惊。他监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敢私下里大规模会面,他们不敢未经他的允许就一同外出游历,他们不敢接待西方人。斯大林生怕这样做还不够,为了避免任何阴谋以及保存自己对国家事务的最高决定权,他特意设置了层层制约的权限,使他们彼此敌对。他在党和政府内部设计了许多平行管理手段,每一部分都由多个安全机构监控,由此需要相互间进行汇报。^①

在下属的眼中,斯大林总是那么神秘莫测。最近一名传记作家写道:“神秘感环绕着他。”另一个则写道:“每个人都觉得很难理解斯大林。”^②他能够进行清晰的表达,但是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却不为人知。他会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话,但却是用来推断另外的含义、相反的计划 and 不同的结果。资本主义将会垮台,但美国却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起内讧,但英美却是“紧密联合”。击败所有的反对者(无论他是谁),但要“确保人民是追随着你的”。社会主义是必然会发展的,但有可能会通过“走议会路线”来进一步发展。^③

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清楚的模式,但那样可能会使我们误读斯大林。他觉得存在着某些不变的事物,但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策略。他总是存在着恐惧与怀疑,对权力的渴望和对安全的需求。意识形态和经验都使得这些事物一成不变。列宁的话不足以阐明世界是个危险的场所这一自明之理——斯大林所要做的就是看看周围的战争遗骸——但列宁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催生了能够湮没、销毁社会主义试验的冲突。一旦德、日重振旗鼓,同样如此。当然,国内的敌人也不例外。威胁无处不在,而且也并非空穴来风。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所写的那样:

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并非假想出来的;他们在如今这片苏联的土地上,在对苏联共产主义充满敌意的地区与武装力量相抗衡。在所有由红军解

① S·贝利亚,《我的父亲》,145—146;戈尔里兹基和赫列夫纽克,《冷和平》;蒙特费奥雷,《斯大林》,435—577;瑟维斯,《斯大林》,521—540。

② 蒙特费奥雷,《斯大林》,455;黑官,《斯大林》,184。

③ 这些反驳出现于许多冷战国际史项目收集的对话中。例如,见合集“对话斯大林”,272,248;关于斯大林神秘的性格和模糊的说辞,另见史蒂文·柯特金(Steven Kotkin),“无限的阴谋”(“A Conspiracy So Immense”),《新共和》(New Republic) 234(2006年2月13日):28—34;另见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放的国家中，亲苏势力只占少数。对这些地域薄弱的管理加剧了与西方的冲突，并且引起了国家对于战争威胁和内部颠覆的近乎持久的戒备。苏联自1946年起对西方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这既是苏联实力的体现，也是其脆弱的表现。^①

斯大林思考着该何去何从。他并不想和昔日的战时伙伴处于敌对状态。维持战时的联盟可以提供不少好处：可能获得用于重建的贷款；可能获得复原的补偿；可能获得抵抗德日势力重起的安全保障。尽管他并不喜欢丘吉尔，可1945年4月罗斯福的死讯还是使他感到沮丧。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从未放下过戒心，因为他知道他们是资本主义敌人，但是他们和他的利益交缠在了一起，也会继续交缠下去。在夺取胜利的第二天以及之后的好几个月都没有出现反美主义。^②

当1945年7月中旬斯大林前往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见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时，国际关系的未来仍不明朗。杜鲁门认为他需要斯大林的帮助共同击败日本，他需要斯大林实现罗斯福的梦想，也就是基于战时同盟之上的永久和平。斯大林仍相信他能让美国接受他的势力范围并帮助其重建。同盟国的三大国都认为它们在控制德日复苏这个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合作也许比冷战要好。^③

杜鲁门

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出生在密苏里乡村一个普通家庭。他之前的生活平淡无奇，直到1934年出人意料地当选为美国议员。当斯大林在俄国鼓动推翻沙皇政权并从劳工营出逃时，杜鲁门正在务农、从商；当斯大林在1917年与列宁、托洛茨基合谋夺取政权并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时，杜鲁门正决定支持威尔逊总统寻求世界民主和平的圣战，应募国民警卫队；当斯大林在俄罗斯南部扮演军阀式的角色并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动员支持时，杜鲁门正在俄克拉荷马经营一个军人俱乐部，随后在法国指挥了一个西线炮兵连；当斯大林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杜鲁门作为一名战后的美国小商人苦苦挣扎；当斯大林智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稳坐克里姆

① 奥弗里，《俄罗斯战争》，312；另见瑟维斯，《斯大林》，478—487。

② 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尤见第7章；布鲁克斯，《谢谢，斯大林同志》，207；阿尔巴托夫，《体制》，35—36；瑟维斯，《斯大林》，467—468。

③ 许多看过俄罗斯新档案的人都在作品中强调斯大林努力调和与合作。例如，见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马克，“逐步革命”；庞斯，“战争年代的后果”；黑官，《斯大林》，161；季米特洛夫，《斯大林的冷战》。



林宫头把交椅时,杜鲁门身在密苏里的杰克逊县,在托马斯·彭德格斯特(Thomas Pendergast)的政治组织中当个不起眼的地方官员;当斯大林对农业实施集体化并消灭富农时,杜鲁门正在他的祖国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新政”事务办公室;当斯大林杀害他过去的同志并清洗他的高级军事指挥官时,杜鲁门作为一名密苏里州的初级参议员,正为了在华盛顿的地位苦苦挣扎;当斯大林与希特勒协商结盟事宜并着手备战时,杜鲁门正在为再次竞选运动绞尽脑汁;当斯大林指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保卫战、会见丘吉尔和罗斯福、组织战胜纳粹军事力量时,杜鲁门正因为带领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调查美国国防工业运作而在国内引起关注。

杜鲁门因为在委员会的工作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而且他在民主党的各个小集团中左右逢源,罗斯福因而挑选他作为1944年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两个人却形同陌路。“他从未向我吐露心声,”杜鲁门坦言,“无论是关于战争、外交事务,还是他对战后的和平展望。”^①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溘然而逝,杜鲁门接任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最富有的国家的总统职务。“现在为我祈祷吧。”杜鲁门对支持他的记者轻声说道。^②

新总统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富有雄心壮志,但是却并不追名逐利。终其一生,杜鲁门都没有赚足他理应能赚到的钱,他接连不断的失望也正源于此。不过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荣耀、品德、良好的生活,这就是上天所赐予的”。作为一个自谦而又自豪的人,他有许多平易近人、真诚坦率的格言,他写道:“若我不能立刻取胜,那我只能继续失败。”^③

杜鲁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自己天生就是个领导者。从法国回到家乡之

① 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编),《父亲的来信:杜鲁门家庭信函》(*Letters from Father: The Truman Family'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纽约:阿博书局(New York: Arbor House), 1981, 106;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斯伯丁(Elizabeth Edwards Spalding),《冷战先锋:哈里·杜鲁门,遏制,自由国际主义的重塑》(*The First Cold Warrior: Harry Truman, Containment, and the Remaking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列克星敦,肯塔基州:肯塔基大学出版社(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6, 16。

② 关于引言,见阿朗佐·L·汉比(Alonzo L. Hamby),《人民之子:哈里·S·杜鲁门的生活》(*Man of the People: A Life of Harry S. Truma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93。

③ 罗伯特·H·费雷尔(Robert H. Ferrell),《亲爱的贝丝:哈里·杜鲁门给妻子的信,1910—1959》(*Dear Bess: The Letters from Harry to Bess Truman, 1910—1959*),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83, 213, 215;阿诺德·奥夫纳(Arnold Offner),《另一场胜利:杜鲁门总统和冷战》(*Another Such Victory: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Cold War*),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后,他又重新做起生意,而他对自己在公职上的表现非常满意。在杰克逊县担任行政法官期间,他为了建造更好的马路和更宽敞的公共建筑到处奔走。他总是希望能做些超出他那微薄的工作范围之外的事。他向往能得到更高的公职,但前景相当黯淡。他分别在1932年的州长和1933年的国会提名中落败。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就要终结了。尽管他一辈子都努力保持积极的个性,但他似乎忐忑不安。1933年5月,他写道:“明天我就要满49岁了,但是回想一下,自己所行的善事还太少了。”^①

1934年,彭德格斯特向几个候选人提出竞选参议员的建议遭拒后,杜鲁门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他是个意志坚定的竞选者,占了对手实力不足的便宜,利用了彭德格斯特组织的实力参加堪萨斯城的竞选,在那里杜鲁门因为曾经的服务记录、尤其是联邦再就业主任的工作而声名大噪并且广受尊敬。到达华盛顿之后,他勤恳工作,以取得新同事的尊重,并试图摆脱“彭德格斯特的议员”这一称号。他支持新政的许多立法政策,但并没有被看作是一名自由改革运动者。到了1938年,彭德格斯特被指控有欺诈行为及逃避所得税,杜鲁门因为与该组织的密切关系而受到牵连。罗斯福不希望他再次当选。杜鲁门考虑过辞职,但之后还是顽强地参加了选举,并极力保住了一场几近不可能的胜利。^②

杜鲁门的外交政策相当简单:他不相信孤立政策,也反对独裁者。他赞成低关税、开放贸易和军事准备。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事。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并不是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斗士。他很少谈及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他有次说他希望希特勒和斯大林斗个两败俱伤,但这充其量只是句俏皮话。从经历一战开始他对国际事务就考虑不多。他“对国际联盟是否存在或者俄国有个红色政府还是紫色政府毫不关心,说他毫不关心还是一种客气的说法”^③。

杜鲁门完全是亲美的。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他喜欢称之为“上帝的国度”^④。他

① 奥夫纳,《杜鲁门》,9。

② 有影响的关于杜鲁门的书,见汉比,《人民之子》;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杜鲁门》(*Truman*),纽约:西蒙和舒斯特(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92;罗伯特·费雷尔,《杜鲁门和彭德格斯特》(*Truman and Pendergast*),哥伦比亚,密苏里州:密苏里大学出版社(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9;奥夫纳,《另一场胜利》。

③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293,285;最新的评价见威尔逊·D·米斯坎伯(Wilson D. Miscamble),《从罗斯福到杜鲁门:波茨坦,广岛,以及冷战》(*From Roosevelt to Truman: Potsdam, Hiroshima, and the Cold War*),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1—33。

④ 出处同上,277。



赞美宪法,认为那是“汇总得最出色的政府文件”^①。他欣赏美国的价值观:自由,个人机遇,以及自由贸易。他支持辛勤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周到而有效的途径对他们进行帮助。他反对大型集团及军事巨头。1941年早期,当国际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争论不休,试图向受围的法国和英国寻求更多支持时,杜鲁门将他的注意力转到了调查国防项目上。他要确保合同公平分配,生产富有效率,钱财没有浪费,大财团没有垄断所有好合同,另外就是他自己的密苏里委托人和制造商得到了款待。杜鲁门将狭隘的国家主义与刚起步的国际主义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成为了联合国强有力的支持者。

尽管他作为参议院委员会主席调查国防工业期间招致了一定的恶名,他那简单的生活方式与自谦的风格始终如一。他鄙弃奢华,厌恶矫饰。他很早起床,工作卖力,常常在当地的快餐店就餐。^②他一直不间断地向妻子和女儿写充满爱意的信,她们经常回到密苏里州的独立市。他思念着她们,期盼着她们的回信。当然他也喜欢政治家的身份,喜欢走近人民,表面上是在代表他们的观点并让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参议院里,他曾一度不再争取升职;他并不向往着成为副总统或是入主白宫。他所成就的早已超出了他的期望值。他喜爱政治和立法界的暗中较劲。他喜欢和朋友一起玩扑克,晚上喝一两杯波旁威士忌。

杜鲁门在参议院获得了连任。在第二任期间,他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和公众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也走出萧条参与战争了。1941年12月,日军对珍珠港发动突袭,数千美军士兵丧生,而美国大陆则是毫发未伤。希特勒对美宣战几天后,美国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与三大轴心国(德、日、意)的战斗之中,还是在远离美国海岸的地方进行战斗。相比起其他参与战斗的国家,美国在战争中的经历实在与众不同。孩子和老人没有死于敌人的屠杀;姐妹、女儿和母亲没有遭受强暴。房屋没有遭到轰炸;城镇也没有受到摧毁。

艰难的时世告一段落了。历史学家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写道:“经过长达十年的萧条之后,战争开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战争期间增长了60%;总收入则增长了50%。当然美国还是存在着社会动荡、工会运动、种族冲突、青少年破坏公物等问题,但比起遭受战火蹂躏的欧洲和亚洲,美国人的生活已是优越得不可想象了。“许多美国人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手头的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住房拥有者的人数都大幅上升。

① 哈里·S·杜鲁门,《杜鲁门演说》(*Truman Speak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32。

②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451。



尽管存在着定量配给,或者说也正是由于定量配给,人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他们买起了洗衣机和干衣机、珠宝和香烟。战争期间,百货商店的平均购买额从2美元上升到了10美元,翻了5番。“在人类的斗争史上,”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评述道:“人们奢谈牺牲,却几乎无人作出牺牲,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尤其对于少年而言,他们从这个机会中尝到了甜头,他们找到了工作也赚到了钱,然后花那些钱。他们正开始营造一种战后的消费文化,这种文化将为世人所艳羡,而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其意义。^①

和战争中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杜鲁门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美国国防生产、工业产量、战略力量上的显著飞跃。到了1942年底,美国的军事生产已经超出了轴心国的总和。1943年间,美国的军备几乎是苏联的三倍。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相当于同盟国在战争中所用武器的三分之二:297000架飞机、193000门大炮、86000辆坦克、200万辆军用卡车。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拥有了年产将近100000架飞机和30000辆坦克的能力。四年之内,美国的工业生产翻了一番;机床工业生产更是增长了两倍。到了1945年,美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四分之三的投资资金、一半的船舶以及一半的生产能力。其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甚至五倍于英国都不止。而且,对于研制原子弹这样耗资巨大的科技产物美国也几近完工。^②

杜鲁门去波茨坦会议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并没有迫切想要穿越大洋与战时的盟友丘吉尔和斯大林见面。“我多么讨厌这次的行程,”他在日记中坦言,“但我不得不去……我们一定要赢。”^③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关键在于要开始讨论德国和东欧的战后安排。更关键的是和斯大林讨论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杜鲁门希望斯大林能够遵守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如果俄国人能

① 迈克尔·C·亚当斯,《世上最好的战争:美国和二战》(*The Best War Ever: America and World War II*),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4, 131, 136, 126—127;关于人们未曾料及的经济繁荣,请参见戴维·M·肯尼迪(David M. Kennedy),《来自恐惧的自由:大萧条和战争中的美国人民,1929—1945》(*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the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785—786。

② 理查德·J·奥弗里,《同盟国何以取胜》(*Why the Allies Won*),伦敦:乔纳森·凯普(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192;保罗·M·肯尼迪(Paul M. Kennedy),《强国沉浮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纽约:兰登书屋,1987, 357—358, 369。

③ 罗伯特·H·费雷尔(编),《非正式官方档案:哈里·S·杜鲁门的私密文件》(*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纽约:哈珀&罗,1980, 49;费雷尔,《亲爱的贝丝》, 516, 518。



在中国大陆对抗日本军队, 日本天皇派遣军队入侵美国时就会失去许多军力。这对于杜鲁门至关重要, 因为当 7 月 16 日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秘密测试成功前, 他还在为波茨坦会议做准备工作。

然而打仗和规划和平并不是杜鲁门拿手的。他对这些事情知之甚少。他读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和备忘录, 外交手腕还是把他难住了。他知道自己缺乏经验。“我很害怕,” 他在波茨坦写信给贝丝(译注: 杜鲁门的妻子), “我不知道一切是否正遵循着游戏规则。”^① 他的亲信幕僚都看出他局促不安、心神不定。有时他回答问题过快, 几乎是别人还没问完就已经作答了。^② 对于这几点, 杜鲁门认为他在展现自己的长处, 但也在自曝其短, 起码对于那些最关注他的人而言。

杜鲁门希望能与斯大林和睦相处。包括美国驻苏联大使 W·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V. Forrestal)、海军上将兼战时参谋长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在内的一些顾问都希望他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告诉杜鲁门, 俄国人正在德国东部大肆抢掠, 并且在欧洲东部强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杜鲁门对此兴致不高, 他对于那些既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无法感同身受。斯大林无疑是个独裁者, 但在杜鲁门眼中, 他还是一个深受俄国人民支持的人。如果他们不支持他, 他们就不会这么顽强地战斗; 所以我们要好好相处, 他在日记中草草记录着这些话。杜鲁门知道苏联在东欧到处洗劫, 但是他们曾经“被德国人三番五次地洗劫, 因而你很难去责备他们的态度”。杜鲁门知道苏联正设法建立警察政府, 但他觉得斯大林最终会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人低头的。他已经目睹克里姆林宫在波茨坦会议前夕作出让步了。“昨天是个让人兴奋的日子,” 1945 年 6 月 7 日他写信给妻子, “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斯大林同意了我们对于旧金山会议上否决票的解释以及重新考虑波兰问题的建议, 但我们在蒙大拿的选举中失利了, 共和党正为此欢呼雀跃呢。”^③

波兰人在遭受苦难, 而民主党在蒙大拿也颇为失意, 于是, 杜鲁门准备好与斯大林过过招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他对亲苏的好友、美国前驻苏大使约瑟夫·戴维斯

①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 519; 米斯坎伯,《从罗斯福到杜鲁门》, 87—96。

② 例如, 见约翰·M·布卢姆(John M. Blum)(编),《远见的代价: 亨利·A·华莱士日记, 1942—1946》(*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波士顿: 霍顿, 米福林(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437, 440—441, 448—451。

③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 515, 522。



(Joseph Davies)说,“我竭尽所能保持和平并达成罗斯福的计划。”^①这个计划就是延续美国与苏联间的合作,避免战后的争端。但在杜鲁门的内心深处,他认为协议应当由美国说了算。他告诉哈里曼:“当然我们不指望 100%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在关键问题上……我们必须得到 85%。”^②杜鲁门一心想要保护美国的利益,即使他对“美国的利益”还没有精确的定义。他对俄国人在战争中的损失没有特别的感激,对丘吉尔或者英国人的英雄主义没有特别的敬意,对于饱受萧条和战争之苦的欧洲人也没有特别的同情。在波茨坦会议上与斯大林、丘吉尔共事几日之后,他带着几分自豪写信给妻子:

昨天的会议非常棘手。我几乎都发急了,我告诉他们该什么时候转变话题,他们就什么时候转变话题。我每天起码要对他们申明一次,对于这个总统而言,圣诞老人已经死了,我最关心的是美国,我要打赢日本战争,而且我要他们一起参与这场战争中。接下来我想要的是和平——世界的和平,而且我们要共同争取这样的和平。但是,我当然不想在欧洲建立另一个(字迹不清),支付赔款,为世人提供粮食,但我却除了轻蔑一无所得。我是当真的,他们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了。^③

杜鲁门当真的是欲与俄国人和平相处,并同时保护美国的利益。“我喜欢斯大林,”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是个直截了当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得不到的时候也会妥协。”^④在重要问题上的异议是不可避免的。杜鲁门对斯大林过去的镇压经历并无义愤。当然,不单单是指斯大林之后才为人所知的统治,对党内高官的残害和屠杀已成了公众心中的明证,还有就是对富农及其他政治对手的无情镇压。然而,总统对这一切都不以为然。甚至多年之后,他都承认那段时间“我非常喜欢他……斯大林是个很亲切的客人,他在餐桌上表现出的悟性高过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⑤有些人认为冷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西方害怕斯大林的残忍,这忽视了当代历史;有

① 戴维斯日记,1945年7月15日—16日,文件箱18,约瑟夫·戴维斯档案,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② 哈里·S·杜鲁门,《回忆录:1945,决策之年》(*Memoirs: 1945, Year of Decisions*),纽约:印章出版社(New York: Signet), 1955,72。

③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520。

④ 出处同上,522;强调继续罗斯福政策及与俄国人打交道,见米斯坎伯,《从罗斯福到杜鲁门》。

⑤ 杜鲁门,《杜鲁门演说》,67—68。



些人认为杜鲁门之所以立即发动冷战是因为受到了反苏顾问的意见和压力, 这是不正确的。杜鲁门眼中的斯大林是一个能够与之打交道的人。他会尊重美国的影响力。还是有可能达成一致的。

杜鲁门坚信美国的影响力与正义。他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 (James F. Byrnes) 持有相同想法。贝尔纳斯长久以来都是华盛顿的捐客, 南卡罗来纳州的前保守派参议员, 最高法院法官, 战时美国经济的最高统治者。杜鲁门喜欢贝尔纳斯, 后者在 30 年代中期他刚当上参议员时就和他交上了朋友, 他把贝尔纳斯看作一个处世精明、知识渊博、吃苦耐劳的人。在波茨坦会议上, 他让贝尔纳斯参与大多数颇具争议的谈判, 包括德国赔款、波兰边境、东欧新政府构成等问题。一旦斯大林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同意攻打日本, 杜鲁门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他在 7 月 18 日向贝丝坦言, “斯大林将会在 8 月 15 日参战, 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我想我们能在一年之内结束这场战争了, 想想那些不用再丧命的孩子吧。那才是重要的事。”^①

对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而言, 原子弹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能够击败日本、挽救美国人生命的武器。这一庞大而又崭新的工具是美国实力的体现。杜鲁门去波茨坦时还不知道它会成功; 海军上将莱希曾说它不会成功; 贝尔纳斯认为它会成功, “但他并不确定”^②。据许多人说, 原子弹测试成功的消息让杜鲁门自信心大增。这“让我的心理负担小了很多”, 他对乔·戴维斯透露。^③ 总统并没有像许多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下令将原子弹投放到广岛以警示俄国人; 不过他还是相信这还是能够对他们起到警示作用并让他们更为合作的。

在波茨坦, 杜鲁门悄悄把斯大林拉到一边, 简短地提到美国有一种强大的新武器对付日本。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也没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非得在波茨坦解决不可, 杜鲁门急着回国。他开始对会议上永无休止的争论不耐烦了。他觉得斯大林拖拖拉拉的。“他不明白,” 杜鲁门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可我手中有张王牌, 另一张已经现出来了——除非他有两张或三张(我知道他没有)。”^④ 贝尔纳斯也认为, “原子弹已经给

①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519;关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见罗伯特·L·梅瑟(Robert L. Messer),《一个联盟的终结:詹姆斯·F·贝尔纳斯,罗斯福,杜鲁门,以及冷战的起源》(*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2。

② M·杜鲁门,《父亲的来信》,178。

③ 戴维斯日记,1945年7月16日,文件箱18,戴维斯档案。

④ 费雷尔,《亲爱的贝丝》,522。

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而且……归根结底,它将拥有控制权。”^①

杜鲁门下令将原子弹投放到广岛,随后是长崎,这对他来说并非艰难的决策。在他心中,要挽救美国人的生命,这就是必需的。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权利;这也表明美国的敌人将为他们的侵犯付出代价。日本人已经付出代价了,随后他们便无条件投降了,唯一的要求是保留天皇。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斯大林的军队也同时在向他们进攻,夺取了满洲,入侵了朝鲜北部,并将视线投向了日本本土最北的北海道。^②

战争结束了。美国人欢天喜地。杜鲁门欣慰地舒了口气。他现在将调解工作迫切地委派给在波茨坦表现出色的国务卿贝尔纳斯。杜鲁门想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所熟悉的遣散、复原及国内事务上去。对于贝尔纳斯来说,当务之急是控制国家的对外政策。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对最亲密的同事说,原子弹这样的强悍武器可以用来迫使可能的敌人就范。^③但国务院和陆军部中富有经验的同事持怀疑态度。他们很反感贝尔纳斯妄图垄断美国外交。然而,因为厌倦了多年的战时职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45年的9月和10月离职,于是贝尔纳斯就全权负责了。

贝尔纳斯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精明,苏联也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受威胁。9月,战后的第一场外长会议在伦敦召开,贝尔纳斯以为自己能压过莫洛托夫的风头,并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人民代表作更多安排。但莫洛托夫对贝尔纳斯在程序步骤上的安排大为光火,而后者想要利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迫使别人让步这一意图太过明显,招致了莫洛托夫的嘲笑。实际上,苏联的外交部长是愿意在这几点上进行协商的——那就是,除非斯大林命令他下定决心。让会议在僵局中结束吧,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话中这样说,让贝尔纳斯焦虑一段时间。在波茨坦,斯大林在杜鲁门面前对贝尔纳斯不吝溢美之辞,象征性地反映出了这位独裁者对公然展现实力者的藐视。^④

① 戴维斯日记,1945年7月28日—29日,文件箱19,戴维斯档案。

② 关于战争的结尾,见长谷川健(Tsuyoshi Hasegawa),《与敌人赛跑:斯大林,杜鲁门,以及日本的投降》(*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

③ 关于贝尔纳斯对原子弹的看法,见布朗日志,1945年7月16日—8月1日,詹姆斯·F·贝尔纳斯档案,克莱姆森大学图书馆(Clemson University Library),克莱姆森,南卡罗来纳州。

④ 关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建议及外长会议的内容,见V·O·佩恰特诺夫,“‘同盟国在对你施压,以打垮你的意志……’: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成员有关外交政策的通信,1945年9月—1946年12月”(“‘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September 1945 - December 1946”),冷战国际史项目第26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1999,18—32;戈尔里兹基和赫列夫纽克,《冷和平》,19—23。



贝尔纳斯回到华盛顿时已颇受磨砺。他意识到了俄国人是不会受胁迫的。贝尔纳斯于是认为,与其把原子弹用作大棒,还不如把它用作胡萝卜。可能苏联人会受到诱导,从而达成控制未来原子能的有利协议。他认为苏联人的有些意见是有价值的。美国坚持要求苏联开放东欧,而将克里姆林宫关在日本之外,他为此不得不勉强摆出一定的伪善姿态。他能理解苏联为什么畏惧德国的复苏,以及为什么要与周边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他觉得如果克里姆林宫能够承诺在和平谈判达成后就立即撤离苏联部队,那么默许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一切还是有意义的。此外,一个保证解除德国军备的四强条约也能加快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一旦解除军备的条约达成,斯大林的安全困扰也就有所舒缓了,尽管他同意了将苏联军队像之前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撤离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从而弱化了其在东欧的统治。^①

在东欧建立开放范围、遏制苏联实力、维持战时联盟、避免与苏俄敌对冲突,这一切都还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可是贝尔纳斯快速的战术转变加上他傲慢的举止使他与内阁的同事、强势的参议院及重要的总统副手渐行渐远。杜鲁门对贝尔纳斯越来越感到灰心,就像他在1945年秋天对手下的许多顾问那样。战争的结束没有给这个经验不足的总统多少喘息的机会。他为了劳工斗争和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而忧心忡忡。他为了自己正遭受的批评和民主党在1946年中期选举中的惨淡前景而惶惶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会正横加阻碍;劳工也已经发疯了;在自私自利中的管理已经离愚顽不远了。”他的内阁患上了“波托马克热”^②。贝尔纳斯背地里的小动作太多,太爱自我宣传,太独断专行,招致了太多反感,试图表现得太过聪明,而且不论敌友一律疏远。

杜鲁门喜欢确定的东西。他最亲信的顾问都知道他不喜欢细枝末节或模棱两可。^③ 在10月27日的海军节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① 洞察贝尔纳斯的思想,见梅瑟,《一个联盟的终结》,137—155;格雷格·赫肯(Gregg Herken),《制胜武器:冷战中的原子弹》(*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纽约:克诺普夫(New York: Knopf),1980,66—94;爱德华·马克,“美国对东欧的政策和冷战的起源,1941—1946:另一种解读”(“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6: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8(1981年9月):313—336。

② 费雷尔,《非正式官方档案》,72;布卢姆,《远见的代价》,512—513;内阁会议备忘录,1945年10月—12月,马修·J·康奈利(Matthew J. Connelly)档案,文件箱1,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HSTL),独立市,密苏里。

③ 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口述历史,180—184,杜鲁门图书馆。



他说道,美国坚决放弃获取任何新领土。美国拥护民主与自决,它赞同公海自由、开放贸易和全球经济合作,它支持联合国和泛美主义,并且再也不会回到孤立主义的时代了。杜鲁门说,美国再也不会遭遇任何意想不到的事了。美国再也不会放弃它在军事上的优势了。它将把原子弹作为全人类的“神圣委托”,它的空军和海军将控制海面、统治天空,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美国的利益不可轻慢,美国的理想不容放弃。美国不会“向恶势力妥协”。^①

尽管杜鲁门的执笔人对讲稿的构思是“促使我们的外交劝解人更密切地关注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没有理由相信杜鲁门认为其演讲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② 这些理想和利益对于杜鲁门而言就像是苹果派和冰激凌。国家必须要强盛,也必须要参与国际事务。其利益和理想必须得到保护。毕竟,这是上帝的国度。战争给人们上了重要一课:再也没有奇袭,再也没有侵略。美国必须在远离其海岸的地方展现实力。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各地建立基地,不允许任何国家打破旧世界的均势,并一举控制亚欧的工业基础结构、原材料、技术熟练的人力。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几乎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并危害到了美国的利益与理想。这样的事情再也不允许发生了。

总统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自己的想法。贝尔纳斯不可以再“骄纵”苏联人了。苏联人必须离开伊朗北部,他们从那里撤军的速度太过缓慢了。他们必须停止就在达达尼建立基地的问题向土耳其施压。他们必须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建立更多民主政府。他们必须对朝鲜和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表示认同。“除非俄国面对的是铁拳和强硬措辞,否则另一场战争就要开打了。”^③

斯大林与杜鲁门

直到1945年末,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在警惕地对视着。他们都为自己的外长倾向于妥协而动怒。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有势力和权力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提升各自国家的安全和理想。他们并不想容忍敌对的状态。不过他们很清楚,冲突是

① “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讲”(“Address on Foreign Policy”), 1945年10月27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公开文件,1945》(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45),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431—438。

② 关于引言,见威廉·莱希日记,1945年10月27日,威廉·莱希档案,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

③ 费雷尔,《非正式官方档案》,79—80;梅瑟,《一个联盟的终结》,156—166;斯伯丁,《冷战先锋》,24—35。



没有意义的。比起决裂, 维持这个联盟更有利可图, 尽管唯有满足各自的国家利益才可能让合作成为现实。整个 1946 年, 他们都在强硬与和解两种态度间举棋不定。

斯大林不相信资本主义者, 而他们的孤立政策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即便如此, 他在战争中还是与罗斯福、丘吉尔齐心协力, 他相信一旦瓜分了德国、平定了周边, 冲突就能随之平息。可是忽然之间, 罗斯福离开了人世, 杜鲁门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罗斯福的离世令斯大林非常震惊。他提防着杜鲁门, 但也不排除与之合作的可能。^① 然而杜鲁门拥有极高的权力, 也行使了这样的权力。

斯大林很快就把广岛视为针对苏联的原子弹胁迫。“广岛已经震撼了全世界,” 他说, “平衡已经被破坏了。”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出尔反尔, 不再履行在雅尔塔所作出的承诺, 即让俄国人随心所欲地管理其势力范围。“他们想要强迫我们接受他们在欧洲和世界问题上的计划。但他们这是妄想。”斯大林对他心腹手下说道。甚至在杜鲁门让贝尔纳斯不要再骄纵苏联人之前, 斯大林就已经告诉莫洛托夫, 和美国人、英国人打交道时, “要是我们开始向这样的胁迫低头或是露出不稳定的迹象, 我们就什么都办不成了。要想从这样的对手身上捞到好处, 我们就必须用坚韧不拔的方针来武装自己”。^②

1946 年 2 月 9 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 通过广播传遍了苏联的每一个角落。忆及作为其指导方针的意识形态观点, 他说战争并不是一个意外, 也不是政治家错误的产物。“战争之所以发生, 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资本主义者能够在没有争端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市场和原材料, 或许能够保持和平, “但是, 资本主义如今在世界经济上的发展消除了这样的可能性”。

苏联被卷入了这场资本主义内部的斗争, 但是二战和一战是“截然不同的”。法西斯消灭了自己国内的“民主自由”, 建立了“残忍、恐怖的政权”, 并试图“统治世界”。“就我们的国家而言,” 斯大林说道, “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 这场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

① 佩恰特诺夫, “哈里曼赴莫斯科的使命”, 尤见 26—27; 杰弗里·罗伯茨, “挑起冷战: 关于莫洛托夫和杜鲁门在 1945 年 4 月会谈的新发现”(“Sexing Up the Cold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Molotov-Truman Talks of April 1945”), 《冷战历史》4(2004 年 4 月): 105—125。

② 蒙特费奥雷, 《斯大林》, 445;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 《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背后: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6, 42—43; 乔纳森·哈斯拉姆(Jonathan Haslam), “史看冷战”(“The Cold War as History”), 《政治科学年刊》(*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2003): 92—93, 佩恰特诺夫, “同盟国在对你施压”, 31。



残酷、最艰难的。”但是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多民族国家的力量，还证明了红军的复原能力和大无畏精神。这场战争还体现出集体化和工业化是明智的选择。“我党始终铭记列宁同志的教诲，那就是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就无法维护苏联的制度。”因此，有必要“创下国民经济的全新高潮”，力争每年生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和6000万吨石油。斯大林含蓄地提到了原子弹，他说在科学上也必须要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超越其他国家的成就”。“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国家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①

关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个人的偏执使斯大林总是疑神疑鬼。当战争快要终结时他坦言道：“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法西斯，另一方是民主派，这暴露了资本主义危机……我们现在与一方联盟抗击另一方，但我们将来也会与资本主义的前一个阵营为敌。”^②带着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对德日的忧虑以及对苏联成就的自豪，斯大林对于友好的周边心满意足。他想要“巩固苏联的领土利益，在东欧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德国问题上有政治发言权，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日本问题”^③。他希望得到安全，又希望在不打破这个强大联盟的前提下得到安全。

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对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富尔顿的演讲如此愤怒，这位前英国首相声称，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斯大林正在那里建造一道铁幕。“接下来发生的事是不可以忘的，”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说道，“德国人穿越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从而入侵苏联。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放肆地准备侵略我国，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苏联持敌对态度。”结果就是几百万的俄国人丧生了，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人也难逃劫数。或许丘吉尔想要忘记那样惨痛的代价，但是斯大林忘不了。斯大林怒道：“苏联正为将来的安全问题担心不已，现在还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家的政府对苏联故态复萌，这样的事实还不够令人惊讶吗？”^④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合力想要把苏联挤出德国，破坏其在东欧的权势

① 约瑟夫·斯大林，“俄罗斯的新五年计划”（“New Five Year Plan for Russia”），1946年2月9日，《第12日的重要讲话》（*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2*）（1946年3月1日），300—304。

② 巴纳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358。

③ 戴维·霍尔韦（David Holloway），《斯大林和炸弹》（*Stalin and the Bomb*），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168。

④ 约瑟夫·斯大林，《为了和平共处：战后访谈》（*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Postwar Interviews*），纽约：国际出版社（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1，11—12。



地位,并且否认苏联认为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受允的100亿赔款。^①苏联官员对贝尔纳斯再三倡议的四国解除德国军备谈判冷嘲热讽。就连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以亲西方态度而著称的战前外交部长,都对美国的动机表示惊愕。1945年7月,李维诺夫就注意到,那些已落入法、美和英手中的鲁尔和其他西德工业地区,它们所生产的钢和生铁分别占德国总产量的75%和70%。他警告道,鲁尔的工业可以在一年之内得到恢复,并能够供养好几百万士兵的军队。“如果我们与西方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我们可能抵挡不了将鲁尔区作为供给基地的西方力量,要么就供将加入同盟国的德国使用,要么就由那些国家自己的武装力量使用。”李维诺夫认为,美国人想让人们以为苏联安全可以通过解除军备的谈判得到保障,而美国人就想用这样的假象来欺骗俄国人。他和斯大林的一个相同观点就是,贝尔纳斯正想方设法为可以想象的最危险局面打基础,那就是提前结束对德国的占领。^②

威胁并不仅仅存在于斯大林的想象之中;威胁的确存在着。饥荒肆虐着他的国家。被他吞并的国家动荡不安。被红军占领的国家不时出现小范围的叛乱和游击战,向他在那些国家的统治地位发出挑战。根据俄国、波兰和乌克兰的档案,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可能会鼓舞叛乱者的士气,斯大林和他的国内安全机构对此“深感焦虑”。在对苏联军力的抵抗中,对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猜测应运而生,这让乌克兰人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想象在新世界冲突中获得解放。“在整个被苏联占领的东欧,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讲无异于一声武装的号角”,或许对于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以及斯大林的警察首领来说也同样如此。^③

意识形态取决于斯大林的思维,而他的猜疑又在经验和现实中得到了强化。在

① 斯大林与贝尔纳斯访谈记录,1945年12月24日,G·P·基尼姆(G. P. Kynim)和Y·劳弗(Y. Laufer)(编),《苏联和德国问题:俄联邦外交政策档案文件,卷2,1945年5月9日—1946年10月3日》(*USSR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Documents from the Foreign Policy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ol. 2: May 9 1945 - October 3 1946*),莫斯科:国际关系(Moskva: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2000,335—336;佩恰特诺夫,“同盟国在对你施压”,10—11。

② 备忘录,李维诺夫,1945年7月5日,基尼姆和劳弗(编),《苏联和德国问题》,171—175;李维诺夫致斯大林(Litvinov to Stalin),1946年5月25日,出处同上,517—519;声明草稿由李维诺夫和I·M·马伊斯基(I. M. Maiskii)准备,1946年6月12日,出处同上,596—598。

③ 杰弗里·伯兹(Jeffrey Burds),“苏联西乌克兰的冷战初期,1944—1948”(“The Early Cold War in Soviet West Ukraine, 1944—1948”),《卡尔·贝克俄罗斯和东欧研究文献》(*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1505号,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出版社(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1,25—30;黑官,《顿巴斯的自由与恐惧》,251—323。



罗马尼亚、波兰、巴尔干、乌克兰和土耳其，英国和美国官员秘密行动着，尽管规模不大，却挑起了动荡的局势并与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当然，斯大林的残酷镇压、对从属国的转让以及对伊朗和土耳其部分领土的争论，这些都使局面变得动荡，并由此出台了加剧其猜疑的政策。^①

然而斯大林还没有准备好发动冷战。他反复犹豫着，说着互相矛盾的话，寻求不同的方法。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动机和目标争论纷纷，因为他的言语和行动前后不一致。1993年，当这段时期的苏联档案第一次浮出水面，挪威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Odd Arne Westad, 中文名“文安立”)写道：“说起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部分上费解，倒不如说是整体上不连贯。”从更多曝光的档案上来看，这样的描述更符合事实了。^②

虽然斯大林一直在拖延从伊朗南部撤军的日期，寻求在土耳其海峡的新权利，并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逐步任命了更多共产主义政府，他还是将部队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地区的博恩霍尔姆岛；他同意了奥地利和部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苏占区的自由选举；从满洲撤出了苏联军队；还继续阻碍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或共产主义夺权。在德国，斯大林巩固了苏联人对苏占区的控制，他在私下里和公共场合多次表示要实践波茨坦会议上的誓言，那就是保持德国的统一和非军

① 杰弗里·伯兹，“苏联西乌克兰的冷战初期”；杰弗里·伯兹，“抗击‘第五纵队’的苏联战争：车臣的事实，1942—1944”(“The Soviet War Against ‘Fifth Columnists’: The Case of Chechnya, 1942—1944”),《当代历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2):309—314；爱德华·马克，“1946年的战争恐惧及其后果”(“The War Scare of 1946 and Its Consequences”),《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 21(1997年夏):406—407,410—411；理查德·J·奥尔德里奇(Richard J. Aldrich),《隐藏的手：英国，美国，以及冷战秘密情报》(*The Hidden Hand: Britain, America, and Cold War Secret Intelligence*),纽约：眺望出版社(New York: The Overlook Press), 2002, 142—145；黑宫,《顿巴斯的自由与恐惧》,313—316；艾丽娜·穆希娜(Irina Mukhina),“前苏联档案的新发现：克里姆林宫，华沙的暴动，冷战来临”(“New Revelation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Archives: The Kremlin, the Warsaw Uprising,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冷战历史》6(2006年8月):397—411。

② 奥德·阿恩·韦斯塔,《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4—1946》(*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55；另见哈斯拉姆,“斯大林掌权下的外交政策制定”；最新评价，见诺尔曼·M·奈马克,“战后的斯大林和欧洲，1945—1953：事件与问题”(“Stalin and Europe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1953: Issues and Problems”),《现代欧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2(2004):28—56；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弗拉基米尔·O·佩恰特诺夫,“苏联与外部世界，1944—1953”(“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utside World, 1944—1953”),《剑桥冷战史(3卷本)》(*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3 vols.*),梅尔文·P·莱弗勒和奥德·阿恩·韦斯塔(编),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事化。对于那些由他任命在柏林当权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他让他们停止激进的行动,为德国统一作计划。他指示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加入到新的社会主义统一党中,争取在四个占领区都赢得选举。然而苏联军队在德国东部的所作所为残忍地伤害到了当地人民,使共产主义原本可以保留的支持付诸东流了。诺尔曼·奈马克,这位专门研究斯大林对欧政策的著名历史学家写道,斯大林“对于战后欧洲没有坚定的计划,更谈不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路线图’了……他在战术上太过倾向于那个方向了”,而且只会对当地的局势作出反应,却看不到事态的发展。^①

斯大林并不想与西方大国有裂隙。1945年晚期,他对波兰共产主义者说,还是有可能与美国达成一致的。^② 当得知他在1946年2月6日发表的选举演讲被西方解读为他在脱离战时联盟并重拾意识形态进攻后,他反复在公共和私下场合澄清他的观点。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新上任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说,他认为美国和英国联合起来阻挠苏俄,而在那之后他又坚持希望与美英合作。“我们不应当担忧或恐惧,”斯大林说道,“因为只要有耐心和善意,那些发生在家庭中甚至亲兄弟间的异议都是能够平息的。”他对工党代表和英国记者也说了同样的话。将不会再有战争了,他对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这样说道。他说,对于战时联盟长期合作的可能性,“我完全有信心”。“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共产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如果他确实是在表达反对美英的言论,又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允许苏联媒体发表这样的采访内容。^③ 而在1946年1月,也就是他在大剧院发表演讲前两个星期,他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最后一次会面,斯大林告诉哈里曼:“基于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理念,苏联与美国是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的。”他还询问美国是否能像之前承诺过的那样提供大量贷款。他明确表示不会将政治上的让步作为贷款的回报,但是还是需要这些钱进行战后重建工作的。他承认,需要6到7年的时间才能

① 奈马克,“战后的斯大林和欧洲”,36。

② 哥穆尔卡备忘录:与斯大林的对话,1945年第3季度,“对话斯大林”,272,冷战国际史项目。

③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致国务卿,1946年4月5日,出处同上,293—294;“工党赴苏友好访问团报告”,[1946年夏],出处同上,330—332;“回答A·沃思的提问”(“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Posed by A. Werth”),1946年9月17日,出处同上,339—340;“回答H·贝利先生的提问”(“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Mr. H. Bailey”),1946年10月26日,出处同上,341—344;关于合作的主题,尤见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佩恰特诺夫,“苏联与外部世界”。



修复俄罗斯西部受创的地区。^①

但是，斯大林希望跟西方合作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控制德国和日本的可能复苏。他对美国公然垄断对日本的占领感到气愤不已，况且日本被俄国视为永久性的威胁，他还不能接受美国对其战略要求的无动于衷。他希望能被看作是一个合伙人，哪怕地位较低。^②他了解到西方联盟不会同意将德国分解成独立的区域，也相信那些国家会利用西占区的潜在力量，为西方的利益服务，于是斯大林转变路线了。1945年中期，他开始支持德国的统一和经济复苏。他的目的在于让一个统一、非军事化的德国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由此可以与英国和美国相抗衡，并遏制他们对国际经济的统治。当然，一个统一、复苏的德国也有可能摆脱控制，加入西方资本主义的阵营，与苏俄为敌，或者有可能自立门户，重整军备，旨在复仇和夺回领土。斯大林认识到，要想把德国争取过来，就要减缓德国的复仇心理，但这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不论他的猜疑有多重，与美、英的合作都是有必要的。最起码他心里知道，如果还想从德国西占区获得用于俄国重建的赔款，合作就必不可少。^③

德国统一会附带不少的未知因素，这使控制苏联的东欧边界显得尤为必要。因此，1946年到1947年，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与贝尔纳斯、英国外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共同完成与东欧各国的和平条约，这些国家在战争时期都是与德国打过仗的。一位专门研究冷战的匈牙利史学家写道，斯大林想要培养“能通过和平手段接管中东欧的共产主义者，同时还要保留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关系”^④。

杜鲁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迂回曲折的苏联政策，况且从中还能窥探出好战和与之

① 佩恰特诺夫，“哈里曼赴莫斯科的使命”，45—46；“回答H·贝利先生的提问”，1946年10月26日，“对话斯大林”，344，冷战国际史项目。

② 所有近来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斯大林对日本崛起的顾虑。如见佩恰特诺夫，“同盟国在对你施压”，11—16。

③ 概括见于奈马克，《俄罗斯人在德国》；奈马克，“苏联人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228—245, 350—355；符拉迪米尔·K·沃尔科夫(Vladimir K. Volkov)，“斯大林眼中的德国问题”(“German Questions as Stalin Saw It”)，“斯大林和冷战，1945—1953”(“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会议稿件，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1999；威尔弗莱德·洛思(Wilfried Loth)，《斯大林不想要的孩子：苏联，德国问题，民主德国的建立》(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

④ 乔巴·贝克斯(Csaba Bekes)，“苏联在1946年初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计划：来自匈牙利档案的新证据”(“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Bulletin) 10(1998年3月)：135。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对话斯大林”中有许多文件谈到了此类概括；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245—253；马克，《逐步革命》；祖博克，《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背后》；霍尔韦，《斯大林和炸弹》；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安全隐患》；佩恰特诺夫，“同盟国在对你施压”；佩恰特诺夫，“苏联与外部世界”。



相对的自制的迹象。1946年2月,他在莫斯科最能干的外交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向华盛顿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上面说“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所持观点的基础是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凯南归纳道,苏联人不相信与西方持久和解的可能性。^①而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哈里曼大使离开莫斯科,他对那位苏联独裁者持有典型的含糊观点:

他当面表现出的彬彬有礼与善解人意是我难以拒绝的,但其中似乎又带有可怕残忍的意味。其他那些没有当面见过他的人只看到了作为暴君的斯大林。而我则看到了另一面——他有着捕捉细节的超凡智慧,也善于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敏感性,起码在战争年代如此。我认为他比罗斯福更见多识广,比丘吉尔更注重实际,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所有战争领导人中最为有力的……我必须承认,斯大林始终是我认识的最神秘莫测、也最自相矛盾的人——而一切的功过是非都要留给历史来评判。^②

当然,杜鲁门总统可没有等待历史评判的闲情逸致。他需要在当前就作出决定。他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对贝尔纳斯的妥协态度非常恼火。他也对战时苏联针对同盟国的谍报活动愤怒不已。他很欣赏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讲时的强硬措辞。他告诉苏联人快离开伊朗北部。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战争计划。他鼓励贝尔纳斯联合德国西部的英占区和美占区,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从而赢得德国人民的支持。如果克里姆林宫反对英美的措施,那么他们的态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③

但是杜鲁门并没有打算摊牌。他承认了没有代表性的、由苏联强加的罗马尼亚

① “长电报”可见于乔治·F·凯南,《回忆录,1925—1950》(*Memoirs, 1925—1950*),纽约:班塔姆出版社(New York: Bantam), 1967, 583—598。

② W·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伊利·埃布尔(Elie Abel),《会见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外交特使,1941—1946》(*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纽约:兰登书屋,1975, 535—536。

③ 关于美国在德国的政策,特别参见卡罗琳·艾森伯格(Carolyn Eisenberg),《划清界线:美国划分德国的决策,1944—1949》(*Drawing the Line: The American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1944—1949*),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 71—276;关于苏联的谍报活动,见凯瑟琳·A·S·西布利(Katherine A. S. Sibley),《红色间谍在美国:失窃的秘密与冷战的端倪》(*Red Spies in America: Stolen Secrets and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劳伦斯,堪萨斯州:堪萨斯大学州出版社(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艾伦·温斯坦(Allen Weinstein)和亚历山大·瓦西列夫(Alexander Vassiliev),《魅影重重的树林:美国的苏联间谍——斯大林时代》(*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 The Stalin Era*),纽约:兰登书屋,1999。



和保加利亚政府。1945年晚期，他让著名的战时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前往中国，平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争端。他鼓励副国务卿迪安·G·艾奇逊(Dean G. Acheson)及其助手制定国际原子能控制计划。他继续监督着美国军队的遣散工作。就像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那样，他也指示贝尔纳斯完成有关东欧、意大利和芬兰的和约。他要求驻德副司令卢修斯·D·克莱(Lucius D. Clay)将军继续会见苏、英、法的军事司令，探讨德国统一的计划。杜鲁门最信任的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George Elsey)在1946年夏天起草了一份内容很长的报告，声称正如总统所言，苏联在之前的协议上有欺骗行为，目的在于一统天下。当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对此观点提出异议，并在公开场合表明支持对克里姆林宫采取更具安抚性的政策后，杜鲁门便将他开除了。可就在同时，总统将克利福德-埃尔西的报告锁在保险箱中，等待合适的时机。

杜鲁门并不渴望分裂这个从罗斯福手中接手的伟大战时联盟。一旦联盟垮台，杜鲁门在国内的优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他所在的政党也会有所削弱。杜鲁门知道，与苏联发生冲突，就需要对受围国家加派国外援助，国防开销增加，税务削减缩小，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共和党早就因为物价上涨、劳工动乱、税金高昂的问题对他进行了批评。尽管杜鲁门的外交顾问们一致认为苏联是个巨大的威胁，他还是不太清楚该怎么办。当其政党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落败时，他请马歇尔将军担任他的国务卿却没有给他行事原则，而马歇尔将军本就是以精明克制闻名的。马歇尔并不想与俄国人产生冲突，而是想和他们协商德国问题的和约。然而，在他到达莫斯科之前，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使最后一丝缓和的希望也破灭了。^①

国际性政治混乱

杜鲁门和斯大林都不想陷入冷战。但冷战还是发生了。为什么？

① 关于杜鲁门在1945年和1946年的政策，可参见笔者的书《实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25—181；不同诠释可参见奥夫纳，《另一场胜利》，1—184；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受引导的和平：欧洲问题的解决》(*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3—65；麦卡洛，《杜鲁门》；汉比，《人民之子》；德博拉·韦尔奇·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遏制政策的来源：心理学上的解释》(*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约翰·L·加迪斯(John L. Gaddis)，《美国与冷战的来源，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



冷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际形势衍生出了杜鲁门和斯大林都不能接受的危机,以及双方都不能抵挡的机遇。无论是世上最强国的总统,还是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都无法掌控历史事件。而这两个人的信仰和经历,又夸大了他们对威胁的感知和对背叛的恐惧。两个人都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因为危机正在迫近。两个人都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因为机遇正在召唤。

从二战接近尾声开始,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没有什么比战争遗留下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冲突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了。1945年4月,欧洲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颇具影响力的陆军部部长助理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从欧洲返回,对局势作出了极为悲观的陈述。“中欧正历经着一场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彻底颠覆,这在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他对陆军部部长亨利·L·斯廷森(Henry L. Stimson)说,德国的形势“比世上发生过的一切都要糟糕”。斯廷森在日记中记录道,他“早就预料到了混乱局面,但没想到其中的细节会如此骇人听闻”。^①

几个月之后,迪安·艾奇逊在7月也对参议院银行业与货币委员会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欧洲和远东正在上演的一切,表明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局势,对我们和我们的先祖毕生所熟悉的世界基础和整体结构产生了莫大威胁。”艾奇逊说道,在得到解放的欧洲,铁路和能源系统已不再运作,“金融系统崩溃了。资产所有权和资产管理都混乱不堪”。艾奇逊还说道,并不是从公元8世纪穆斯林将世界分为两派开始,局势就如此严重的。欧洲的工业与社会生活已是“完完全全地停滞不前了”。“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艾奇逊警告道,“可能会支离破碎,除非在所有阵线上都采取最有力的措施。”^②

人们在水深火热中艰难度日。人们渴望美好的将来。人们在讨论、争辩中想象着另一种政治、经济秩序。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大萧条、战争、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历史学家伊戈尔·卢克斯(Igor Lukes)在战后记述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谈道:“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变得陈腐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指出,世界从战争的硝烟中屹立起来,以一种黑白分明的姿态:一方是奥斯威辛,另一方则是斯大林格勒。前者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后者则代表了

① 总统备忘录,麦克洛伊整理,1945年4月26日,总统秘书存档(PSF),哈里·S·杜鲁门档案(HSTP),杜鲁门图书馆,文件箱178;亨利·L·斯廷森日记,1945年4月19日,亨利·L·斯廷森档案,耶鲁大学。

② 艾奇逊证词,1945年6月12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与货币委员会,《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第79次大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45,1—51,特别参见19,20,21,48—49。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①1945年11月，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评论道：“在欧洲，没人相信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私人企业。”他说道，人民“需要社会主义，但他们也需要人权”。^②

这不仅仅是浮夸至此。在大街小巷和投票站发生的一切令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在欧洲的每一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在攀升。在比利时，共产党人数从1939年的9000人上升到了1945年11月的100000人；希腊共产党从1935年的17000人上升到了1945年的70000人；意大利共产党从1943年的5000人上升到了1945年底的17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从1945年5月的28000人上升到了1945年9月的750000人。在法国、意大利和芬兰，共产党得到了全部投票的20%；在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和瑞典则接近10%。在东欧国家，20%至50%的平民支持左翼政党。^③民众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使左派对中间派和右派的威胁更大了。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的是，1945年7月，英国的工党夺取了胜利，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人们到处嚷嚷着要实行土地改革、社会福利、工业国有化。“他们受了这么多苦，”艾奇逊说道，“他们相信政府能够采取一些减缓他们痛苦的措施，他们要求更进一步加强国家对所有业务的管控和干预。”^④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在复苏的左派面前几近消失。

亚洲、中东和非洲的局势也不容乐观。在日本，15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濒于崩溃。中国陷入政治斗争和内战之中。在南亚，莫汉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领导的国大党继续走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漫漫长路上。在东南亚，革命性的国内运动此起彼伏。共产主义领导人胡志明(Ho Chi Minh)向法国发出越南独立的呼声。阿克梅德·苏加诺(Achmed Sukarno)为赢得印度尼西亚主权向荷兰发出挑战。实际上，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曾为欧洲殖民地的亚非国家如今要求独立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整国际秩

① 引自伊戈尔·卢克斯，“捷克的共产主义之路”(“The Czech Road to Communism”)，收录于奈马克和吉比安斯基(编)，《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249；关于此观点的详细阐述，见艾布拉姆，《国家灵魂的挣扎》。

② A·J·P·泰勒，“欧洲革命”(“The European Revolution”)，《倾听者》(Listener) 34(1945年11月22日)：576；见朱特，《战后》，215—219。

③ 亚当·韦斯特比(Adam Westoby)，《二战以来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Since World War II)，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1，14—15；罗伯茨，“意识形态、周密分析与应变对策”，671；艾布拉姆，《国家灵魂的挣扎》，9—38。

④ 艾奇逊证词，1945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与货币委员会，《布雷顿森林协议》，1：35。

序,点燃莫斯科对前进、变革的巨大希望,也导致华盛顿的巨大恐惧和无限挫败感。

美国的官员希望形势能够好转。在某些地方,形势是有所改善了,但还不足以减轻那些官员的心理负担。1946年3月,艾奇逊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说:“世界商业、金融系统比我们所有人在一年前预料的都要糟。毁灭更为彻底,饥荒更为严重,疲惫也更为普遍。那些曾被当作预言而遭忽视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不争的事实。”^①在内阁会议上,杜鲁门的顾问讨论了当前的食物短缺、社会紊乱、政治动乱问题。总统承认:“如今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民众已经多过战争中的任何一年,可能比战争中那些年加在一起的人数都要多。”^②

凌驾于这些评议之上的,是对斯大林利用这些局势的担心。“这个冬天,中欧将会爆发疫情和饥荒。”1945年5月16日,陆军部长斯廷森这样对杜鲁门总统说,“之后很可能会出现政治革命和共产主义渗入。”第二个月,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将一份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报告交到了总统手中。报告总结道:“如今的欧洲,是阶级仇恨的发源地,而这种自发的阶级仇恨是由一名娴熟的煽动者引导的。”接下来的两年,尽管苏、美的官员与东欧、伊朗、土耳其大费口舌,这一威胁并未减弱。1947年9月,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得出推论:“对美国安全最大的潜在危险在于……西欧可能的经济崩溃,以及随之出现的对克里姆林宫俯首称臣的局面。”^③

1947年1月、2月间的大雪和严寒将忧虑变成了行动。英国官员透露,财政危机迫使政府从地中海东部撤离,由此使希腊和土耳其暴露在新的危险中。“世界的领导权,”国务卿助理威尔·克莱顿(Will Clayton)写道,“正从英国那一度充满力量、现在却异常虚弱的双手中快速滑落。这一领导权不是落到美国手中,就是落到俄罗斯手中。如果是落到俄罗斯手中,在接下来十年左右几乎肯定会爆发针对我们的战争。”^④克莱顿担心希腊共产党会夺取政权,并使希腊投靠苏联。共产主义在希腊的

① 艾奇逊证词,1946年3月13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与货币委员会,《布雷顿森林协议》,第79次大会第2次会议,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46,306。

② “总统的陈述”(“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1946年2月6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46》,106;内阁会议备忘录,1946年1月—3月,康诺利档案,文件箱1。

③ 斯廷森致杜鲁门,1945年5月16日,文件箱157,总统秘书存档,杜鲁门档案;约瑟夫·格鲁致杜鲁门,1945年6月27日,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波茨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otsdam*),1:267—280;中央情报局,“世界局势回顾”(“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1947年9月26日,文件箱203,总统秘书存档,杜鲁门档案。

④ 备忘录,威尔·克莱顿,1947年3月5日,弗雷德里克·J·达布尼(Frederick J. Dobney)(编),《威尔·克莱顿文选》(*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1,198。



胜利将产生席卷欧洲的浪潮。对此，杜鲁门总统是这样看的：

如果我们背弃这个世界，像希腊那样被战争削弱、分裂的国家就会被苏联轻而易举收入囊中。如果俄罗斯在这些地区获取了成功，而我们又明显缺乏兴趣，那么像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境内的共产党就得到发展，而他们本身就已是明显的威胁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就等于将现在不承认与俄国有联系的广大地区拱手送给俄国人。^①

杜鲁门采取行动了。1947年3月12日，他向国会发表了一个特别演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观点。之后，“当渴望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民族或外来压力的征服时，这就将成为美国支持那些人民的准则”。他要求国会拨款4亿救济希腊和土耳其。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那些国家必须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如果我们在领导权问题上稍有犹豫，”杜鲁门警告道，“我们就可能会殃及世界和平。”^②

三个月后，关于德国问题的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国务卿马歇尔寻求进展未果，随即便在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时声称，他提议美国帮助欧洲的重建工作，只要欧洲人民能为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规划。苏联并没有采取带侵略性的行动，但是不断巩固其在东欧的影响力，并策划利用西欧愈演愈烈的混乱场面。“欧洲的局势正在一步步恶化，”国务卿助理克莱顿在5月27日说，“几百万城市居民逐渐开始挨饿……如果不能进一步得到美国的实质援助，欧洲将会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瓦解。”在德国的西占区，定量配给减少到了每人每天1200卡路里。马歇尔和他的部下都很担心，如果再送来更多食物，他们“阻止德国倒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努力”就要白费了。^③

杜鲁门明白，他必须设法让美国民众理解他们是否要支持他正在设想的这个倡议。他解释道，那是二择一的生活方式的斗争。那不是军事斗争，而是政治领域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是精神层面的斗争。就在宣布“杜鲁门主义”前几天，杜鲁门

① 哈里·S·杜鲁门，《回忆录：审判与希望的年代，1946—1952》（*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1952*），纽约：印章出版社，1956，124—125。

② “致国会的特别讯息”（“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1947年3月12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47》，176—180。

③ 关于马歇尔的发言，见国务院《公报》16（1947年6月15日）：1159—1160；克莱顿致艾奇逊，1947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47》，3：230—232；霍华德·C·彼得森（Howard C. Peterson）致罗伯特·P·帕特森（Robert P. Patterson），1947年6月12日，文件箱8，普通十进分类文件，罗伯特·P·帕特森档案，第107号记录组（RG），国家档案馆（NA），华盛顿特区。



在贝勒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向计划经济迈进。自由企业到处受到质疑。而在自由企业处于危险的地方,其他应受重视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也都受到质疑。在总统看来,所有这些自由都是无形的。^① 它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以及人民对美好将来的向往。它们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强大的共产党成功入主政府机关,因为武装的少数派愿意用武力夺取政权,因为在幕后虎视眈眈的克里姆林宫为夺权者提供帮助并予以利用。

美国自身的未来也面临危险。“对于欧洲复苏,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美国式生活方式所植根的文化,这是相当重要的。”杜鲁门解释道,“如果欧洲无法复苏,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可能会被迫陷于(极权主义的)绝望之中。这样一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便将遭受致命打击。这或许会让我们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经济体制,或许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们还要放弃许多自由和特权。”^②

美国的官员们于是不得不采取行动,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是邪恶的独裁者,残杀了数百万同胞,还镇压了苏联周边国家的人民;而是由国际体系的条件所决定的,而且他们担心社会骚动和经济瘫痪会让欧洲落入共产党手中,从而让斯大林有机会壮大苏联的力量。他们同时还担心在德、日的占领政策不得要领,会令这两个国家倾向苏联的轨道,而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也会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利用。他们已经认识到,一旦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拥有强盛的势力,它就有可能发动战争,而即使它没有发动战争,它对亚欧的巨大资源和市场的控制也意味着它侵害到了美国的自由政治经济。“如果我们任由共产主义吸纳自由的国家,”杜鲁门之后解释道,“我们就会丧失我们的供给来源,还会失去我们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就必须采取防御手段,而这又可能会搞垮我们的经济,我们还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致再也认不出这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了。”^③

德国比所有国家都要关键。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德国的统一是个高于一切的问题。“我心中唯一认为真正危险的事,”乔治·凯南于1946年说道,“那就是德国的技术技能有可能会和苏联的物质资源相结合。”^④从战争落下帷幕开始,美国的高级

① “关于国外经济政策的演讲”(“Address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47年3月6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47》,170—171。

② “致国会的特别讯息”,1947年12月19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47》,516—517。

③ “广播和电话演讲”(“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1952年3月6日,出处同上,1952—1953,194—195;另见“致国会的特别讯息”,1952年3月6日,出处同上,189。

④ 凯南,“俄罗斯的国家宗旨”(“Russia's National Objectives”), 1947年4月10日,文件箱17,乔治·F·凯南档案,西利·马德图书馆(Seeley Mudd Library),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官员就意识到，德国煤产的复苏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极为重要，这也是社会和平的立足点。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总统要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也就是后来的美国驻欧总司令，将2500万吨煤的生产和出口作为美国在德首要的占领策略（而不是美国部队自身的健康和安​​全）。这一举动有着深远的含义。大规模的煤矿开采获得了成功，用克莱将军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经济以及支持煤矿开采的某些工业活动的部分恢复”^①。

但是1946年，英、法、美占领区的经济举步维艰，造成了华盛顿的巨大恐慌。当官员们都致力于马歇尔计划时，凯南和他在国务院的助手仍坚持相信恢复德国生产是欧洲复苏的关键，但他们担心复兴的德国将会挣脱他们的控制。无法确定德国在占领状态结束后会有怎样的举动，或是它在这样的国际体制下将何去何从。当马歇尔前往莫斯科参加1947年3月的四国外长会议时，与他同行的还有著名共和党外交发言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杜勒斯告诉马歇尔，德国的经济潜力应当被吸纳进西欧，不能“将经济大权交由德国人”。正如杜勒斯所言，这是个莫大的挑战。他相信，一旦德国人恢复元气，他们“几乎肯定会充满复仇的欲望，并一心要夺回强势地位”。他们可能会与苏联合伙，也可能单枪匹马。不管哪种情况都潜藏着危险。^②

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必须采取措施加快鲁尔的煤生产。苏联不该得到任何赔款，不论是以原材料、机床还是其他形式的赔款。德国的资源应当用于西欧的重建。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赔款问题的讨论一度陷入僵局。尽管马歇尔希望维系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是告诉斯大林他无法在德国的未来这一问题上过多争论。行动刻不容缓。^③ 在7月3日的会议上，国务卿马歇尔、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一致同意：“德国必须全力与任何现行欧洲计划合作，欧洲的经济复

① 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指示，1945年7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波茨坦》，2:1028—1030；让·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编)，《卢修斯·D·克莱将军档案：德国，1945—1949(2卷本)》(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 Clay: Germany, 1945—1949, 2 vols.)，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4，1:44。

② 备忘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47年2月26日和3月7日，文件箱31，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档案，马德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

③ 对话备忘录，1947年4月15日，《美国外交关系，1947》，2:339—344；罗伯特·H·范·米特(Robert H. Van Meter)，“1947年的国务卿马歇尔，克莱将军，以及莫斯科外交部长会议：对菲利普·泽利科的回应”(“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 General Clay, and the Moscow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1947: A Response to Philip Zelikow”)，《外交与治国》(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6(2005):139—167。



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生产力的复苏——煤、食品、钢铁、肥料等的生产,还依赖于这些欧洲资源的有效运用,比如莱茵河。”^①一周之后,克莱将军受命提高西占区的工业生产水平。

美国的进攻——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西德的重建——是对国际局势的混乱所作出的回应,美国认为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利用这样的政治混乱。他们担心受到驱逐政策的影响。杜鲁门及其顾问认识到,比起维持与苏联战时合作的心愿,他们将重建西欧和拉拢西德看得更重。他们并不想激怒斯大林或是威胁苏联安全,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不得不做他们正在做的事,即使那样会让苏联感觉受到挑衅。深思熟虑后即可行事。

斯大林并不感到惊讶。资本主义者露出其本性,拉帮结派要对付苏联。一开始,他还在考虑苏联是否要参与到马歇尔计划中。1947年7月,他派莫洛托夫和一百名技术顾问前往巴黎开会,讨论马歇尔关于欧洲复兴项目的建议。但正当莫洛托夫参与谈判时,斯大林改变了主意。他看到了孤立的前景。他很快便相信,参与该计划就意味着要开放苏联红军正掌控的东欧国家。他说,金融贷款眼看已无望,而且还会成为孤立苏联的托词。美国人正试图步步逼近东欧,他们想要利用德国的力量对抗苏联。美国正竭力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参与其中,斯大林因而要求这两国的政府不得接受美国的诱导。^②

然而,除了向盟友施压拒绝美国建议之外,斯大林还有进一步行动。看到危险之后,他在东欧掀起新一轮肃清,改组政府的构成,进一步将其僚属安插到权力机构中。苏联代表退出了即将治理德国的同盟管理议会。克里姆林宫加紧监控进入柏林的进程,并在德国东部的苏占区镇压社会统一党的反对者。1948年2月,斯大林支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夺权;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就演变成了“人民民主专政”。斯大林与苏联周边国家商讨了国防协议,他还提高了自己国内的军备支

① 国务卿、国防部长、海军部长集会,1947年7月3日,文件箱3,安全文档,罗伯特·P·帕特森档案,陆军部长办公室记录,第107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② 访问J·V·斯大林元帅记录(Minutes of a Visit to Generalissimo J. V. Stalin),捷克代表团,1947年7月9日,收录于“对话斯大林”,395—399,冷战国际史项目;杰弗里·罗伯茨,“莫斯科与马歇尔计划:政治,意识形态,冷战的开端”(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欧亚》46(1994):1371—1385。



出。“我们不想发生战争，”他说道，“但我们也不怕迎战。”^①

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者已经发出了挑战。尽管一段时间之前他就开始筹划行动了，1947年9月他在波兰召开了一次会议，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以加强对欧洲共产党的监控和配合。在会议上，他的代表宣布世界正在被分裂为两个阵营。和平共处已无可能。必须挫败西方资本主义者的计划。必须打击马歇尔计划。必须反对团结和重建德国西占区的企图。如果有必要，斯大林将会封锁柏林。纳粹德国过去的首都尽管表面上是由四个国家分别占据、划分为四个占领区，但实际上是座落于由苏联控制的东欧，可以用来获得对抗西方的主动。在1948年3月14日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解释了他的想法：“这两年开了无数的会议，清晰地表明我们无法与对方阵营取得一致，正如火水不相容。眼下这种虽有敌意但仍保持和平的状态还会维持很长时间，但是，我再重复一遍，终有一天，矛盾冲突会无可避免。”^②

意识形态决定了斯大林如何看待英美的行动，并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反应。他可以设法分裂资本主义列强。他可以设法动员欧洲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而实际上，他因为之前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有过战后的合作而谴责这两者，现在则又鼓励他们阻碍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但他同时还得提防冒险主义，提防行动太过粗暴，提防煽惑资本主义敌人更不祥的反应。^③ 斯大林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不再支持希腊共产党。他坚持认为那样的斗争应当留到更适宜的时刻。“所有的问题都取决于势力的均衡。我们不是在敌人希望我们进入战斗时才参与战斗，而是在时机符合我们利益时参与战斗。”^④

但是如果国际环境存在着危险，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假定存在着机遇。从20世纪20年代起，斯大林就开始思索“联合欧洲的无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革命……对抗帝国主义的世界阵线”^⑤。如今，在1947年晚期和1948年早期，斯大林重新把

① 关于引言，见“J·V·斯大林同志在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上的发言速记”（“Stenographic Record of a Speech by Comrade J. V. Stalin at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Politburo”），1948年3月14日，“对话斯大林”，432，冷战国际史项目；马斯特尼，《冷战与苏联安全隐患》，23—46；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背后》，50—52，104—108；克拉默，“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1099—1102。

② “速记”，斯大林发言，1948年3月14日，“对话斯大林”，429，冷战国际史项目。

③ I·V·斯大林同志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同志的谈话记录，1947年11月18日，出处同上，403—405。

④ 米洛万·吉拉斯对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Report of Milovan Djilas about a Secret Soviet-Bulgarian-Yugoslav Meeting），1948年2月1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0（1998年3月）：128—134。

⑤ 斯大林，“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110。



更多的关注投放到这一主题上。在 1948 年 3 月 14 日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 他说道: “我们应当强烈支持那些受到美国、英国、法国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许多曾一度受到欧洲列强统治的国家, 斯大林解释道, 如今都已“走上了国家解放的道路”。他们的反抗可以促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很早就预见到的资本主义危机。他说, 克里姆林宫可以设法加快中南美甚至亚洲的革命进程。他对他的同志说, 我们已经付出很大努力以“加快亚洲人民的解放, 尽管我认为今后我们还要朝着这个方向付出十倍的努力”。斯大林主张, 中国的解放运动应当成为未来的模范。第三世界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动乱为共产党扩大影响、侵蚀资本主义势力提供了无限的机遇。^①

正当斯大林承认在欧洲的弱势和在亚洲、拉丁美洲的机会时, 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也坚持认为, 以他们在欧洲的实力地位, 他们仍能得到行动的机会。“在必要而棘手的资源分配问题上,” 1947 年中期陆军部长助理霍华德·C·彼德森写道, “时间因素允许将重心放在加强针对苏共的经济堤防, 而非准备一场可能最终会发生、但还不至于无可避免的战争。”^②如果那段时间意味着美国人正在进一步提升国力、在中央决策上进行更多测试、增进贸易交流的控制, 那么既然所有相关条件都显示是美国占上风, 行动就刻不容缓。如果德国西占区的食品短缺、运作中断、政治动乱都预示德国的未来充满着不可知性, 那么就必须在德国共产党和他们的苏联支持者战胜亲西方的政党和政治家之前采取行动。

到了 1947 年秋天, 美国的官员已经感到他们没有时间达成合作的协议了。他们必须立刻调动西德的资源, 为西欧的经济重建和金融稳固服务。在 12 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 苏联官员仍刻意就德国的将来讨价还价, 甚至当时克里姆林宫已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煽动起了针对马歇尔计划的暴乱和游行。正因为国际环境危机四伏, 况且意大利共产党很有可能赢得将于 1948 年 4 月举行的选举, 杜鲁门和马歇尔敦促国会通过了紧急救济法, 之后, 他们利用布拉格共产党政变的消息竭力推动通过了支持马歇尔计划的法律。

更重要的是, 他们再也不想就德国的将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力求将英、法、美所占区联合成一个联邦共和国, 在那里实行货币改革, 提高工业

① “速记”, 斯大林发言, 1948 年 3 月 14 日, “对话斯大林”, 429—432, 冷战国际史项目。

② 参谋长备忘录, ND(1947 年 7 月), ABC471.6 核能(1945 年 8 月 17 日), 第 6-A 节, 美英对话, 陆军部将军与特别参谋记录, 第 165 号记录组, 国家档案馆; 另见沃尔特·米利斯(Walter Millis)(编), 《福莱斯特日记》(The Forrestal Diaries), 纽约: 维京, 1951, 350—351。



产量,从而将这个全新的西德纳入欧洲复兴的计划中。法国开始推诿并提出抗议,担心英美这样主动出击会在短期内激起苏联的侵略,或者在长期内制造出一个作法自毙的德国。1947年秋天,威尔·克莱顿在与法国官员交谈后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民对于德国人的再次进攻竟如此担惊受怕。”马歇尔试图减轻这些顾虑,但他坚持要向前推进。他写道:“要想让德国对欧洲复兴做出最大贡献,就一定要建立西德的政治组织……要是无法继续这一进程,在苏联人看来这就是弱势的表现……尽管美国政府能够理解法国的顾虑,但还是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允许面前有任何阻碍。”^①

也就是说,苏联封锁柏林的威胁是不可以阻碍到西方的主动攻势的。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同事认为,苏联不会越过德国开始作战。美国国内最资深的苏俄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都认为斯大林不会进攻。确实,美国之所以能够增进西德实力,利用这一点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正是因为美国料定苏联太弱,无法进行军事反击。斯大林可能会出言威胁,也可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大发淫威,还可能封锁柏林,但他还没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不会无视美国的原子能垄断。马歇尔认为,即使斯大林谴责或否认美国的实力,他还是会为此顺从。这位苏联领导人会大肆叫嚣,会奋力镇压,会煽起动乱。但是这些行动,马歇尔告诉他的内阁同事,只是反射出苏联的“绝望”,而非力量。1948年6月17日,克莱将军说道:“他们是在虚张声势,现在能够也应该让他们摊牌了。”^②

美国官员深受国际政局的鼓舞,于1947年和1948年继续外交上的进犯。在吸取了最近这段历史的教训之后,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应当先下手为强,不能让欧洲的技术工人、资源和工业设施落入极权主义的对手中;否则将会使美国的自由政治经济陷于危险境地。可如果目前的力量关联使美国能够迅速在西欧和日本采取行动,克里姆林宫仍有大把机会扩展其在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斯大林一心想着要保卫苏联安全,监管世界革命力量,他从未背弃这样的决心。只要与西方合作能够促进家园的重建,并能控制德、日的东山再起,他就准备好冷却

① 关于克莱顿的申明,见达布尼,《文选》,208;关于马歇尔的观点,见马歇尔致卡弗里,1948年5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48》,2:284。

② 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的陈述,1948年7月23日,文件箱1,康奈利档案;关于克莱,见史密斯,克莱档案,2:708;关于凯南和波伦的观点,见《美国外交关系,1948》,3:152—154,157—158,177,186;凯南致劳里斯·诺斯塔德,1948年5月4日,文件箱33,政策规划办公室会议纪录,第59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革命同志的热情,有时甚至背叛他们。但是,一旦杜鲁门宣布他要为了争夺人心发动一场对抗邪恶的战争,斯大林发现国际前景中不仅充斥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假定的危险,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

确实,危险与机遇正是冷战的特色。植根于国际秩序之中的,是各种有序与无序的社会力量、权力的空虚以及国家的解放战争。在历经了萧条、战争和屠杀之后,谁能赢得这场为人心而战的精神之役?在击败了德国和日本之后,谁能填补中欧和东南亚的权力空虚?在欧洲殖民地得到让渡之后,亚洲和非洲的国家解放战争会如何决定国际力量的划分?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在思索这些问题。他们既受到恐惧的折磨,又得到希望的激励。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潜伏在国际秩序中的危险和机遇。但是,国内政治也同样如此。

国内政治

杜鲁门并不急于继续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展开攻势。到1947年至1948年,他认识到美国民众已经加剧了对俄罗斯的猜疑,而共和党也迫切想要用他对另一个极权主义敌人的绥靖手段对他进行攻击。然而他也不知道公众是否会支持一项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而那样将会付出相当的代价。1946年11月,杜鲁门领导的民主党在选举中落败,共和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首次执掌参众两院。可是选战的重点落在了国内问题上。许多新当选的参议员,如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来自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John Bricker),都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他们认为总统对国内的共产主义不够强硬,因而比起敦促总统在外国事务上有所作为,他们更急于用前一点来对其进行攻击。^①

1946年11月的选举之后,杜鲁门的威望跌至谷底,仅有30%的美国人认为他是称职的总统。人们早已厌倦了物资的匮乏和工人的罢工,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房价和肉价。商人想要搞垮工会;南方的隔离主义者不想让黑人进入他们的生活领域;美国第一委员会成员则想要铲除国内的间谍和共产主义叛徒。

^① 兰德尔·B·伍兹(Randall B. Woods)和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冷战伊始:美国对秩序的探求》(*Dawning of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Quest for Order*),雅典城:佐治亚大学出版社(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98—102;梅格·雅各布斯(Meg Jacobs),《获利政治:20世纪美国公民的经济义务》(*Pocketbook Politics: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222—231。



杜鲁门之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动作不断，是因为他担心斯大林会利用当前局势扩张苏联的势力，而不是因为他醉心于公众对外交主动权越来越高的呼声。总统和他的顾问们都认为，在采取行动这个问题上，他们远远走在了公众的前面，而且他们必须让公众“惊愕”或“震惊”，从而获得支持。在会见国会里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时，国务卿马歇尔和副国务卿艾奇逊意识到，如果想得到人们对“遏制”政策的支持，他们就应该搬出刻板的意识形态那一套，以此施加威胁。杜鲁门的助手和国务院官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如何帮助总统遣词造句，以向国会申请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杜鲁门坚持该咨文应当用美国人民能够理解的简单语句来表述。这场迫在眉睫的竞争，实为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①“我不想这个演讲受到任何阻碍，”他在回忆录中谈道，“这是美国面对共产主义扩张冲击的回应。这必须是明白无误、不带任何犹豫的。”^②

国内的舆论已是水到渠成。1947年春天杜鲁门对苏联发动攻势之际，他的支持率一路飙升。杜鲁门的意图并不在于发动一场征战，将他和他的继任者卷入其中，但实际上他确实就是这么做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包括宗教狂热者、种族隔离主义者、右翼极端主义者、新政反对者在内的人们都高喊着反共的口号。杜鲁门缔造了调查联邦雇员背景的“忠诚法令”，还支持了建立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立法，这一切都“使民主党重新抬头”。^③

但是，总统也同样在自己的措辞中画地为牢。^④他强调了国外的共产主义威胁，

① 克莱顿备忘录，1947年3月5日，达布尼，《文选》，198；特别委员会研究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第一次会议纪录，1947年2月24日，《美国外交关系，1947》，5：47；迪安·艾奇逊，《目击创举：我的国务院岁月》（*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纽约：诺顿，1969，218—219；约瑟夫·M·琼斯（Joseph M. Jones），《十五周》（*The Fifteen Weeks*），纽约：维京，1955，129—170。

② 杜鲁门，《回忆录：审判与希望的年代》，128。

③ 乔纳森·贝尔（Jonathan Bell），《受审的自由国度：杜鲁门时期的冷战和美国政治》（*The Liberal State on Trial: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Truman Year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80。

④ 出处同上，46—120；理查德·M·弗里兰（Richard M. Freeland），《杜鲁门主义和麦卡锡主义的起源：外交政策，国内政治及内政安全，1946—1948》（*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l Security, 1946—1948*），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5；托马斯·J·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得力对手：重大策略，国内动员，中美冲突，1947—1958》（*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49—69；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民主与外交：国内政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789—1994》（*Democracy and Diplomacy: The Impact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U.S. Foreign Policy, 1789—1994*），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84—86。



可他又怎么能忽视国内的共产主义呢? 1946年7月,民意调查显示,36%的美国人认为国内的共产党应该受到处决或囚禁。^① 杜鲁门的保守派对手利用了这样的公众见解,巧妙地用总统的言论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想要把共产主义者从政府中驱逐出去,镇压“左派人士”,并对新政进行批驳。就在总统向国会提出其杜鲁门主义咨文的两周之后,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告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政府没有在搜捕破坏分子这件事上花足力气。他说,这事应该激起公众的怒火,“一旦共产党被指认和暴露出来,胜利就得到了保障,因为公众会率先孤立那些共产党,这样他们就无法危及他人了。实际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邪恶的、有害的生活方式”^②。

对苏联力量的遏制演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层面的庞大运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人民刚刚才击败了一个极权主义敌人;他们现在又面对着另一个敌人。他们知道斯大林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他们也知道他正向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强加“无神的”共产主义政府,一些在那里的美国人被迫移居。他们并没有问斯大林是否和希特勒不同。他们认定答案是显见的。而且他们知道斯大林在苏联周边以外也广受支持。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理查德·尼克松于1947年早期访问了欧洲,这位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发动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共运动。他看到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正在政治上大肆利用欧洲惨淡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威胁不仅真实存在,而且迫在眉睫。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并不是向他们自己的国家效忠,而是向俄国效忠。”^③

因此,国内的政治斗争强化了美国官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上的信念。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拥有一句共同的说辞:他们认为他们正在为保存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战斗。“如果西欧生活在铁幕的背后,”共和党议员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表示,“世界上那部分的所有生产潜能都要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了……(而且)这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反响也将会……非常严重。”乔治·凯南警告道,如果美国在能够运用其巨大力量时不抓住机会,它将面对一个如希特勒所梦想的那样的“充满敌意”的欧洲。这样一来,美国就会在欧洲的迫使下发生变化,增加国防支出,全盘控制经济,更紧密地打击国内破坏分子,对个人自由作出更多侵害。杜鲁门预计,美国将会成为一

① 克里斯滕森,《得力对手》,52。

② 理查德·吉德·鲍尔斯(Richard Gid Powers),《荣誉犹存:美国反共历史》(*Not Without Hono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Communism*),纽约:自由出版社(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217。

③ 出处同上,223;贝尔,《受审的自由国度》,92。



个要塞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我们闻所未闻的中央统制体制”。^①

斯大林的各项政策也逐步对其国内政策作出响应。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个性特点决定了他的态度,但是人们无法全然理解他的行为,除非是在他掌管国内事务的情况下。斯大林明白,苏联人民向往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获得实际利益,不想再看到任何牺牲了。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写道:“每个人都期盼着一旦获取胜利,人民就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战争本身也已经“被看作是一段自由的时间”。它激发了社会的同情心,也体现出人民的无穷创造力,因为他们被迫“再三为自己作出决定,再三为自己负起责任”。自发的非斯大林化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胜利过后,他们想要更好的东西。“他们相信胜利会带来正义,”爱伦堡写道,“意味着人类的尊严将大获全胜。”^②

斯大林并没有无视身边的现实。他的国家一片荒芜,他的人民一贫如洗。他的军队征服了新的国土,那里却居住着几百万心怀不满的人民。他的士兵回归故里时只是怀揣着不可靠的信念和希望。隶属于苏联的人民和民族都渴望自主权,而这样的渴望在抵抗和战争中愈益增强。苏联军队之前展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可是唯有依靠人数众多这一优势,而且还有可能对他的权力有所挑战。斯大林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但是在他的内心却满是对生活的不安与恐惧。苏联拥有了从未有过的权力,其长期安全却远远得不到保障。共产主义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共鸣,其内部机制却是摇摇欲坠。

不满的怨声铺天盖地。人民无以果腹,住房条件恶劣。1946年,苏联的谷物产量从1940年的9.55亿吨下降到了3.96亿吨;1947年,国家的面粉产量从1940年的2900万吨下降到了1400万吨。而那些能够到手的粮食往往也已是不可食用的了。“农村的工人,甚至那些低级别的经理,都陷于难以描述的赤贫状态之中。”家长都没有办法让孩子吃上饭、穿上衣服。平静的前进,哪怕缓慢的前进,也都永远成了泡影。^③

到处都是士气低落的景象,斯大林的间谍也警惕地报告着不断的抱怨。V·N·

① 关于诺兰的引言,见《国会纪录附件》(*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卷93, A4915页;关于凯南的观点,见政策规划办公室第20号文件,“欧洲复兴计划若不通过对美国的影响”(“Effect Upon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European Recovery Plan Is Not Adopted”),《政策规划办公室档案(3卷本)》(*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s, 3 vols.*),安娜·卡斯滕·纳尔逊(Anna Kasten Nelson)(编),纽约:加兰(New York: Garland), 1983, 2:78—79;关于杜鲁门,见“致国会的特别讯息”,1952年3月6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52—1953》,189。

② 爱伦堡,《战争》,124;梅里代尔,《墓石之夜》,213—224;奥弗里,《俄罗斯战争》,329。

③ 唐纳德·菲尔策(Donald Filtzer),《苏联工人与晚期斯大林主义:劳动与二战后斯大林体制的复元》(*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46—47,76;黑官,《顿巴斯的自由与恐惧》,300—308。



戈尔多夫(V. N. Gorgov), 这位曾攻克布拉格和柏林的将军与他的前参谋长 F·T·里巴尔申科(F. T. Rybalchenko) 共同对局势进行反复思考。“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愤愤不平, 抱怨不断,” 戈尔多夫说道, “饥荒已变得难以置信。”里巴尔申科反驳道: “眼下的政策让人们再也不想去工作。所有集体农场的农民都恨透了斯大林, 巴不得看到他完蛋。”谈话的内容被记录下来送到了斯大林手上。戈尔多夫和他的妻子便被处决了。^①

在苏俄的西部边境和新吞并的疆域中, 人民的不满情绪相当高涨。遭受镇压的民族团体和少数民族希望苏联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所缓和, 还想寻求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整个 1946 年, 乌克兰民族主义反叛分子都在不断地顽强斗争。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报告了愈演愈烈的外国谍报活动。被捕的嫌疑犯声称他们受雇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 在苏联收集情报资料。反叛分子则到处散播美苏即将开战的传言, 这样就会造成乌克兰的解放了。^②

斯大林的疑心病再次复发。他决定“重拳打击”任何有关“民主”的言论, 更不用提破坏活动了。他重新组织了西部边境的苏联内部警察机制。他任命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 负责党内秘书处宣传部, 并在当权人物和共产党官员中重新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正。他让秘密警察头子拉弗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 用苦役犯加快苏联的原子能项目。他改组了军队的高级将领, 降了朱可夫的军职。苏联劳动营的庞大网络内关押的政治犯人数从 1945 年的 1460677 人上升到了 1948 年的 2199535 人; 到 1946 年底, 被迫居住在特殊居民点的少数民族和受遣返士兵的人数已达到 2500 万。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囚犯死亡: 1945 年是 81917 人; 1946 年是 30715 人; 1947 年是 66830 人; 1948 年是 50659 人。^{③*}

①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帝国的制约: 斯大林与贫瘠的 1946 年”(“Limits of Empire: Stalin and the Lean Year of 1946”), 未出版; 关于此段对话在译文上的细微差异, 见黑宫, 《斯大林》, 177; 罗伯特·瑟维斯, 《20 世纪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伦敦: 企鹅, 1997, 299。

② 伯兹, “苏联西乌克兰的冷战初期”; 黑宫, 《斯大林》, 174—180; 黑宫, 《顿巴斯的自由与恐惧》, 310—320; 斯温, 《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

③ 瑟维斯, 《俄罗斯》, 299; 艾坡鲍姆, 《古拉格》, 516—520; 戈里兹基和赫列夫纽克, 《冷和平》, 31—43; 沃纳·G·哈恩(Werner G. Hahn), 《战后苏联政治: 日丹诺夫的沦陷与妥协的失败》(Postwar Soviet Politics: The Fall of Zhdanov and the Defeat of Moderation), 伊萨卡, 纽约州: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译者注: 据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 1939—1948 年间集中营总管理局(即“古拉格”)平均每年关押人数为 1961856 人, 其中最少为 1944 年 1335032 人, 最多为 1948 年 2475385 人; 1953 年 1 月 1 日关押在集中营的人数为 2468524 人, 另有 2753356 人被拘押在“特别居民点”。这些数字不包括被关在监狱的犯人。(参阅马龙闪: 《苏联“大清洗”受迫害人数再考察》, 《历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



斯大林一个一个地胁迫他的下属，他并不要他们的命，而是让他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恐惧，剥夺他们的独立，提醒他们他才是他们的权力甚至生命的来源。然而，很难看出除了那些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外他究竟还需要什么：他那不容置疑的权力，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的一党制国家，对苏联和东欧人民的专横统治。经济事务的责任被斯大林分配给了部长会议。国防、外交事务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则交由政治局处理，深受斯大林管控的政治局成员很少会面，即使见面也都是非正式会面。可是独裁者的统治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具有前瞻性。^①

苏联的记录揭示，斯大林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确切的策略。在很多问题上他会选择暂缓行动。高级官员会彼此间或与他一起讨论复杂、往往呈交叉性的问题——与美国的关系，苏联的安全，德国的未来，国外共产党的方针，工农业资源的分配，国家与文化自我表现的程度，等等。但斯大林偶尔才会插几句话，还会前后矛盾。^②然而，俄罗斯中心主义却在他心目中越来越有地位。“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比，爱国分子的重要性已日益上升。”^③

可是混乱并没有结束。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为他求得清晰的答案，国内政策也没有塑造他的外交政策。但在一个国内外骚乱不断的时期，意识形态夹杂着他的个人偏执，引导着他的想法，并决定了他在国内的镇压行动。没有人可以信任，最不可信的是所有的资本主义者。正如杜鲁门想与他和平相处，他也做好了与美国合作的准备，但是要根据他自己的主张，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与西方强国合作并不意味着他允许看到苏联安全或共产主义实验遭受侵害。在东欧和苏联西部边境，资本主义者煽起不满情绪，酝酿叛乱活动。他们要阻碍他在伊朗和土耳其的野心，他们抱定了重建西德的决心，他们是危险的无赖。马歇尔计划验证了他最坏的猜疑。该计划“将联盟扯碎了”，最近一名传记作家写道。斯大林把它看作是“破坏苏联在东欧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工具。^④

这时的斯大林别无选择，唯有直面他的外国对手。意识形态与历史都决定了他

① 瑟维斯，《俄罗斯》，301；戈尔里兹基和赫列夫纽克，《冷和平》，1—65；J·埃里克·达斯金(J. Eric Duskin)，《斯大林主义的重建和新掌权集团的证明》(*Stalinist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a New Elite*)，洪兹米尔，英国：帕尔格雷夫，2001。

② 瑟维斯，《斯大林》，531—540；戈尔里兹基和赫列夫纽克，《冷和平》，45—65；奈马克，“苏联人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370—371；柯特金，“无限的阴谋”。

③ 雷，《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282—283；布兰登伯格，《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

④ 关于引言，见黑宫，《斯大林》，188；瑟维斯，《俄罗斯》，308；另见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531，534；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克里姆林宫的冷战背后》，50—51，104—108。

们无法靠绥靖解决问题。斯大林的部下不仅在国内必须表现出忠诚和守纪,在整个东欧也同样如此。那是一段党同伐异的日子。

同盟国与附庸国

正当铁幕在欧洲徐徐下落之时,亚洲迎来了机遇。在中国,共产党顽强地战斗,志在夺权;民族主义革命领导人,例如越南的胡志明、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都在代表各自人民的自由与法国、荷兰抗争到底。

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斯大林并没有花大力气支持他在亚洲、非洲或拉美的共产主义盟友。他对毛泽东和中国解放战争的态度显示出他最关注的始终都是苏俄。斯大林表示,中国的革命局势尚未成熟,物质基础和阶级构成也不足以赢取胜利。1945年8月,他与国民党签署了一份协议,因为他希望保证俄国在东北亚的安全,避免与美国产生摩擦,缓和美国代表蒋介石介入亚洲事务的企图。在关键时刻,在满洲的苏联军队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和援助,而且斯大林敦促毛泽东作出让步,与国民党暂时妥协,共同治理中国。这些行动让毛泽东颇为沮丧,但是他的夺权意念不为所动。1948年2月,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说道,中国的同志“在口头上”同意了,“但实际上却仍在招兵买马”。^①

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亚洲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而是如何重建苏联,保护疆域。革命是最高目标,可以暂缓,甚至可以屈居次席,而克里姆林宫估算着是否要与其战时盟友合作,以及多久之后才能真正决定德国、日本这两个俄国传统敌人的未来。由于斯大林一心想着“小心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在1945年12月表示,苏联军队在阻止国民党军队攻占满洲重要城市时没有做任何该做的事。毛的革命可以

^① 关于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判,见“对话斯大林”中的诸多文件,144—246,冷战国际史项目;关于斯大林对自己行动的反思,见“米洛万·吉拉斯对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一次秘密会议的记录”,1948年2月1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0(1998年3月):131;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见S·N·冈察洛夫(S. N. Goncharov)、约翰·W·刘易斯(John W. Lewis)、薛理泰(Xue Litai),《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张戎(Jung Chang)和乔恩·哈利迪(Jon Hallida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05,175—189,281—292,337—355;盛慕真(Michael J. Sheng),《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陈兼(Chen Jian),《中国的韩战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66ff.



等,斯大林认为,直到他与美国在日本的权力分割上达成一致。越南的抗法革命可以等,斯大林盘算着,直到他确定胡是否可靠并估算出法国国内政策的发展。^①

可是,一旦美国在1947年春夏决定了将重点放在西欧的重建上,一旦法国官员在德国与美、英结盟并革除了巴黎统治联盟的共产党,斯大林的态度转变了,他开始寻求削弱资本主义、鼓励亚洲革命的机遇。杜鲁门当局于1948年早期改变了对日政策,关注恢复日本经济多过改革战后设施,斯大林也改变了对华政策。他告诉毛的特使,他们如今可以依靠他了。“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获胜,”斯大林说道,“而且(如果)其他国家也走上同一条道路,我们就可以断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得到了保障。”^②

然而,世界革命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并不是以损害苏联利益和权力而获取的。1947年9月,斯大林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当时他的目的是对他在欧洲的僚属实施更紧密的控制,而并不是鼓励世界革命。实际上,他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了严惩,因为他们在斗争中处于下风,同时他还警告他们不准参与起义活动。^③意识形态并没有使斯大林在国外的共产主义同志加强合作,也没有让斯大林更认同他们的想法。他的盟友和主顾沮丧地发现他们不得不适应他那迂回曲折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会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产生冲突。^④

斯大林对他们有任何独立自主的迹象都很轻视。在与别国共产党交流时,他时常试探对方,态度含糊,掩饰自己的半信半疑。可一旦他认为他们的行为危害到了苏联利益,他的态度就会明确得几近残酷。他不会允许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用国家利益篡夺他的权力或干预他的优先权。1947年8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事先未与他商议便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为此大发雷霆。在他看来,他们支持希腊起

① 张曙光 (Shuguang Zhang) 和陈兼,《中共政策与亚洲冷战:新文献证据,1944—1950》(*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1944—1950*),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印痕出版局(Chicago, Ill.: Imprint Publications),1996,54;伊利亚·V·盖达克(Ilya V. Gaiduk),《直面越南:苏联对印度支那冲突的政策,1954—1963》(*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出版社,2002,3。

② 引自雷,《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思想》,252。

③ 斯大林与多列士会谈记录,1947年11月18日,“对话斯大林”,403—406;另见庞斯,“斯大林,陶里亚蒂,以及冷战在欧洲的起源”;朱特,《战后》,139—145。

④ 在“对话斯大林”的文件中大量谈到这个问题,冷战国际史项目;另见巴纳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421—423,437—440;庞斯,“斯大林,陶里亚蒂,以及冷战在欧洲的起源”;亚特里德斯,“革命还是自卫?”;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见第63页注①。



义的行为是愚蠢的,而用南斯拉夫军队胁迫阿尔巴尼亚的企图是错误的。“这些都是左派的愚蠢。”他如此宣称道。此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必须保证其外交政策与克里姆林宫一致。他们不可以做任何会激怒资本主义敌人的事。“美国目前有一场盛大的选举斗争,”斯大林在演讲中提到,“对我们而言,看清未来政府是什么样的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是一个势力庞大、全副武装的国家。领导这个政府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憎恨我们、寻求借口伤害我们的富翁。”^①

斯大林独自决定他那些共产主义邻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公然反抗他的领导,于是他便想消灭对方。1948年6月,他将南斯拉夫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驱逐出去。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远比铁托更能触怒美国的行动:苏联军队对柏林实施了封锁,这座孤立的都城与西方之间的铁路交通全线中断了。

斯大林希望阻止西德形成独立的共和国,这样一个共和国可能会加入美国所领导的西方集团。他表示,如果英国、法国、美国拒绝他们刚签署的有关德国境内占领区的协议,他就解除封锁。否则,他就继续使柏林和西德的其余地区隔离,设法将柏林并入苏占区。

这是他自战争时期以来做过的最大胆的事。如果美国人反对苏联的封锁,他们就将在欧洲的中心发动一场战争。实际上,斯大林希望这样的敌意举动会让法国产生恐惧,从而对英美的主动权产生逆反。^②

但是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同仁巧妙周旋,以打消他们那些欧洲盟友的疑虑。他们相信自己的主动权对重建西欧以及恢复民主资本主义希望至关重要,他们决不会后退。他们料想斯大林不会冒着打仗的危险射下美国飞机,便决定向柏林空运物资。杜鲁门和马歇尔知道他们正在请求西欧的朋友冒巨大的风险,于是他们试图减轻对方的恐惧:马歇尔明确表示美国军队不一定会留在德国,华盛顿会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他们会认真部署紧急战争计划。更重要的是,他和杜鲁门总统作出决定,美国将与观点一致的北大西洋地区民主国家形成一个联盟,该联盟旨在阻止苏联入侵,并再度保证抵抗德国人。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都在催促美国签订能保障旧世界

① 巴纳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439—440;“吉拉斯报告”,1948年2月1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0(1998年3月):129—133;利奥尼德·吉比安斯基,“斯大林在东欧的政策,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苏联集团的首次分裂”(“Stalin's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ominform, and the First Split in the Soviet Bloc”),17—22;为“斯大林和冷战”讨论会准备的文件。

② 洛思,《斯大林不想要的孩子》,84—94;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354—355。



和平与安全的北大西洋条约。150年来,美国都远离各个“错综复杂的”联盟,无论是公众还是国会都不想打破这一传统。但杜鲁门和马歇尔知道,他们必须满足他们那些欧洲朋友并保障其安全。他们知道,他们正使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冒上失去选民支持的风险。毕竟,欧洲人民渴望的是和平与稳定,而非新的危机与冲突。如果美国领导人要求他们遵从美国的主动权,从短期看这将引起苏联的进攻,或是最后激起德国的复仇,那么美国将很可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也将作出无比惨痛的牺牲。^①

面对英国的提议和法国的请求,杜鲁门及其顾问显示出与盟友引起共鸣的能力,而这是斯大林所不能及的。但是同盟国所施加的压力并未使美国采取行动。忧虑与机遇是美国迟迟没有行动的原因:他们担心苏联会用非战争的方式夺取亚欧的大部分控制权,除非美国处于攻势,而机遇则在于他们知道美国仍具有击败共产主义、遏制苏联势力、复苏民主资本主义的能力与财力。一旦这样的观点在华盛顿的决策圈中占了上风,那么未来的盟友便会在欧洲内外产生杠杆效应。^②很快,共产党在印度支那境内煽起动乱,杜鲁门及其顾问即刻决定支持法国平定叛乱。关于人心的斗争早已演化为全世界范围的斗争了。

意识形态、个性特点与国际体系

杜鲁门和斯大林在一场全球斗争中坚定不移,然而这场斗争的表现形式并非预先确定好的。起初,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有理由与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形成合作关系。他们都相信,要想获取国家的自我利益,就要通过合作这一途径。两人都认为世界各国既可以走民主资本主义路线,也可以走社会主义路线,而一开始两人都不觉得战后恢复、重建或安全问题会遭遇冲突。实际上,两位领导人都有理由相信、也确实认为,可以通过遏制性的竞争和调整性的冲突来达成眼下的目标。

但是冷战还是不期而然,全世界都卷入其中。为什么?

① 莱弗勒,《实力优势》,182—286。

② 威廉·希契科克(William Hitchcock),《复元的法国:冷战外交和对欧洲领导权的追求,1944—1954》(*France Restored: Cold War Diplomacy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urope, 1944—1954*),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8;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受邀的帝国?美国与西欧,1945—1952”(“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1986年9月):263—277;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承受负担:欧洲和美国在越战中的承诺》(*Assuming the Burde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War in Vietna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



杜鲁门和斯大林能够、也确实阐明了国家自我克制的理由。他们能够、也确实警告了那些朋友和将来的盟友,不要刺激敏感、强大的对手,从而更加激发对方的猜疑。但是他们无法控制他们自己的恐惧与冲动、激愤与抱负。国际秩序的结构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心态压伏了他们最初对国家合作的愿望。

国际秩序的新形势产生了忧虑与机遇。战争结束时,陷入混乱的人们在历经数十年的萧条、战争、屠杀及被迫迁居之后,渴求有更美好的未来,国际社会为此振奋。德国和日本战败之后,欧洲中部和亚洲东北部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之后——不久之后——占领状态便会结束,德国人和日本人也将重建他们的政府和政治经济。他们接下来要决定如何在国际秩序中摆正位置,但是他们未来的轨迹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号。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亚洲,非洲,还有中东——当地领导人和本土精英在目睹他们的殖民主人势力大减之后,勇敢地寻求独立。自由的言论和民族自决的主张深深启发了他们。他们希望使自己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希望克服身为从属国的屈辱,希望扫除贫穷所带来的不幸。他们是选择自由企业和自由民主,还是选择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和杜鲁门要对这些新的形势明了于心,需要将其纳入自己的信仰体系,同时又必须时时理智地考虑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以及潜在的友邦与附庸国的期望和感受。他们是发展变化的使然力,是国际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被包围在组织和信念之中。

斯大林的任务非常艰巨,对内是浩大的重建工程,对外则面临一大堆不确定因素。德国和日本虽然被击败了,但他们还是会像过去那样东山再起,然后又成为需要去应付的对象。英国和美国在战争中便是伙伴关系,但他们还是潜在的敌手,不可以予以信任。有挑战,就有机遇。苏联军队遍布东欧和亚洲东北部的一些地区。斯大林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能够在未知的未来保障他的边境,掌控俄国周边地区。他知道,在红军所占领的那些国家中,自由选举会导致反苏政府的出现。为什么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毕竟西欧的自由选举和殖民世界的自主会带来相当可观的好处。

斯大林必须在合作的动机与竞争的诱惑中找到平衡。对于斯大林而言,最大的愿望就是保卫苏俄,不让德国与日本的复苏给自己国家造成任何危害,这样的目标是传统与经验所要求的,是策略必然与国家复仇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任何俄国或苏联领导人会放弃控制其周边、决定德日发展的机会。国际蓝图是允许斟酌的。现存的任何国家都无法遏制俄国的扩张;俄国需要填补真空状态,以保障长期的野心。



斯大林的行动中潜藏着马克思列宁思想。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或许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至少从短期看是如此，但这样的状况不适合维持下去。资本主义的战争会使苏联也深陷其中，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或者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会再次致力于镇压布尔什维克运动。甚至正当他向波兰共产党坦言并不排除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时，斯大林还是认为华盛顿设法利用其原子能垄断“恫吓我们，并逼迫我们在日本、巴尔干和赔款问题上就范”，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他认为美国正设法向东欧调兵遣将，疏远俄国与在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新结交的盟友。他告诉波兰领导人要对此多加小心。^①

他在处理政务中无处不显出猜疑。资本主义者诡计多端，试图打垮共产主义者。1945年，他警告他的波兰同志，不要接受前往伦敦的邀请。“我向你保证他们邀请你不是出于良好的目的……在情报机构中有一大群纯粹的无赖和残忍的杀手，他们会完成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②美国的原子能外交和英美的谍报活动现身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甚至出现在苏俄的西部边疆，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的思想使斯大林夸大了这两者的危险性。斯大林深知不满情绪的严重性以及广泛动乱的可能性，便让布尔什维克思维与个人偏执取而代之。当美国人宣布杜鲁门主义，筹划欧洲复兴计划，并着手进行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复苏，他便深信对方已处于攻势，于是接受了将欧洲划分为两个阵营。马克思列宁思想并没有为斯大林提供冷战的蓝图，但是对资本主义敌人的行动作出了解释，并描述了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发展的无限可能。

杜鲁门必然有所恐惧，同时他必须采取行动，尽管他并不想看到一场冷战。正如情报机构的分析师反复提到的，斯大林不可能抓住每一次扩张的机会，他也是老谋深算，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有所放弃，但是他的侵略行径已足够加剧杜鲁门的焦虑了。就在那之前几年，其他的极权主义敌人发出了威胁的信号，随后便势如破竹，向美国宣战，征服了世界上许多土地。杜鲁门思忖道，美国的财力与权力足以巧妙、迅猛地行事，甚至带有挑衅意味，这样一来便能够促进欧洲的复兴，拉拢德国和日本，大振萎靡的士气，点燃自由企业民主制的希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而是再三等待呢？

杜鲁门是个直截了当的人，看事情一向黑白分明。他目前所看到的，是另一个带着扩张思想的极权主义强国初见端倪。激发他的并不是斯大林的残忍无度——事实

①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与斯大林的会谈(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Stalin), 1945年11月14日,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1(1998年冬):136。

② 出处同上。

上他很少谈到这个问题——而是他见到美国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他说道：“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对我们所信仰的民主信念的外在表达。”^①

无动于衷或退却避让都意味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不仅在国外受到损害，甚至在国内也难逃此劫。这意味着将要放弃一些可能的盟友，而它们的资源与劳动力都要落入可能的敌人之手。杜鲁门警告道：“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会迫使我们作出比现在更高层次的调动。这将使我们采取一系列紧迫且综合的配给措施，节约使用较少的资源。这将使我们演变成一个要塞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存在着一种我们闻所未闻的中央统制体制。”^②总统心里清楚，国际秩序的力量分配会对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产生可见的后果。

国际秩序中贯穿着造就冷战的人类原动信念。杜鲁门想要确定的是，类似西欧、西德、日本这样的权力中心并没有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是无论再怎么争取，也需要用其他的计划作补充。正当斯大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里提到的共产主义前进机会而向东南方向前行时，杜鲁门及其顾问则意识到必须保存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投资利润以及工业民主国家的市场。凯南在1948年12月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写道：“非常奇怪的是，眼下我们与克里姆林宫对抗的最关键问题竟然很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的问题。”^③

非殖民化和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已成为现实中的重要一笔，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意味着欧洲和亚洲东北部都无法遏制冷战。将来在遥远的土地获取胜利，这样的想法深深引诱着斯大林；而对在那些地方遭遇失败的惧怕，则使美国的官员陷入痛苦之中。在1948年12月经由总统批准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声明中，杜鲁门的顾问们解释了他们的想法：“无论是武装侵略、还是政治颠覆的途径，失败对于美国而言，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④

① “致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1949年1月5日,《总统公开文件:杜鲁门,1949》,6。

② “致国会的特别讯息”, 1952年3月6日, 出处同上, 1952—1953, 189。

③ 凯南致马歇尔和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 1948年12月17日, 文件箱33, 政策规划办公室档案, 第59号记录组, 国家档案馆。

④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20/4, “美国关于反击苏联对美国安全所形成威胁的目标”(“U. S.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 S. Security”), 1948年11月23日, 收录于托马斯·H·埃佐尔德(Thomas H. Etzold)和约翰·L·加迪斯(John L. Gaddis)(编),《遏制政策:关于美国政策与战略的文献》(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208。



杜鲁门及其助手都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的行径都清楚地表明，苏联的最高目标就是统治全世界”，从而认为遏制政策还是不够的。他们表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削弱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力，使其无法再对和平、国家独立和世界大家庭的稳定形成威胁”。他们的次要目标则是“彻底改变那些受俄国控制的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处事方式”。^①

1948年，斯大林与杜鲁门提出了能够在接下来的40年推动双方国家前进的观点和抱负。在那样一个如此多恐惧与机遇共存的国际秩序下，他们别无选择。

^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20/4，“美国关于反击苏联对美国安全所形成威胁的目标”，1948年11月23日，收录于托马斯·H·埃佐尔德和约翰·L·加迪斯(编)，《遏制政策：关于美国政策与策略的文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204—209。

第二章

和平的机会, 1953—1954:

马林科夫与艾森豪威尔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1日中午,斯大林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几个小时过去了,他的仆人和保镖听不见任何声响,不由担心起来。没有他的召唤,他们不敢进入他的住处。下午6点30分,斯大林的房间亮起了灯,他们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可接下来又是鸦雀无声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焦躁不安袭上人们的心头。到了夜间11点,经过紧张的讨论,一名保镖收集了一整天的邮件,走进了狭小的用餐区,斯大林经常睡在那里的一张小床上。保镖看到这位年老的独裁者躺在地毯上,穿着睡裤和白色汗衫。他的裤子已被尿液打湿。他几乎丧失了知觉。他看到保镖,虚弱地抬起一只手,却说不出一句话。“他的眼睛表达了恐惧与担心,眼中满是恳求之色。”他的仆人们将他抬到一张沙发上。他们全都吓坏了。^①

^① 季米特里·沃尔克格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纽约:格罗夫·韦登菲尔德,1988,572;关于斯大林临终前的细节,见西蒙·西巴格·蒙特费奥雷,《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2003,555—577;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伦敦:自由出版社(London: The Free Press),2003,236—241;弗拉基米尔·香伯格(Vladimir Shamberg),“斯大林最后的核心集团”(“Stalin’s Last Inner Circle”),《哈里曼评论》10(1997年春):38—39。



这些人惊恐万分，又不敢打电话叫医生，因为最近斯大林经常控诉其医生密谋杀害克里姆林宫的高级领导人，于是他们设法联系秘密警察头子拉弗连季·贝利亚以及斯大林的重要副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 Malenkov)。正值夜半，无法找到贝利亚。他正在莫斯科某处和最新一任情妇把酒畅饮。因此时间进一步流逝了。没人敢在获得贝利亚批准前通知医生。最终，带着醉意的贝利亚现身了，他与马林科夫一同驶去别墅。马林科夫脱下了他的新鞋，以免他们走近那不省人事的上司时鞋子吱吱作响。当贝利亚看到睡在沙发上发出鼾声的斯大林，他假装没有发生任何异常。“你这是什么意思……引起恐慌？”他对一名保镖高声叫嚷。^①

到了3月2日的清早，斯大林奄奄一息地躺着，仍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急救，而此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驱车返回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斯科的共产党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以及部长会议副主席、前民兵头目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我们无从知晓他们彼此间的谈话内容，但他们很可能开始讨论斯大林不在时的权力分配问题。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有理由相信斯大林意欲将他们免职。最近一段时间，他在好几次谈话中都提到老同志无法满足他的期许。贝利亚深信他不会仅仅是被罢免那么简单，而是会遭到杀害。他在那个节骨眼上的洋洋得意逃不过他那些同志们的眼睛，他们驶回了斯大林的别墅，上午9点左右到达。

这时他们才召来了医生。这批外科医生是新来的——斯大林平时的医生都被关在狱中——对于这位领导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当他们仓促检查他的状况时颤抖不已，随后他们在他耳后装上抽血器械，并在他头上进行冷敷。当然，也别无他法了，因为斯大林所患的是大脑动脉出血。当他们忙于工作时，贝利亚在一旁大声训斥他们，说如果领袖过世，他们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和儿子瓦西里也来了，与之前来的还有斯大林的其他重要随从。

当他那些副官来到他的床边时，斯大林睁开他的眼睛——看着他们。前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外交部长V·M·莫洛托夫任眼泪从脸上淌下，尽管他的妻子当时还在受牢狱之苦。其他许多人也是如此。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跟随斯大林最久的人之一，哀求道：“斯大林同志，您忠诚的朋友和同志们在这里。亲爱的朋友，您感觉怎样？”斯大林动了一下，他的脸“扭曲了起来”，却一言不发。^②

^① 蒙特费奥雷，《斯大林》，567。

^② 出处同上，569—572。



贝利亚往返于别墅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所有的同志都感觉出他将要当权了。他聪明坚毅, 勇敢无畏, 富于经验, 同时又目中无人。他之前就掌管着秘密警察和古拉格(内务部劳改局)。二战结束后, 他管控着发展原子弹的宏伟计划。他还是个残忍的人, 签署执行死刑的名单, 对人们施以酷刑, 当街强掳妇女并将她们强暴。贝利亚心里清楚, 斯大林最近数月一直盘算着要指责他在统治过程中的罪行。想到斯大林可能会像列宁那样留下遗训, 贝利亚便利用匆匆赶去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机会搜查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和保险箱, 很可能取走了对他不利的文件。随后他便回到别墅。当斯大林再度睁开眼, 贝利亚跪倒下来亲吻领袖的手, 表现着忠诚, 诉说着溢美之词。可当斯大林最终于3月5日上午9点50分去世, 他的管家趴在他胸前呜咽时, 贝利亚立刻看着马林科夫, 厉声道: “我们走。”^①在驶往克里姆林宫的途中, 他们便已急切地想要结束政府和政党过渡的准备工作。

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以及数名斯大林的最高将领在别墅进行了会谈, 期间一致同意马林科夫当选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为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同时还将领导苏共, 而赫鲁晓夫则辞去莫斯科市委书记之职, 专注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国家安全部将并入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部。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 莫洛托夫出任外交部长, 阿那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出任贸易部长。当年斯大林为了压制旧的寡头政治家时引入了不少新人, 而现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规模减小, 那些新人也便纷纷落马。他们彼此互相保证, 新的领导权是集体的和共同的。然而他们都知道贝利亚试图掌权。莫洛托夫在这一关键会议中“缄默不语”地坐着。赫鲁晓夫对他的朋友布尔加宁低语, 如果他们不谨慎行事, 贝利亚就会把他们铲除。^②

苏联民众直到斯大林死前数小时才知晓其情况。接着到处都弥漫着强烈的悲痛情绪。人民震惊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涌上街头,” 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苏联的氢弹之父, 国内最知名也是最杰出的

① 香伯格, “斯大林最后的核心集团”, 39; 艾伯特·雷西斯(编), 《莫洛托夫回忆录: 克里姆林宫政治内幕: 对话费利克斯·楚耶夫》, 芝加哥, 伊利诺伊州: 伊万·R·迪伊, 1993, 236;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编), 《赫鲁晓夫回忆录》(*Khrushchev Remembers*), 波士顿: 利特尔&布朗公司(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0, 316—320; 沃尔克格诺夫, 《斯大林》, 567—576; 陶布曼, 《赫鲁晓夫》, 236—240; 埃米·奈特(Amy Knight), 《贝利亚: 斯大林的首席副官》(*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 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3, 176—180。

② 沃尔克格诺夫, 《斯大林》, 574; 陶布曼, 《赫鲁晓夫》, 238。



那些人而言,斯大林便是他们的一切”。^① 他们哀悼他的逝世,“古往今来伟人中的伟人……我们的党成了孤儿,”一家莫斯科橡胶厂的工人悲叹道,“苏联人民成了孤儿,全世界工人成了孤儿。”^②

新的集体领导班子感到不安。他们敬畏、害怕、憎恨斯大林,但他们不知道没有了他该如何应付问题。“没有斯大林,我们该如何生活、工作?”赫鲁晓夫对此表示疑惑。^③ 斯大林死前曾嘲笑过他们,他说:“你们将会看到,我走后帝国主义列强会像拧小鸡脖子一样拧你们的脖子。”^④ 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他们的同僚很清楚他们缺乏合法性,也认识到他们在国外有难以对付的敌人。他们还意识到,潜藏在苏联民众的深切悲恸之下的,是一触即发的不满情绪,是对他们曾被许诺也为之煎熬的理想社会的渴求——而如果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起码也得要缓和他们内心的恐惧,并改善他们日常生活的条件。

斯大林的继承者同意由马林科夫担任他们的官方领袖,作为集体统治的公开面貌。但贝利亚就好像马林科夫背后的发动机,毕竟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和警察头脑,他无法正式接替斯大林。当时,民众越来越推崇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性,因而不可能由另一个格鲁吉亚人统治苏联。贝利亚深谙此道,便与马林科夫通力合作,他与后者已共事多年。“我父亲提名马林科夫出任总理一职,”贝利亚的儿子写道,“因为他认为他能够完全控制对方。”^⑤ 但在斯大林过世后的数天乃至数周中,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都对该做什么达成了一致。^⑥

他们明白必须要平息这样的气氛,获取信任和合法性。他们明白苏联的经济处于恶劣状态。他们希望赋予共产主义人性,使之为民服务。很快,他们就宣布大赦,从古拉格的监狱和劳动营中释放了数百万人。他们宣布取消斯大林对医生密谋的指控,声称那并不属实,还将医生释放出狱。他们缩小了安全机构的规模,禁止了过去常见的肉体折磨,为体现强制劳动营的经济功能而实行了合理化改革。他们决定提

① 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伦敦:哈钦森,1969,369,355。

② 梅里代尔,《基石之夜》,260—261。

③ 陶布曼,《赫鲁晓夫》,249。

④ 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392。

⑤ 谢尔格·贝利亚,《贝利亚,我的父亲: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之内》,伦敦:杰拉尔德·达克沃思出版社,2001,251。

⑥ 马克·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早期斗争与东中欧剧变:苏联决策的内外部联系(第2部分)”(“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Part 2)”),《冷战研究杂志》1(1999年春):18。



高生活资料的产量。他们同意将更多的党内机构力量调往政府机构，这意味着政治局虽然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其影响力会略有减小，而部长会议的影响力会有所上升。^①

他们知道，要想达成他们在国内的计划，必须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有必要“同外部世界结束对峙，”贝利亚这样说道，以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②他并不是唯一持此想法的人。“我们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表示怀疑，”赫鲁晓夫回忆道，“他过分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武装力量上投入了过多精力。他生活在敌人攻击的恐惧之中。”^③

然而，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真正的信徒，深深地依赖极权主义方法和共产主义公理，尤为明显的是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意深信不疑。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孤立和围攻。赫鲁晓夫说道：“美国对我们实行一种傲慢而又挑衅的政策。”他认为美国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展现其优越感的机会。“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国家是美国轰炸机的巨大目标，这些轰炸机正是从挪威、德国、意大利、南朝鲜和日本飞机场起飞的。”^④

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还是想要建起一座桥。贝利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想对西方人表明苏联不希望对抗状态，正在放弃过去的政策。”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持有相同意见，但是他们和贝利亚一样，害怕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脆弱和分裂。他们不想表现出恳求的姿态。既然代表了无上的文明，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可是他们知道必须缓和紧张状态，由此聚焦于国内的计划，重新定义他们的目标，巩固他们的价值观。要迈向社会主义，缓和政策必不可少。共存与和平将是他们的祷文。^⑤

这一切在3月9日的葬礼演说中表露无遗。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都发了言。这个国家承受了“最痛苦的、无法弥补的损失”，马林科夫开始了他的演讲。斯大林永远不会被忘记，他的名字“必当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斯大林同志为我们国家带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在人

① 陶布曼，《赫鲁晓夫》，246；贝利亚，《我的父亲》，251—267；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15。

② 贝利亚，《我的父亲》，253，262。

③ 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392—393；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19。

④ 引自陶布曼，《赫鲁晓夫》，243—244。

⑤ 贝利亚，《我的父亲》，262（引言），261—265；陶布曼，《赫鲁晓夫》，242—244；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18—19。



类社会存在的千百年来,第一次确保废除了剥削制度”。斯大林懂得“我国的国力和军力是成功建设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条件。继续加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神圣的义务”。

马林科夫还强调,斯大林的伟大还表现在他致力于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他克服了过去受压迫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将他们融入“一个兄弟般友善的大家庭……构建民族间的友谊”。因此,他的继承者的另一个神圣义务便是继续增进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谊。

然后,马林科夫提出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强调了连续性,但又暗示了出现新方针的可能性。共产党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得到进一步壮大,保证党的团结。要加强党与人民之间“不可破损”的联结。所有工人在“与党内、国内和国外的敌人斗争时”都要保持警惕。同时,党也要领导国家前进,确保“社会主义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是我们国力和军力的保障。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我们的集体农场秩序……我们必须加强工人和集体农场农民的团结。”

但是之后马林科夫提到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国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努力,进一步提高工人、集体农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我们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将这一义务奉若法度,不遗余力地为之奋斗。”

在谈到外交政策问题时,马林科夫发表了一些陈词滥调,而随后又暗示了一个新方针。他说道,兄弟般的关系应当在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得到发展,这样一个阵营包括了东欧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不仅要支持“英勇的朝鲜人民”保卫其祖国,还要支持为自由和国家独立而战的越南人民。但是,总的来说,苏联的任务还是促进和平事业,马林科夫强调道。苏联要促进“与所有国家合作并发展商业关系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基于列宁、斯大林关于延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共处与和平竞争的可能性的假设……我们是人民忠诚的仆人,而人民向往和平,憎恨战争”。政府希望能避免“百万民众血流成河的场面,以确保和平构建幸福的生活……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坚持认为,国家间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与所有国家的利益相符”。

为了提醒所有听众注意苏联的使命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马林科夫以一段高谈阔论结束了他的演讲:



苏联的辛勤劳作者……我们已经用尽全力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苏联人民对其无限的力量和可能有坚定信念，将会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前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苏联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的前进脚步。

再见，我们的老师和领导，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列宁同志！

前进，追随列宁和斯大林的脚步，夺取这一伟大事业的全面胜利！^①

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重申了马林科夫所说的要点，对和平及“以互惠为基础、与所有国家合作并发展商业关系的政策”许诺。^②

政策很快就落实为行动。克里姆林宫很快就秘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马林科夫与部长会议向中国和北朝鲜发布指示，要求对方以休战协议为目标进行建设性谈判，这两国已与以美国为首的支持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周旋了三年。^③ 随后，马林科夫在3月15日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中慷慨陈词：“如今，只要相关国家达成共同协议，没有任何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美国在内。”^④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新的领导人设法表现出一条团结一致的阵线。尽管并不信任贝利亚，他们还是支持他进行国内改革，鼓励消费品生产，减轻极权主义控制。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很害怕，真的很害怕。”赫鲁晓夫回忆道，“我们担心冰雪消融后会引发洪灾，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还会把我们都淹没。”^⑤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担忧如出一辙。“就我所知，”他的女婿写道，“马林科夫生命中仅有的真正兴趣便是权力。”他不想错过权力。^⑥

马林科夫是一个精明而有见识的政党人士。后来，当赫鲁晓夫占了他的上风之

① “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在葬礼上的演说”(“Funeral Orations by Malenkov, Beria, Molotov”),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5, 第7号, 1953:7—8。

② 出自贝利亚的演说, 出处同上, 9。

③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 包括苏联政府写给毛泽东和金日成信件的初稿及对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53年3月19日,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6—7, 华盛顿特区: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 1995/1996, 80—81。

④ 马林科夫的演说, 1953年3月16日,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5, 第8号, 1953:5。

⑤ 引自陶布曼, 《赫鲁晓夫》, 242。

⑥ 香伯格, “斯大林最后的核心集团”, 30; 贝利亚, 《我的父亲》, 161—162。



后,马林科夫的历史性角色被降低了,而他的才能也被轻视了。贝利亚把他称为一只公山羊,赫鲁晓夫说他是“跑腿的”,而莫洛托夫则鄙视他对理论事务的冷漠。^①但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期间,列宁一直很器重他,不断提拔他坐上党内更高的位置。马林科夫管理人民很有一套,工作也极其努力。他可以吸收极为庞大的信息,执行命令也很有效率。他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但他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并将其中的理论巧妙地运用到任何场景之中。尽管他的社交表现和外貌并不起眼——他又矮又胖,“身体呈梨形,肩窄臀阔”——他意志坚强,铁石心肠。在30年代晚期,他与贝利亚和秘密机构一同逮捕了涉嫌叛国罪的人员。当囚犯受到审讯和折磨时他经常在场。“如果斯大林下令让他铲除一个人,他一定会做到最极致以确保万无一失。”贝利亚这样告诉他的儿子。斯大林知道他能够信赖马林科夫不容置疑的忠诚和无与伦比的效率。战争期间,斯大林任命他执掌国家军事委员会,协调所有政府与军事力量。马林科夫管控着航空工业,1943年又受命负责从德国人手中收复地区的经济重建工作。战后,他监督了德国赔款的装运工作,同时担任党内秘书处和部长会议的领导人。虽然在1946年遭到斯大林的公开羞辱及降级处分,马林科夫还是再度占据了党和政府内的统治地位,并施展手段,与贝利亚等党内寡头政治家形成了联盟。斯大林在1952年的党代会中指派他为领军人物。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便成了当然继承者。^②

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和共产党领袖,马林科夫希望延续寡头政治家之间的和谐,同时塑造一个更为有序政府。人们普遍将他视为贝利亚的亲密同事,而其实他和赫鲁晓夫走得更近。斯大林刚过世不久,马林科夫就同意将重要党务让给他信任且低估的赫鲁晓夫。与此同时,他每天都花上好几个小时与贝利亚一起制定决策并疲于奔走,目的是获得尊重与合法性。他希望通过提高苏联的生活质量,并使制度运作良好。要达成

① 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313,322—323;雷西斯,《莫洛托夫回忆录》,233。

② 关于引言,见贝利亚,《我的父亲》,160—164;关于马林科夫,另见香伯格,“斯大林最后的核心集团”;“马林科夫”(“Malenkov”),诺尔玛·C·努南(Norma C. Noonan),《现代俄罗斯与苏联历史百科全书》(*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Soviet History*),布里兹湾,佛罗里达州:学术国际出版社(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1989,卷50(补):16—22;埃迪·吉尔摩(Eddy Gilmore),“俄罗斯记录:马林科夫先生上台了”(“A Report on Russia: Mr. Malenkov Takes Over”),《第20日的重要发言》(*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20),1953年11月:85—90;雷西斯,《莫洛托夫回忆录》,337—338;约拉姆·戈尔里兹基和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冷和平:斯大林和苏联的统治层,1945—1953》,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关于马林科夫的形象描述,我非常感激皮埃尔·杜奎斯诺伊(Pierre DuQuesnoy)和以赛亚·格鲁伯(Isaiah Gruber)这两位研究助理的细致分析。



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和平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① 他希望美国给和平一个机会。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

斯大林之死为华盛顿的新政府同时带来了困境和机遇。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对于这位苏联领袖的离世毫无准备,但这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对于国家安全问题投入了许多关注,而他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持相同意见。实际上,在这个国家的制宪元勋之后,很少有人参与执政时带着处理策略、外交、战争问题的丰富经验或知识。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取得轰动性的胜利。他是二战的伟大英雄之一,是策划了诺曼底登陆战并在西线击溃希特勒军队的将军。他精通外交手腕,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劝诱、哄骗、妥协、达成重要目的。他是一个才能出众的领袖:意志坚定、严于律己、坚守原则、乐于助人、充满自信。这位新总统天生就是名乐观主义者,拥有迷人的微笑和亲和的性格,同时他还是个敏锐、聪颖、坚定、有抱负的人。在公开场合,他的发言往往冗赘而隐晦。在私底下,他则善于分析,文笔清晰。他也可能会发脾气,但他通常谨言慎行,圆通得体。他很懂得该如何与人打交道,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和喜爱。他总是会在好友生日时寄去贺卡,很少错过任何一个赞叹或措辞亲切的机会。^②

艾森豪威尔于世纪之交成长于堪萨斯的阿比林。他非常重视价值观、宗教、历史以及各种思想。阿比林是一个质朴的美国小城,二三十年之前还是西部畜牧业鼎盛时代的小镇。那里的生活平静而困苦。艾克(译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的父亲在里弗兄弟会下属的乳品厂工作,那是一个门诺教派。艾森豪威尔家并不穷,环境却很朴

① 关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的友谊,见香伯格,“斯大林最后的核心集团”,33—34;关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密切关系,见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315—341;关于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的低估,见陶布曼,《赫鲁晓夫》,236—266。由于之后斯大林的继任者之间发生了斗争,当事人的分歧也愈发突显,但克拉默用充满说服力的笔调阐明了在斯大林刚死数周内众人的统一观点。见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15—21;另见陶布曼,《赫鲁晓夫》,248—249。

② 史蒂文·E·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艾森豪威尔(2卷本)》(*Eisenhower, 2 vols.*),纽约:西蒙&舒斯特,1983及1984;罗伯特·F·伯克(Robert F. Burk),《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英雄与政治家》(*Dwight D. Eisenhower: Hero and Politician*),波士顿:特威恩出版局(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86;小切斯特·J·帕克(Chester J. Pach, Jr)和埃尔莫·理查德森(Elmo Richardson),《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生涯》(*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劳伦斯:堪萨斯州大学出版社,1991;弗雷德·I·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垂帘听政的总统生涯:领袖艾森豪威尔》(*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纽约:基本书局(New York: Basic Books),1982。



素。艾克被教导要成为独立、勤奋、俭朴的人。如果受到良好教育,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他便能自行塑造未来。“有抱负而无傲气,”他后来回忆道,“这一点对我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①

宗教也同样如此。艾克的父母笃信祈祷和仁慈的上帝。他母亲熟记了圣经中的很多内容。艾克的价值观植根于宗教和民主。男人和女人都是以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他们有义务发展其内在的价值。在美国,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美国所拥有的生活方式以人类自由、个体自尊、自愿合作和自由贸易为基础。“我狂热地相信美国的民主形式,”1949年他在写信给童年好友艾弗雷特·“瑞典佬”·黑兹利特(Everett “Swede” Hazlett)时提到,“这种制度承认而且保护个人的权利,赋予人以尊严,因为人是以神的形象而创造的,而神的意旨即是只有自由商业制度才可能保证民主的千古长存。”^②

艾森豪威尔没有料到自己会从军。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一个进入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的机会。他因为年龄过大(20岁)而遭到拒绝,于是他决定申请去西点,那里的申请人年龄上限为22岁。他在军校里表现不错,但称不上优越,于1915年毕业。一战中,他并没有如愿被派往海外,但战时他在大后方的表现极佳,主要负责训练军官和组织一个坦克营。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随着军衔一步步上升,他令许多上司印象深刻。他在莱文沃思堡的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表现抢眼,30年代晚期到了菲律宾,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手下供职期间干练得力。1939年9月战争爆发,艾森豪威尔回到美国,随着美军规模壮大,他晋升的速度也变得飞快。就在珍珠港袭击过后不久,时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让艾森豪威尔加入其参谋部。艾克给马歇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后者让他担任欧洲战区行动计划的指挥。艾克随后负责掌管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欧洲的一些战役。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位享有盛誉的司令官,并且还是世上最知名的人之一。他在夺取胜利后担任了陆军参谋长,1948年卸任后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到了50年代晚期,由于杜鲁门总统的私人请求,艾森豪威尔离开了哥伦比亚,于

① 威廉·B·皮克特(William B. Pickett),《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国力》(*Dwight David Eisenhower and American Power*),惠灵,伊利诺伊州:哈伦·戴维森(Wheeling, Ill.: Harlan Davidson),1995,4。

② 艾森豪威尔致“瑞典佬”·黑兹利特,1947年7月19日,收录于罗伯特·W·格里菲思(Robert W. Griffith)(编),《艾克给一位朋友的信,1941—1958》(*Ike's Letters to a Friend, 1941—1958*),劳伦斯:堪萨斯州大学出版社,1984,40。



朝鲜战争期间成为了北约在欧洲的最高统帅。^①

1952年，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表现出色，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要将他们从激烈的朝鲜战争中解救出来，并领导他们在冷战中对阵由克里姆林宫为首的极权主义力量，由此获得了美国人民的信任。杜鲁门的政策包括了重建欧洲、拉拢西德、加入北约，尽管这些都挫败了苏联在旧世界的直接威胁，但是共产主义还是在亚洲继续前进。1949年10月，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在中国当权，并鼓励全亚洲，尤其是印度支那，参与到革命中去。1950年6月，金日成领导下的北朝鲜共产主义政府袭击了南朝鲜，杜鲁门为此部署美军部队阻止该进攻并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可是当美国人进一步参与到战斗中，越过了代表南北朝鲜分界的三八线，并设法将美军兵力安置到中国边境时，毛出兵干涉了。从那之后，朝鲜战争陷入僵局，伤亡人数节节攀升，美国人开始感到幻想破灭。杜鲁门大手笔地重整军队，研发氢弹，在整个冷战中最著名的国家安全文件 NSC - 68 中再次确认了国家的战略目标。^②

正当国家陷于这场漫长、有限的战争之中时，大后方的士气有所减退了。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与他人数量日增的追随者向杜鲁门政府提出质疑，谴责对方无力应对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入。否则该如何解释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又该如何解释同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夺权？必须监禁国内的背叛者，也必须铲除国外的共产主义者，即便这意味着要动用核武器。生命与资源不应浪费在朝鲜那样的边角事件中，真正的威胁存在于北京和莫斯科。美国人相信，艾森豪威尔是能够应对冷战与核时代困境的人。他们相信，艾森豪威尔理解冷战的意義，能够设想出获胜的策略。^③

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讲中解释了他对冷战的看法：

-
- ① 关于艾森豪威尔的职业生涯，见第80页注②和第81页注①。
- ② 相关背景见梅尔文·P·莱弗勒，《实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312—518；威廉·W·斯图耶克(William W. Stueck)，《朝鲜战争：一场国际历史》(*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陈兼，《中国的韩战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欧内斯特·R·梅(Ernest R. May) (编)，《美国冷战策略：解读国家安全文件 NSC - 68》(*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 68*)，波士顿：贝德福德书屋(Boston: Bedford Books)，1993。
- ③ 关于麦卡锡主义的背景，可参见罗伯特·S·格里菲思(Robert S. Griffith)，《恐惧的政治：约瑟夫·R·麦卡锡和参议院》(*The Politics of Fear: Joseph R. McCarthy and the Senate*)，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0；戴维·M·奥辛斯基(David M. Oshinsky)，《无限的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纽约：自由出版社，1983；理查德·吉德·鲍尔斯，《荣誉犹存：美国反共历史》，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



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很少会像现在这样,正义与邪恶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全副武装,针锋相对。

在上帝面前,我们被称为在世界面前作证的民族,我们承诺,未来属于自由的人。

自由与奴役搏斗;光明与黑暗竞争。

捍卫自由,如自由本身般不可分割,对所有大陆和民族一视同仁。怎么能说种族和民族之间有贵贱之别,我们拒绝任何这样的影射。^①

艾克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简单地保卫财产、领土、房屋或生命”^②。“生活方式”意即个人自由、自由贸易、机会平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上苍的礼物”。他说,宗教信仰是“自由政府的重要奠基石”^③。

苏联对这种美国生活方式提出异议。中央集权制和独裁主义对民主和自由形成挑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非军事上的抗衡。在这场对阵中,艾森豪威尔相信,“自由对抗共产主义独裁最有力的武器是其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至高呼吁。”美国人所拥有的信念一如他们建立起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时那样,他们这样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将会“战胜孤注一掷的共产主义教条”。^④

艾森豪威尔挑选了一名与他观点一致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父亲是名部长,爷爷和叔叔都是国务卿。他曾就读于普林斯顿,游学欧洲,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取得法律学位。通过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他进入了纽约最有声望的法律事务所沙利文和克伦威尔事务所。他后来终止自己的法律事业,在他的叔叔国务卿罗伯特·

① “就职演讲”,1953年1月20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文件: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953*),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60,1—8。

② 日记条目,1953年1月22日,路易斯·加兰博斯(Louis Galambos)(编),《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档案:北约与1952年运动》(*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NATO and the Campaign of 1952*),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13:897。

③ 艾森豪威尔致A·F·洛伦佐(A. F. Lorenzon),1953年9月9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档案(DDEP),安·惠特曼文件(Ann Whitman File),日记系列,文件箱3,第2文件夹(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图书馆[DDEL],阿比林,堪萨斯州)。

④ 艾森豪威尔致乔治·阿瑟·斯隆(George Arthur Sloan),1952年3月20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3:1103;罗伯特·H·费雷尔(编),《艾森豪威尔日记》(*The Eisenhower Diaries*),纽约:W·W·诺顿,1981,136—137,143—144。



兰辛(Robert Lansing)手下做事,就职于威尔逊政府的俄国办公室,1917年革命后帮助美国开展对抗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而后不久,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德国赔款问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杜勒斯努力制止法国和英国从战败的德国榨取数目巨大的赔款。他认为他们想要的复仇会毁了威尔逊的调解努力。这样的观点造就了他之后的思维,甚至当他回到华尔街赚钱时也不曾改变。^①

杜勒斯常被讽刺为国际关系中的说教者,但他更为复杂。他的观点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体。他认为基督徒应当将观念转为现实。可是他对事物持有现实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的中心思想是认为美国自由商业体制与世界经济休戚相关的共同国际主义观点,这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观点不谋而合。杜勒斯和他的新上司一样,认为这场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竞争,究其根源,实为意识形态的竞争。和艾克一样,杜勒斯并非冷战的先锋战士,但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忧虑与不安逐渐上升。^②

作为共和党的国际事务专家,杜勒斯曾为杜鲁门和艾奇逊工作,设法获取两党对遏制政策的共同支持,但是他对他们逐渐失去了信心,一来是由于政治上的策略,二来也因为党派的政见。他相信,苏联这样的敌人比民主党以为的更为强大。克里姆林宫巧妙引用自由、平等、友爱、和平等言论以感染欧洲和日本的困苦工人。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共产党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申斥了西方对欠发达地区的帝国主义剥削,而将自己描述为自由与进步的胜利者。对于全球为独立而奋斗的人来说,共

① 关于杜勒斯的背景,见理查德·H·伊默曼(Richard H. Immerman),《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外交政策的虔诚、实用与权力》(*John Foster Dulles: Piety, Pragmatism, and Power in U. S. Foreign Policy*),威尔明顿,特拉华州:学者资源出版社(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1999;罗纳德·W·普鲁森(Ronald W. Pruessen),《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权力之路》(*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82。

② 关于身为道德家的杜勒斯,见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魔鬼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3;关于身为现实主义者的杜勒斯,见迈克尔·A·吉恩(Michael A. Guhin),《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名政治家和他的时代》(*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sman and His Tim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关于杜勒斯的宗教观点,见马克·G·图卢兹(Mark G. Toulouse),《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转变:从现实主义的先知到民族主义的牧师》(*Th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From Prophet of Realism to Priest of Nationalism*),梅肯,佐治亚州:默瑟大学出版社(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5;关于更多带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观点,见伊默曼,《杜勒斯》;另见数篇论文,出自理查德·H·伊默曼(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冷战外交》(*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关于集体国际主义的内容,见罗伯特·W·F·格里菲思,“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与集体联邦”(“Dwight D. Eisenhower and the Corporate Commonwealth”),《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1982年2月):87—122;关于此态度的精彩阐述,见艾森豪威尔致斯隆,1952年3月20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3:1097—1104。



产党显得更为强大、先进、具有远见,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远比现在美好的蓝图。杜勒斯担心美国已经失去了其强有力的地位。“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苏共的。”他在1952年断言,遏制政策已经在精神上破产了。杜勒斯比艾森豪威尔更为悲观,他警告道,如果不再继续采取攻势,也不设法“击退”共产主义,那么美国将会在冷战中败下阵来。^①

当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于1953年1月上台时,他们希望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更为有力,在降低开支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安全。他们认为杜鲁门及其顾问都太过浪费。艾克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提到:“真正的挑战在于用智慧和效率建立防线。我们既要讲求安全,也要具备偿付能力。对于苏联人而言,比起在战场上征服美国,眼看着美国彻底失败才是他们的目标。”这并不仅仅是总统的豪言壮语。他多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强调这些问题。“我非常坚信,”他在1952年5月给朋友(及前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的信中写道,“美国殷实的财政和经济是自由世界中共同安全的第一要素。这要先于其他所有事物。”^②

斯大林的死为重夺攻势提供了一个唾手可得的时机。在1953年3月6日的顾问团会议中,总统嘲弄了毫无计划的状态。“我们毫无计划,”他说道,“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死带来什么不同之处。”^③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略家和情报分析家都非常认同巨大机遇已来临的说法。“我们在战略上的指导原则,还有我们的秘密目标,”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负责人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写道,“就是竭尽一切力量煽动和助长苏联的混乱。”^④

①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War or Peace*),纽约:麦克米伦(New York: Macmillan), 1950, 163, 74—78;伊默曼,《杜勒斯》,1—34。

② 戴维·L·斯尼德(David L. Snead),《盖瑟委员会,艾森豪威尔,以及冷战》(*The Gaither Committe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哥伦布: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会议备忘录,1953年3月25日,1953年9月24日,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4, 2: 261, 469;艾森豪威尔致刘易斯·W·道格拉斯,1952年5月20日,加兰波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3: 1230。

③ 埃米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权力的煎熬:艾森豪威尔年代的政治回忆录》(*The Ordeal of Power: A Political Memoir of the Eisenhower Years*),纽约:阿瑟诺姆(New York: Atheneum), 1975, 101;内阁会议备忘录,1953年3月6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内阁系列,文件箱1。

④ 威廉·J·摩根致H·S·克雷格(H. S. Craig),1953年3月4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部:档案,1948—1961,心理战略委员会,中央档案,文件箱8,第1号档案,第2文件夹;弗兰克·G·威斯纳致乔治·摩根(Frank G. Wisner to George Morgan),1953年3月9日,出处同上。



作为冷战行动的总统特别助理，C·D·杰克逊(C. D. Jackson)与摩根观点相同。杰克逊是总统的好友，也是战时的伙伴，还曾任《生活》杂志的高级主编。他渴望动用心理上的主动和隐秘的行动打垮苏联力量。他召集了政治科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 Rostow)等外界代表共同策划该如何操作。杰克逊与罗斯托都认为，斯大林之死，对于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情感上的冲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造成了苏联特有的脆弱。”美国可以抓住冷战的总体主动权。杰克逊认为，总统应当发表一个带有外交实质的重要演讲，提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计划。他应当召开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讨论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减少军备开支，以及德国、奥地利、朝鲜问题等。“俄罗斯人民和共产党集团国的人民目前正优柔寡断，甚至不知所措，在这样的时机，我们必须预想到种种可能性，进而主动出击，这至关重要。”^①

国务院自有忧虑。美国若是带着挑衅加强冷战的压力，可能会在无意中帮助苏联新政权巩固其地位。“利用斯大林之死发表煽动演说，现在时机还为时过早。”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说道，他曾是将军、中情局局长以及艾森豪威尔最信任的战时助手之一。史密斯还写道，除此之外，四国外长会议令美、英、法产生分歧，原本提出欧洲防务集团(EDC)的批准计划也受到了挫折。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即要重整西德军备，并将西德兵力纳入与北约相关的西欧军队之中，这是杜鲁门政府最先考虑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对此予以强烈支持。史密斯表示，不能出现任何可能会让法国和西德延迟批准欧洲防务集团的行动。^②

在3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人们讨论了杰克逊有关总统演讲的想法。杰克逊和杜勒斯各自提出了不同观点。不过打动总统的提议来自富有影响力的政治记者塞缪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他建议艾森豪威尔对政府花费在军备上的开支设定限制。这样做的目的是“同时令世界所有经济体遣散军队，将如今致力

① “给苏联政府和俄罗斯人民讯息的赞同见解”(“Supporting Thinking for Message to Soviet Government and Russian Peoples”), 1953年3月11日, W·W·罗斯托, 《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3月11日的三个决定》(*Europe After Stalin: Eisenhower's Three Decisions of March 11, 1953*), 奥斯汀: 德克萨斯州大学出版社(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87—90; 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Gregory Mitrovich), 《损害克里姆林宫: 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策略》(*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伊萨卡, 纽约州: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0, 126—132。

② 史密斯致C·D·杰克逊、艾伦·杜勒斯、乔治·M·摩根和哈罗德·史塔生(Smith to C. D. Jackson, Allen Dulles, George M. Morgan, and Harold Stassen), 1953年3月11日, 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白宫办公室, 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部, 心理战略委员会, 中央档案, 文件箱8, 第2号文件, 第3文件夹; 查尔斯·波伦致休斯, 1953年3月9日, 国家档案馆, 第59号记录组, 国务院记录, Lot 74 D 379, 查尔斯·波伦档案, 文件箱9。



于毁灭性目的的庞大资源转用于提高各处的生活质量”。在卢贝尔看来,俄罗斯人民渴望“更好的生活条件,百货商店里货物更多,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有一些消遣活动”。艾克很认可这样的思路。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出席者总结道:“斯大林的死对维护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世界领导地位提供了契机,这符合所有人民在安全、和平、更高生活水平上的利益。”杰克逊受命尝试起草演说词。^①

起初,美国的情报分析人员并没有料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会改变路线。他们认为,斯大林的继任者“会反复强调对西方的仇视……该集团会扩大其经济基础,增强其军事力量”^②。因此,总统及其顾问对于马林科夫的声明大吃一惊,尤其是3月15日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发言。期间令艾克苦恼的是,杰克逊、杜勒斯和他的讲稿撰写人埃米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很难为他起草一份演讲稿。总统毫无怒气,他希望美国能在国际上占据高位,能够成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艾克在与休斯的坦诚交谈中表示,他不想对苏联进行另一项控告,那将会是“愚蠢的”。他想说一些具体的内容。军备竞赛并无意义。“它会将我们引向何处?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核战争。而最好的可能性,则是掠夺世上每个民族和国家辛勤劳作的果实……历史已不言而喻。”艾森豪威尔继续道,“我所关心的是未来。我们双方政府都已换了新人。现在的底子干净的。现在应该让我们彼此通话。让我们说说世界上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③

艾森豪威尔告诉休斯,当局需要设计出具体建议。如果我们“实在无法提出任何内容,我不打算就此作演讲”。艾克说道:“假设马林科夫是个明理的人,我们能够与他消除一些严重分歧——我们可能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但让我们从这样的假设出发,作出相应的谈判吧。”休斯婉转地提醒总统,杜勒斯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也无意于探讨新计划,比如朝鲜问题等。休斯说,杜勒斯并不准备结束战争,“除非我们狠狠教训那帮中国佬,在整个亚洲面前明确显示我们的实力”。艾克斥责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那些成熟老练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无法严肃地讨论和平,那么我就算

① 杰克逊备忘录,詹姆斯·S·莱(James S. Lay),1953年3月12日,国家档案馆,第273号记录组,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P文件,P31,文件箱1;塞缪尔·卢贝尔致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953年3月7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档案,白宫备忘录系列,文件箱1,第5文件夹。

② 第39号特别意见(Special Estimate),“斯大林过世以及马林科夫在苏联领导地位提高的可能后果”(“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Death of Stalin and of the Elevation of Malenkov to Leadership in the USSR”),1953年3月10日,收录于罗斯托,《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96—101。

③ 休斯,《权力的煎熬》,102—105;总统会谈备忘录,杜勒斯,1953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杜勒斯档案,电话会谈系列,白宫电话通话记录,文件箱10。



是站错地方了……如今，我们要么就结束这样毫无建树的状态，努力争取和平——要么就忘了这一切……毕竟——我要对这个国家该死的外交政策负责。这是我的工作。”^①

总统并非唯一假设存在重要和平机遇的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新领导人不得不讨论新的可能性。在准备杜勒斯向国会递交的证词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注意到，这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同是上任不足三个月的莫斯科与华盛顿新领袖，两极世界中两大势力的首领”^②。

苏联政策的转变已有了确凿的标志，无可辩驳的是，马林科夫在探求外交上的开放。但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并没有就该怎样行动或该发表怎样的演讲达成一致。受挫中的杰克逊于4月2日向总统写道：

这一个月来，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我们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苏联人——而在这一个月中，他们也朝着活力和裁军的目标有所迈进……他们反复在国内强调，只有他们在对和平负责。他们提出要就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国会议。他们成功地说明射落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在欧洲和美国几乎只是件小事情。^③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所有层次的官员都在揣摩这一变化的严重性和意义所在。“自从斯大林死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PPS)的卡尔顿·萨维奇(Carlton Savage)写道，“苏联对西方的表示比其他任何类似时期都要多。”^④路易斯·哈利(Louis Halle)，萨维奇在政策规划办公室的同事，写道：

如今没人知道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的相应职位。竞争中

① 我将引自休斯著作和日记中的内容进行了核对。见休斯，《权力的煎熬》，103—105。休斯日记中的申明语气更为强烈，1953年3月16日，埃米特·休斯档案，西利·马德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新泽西州；另见“埃米特·休斯电话会谈”(“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Emmet Hughes”)，1953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杜勒斯档案，电话会谈系列，白宫电话通话记录，文件箱10。

② “关于国务卿在白宫拨款委员会发言的边缘性提议”(“Marginal Suggestions for Secretary’s Use in Presentation Before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无签名]，1953年3月18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Lot 64 D 563，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1947—1953，文件箱42。

③ 致总统备忘录，杰克逊，1953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C·D·杰克逊档案，文件箱50，第2文件夹。

④ 备忘录，卡尔顿·萨维奇，1953年4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8，8：1138。



的团体与个人的一连串优势会暴露一场权力之争,没人能永久保持其优势。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看到,一旦政局稳定下来,苏联体制和政策就会发生转变,而苏联的状态就会与过去大不相同。^①

情报分析员一丝不苟地获取更多有关马林科夫的信息。令人同情的是,他们只得到了一点点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内容并不乐观。中央情报局表示,综其情报,他们的结论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或者赫鲁晓夫(其生平也一样颇受关注)一样,长期压制苏联人民,实施恐怖活动。一旦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很可能证明他也参与了那些违背人性、令人发指的罪行。”^②

然而马林科夫却在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4月8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福斯特的兄弟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严重背离了斯大林政权原有的政策。苏联的和平攻势比中央情报局预料中出现得更早,也实行得更有条理。”杜勒斯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目标在于“减轻全球战争的危险”。他之前就注意到,苏联的领导人“真的相信他们正受到包围——这并不属实,但是我认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看到出路,可能会希望出现这么一条路”。他认为,苏联的确希望干扰欧洲防务集团,也的确在设法妨碍美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尽管可以把这些外部的政策变化单纯看作是战术上而非政治上的改变,杜勒斯对于“缓解国内压力”的意义和重要性愈发迷惑。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苏联的一些行动,比如拒绝承认医生的阴谋,是“非常惊人的”。杜勒斯总结道,接连不断的危机并未结束,“苏联内部明显还有着极度的紧张与不满”,新政权需要一个“喘息的时机”,“没有理由相信苏联对于自由世界的根本敌意有所改变”。^③

可是艾森豪威尔对这些结论提出了异议。他认同“没有理由相信苏联对西方大国的政策有根本改变”,但他也提到:

① 路易斯·哈利致保罗·尼采(Louis Halle to Paul Nitze),1953年4月8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 Lot 64 D 563,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文件箱42。

② 艾伦·W·杜勒斯致摩根,1953年4月2日,附于“马林科夫:部分生平重点”(“Malenkov: Some Biographical Highlights”),1953年4月20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部,心理战略委员会,中央档案;摩根致克雷格,“马林科夫判例案件”(“Malenkov Test Case”),1953年3月26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DRS),电子存取,解密于1997年5月20日。

③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4月8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关于艾伦·杜勒斯对孤立政策的暗示,见日记条目,1953年3月16日,休斯档案。



也没有理由相信苏联在不远的将来不会彻底改变政策。对总统而言,很可能苏联领导人已经作出决定,本着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一旦苏联更多的财富与资源转为民用及消遣,时机便到来了。总统说道,很明显苏联内部不满的呼声很高,因此我们应当不断研究该问题,努力确定苏联人是否真的改变了观点,以及一些权宜之策在历经重重困难后是否不可行。^①

问题在于这是否存在着一个和平的机遇,以及如何去抓住它。在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离开华盛顿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之前,苏联大使格奥尔基·扎鲁宾(Georgi Zarubin)邀请他一起谈谈。扎鲁宾热情地问候了波伦,说加强双边关系是大使的职责。他提到了莫斯科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颇具建设性的措施,希望朝鲜问题上的进展也能积极推进其他方面。^②

然而艾克的顾问们仍保持大相径庭的看法。杰克逊仅仅希望利用好斯大林过世的机会和苏联的脆弱。杜勒斯同意总统发表演讲,但认为西方最为重视的问题,例如欧洲防务集团则不容妥协乃至受到威胁。“真该死!”当他的朋友 C·D·杰克逊指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绝不会空谈学校和医院的建设而减少其全球称霸的野心时,他这样说道:

我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我仍然记得与斯大林一起开会的那四个小时。他老是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我们必须与美国和平相处,因为我们无法承担不这么做的后果”——他谈到了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房子、粮食、技术帮助。他跟我说在莫斯科7个人挤一个房间,焦虑的口气就好像你或我谈论美国的贫民窟问题。真该死,这些家伙必须用物质来思考——那就是他们所有的信仰。^③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4月8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关于艾伦·杜勒斯对孤立政策的暗示,见日记条目,1953年3月16日,休斯档案。

② 会谈备忘录(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Stoessel),1953年4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8:1139。

③ 关于引言,见日记条目,1953年3月17日,休斯档案;休斯,《权力的煎熬》,106—107;米特洛维奇,《损害克里姆林宫》,128—129;心理战略委员会 D-40,“斯大林之死的心理利用计划”(“Plan for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1953年3月20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部,心理战略委员会,中央文档,文件箱8。



艾克的顾问们知道和平的主动权在美国这一点是深得人心的。^① 在红色恐怖和麦卡锡攻击之中,还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渴望,那就是开拓新方针的可能性。尽管并不占多数,但相当一部分具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与报刊认为,马林科夫应该是在试图改变方针,并且向往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会谈。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8%的美国人支持艾克与马林科夫会面,讨论有争议的重大问题。^②

无疑,舆论之所以有所动摇,是因为再度当选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正致力于推动与俄罗斯人的首脑会议。在一系列写给总统的私人信件以及公众演讲中,丘吉尔都强调了斯大林之死所带来的机遇。“亲爱的艾克,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希望,”他写道,“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事态的自然发展出现变故。”^③

问题在于对和平的渴求能否产生效果。实际上,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当局,甚至艾克本人,真正希望的是缓解紧张局势还是赢取胜利。相互冲突的情感与抱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法轻易解决。埃米特·休斯敏锐地向杜勒斯提问,他的意图是在于煽动革命、赢取冷战,还是推动东西方谈判、缓解紧张。休斯强调道,万事不可能两全其美。但是艾克正企图这么做,这必将徒劳无功。^④

4月16日,艾森豪威尔终于对美国报刊编辑协会发表了他的演说。他开始说道:“1953年的这个春天,自由世界中最为重要的事便是:一个对所有民族都平等的和平机遇。”在二战的尾声,艾克回忆道,俄国战士与西方同盟国的战士在欧洲中部相遇。他们那时带着胜利的喜悦。所有民族都渴望和平。但他们的希望破碎了。“这

① 阿博特·沃什伯恩致杰克逊(Abbot Washburn to Jackson),1953年4月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7。

② 杰弗里·布鲁克斯,“斯大林的幽灵:冷战文化和美苏关系”(“Stalin’s Ghost: Cold War Culture and U. S. -Soviet relations”),收录于《斯大林死后的冷战:新的国际历史》(*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肯尼思·A·奥斯古德(Kenneth A. Osgood)和克劳斯·拉雷斯(Klaus Larres)(编),兰汉姆,马里兰州:罗曼和利特菲尔德,2006,125;乔治·H·盖洛普(George H. Gallup),《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意见,1935—1971(3卷本)》(*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71, 3 vols.*),纽约:兰登书屋,1972,2:1136。

③ 彼得·G·博伊尔(Peter G. Boyle)(编),《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的通信,1953—1955》(*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3—1955*),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0,30—45,引言见41。

④ 日记条目,1953年3月16日,休斯档案;休斯,《权力的煎熬》,102。更多关于艾森豪威尔意图的重要观点,见克劳斯·拉雷斯,“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死后的最初40天:水火不相容的缓和政策与政治战争”(“Eisenhower and the First Forty Days After Stalin’s Death: The Incompatibility of Détente and Political Warfare”),《外交与治国》6(1995年7月):431—469;肯尼思·A·奥斯古德,“实质前的心态:艾森豪威尔对心理战的承诺和与敌人的谈判”(“Form Before Substance: Eisenhower’s Commitment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Negotiations with the Enemy”),《外交史》24(2000年夏):405—433。



共同的远景只是昙花一现。”美国选择了一个方向，而苏联选择了另一个。美国所选择的道路以自由民族的独立自主为信念，探求公正与和平，支持国际合作，对军事力量反感。克里姆林宫则有不同的见解，总统说道，他们认为要通过武力、军队、恐怖、镇压来维护安全。“目标在于不惜任何代价获得权力上的优势。将自身的安全建筑在其他所有人的不安全之上。”

苏联的行动促使西方作出反应，这使冷战和军备竞赛急剧升级。苏联和其对手都没有获益。倘若持续这样的趋势，局面则不容乐观。“最糟的局面就是爆发核战争。”最好的则是“永久生活在恐惧与紧张之中”。军备竞赛会榨干所有民族的财富，令苏联和美国的制度都无法“为所有人民带来真正的富足与幸福……每一把制造出的枪，每一艘投入战斗的军舰，每一枚发射出的火箭，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从饥寒交迫、衣不蔽体的人那里偷来的……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人类的命运悬于一线、岌岌可危”。

随后总统对更美好的未来作出了展望。“这是国家事务所面临的最严峻抉择，要是能转向公正、持久的和平该有多好……全世界都知道，随着约瑟夫·斯大林的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如今在苏联一个新的领导层已上台。无论与过去的纽带多么紧密，这个领导层不会被过去完全束缚。它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自己决定的。”但是要迎来一个新时代，苏联就应该在和平事业中有实际行动，在朝鲜、德国、奥地利、印度支那的问题上有具体措施，而不是只动嘴皮子。如果在这些问题上的进步使彼此产生了信任感，“我们就能继续合作了，接下来的工作是讨论如何减少给世界造成重担的军备压力”。在这个问题上，总统谈得很具体。他表示，我们可以在军力规模的限制上达成一致，可以按照绝对的数目，也可以按照商定的国际比例；我们可以商讨对部分军用战略物资的生产设限；我们可以同意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以提升其用于和平的目的，“确保对核武器的禁止”；我们可以共同限制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艾森豪威尔说，要巩固以上协议，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联合国监督下的体系”。

如果美国、苏联和它们的盟友能够成功抓住这一机会，就能构建起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平也就能够得到巩固，总统说道，“并不是通过战争武器，而是通过小麦和棉花，牛奶和羊毛，肉、木材和米饭。这些话要翻译成世界上每一种语言。这些需要共同向武装起来的世界挑战”。总统继续道，美国希望做领头人，就像马歇尔计划中所表现的那样。通过裁军所得的实际款项可用于资助不发达地区的重建工作，“刺激有利且公平的世界贸易，帮助所有人知道充沛的自由能带来怎样的福音”。



进展只来自一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宣告道:“苏联准备做什么?”克里姆林宫是否会利用对其盟友的影响力要求朝鲜战争停战,并为印度支那和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它是否会允许东欧的独立自主?它是否会同意军备限制、保证条款以及“联合国严格的管控监督”?

艾森豪威尔总结道,让我们抓住这个和平的机遇吧。否则,“未来对我们的评价将是公正的、严厉的”。他说道:“如果没有那些别有用心为目的或政治,我们深信所有人民心中都有着对和平的渴望——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渴望并不亚于其他人。”上帝“创造出人类,是为了让他们享受地球上的和他们辛勤劳作的果实,而不是摧毁这样的果实。他们所向往的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解除他们对武器和恐惧的负担,这样他们就会发现眼前是自由、和平的黄金时代”。^①

演说得到了广泛共鸣,并深受好评。^②但是两天之后,国务卿杜勒斯在同一个报刊编辑协会前,用不同的语气传达了不同的信息。他坚持认为,美国正从强大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行动。由于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一职,他已经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带去了活力和想象力。苏联的领导人正处于“和平防御”而非“和平进攻”。他们正发出改变方针的信号,却无法获取信任。他们的意图仍难以预料,因而美国要小心谨慎,要继续坚持表现具体的良好意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表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意志必然会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那样的进程会走向何处,杜勒斯无法预言。“只要那些不接受道德准则的人仍拥有大量权力,这就一定会继续保持不明朗的状态。”^③

几天之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以持重、周全、平缓的语气作出回应。首先,他们全文发表了艾森豪威尔的发言,包括总统指控斯大林对引起欧洲分裂、军备竞赛和冷战负有责任。随后他们在《真理报》上刊登了篇幅颇长的答辩,措辞恭敬而又不乏批评的意味。这篇社论说道,艾森豪威尔质问苏联的作为,但却没有谈他自己将在朝鲜、德国和亚洲采取怎样的措施,从而实现他心中无比珍贵的和平。艾森豪威尔再度责怪克里姆林宫在战后国际关系上的起落,却又不肯承认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又是如何令伟大的战时联盟四分五裂。更糟的是,杜勒斯的演讲表现出了敌意和侮辱性,而且

① 致辞(Address),“和平的机遇”(“The Chance for Peace”),1953年4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艾森豪威尔,1953》,179—188。

② 参见针对1953年4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言的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4月22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291—305中遗漏)。

③ 杜勒斯的演讲重印于罗斯托,《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122—131。



错误声称苏联领导人正对美国势力作出反应。苏联政府必须保护其国土和朋友，但也寻求协商所有的重要分歧。克里姆林宫邀请美国共同探讨为了和平应当采取哪些动作。到那时为止，华盛顿的意图显得自相矛盾、不可理解。过去，它致力于统治世界舞台，危及苏联利益。还不清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将来究竟作何打算，克里姆林宫就决心积极助益。“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已经准备好在有争议的国际事务中承担相应的那部分责任。”克里姆林宫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的准则之下，在必要时通过直接洽谈的手段，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讨论问题”。^①

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这两位美国最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的反应印象深刻。凯南认为“现今的苏联领导人肯定有兴趣与我们共同寻求解决当今国际难题之道”，尽管他们不太可能公开谈判。“他们极度敏感，生怕人们将他们愿意谈判视作虚弱的标志。”在这方面，国务卿杜勒斯的评价帮助不大。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说：“伸出你们的触角：我们会作出反应的。”凯南提醒每个人，对于俄国人，德国“慢慢崛起……是美苏所有分歧中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德国东部的弱势……他们感到，如果有人将会在解决德国问题时维护自身利益，那个人必须是他们自己”。^②

波伦从莫斯科来信，他也同样认为那篇社论很重要，经过了深思熟虑和斟酌词句，但是其中还是有矛盾的。“文章甚至在提到迟疑时都小心谨慎，要么反映出当前领导层的不确信，要么则反映出对不同观点的妥协。”当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总统发言中提到的一些主题让苏联人“措手不及”，并且鼓励他们表露意图。^③

4月28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及其顾问讨论了接下来的行动计划。C·D·杰克逊强调道，华盛顿已经取得先机，还要再接再厉。美国人需要在奥地利和德国问题上进行部署。而在朝鲜，他们应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实力。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对付中国，从而达到朝鲜停战的协议。令杜勒斯大为苦恼的是，美国的许多盟友希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当他强调美国必须展示实力时，总统表示赞同，并且说道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先发制人，不管俄国人在接下来数

① 《真理报》的社论出自罗斯托，《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151—162。

② 凯南致艾伦[杜勒斯?], 1953年4月25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情报与研究记录，项目文档，1945—1960，Lot 58 D 776，文件箱14。

③ 波伦的信件可见于罗斯托，《后斯大林时期的欧洲》，162—164。

周和数月中可能会做些什么”^①。

但是杜勒斯仍然感到悲观。在与总统共同出席5月8日的一个小型会议时,杜勒斯坦言道:

几乎在每一个人们可以看到的——非洲、中东(不包括在苏伊士的英国)、印度、东南亚(不包括在朝鲜和日本的美国),都不存在坚固的约束点,到处是共产主义渗透的危险。南美不堪一击。西德可能会吞下共产主义的诱饵,阻碍欧洲防务集团,从而使北约有垮台的危险。在这场世界的棋局中,红方的阵地更好。

尽管新的因素能够改变当前的轨迹,“苏联对西方世界所形成的现存威胁在后者1000年的统治中最为严峻和根本。这样的威胁,从其性质上说,与拿破仑或希特勒的威胁是截然不同的。这就好像公元10世纪伊斯兰的入侵。现在的问题清晰无误:西方文明能否幸存下来?”

杜勒斯强调道:“我们现在走的道路对我们和自由世界而言是致命的。这只不过是在防御:我们总是担心苏联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除非我们改变这一政策,或是终止这一政策,否则就会一点一点地失去自由世界,最终自我粉碎……很有必要采取一条全新的、不同的路线。”他简要地阐明了几种可能性。政府可以警告苏联人,如果又有另一个国家受到颠覆,华盛顿就会将此作为一个宣战的标志;或者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地区,比如亚洲,划定最后界限,并且让中国人知道,如果其他国家也加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美国将会采取自己所选择的措施。按照杜勒斯的观点,第一个选项有引发全球战争的危险;第二个选项则没有。而第三种可能就是继续攻势,努力重新赢得一个或更多地区——比如,整个朝鲜,或海南,或阿尔巴尼亚。第四个可能就是在苏联帝国内部,尤其在东欧,挑起一场颠覆。目标是:“扰乱克里姆林宫;令它多考虑考虑如何守住已有的东西,少动获取其他领土和民族的念头;将苏联集团变成一个没有进攻能力的松散联盟,要从斯大林的庞然整体中改头换面。”

艾森豪威尔专注地倾听着。他说,我们需要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要让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路线都是明智的。他没有装作知道该做什么,但是他强调了盟友的重要性,不赞成“划定最后界限”的想法。他注意到杜勒斯似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4月28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



乎忽略了另一个选择：“我们应当多想想如何提高生活水平，不要那么依赖物质实力……这才是获取内在实力的方法。我们希望人民看到真正的自由和共产主义……这需要一定时间，但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最终将会尝到失败的滋味。”杜勒斯插话道：谈论自由并没有阻止人们走向共产主义。总统驳回了这一观点：“必须要赢得人们的心。”^①

然而，两人都已认识到，国际秩序的瞬息万变使他们很难赢得人们的心。德国的将来充满着未知，特别是在欧洲防务集团获得西德和法国认可前。杜勒斯说道，“没有统一性”，欧洲就“没有希望可言”，然而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法国，却危及着这个统一性。^② 如果西德不尽快投入西方阵营，他手下的一位专家写道，“德国可能会采取更为独立的政策，随之而来的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或者苏共势力抬头，这要视情况而定”^③。德国仍有可能逃脱西方的诱惑。德国不但无法吸引克里姆林宫在东欧的卫星国投向西方，还可能会滑入苏联的轨道或完全失去控制。^④

要是无法将西德融入进来，西欧的复兴便将受挫。而且，在法国、意大利、希腊，甚至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经济上的停滞会重新激起共产主义政治胜利的威胁。“欧洲的呆滞不振与迟迟不动，”艾森豪威尔始终都在担心，可能会“令欧洲大陆落入苏联的掌控。”^⑤

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处在不平静和不稳定之中。印度支那、伊朗、埃及和朝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不变的话题。杜勒斯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道，在五月中旬访问数个国家之后，他发现“痛苦”遍及整个阿拉

① 关于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谈话，见“日晷计划”（“Solarium Project”）[无签名]，1953年5月8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Lot 64 D 563，文件箱64；伊默曼，《杜勒斯》，59—62。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8月13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7：502。
③ “关于美国对德政策的申明”（“Statement on Policy of United State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Germany”），佩里·劳卡夫（Perry Laukhuff），1953年6月24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Lot 64 D 563，文件箱42；第51号情报评估，“德国长期趋向”（“Long-Term Trends in Germany”），1953年5月8日，出处同上，情报与研究，指导办公室，1950—1959，Lot 58 D 528，文件箱65。
④ 关于德国的吸引力，见艾森豪威尔致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953年7月14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总统生涯：中间道路》（*Papers of DDE: The Presidency: The Middle Way*），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14：383—384。
⑤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3月3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271—272。



伯世界,在那里“美国不得不忍受被视为英、法帝国主义的一丘之貉”。^① 作为总统在冷战事务上的特别助理,C·D·杰克逊在对整体局势再三揣摩后,遗憾地表示“世界的局势”正“急剧恶化”。必须要集中起“每一份技能和决心,”他写道,“让法国领悟到他们必须制定一个全球性的政治计划……为所有这些人民的自由”。^②

艾森豪威尔深知美国的脆弱,他再三表示,对和平倡议的支持要依苏联是否表达友好而定。5月5日,他写信给当时在台湾岛领导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

我们无法想当然地认为共产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已经过去或正在消失。恰恰相反,似乎近来苏联的姿态显示他们不过在战术上有所变动,其程度与持续时间并不明确,很大程度上受必然性的支配。我当然会认为仅仅如此,直到苏联用行动而非言语证明自己已经放弃了称霸全球的计划,也愿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国际社会,让所有人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享用劳动的果实。^③

然而,和平的机遇不容忽视。艾克给蒋的信中还说道,如果“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不理睬“共产主义集团表面上的友好行动”,“自由世界”的声望将会被玷污。此外,这些行动给了人们一个降低国防开支的机会。如果的确存在和平的机会,艾克就能平息自己国家的预算危机,将节约的开支转为美国人税收的减少。他承受着来自与他同党派领导人的巨大压力,他们指责他没有能够减少开销。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在一个立法领导会议上告诉总统,他“对预算状况极其失望,简直无以言表”。^④

总统所坚信的是,安全有赖于偿付能力和战备状态。就在他担任职务不久,他就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是将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和预算主管威廉·道奇(William Dodge)列入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定期出席这些会议,积极参与讨论,对这些会议极为重视。整个1953年春天,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在努力解

① 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1953年5月17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安·惠特曼文件,杜勒斯-赫托系列,文件箱1;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6月1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系列,文件箱4。

② 杰克逊致亨利·卢斯(Henry Luce),1953年5月19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70;杰克逊致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1953年5月11日,白宫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办公室(OSANA),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简报笔记,文件箱8。

③ 艾森豪威尔致蒋介石,1953年5月5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4:209。

④ L·A·明尼克(L. A. Minnich),“立法领导会议笔记”(“Notes on Legislative Leadership Meeting”),1953年4月30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立法会议系列,1。



决国防需要与财政要求的问题。总统不会在国家安全上作出妥协，但他同时也担心如果美国不得不“生活在长久的动员状态中，我们整个民主生活方式将会在此过程中遭到破坏”^①。

尽管对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存有疑心，艾克并不想放弃他的希望，那就是斯大林时代结束后有一个和平的机会。缓解紧张局势可以促进国内的美元储蓄，转用于投资和生产，推进“改善世界”计划，加强“所有人们的合作，排除控责或辩护”。^② 而当艾克对杜勒斯在5月8日所提出的选择发起系统研究时，没有一个选项预见和平的机遇。总统在互相冲突的建议中头痛不已。而既然他已表示会因为苏联的行为而改变看法，克里姆林宫新领导的态度和举动就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

克里姆林宫中的动乱

斯大林的继承者积极而又焦虑，多疑而又团结。他们知道美国人想要利用他们在过渡时期的脆弱和经验不足。为了获得在国内的支持，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释放囚犯，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过他们始终都没有放松警惕，始终都担心那些企图瓦解他们国家的外国资本主义者可能在国内进行颠覆活动，而他们的国家代表了人类的未来。^③

尽管他们对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大量实质性的讨论，但他们彼此并不信任，尤其是贝利亚。他们不相信他的动力、主动性和权力，他们认为他想自称为一名伟大的改革者，以获取公众支持并夺取政权。^④ 他们非常熟悉他过往的暴虐和谋杀行为。他们还知道他正在搜集有关他们和他们过去犯罪证据的档案。“你应该为这些档案在我手中而感到高兴，”贝利亚对马林科夫说道，“但将来要表现得好。”^⑤“我知道贝利

① 关于引言，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3月25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261；艾森豪威尔致阿尔弗雷德·M·格伦瑟(Alfred M. Gruenther)，1953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日记系列，文件箱3；另见《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237—386。

② 艾森豪威尔致蒋介石，1953年5月5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4:210。

③ 例如可见马林科夫在关于贝利亚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开场白。会议记录，1953年7月2日，D·M·斯蒂克(D. M. Stickle)(编)，《贝利亚事件：预示斯大林主义终结的会议秘密记录》(The Beria Affair: The Secret Transcripts of the Meetings Signalling the End of Stalinism)，纽约：新科学出版社(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1992,3。

④ 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9—21；陶布曼，《赫鲁晓夫》，245—246。

⑤ 贝利亚，《我的父亲》，161。



亚在对我耍两面派的花招,”赫鲁晓夫回忆道,“在让我消除疑虑的同时等待着迅速干掉我的时机。”^①

那段时间里,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东欧尤其是骚乱不断的东德之上。他们知道斯大林对卫星国施加了太多经济和军事重担。改革刻不容缓,如果不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缓和镇压行为,很可能发生动乱。他们将东欧领导人召集至莫斯科,与他们安排单独会议。^②

关于那些会议的详尽纪录显示,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他们的同志一心想要实现意义重大的自由化。比如,1953年6月中旬,整个克里姆林宫集体领导班子——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阿那斯塔斯·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会见了从布达佩斯前来的匈牙利政党及国家领袖麦特雅斯·拉柯西(Matyas Rakosi)及其随行人员。

马林科夫从经济环境开始说起。“我们以一种严谨的态度看待匈牙利的情况……我们的印象是,匈牙利的同志们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所熟悉的事实显示,农业领域的境况并不好……贸易领域也有不少问题。能为人民提供的商品太少了。”随后他谈到了政治镇压问题,多年来这在匈牙利非常严重。仅仅“在1952年下半年,就有250000人受到迫害”。其中75%已经停止,“但是,数字仍然很庞大……所有这一切都会激起人民的不满”。

当贝利亚开始发言时,他就经济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镇压责问了拉柯西。他说,投资不足导致乡村生活的艰难,还分散了轻工业的资产,“轻工业可是服务人民的工业”。怎么可以在一个拥有950万人口的国家“对1500000人实行迫害”?贝利亚警告道,美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将会利用百姓的不满情绪。“他们的目标就是:推翻现有的政府,恢复资本主义的势力。”逮捕和打击人民只会起反作用;人们只会畏惧拉柯西而不会尊重他。必须要赢得人民的忠诚和爱戴。布尔加宁随后接口道:匈牙利共产党滥用了他们的权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他说道,“这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走向灾难的道路。”贝利亚总结道,“今天匈牙利仍然有红军,但红军不会永远都在。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让自己更为强大,那样就没有任何人能够伤害我们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严肃地提出这些事?”马林科夫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这个问

① 引自陶布曼,《赫鲁晓夫》,250。

② 马克·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早期斗争与东中欧剧变:苏联决策的内外部联系(第1部分)”,《冷战研究杂志》1(1999年冬):3—55。



题。“我们作为共产党，应该对匈牙利所有事情的状态负责。苏联也应该为匈牙利存在哪些规则而负责……我们承认极端的军事需求，但是[匈牙利的]同志执行这些需求的方式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军队的规模要达到令国家不堪重负？”

拉柯西试图为自己辩护，语气温顺而礼貌，贝利亚回应道：“我们喜欢你也尊重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批评你。”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重复道，关于匈牙利军队的规模和开支，没有任何借口可言。匈牙利人将苏联的愿望发展到了一个极端。“斯大林同志给出了错误的指示。”贝利亚声称，“如果伟大的斯大林也犯了错，”他说道，“拉柯西同志也可以承认他犯了错误……不可以打击人民。”他不容分说地补充道，“必须改变”政府针对中农的政策。^①

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如布尔加宁所警告的，的确发生了一——但并不是在匈牙利。6月17日，东柏林的工人开始了罢工。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对东德政权苛刻的劳动规则、低廉的工资和严厉的经济系统化提出抗议。人们受够了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也对其妄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迅速建立社会主义”感到腻烦。成百上千的工人猛攻了政府办公楼，约25000人参与了上街游行。罢工和暴动很快蔓延至整个东德。到了下午早些时候，苏联司令官出动部队，宣布戒严。俄国的士兵和坦克向抗议者开火，疏散人群，逮捕数百人，还处决了其中的几个。^②

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暴乱的可能，并一直试图避免。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意识到乌布利希的反应是一个灾难。人民对其政权高涨的敌意被苏联驻军和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尽收眼底。此外，在之前两年中大约有50万东德人逃往西方。5月，苏联官员同意让东德走一条“新路线”，以缓解劳动规则，不再建立农业合作社，停止压榨小型私人企业，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于6月2日召见乌布利希及其同僚，警告他们如果形势没有得到改善，“一场灾难必然会产生”^③。

① 苏联领导人与匈牙利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谈记录，1953年6月13日及16日，收录于克里斯蒂安·F·奥斯特曼(Christian F. Ostermann)(编)，《东德的动荡，1953》(*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布达佩斯及纽约：中欧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安全档案馆(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2001，144—151。

② 出处同上，33—34；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1部分，50—55。

③ 奥托·格罗特沃尔(Otto Grotewohl)对东德和苏联领导人莫斯科会议的记录，1953年6月2日—4日，收录于奥斯特曼，《东德的动荡》，137；霍普·M·哈里森(Hope M. Harrison)，《把苏联逼入绝境：苏联与东德关系，1953—1961》(*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1953—1961*)，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12—31。



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对德国的长期规划并不明确。他们所坚持的改革意在平息东德的动荡局面,在西德获取更多支持。而苏联的官员,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一样,很清楚要想在德国的任何一方赢得信誉,他们就必须拥护德国的统一。因此苏联的改革计划旨在“重建一个单一、民主、热爱和平、独立的德国”^①。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是否真的希望就统一德国进行认真协商还不清楚。至少他们努力将分裂德国的罪名推到华盛顿身上,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阻止西德人参与一个完整的西欧防务集团。

贝利亚非常希望能彻底解决德国问题,这样既能减轻莫斯科的负担,又能缓解东西方的紧张。他的一名属下回忆道,他“命令我准备最高机密的情报调查,测试统一德国的可行性。他告诉我,要想增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并且由联合政府管理。德国是美苏在西欧利益的协调性因素”。据称,贝利亚并不“想看到一个依赖苏联支持、始终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德国”。^②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他激怒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当时他大声叫嚷着:“民主德国?这个民主德国相当于什么?它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只不过被苏联军队控制着而已。”克里姆林宫需要一个和平的德国,贝利亚说,“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没有区别。”^③贝利亚的儿子也说他父亲希望统一德国,认为一个“统一的德国会对苏联充满感激,便会同意从经济上予以帮助。我们甚至可以容忍一个资本主义的德国。”^④

没有人知道贝利亚是默许了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资本主义德国,还是仅仅希望有一个处于苏联轨道中的统一德国,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多数官僚也并没有发表明确观点。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苏联军队正在镇压东德的暴乱,克里姆林宫领导也正在构思一个长期的政策,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决定摆脱贝利亚,带头的是赫鲁

① 苏联部长会议指令,“关于改善民主德国政治境况的措施”(“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GDR”),1953年6月2日,收录于奥斯特曼,《东德的动荡》,134;另见出处同上,67—71,82—85,90—109,133—136。

② 帕维尔·苏达普拉托夫(Pavel Sudaplatov)和安纳托里·苏达普拉托夫(Anatoli Sudaplatov),另有杰罗尔德·L(Jerrold L.)和利昂娜·P·谢克特(Leona P. Schecter),《特别任务:不必要的证人回忆录——一位苏联的谍报大师》(*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 a Soviet Spymaster*),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94,363—364。

③ 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回忆录》(*Memoirs*),纽约:道布尔迪(New York: Doubleday),1989,317;雷西斯,《莫洛托夫回忆录》,334—335。

④ 贝利亚,《我的父亲》,262。



晓夫。他们尤其担心的，是他正在内务部(MVD)这一安全机构中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秘密联系了领导层的每一个成员，逐步达成了将贝利亚从其关键职务上撤离的共识。他们在暗地里更是召集了支持他们的部队，策划将贝利亚逮捕。

贝利亚对于这场针对他的阴谋浑然不知，他于6月26日抵达了一个主席团会议。令他备感震惊的是，马林科夫在会议一开始就说这次会议将聚焦于贝利亚的行为。马林科夫控诉道，他有罪，因为他试图“将内务部这个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他滥用职权，一心想引发集体领导的内讧。所有与会成员都支持这一提议。马林科夫随后按下一个键。按照计划，朱可夫元帅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官进入会议室，包围了贝利亚。马林科夫便要求所有人安静，宣布贝利亚“是如此狡诈和危险，只有恶魔才知道他现在可能做什么。因此我提议立刻逮捕他”。所有人都同意了，尽管没人意料到事态会发展至此。^①

一周内，这些密谋者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对贝利亚的指控。马林科夫最先在会议中发言，他攻击了贝利亚的罪行行径、分裂集体领导的行为以及篡夺权位的计划。他声称，贝利亚想要破坏集体农场和粮食供给。总而言之，他“丢尽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脸”，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复兴者”，还表现为“一名国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②

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最受关注的问题莫过于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的态度。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在德国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无比清晰地表明了自己是一名教唆者，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提出要放弃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西方作出让步”。赫鲁晓夫表示，所有领导人都认识到了他们对民主德国的政策是错误的。所有人一致表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过快，使他们与德国人有所疏远。然而除了贝利亚，他们都坚持不能放弃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因为那样做会危害到苏联的安全和共产主义的未来。“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德国能真正做到中立吗？”赫鲁晓夫质问道，“这可能吗？”德国是一个魅影般的威胁，会趁苏联领导人放松警惕时予以报复。布尔加宁说道：“关于德国过去的中立问题，我（给贝利亚）举过例子……我指出……德国解

^① 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27—34。

^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贝利亚反党反政府罪恶行径的决议”（“Resolution on the Criminal Anti-Party and Anti-Government Activities of Beria of the Plenum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PSU”），1953年7月7日，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87—188；另见马林科夫的评价，1953年7月2日，出处同上，3—13。



除了武装,然后发生了什么?德国重整军备,对苏联发动了袭击。”^①

所有人中,莫洛托夫最清晰地表达了他的忧虑。“我们谁都不能忘记,”他说道,“德国应当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而资本主义德国要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他继续说道,认为资本主义德国会保持和平的想法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想出来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德国怎么可能没有带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野心?怎么可能不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勾结?我们不能否认“用我们士兵的鲜血、人民的鲜血在对抗希特勒主义的艰难过程中所得来的一切……在正确的政治道路引导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会成为苏联更可靠的朋友,也会成为实现欧洲帝国主义计划中的棘手障碍。”^②

对贝利亚的谩骂说明了,过去的经验、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中的权力分布都对德国统一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志们,”马林科夫在7月7日全体会议闭幕时大声说道,“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国际形势,不能忘记我们身边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都摆脱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因而克里姆林宫不可以放松警惕,还必须重申对乌布利希和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支持。克里姆林宫还必须重新检验东欧的改革成果,确保没有出现任何动荡局面。一定要提高革命警觉。“我们必须牢记也千万不能忘记身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会向我们的中心派遣特工,妄图打垮我们。”^③

贝利亚恳请得到原谅。“亲爱的格奥尔基,”他写信给马林科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因为你比别人都更了解我。”没错,他承认,他在主席团会议的举动过于傲慢。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的无礼非常不可取。“毫无疑问,我[在这件事情上]有罪,理当受到彻底批评。”但是,他哀求道: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应该明白我是对祖国无比赤诚的战士,是对列宁和斯大林政党忠心耿耿的儿子,是你们忠实的朋友和同志。你们愿意把我派到哪里,我就去哪里,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看着我吧,我会再工作十年,会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我的这些话都是发自肺腑的。^④

① 关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评论,斯蒂克,《贝利亚事件》,22,44—45。

② 莫洛托夫的评论,1953年7月2日,出处同上,29。

③ 关于引言,见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5日所作的评论以及苏联共产党关于贝利亚问题的最终决议,见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78—179,189;关于对东德和东欧的政策问题,见马克·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早期斗争与东中欧剧变:苏联决策的内外部联系(第3部分)”,《冷战研究杂志》1(1999年秋),3—66;哈里森,《把苏联逼入绝境》,34—48。

④ 贝利亚致马林科夫,1953年7月1日,奥斯特曼,《东德的动荡》,155—157。



几个月后，贝利亚受到正式审判。判决是预先决定好的。他没有律师，也没有上诉的权利。他背叛了祖国，试图恢复资产阶级。不久之后，警卫员绑住他的双手，撕掉他的囚服，用一块毛巾塞住他的嘴。他站在那里，身上只有一件内衣，还在不停申辩自己的清白，一名三星将军拿枪抵着他的头，一枪将他毙命。^①

逮捕并处决贝利亚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领导拒不考虑他的想法。安全顾虑和意识形态都不会允许他们背叛东德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意识到，苏联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仍需要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当马林科夫结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他再次说道，要是他们想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还有许多任务在等着大家。他说，他们必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敏感地对工人的要求作出反应，“日日关心苏联人民在物质水平上的进步，要牢记，关心苏联人民的利益是党最重要的职责”^②。

8月8日，马林科夫对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描述了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轨迹。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准则下设计了该政策。“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知道该如何领导人民以及该将人民带向何处，因为给他们领路的是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伟大的父亲和老师列宁，以及他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都高举了这样的旗帜。”过去，党特别重视重工业、燃料、能源和机床。不那样的话，祖国就会被攻击，革命就会被破坏，资本主义的包围就会得胜。但是现在非转变路线不可了。“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活资料生产方面进行彻底改变，保障轻工业和粮食产业更快发展。”国家没有能够刺激土豆、蔬菜、牛奶和肉类的生产，马林科夫承认道。住房情况糟糕，校舍也不够用，医院数量太少，许多企业经营不善且效率低下。必须要承认这些缺点，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制度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发掘。“我们力量的来源是工人、集体农场农民和知识分子无穷的活力和进取。我们有许多机会实现我们的主要任务——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稳步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马林科夫强调道，在研究国内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国际事务。他重申道，苏联及其民主盟友是向往和平的力量。克里姆林宫并没有领土需求。新领导人已经采取措施缓解与邻国——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和芬兰——的紧张状态。他们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最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暗中的运筹帷幄，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

① 克拉默，“斯大林继任的斗争”，第2部分，37；陶布曼，《赫鲁晓夫》，256—257。

② 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7日的闭幕词以及苏联共产党对贝利亚问题的最终决议，收录于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78, 190。



战协议。他说,他们还想有更多作为。他们希望解决德国问题。他们做好了会见其他大国外长的准备。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理由发生冲突”。“我们坚信,在国与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如今没有任何争议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从过去到现在,我们都支持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

但是,马林科夫也明确表示,苏联不会接受胁迫。一些美国人强调他们排除实力因素进行谈判的决心,然而美国之前一直希望保留核能垄断,但是没有做到。如今马林科夫自豪地宣布,苏联也有了自己的氢弹。“正如你们所见,在有力的事实面前,所有针对苏联弱点的说法都不攻自破了。”有关国力的措辞不应用来针对克里姆林宫。妥协和调解必不可少。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存在一个和平的机会。确实存在一个机会,马林科夫强调道,但这需要美国和苏联各自付诸行动。“万一在国际氛围中已经出现的缓和变成了加剧的紧张,那便是对人类的罪行。”美国应该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那就是已经有8亿人——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信仰社会主义。这些人“不可能放弃他们用血汗打拼来的历史成就”。

也就是说,尽管东德出现了镇压,贝利亚遭到了逮捕,美国人被认定要为铁幕的动乱负责,和平的机遇仍然存在。马林科夫和他的同事很清楚,他们在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和他们国家的安全都依赖于军备竞赛的缓和、德国问题的解决以及更平静的国际环境。他们将努力给和平一个机会。但是世界应当知道的是,“我们的事业是无往而不胜的。我们将会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信心百倍地前进”^①。

和平的机会?

东德的暴乱和贝利亚的被捕让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决定继续保持攻势,实施杜勒斯的“回滚”策略。在6月底7月初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们和同事反复思考近来一些事件的意义。杜勒斯认为俄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警惕”。他认为他们在德国的地位并不牢固,因而希望就德国的未来召开一次四国会议。杜勒斯的兄弟记述“驱逐贝利亚对俄国人民而言是个巨大的冲击”。杰克逊表示同意:这是“在整个集团中发展消极抵抗的良机”。他认为,利用克里姆林宫的骚乱制造混乱的时候到了,

^① 关于马林科夫在1953年8月8日的演讲,见《第19日的重要发言》(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1953年9月1日:679—691。



他还提交了有关引发卫星国动荡的心理主动和隐秘行动的详细计划。^① 他认为美国应该捣毁克里姆林宫所安排的傀儡政权,但又不能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要让自由世界尤其是西欧相信,“铁幕之下,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外族镇压的憎恨要比想象中更强烈,而对极权主义的抵抗也不像预料中的那样毫无希望”^②。

然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小心地揣摩了美国的反应。他们决定与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政府合作,在东柏林和东德发放粮食包裹。一直到8月中旬,有865000东德人涌向西柏林的中心收捡粮食,而到10月初已经发放了5500万个包裹。东德和苏联政府既为难又愤怒,拼命阻止粮食计划的运行,而那些组织前往西德的人则被没收了身份证件并遭受制裁。但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减轻了对东德经济的负担,撤销了赔款义务,并且同意参与四国外长会议,共同探讨德国的未来。^③

发生在东德的这些事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既让他们跃跃欲试又让他们备感清醒。美国在东欧的外交官警告道:“煽动起叛乱的抵抗因子可能会长期延迟苏联的军事撤退。”他们提醒在华盛顿的上级们,心理战的使用“不应该走在政治和军事政策之前”。除此之外,英国和法国担心粮食计划和心理进攻会引起一场危机,甚至可能引发苏联对西柏林采取行动。美国官员知道他们对东德和东欧的行动,应当被纳入应付后斯大林时代的整体评估。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该做什么。^④

从5月初杜勒斯向总统坦言忧虑时开始,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对冷战以来的国家安全政策进行极为系统的回顾。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的指导下,召集了三个特别工作组,描述各自的行动路线。在数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这些团队于7月16日的白宫全日会上阐述了他们的想法,出席该会的有总统和他最重要的顾问。

乔治·凯南领衔的A组认为,眼下的时机不利于自由世界。它提出了一个长期增强和维持美国军事能力的计划。回顾凯南在1947年和1948年所设计的遇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6月25日及1953年7月9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1953年7月10日内阁会议记录,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内阁系列,文件箱2。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158,“美国利用卫星国动乱的目标和行动”(“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Actions to Exploit the Unrest in the Satellite States”),1953年6月29日,收录于奥斯特曼,《东德的动乱》,332—334;米特洛维奇,《损害克里姆林宫》,132—134。

③ 奥斯特曼,《东德的动荡》,321—324。

④ 国务院准备的备忘录,1953年10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8:84;奥斯特曼,《东德的动乱》,325。



制政策, A 工作组希望在加强自由社会凝聚力的同时激起苏联集团内部的颠覆。其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力量, 使它撤出传统的俄罗斯边界”, 而又不用冒全球战争的危險。

陆军少将詹姆斯·麦科马克(James McCormack)为首的 B 组提出了美国如何在现存的苏联集团中划定最后界限。如果克里姆林宫或其朋友想要越过那条线, 他们就要冒全球战争的危險了; 如果共产主义者在“我们这边的线内”夺取政权, 美国就会保留和发展一定的手段, 采取任何必要措施, 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状态。但是 B 组不赞同周边战争的想法, 认为很浪费。

海军上将理查德·L·康诺利(Richard L. Conolly)所带领的 C 组认为, 美国“无法继续处于苏联的威胁之中。只要苏联存在着, 它就不会崩溃, 但是必须也能够将其搞垮”。康诺利和他的组员规划出了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如何采取进攻行动, 颠覆苏联集团并削弱苏联力量, 即便这些措施会提高总体战争的风险。^①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展示印象深刻。他说他从未参与过“更好或更有说服力的参谋班子”。他希望这三个特别工作组能够将各自的观点融汇成一个“统一的政策”。尽管各个工作组彼此间存在很大异议, 艾克相信他们各异的研究结果还要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彻底的讨论, 继而综合为一个全面的国家安全计划。^②

三个工作组的报告中有一点很惊人, 那就是没人关注任何和平的机会或向往缓和政策。7 月下旬, 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开展, 苏联阵营的混乱也愈发凸显, 人们更相信“胜利的风潮”即将来到。总统和他的参谋认为他们可以冒更大的风险, 因为苏联人看上去更为胆怯、更趋守势。美国甚至可能“采用 C 组所提出的对卫星国攻击性的措施, 这种方法相应提高了风险指数”。^③

但是他们的商讨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安全计划的开支将会超出预算。总统坚持认为, 国家安全必须建筑在健全的财政政策和国内经济的勃勃生机之上。7 月 14 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 当他听说 1955 财政年度不断攀升的赤字将超过 80 亿美元并需要国会提高负债限度, 他大声喊道: “我们正陷于一

① 关于被称为“日晷计划”——得名于白宫的日晷办公室,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这里设计出了该计划——的国家安全政策总体回顾, 见《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2: 323—328, 349—354, 360—366, 387—434; 另见“日晷计划: 特遣部队基本概念概要”(“Project Solarium: Summary of Basic Concepts of Task Forces”), 1953 年 7 月 30 日, 国家档案馆, 第 59 号记录组, 关于国务院参与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记录, 1947—1953, Lot 66 D 148, 文件箱 122。

② 备忘录, 卡特勒, 1953 年 7 月 16 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2: 397—398。

③ 备忘录, 卡特勒, 1953 年 7 月 31 日, 出处同上, 440—441。

个极大的麻烦中。”^①苏联的战略能力得到提高，本土防御的需求也更高了，而美国承担海外义务的能力则下降了。7月艾克任命新人负责军方工作，要求他们设想出新的想法和计划，让美国不用破产便能保证安全。^②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总统去了丹佛度假，而新的参谋长在8月2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呈交了他们所设计的计划，该会议由国务卿杜勒斯主持。那些参谋长提出要减少在海外的部署，着重于空军的战略能力和本土防御。这种态度在短期内花费很多，但从长远出发能节省下一大笔开支，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新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er Radford)说道。经过一系列研究和讨论，财政部长汉弗莱宣称这份报告“非常出色……这是1月20日以来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最终，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了一个全新且大胆的观念，而且还能确保财政上的稳健。汉弗莱难以克制内心的激动，坚持下一步就要取决于国务院了。

杜勒斯迅速认清这样的新观念将会对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欧洲。他承认该观念会在国内大受欢迎，但“如果我们没有充足时间就国外对此改变的公众舆论做好准备，后果将不堪设想”。新任陆军参谋部部长马修·里奇韦(Matthew Ridgway)将军说出了杜勒斯确实在思考的问题，这也加剧了国务卿的不安：北约的盟友一旦得知这样的计划，他们会“把这看作是一种抛弃，将会产生骇人的后果”。但是杜勒斯和里奇韦都无法忽视同事们显而易见的激动情绪。突然之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拥有了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欣然接受的新观念，承诺调和安全与经济，维持偿付能力，用新的减税政策鼓励共和党的选民。^③

卡特勒飞去丹佛向总统作了通报。艾克对此非常热衷，但是强调不要再说这些观点是新的了。他总认为向海外派驻大量美军只是暂时的。他同意要将保护本土不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7月14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另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陈述”，1953年6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379—380。

② 社论注解，《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394；罗伯特·J·沃森(Robert J. Watson)，《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1953—1954》(*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53—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6，14—21；理查德·M·莱顿(Richard M. Leighton)，《战略、财富与新面貌，1953—1956：国防部长办公室历史》(*Strategy, Money, and the New Look, 1953—1956: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2001，65—204。

③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8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443—455；关于汉弗莱之前对战略计划的批评，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7月14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另见沃森，《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政策，1953—1954》，17—21。



受突袭作为最优先考虑的内容。当卡特勒提到杜勒斯的忧虑, 艾克表示他非常希望听听国务卿的想法。艾克对苏联氢弹的最新消息非常关心, 这一点强化了他对本土防卫的担心, 也强调了要避免战争的发生。他想要知道“我们究竟怎样才能将一只动物赶过层层铁笼”^①。

杜勒斯决定迅速与总统当面谈谈。9月6日, 他花了几小时飞到国家的另一边, 与他的老板进行了讨论。杜勒斯很理解对经济和本土防御的需求, 还有对“预算平衡和货币稳定的需求,” 他说道。他明白美国盟友的顾虑, 因为苏联拥有氢弹。但是, 他说,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推行的新战略观念将会加强这些恐惧, 再度让盟友认为美国要回到过去的孤立主义时期了。

美国在经济、战略、外交政策上充满分歧的需要该如何兼容并蓄呢? 杜勒斯向总统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彻底颠覆了他自己过去的倾向。他承认, 或许已经是时候发掘“一些可能性, 利用好这一机会, 在全球的基础上努力缓解世界的紧张局势……红军部队和美军部队双方都实行撤退……该计划包括了军备限制和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为了不让总统感到国务卿是在全盘否定过去的思想, 杜勒斯表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美国可以从实力角度进行谈判: 朝鲜停战协议已经签定; 在美、英秘密行动的帮助下, 伊朗的过激政府被推翻; 阿登纳在西德选举中刚刚赢下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法国似乎愿意继续在印度支那迎战越南共产党。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和平的机遇, 那么现在便是时候了, 他说道。^②

艾森豪威尔予以支持。“我坚决同意,” 他在杜勒斯返回华盛顿后致函, “应该进一步努力在全球基础上缓解世界局势。提出红军和美军的双方撤退, 可以作为缓解紧张的一个步骤。”同时, 美国人应当了解他们所生活着的世界更为危险了, 因为俄国人已经研发出了氢弹, 空军的战略力量也更强大了。美国要想建立威慑力量、保卫本土安全, 需要的花费的可能比之前设想的要多; 税减也可能必须延后。这样的折衷痛苦且艰难。反复思考不容乐观的形势之后, 总统推测道, 如果国家必须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继续承担巨大的国防负担, 可能只有求助于预防战争或是接受“某些形式的独裁政府”。但是艾克鼓励杜勒斯继续前进, 并注意是否有机会推动“安抚和理解的事业”。艾克知道杜勒斯之前就一直很想去丹佛找他, 他非常感谢杜勒斯, 正是因为他,

① 备忘录, 卡特勒, 1953年9月3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2: 455—457。

② 备忘录, 杜勒斯, 1953年9月6日, 出处同上, 457—460。



才有了回顾“急需研究、考虑和实行的重大国际问题”的机会。^①

有理智的人需要探究是否有和平的机遇。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已经开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了。过去六年中,规划人员在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的带领下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尊重。如今,身为参谋部最出色成员之一的路易·哈利表示,忽略克里姆林宫内部发展的意义将会是个错误。未来当然是未知的,美国也需要增强实力,但是再进一步施行强权的同时应该口气更缓和。“以苏联当前的(暂时)状态,我们很可能觉得自己能干,如果我们明智地行动,通过协商从莫斯科获取相当的让步,而我们自己这边就能作出相对少一点让步了。”^②

最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德国的将来。“这是问题的中心,”杜勒斯手下的政策制定者写道,“德国国力和资源的规模在平衡状态中都具有决定性,坚决抵抗其中任何方式的转变只会导致失败。”然而,要想看到紧张关系的缓和,只有等到冷战对手同意建立一个统一、中立、和平的德国,能够确保苏联和美国军队从欧洲的心脏顺利撤退。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可能会结束,分离了欧洲的铁幕也可能消失。只要能解决德国问题,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军力,就能省下一大笔钱,预算危机也能平缓了。^③

尽管政策制定者已经竭尽所能,他们还是无法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统一、中立的德国既不能缓解紧张,也不能提高美国的安全。目前,西德正在实行民主政治。和魏玛共和国不同,艾森豪威尔在给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的信中说道,“波恩政权已是根深蒂固……民主政权和共识的力量已迅猛发展。”^④但是德国政治的发展轨迹仍不明朗。“民主政治的设立,”有关德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谈到,“需要接受真正的考验。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心中存在着失调、不满的因

① 艾森豪威尔致杜勒斯,1953年9月8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460—463。

② 哈利致鲍伊和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1953年7月27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 42; 埃德蒙·A·格利昂(Edmund A. Gullion),“利用苏联局势的原则和艾森豪威尔总统4月16日演讲的后续”(“Principles for Exploit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Follow-Up of President Eisenhower’s April 16 Speech”),出处同上;罗斯托致杰克逊,“对美国政策的一些说明”(“Some Notes on American Policy”),[未标注日期],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6。

③ “与苏联人在欧洲的可能和解”(“Possible Accommodation with the Soviets in Europe”),1953年10月3日,[无签名],包含于鲍伊致杜勒斯,1953年10月3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 43; 另见列昂·富勒(Leon Fuller),“苏联与西方在同意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姿态方面的可能协议”(“Possible Soviet-Western Agreement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Power Position of a Unified Germany”),1953年7月21日,出处同上,文件箱42。

④ 艾森豪威尔致约瑟夫·拉尼埃,1953年9月20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4:527—528。

素, 压力状态下可能会表明政治上的不可靠。”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詹姆斯·科南特 (James Conant) 提醒杜勒斯: “德国的基本政局太不稳定, 德国的政府结构过新以至于无法信任, 军队的最终控制权会落入将来未知的德国领导人手中。”^①

因此德国必须要做到统一, 要与西欧的共同体关系密切。艾克提醒拉尼埃, “对德国迅速摆脱西欧统一体发展实力的恐惧”是最坏的可能。^② 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会设法对付冷战对手, 满足自己的目的, 或者更糟的是, 倒戈转入苏联几天。这样的局面极为可怕, 因为德国军力对于西欧防御和北约联盟的成功运作都至关重要。参谋长联席会议严厉警告道: “任何组织德国重整军备及与西方结盟的意见在军事上都是不可接受的。”^③

在经过仔细评估之后, 美国官员总结道, 他们必须努力让德国融入西欧——希望整个德国都包括在内, 但最起码得做到西德的融入。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支持德国的团结, 因为德国人希望如此。如果华盛顿被看作是反对统一的, 那么美国在阿登纳政府眼中的相对地位就会下降。但是统一的必要条件是在德国的东西部都进行自由选举, 而不是像克里姆林宫所希望的那样, 合并现有的东德和西德政府。^④

美国官员知道他们所处的立场不可能解决德国问题。苏联人想要通过要求德国统一和一项泛欧洲安全协定来煽动北约盟国的分裂, 他们害怕德国的力量, 绝不会接受投向北约的统一德国。“带着对德国最近侵略的记忆,” 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 “苏联无疑非常惧怕德国军事力量的重起, 那样对其安全是一大威胁。”俄国人不可能放弃他们在东德的地位, 否则他们就无法得到萨克森的铀资源, 还会导致所有卫星国的独立行动。“简而言之,” 政策规划参谋部总结道, “只要欧洲仍是竞争的战场和战争的温床, 德国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德国作为各国势力的交集之地, 有着无与伦比的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0/1, “美国对德国问题的立场”(“United State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1953年8月17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7:511; 富勒致比姆和鲍伊, 1953年11月20日, 国家档案馆, 第59号记录组, 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43; 詹姆斯·科南特致杜勒斯, 1953年10月28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7:551—552。

② 艾森豪威尔致拉尼埃, 1953年9月20日, 加兰博斯, 《艾森豪威尔档案》, 14:528。

③ 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 见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 1953年9月30日, 国家档案馆, 第330号记录组, CD 350.05(欧洲), 文件箱29;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 见国家安全委员会 160/1, “美国对德国问题的立场”, 1953年8月17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7:515; 另见“与苏联人在欧洲的可能和解”, 1953年10月3日, 国家档案馆, 第59号记录组, 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42。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0/1, “美国对德国问题的立场”, 1953年8月17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52—1954》, 7:510—520。



重要地位,仅有的解决方法似乎便是依东西方在该地区的缓和而定。”^①

总之,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令德国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德国在这个体系中是如此重要的单位,其未来发展又毫不确定,美国不会做任何危及将德国吸纳入西方联盟的事情。这样的谈判姿态可能会让冷战拖延下去,但是这样总比拿将来的稳固冒险要好。中立的德国其实并不能为人所接受。

第三世界——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动荡也没有尘埃落定。“动乱的力量和对西方的厌恶情绪都非常强烈。”总统的高级顾问们都这么认为。“这些来源包括了种族情感、反殖民主义、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社会经济快速进步的普遍要求、人口过多以及固定社会模式的崩溃。”^②共产主义思想,C·D·杰克逊写道:“且不论苏联制度中所有现实生活证据——还是对许多制度之外的人有显著吸引力。”^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同意这一点。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

民族主义正在发展中,世界共产主义正在利用民族主义的精神,以引发自由世界的纠纷。莫斯科让许多受到误导的人民相信,他们能够依靠共产主义的帮助,获取和维持民族抱负。而实际上,共产党正寄希望于利用现存关系的破坏所导致的混乱……促进其世界革命的目的以及克里姆林宫对所有人民的统治。^④

不能用和平的机会冒风险,因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会被中国或苏联共产党占有。在上任后的最初几个月中,艾森豪威尔都对伊朗颠簸不断的局势不胜担

① 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评估,《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7:513;关于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观点,见“与苏联人在欧洲的可能和解”,1953年10月3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 42;另见列昂·富勒,“一个全德国人政府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an All-German Government”),1953年8月13日,出处同上;比姆致鲍伊,1953年9月22日,出处同上,文件箱 43;鲍伊,“安顿的基础”(“Bases for Settlements”),1953年10月3日,出处同上;富勒,“苏联的安全概念”(“Soviet Concept of Security”),1953年7月17日,出处同上,文件箱 42。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2/2,“国家安全基本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587。

③ 总统的国际情报行动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致总统的报告”“Report to the President”,1953年6月30日,10,19,27—28,国家档案馆,第273号记录组,总统文件,文件箱 1。

④ 关于引言,见费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223;另见如艾森豪威尔致玛格丽特·温切斯特·帕特森(Margaret Winchester Patterson),1953年6月15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4:293;关于杜勒斯,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6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377。

忧。在德黑兰,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ad Mosaddeq)总统是一个亲民的、富于魅力的领导,他曾于1951年将英属的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收归国有。当伦敦加紧对他的经济压力时,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摩萨德似乎开始依赖于信奉共产主义的图德党(Tudeh Party)。艾森豪威尔担心摩萨德会受到共产党的控制,而伊朗的石油资源也会落入苏联手中,他便决定于1953年7月11日批准一份精心策划的英美秘密行动,目的在于推翻伊朗领导人。结果这一密谋成功了。摩萨德遭到关押,之后受到软禁。数千名他的同事和支持共产党的人都被逮捕,一些人还被处决了。到1954年底,沙·雷扎·巴勒维(Shah Reza Pahlavi)领导下的独裁政府唯美国的马首是瞻。伊朗石油也处在一个新的跨国联合企业的管理之下,其中美国企业有着突出的影响力。“一年前,”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11月写信给他的兄弟埃德加,“我们处于失去伊朗和已知的世界60%石油储备的极度危险之中……那个威胁即便没有完全消除,也消除了绝大部分了。”^①

伊朗秘密行动的成功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受到鼓舞,希望在其他地方也能用上相似的战术。在危地马拉,一个以雅各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为首的改良主义政府引进了一项减少税收和改善土地的改革,这一改革威胁到了美国公司尤其是联合水果公司在那个国家的一些子公司。阿本斯与左派人士合作,让共产党在政府任职。他希望将社会公正、经济增长和独立自主作为危地马拉最首要考虑的事项,并且不受美国的干预。路易·哈利写道:

这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现在正经历着我们这个时代欠发达国家特有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是两个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都见到过相同的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不是危地马拉社会革命的起源,但它在那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它在别处也促进了革命的推动力——民族主义和社会改革很相似——利用这些为其所用。^②

① 艾森豪威尔致埃德加·牛顿·艾森豪威尔(Edgar Newton Eisenhower),1954年11月8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5:1387;一些关于分析摩萨德垮台的优秀论文,见马克·J·加舍罗斯基(Mark J. Gasiorowski)和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编),《穆罕默德·摩萨德与1953年伊朗政变》(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锡拉丘兹,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② 备忘录,哈利,1954年5月28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4:1140—1141。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无法忍受邻国存在这样一个政权，尤其是当美国对从苏联来的武器装备和军用供给进行抵制时，阿本斯公然表示反抗。1953年12月，他们动用300万美元进行推翻他的秘密行动，到1954年6月付诸行动。和摩萨德一样，阿本斯被颠覆了。^①

艾克和助手认识到，莫斯科和北京并不为这些第三世界的革命性民族运动负责，这其实是落后、殖民和帝国剥削的产物。看过印度支那的情况，政策制定者承认，胡志明的部队虽是由共产党领导、受到民族主义的激励，但“只受到过中国共产党极少量的帮助”，就从法国手中赢得了地区的控制权。胡的政治组织越盟在二战时曾与占领印度支那的日军对战，战后便在越南组织起了一个独立政府，而巴黎的官员拒绝承认其合法性。为了得到对越南的控制，越盟从1946年起就与法国进行抗争。艾克的助手认为，如果进行选举，胡获选不是因为外部的协助，而是因为当地人的支持。这一结果被看作不可接受。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总结道，只有摧毁越盟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作为“美国在印度支那达成目标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别无他选。^②

这些官员认为打击东南亚和中东的革命民族主义非常有必要，因为对于日本和西欧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生机而言，那些地区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是不可或缺的。不靠这些资源，美国也能对付得过去——尽管总统并不这么认为——但是美国的盟友肯定不行。比如说，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成功会鼓励所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和苏联合作，“同样还会鼓励日本的政治趋势偏向迁就”。没有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和原材料，日本和西欧可能就会落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世界力量的平衡就会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方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总结道，失去东南亚会“使日本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那么日本就很难不向共产主义妥协了”。总统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强调道：“务必要保证日本不落入铁幕国家的统治，或者说尤其是克里姆林宫。如果克里姆林

① 尼克·卡拉瑟(Nick Cullather),《秘密历史:中情局对危地马拉行动的机密报告,1952—1954》(*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1954*),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皮尔洛·格雷杰西斯(Piero Gleijeses),《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1944—1954》(*Shattered Hope: The Guatemalan Revol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4—1954*),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斯蒂芬·G·拉布(Stephen G. Rabe),《艾森豪威尔与拉丁美洲:反共的外交政策》(*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42—63。

② 关于印度支那,见富勒,“远东问题的解决”(“Settlement in the Far East”),1953年10月3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 文件箱 43;关于中东,见F·威尔金斯(F. Wilkins),“问题:如何在中东建立势力范围”(“Problem: How to Create a Position of Strength in the Middle East”),1953年9月17日,出处同上,文件箱 65。

宫控制了它们,所有进行战争的巨大能力就要调转矛头指向自由世界了。”^①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想要找出哪些因素符合缓和政策,但是实在很难想象满意的和平期限。由于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仍狂热地信仰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要想与他们达成协议,危险似乎要超过可能的好处。尽管他们也似乎想要缓和紧张局势,但他们可能会利用竞争中的任何间隙将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纳入其轨道,或者破坏那些拥有重要原材料的国家,或是处于东南亚、中东、甚至中美洲战略性地位的国家。冷战代价高昂且越来越危险,核战的可能性也有所上升,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态势都对和平的机会产生了不利影响。^②

1953年10月底,艾克和顾问在确定一份国家安全政策声明时承认,克里姆林宫可能在寻求紧张局势的缓和。然而,到那时为止,马林科夫始终都没有表示“准备好就此作出重要妥协”。苏联统治者仍然将他们的政策基于“坚信苏联集团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敌意不可协调”。他们的基本目标不变:巩固并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最终夺取“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统治权”。^③

因此,美国需要准备好赢下冷战。三个特别工作组的想法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观念结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策略,确认了战略性优势、威慑、遏制,以及经过精心计算的、稳妥的反击。美国必须要有一个强硬的军事姿态,“将重点放在是否有能力对显著的侵略性国家实行大规模报复性破坏”。在苏联的影响范围之内,美国不应该冒全球战争的风险,而是应该采用“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手段,为苏联制造和发掘出棘手的问题,离间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恶化在卫星国的控制,阻碍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发展”。美国的总体目标是防止苏联的侵犯,结束苏联对其他

① 关于政策制定者的引言,见F·威尔金斯,“在远东的区域群集中增强实力”(“Building Strength in Regional Groupings in the Far East”),1953年9月18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档案, Lot 64 D 563, 文件箱 65;另见“远东问题的解决”[无签名],1953年10月3日,出处同上,文件箱 43;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引自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变样的国家:美国与被占领的日本》(*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Occup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97;关于艾森豪威尔对日本重要性的认识,见社论注解,《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4:1663;内阁会议备忘录,1954年8月6日,出处同上,1693—1695;关于艾森豪威尔如何看待世界工业中心与欠发达周边之间的互相联系,见艾森豪威尔致乔治·阿瑟·斯隆,1952年3月20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3:1097—1099;另见艾森豪威尔致道格拉斯,1952年5月20日,出处同上,1229—1230;“要点概述”(“Summary of Points”),1953年7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433。

② 除了之前的注释引用,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10月1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 4。

③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2/2,“国家安全基本政策”,1953年10月30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579, 584。



国家的统治,建立一个拥有相应保卫措施、有效进行军备控制的政权。^①

美国不应该忽略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协议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顾问总结道,但是这些协议必须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② 否则的话,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更愿意利用美国在实力上的优越性赢得冷战,而非探究一些可能会被证明危险的事务。^③ 比起一个统一的德国,艾森豪威尔更希望将西德纳入西欧,他相信一个自立的联邦共和国能够吸引东德人和东欧人向西方靠拢。比起接受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更希望笼络或颠覆革命性的民族运动。

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可能时间并不站在共产党那一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凭借优势国力,美国能够冒险得到它所向往的那种世界;这些危险比那些紧张的缓和中固有的危险还要显见。杜勒斯告诉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必须制止苏联的扩张,“甚至冒战争的风险”。政府的“最新”战略以边缘政策和报复行径为基础,能帮助美国在危机中占上风。如果苏联人想要选择战争,就让他们做去吧。杜勒斯认为他们不会那样做。他认为他们会像过去那样打退堂鼓。^④ 国务卿摆脱了近来的悲观,他在10月1日告诉同事,最新迹象显示美国即将在冷战中获胜,而克里姆林宫也知道这一点。美国因此必须要做到随机应变,态度强硬,充满胆识,同时又要小心谨慎。美国必须在西德和西欧建立势力范围,抑制苏联在东南亚和中东的扩张,寻找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弱点,但又不引发战争。它能够不进行热战便赢下冷战。^⑤

但是总统所承受的压力并没有停止。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他不能让和平的机会溜走。马林科夫和他的同事在开展一场持久的和平运动。俄国人将自己标榜为裁军的拥戴者,始终都在设法避免一场核灾难。对于那些成长在战火之中、熟悉水深火热生活的人民,他们的宣传起了不可忽视的效果。在这场围绕人心的斗争中,艾克不希望让克里姆林宫抢下高地。

丘吉尔首相也不希望总统放弃这一和平机会。自从斯大林死后,丘吉尔就一直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2/2,“国家安全基本政策”,1953年10月30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 578—595,引言见于 582,591—592,595。

② 出处同上,594—595;另见1953年10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出处同上,514—534。

③ 关于强调赢得冷战,另见肯尼思·奥斯古德,《全面冷战: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外的秘密宣传战》(*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劳伦斯:堪萨斯州大学出版社,2006。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6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374,377;“对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评论”(“Review of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年9月30日,出处同上,494。

⑤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10月1日,艾森豪威尔档案,安·惠特曼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文件箱4;杰克逊致艾森豪威尔,1953年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50。



想要达成缓和,还主张与苏联新领导人举行峰会。他想春天时候前往华盛顿,说服艾森豪威尔同意这一计划,但是他们都日理万机无暇抽身,之后丘吉尔就突然中风了。他康复之后继续就此进行努力。^① 12月初,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以及他们的高级顾问终于在百慕大会面了,席间还有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和外交部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

12月4日,在百慕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强调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存在新的苏联姿态”?他认为是的。美国的实力和苏联的经济抱负“很可能会导致俄国政策发生切实的改变,还会使决定他们将来几年行动的观点有所变化”。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丘吉尔告诫道,但是“我们还是要确定不能太轻率地拒绝考虑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莫斯科已经出现了新的部署。^②

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顾问认定克里姆林宫的心态没有改变。艾克表示,在崭新的“裙子”之下还是“那个过去的女孩”。“沐浴、香水、蕾丝”都没有改变她。简而言之,“他看待这个问题时还是认为苏联无所不用地想要摧毁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这一点始终未变”。^③

比起讨论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更希望在欧洲进一步站稳脚跟,并且支撑住东南亚的薄弱形势。他们坚持认为,欧洲防务集团必须得到认可。比多解释了为什么这一认可困难重重,为什么让西德发展新军队对于法国而言难以忍受,以及为什么将西德部队并入欧洲军队会导致负面后果。杜勒斯倾听了他的解释,但并没有让步。他表示,俄国人的威胁,以及一些其他的因素,使法国和德国必须要解决他们“由来已久的争执”。“如果无法在不久的将来采取实质性的措施,修补多年来撕裂了西方文明心脏的裂缝,”杜勒斯警告道,“就不可能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也不会继续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丘吉尔表示支持杜勒斯。他告诉比多,法国没有办法阻止西德军队直接或间接地融入北约。这个道理很简单:西德的军力是用来保

① 关于丘吉尔的努力,见博伊尔,《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的通信》,30—110;克劳斯·拉雷斯,《丘吉尔的冷战:私人外交政治》(*Churchill'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iplomacy*),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2,189—317。

② 政府首脑三方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First Plenary Tripartite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1953年12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3,5:1758—1759。

③ 出处同上,1761;关于百慕大会议的背景文件,见鲍伊,“对苏联立场的分析”(“Analysis of Soviet Positions”),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文件箱43;鲍伊,“美国政策大纲”(“Outline of U.S. Policies”),1953年12月2日,出处同上。

卫西欧的；西德必须要融入西欧；德国军队必须要为西方文明所用。^①

此外要在亚洲站稳脚跟。再也不能忍受共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了。就在百慕大会议之前，艾克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一致同意，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通过非战争的手段降低“共产主义中国在亚洲的相对实力地位”。^② 杜勒斯向丘吉尔和比多坦言，如果朝鲜的休战协议失败了，美国就会直接打击中国，甚至可能使用核武器。^③ 同样，如果中国要介入印度支那的事务之中，中国自己的政权也将面临报复行为。^④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法国必须在印度支那获胜，因为对“自由世界”的保卫正处于紧要关头。美国、英国和法国要“同心协力，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⑤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离开百慕大时感到有些沮丧，一方面是因为丘吉尔对克里姆林宫新领导人的怀柔处理，一方面则是比多在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但艾森豪威尔立刻前往纽约，发表了他的总统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演讲之一。他知道他必须与克里姆林宫的和平运动抗争，深切地希望能够避免战争；他知道他已经在国际舆论中抢得先机，因而美国便能凭借自身实力进行谈判。^⑥ 他还知道麦卡锡议员的反共运动——他攻击国务院官员所谓的不懂，他调查那些拥有由共产主义者或“同党”所撰写的书籍的美国图书馆，他不断指控一些名声好的公务员的信仰和行为——这些都破坏了美国在国外的形象，还致使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活力产生怀疑。^⑦ 艾森豪威尔需要向世界展示，美国在技术上的优越性能够用来改善贫穷的生活条件；其自由商业的制度可以带来和平，而非战争；其价值观可以带来自由，而非镇压。

1953年12月8日，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契机，能够让这么多人聚集到同一个组织中，这就是联合国。”但是世界和

① 关于百慕大会议上对欧洲防务集团问题的讨论，见《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5：1770—1771，1780—1782，1796—1804，1835—1836，1843。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 166/1，“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U. 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5，14：281。

③ 政府首脑会议第二次有限会议（Second Restricted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Government），1953年12月7日，出处同上，5：1810—1813。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部在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政策上的研究，1953年11月6日，出处同上，14：303—304。

⑤ 百慕大会议公报，1953年12月7日，出处同上，5：1839。

⑥ 关于艾森豪威尔动机的相似但更为批判的说明，见奥斯古德，《全面冷战》，153—180；艾拉·切诺斯（Ira Chernus），《艾森豪威尔的和平原子弹》（*Eisenhower's Atoms for Peace*），柯利奇站：德克萨斯 A & M 出版社（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Press），2002。

⑦ 杰夫·布罗德沃特（Jeff Broadwater），《艾森豪威尔与反共圣战》（*Eisenhower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2，54—136。

平与人类尊严的希望受到了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危险。核能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美国的兵工厂日益扩展。其中的武器储备“几倍于二战中所有战场上所有飞机和枪支中发射的弹药总和”。但是这并没有让总统满意。他不希望看到“两大核武器巨人在一个震颤的世界中举头怒目相对的无望结局”。

华盛顿想要的是协议, 而不是战争; 美国人想要的是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立。既然苏联已经为一场会议造就了多个先决条件, 美国、法国、英国和苏俄的外长就能够会聚一堂, 讨论德国和奥地利、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了。但是总统想要的不只是这些。他宣布美国愿意私下与关键国家会见, 讨论核能军备竞赛的解决方法, “这个问题不仅为和平带来了阴影, 还会影响到世界的生存”。他不单单想要减少或消除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材料, 他还提议: “主要涉及的政府能在尽可能谨慎的条件下”, 从他们的核能储备中抽出部分贡献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该机构将在联合国的支持之下建立, 其主要任务为“想出办法让这种可裂变的材料……服务于人类对和平的追求”。通过贡献“用于和平的核能”, 美国和苏联就能处于一个共同的事业中, 可以建立起信任, 并向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强烈愿望更进一步。^①

军备控制, 德国和印度支那

俄国人似乎对此颇有兴趣。1954 年新年伊始, 马林科夫总理发表声明, 向美国人民给予祝福, 并对和平发出召唤。“值此新年之际, 我相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碍苏美关系的进展或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巩固。”他补充道, 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此协议比其他任何事都要重要, 这可以帮助达成“对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理解, 以及建立对禁止军用核能使用的严格国际管制”。除了这些, 还要就其他裁军方面的内容进行磋商。他总结道: “毫无疑问, 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减少国家在军事需求上的开支, 并能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马林科夫示意道, 苏联最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改善国内的生活条件, 因而缓解紧张局势意义非常。^②

苏联人已做好了会谈的准备。几天后, 格奥尔基·扎鲁宾大使与杜勒斯会面, 前者表现得既积极又谋求和好。他的政府希望能合作, 而他自己的工作便是改善关系,

① “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Addres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1953 年 12 月 8 日, 《总统公开文件: 艾森豪威尔, 1953》, 813—822。

② 马林科夫答一名美国记者, 1954 年 1 月 1 日, 收录于丹尼斯·福利奥特(Denise Foliot)(编), 《国际事务档案, 1954》(*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7, 263—264。



他这样说道,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提议还不够彻底。^① 该提议没有禁止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实际上,这对终止军火库的升级毫无用处。即使少量的核材料受到国际机构的掌管,武器的数量还是可以上升。还需要更进一步,为和平冒更大的风险;克里姆林宫愿意拓展更多的角度。^②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没有准备就禁止使用和拥有核武器进行严肃谈判。事实上,当时他们已经对基于大规模报复能力的“最新”战略姿态达成了一致。总统不会在明明可以预防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也可以想象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最终灾难。^③ 但是目前,他的战略政策依赖于报复和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的能力。“由于我们无法让美国继续成为武装营或军事体制国家,一旦被卷入战争之中,我们必须做好利用原子弹的计划。”艾森豪威尔说道。^④

总统和杜勒斯认为,美国的战略武器所投射出的阴影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为了他们对苏联周边国家的遏制政策,也是为了西欧和美国本土的防御工作。这是战略分析人员谈到进一步威慑时所提出的。结果就是美国不能禁止核武器。“尽管我们完全做好准备倾听他们任何可能的谈话内容,”杜勒斯对总统强调道,“但我们并不想与苏联单独讨论对核武器的取消或控制。”艾森豪威尔表示赞成。那么,总统有关联合国的提议也就没有后续了,与俄国人也不存在重大会晤了。^⑤ 信任是军备控制的先决条件。

要想建立信任,苏联官员必须要表现出友好。他们对德国的态度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杜勒斯在 1954 年 1 月底出席了在柏林召开的外长会议,他认为俄国人不会

① 会谈备忘录草案,列文斯通·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1954年1月1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1335—1336。

② 俄罗斯政府申明,1953年12月22日,收录于福利奥特,《国际事务档案:1953》,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122—125;俄罗斯政府公报,1954年1月6日,收录于《国际事务档案,1954》,263—264。

③ 艾森豪威尔致杰克逊,1953年12月31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1321—1322;国务卿会谈概要,1954年1月6日,出处同上,1325—1326。

④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3年12月3日,出处同上,2:805—806;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会谈,1953年12月5日,出处同上,5:1768。

⑤ 白宫会议概要,1954年1月16日,出处同上,2:1342—1343;另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4年2月26日,出处同上,1364—1365;关于未见的后续,见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危险与幸存:过去50年间关于炸弹的抉择》(*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Past Fifty Years*),纽约:兰登书屋,1988,293—295;关于艾森豪威尔对于真正裁军的反感,见艾拉·切诺斯,“运作的公平:恐惧、信念与弹性”(“Operation Candor: Fear, Faith and Flexibility”),《外交史》29(2005年11月):791—792,804;奥斯古德,《全面冷战》,153—189。



以美国可以接受的程度赞同德国的统一。^①然而从会议开始的最初几天,令美国代表团团员备感意外的是莫洛托夫的亲切友善和苏联外交家们的明显善意。这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外交部长会议,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似乎决意要让会议圆满召开。苏联的外交官们——甚至习惯于沉默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都热切地想让美国看到他们“试图为国际关系带来平静的远景”^②。俄罗斯人邀请美国代表团在苏联高级委员的府邸用餐。根据C·D·杰克逊的记录,莫洛托夫的幽默中带着敏锐和精妙。另一名美国外交家写道,他“说话时并不张扬,极力营造一种友好的形象”^③。

但是莫洛托夫在整个会议中所谈的内容令美国人心怀不满。从开始几天一直到结束,他都在强调德国军事力量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后果,不赞成美国代表欧洲防务集团进入北约。“众所周知,德国的军国主义导致了一战和二战。苏联人民无法忘记自己和其他国家人民所经历痛苦和牺牲……将德国吸引入欧洲防务集团不仅会阻碍德国的国家团结,还会在欧洲增加新的世界大战的风险。”莫洛托夫坚决认为,苏联要预防德国军国主义的再生,还要避免另一场战争,为此“感到责任重大”。^④

莫洛托夫在私下里说的话与他在公开场合的说法别无二致。柏林会议结束后,他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事进行汇报,他扼要地再述了杜勒斯是如何反复提及要将全德国的自由选举作为统一的前奏,这一想法是他全盘拒绝的。他说,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关于自由的言论都真的意味着自由。一些人想要的是给予军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特权的自由。他回忆道,希特勒也是通过自由选举的方式当权的。苏联是纳粹进攻最大的受害者,不能也不会容忍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⑤

莫洛托夫的陈述反映出了克里姆林宫中德国问题专家正在准备的报告,报告中

① 备忘录,杜勒斯,1954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杜勒斯档案,白宫备忘录系列,文件箱1(与总统的会议,第4文件夹)。

② 备忘录,波伦,1954年1月28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7:854—855。

③ 会谈备忘录,1954年1月29日,出处同上,880—885;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2月1日,出处同上,916—917;备忘录,杰克逊,1954年2月22日,出处同上,1215—1216。

④ 关于莫洛托夫演讲的报道,见美国代表团致国务院,1954年1月25日与1954年2月2日,出处同上,815,913—916。

⑤ 莫洛托夫的申明,收录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官方档案》(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41—1990”(“Plenum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90”),第2集,目录1,组号77(“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11次会议速记未修改记录”),1954年3月2日,36—38,拉蒙特图书馆,缩微复制,A1059,哈佛大学(此后引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41—1990”)。



无比详细地描绘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们用大量统计数据显示西德煤钢生产的增长。苏联专家断言道,西德人正在发展工业设施,以生产满足北约和欧洲防务集团战略需求的武器。尽管禁止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苏联人认为西德的科学家正在研发细菌战的方法。他们还在建造战略性路线,恢复他们的造船业,并且制造军舰。据说他们有建造鱼雷艇、小型巡洋舰潜水艇、油船、甚至航空母舰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一面美国的旗帜下启航。^①

东德代理部长在 1953 年的年度报告中就相似的发展作了总结,特别强调了集结一支德国军队的准备工作,他还与纳粹时期进行了诸多比较。他宣称,阿登纳的新内阁中有四名西德部长是前纳粹分子。他们正准备着将这个国家军事化,或通过欧洲防务集团,或直接进入北约,将西德紧密地安置在西方联盟的结构中。德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还包括了许多前农民、小资产阶级者、移民、前法西斯士兵等,所有这些都缺乏阶级意识,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报告断言道,总而言之,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国内外事务中寻求更多的独立,无论欧洲防务集团是否在法国得到认可,他们都支持建立军队。阿登纳决意要让德国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西方强国也决意要用自己的方式求得统一。此外,他们还在极力颠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②

意识形态和回忆在形成苏联对德国发展的认识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莫洛托夫解释道,美国人一心引领帝国主义阵营。他们追求世界霸权。为了这一目标,他们建立了类似于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北约。美国官员从实力角度出发,渴望得到更为强大的实力,即便这意味着恢复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一旦西德军队增强了兵力,莫洛托夫坚称,希特勒式的将军就会成为领军人物,进行侵略性的报复。他说,华盛顿和波恩无疑在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这没有其他含意。”^③

① 西德经济信息公报(Bulletin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on West Germany),第 6 号与第 7 号,柏林:苏联驻德高级代表机构(Berlin: Apparatus of the High Commissar of USSR in Germany),1953,收录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官方档案》,“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1953—1966”,第 5 集,目录 30,组号 35(“苏联部长会议中央委员会决议草稿,西德经济信息公报,等等”),66—191,拉蒙特图书馆,缩微复制,A1046,哈佛大学。

② 《1953 年德国经济政治局势》(*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Germany in 1953*),柏林:苏联驻德高级代表机构,1954,收录于《俄罗斯当代历史官方档案》,“苏共中央委员会总部与国外共产党关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1953—1957)”,第 5 集,目录 28,组号 53(苏联驻德高级代表机构对 1953 年民主德国经济政治局势的报告),1—151,拉蒙特图书馆,缩微复制,A1050,哈佛大学。

③ 关于引言,见申明,莫洛托夫,1954 年 3 月 2 日,收录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41—1990”,第 77 号,22;另见 13—19,36—37,56—59。



为德国政治发展感到焦虑的并不仅仅是俄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一样忧心忡忡。没人能肯定德国民主的将来究竟会怎么样。正如政策规划办公室的一名分析员在柏林会议召开前不久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打交道的的是一个[在德国]不稳定的社会，一个尚未成形的政治团体，一个带有强烈目的性却又不知最终方向为何的民族……波恩共和国表面上令世人印象深刻，但表象之下是一派波涛汹涌的景象，很可能危及其稳定。”^①这更凸显出将西德纳入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性，因为这样就能结合德国的力量，帮助发展德国民主。

但是苏联是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的，对这样一个共同体并无信心，因为他们认定整个资本主义阵营都怀有敌意。莫洛托夫向同僚解释道，他在柏林会议上的目的在于挫败西方对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支持一个中立德国的统一，呼吁进行全欧洲安全条约的谈判——旨在遵守克里姆林宫新领导的共同目标：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又不屈从于西方的要求。此外，他很高兴地汇报说，美国人希望参与另一个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讨论困扰着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在这个会议中，美国官员将会与来自北京的代表进行协商，尽管他们并不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合法性。^②

尽管莫洛托夫对柏林会议的结果很满意，美国官员也并没有气馁。C·D·杰克逊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杜勒斯的“强有力外交”挫败了苏联的每一步措施，以及每一个可能疏离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花招。在杰克逊看来，苏联似乎是贫弱且呈现守势的。眼下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控制住东德和东欧。他们所能提出的仅有一个对全欧洲安全条约的模糊计划，以及召集另一场会议讨论亚洲问题。^③

他们的软弱刺激了美国进一步强大的欲望。“如果，在1954年间，我们有意图也有能力对苏联的影响范围继续全方面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就从这样的政策中

① 富勒致比姆和鲍伊，1953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Lot 64 D 562，文件箱43。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外交部40%的官员、内务部42%的官员和75%处理东德难民事宜的官员是前纳粹政府的官员。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特赦与遗忘”(“Amnesty and Amnesia”)，《新共和》(*New Republic*)，2003年3月10日，33—35；关于来自东欧其他地方移民的巨大影响力和扩张渴望，见珀蒂·阿霍南(Pertti Ahonen)，《驱逐之后：西德与东欧，1945—1990》(*After the Expulsion: West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1945—199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1—154。

② 申明，莫洛托夫，1954年3月2日，收录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41—1990”，第77号，37—81。

③ 杰克逊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2月22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7：1215—1220。



获取回报。”杰克逊说道。^①波伦大使从莫斯科汇报道，俄罗斯作出缓和紧张局势的部署，这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能让他们意识到，要真正缓解紧张的局势，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作出重要让步，我认为我们给苏联领导人所作的选择几乎必然会引发异议甚至分裂。”^②美国官员希望通过加固西德融入西欧的进程，令克里姆林宫放松对东欧的控制。“一旦出现了真正团结而且强大的西欧，”杜勒斯告诉阿登纳，“苏联就无法用当前的方法继续控制其卫星国了，而可能将它们转变成缓冲国家。”^③

考虑到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敌人对于西方的敌意始终不减，美国无法冒险让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德国。这将会阻碍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即法德之间的修好，西欧经济的一体化，以及欧洲政局的稳定。苏联将会有更多分裂西方的机会，共产党也会有更多利用社会动乱的机会。对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而言，缓解紧张局势不及实现他们在西欧的目标重要。现在就是利用美国实力的时机了。

但是，尽管美国似乎在欧洲占据有利的位置，其在亚洲的弱势也是一览无遗的。在印度支那，法国人在与越盟的对抗中渐渐败下阵来。5月，法国人在奠边府遭遇惨败。之后，以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为首的新政府在巴黎上台，表示在7月底之前进行和平协议谈判。在日内瓦会议上，弗朗斯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并承认了越南、柬埔寨、老挝作为独立国家的合法性。在莫斯科和北京的施压之下，越南共产党同意重新对他们的部队进行编制，并且接受了越南的临时分区。两年内将进行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④

日内瓦会议的这一结果比杜勒斯预想的更为乐观，不过他厌恶谈判。他仅在日内瓦逗留了几天，就将绝大多数的谈判工作留给了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而当杜勒斯出席会议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轻蔑是极为明显的。他拒绝和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也不愿意和任何共产党坐得很近。一名英国观察者作出的评论是，杜勒斯似乎陷于“一种近乎病态的愤怒和忧沉”。出席会议时，他“坐在角落中一语不

① 杰克逊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2月22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7:1220；杰克逊致弗兰克·威斯纳(Jackson to Frank Wisner)，1954年2月27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50(艾森豪威尔信件，第2文件夹)；杰克逊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3月1日，出处同上，文件箱50。

② 波伦致国务院，1954年1月20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8:1223—1225。

③ 会谈备忘录，道格拉斯·麦克阿瑟，II，1954年2月20日，出处同上，7:1210。

④ 加雷思·波特(Gareth Porter)，《优势的冒险：权力的失衡与越战之路》(*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32—40。

发,眼睛望向天花板,吸吮着牙齿”。^①

但他积极参与到国内政策的制订之中。他和艾森豪威尔相信,如果无法赢得越南南部,整个东南亚都会被共产主义掌控,那样一来就会失去重要的原材料,日本在西方轨道的位置也会受到殃及。日本需要在自由世界中获得市场和原材料。如果无法在那里得到这些,他们就会被迫转向与中国共产党和解。世界势力的平衡局面将会被打破。我们不可以失去日本,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丘吉尔道,“道德、政治和军事上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②

美国决不允许革命性的民族主义骚动愈演愈烈。英国人可能认为俄罗斯的危险首先在于民族主义,但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掌控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他们坚信,“妄图统治全世界。”他们因此无法忍受越盟接受印度支那的主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将会危及世界势力的平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并没有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雷德福所希望的那样,在1954年5月单边介入战争,协助法军攻击越盟,但他们也不准备放弃越南南部和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③

美国官员明白,他们就要开始面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革命的时代了。C·D·杰克逊写道,美国切不可对未来存有天真的想法。“殖民主义如今已是穷途末路”,但是不允许出现权力真空。美国官员需要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地作出打算,找出吸引或胁迫民族主义领导人加入自由世界的方法。我们必须克服“我们的心结”,杰克逊写道,“每个扛着冲锋枪的棕色或黑色皮肤的人都自发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爱国者,向往着成

① 伊默曼,《杜勒斯》,93。莫洛托夫反而表现得放松、自信、谋求和解。见伊利亚·A·盖达克,《直面越南:苏联对印度支那冲突的政策,1954—1963》,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45—53。

② 艾森豪威尔致丘吉尔,1954年12月14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5:1444;关于美国政策的进展,另见国家安全委员会5405,“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目标与路线”(“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Southeast Asia”),1954年1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2:367—380;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2,“美国远东政策回顾”(“Review of U. S. Policy in the Far East”),1954年8月20日,出处同上,769—776;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3,“美国当前的远东政策”(“Current U. S. Policy Toward the Far East”),1954年11月19日,出处同上,973—980;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5,“美国当前的远东政策”,出处同上,1062—1070。

③ “与英国的明确问题”(“Specific Problems with the UK”),1954年5月1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白宫备忘录系列,外交政策概述子系列,文件箱8;会谈备忘录,卡特勒,1954年5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2:446—450;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4年5月6日,1954年6月3日,1954年6月9日,出处同上,452—459,532—537,552—555;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5月28日,出处同上,527—528;总统办公室会议,卡特勒,1954年6月2日,出处同上,529—531;关于雷德福的观点,见国家档案馆,第218号记录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记录,雷德福档案,文件箱10,印度支那第091文件夹。



为一名当地的乔治·华盛顿”。^① 专职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拜罗德(Henry Byroade)解释道：

这一迈向独立自主的运动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当我们这个时代尘埃落定，历史能证明其无上的重要性……一旦亚洲和非洲人民，正如他们在历代的附庸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受到新帝国主义诱饵的蒙骗，由此回到受奴役的时代，陷入前所未知的水深火热之中，那将会成为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②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奋力挫败越盟在印度支那南部的胜利。在公开场合，他们表示美国不会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成果；在私下里，他们即刻致力于避免越南南部并缓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落入共产党之手。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告知同事：“从现在起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挽回共产党在印度支那明显力不能及的那些地区。”^③美国官员并没有处于抢占该位置的公众压力之下，也没有盟友迫使他们这样做。^④其实，英国人现在“似乎对他们是否能控制马来亚漠不关心，甚至哪怕失去印度支那和暹罗也无所谓”，这样的看法是杜勒斯不予赞同的。^⑤但是杜勒斯和艾克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阻止共产主义在全越南选举中获胜”。^⑥此外，美国不得不准备好动用武力阻挠共产主义的进展，即便是单边动用武力。^⑦但是在东南亚建立起一个区域性防御联盟(SEATO)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能够与盟友一

① 杰克逊致卢斯，1954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杰克逊档案，文件箱70。

② 亨利·拜罗德，“世界上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对美国的挑战”(“The World’s Colonies and Ex-Colonies: A Challenge to America”)，国务院《公报》29(1953年11月16日)：655—656。

③ 引自罗伯特·J·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帝国的制约：二战以来的美国和东南亚》(《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66。

④ 例如可参见1954年6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议上的发言。他想知道一旦对印度支那进行攻击，该如何让美国人民支持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激烈行动。见总统办公室会议，1954年6月2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2：530—531。

⑤ “与英国的明确问题”，1954年5月16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杜勒斯档案，白宫备忘录系列，外交政策概述子系列，文件箱8，第2文件夹。

⑥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4年8月12日及18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2：730，756—757；关于东南亚问题的会议记录，1954年7月24日，出处同上，666—667。

⑦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备忘录，1954年8月18日，出处同上，756；国家安全委员会5429/2，“美国远东政策回顾”，1954年8月20日，出处同上，769—776。

起阻止进攻。^①

1954年5月,越南局势变得逐步鲜明起来,有人建议艾森豪威尔寻求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共产党问题。他与杜勒斯就此进行了讨论,他们决定放弃这一建议。时机尚未成熟。威胁过于庞大。^②只要美国在国力上保有优势,它就要利用好这一优势,防止、牵制并赶走共产主义。

尽管克里姆林宫有了新的领导人,美国的情报分析员还是得出了苏联威胁将会加大的结论。^③然而美国的力量暂时还是大大超过苏联。海军上将雷德福说:“此刻,以及接下来的几年……短短的几年而已……自由国度的军事态势是强大的……极为强大……与苏联的军事态势相比。”^④国防分析员总结道,美国大约到1955年会进入核富裕的时代;而苏联可能要到1959年,甚至更晚,才进入该时代。在那之前,美国必须利用其国力上的优势,不仅仅是防止和牵制,还要破坏中国共产党对大陆地区的控制,并且在苏联的弱势上大做文章。^⑤但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部署,不能引起冲突。

1954年底,罗伯特·卡特勒向总统递交了后者上任来收到过的最有独到见解的国家安全文件。文件中说,必须继续反对苏联的制度:那是邪恶的。但是获取冷战胜利的关键在于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而非一蹴而就的方式。首要目标是决定如何处理共产主义政权,“设法引导他们放弃扩张主义政策”。可以采取颠覆对方的秘

① 备忘录,卡特勒,1954年6月2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12:529—531;关于东南亚问题的会议记录,1954年7月24日,出处同上,665—669。

② 与总统的午餐会谈备忘录,1954年5月11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杜勒斯档案,白宫备忘录系列,文件箱1(与总统的会议,1954,第3文件夹);总统备忘录,杜勒斯,1954年5月12日,出处同上;杜勒斯,“美国外交政策”(“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54年5月16日,出处同上,外交问题概述,文件箱8,第2文件夹;杜勒斯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5月17日,出处同上,文件箱1(白宫通信,1954,第3文件夹)。

③ 例如可参见情报与研究办公室及苏联东欧研究部,“苏联的意图及力量”(“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1954年9月8日,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情报与研究档案, Lot 58 D 776,文件箱14;国家情报评估 11—5—54,“1959年中期苏联的力量及主要政策路线”(“Soviet Capabilities and Main Lines of Policy through Mid-1959”),1954年6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8:1235—1238;国家情报评估 11—4—54,“1959年中期苏联的力量及可能的行动路线”(“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Through Mid-1959”),1954年9月14日,出处同上,1248—1252。

④ 演说讲稿,“我们的武装部队”(“Our Armed Forces”),雷德福,1954年6月8日,国家档案馆,第218号记录组,雷德福档案,文件箱29,337 匡提科。

⑤ 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美国对武装部队和军备管理、限制及减少政策的回顾”(“A 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on the Regulation, Limitation, and Balanced Reduction of Armed Forces and Armaments”),尤见110—125,1954年12月11日,国家档案馆,第330号记录组,国防部长记录,1954,文件箱58,CD 388.3。

密行动,但要与改变他们的表现双管齐下。同时还要加强在西欧的势力。要让人民看到,“除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积极的、有吸引力的选择”。在为争取人心的奋斗中,民主资本主义必须要比共产主义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①

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西方加强实力,证明其优越性,对手就可能改变。^② 这不会很快实现,毕竟国际局势变化无常,德国的未来毫无定数,革命性的民族主义骚动仍处于初级阶段。只要这些形势扎根于国际体系中,能看到的也仅仅是休战而已。克里姆林宫还是会继续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必须让自己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长时间适应这样的形势。”罗伯特·鲍伊这样写道,他在杜勒斯的政策规划办公室中是颇具影响力的主任。^③

但是苏联可能要在很久以后,当形势逐步发展、意识形态竞争消失之时,才会有所改变。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出现根本改革。查尔斯·波伦说道,但是苏联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果无法预见的新阶段”^④。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无法赢得和平的机遇,但它可以紧紧监视住克里姆林宫,增强国力,吸收德国军力,煽动起铁幕后的动荡,拉拢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更好生活方式的典范。美国需要证明它的方法是最好的,民主资本主义并非为历史所摒弃。

① 卡特勒致艾森豪威尔,1954年12月17日,艾森豪威尔档案,白宫办公室,开放安全档案/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系列,政策档案子系列,文件箱14;国家安全委员会5501/1,1955年1月31日,“对苏联及欧洲卫星国弱点的利用”(“Exploitation of Soviet and European Satellite Vulnerabilities”),1955年1月31日,出处同上。尽管措辞中提到自由,艾克及其顾问在着手制定更谨慎的长期政策,试图避免短期内的战事,并达成长期的自由。该政策充满了自相矛盾。见罗纳德·R·克莱布斯(Ronald R. Krebs),《决战的远见: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对东欧的策略》(*Dueling Visions: U. S. Strategy Toward Eastern Europe Under Eisenhower*),柯利奇站:德克萨斯A & M出版社,2001;拉兹罗·波里(Lazlo Borhi),“击溃,自由,遏制,还是无动于衷? 1950年代的美国政策与东欧”(“Rollback, Liberation, Containment, or Inaction? U. S. Policy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50s”),《冷战研究杂志》1(1999年秋):91—95;克里斯·塔达(Chris Tudda),《事实就是我们的武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措辞外交》(*The Truth Is Our Weapon: The Rhetorical Diploma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John Foster Dulles*),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② 除了以上引言,还可参见米特洛维奇,《损害克里姆林宫》,163—171。

③ 鲍伊,“对苏联立场的分析”(“Analysis of Soviet Position”),9,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文件箱43。

④ 大使会议记录概要(Summary Minutes of the Chiefs of Mission)1953年9月22日—24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8:96;另见鲍伊,“对苏联立场的分析”,国家档案馆,第59号记录组,政策规划办公室记录, Lot 64 D 563,文件箱43。

恐惧与权力

斯大林逝世后,冷战可能由此进入不同的发展轨迹,但这样一丝希望仅微微闪过,随即消逝了。艾克声称存在着一个和平的机遇,却没有努力将其化为现实。为什么?

恐惧与权力给出了答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不能为和平冒上巨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军力的发展,而且他们害怕像越南的胡志明这样的革命民族主义者会夺取政权,与北京和(或)莫斯科结盟。

在就任总统前夕,艾克就已经规划出了他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途径。“绝大部分的世界资源,”他在给刘易斯·道格拉斯的信中写道,“不可以落入苏联人的手中。”美国必须获权进入生产重要原材料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政府必须“支持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信仰自由事业和开放贸易。只要美国继续维持其优势国力,就应当利用这样的优势来营造一种顺从于美国国内制度的世界秩序。^①

马林科夫一心想要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在1954年3月和4月间,他持续发表了重要演讲,强调所有的争执都能和平解决。他指出,有人说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新的世界大战,要么就是永久的冷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苏联政府“支持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持久的和平”。最具影响的政策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毁灭”,他警告道,“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支持苏联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争,其中当然也包括美国”。^②

马林科夫的动机毫不含糊。新领导人需要一定时间推行国内的经济改革。在他们的内部审议、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以及政治局(或者用当时的称呼主席团)的决议中,他们纷纷表示,最关心的问题是苏联人民提供更多食物、衣物和住房。甚至就连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向国内听众发言时,也强调了新领导人不仅会加速生产,还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商品价格。^③

然而斯大林的继任者还不能设想出冷战的结局。文献记录显示,他们和斯大林一样,坚信资本主义世界根深蒂固的敌意。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旷日持久的斗争

① 艾森豪威尔致道格拉斯,1952年5月20日,加兰博斯,《艾森豪威尔档案》,13:1229—1231。

② 马林科夫的演讲,1954年3月1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54年3月26日,125—128;马林科夫的发言,1954年4月26日,《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26(1954年6月):372—373。

③ 莫洛托夫的演讲,1954年3月1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4年3月26日,128—131;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53—1954,拉蒙特图书馆缩微复制,A 1059。



为当然，马林科夫和其他人要像他们的前任一样警惕，根除敌人并挫败层出不穷的威胁。莫洛托夫告诉中央委员会，美帝国主义者表现得高傲自大，试图重整德国军备，增强地位上的优势，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本土。^① 苏联领导人相信有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决心要破坏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敢冒这么大的险争取和平。“一旦有必要，”马林科夫阐明，“我们就会与帝国主义者进行谈判，……[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单边让步……我们坚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②

当然，美国的举动也强化了这一自明的苏联思维。美国不会就禁止核武器进行谈判，不会同意限制战略性军备，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接受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全盘胜利，也不会解决德国问题，除非以他们自己的形式。也就是说，历史和经验似乎在印证马克思列宁思想的真实性。如果共产主义者表现出软弱，对手就会抓住机会将其一举歼灭。^③

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知道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意识到了困扰着他们制度的问题，也意识到了他们阵营中的骚乱。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在国内进行改革，提高生产力，扩大食品产量，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他们的同事都决心在他们所控制的德国部分推行社会主义。^④

国内政治上的原因促使紧张局势的缓和，但也强化了克里姆林宫的承诺，即保卫社会主义，并让社会主义在其阵营中成功运作。而杜勒斯声称他们的和平表示反映出弱势，苏联领导人对此感到极为愤慨，他们认为如果作出太多让步，美国就会得寸进尺。^⑤ 而最终让他们支持盟友社会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他们宣称贝利亚之前想要出卖东德的社会主义，这让他们感到恐慌的莫过于德国军国主义的复苏，他们害怕牢牢隐蔽在美国阵营中的强大德国，或是一个独立的、想要重夺战争失地的德国。^⑥

意识形态教会俄国领导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了未来。“超过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马林科夫高兴地说，“已经永远和资本主义决裂了。”^⑦两场

① 参见他对柏林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54年3月2日，第77号，拉蒙特图书馆缩微复制，A 1059。

② 马林科夫就贝利亚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闭幕发言，1953年7月7日，收录于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79。

③ 出处同上，178—179；马林科夫的演讲，1953年8月9日，《第19日的重要发言》（1953年9月1日）：688。

④ 关于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见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1953年7月7日，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73—180。

⑤ 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开幕致辞，1953年7月2日，出处同上，3；马林科夫的演讲，1953年8月，《第19日的重要发言》（1953年9月1日），688—689。

⑥ 在中央委员会关于贝利亚问题的会议中，对德国的恐惧是一个始终的主题。参见斯蒂克，《贝利亚事件》。

⑦ 见其演讲，1954年4月26日，《当代历史》26（1954年6月）：372。

世界大战缩小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革命将数亿人带入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辖区之内。亚、非、拉的民族革命再次预示了胜利。“共产主义的力量日趋强大,”马林科夫说道,“我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是强大的、日益发展人民和民主的据点。”^①在召唤和平的同时,马林科夫也对历史的发展轨迹确信无疑。“显然,对于全世界而言,侵略力量是不会扭转历史进程的。”^②

马林科夫坦言斯大林犯下了重大的错误。眼前有着难以克服的挑战。他和他的同志都表示:“我们仍然还有未解决的、迫切的经济任务,忘记这一点就等于犯了个大错……我们还有……非常重大的任务,即最大程度地满足工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③但是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开明领导之下,有着强大的恢复力。他们正在建设“一个不存在剥削和政治民族镇压的新社会”。他们拥有着共同的希望和梦想。他们想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1954年3月12日,马林科夫在列宁格勒告诉他的听众,党的领导人将会“坚持不懈地让所有苏联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他们在共同营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④

艾森豪威尔也认为他在营造一种生活方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强调了要保护基本的价值观和制度,如果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分布产生剧变,这两点就会有危险。苏联在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频频得手,这将影响到日本和西欧的核心工业地区。如果欧洲和亚洲的工业中心区域落入中苏影响范围之内,世界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变化,美国就可能不得不实行军事体制,放弃其价值观和制度。^⑤

艾森豪威尔谈及和平的机遇,马林科夫向往缓解国际紧张局势。但是既然意识形态的预想决定了双方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机遇的看法,就不会有真正的缓和与和平。美国和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悍的武器,但是双方领导人都无法将自己从恐惧中释放出来,或是超越其意识形态的表象。这个世界似乎太令人惊恐;又似乎充斥着过多的机遇。

① 马林科夫的闭幕发言,1953年7月7日,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78。

② 马林科夫的演讲,1953年8月8日,《第19日的重要发言》(1953年9月1日):691。

③ “对贝利亚反党反政府罪恶行径的决议”,1953年7月7日,斯蒂克,《贝利亚事件》,190。

④ 马林科夫的演讲,1954年3月1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54年3月26日,128;马林科夫的演讲,1953年8月8日,《第19日的重要发言》(1953年9月1日):691。

⑤ 关于描述性的评论,例如可参见艾森豪威尔致黑兹利特,1947年7月19日,格里菲思,《艾克给一位朋友的信》,40;日记条目,1953年1月6日,费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222—224;笔记,明尼克,1954年12月14日,《美国外交关系,1952—1954》,2:825—826。



第三章

躲过大决战, 1962—1965:

赫鲁晓夫, 肯尼迪与约翰逊

千钧一发

美苏两国在 1962 年 10 月的导弹危机中可谓是“针锋相对”。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试图将导弹偷偷运往古巴。一架美国侦察机在飞越加勒比海群岛时发现了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 赫鲁晓夫的计划为美国所察觉。1962 年 10 月 22 日,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在一次情绪激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指出, 克里姆林宫在古巴布置导弹的行为是“有预谋的、挑衅性质的, 是在考验美国人民的勇气和决心”。肯尼迪宣布, 美国将会实施对古巴的全面封锁以阻止进攻性的军事装备被进一步地运往古巴。如果苏联舰船强行前进, 并且导弹并未移除的话, 美国将阻止它们的前进。肯尼迪总统宣称: “我已经命令军队为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①

① 肯尼迪的演讲, 参见欧内斯特·R·梅和菲利普·D·泽利科(编), 《肯尼迪录音磁带: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白宫内幕》(*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坎布里奇,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7, 276—281; 背景知识, 同时参见迪诺·A·布鲁焦尼(Dino A. Brugioni), 《针锋相对: 古巴导弹危机内幕》(*Eyeball to Eyeball: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纽约: 兰登书屋, 1991; 詹姆斯·G·布莱特(James G. Blight)与戴维·A·韦尔奇(David A. Welch)(编), 《濒临绝境: 美苏两国重新审视古巴导弹危机》(*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纽约: 正午出版社(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90; 马科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 《冷战的顶点: 肯尼迪, 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High Noon in the* (转下页))



10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空军战略部队进入大战前的最高战备状态。美国军方官员也做好了发射洲际导弹和潜载导弹的准备。美国军火库中所有可用的导弹都已处于战备状态。其中的一部分导弹已经加载了核弹头,预先设置了打击目标,机载后在空中持续飞行,同时战机将由空中加油机加油。^①“整整一周的时间,整个世界都处在战争的边缘,”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事后写道,“我们两国都处于一种备受煎熬的紧张状态之中。”^②

这种紧张感也体现在两国元首的思考和书信往来之中。10月26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件中写道:“我想,总统先生,您不免也会对世界的命运存有一丝忧虑吧?”^③赫鲁晓夫用断断续续的威胁和鲁莽仓促的决定来掩盖他自己内心的恐惧,但事实上他是心存恐惧的。“我当然也会害怕,”他事后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不害怕的话,那我肯定是个疯子。”^④

赫鲁晓夫希望在不蒙羞的前提下解决这场危机。“我们不能屈从于自我陶醉和褊狭的感情用事,”他在给肯尼迪的信中写道,苏联不想要战争,“我本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他提醒肯尼迪总统说。战争只会带来“死亡和毁灭”,而这些是他永远铭记在心不会轻易忘却的。“只有精神病人和自杀者”才会发动一场进攻战。^⑤因此他提出一个解除危机的方案。他已经把这个想法递交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所有成员,这些常委都遵从他的领导。10月25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致同意,这场危机不应当朝着一个“沸点”发展。这场大国政治的游戏还得继续玩下去,“但不能在这场游

(接上页) *Cold War: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纽约: 巴兰坦图书公司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谢尔登·M·斯特恩(Sheldon M. Stern),《让世界骤停的一周: 古巴导弹危机的秘密内幕》(*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5。

① 菲利普·泽利科与欧内斯特·梅(编),《约翰·F·肯尼迪: 总统录音资料: 重大危机(3卷本)》(*John F. Kennedy: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The Great Crises, 3 vols.*), 纽约: W·W·诺顿出版公司, 2001, 3: 183—184。

②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机密: 历经六位美国冷战总统的莫斯科驻美大使》(*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纽约: 兰登书屋, 1995, 111。

③ 尼基塔·S·赫鲁晓夫致约翰·F·肯尼迪, 1962年10月26日,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书信往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出版署, 1996, 6: 172。

④ 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 约翰·F·肯尼迪, 约翰教皇, 与尼基塔·赫鲁晓夫》(*The Improbable Triumvirate: John F. Kennedy, Pope John, Nikita Khrushchev*), 纽约: W·W·诺顿出版公司, 1972, 46。

⑤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 1962年10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6: 172—174。

戏中丢掉你的脑袋”。我们双方应当采取谨慎且节制的态度,为这场危机寻求一个明智的解决方案。赫鲁晓夫希望能够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为交易筹码,换取美国从土耳其的基地中撤离木星导弹。^①

但到了次日早晨,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补充道:“我们被警告说,战争可能在今天就会打响。”他告诉他的常委同事们,昨天的提议信应当作出修改;对于原先希望美国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的建议应当删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考虑最主要的重点,他说。如果美国人保证不入侵古巴,我们会撤走在古巴的导弹。“否则,情况将会变得异常危险。”^②

但是,赫鲁晓夫并不想成为先动摇的那一方。事实上,他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希望能够不作出任何退让。他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考察美国是否会让步退却。肯尼迪是个懦夫,他曾经这样对他的同事说。肯尼迪总统睡觉的时候总是带着一把木刀。主席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之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问道:“为什么他会带木刀呢?”赫鲁晓夫以一种玩笑的口吻回应:“当一个人第一次去猎熊的时候,他总是会带上一把木刀,因为这样更容易刮掉他裤腿上的泥巴。”^③

但是,赫鲁晓夫本人也绝非冷静且有逻辑的人。在10月26日寄给肯尼迪总统的一封仓促草就的信里,他提出了一笔交易:“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宣布我们所有前往

① 会议记录第61号,1962年10月25日,弗拉基米尔·马林(Vladimir Malin)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笔记记录,收录于A·A·富尔先科(A. A. Fursenko)等人编著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4—1964:会议议程的记录草案》(*The Presidium of the CC of the CPSU, 1954—1964: Draft Records of Session Proceedings, Stenographic Transcripts, Resolutions*),卷1,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ROSSPEN),2003。一个修订后的扩充版本再版于2004年。我所使用的是米勒中心提供的由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翻译的马林笔记(在之后的引文中称为“马林笔记”),而纳夫塔利与富尔先科合作出版了两本书。这些文稿现在可以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中心的网站上查到。网址是<http://millercenter.virginia.edu/scripps/digitalarchive/kremlin>。同时可以参见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收录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威廉·陶布曼,谢尔盖·赫鲁晓夫(Sergei Khrushchev)和阿博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编),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234—238;关于赫鲁晓夫与导弹危机,同样可以参考亚历山大·富尔先科与蒂莫西·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古巴导弹危机的秘密历史》(*“One Hell of a Gambl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97;威廉·陶布曼,《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纽约:自由出版社,2003,529—577。

② 谢尔盖·赫鲁晓夫,雪莱·本森(Shirley Benson)(译),《尼基塔·赫鲁晓夫与一个超级大国的诞生》(*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大学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584。

③ 会议记录第61号,1962年10月25日,马林笔记。

古巴的舰船绝不会携带任何类型的武器。而你们应该宣布美国不会以武力侵犯古巴,也不会资助任何企图在古巴进行颠覆活动的势力。以此为前提,我们就不需要再向古巴派遣我方的军事专家了。”^①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常委们,如果肯尼迪同意的话,苏联将拆除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到那个时候,他就能成功地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和平区,同时保障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政权在古巴的安全,虽然美国一直致力于颠覆该政权。继续保有对未来革命成果的期望,赫鲁晓夫希望用这种说法在他那些顺从的同志面前努力挣扎着保留自己的颜面。^②

然而,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心情让谈判拖延下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一次执委会的会议上通报说:“他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加紧建设导弹基地。”^③一旦导弹基地建成完工,如果美国决定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话,苏联有能力和手段对美国本土进行报复式打击。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继续坚持所有运送武器前往古巴的舰船必须掉头返航,同时苏联已在古巴境内部署的进攻性武器必须拆除。赫鲁晓夫最近的一封信可以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他们相信:只要美国作出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作为交换,苏联将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④

在任何问题得以解决之前,赫鲁晓夫在10月27日当天又向华盛顿发去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一次大胆的赌博,是“从失败口中夺取胜利的尝试”^⑤。“你希望能够保障贵国的安全,这点我可以理解,”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但是,古巴也希望能够保障自己国土的安全;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在此,赫鲁晓夫终于透露了真正让他恼怒的东西:美国在苏联周围部署的所有军事基地。“你们为古巴的事烦恼不已,”赫鲁晓夫接着写道,“你们表示对此感到很不安,其原因在于古巴从海上到美国的海岸线只有90英里。但是土耳其和我们苏联毗邻接壤;我们的岗哨和土耳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0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176—177;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584,588。

② 尼基塔·S·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解密磁带录音》(*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杰罗尔德·L·舍希德(Jerrold L. Schecter)与维亚切斯拉夫·L·卢奇科夫(Vyacheslav V. Luchkov)(编译),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90,170—173;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578—595;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259—260;陶布曼,《赫鲁晓夫》,566—569;亚历山大·富尔先科与蒂莫西·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与美国为敌的内幕》(*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2006,482—487。

③ 泽利科与梅,《肯尼迪》,3:360。

④ 出处同上,355。

⑤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274;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487—488。

其的哨兵在边界来回巡逻的时候彼此都能够看见对方。你难道认为美国有权单方面要求保障贵国自身的安全, 同时要求我们移除你们称之为进攻性的武器, 且不赋予我们同样平等的安全权利吗?”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 如果美苏双方都同意撤除可能会对对方造成如此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 这场争端可以很快终止。^①

苏联最高领导人提高了赌注, 重新回归到两天前的初衷。他不仅希望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 同时希望借此机会迫使美国撤除在土耳其部署的木星导弹。如果美国撤除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 赫鲁晓夫在 10 月 25 日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将会是赢家。”^②

这第二封信给华盛顿带来了不小的震惊。而 10 月 27 日早晨美国 U-2 侦察飞机在古巴被击落, 把这种紧张态势推向了顶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 苏联的军事计划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这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入侵”。不仅仅是肯尼迪的军事顾问, 其他的总统助理们也要求对古巴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在美国南部集结的准备入侵古巴的军队已经待命, 非常迫切地支持打击古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准备在必要时发起一场全面的核战争。^③

肯尼迪决定无视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 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说, 如果苏联从古巴移除其部署的武器系统, 并同意接受联合国视察, 美国将会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措施, 并且承诺不会入侵古巴。^④ 但是, 肯尼迪担心这场危机不会很快结束。肯尼迪感到时间正一点一滴地流逝, 离他迫于压力不得不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那一刻越来越近, 他让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前去再次约见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 向他再次表明事态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 肯尼迪总统说, 如果必要的话, 他会从土耳其撤除木星导弹; 但任何情况下, 古巴的导弹必须被移除。肯尼迪总统劝告说, 如果秘密地私下告诉赫鲁晓夫这些能够避免战争的爆发, 没有比这更明智的选择了。^⑤

罗伯特·肯尼迪邀请多勃雷宁秘密地前往司法部会面。当多勃雷宁在那里看到罗伯特·肯尼迪的时候, 感觉他看上去精疲力竭。总统的弟弟看上去非常紧张, 说话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 1962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6: 178—181。

② 会议记录第 61 号, 1962 年 10 月 25 日, 马林笔记;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 《“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 274; 陶布曼, 《赫鲁晓夫》, 569—570。

③ 斯特恩, 《世界骤停》, 163, 188;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 《“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 266, 280; 泽利科与梅, 《肯尼迪》, 3: 387—388。

④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 1962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6: 181—182。

⑤ 斯特恩, 《世界骤停》, 157—188;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 《“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 281—282; 小阿瑟·梅尔·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波士顿: 霍顿米夫林图书公司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8, 520—521。



有些迟钝。“战争爆发的威胁非常大，”他这样告诉多勃雷宁。军事顾问对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总统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战争有可能会打响。赫鲁晓夫必须在第二天就同意从古巴移除导弹。多勃雷宁询问关于在土耳其部署的木星导弹。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些导弹自然会在几个月后被移除。虽然这并非一次等价交换，但是却会兑现。此中的任何细节都不能向外界透露，否则这笔交易就会告吹。^①

正当多勃雷宁准备着将要递交给莫斯科的报告的同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0月28日星期天早晨又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乡间别墅。赫鲁晓夫迎接他的同事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他非常不安，气氛“异常紧张”。战争眼看即将来临。当他在总结当前形势时，他的同事们都认真地聆听着。赫鲁晓夫开始时回顾了列宁在1918年3月作出的决定，即签署与德国的和平协定，并割让俄罗斯的绝大多数边陲地区给敌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损失，但同时却也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战略决定，因为它使布尔什维克能够集中力量击败国内的敌人并巩固政权。“我们的利益指导着我们作出那样的决定——我们必须保护苏维埃政权。”赫鲁晓夫说。现在苏维埃政权再一次面临危险，因为核战争一触即发。他希望他的常委同事们能够支持他从古巴撤回导弹，以换取美国作出不入侵古巴的承诺。“为了能拯救全世界，我们必须撤退。”^②

当赫鲁晓夫请他们开始表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外长来电，刚刚收到多勃雷宁与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晤的报告。赫鲁晓夫的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在电话里听着报告被逐字念出，仔细地做着笔记，然后向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总结汇报。多勃雷宁说，从未看见过罗伯特·肯尼迪如此的紧张：毫无疑问“该作出决定的时候到了”。军事行动已经迫在眉睫。美国人期望第二天就得到答复，同时他们要求赫鲁晓夫公开同意肯尼迪总统在10月27日的来信中提出的要求。同时，苏联不得在公开场合提及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③

赫鲁晓夫对此很不满意，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是他所能达成的最好的交易。他长篇大论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试图劝说他的同事们相信肯尼迪的话。肯尼迪总统还

① 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17—620；多勃雷宁，《机密》，86—88；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承认多勃雷宁的陈述比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要更为准确，参见《13天》，参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1995年春)：78；吉姆·赫什伯格(Jim Hershberg)，“再谈鲍比和古巴导弹危机”(“More on Bobb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出处同上，8—9(1996年冬/1997年)：274,344—347。

② 陶布曼，《赫鲁晓夫》，574；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21—622；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284—286。

③ 陶布曼，《赫鲁晓夫》，575；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285；特罗扬诺夫斯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237。

将在位六年。古巴的革命将得到拯救, 卡斯特罗政权将拥有足够的时间发展壮大。最后, 赫鲁晓夫请他的同事们表决。他们迅速表决通过了他的提议。^①

赫鲁晓夫正式接受了肯尼迪的条件。10月28日, 下午5点, 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了苏维埃最高领袖给美国总统的最新信件。为了“能尽快消除威胁和平进程的冲突”, 赫鲁晓夫写信告知肯尼迪, 苏联政府将下令停止在古巴安装导弹的建筑平台上的一切工作, “将会下达拆除您所指的进攻性武器的指示”, 命令将这些武器包装后运回苏联, 同时寻求与古巴政府达成协议, 允许联合国对于导弹拆卸进行核查监督。^②

肯尼迪总统甚至在阅读正式书面文本之前就作出了回应。事态的发展正迅速地“接近一个临界点”, 局面几乎变得“难以控制”, 他说道, 而现在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他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或许此刻,” 他写信告诉赫鲁晓夫, “当双方从危机中各退一步之后, 我们可以携手合作”, 在最关键的军备裁减领域取得更大进展。^③

赫鲁晓夫迫切希望能够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其他问题, 同时对肯尼迪重申他们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做法不甚满意。他立即又向华盛顿寄去了一封密信, 由多勃雷宁亲手转交给罗伯特·肯尼迪。赫鲁晓夫重申, 尽管他对木星导弹一事保持沉默, 但苏联对于肯尼迪总统的条件是否接受, 取决于美国是否会从土耳其撤除木星导弹。罗伯特·肯尼迪收下了信件, 和他的胞兄彻夜长谈讨论后, 第二天给多勃雷宁作出了答复。罗伯特·肯尼迪坚称, 并不存在什么交换条件, 因为并没有正式的记录或官方的书面信件交流。但是密约还是有效的: 苏联不应该质疑他兄长所作出的承诺。如果赫鲁晓夫想要获得更多的话, 收到的只会是一封会让他不甚愉快的公开信。^④

① 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编译), 波士顿: 利特尔 & 布朗公司, 1970, 498; 陶布曼,《赫鲁晓夫》, 574—575; 多勃雷宁,《机密》, 87—88; 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 622—624。

②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 1962年10月28日,《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6: 183—187; 多勃雷宁,《机密》, 89—91。

③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 1962年10月28日,《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6: 187—188。

④ 多勃雷宁,《机密》, 90; 多勃雷宁致苏联外交部, 1962年10月30日,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冬/1997年): 304; 施莱辛格,《罗伯特·肯尼迪》: 523; 詹姆斯·W·希尔蒂(James W. Hilty),《罗伯特·肯尼迪: 胞兄保护者》(*Robert Kennedy: Brother Protector*), 费城, 宾夕法尼亚州: 坦普尔大学出版社(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50—451。在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合著的新书中, 他们声称赫鲁晓夫并未指望肯尼迪会以撤出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来交换苏联撤走在古巴部署的导弹, 因此双方所达成的秘密约定让赫鲁晓夫非常满意。参见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 490。



赫鲁晓夫的退让

赫鲁晓夫并未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抱定决心要推进和平进程。他再也不想经历危机或战争。他“从未热衷于战争，事实上，他害怕战争——毕竟，他上过前线”。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解释说，与纳粹作战对他父亲成年后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每当电视上演战争电影时，”谢尔盖补充说，“父亲总是会关掉电视——因为即便是拍得最好的战争电影都是一个谎言。”^①

在他和肯尼迪总统的书信往来中，赫鲁晓夫再三强调苏联人民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并未打算摧毁你们的国家，他在给总统的信中写到，我们希望能够在和平的基础上和你们展开竞争。“我们的确和你们有过争执，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大分歧。但是我们的世界观都应当基于以下的共识，即无论是意识形态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不应诉诸于武力手段来解决，而应当在和平竞争的基础上解决。”他一直致力于谋求和平共处。^②事实上，赫鲁晓夫看似鲁莽地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为似乎是他所精心策划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试图抵消美国在实力上对苏联占优的局面，迫使美国在突出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③

擦身而过的核战争让赫鲁晓夫变得更冷静自制，现在他迫切希望开始着手解决其他问题。“恶的开始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的结果，”他在10月30日给肯尼迪总统的又一封长信中这样写道，“好的结果在于现在人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一场热核战争可能带来的熊熊烈焰的威力，同时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军备竞赛一天不结束，悬在他们头顶的核战威胁就不会消失。”^④“总统先生，”赫鲁晓夫写道，“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危机将来可能再度重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这其中牵涉到太多的“爆炸物”了。^⑤

赫鲁晓夫用小心翼翼的措辞慢慢展开他想要讨论的问题。现在，达成一个禁

① 访谈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离与美国的战争只差20分钟”(Khrushchev Was 20 Minutes Away from War with the USA)，《论据与事实》49(2004年12月8日)：1258；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582。

②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0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174。

③ 关于对赫鲁晓夫的动机的最新解读，参见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409—437，539—545。

④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0月30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196。

⑤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0月28日，出处同上，190。



止核试验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说,我们双方已经同意了在大气层、外太空和
水下禁止核试验。对于是否禁止地下核试验,我们双方仍存在分歧,但是只要美国
不固执地坚持必须进行核查的话,这个问题终将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双方应当
考虑在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签署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也许甚至可以考虑废除
这两大军事集团。如果肯尼迪认为这个提议异想天开,赫鲁晓夫能够充分理解这
样的反应,但同时提请肯尼迪无论如何开始思考“一些防止冲突再次发生的行为
准则”。

赫鲁晓夫一再重申,为了避免战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着手解决最根本的
问题。“现在必须消除美苏双边关系中任何可能导致新一轮危机的因素。”开展真正
会落实的军备削减对话将会使双方受益,同样双方也应当开启对话来解决德国问题,
确保东德和西德的边界和主权,同时安排美国、英国、法国三方从西柏林撤军。赫鲁
晓夫补充说,如果美国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允许其在联合国行使其合法权
益,这将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虽说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但是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这
些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苏联人民,”以及亚洲和欧洲的人民,“亲眼目睹了战争。战
争席卷了我们的领土”。赫鲁晓夫承认,尽管美国也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
只承受了“微小的损失”,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或许美国人很难完全理解苏
联对和平的渴望。但是,我们双方刚刚共同经历了一次几乎鱼死网破的危机,让所有
卷入其中的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我们正站在核战毁灭世界的悬崖
边。美苏双方的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互相妥协,但是我们双方应当更为明智地着手
解决那些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冲突的问题。^①

肯尼迪总统并未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宏观问题作出答复,而是选择关注当前
局势中的细节。他感觉赫鲁晓夫背叛了,他说:“你们苏联政府总是一而再地向我们
保证着你们并未做到的事情;事实证明……这些保证都不是准确可信的。”肯尼迪接
着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一次“极大的休克”。苏联在古巴采取的行动不仅
威胁到了西半球的安全,同时“从广义而言,也是一次试图改变当前国际局势的危险
尝试”。简而言之,苏联对他撒了谎,谎称永不再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但接着马上就进
行了部署。肯尼迪坚持,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赫鲁晓夫必须履行他本人许下的承
诺,从加勒比海地区撤除所有的进攻性武器,包括赫鲁晓夫运送给卡斯特罗的轻型轰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0月30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190—198。



炸机——伊尔 28 喷气式轰炸机。^①

肯尼迪总统正在经历政治对手和他的军事顾问的严格审视，而他的军事顾问们正因为他通过谈判来解决古巴危机而感到深深不满。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他说，苏联人正“为一场政治敲诈打下基础”。他必须非常小心，以免受骗上当。^②“苏联可能会再一次进行尝试，我们必须以此假设为前提来进行应对。”肯尼迪私下里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除非苏联人能够让我们恢复对他们的信任，否则局势的缓和有待时日才可能实现。^③

赫鲁晓夫带着他自己的抱怨和逐渐升级的挫败感回复肯尼迪。美方以异常缓慢的速度解除着封锁。那批伊尔 28 轰炸机都是有 12 年机龄的飞机，根本没能力开展进攻性质的军事行动，已经可以报废了；此外，赫鲁晓夫强调，这并不是他们交易中的一部分。卡斯特罗正处于一种全面反抗的状态，完全拒绝赫鲁晓夫要求其配合的请求。而事实上，美方一而再地侵犯古巴领空，并支持对古巴持续不断的颠覆活动，无疑进一步激化了卡斯特的顽抗态度。^④

在这场持续的互相指责过程中，赫鲁晓夫不断试图促使肯尼迪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宏观的议题。在 11 月 11 日给肯尼迪总统的去信中，赫鲁晓夫写道，我们“必须考虑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来确保世界的安全。他用一种久经磨砺的语气说：我们一度接近深渊，然后通过自我克制，终于从悬崖边上退了回来。他警告说：“下一次，我们未必能够安全地解开紧紧打上的结。”与其拘泥于协议中那些双方存在分歧的细节，不如“让我们为全世界的人们带去欢乐和福祉，向全世界表明这次冲突已经成为

①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2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01—204，引自 202；也可参见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2 年 11 月 15 日，出处同上：212—215；多勃雷宁致苏联外交部，1962 年 11 月 5 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 年冬/1997 年），326；V·V·库兹涅佐夫（V. V. Kuznetsov）与 V·A·佐林（V. A. Zorin）致苏联外交部，1962 年 11 月 6 日，出处同上，327—328。

② 泽利科与梅，《肯尼迪》，3：517；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287；多勃雷宁致苏联外交部，1962 年 11 月 12 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 年冬/1997 年），331—332。

③ 引自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未完成的人生：约翰·F·肯尼迪，1917—1963》（*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1963*），波士顿：利特尔 & 布朗公司，2003，571；同时参见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2 年 11 月 15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12—215。

④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未标注日期[1962 年 11 月 11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04—208；会议记录第 68 号，1962 年 11 月 21 日，马林笔记；许多苏联文献可以参见詹姆斯·G·赫什伯格（James G. Hershberg），“古巴导弹危机的新证据：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更多文献”（“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ore Documents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 年冬/1997 年），270—343；弗拉季斯拉夫·M·祖博克，“古巴导弹危机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5（1995 年春），59，89—109，159。

了昨天,让我们恢复国际局势正常化。”^①

整个11月,美苏双方逐步恢复了对彼此的部分信任。苏联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导弹被拆除,轻型轰炸机被撤回。美国方面解除了对古巴领海的封锁,肯尼迪总统再一次保证企图颠覆古巴政权的行动将会终止。他试图宽慰赫鲁晓夫绷得太紧的神经。在12月14日给赫鲁晓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感谢您能够坦诚地与我交换意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等到古巴危机能最终被抛在身后之时,我们将有能力来解决共同面临的其他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②。罗伯特·肯尼迪在一场华盛顿的晚宴上小声地告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最重要的”是赫鲁晓夫书记和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他们俩能否取得彼此的信任并达成互相谅解。^③

赫鲁晓夫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在12月初,他邀请诺曼·卡森斯到克里姆林宫来做客。那时,卡森斯是《星期六书评》(*The Saturday Review*)的编辑,军备控制的拥护者,以及美苏非正式会谈的常客。赫鲁晓夫看上去和蔼放松。“现在我们可以坦诚地交流了,”他说,“请跟我讲讲你的家庭。在俄罗斯我们希望在谈正事之前先听听关于家庭方面的事情。”

在卡森斯向赫鲁晓夫介绍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之后,他们俩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深入交谈,谈及了许多问题。赫鲁晓夫的镇定自若、风度翩翩和自我内省给卡森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赫鲁晓夫说话时思路敏捷、不动声色,同时又能打动人。赫鲁晓夫对教皇想要改善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关系的努力表示感谢。他说他希望能和约翰教皇达成互相谅解。“我们都来自农民家庭;我们都非常接近土地;我们都是爱笑的人。”在被要求比较列宁和斯大林的时候,赫鲁晓夫直白地指出了他们两人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列宁原谅他的敌人;斯大林杀死他的朋友。”赫鲁晓夫声称,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得很好,尤其是工业这一块。但是官僚主义导致了效率低下。一旦有什么事情出错,总是被推托给另外的什么人为此事负责。

但赫鲁晓夫最想谈的还是外交政策,这也是卡森斯所期望听到的。苏联总书记知道卡森斯在来苏联之前已经和肯尼迪总统交谈过了,同时他也问候了总统先生的健康状况。卡森斯回答说,总统先生身体不错,同时热切地期望能和苏联一道建立一

①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未标注日期[1962年11月1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04—208。

②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4日,出处同上,232;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2年11月21日,出处同上,223。

③ 米高扬,与罗伯特·肯尼迪会谈的备忘录,1962年11月3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冬/1997):335。

个更好的世界。赫鲁晓夫反驳说，他也非常盼望能够在两国关系上取得进展。他补充道：“总统先生和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签署一份禁止核试验协议，然后着手解决防止核武器向全球扩散的问题。”事实上，赫鲁晓夫现在否认他曾经阻止过核武器的核查。他已经说服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让苏联允许接受少量的核查，如果这些核查是签署禁核协议所必需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核查被用于美方的侦查和间谍活动，因为他相信这才是美方要求核查的真正目的。“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原因妨碍找到一种我们两国都认可的核查方案。这种方案应当既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让你们知道我们没有在舞弊；同时又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让我们放心你们不是在借核查进行间谍活动。”^①

12月19日，在这次访谈之后，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又去了一封信，因为肯尼迪总统希望得到赫鲁晓夫对禁止核试验想法的细节。赫鲁晓夫以他惯用的长篇大论的方式作出了回应。“苏联不需要战争……热核战争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会给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赫鲁晓夫解释说，作为苏联愿意调解的表示，苏联的谈判专家会同意并允许美方建立一些地震监测站。虽然他仍旧不认为这些设施是监测地下核试验所必需的，但是他愿意作出这个让步。“因此我们认为建立自动地震监测站的提议应当包含国际军控的元素。”因为他被告知，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不含核查的协议，因此他愿意接受“在地震监控领域内的每一处核设施，当有可疑的地壳颤动时，一年接受两到三次[核查]。”而这些将被作为对苏联国内的监测设备的补充，虽然赫鲁晓夫本人认为国内的核监测设施已足以监督全面禁核协议的履行，也包括对地下核试验的监督。“我们坚信通往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道路现在已经是清晰笔直的了。”“全世界将不必再担心会听到核爆炸的咆哮声。各国人民翘首企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赫鲁晓夫总结道，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了。^②

对于苏联而言，最紧迫的国际问题仍然是德国问题。在与肯尼迪的所有交流中，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点。他对西德日益增长的实力和繁荣的经济对东德工人吸引力感到忧心忡忡。赫鲁晓夫现在希望能够永久维持德国被分割的状态，同时迫使西方社会承认东柏林的共产主义政府，因为东德政权的存亡与苏联在

^① 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39—57，引自 39, 44—45, 42—43, 54。

^②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2月19日，1963年1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 234—237, 247—249；V·V·库兹涅佐夫与肯尼迪的会谈记录，1963年1月9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RADD)，美国国家安全档案(NSA)；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04—513。

东欧的势力范围乃至苏联自身的安全息息相关。^① 在1961年夏天的维也纳峰会上，他告诉肯尼迪，苏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将如何解决德国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16个年头了，苏联在那场大战中失去了2000万条生命，而且苏联很大一部分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现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却已经又积聚起了军事实力，同时在北约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德国将领在北约这个军事组织中充任要职。这无疑可能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一旦开打的话，其破坏力将会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②

之后，在1961年夏的晚些时候，当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陡然升级之时，赫鲁晓夫支持东德政府决定修建柏林墙的决定。柏林墙最初由铁丝网构成，然后又重新筑起了水泥高墙。这道柏林墙阻止了逃离东德的难民的去路。它对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消除了赫鲁晓夫对于东德政权存活能力的焦虑，同时也短暂地缓和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后，这一道柏林墙不仅象征着德国的分裂，同时也象征着欧洲的分裂。^③

但是柏林墙并未消除赫鲁晓夫对于西德的不信任。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百慕大会晤并宣布一项关于北极星潜艇的核分享计划。这项条约将部分整合美英两国的核实力，以构成多边核力量(MLF)，同时美英两国也邀请他们的北约盟友国加入多边核力量，以期借助多边核力量来阻止盟友国，尤其是联邦德国，谋求建造他们自己的核武库。^④ 但是，俄罗斯方面立即就将这一协定视为向往独立的西德政权向拥有自身核实力这个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赫鲁晓夫对于西德的忧虑与日俱增，这种忧虑在广大苏联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赫鲁晓夫告诉诺曼·卡森斯：

①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358。

② 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苏联》，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8，5：217。

③ 霍普·M·哈里森，《把苏联逼入绝境：苏联与东德关系，1953—1961》，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172—223；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374—375。

④ 关于拿骚协定(the Nassau Agreement)以及多边核力量的概念，参见《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西欧与加拿大》，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4，13：1088—1123；马克·特拉赫滕贝格(Marc Trachtenberg)，《构建和平：欧洲和解的实现，1945—1963》(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305—306，355—367。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人看待德国人的方式和我们看待德国人的方式有些不同,即使最近一段年月你们也不得不两次和德国人作战。我们和德国人的关系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我们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德国的政权更替以一种极其容易且迅速的方式完成,同时德国人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种大屠杀的工具。我们甚至很难数清在二战中究竟有多少俄国人被德国人杀害。至少是1200万。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给德国人一把枪;迟早他会把这把枪的枪口对准俄国人的脑袋。”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我不认为俄国人会对除了德国的重新武装这个问题之外的任何问题有更强烈的反应。你们美国人总是喜欢说我们的公众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别太相信这种说法。在德国问题上,苏联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主见。如果任何苏联政府违背苏联人民的这种民意的话,都不可能继续执政下去。

我曾经把这种民意告诉你们美国的一位州长,他说他对苏联人民对德国的这种恐惧很难理解,因为苏联拥有那么多的核武器和导弹。我告诉那位州长,他完全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们当然有实力摧毁德国。我们可以在几分钟内摧毁德国。但是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武装起来的德国以其自身的行动来侵犯美国。我们害怕德国会获取足够的实力以发动一场全球核战争。让我最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在德国总有一大批的人热切地渴望着摧毁苏联。你们究竟要被火烧到几次才会学会重视火造成的威胁呢?①

在1962年底,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总统致以了诚挚的新年祝福,表达了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同时也对“多边核力量”表示极为失望。他在信中写到,苏联人民对于新一轮新的核力量重新武装计划感觉极度失望,更糟的是,这个计划会导致核实力的扩散。他声明,他们的人民“悲痛地”看见更多的武器被生产出来,因此他们希望看到有良知的政治家能够“废止大国的战争机器,摧毁所有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手段”。②

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削减军费开支,转而集中精力促进苏联经济发展。军备控制、对外关系的缓和,以及紧张对峙的缓解都将成为释放更多资金用于苏联国内经济复兴的有效手段。他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说:“父亲开始谈到,现在最关键的是把主要的

① 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54—55。

②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2年12月29日,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肯尼迪,1962年12月2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41—246。

精力放在增强国内的经济实力上。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健康发展的话,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吓倒我们。”^①

赫鲁晓夫开始对那些催促他拨付更多军费的苏联高级军官失去耐心。华沙条约总司令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Andrei Antonovich Grechko)将军试图说服赫鲁晓夫把更多的卢布花在战术核武器上。“不要试图说服我,”赫鲁晓夫愤怒地回答说,“我没钱给你。你别指望能得到一切。”^②罗季恩·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将军试图要求增加征兵数量以及延长陆军海军服役年限,赫鲁晓夫发了更大的脾气:“究竟是谁在为谁服务?究竟是军队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军队服务?你想过没有,如果年轻人不是在军队中度过他们的第三年兵役,而是复员投入生产,他们将生产出多少有用的东西?……我们花了数十亿的卢布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而你想要的只是靠兵役夺取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学习怎样正步走。”^③

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在接受访谈时,在发表演讲时,赫鲁晓夫一再解释他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点是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发表演讲,并威吓那些他认为是玩忽职守的同事。他们需要做得更好,他们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劳动力的组织上,需要为集体农场的工人提供更多的激励。人民需要得到更多;人民也应当获得更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说,“现在我们总是在说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清算土地私有制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把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转化成国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人民就不会抱怨说:‘你们声称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去你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没有苜蓿吃,也没有土豆吃。’”^④

赫鲁晓夫确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应当由以下这些标准来判断衡量,即社会主义是否能生产出更多的苜蓿和土豆,是否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住房、学校、医疗和生活消费品。要为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如是说,“政策的主线……应当是经济”。苏联的领导人应当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在建设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是最优越的,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归根结底,这才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争论的

① 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73;同时参见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13。

② 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70。

③ 引自陶布曼,《赫鲁晓夫》,586;同时参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515—520。

④ “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发言”,1963年9月10日,马林笔记。

重点；而这场竞争的结果将为全人类开辟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为了实现这些经济目标，赫鲁晓夫希望能够削减军费开支。^② 他很高兴能看到苏联在科学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同时他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开发出战略导弹和强大的弹头。这些武器有助于给那些帝国主义敌人们投下阴影，因为在他心目中，帝国主义分子永远都在寻求利用他们假想中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苏联。因此他构思了一场赌局，在古巴部署导弹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样不仅能保护卡斯特罗的政权，同时也能纠正战略上的不平衡，使持续地削减作战部队和军事人员成为可能。^③ 他思忖着，如果美国人也面临着苏联正面临着如此严重的问题，或许他们就会以更认真的态度来针对裁军和德国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④ “父亲取得了他致力多年希望达到的目标，”他儿子谢尔盖说，“美国不得不官方认可了苏联在破坏力方面和美国平起平坐这一事实。”现在赫鲁晓夫可以开始转而关注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其他议题：控制军备竞赛，重新分配资源，以及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⑤

但是，1963年春天，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失望达到了顶点。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同时也是其他领域取得任何进展最核心的前提，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在整个1950年代，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都试爆了当量越来越大的核武器，因此对大气造成

①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演讲，1964年2月14日，尤其参见第56页，置于文件箱217，苏联，美国国家安全文档(NSF)，林登·巴恩斯·约翰逊图书馆(LBJL)，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德克萨斯州)。赫鲁晓夫私下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说的一切正是他在公开场合所发表的演讲的内容。例如，参见他在莫斯科竞选会议上的演讲，1963年2月2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3年2月28日，BB1-22。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演讲，1964年2月14日，53-55，文件箱217，苏联，美国国家安全文档，约翰逊图书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515-520。美国中央情报局获知了赫鲁晓夫的意图。例如，参见国家情报评估11-4-63，“苏联的军事实力和政策，1962-1967”（“Soviet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Policies, 1962-1967”），唐纳德·P·施托瑞(Donald P. Steury)(编)，《意图与实力：对苏联军事战略力量的评估：1950-1983》(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Estimates on Soviet Strategic Forces, 1950-1983)，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1996，147-167；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43。

③ 关于在古巴部署导弹，参见特罗扬诺夫斯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234-237；陶布曼，《赫鲁晓夫》，529-577；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关于削减战区军事实力和人员数量，参见国家情报评估11-4-63，以及“苏联的军事实力与政策，1962-1967”，162-166；同时参见诺埃尔·E·费思(Noel E. Firth)与詹姆斯·H·诺伦(James H. Noren)，《苏联的国防开支：中央情报局评估历史，1950-1990》(Soviet Defense Spending: A History of CIA Estimates, 1950-1990)，柯利奇站：德克萨斯A&M大学出版社，1998，111；美国武器控制与裁军署，《全球军费开支与军火交易，1963-1973》(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de, 1963-1973)，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5，56。

④ 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388-437。

⑤ 谢尔盖·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5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515-520；特罗扬诺夫斯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238。

了严重的污染,同时也招致了全球的抗议浪潮。时断时续的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由于美方坚持要进行现场核查而中止。美方坚持要使用精密的监测仪器进行现场核查,以确保苏联没有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核试验。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因为肯尼迪曾经使他相信,只要克里姆林宫同意接受三次核查,美苏就可以签订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但是现在肯尼迪总统坚持要核查三次以上,同时在对苏联的一些地理敏感地带的核查中必须用到精密监测仪器。赫鲁晓夫感觉自己又被肯尼迪骗得输了个精光。^①

4月1日,赫鲁晓夫指示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面见罗伯特·肯尼迪,当面转达他的愤怒。多勃雷宁将他的长信转交给了这位司法部长,信中充满了中伤、侮辱和失望。这封长信从很大程度上再次反映出了赫鲁晓夫感觉自己处于劣势。他警告说,不要试图威胁我们。不要胆大妄为到让西德染指核武器。肯尼迪与其选择食言,背弃原先许下的承诺(至少赫鲁晓夫是这么认为的),不如鼓起勇气来降伏国内的反对派。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已经对政治借口感到恶心和厌倦,不想再听肯尼迪辩解说只允许核查三次就可以签署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参议院得不到通过。赫鲁晓夫怀疑,肯尼迪是否诚心想要达成缓和?总统先生是否真心希望防止核扩散?“如果每次麦克纳马拉和马利诺夫斯基轮流发言时讲得都是如何消灭对方,我们之间哪里还有互相信任可言?”然而在这些让罗伯特·肯尼迪非常不快的咆哮和恐吓背后,却是恳请美方开始新一轮的谈判,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召开一次峰会。^②

肯尼迪总统以一种寻求和解的方式作出了回应。这种安抚的语气可能也影响到了赫鲁晓夫的举止。当他4月12日再次接见诺曼·卡森斯的时候,态度缓和了许多。现在,这位《星期六书评》的编辑充当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联络员,这次他再次访问苏联,同时还带上了他的两个女儿。赫鲁晓夫邀请他们前往他位于黑海附近加格拉的府邸。当私人司机将卡森斯一家从索契机场接到府邸时,赫鲁晓夫亲自站在车道上迎接他们一家的到来。这时,赫鲁晓夫是完美的好客主人。在一顿奢华

① 劳伦斯·S·维特纳(Lawrence S. Wittner),《拒绝炸弹:世界核裁军运动史,1954—1970》(*Resisting the Bomb: 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54—1970*),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335—421;背景知识参见罗伯特·A·迪万(Robert A. Divine),《见风使舵:关于核禁试的争论,1954—1960》(*Blowing on the Wind: The Nuclear Test Ban Debate, 1954—196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

② 苏联外交部给多勃雷宁的讯息,1963年4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250—262,引自261;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应,参见罗伯特·肯尼迪致约翰·肯尼迪,1963年4月3日,出处同上,262—265。



的午宴之后，他自豪地带着卡森斯和他的女儿们参观了他那有着美丽松树林的宅地。他对建在山顶的运动房尤其得意。当两位女孩惊叹于其中的游泳池时，赫鲁晓夫鼓励她们不妨下水游玩，而他和她们的父亲可以安静地在阳台上交谈。当然谈话之前，赫鲁晓夫提出要和卡森斯来赛一场羽毛球。卡森斯对于这位当时已年近 69 的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灵敏度、反应能力和竞争精神惊讶不已。^①

但是当他们坐在落地玻璃围成的阳台上开始交谈的时候，卡森斯觉得赫鲁晓夫看上去“忧心忡忡，表情冷漠”，与四个月前见到的那位自信乐观的领袖大不一样。很快，会谈就转向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倾吐着被背叛的感受。他说，核战争是“完完全全的疯狂行径”。但是，美国再一次让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常委同事面前“看上去像个傻瓜”，因为他好不容易说服他们表决通过接受三次核查，并使他们相信这样可以达成禁核协议。而现在他不得不承受来自本国的高级军官和核能科学家要求进行更多的核试验的压力。“美国人似乎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任何决策的独裁者。事实并非如此，我也必须在发号施令之前先说服我的同事们。”赫鲁晓夫暗示说，他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压力。“我不能也不愿回去告诉部长会议，让他们改变我们苏联的立场来再次满足美国的要求。为什么我总要充当那个必须体谅对方难处的人？这次我希望对方能够充分理解我的处境。”当卡森斯雄辩地解释着说肯尼迪总统感到双方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同时诚心地希望能够和苏联达成一致，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指出是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但是他坚持说，下一步将会怎样，取决于美方的态度。^②

赫鲁晓夫已经把要点讲清楚并准备结束这次会谈，但是他礼貌地询问卡森斯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卡森斯回答说是，他想知道赫鲁晓夫对那些反对禁止核试验的美方批评家，对那些真的相信他在公开场合将要埋葬美国的言论并反对美苏和解的反对派想说些什么。

赫鲁晓夫“义愤填膺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并不是我将埋葬你们美国，而是历史将会埋葬你们。不要怪我，但是你们的资本主义体系终将灭亡。我不打算杀死你们。我没打算谋杀两亿美国人民。事实上我甚至不会参与埋葬你们。你们社会中的工人们将会埋葬你们的体系，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送葬人。别问我这种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也许明天，

① 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81—90。

② 出处同上，90—101。



或后天还不会发生。但是革命必将发生，这就好像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一样确凿无疑。”

当卡森斯为美国的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同时说马克思未能领会自由社会的流动性以及自由社会中阶级意识的消亡时，赫鲁晓夫打断他说马克思会很乐意看到革命在美国的发展壮大。“我再次重申，”赫鲁晓夫说道，“我对美国人民充满了敬意。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当他们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他们将建设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人民足智多谋、精力充沛、智慧过人、想象力丰富。如果他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对于美国人民乃至整个世界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①

很明显，赫鲁晓夫深信苏联所代表的制度最终将会证明其无与伦比的满足人类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能力。“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经济体系，它是一种最终会导致一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沦丧的生活方式。”赫鲁晓夫蔑视美国文化，嘲笑美国媒体，奚落美国式的自由理念。“如果你们[在美国的电视和电影中]所展示的虐待和暴力是你们美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的话，那么愿上帝拯救你们！你们的媒体上播放着屠杀、殴打、欺骗、咒骂、偷妻这种种的不道德行径。人们不禁要以一个国家所感兴趣的东 西来对这个国家作出评价。”^②

在与卡森斯面谈几天之后，赫鲁晓夫接受了一位意大利报纸编辑的长篇采访。他说道：“消除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真正为人类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这使苏联和西方国家能够超越冷战并进入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真正的缓和……应该由各国各民族人民齐心协力来共同创造。”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应当促进彼此之间的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不同民族应当更好地了解彼此。但是同时，”赫鲁晓夫接着说道，“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未，将来也不会认同意识形态上的和平共处。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③

赫鲁晓夫承认，他的国家和政治经济体制正面临着不少问题。“当然，我们在农业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但是这些都是有关发展和进步的问题。试想一个正在迅速成长发育的小男孩，他可能事实上每一天都在长力气……或许他长得太快以至于裤子变得太小而穿不上，或许他的外套会被撑坏从接缝处裂开，抑或其他的情况

① 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101—102。

② 出处同上，105。

③ 赫鲁晓夫接受伊利焦尔诺(*Il Giorno*)报主编的访谈，1963年4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4月24日，尤其是BB 14和15，置于文件箱188，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JFKL)，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会出现。但不管怎样,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身体健壮的。”我们的敌人们试图夸大苏联面临的问题,他说道,但是这些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相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能够为人类迈向大一统铺平道路的社会,是永远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不公正和枷锁的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①

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未必需要通过动用武力来达到,除非资本主义硬要阻止历史演变的自然进程。^②当印度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赫鲁晓夫向她解释说,因为历史是站在共产主义这一边的,所以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选择妥协。危及未来或者摧毁人类的希望,这些都是疯狂的举动。^③我们必须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必须坚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这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已经发起猛烈的攻击,并将继续不断进攻,以证明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④

赫鲁晓夫对这些思想深信不疑,同时这些思想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人民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共鸣。“我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正在不断地征服刷新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头脑。他们已经成长为人类进步思想的支配者。”^⑤在1962年和缅甸籍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赫鲁晓夫详细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腐朽的深信不疑。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是颓废的。在美国,没有剧院,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报纸都为大亨所有,因此大亨们的思想——而并非真正的人民的思想,工人阶级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宾馆、餐厅、火车上还是公交车上——黑人都遭到歧视。“这真是难以置信,”赫鲁晓夫惊叹道,“但这就是西方文明。”不,应当说它代表了一种“疯子的意识形态”。^⑥

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全人类的希望共鸣。垄断资本没有兴趣帮助那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计划经济,他们的做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

① 赫鲁晓夫接受伊利焦尔诺报主编的访谈,1963年4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4月24日,尤其是BB 10和6。

② 出处同上,BB 14。

③ 关于赫鲁晓夫与英迪拉·甘地的会谈的录音稿,1963年7月下旬,参见中央情报局,情报记录,编号EO 12958,1963年10月1日,置于文件箱188,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

④ 赫鲁晓夫访谈,1963年4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3年4月24日,BB15,出处同上。

⑤ 出处同上,BB 18。

⑥ 赫鲁晓夫与吴丹的会谈,1962年8月28日。《来源》(Istochnik)6(2003年):150—159,引自155—156。

不同。他们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帮助,同时满足他们本国人民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不会遭遇危机或衰退。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人员也会犯错,计划经济的进程也并非完美,但是这些错误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的无政府主义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赫鲁晓夫告诉吴丹,到197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和美国持平,到198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生活经历将会塑造人们的意识。届时,一些反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家都将会争相仿效苏联取得如此巨大的物质、文化和思想进步的手段。赫鲁晓夫认为,计划经济会成为未来的潮流。^①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认同赫鲁晓夫的观点。从古巴到阿尔及利亚、加纳、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主义的领导人都表示了对于计划经济的支持。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共产党人。但是“计划”是他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印度规划署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写道:“如果经济要按照所构想的速率发展的话,计划是不可避免的……国有企业这一块必须增长。”“有关生产、分配、消费和投资的核心决策——事实上有关所有重要社会经济关系的关键决定都必须由熟知社会需求的机构进行制定。”^②

赫鲁晓夫相信,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的民族会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很愿意支持他们,培养他们,为他们提供援助,忍受他们的冒犯,甚至不惜冒险承担来自不信服他的决定的同事们的责难,因为他相信国际秩序的变革以及席卷了亚非拉各民族的独立斗争昭示着人类的未来。在出访埃及归国后他表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一事实让我们苏联人民非常高兴。但是,新生事物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确立的。考验、磨难和错误的转变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帝国主义分子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批判。”他说:“国际政治舞台上

① 《来源》6(2003年):155—157。

② 印度政府,经济规划署,《第二个五年计划》(新德里,1956),23,22;同时可参考戴维·C·恩格曼(David C. Engerman),“冷战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新历史传奇”(“The 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外交史》28(2004年1月):23—54;奥德·阿恩·韦斯塔,《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73—109;福雷斯特·D·科尔伯恩(Forrest D. Colburn),《贫穷国家的革命风潮》(*The Vogue of Revolution in Poor Countries*),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

力量优势的天平正在倾向于社会主义。”^①

因为赫鲁晓夫深信第三世界的变革进程决不能被阻挠，因此他非常反感美国对苏联发出共谋维持世界现状的邀请。在1961年6月维也纳峰会期间的会晤上，他对肯尼迪总统说，他“感觉美国似乎想要求苏联像一个小学生那样把手放在课桌上乖乖地坐在座位上。苏联拥护共产主义思想并对此充满崇敬。苏联不能保证这些思想不会越过国界往其他国家传播”^②。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后，当肯尼迪总统再次要求苏联“避免恶化全球各个角落的局势”时，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礼貌地反驳道，“革命自古就存在，将来也会一直发生。”^③

此外，赫鲁晓夫也不能轻易地改变苏联的立场和政策。他毫不避讳地在他的言谈中承认他不断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无情批判，中国的领袖们嘲笑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让，反对苏联与美国进行禁止核试验的协商，嘲弄他谋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他们谴责他拒绝为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力量提供武器的行为。他们抨击他发表的意识形态上的异端邪说。他们的批评刺痛了赫鲁晓夫，因为他认为他们来自一个自身追求非理性经济政策的政府。赫鲁晓夫告诉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同事们，中国的同志们正在发表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言论。他们想要成为“交响乐团里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们正在谋求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他们攻击莫斯科而不去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样做毫无意义。但这也意味着苏联一刻都不能放弃在广大第三世界支持革命的爱国者中广交朋友，与他们结成同盟。^④

国际局势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巨大变迁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广泛的共鸣，而苏联的计划经济所取得的表面上的巨大成功在广大的新

① 赫鲁晓夫的广播讲话，1964年5月2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5月28日，BB 13；赫鲁晓夫的讲话，1964年9月16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9月17日，BB 13；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的言论，1964年6月27日，《来源》6(2003):182—184；赫鲁晓夫致菲德尔·卡斯特罗，1963年1月31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 326，国家安全档案。

② 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3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174—178，引自 177。

③ 多勃雷宁，《机密》，92。

④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1963年6月7日，马林笔记；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96；赫鲁晓夫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讲话的总结，1963年12月13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 1437，国家安全档案；B·N·波诺马廖夫(B. N. Ponomarev)的讲话，1963年12月13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 1434，国家安全档案；托马斯·L·休斯致迪恩·腊斯克(Thomas L. Hughes to Dean Rusk)，1963年6月4日，文件箱 2，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主题文档，1961—1963，国务院档案，第 59 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关于中苏决裂的背景知识，参见，例如，奥德·阿恩·韦斯塔(编)，《肩并肩的兄弟：苏中同盟的起起落落，1945—1963》(*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1998。

兴国家的首都博得了非常高的尊崇。但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分裂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阵线,并造成了能让资本主义敌人有机可乘的漏洞。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共产党大发雷霆,但是同时也认识到他们必须尝试治愈中苏不和带来的伤痛,同时在中苏两国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的狂热竞争中遵循保持共产主义内部团结的原则。^①

赫鲁晓夫不会调整他对意识形态的热忱,也不会停止苏联为了争取人心所参与的竞争。但是,当他意识到一场和美国的对立到达顶点可能会造成核战毁灭地球时,他平息了胸中的怒火。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务实同时重视意识形态,性格冲动但同时为人审慎。农奴的孙子,农民的儿子,少年时放过羊,青年时当过煤矿工和机械师,未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赫鲁晓夫却意外地攀上了权力的巅峰,这应当归功于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坚忍不拔的决心,街头学来的小聪明,朴实的智慧,以及对一位残酷邪恶的领导人的效忠。他对自己所建设的文明感到非常自豪,但也清楚地意识到他曾经拥护斯大林主义的经历是多么大的一块污点。1930年代,作为莫斯科市党委领袖,赫鲁晓夫曾经攻讦了“人民公敌”。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乌克兰的党内沙皇,他负责对知识阶层进行大清洗,杀害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同时摧毁了当地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势力。虽然赫鲁晓夫的双手浸满了他所谋害的人的鲜血,但现在赫鲁晓夫仍然希望人民能够铭记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希望人们记住他把斯大林主义的毒素从苏联的体制中驱除出去,记住他有序地安排权力的交替。“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诺曼·卡森斯这样评价道。^②

赫鲁晓夫全身心致力于完善一种优越的文明,他是这么认为的。他和他的同事们毕生致力于的社会主义事业曾经几乎被纳粹入侵者所毁灭,而现在,他相信,社会主义仍然受到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的威胁。而现在他一直期望塑造的社会主义乌托邦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核战导致人类灭亡。为了能够保护和培育他所最为

① 波诺马廖夫的讲话,1963年12月13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1434,国家安全档案;B·N·波诺马廖夫,《波诺马廖夫讲话与文书选集》(*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牛津:培格曼出版社(Oxford: Pergamon Press),1981,82—104。

② 赫鲁晓夫对卡森斯所讲的发人深省的讲话,参见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108—110;关于赫鲁晓夫的背景,尤其可以参见陶布曼,《赫鲁晓夫》,72—207;尤里·沙波瓦尔(Iurri Shapoval),“在乌克兰的岁月”(“The Ukrainian Years”),收于陶布曼,谢尔盖·赫鲁晓夫和格里森(编),《尼基塔·赫鲁晓夫》,8—43。“我的双臂直到手肘都浸满了鲜血。这是我灵魂深处最为恐怖的一件事,”赫鲁晓夫在退休后这样回忆道。参见威廉·陶布曼,“如何用一次讲话来赢得冷战的胜利”(“How a Speech Won the Cold War”),纽约时报,2006年2月25日。



珍视的社会主义事业，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缓和竞争，避免错误的计算，协商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限制军备竞赛，同时签署能够确保两个德国分立和维持欧洲战后领土现状的条约。

1963年春天，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同事们他们应当在谋求缓和的进程中考虑多种方案，包括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甚至是与西德调停。^①但是，在他辨明美方是否对他的建议作出相对等的回应之前，他不打算在任何方面采取贸然行动。

他那莽撞的咆哮化为了急躁的审慎。没有人知道他下一步将会做什么。他疯狂而频繁地在苏联内外游历。他访问了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印度和埃及，常常作一些冗长而枯燥的演讲。在莫斯科，他与党内的官僚和军方的官员争论，与作家、诗人、画家争吵，因为他们日益增长的艺术自由让他非常反感，同时他开始再次镇压他们。^②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他是一个很受伤的政治家，但是他仍然渴望取得新的突破，并希望能找到一位和他一样对和平及人类福祉充满热忱的伙伴，即使这位伙伴代表着一种终将被扔进历史垃圾桶的文明。

肯尼迪等待时机

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于赫鲁晓夫的提议保持警惕。就好像1953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肯尼迪需要看到苏联的真正行动，而不是听信苏联的说辞。通过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一事，赫鲁晓夫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他“并不希望我们成功”，肯尼迪在1962年底接受一次采访时说道。^③

肯尼迪承认赫鲁晓夫并未打算动用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来袭击美国。但是它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存在“却有可能在政治上改变[全球]实力的平衡。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表象很快会变成现实”。苏联领导人再次表明他不值得信任。通过诡计多端和胆大妄为，苏联人正谋求着创造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世界”。^④

①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1963年4月25日，马林笔记；会议记录第101a号，1963年6月13日，出处同上；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22—526。

② 陶布曼，《赫鲁晓夫》，578—619；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传》(Khrushchev: A Biography)，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译)，花园城，纽约州：锚版图书，1984，213—222。

③ “电视和广播访谈”，1962年12月17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F·肯尼迪，1962》，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63，900。

④ 出处同上，898。

然后,总统并不是不愿意与共产党人和平竞争,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放弃扩张主义的行事方式并终止对于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战争的支持。他们的体制“事实上是不符合普通人期望的体制”^①。因此,美国人民欢迎和平竞争。但是肯尼迪说,克里姆林宫不能不允许人民进行自由选择。因此冷战的结束还遥遥无期。共产主义的政策还不太可能得到改变。“一时的停歇并非和平的希望,”肯尼迪在1963年1月14日向国会作出的国情咨文中这样告诉国会,“对于世界局势的预测表明……新的一年并不是让我们休假的一年,而是充满责任和机会的一年。”^②

机会并不意味着和苏联领导人的一次会晤。肯尼迪不认为再召开一次首脑峰会可以取得多大成果。他也不认为,有关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分歧的种种迹象能为美国提供多大希望。他告诉国会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争论是关于手段,而非目的的争论。”“一场关于怎样才是埋葬自由世界的最佳方案的争论根本就不值得西方社会欢欣鼓舞。”^③

竞争意识深深植根于肯尼迪总统的基因之中。出生于一个拥有着巨大新兴资产和广泛政治人脉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裔家庭,肯尼迪的血管中脉动着勃勃的雄心。他接受了精英化的私立学校教育,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当上国会议员,并于1952年进入美国参议院。从政治生涯的早期开始,他就立志成为美国总统。效忠和奉献是他所属的阶级和年龄层的座右铭。多年的国际经济萧条让他变得坚强,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失败教训让他变得机智,亲身经历世界大战的艰辛让他变得强硬,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想要同贫困和专制作斗争,并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适应被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斗争所彻底改变的国际格局。虽然这位充满朝气的总统经常会偶染微恙,但无疑他总是散发着自信、活力和决心。他机智聪明、思路缜密、举止优雅、能言善辩。“让我们向世界自豪地宣告,”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接力的火炬已经传递给了新一代人。”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美国人将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任何压力,直面任何困难,支持任何盟友,反抗任何敌人,以确

① “电视和广播访谈”,1962年12月17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F·肯尼迪,1962》,900。

② “年度国情咨文”(“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1963年1月14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3》,15。

③ 出处同上,17—18;关于苏中决裂,参见中央情报局,反情报办公室(OCI)编号0581/63,“中苏关系中的一次新危机”(“Sino-Soviet Relations at a New Crisis”),1963年1月14日,文件箱180,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



保自由的长存和胜利”。^①

肯尼迪意识到，言论自由和自由企业经济被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国际体系所围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正在积极活动，谋求独立自主，渴望能够摆脱落后状态。肯尼迪知道，这些分布于全球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为赫鲁晓夫提供了绝佳的良机来证明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同时他相信，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史无前例的挑战。“我的确认为我们正朝着将世界两分为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的趋势发展，就好像它们是两支部队，”肯尼迪告诉他的美国同胞们，“但事实是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的分裂，为贫困所深深困扰，许多情况显得如此令人绝望，因此我们必须以全身心的努力来增强非共产主义世界这一块的实力。”^②他深信这是当前最为紧迫、亟待完成的任务。作为肯尼迪的朋友和顾问，小阿瑟·梅尔·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写道，冷战“是一场两个不同体系之间的斗争，双方都试图证明自身比对方能更好地应对一个无情冷酷地不断变化的世界”^③。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肯尼迪优先考虑怎样阻挠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前进发展，而非对苏联要求缓和的建议作出回应。赫鲁晓夫发表于1961年1月6日的演讲，而非他最近寄来的书信，让肯尼迪永远铭记在心。在那次演讲中，赫鲁晓夫表达了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忱支持——虽然这些民族解放战争不是苏联发起的，但是苏联愿意支持他们，这场运动将被载入史册，这场运动标志着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并预

① 引文参见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1》，1—3；极富启示意义的关于肯尼迪及其任内的政府陈述，参见达莱克，《未完成的人生》；迈克尔·奥布莱恩(Michael O'Brien)，《约翰·肯尼迪传》(John F. Kennedy: A Biography)，纽约：托马斯·杜恩/圣马丁出版社(New York: Thomas Dunne/St. Martin's Press)，2005；罗伯特·D·迪恩(Robert D. Dean)，《威严的大丈夫气概：性别与冷战外交政策的制定》(Imperial Man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0；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肯尼迪总统：权力的侧影》(President Kennedy: Profile of Power)，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3；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约翰·F·肯尼迪：毫无瑕疵的青年时期》(JFK: Reckless Youth)，纽约：兰登书屋，1992；约翰·D·费尔(John D. Fair)，“智慧的约翰·F·肯尼迪：在英国史启示下的政治家生涯经验”(“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外交史》30(2006年1月)：119—142。

② “电视和广播访谈”，1962年12月17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2》，900。

③ 小阿瑟·梅尔·施莱辛格致西奥多·索伦森，1963年1月2日，文件箱327，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

示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① 对于克里姆林宫在第三世界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美国必须保持审慎,阻止苏联继续从中受益。在拉丁美洲,苏联希望从卡斯特罗革命的巨大声望中获利,并更好地利用广大拉美国家中广泛存在的痛苦和绝望情绪;因此,对肯尼迪总统而言,1961年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在于尝试一方面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另一方面发起一个“进步联盟”以促进西半球的经济、社会、政治改良。^② 但是,肯尼迪忧虑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各个角落。在整个非洲大陆,苏联似乎在密谋策划着通过提供援助和尝试协商达成新的民用航空协议来获取更大的优势和利益。^③ 在东南亚,克里姆林宫似乎并不愿阻止在老挝新近爆发的右派、中间派和左派三方之间的争斗,虽然之前在1962年苏联曾尝试过帮助三方通过协商来达成“平衡”各派的协议。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苏联人似乎始终准备着要利用当地的冲突、内战和局部动荡。“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自称中立派的人加入共产主义阵营,”肯尼迪在1963年1月告诫他的顾问们,“如果我们失去他们,那么力量平衡的钟摆将离我们而去。”^④

在越南南方,肯尼迪总统知道克里姆林宫并不对南越由共产党领导并得到河内支持的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吴庭艳政府的持续斗争负责。艾森豪威尔在任时于1954年扶持了吴庭艳政府,为他提供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前往南越帮助训练一支效忠于他的部队。但是吴庭艳从未能积攒起足够的民众支持。在拒绝了一次他知道胡志明和北越共产党领袖会获胜的全越南大选之后,他在南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仍停留在南越境内的支持前越南独立同盟的共产党人在1954年协商签署日内瓦协

① 赫鲁晓夫演讲的关键部分,参见尤西·哈尼马基(Jussi Hahnimaki)与奥德·阿恩·韦斯塔(编),《冷战:从文献和目击证词中发掘历史》(*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358—360;有关肯尼迪的成见,参见,例如,“肯尼迪对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所作讲话的小结”,1962年1月18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国家安全政策》,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8:239—240;关于赫鲁晓夫讲话的反响,参见文档记录备忘录,关于肯尼迪对跨部门研讨会上的教职员和学生所发表的讲话,1963年4月22日,文件箱315,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

② 斯蒂芬·C·拉贝(Stephen C. Rabe),《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约翰·F·肯尼迪应对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革命》(*The Most Dangerous Area in the World: John F. Kennedy Confront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9。

③ 参见文件箱1和2中的许多文件,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的文档记录,主题文档,1961—1963,FM 1993,国务院的文档记录,第59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④ 引文参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63年1月22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8:460;关于肯尼迪发表的声明的背景,参见科默提供的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1963年1月19日,文件箱314,国家安全文档,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有关在欠发达国家的美苏竞争,参见“美国国务卿政策制定会议中的重点”,1963年3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658。



议之后强烈要求推行土地改革,公正税制以及消灭腐败。但这些提议都被横加阻拦,于是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武器,组成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越共”),寻求北越共产主义政府的支持,通过武装斗争试图推翻吴庭艳政权。

肯尼迪总统对于美国对越南所承担的义务感到很矛盾,但是他仍然分别在 1961 年、1962 年和 1963 年初作出决定,逐步增加对越南的投入。他期望这场镇压暴动和游击战的实验能够成功,并且不希望看到美国采取派出作战部队或炮轰北越的措施,虽然他身边的不少顾问向他施压要求他这么做。但同时他坚信“美国有强烈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必须待在越南”。“如果你输掉了越南,”罗伯特·肯尼迪说道,“所有人都非常清楚东南亚的其他地区都将沦丧。”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认为如此巨大的损失“将会对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①

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的良好意愿持怀疑态度。而当他得知赫鲁晓夫放任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西半球进行颠覆活动时,这种怀疑被进一步加深。事实上,克里姆林宫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来移除部署在古巴的所有军队、飞机,甚至战术核武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声讨卡斯特罗并诋毁赫鲁晓夫。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坚称,“我们必须把苏联轰出去”,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防止任何其他国家再次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肯尼迪对此表示同意,并持续地批准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② 当肯尼迪总统于 1963 年 4

① 有关罗伯特·肯尼迪与他的胞兄交换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参见埃德温·O·格思曼(Edwin O. Guthman)和杰弗里·舒尔曼(Jeffrey Shulman)(编),《罗伯特·肯尼迪的亲口陈述》(*Robert F. Kennedy in His Own Words*),纽约:班塔姆图书公司(Bantam Books),1988,394—395;关于肯尼迪与越南的背景知识,尤其可参见戴维·凯泽(David Kaiser),《美国式悲剧:肯尼迪、约翰逊以及越战的起源》(*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1—212;加雷斯·波特(Gareth Porter),《主导权的风险:权力的不平衡以及通向越战之路》(*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5,141—179;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一代人的消亡:吴庭艳和肯尼迪遇刺对延长越南战争所产生的负面作用》(*Death of a Generation: 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总结”,1963年3月13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11:715—71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委会议的总结记录”,1963年4月23日,出处同上,780—781;文档记录备忘录,德斯蒙德·菲兹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整理,1963年6月19日,出处同上,837—838;文档记录备忘录,1963年11月12日,出处同上,883—885;舍曼·肯特(Sherman Kent)整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准备的备忘录,“古巴未来一年”,1963年4月22日,文件箱315,会议和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同时可参考唐·博宁(Don Bohning),《为卡斯特罗所困扰:美试图颠覆古巴的秘密行动,1959—1965》(*The Castro Obsession: U. S. Covert Operations Against Cuba, 1959—1965*),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图书公司(Potomac Books),2005。

月下旬派副国务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前往莫斯科访问苏联时,哈里曼告诉赫鲁晓夫,他“必须意识到古巴正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既然对于苏联而言在古巴部署军队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苏联为何不把军队从古巴撤出?”^①

当然总统也意识到,卡斯特罗并不是赫鲁晓夫的附庸,但是总体上而言,他正谋求着利用拉美国家的贫困和绝望。“我认为拉丁美洲是我们最为艰难的地区,”肯尼迪于1963年1月8日这样告诉美国的立法领袖们,“并不真正因为卡斯特罗,而是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原文如此]。”全局意指拉美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贫困。^②

但卡斯特罗并非是唯一试图利用动荡的社会经济局势的人。肯尼迪对中国也给予了相同程度的关注。他知道,中国也将在不久的未来进行第一次核试验。^③ 届时北京将会更倾向于冒险推广他们自己版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对1962年秋天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所持的中立态度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因此毛泽东决定在第三世界谋求更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将会抛开苏联继续在最不发达国家中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中央情报局汇报说。他们仍将会继续“激烈地反对美国”。^④

因此,中苏决裂为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平添了不少忧虑,而这也促使了他们选择与苏联对抗而非和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肯尼迪总统深知全球局势的动荡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源自苏联,而是源于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分裂以及在世界上较不发达地区持续沸腾的动荡局面。

但是,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分裂。1962年12月以及1963年1月,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两次挑战美国对北约的领导权。他拒绝接受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并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他邀请德国总

① 会谈备忘录,1963年4月26日,文件箱187,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② 录音磁带,“为立法领袖所作的有关外交政策的简要通报”,1963年1月8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弗吉尼亚大学。

③ 出处同上;威廉·伯尔(William Burr)与杰弗里·T·里切尔森(Jeffrey T. Richelson),“是否应当‘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核项目,1960—1964”(“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1964”),《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5(2000年冬/2001年):54—99。

④ 国家情报评估(NIE)13—63,“共产主义中国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前景”(“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ommunist China”),1963年5月1日,文件箱4,国家情报评估,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访问巴黎,并与联邦德国签署了一份保证双方国土安全的条约,同时重申战后法德和解的真诚。戴高乐再次强调,法国将发展本国独立的核力量,并暗示可能与西德达成核交易。他和阿登纳一样不信任美国对他们国土安全所作出的承诺,并害怕美国会与莫斯科签订协议,削减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承诺以减轻美国财政的负担。戴高乐和阿登纳同时担心美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急躁鲁莽、傲慢自大和错误判断可能会把法德两国再次拖入与他们的核心利益无关的战争中去。戴高乐成功地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泥沼中救出,同时巩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这使他深受鼓舞并试图复兴法兰西的辉煌,并自诩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应对一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世界。^①

肯尼迪总统对戴高乐的举动和阿登纳的行为感到不安,甚至迷惑。他告诉他的顾问们说:“戴高乐可能正试图通过和俄国人做交易来把我们逐出欧洲。”肯尼迪同时思忖着阿登纳暗示将要建立一个欧洲防御体系又意欲何为。^②他命令中情局每周向他汇报法苏两国谈判的每一个方面的细节。^③

因为肯尼迪和他的助手们认识到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戴高乐的政策,所以他们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西德上,肯尼迪坚持认为西德必须保持“与西方的结盟”。毕竟,美国推行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总体目标是“保证德国的安全,同时确保德国不成为一个有核国家”。如果西德能够参与到多边核力量计划,肯尼迪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或

① 埃林·马汉(Erin Mahan),《肯尼迪、戴高乐和西欧》(*Kennedy, DeGaulle, and Western Europe*),汉普郡,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2002,128—162; 罗纳德·J·格拉涅里(Ronald J. Granieri),《矛盾的同盟:康拉德·阿登纳,基督徒民主联合会/基督徒社会联盟,以及西方社会,1949—1966》(*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1966*),纽约:贝格汉图书公司(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3,150—190;《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3:739—761; 汉斯·彼得-施瓦茨(Hans Peter-Schwarz),《康拉德·阿登纳,杰出的政治家,1952—1967》(*Konrad Adenauer, the Statesman, 1952—1967*),杰弗里·彭妮(Geoffrey Penny)(译),普罗维登斯,罗德岛(Providence, R. I.): 伯格汉图书公司,1997,662—676; 杰弗里·格兰·吉奥克(Jeffrey Glenn Giauque),《宏伟规划与统一的愿景:北约诸强与西欧的重组,1955—1963》(*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 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55—1963*),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2,158—237; 托尼·朱特,《战后》,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278—292。

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会议的总结记录”,1963年1月2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3:487—491。

③ 麦克乔治·邦迪致中央情报局局长,1963年2月1日,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 219,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73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至少推迟他们对于拥有独立自主的核力量的热情和渴望。^①但是对于过去的记忆和对将来的恐惧塑造了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知道，不可能“把西德无限时地放逐在一个核弱势的地位”；过去那些试图压制德国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的尝试最终导致了灾难的降临，因此不应该重演。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毫无疑问，“除非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24个月牢牢地把他们绑定在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框架内，[西德]将在今后10年到20年之内拥有独立的核力量”。^②

肯尼迪清楚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他知道苏联人肯定会反对让西德加入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想法。“从我和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哈里曼大使在1963年1月23日提醒肯尼迪说，“我深信苏联人对德国军国主义的重生极其担忧。”虽然赫鲁晓夫并不认为阿登纳会提倡侵略性的军事政策，但是他对未来的德国领导人是否会这样做表示深深的怀疑，同样肯尼迪的不少顾问也持有相同的顾虑。“这一点上，我同意赫鲁晓夫的忧虑，”哈里曼写道，“我对德国未来的发展也充满不信任……一位新的德国领导人，比如[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完全可能对我们重演一次戴高乐式的发展西德的独立核力量。”^③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警告以及多边核力量计划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肯尼迪还是指示他的助手们考虑是否能够与英国、西德，以及其他的北约盟友国就此计划进行谈判。此刻，法国和西德采取的行动，表达的情绪，以及他们对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所提出的缓和建议，需要美国优先应对。为了使西德远离戴高

① 引文参见文档记录备忘录，1963年1月18日，文件箱317，备忘录与会议，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1月12日就纳塞公国协定的生效与总统会晤的记录”，由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整理，1963年1月14日，文件箱5，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文档记录，1961—1963，MLR 3063A，第59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同时可参考“肯尼迪总统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前发表的言论的记录”，由中情局记者记录，1963年1月22日，文件箱314，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特拉赫滕贝格，《构建和平》，302—321。

② 杰弗里·基钦(Jeffrey Kitchen)致腊斯克，1963年1月11日，文件箱5，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的文档记录，MLR 3063A，第59号记录组；同时可参见备忘录，基钦整理，1962年12月27日，文件箱4，出处同上；麦克纳马拉的引文，参见国防部首长会议，1963年1月7日，文件箱23，麦克斯威尔·泰勒文件(Maxwell Taylor Papers)，参谋长联席会议文档记录，第218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③ 哈里曼致肯尼迪，1963年1月23日，哈里曼文档。非常感谢凯·伯德(Kai Bird)与我分享这一文件。弗兰克·科斯蒂廖拉(Frank Costigliola)在“林登·B·约翰逊，德国和‘冷战的终结’”(“Lyndon B. Johnson, German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一文中解释了美国官员对德国实力增长的忧虑，此文收录于《林登·约翰逊对抗全世界：美国外交政策，1963—1968》(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1968)，沃伦·I·科恩(Warren I. Cohen)与南希·贝恩科普夫·塔克(Nancy Bernkopf Tucker)(编)，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173—192。



乐的控制,以及谨防波恩受到莫斯科的诱惑而与之签署独立协议,肯尼迪不断探索各种形式的多边核力量实现的可能,同时重申对于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统一的支持。他更倾向于不理睬苏联的建议,直到“德国完全听话”为止。^① 为了能够安抚西德的情绪,肯尼迪在一盒录音的会谈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承认,“我们正在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②

肯尼迪从未对赫鲁晓夫的缓和要求作出过适当的回应。最有可能缓和与克里姆林宫的紧张局势的方法就是协商签署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因为赫鲁晓夫觉得是否接受核查这个问题已经让他在苏联国内焦头烂额。^③ 但是肯尼迪却相信必须增加核查的次数和更多的监测手段才能够克服美国国内政治对手的保留反对意见。他清醒地知道,共和党人正等着对他的轻信上当进行狂轰乱炸。因为他的注意力焦点从未远离如何赢取 1964 年的总统大选,同时其工作重心偏向于国内的减税政策,肯尼迪倾向于为自己保留更大的开放式的选择余地。放弃了豪赌一把可能会赢得世界和平的机会,肯尼迪选择静候时机的到来。^④

给和平一个机会

然而,1963 年 6 月 10 日,肯尼迪总统却作了一次在他的任期内最为惊人也最为雄辩的演讲。这次演讲由他在白宫的几位亲信幕僚秘密起草。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情局和国务院都未得到过目、质疑或修改这份演讲稿的权利。总统最亲密的心腹告诉我们,这份演讲中的词句反映了他内心最深处的信念,他对理想主义的热忱,他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面临的危机的敏锐认知,以及在未来超越这些危机的

① 关于探索多边核力量的可能性的决定,参见《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3:487—511;关于肯尼迪对与苏联就柏林和德国问题进行磋商的态度,参见会谈备忘录,1963 年 2 月 15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5:486—488;关于对西欧的宏观政策,参见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写的重要文章(无标题),1963 年 2 月 9 日,文件箱 314,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同时参见编辑注解,《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88—189。

② 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晤,1963 年 1 月 15 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

③ 编辑注解。《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596—597,664;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17。

④ “在共和党猛烈抨击下重启核禁试以及裁军谈判”,《美国国会季刊每周报道》(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1963 年 2 月 15 日,176;“日内瓦会谈在美国政局动荡中继续召开”,1963 年 4 月 19 日,出处同上,634;埃林·马汉,“肯尼迪政府期间的民意与美苏缓和”,“Public Opinion and Détente During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未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

决心。^①

在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的年度开学仪式上，肯尼迪总统发表了这次演讲。在演讲伊始，他引出了一个“总是存在着太多的无知却鲜有人理解其真谛所在的”话题。然而，这也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话题：世界和平。我们追求的究竟是怎样的和平？”肯尼迪娓娓道出他长久以来的思考：

绝非美国用战争武器强权胁迫下的世界和平。也不是坟墓的和平或奴役的安全。我所谈论的是真正的和平，那种让生活变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和平，那种让人民和国家能够自由发展，拥有希望，并为子孙后代建设更美好人生的和平——绝非仅仅是为美国人着想的和平，而应当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是世代永远流传下去的和平。

肯尼迪接着解释道，然而现代武器却让和平变得岌岌可危。和平应当是“理性人民的理性目的”。和平应当被视为“一个过程——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平“必须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应当是不断变化以适应每一代新人的挑战”。他接着说，和平“绝非不切实际，而战争也绝非不可避免”。

但为了迎接和平的到来，美国人民需要重新思考对待苏联的态度。“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或社会体制会邪恶到让我们把他们所有的国民都视为缺乏道德的人。”作为美国人，

我们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视其为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否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为俄罗斯人民在科技和外太空利用上，在经济和工业增长上，在文化和勇敢之举上所取得的众多成就而喝彩。在历史长河中的诸多战争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蒙受的巨大损失相比较。至少有两千万苏联人在二战中失去了生命。数不尽的、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和农场被焚毁或洗劫。苏联三分之一的领土，包括国家近三分之二的工业基地，被战争夷为了满目疮痍的荒原——这相当于我们国家芝加哥以东的所有地区被完全

① 西奥多·C·索伦森(Theodore C. Sorenson),《肯尼迪》(*Kennedy*),纽约:班塔姆公司,1965,822—823;小阿瑟·梅尔·施莱辛格,《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格林威治,康涅狄格州:福西特/霍顿米夫林公司(Greenwich, Conn.: Fawcett/Houghton Mifflin),1965,821—823。



摧毁。

因此,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肯尼迪总统这样宣告。让我们重新审视冷战。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够在不放松警惕的前提下寻求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可以从中大受裨益。巨额的资金可以被重新分配,用于“消除无知、贫困和疾病”。我们可以消除对彼此的猜忌,解放宝贵资源并用于更富建设性的用途,同时也可以遏制军备竞赛。虽然共产主义“将自身的政治经济体系强加于人的企图是导致当今国际社会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尊重人民自行决定未来的权利,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能够重新遵守“世界法则”,那么这种紧张局势是可以得到根本改变的。事实上,共产主义阵营本身也可能发生演变。如果我们携手追求和平而不是准备战争的话,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肯尼迪总统勾勒了一系列提议以及步骤。他将建立与克里姆林宫的一条直通“热线”以备在危急时刻促进双方的沟通。他将重启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并寻求制止核武器的扩散。他将派一名代表前往莫斯科加入苏联与英国之间的会谈以期能够达成一份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受进一步的核污染,只要其他国家也停止大气层核试验的话,他也将停止美国在大气层所进行的核试验。肯尼迪清楚地保证,美国不会做任何危及盟友国或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的事情。但是,他总结说道,是时候“为建设强者公正而弱者安全的世界和平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份贡献了……我们将充满自信与无畏地致力于推行——并非通向人类毁灭的战略,而是通往世界和平的战略”。^①

苏联的领袖们对于这份演讲稿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二战后最为重要的美国总统演讲,但是掩卷沉思之时,他们又不禁心存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肯尼迪总统传递出这样一条讯息?^②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对这次演讲的出炉有一定的影响。在3月,他写了一封13页的长信给肯尼迪总统,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很抱歉将如此冗长的一封信加诸你,但是我觉得,在一切都变得太迟之前,我个人有非常重大的职责必

① “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963年6月10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3》,459-464。

② 关于赫鲁晓夫在与哈里曼、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 Henri-Spaak),以及英迪拉·甘地的会谈中对肯尼迪的美利坚大学演讲的褒奖,参见哈里曼致腊斯克,1963年7月27日,文件箱187(葛罗米柯会谈—哈里曼),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波伦致腊斯克,1963年7月11日,文件箱187(赫鲁晓夫—斯帕克),出处同上;赫鲁晓夫与甘地和考尔会谈的录音稿,[1963年7月下旬],文件箱188(弗里曼和甘地/考尔),出处同上。

须要履行……虽然这种职责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现。”麦克米伦希望能够约见赫鲁晓夫,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与苏联进行磋商,以期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并“使苏联能够尽快接近或融入欧洲”。^①

但是,比麦克米伦的恳请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赫鲁晓夫提出了更多的缓和提议,并且对美国冷淡反应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当诺曼·卡森斯从莫斯科归来后,他约见了肯尼迪总统,告知总统和他的顾问说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积怨已经很深了。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期望看到进展,但总是被冷漠回绝。卡森斯说现在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必须抓住主动权并努力终止冷战。^② 4月,哈里曼在会见了赫鲁晓夫之后,拍回了持相似观点的电报。赫鲁晓夫似乎“更为苍老,活力大不如前,而且看上去非常疲惫”。他对中苏分歧感到大为恼怒。他希望能够证明对资本主义敌人采取更为柔和的方针和路线能够有所收获。赫鲁晓夫是“真诚地希望能够与美国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会见5月底来访莫斯科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T·西博格(Glenn T. Seaborg)时这样说道。“这并非政治宣传需要,”勃列日涅夫强调说,“而是我们政府、人民和苏联共产党的真诚期盼。”^③

肯尼迪越来越倾向于重视苏联的这些声明和提议。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联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实力,但是现在经济发展趋势正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苏联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克里姆林宫对现有的资源显然已“过度调拨”。中情局报告说,苏联人现在非常害怕会发生局部战争,并认为“苏联现有的战略地位处于弱势”。^④ 赫鲁晓夫很希望能够追赶上美国,但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肯尼迪知道美国的战略优势并未受到动摇。

① 编辑注解,《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656;会谈备忘录,哈里曼整理,1963年4月29日,文件箱315,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② 卡森斯,《不切实际的三头政治》,114-122;会谈备忘录,1963年4月22日,文件箱188,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③ 会谈备忘录,哈里曼整理,1963年4月26日,文件箱315,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格伦·T·西博格,《肯尼迪、赫鲁晓夫与核禁试》(*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1,204—205。

④ “美国国务卿政策制定会议中的重点”,1963年3月2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654—660,引自656;国家情报评估11—4—63,“苏联军事实力与政策,1962—1967”,1963年3月22日,出处同上,8:469—477,引自471;同时可参看国家情报评估11—63,“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主流趋势”,1963年5月22日,出处同上,685—701。



在赫鲁晓夫 10 月退却之后，肯尼迪开玩笑地说道：“我把他吓破了胆。”^①现在，赫鲁晓夫希望与美国进行谈判，肯尼迪意识到这是一次以强势姿态与苏联对话的机会。“让我们永远不要出于恐惧才进行谈判，”在就职演说中肯尼迪这么说道，“但是让我们永远也不要害怕进行谈判。”^②

肯尼迪同时也计算了如果和苏联缓和可能会冒的风险，因为事实上苏联在亚洲和非洲取得的进展并不大。虽然苏联在第三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事实上其在第三世界取得的进展比美国所预估的要小得多。而苏联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并未为苏联赢得多少荣誉或向苏联倾斜的影响力。^③“中立派的领导人尽管披着反殖民主义的外衣，但基本上大多采取民族主义的取向，”美国情报机构的分析员总结说，而这些领袖们抵制苏联对他们国家渗透入侵的企图。例如，在几内亚、加纳和马里，尽管俄罗斯在 1962 年向这三个国家各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卢布，但是仍然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莫斯科终于开始意识到对外援助项目的潜力比事先预期的效果要局限得多。”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托马斯·L·休斯(Thomas L. Hughes)在写信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时这样写道。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罗伯特·W·科默(Robert W. Komer)强调说：“时机正掌握在我们手中。”^④

许多肯尼迪亲信的顾问认为，苏联正在遭遇的这些麻烦只是为缓和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⑤但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肯尼迪的美利坚大学演讲。与苏联和英国达成核禁试协议可以遏制北京追求核武器的企图。肯尼迪总统说：“我们尝试与苏联达成核禁试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制止或延缓中国共产党发展自身核实力的脚步。”他们可能是“六十年代后期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潜

① 引文参见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一个短暂的耀眼时刻: 追忆肯尼迪》(*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Remembering Kennedy*), 波士顿: 利特尔 & 布朗公司, 1983, 215; 关于肯尼迪对美国军事战略实力的优势的自信, 参见, 例如, 他与麦克纳马拉、麦克斯威尔·泰勒的录音会谈, 同时参见“国防预算会议”, 1962 年 12 月 5 日, 总统录音项目, 米勒中心。

② 肯尼迪就职演说, 1961 年 1 月 20 日, 参见《总统公开文件: 肯尼迪, 1961》, 1—3。

③ 国家情报评估 10—63, “区域经济与军事援助项目”, 1963 年 1 月 10 日, 文件箱 1, 国家情报评估, 国家安全文档,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文档记录备忘录, 罗伯特·科默整理, 2, 1963 年 5 月 8 日, 文件箱 322, 会议与备忘录, 国家安全文档,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④ 为总统整理的备忘录, 科默整理, 1963 年 1 月 19 日, 文件箱 314, 出处同上; 休斯的观点, 参见休斯致腊斯克, 1963 年 5 月 28 日和 1963 年 7 月 12 日, 文件箱 2, 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的文档记录, 1961—1963, MLR 3055A, 第 59 号记录组, 国家档案馆; 同时可参见美国官员与法国官员之间会谈的备忘录, 1963 年 6 月 10 日, 出处同上。

⑤ “美国国务卿政策制定会议中的重点”, 1963 年 3 月 26 日, 《美国外交关系, 1961—1963》, 5: 654—660; 国家情报评估 11—63, “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主流趋势”, 1963 年 5 月 22 日, 出处同上, 685—701。

在的主要对手”。^①

虽然外部有英国的施压、苏联的弱势和中国的狂热,但要不是有国内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肯尼迪也不会尝试寻求和平。共和党对于他的批评日益尖锐。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籍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说,总统先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应该寻求与克里姆林宫达成核禁试协议。^② 尽管民意仍然有所分歧,但是大部分公众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支持。主张和平的团体正逐渐增强着他们的要求和主张,而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坚信他们的祖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当民众们被问及美国是否有可能与苏联达成协议时,49%参与调查的民众回答说是;而37%给出了否定回答。^③ 肯尼迪直觉地认识到,强有力的总统领导可以促成民意的转变,尽管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民主党内仍然遭遇一定的反对意见。^④

情报分析员和总统顾问们仔细审视了赫鲁晓夫的动机和政策。他们相信的确有机会寻求和平,同时有可能促使苏联的转变。虽然克里姆林宫暂时还未重新评估其核心原则,但是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这么做。中情局的分析员写道:“苏联人民持久的失望情绪可能会为从长远上促使苏联转向接受永恒的多元世界提供一种可能。”^⑤

不少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官持相似观点。他们热切地盼望西方能够赢得冷战的胜利,但是他们同时意识到了缓和带来的益处。两难的矛盾心理使他们痛苦不堪。他们甚至开始认为可以通过交织缓和与遏制来赢取冷战的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没有比洞悉并正确评估促成[克里姆林宫]的领导目标和走向转变的可能性来得更重要,”国务卿腊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这样总结道,“过去苏联总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并付出沉痛的代价。毫无疑问,我们已经错过了一些机会。”^⑥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记录”,1963年1月22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8:462,包括脚注⑥;同时可以参见肯尼迪致哈里曼,1963年7月15日,出处同上,7:801;同时可以参考肯尼迪会见瓦西里·库兹涅佐夫,1963年1月9日,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208,国家安全档案;伯尔与里切尔森,“是否应当‘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54—99。

② “1962年活跃的‘和平’组织,以及展望1964年”,《美国国会季刊每周报道》20(1962年11月2日):2101。

③ “展望和平”,1963年1月4日,乔治·H·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公众意见,1935—1971》,纽约:兰登书屋,1972,3:1797;“展望和平”,1963年7月5日,出处同上,1826;背景知识,同时可以参考维特纳,《与核弹作斗争》(*Struggle Against the Bomb*),370—414。

④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753—754,783—784,802,821,829—831。

⑤ 国家情报评估11-63,“苏联外交政策的主流趋势”,1963年5月22日,出处同上,5:685—701,尤其是697,699。

⑥ “美国国务卿政策制定会议中的重点”,1963年3月26日,出处同上,654—660。



此刻肯尼迪总统决定冒险寻求和平，尽管作为冷战根基的压力、局限、原则和考虑都仍在发挥作用。当埃夫里尔·哈里曼在1963年7月中旬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和英国官员进行会晤时，世界的未来充满了变数。然后，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三方达成了共识，同意缔结核禁试协议，虽然三方都不确定这份协议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三方就如何进行地下禁试或是否应当进行地下禁试并未达成共识，但是三方最终同意并准备达成一份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实行禁试的局部条约。三方最终在激烈但友好的协商之后达成了共识。^①

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哈里曼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几次会面。赫鲁晓夫很欣赏他，就像斯大林当初也非常喜欢哈里曼，赫鲁晓夫还开玩笑说要雇佣这位美国金融大亨来当他的经济顾问。哈里曼总是能灵巧地配合并利用赫鲁晓夫的欢快情绪，并从他口中套出更多关于他的想法和期望的信息。赫鲁晓夫总是非常健谈，偶尔还会变得情绪化，有时也会显得措辞含糊，让人难以理解。但是在与哈里曼进行的几次会晤中，赫鲁晓夫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希望和抱负。

他希望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在7月21日，他出席了在莫斯科体育场举行的一次苏美田径运动会，他邀请哈里曼、科勒大使及夫人一起前往他的私人包厢观看比赛，这个私人包厢位于体育场最高处，是为赫鲁晓夫以及随从特设的。言谈中赫鲁晓夫显得和蔼可亲，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对改善苏美关系的希望。他评价道，田径比赛远远要比军备竞赛好得多。深受苏联运动员的优异表现鼓舞，赫鲁晓夫变得“情绪高涨”，哈里曼写道，“当我们两国的旗帜并排着绕场一周，当我们两国的运动员队伍中有苏联人和美国人手拉手走在一起时，他的眼中似乎泛起了激动的泪光”。赫鲁晓夫受到了来自观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赛场上洋溢着友好气氛进一步得到了增强。他邀请哈里曼和科勒共赴晚宴。“在整个过程的始终，他都显得非常热情友好，”哈里曼在给华盛顿的回信中这样写道，“并且试图使我深信他期望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与美国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当国务卿腊斯克八月前往莫斯科签署正式核禁试条约时，赫鲁晓夫邀请他前往他的府邸并“竭尽全力以一种友好轻松的方式安排好我的来访中的一切事务”。^②

同样，在官方正式场合，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也清楚地表达了希望尽快着手解决

① 《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728—863；出处同上，5:712—713；关于赫鲁晓夫的行事风格，参见“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速记记录”，1963年4月25日，马林笔记。

② 哈里曼致腊斯克，1963年7月23日，文件箱187（葛罗米柯会谈—哈里曼），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腊斯克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8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748。

其他问题的意愿;他们强调说,核禁试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他们希望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军事组织之间协商签订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希望能冻结军费预算。他们期望能在监察军事动向的措施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以期降低对闪电攻击战的疑虑。他们同时也希望能够增加与西方的贸易往来。赫鲁晓夫说过,商贸往来会带来和平,而和平可以允许他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人民正在享受苏联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同时希望苏联经济取得更大的进步。“在小麦和牛肉产量上开展较量要远远好过在核武器数量上的彼此竞争,”赫鲁晓夫对1963年7月下旬来莫斯科访问的美国农业部长奥维尔·L·弗里曼(Orville L. Freeman)这样说道。赫鲁晓夫对腊斯克说,尽管苏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存在对立,但是“我们两国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即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开发利用我们的资源。”^①

但是除了推动苏联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之外,对于赫鲁晓夫最为重要的话题仍然是德国问题。“他对这个问题极其执著,”美国国务院首席苏联问题专家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这样告诉肯尼迪总统。赫鲁晓夫承认,东德和西德的政权都非常想要消灭对方的社会体制,但那只是“纯粹的空想”。不诉诸战争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赫鲁晓夫思忖,我们作为经历过战争洗礼并且知晓人生真相的成熟的人,是否应当把思路从战争的轨道转回和平的轨道,即如实地记录现存的局势,但是否时机还不成熟?”^②多勃雷宁大使对肯尼迪总统解释说,赫鲁晓夫对联邦德国本身并不害怕。但是他担心如果在民主德国再次出现如1953年那般的新一轮骚动或示威游行的话,西德恐怕会出面干预,而这种干预将可能触发一轮美苏战争。赫鲁晓夫热切地相信,防止冲突发生的最好方法是让东德和西德签署一份互不侵犯条例以确认现状:德国以现有边界分割为两个国家。^③

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所说的恰恰是他对国内的同事们在公开场合和在私下里所说

① 腊斯克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8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733;奥维尔·L·弗里曼与赫鲁晓夫的会谈备忘录,1963年7月30日,文件箱188,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哈里曼致腊斯克,1963年7月26日,文件箱187,出处同上;哈里曼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7月15日,22日和23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799—800,824—826,833;关于贸易,参见会谈备忘录,1963年8月8日,出处同上,5:738—740。

② 腊斯克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8月5日,出处同上,5:731;汤普森的引文,参见编辑注解,出处同上,5:750。

③ 多勃雷宁与肯尼迪会谈的备忘录,1963年8月26日,出处同上,751—755;备忘录,“对今后会谈的展望”,哈里曼,1963年7月30日,文件箱480,哈里曼文档,国会图书馆。



的话。在1963年夏天和秋天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盛气凌人地命令他的同事们必须推进经济发展，克服农业困难，并重新调拨资金以发展化工经济和开发新化肥。他们必须重新调整思维方式并更换行事方式。此外，他们还必须驳斥中国对克里姆林宫制定的政策所提出的批评。他不会屈服于中国的诽谤，也不会放弃他对实现和平共处的希望。他警告他的同事们不要对中国进行侮辱，而是应当劝诫中国共产党，向他们指明他们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同时，克里姆林宫需要继续以自身的努力来促成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推进和平进程。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能够明白，核禁试条约“能够通向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以及冷战的终结”^①。

肯尼迪认同赫鲁晓夫所着手实施的新方针，同时他本人也希望能与苏联取得新的进展。通过小心谨慎的政治领导，他终于获得了参议院对局部核禁试条约的批准，尽管这个条约遭到了他手下几位高级军官的反对。^② 当赫鲁晓夫想要从美国进口小麦时，肯尼迪也同意了他的请求，尽管几位显赫的共和党高官对此作出了激烈的批评。^③ 在1963年9月20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肯尼迪更进一步，他提议苏联和美国合作开发外太空，从而确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会出现在外层空间”。这与一年前他的态度相比，是一次180度的大转向，当时他还奚落过一些下属，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论付出多大代价美国都要赢得通往月球的军备竞赛。当时他曾经说过，“这是对我们体制的一次考验。”但现在他却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需要通过采纳新理念和新提议来培育和促进美苏关系的解冻。如果“这次冷战的暂时停顿带来的是冷战的重启而非冷战的终止，”肯尼迪宣布说，“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控诉的手指直接

① “N·S·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论断”，1963年9月10日，马林笔记；同时可参见会议记录第107号，1963年7月23日，会议记录第113号，1963年9月4日，会议记录114号，1963年9月10日，出处同上；引文见赫鲁晓夫致肯尼迪，1963年9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306—307；同时可参见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10。

② 达莱克，《未完成的人生》，628—629；迈克尔·贝施罗斯(Michael Beschloss)，《肯尼迪对赫鲁晓夫：危机岁月，1960—1963》(Kennedy v. Khrushchev: The Crisis Years, 1960—1963)，伦敦：费伯和费伯公司(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1，631—637；《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783,802,821—822。

③ 有关小麦交易，参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结记录”，1963年10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774—778；会谈备忘录，10月23日，出处同上，796ff；关于批评，参见“总统批准私营公司向苏联经济体销售小麦”(“President Approves Private Wheat Sales to Soviet Bloc”)，《美国国会季刊每周报道》21(1963年10月11日):1760；“向共产党销售小麦激起了不同的反应”(“Communist Wheat Deal Provokes Mixed Reactions”)，出处同上，21(1963年10月18日):1804。

指向我们。”^①

但是缓和的局限性也是大得令人生畏的。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于核禁试条约都非常不满。虽已高龄，但言辞依旧毒辣的西德首相在将近 15 年富有想象力的领导位置上即将离任之际，仍然对共产主义持有根深蒂固的抵制情绪，他告诉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他并不认为莫斯科核禁试协议是美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得知了阿登纳的态度之后，肯尼迪立即向他保证美国不会上当受骗，也不会因为签署了一份局限性的协议就“被健忘所麻痹”。^② 当几天后腊斯克会见阿登纳时，腊斯克向阿登纳重申了美国不会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也不会放弃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支持。在 10 月下旬，阿登纳离任之后，腊斯克与西德新首相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会面时向他提供了相同的保证：在“当前形势下”，腊斯克说道，并不存在所谓的“缓和”，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而以牺牲西德的利益为代价向苏联作出妥协。^③

不但盟友国对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持反对意见，民族革命主义的浪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动荡和地区冲突也对缓和形成了逆流。“人类大家庭，”肯尼迪总统对一群纽约的听众说道，“已经拥有了超过三十亿的人口。人们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非白人，也不是基督徒，对自由企业制度或法律的应有进程或澳大利亚大选一无所知。”肯尼迪接着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正被反殖民主义的战争、地区冲突，或宗教种族斗争吞噬。“人类大家庭的成员们在今日的世界上相处得并不融洽。”^④而正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上演的这一幕幕争斗给超级大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这些战争会造成威胁，使美苏两国不得不在违背意愿的前提下卷入其中。尽管他和赫鲁晓夫都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肯尼迪清楚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未能控制国际

① “在联合国第 18 次全体大会上发表的演讲”，1963 年 9 月 20 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3》，693—698，引自 694；有关肯尼迪早前对赢得外太空军备竞赛的观点，可参考他与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的录音会谈，1962 年 11 月 21 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

② 施瓦茨，《阿登纳》，692—693；肯尼迪致阿登纳，1963 年 8 月 6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870—871；同时可以参考肯尼迪致戴高乐，1963 年 7 月 25 日，出处同上，851—853。

③ 腊斯克致国务院，1963 年 8 月 10 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7：875；文档记录备忘录，1963 年 10 月 25 日，出处同上，15：618；同时可以参考腊斯克与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的会谈，1963 年 10 月 7 日，出处同上，587—590。腊斯克在同葛罗米柯的亲切会谈中再次强调美国并不打算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也不会发表官方声明接受现有的两德边界。会谈备忘录，1963 年 10 月 2 日，文件箱 187，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④ “在纽约市新教徒委员会晚宴上发表的言论”，1963 年 11 月 8 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2》，838—841。



格局动荡的态势。肯尼迪的顾问们告诉他,在第三世界,“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把超级大国卷入其中”。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可能试图避免介入,越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同时苏联可能也希望能够调停地区冲突,老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赫鲁晓夫并不能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同时他对“中共[中国共产党]指责苏联软弱的指控”非常敏感。^①

肯尼迪清醒地意识到中苏分歧给克里姆林宫造成了真正的麻烦。^②赫鲁晓夫急需在他的共产主义战友们面前保持高姿态,同时必须以与毛泽东和他的北京同志们对等的积极态度来支持全球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进展。莫斯科面临着“公众舆论压力的问题”,罗伯特·科默这样写道。^③

肯尼迪同样也遭遇了国内政治对手们的尖锐批评,并对这些批评作出了敏锐的回应。当肯尼迪总统需要作出决策行动时,他总是争取公众舆论支持并设法取得参议院的支持,正如他在参议院辩论是否通过核禁试条约时所做的那样,尽管他一直对那些批评他“对共产主义太过温和”的反对意见很忧虑;当年麦卡锡对民主党人的炮轰仍然在他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共和党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将视线瞄准了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两人也都已经开始在公开场合嘲讽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曲意迎合。^④总统顾问们知道肯尼迪迫切需要掩盖他“在抵制过度缓和主义上的不及格表现”^⑤。这位英雄在与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作斗争的时候却没有抗击国外共产主义势力来得那么骁勇善战。

肯尼迪犹豫不决。他希望能达成缓和,他对和平充满渴望,但他也以捍卫自由世界的事业而自豪。“抬起你们的双眼,”他在1963年6月29日对一百万柏林市民这

① 引文参见科默致邦迪,1963年10月16日,文件箱322,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科默致邦迪,1963年10月15日,出处同上;葛罗米柯与腊斯克会谈备忘录,1963年10月3日,文件箱187,苏联,出处同上;有关越南和老挝,同样可以参见赫鲁晓夫与哈里曼会谈备忘录,1963年4月26日,文件箱187,出处同上;汤普森致腊斯克,1963年5月20日,文件箱185,出处同上;S·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95;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42。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总结记录”,1963年7月31日,文件箱314,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NIE)13-4-63,“中国共产党取得更大军事实力的可能性”,1963年7月31日,文件箱4,国家情报评估,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③ 科默致邦迪,1963年10月16日,文件箱322,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④ 有关尼克松的批评,参见“总统批准私人公司向苏联经济体销售小麦”,1760;关于戈德华特,参见“对外贸易:小麦僵局”(“Foreign Trade: Impasse on Wheat”),《时代周刊》(Time),1963年10月11日,30。

⑤ 科默致邦迪,1963年10月15日,文件箱322,会议与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样说道,“让你们的视线超越今日的危险,投向明日的希望,……投向世界各地自由的进步,……投向全人类的进步。”^①当他对核禁试条约的签署大为称赞时,他仍小心翼翼地在呼吁和平与警示威胁之间拿捏平衡。他说道:“美国必须持续寻求紧张局势的缓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松警惕。”^②

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依然存在。“美国和苏联对世界、自由以及未来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总统这样说道,“我们两国仍然对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颠覆手段的使用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在他看来,这些观点的分歧是无法、也不应该隐藏的。“我们的冲突……是真实的。”^③11月苏联高官们再次对美国总统表示非常失望,并沮丧地怀疑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是否并不想,或者不能给和平一次机会。^④

那么,在一个意识形态交锋的世界中,缓和的意义究竟何在呢?肯尼迪总统在美利坚大学所发表的演讲中呼吁苏联与美国携手建立新型的美苏关系。但究竟缓和是缓解紧张局势,促进美苏和平共处,以及接受世界多元化的战略,就如肯尼迪时常挂在嘴边说的那样?抑或缓和只不过是美国期望赢得冷战胜利的一种战略?缓和是否能够减少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同时使美国大幅削减对一些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以越南为例,在越南南方现在几乎有一万六千名美国军事顾问以及特种部队正在支持南越亲美政府与越共所领导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作战。抑或美苏缓和反而鼓励中国共产党利用苏美合作来推进他们自己的革命进程?

肯尼迪的顾问们也变得犹豫不决起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建议,“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国民和全世界面前以戏剧化的方式来渲染缓和的局限性”,因为他认为美苏缓和可能会使共产主义取得合法化的地位,因此缓和的效力值得质疑。他对苏联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开展的颠覆活动充满恐惧,并担心缓和可能对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国内政策走向产生“潜在负面影

① “在鲁道夫·怀尔德广场所作的讲话”(“Remarks in the Rudolph Wilde Platz”), 1963年6月26日,《总统公开文件:肯尼迪,1963》,524—525。

② “在缅因州大学所作的演讲”,1963年10月19日,出处同上,795—796。

③ 引文出处同上,796;“在联合国第18次全体大会上发表的演讲”,1963年9月20日,出处同上,694。

④ 多勃雷宁与汤普森会谈备忘录,1963年11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829—830;多勃雷宁,《机密》,113—114;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回忆录》(Memoirs),哈罗德·舒赫曼(Harold Shukman)(译),纽约:道布尔迪公司(New York: Doubleday), 1989,181—182。



响”。^①但是另一方面,缓和也可以成为遏制战略的一种复杂形式,可用于怂恿苏联放松警惕,(期望苏联会)逐步接受德国的统一,并且开始尊重东欧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自主。迪安·腊斯克说,真正的缓和“终将朝着对西方有利的方向发展”^②。

缓和能够使西方得以喘息,抑或能促使克里姆林宫发生转变;它可以使共产主义合法化,但也可能最终消灭共产主义。缓和可以促成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进行和平竞争,但也可以在一个急速巨变的世界中孕育出危险的自满情绪。缓和可以限制军备竞赛,释放宝贵的资源用于经济增长并提升全人类的福祉,但也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得以长长地舒一口气,重新调校其实力并向世界展示苏联式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③

缓和的未来随着一颗子弹在1963年11月22日击中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后变得扑朔迷离。而此刻,虽说缓和变得步履蹒跚但仍然存在,然而缓和在美国最为雄辩的——或许也是充满矛盾的——拥护者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

崭新的开始与唐突的收场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傍晚致电赫鲁晓夫的府邸,转告肯尼迪去世的消息。赫鲁晓夫听到这条消息后极度震惊。“一种巨大的悲痛凝固在他的脸上。”他的儿子事后回忆道。这位苏联的最高领袖逐渐开始对肯尼迪充满钦佩之情,并对他的过世悲痛不已。他将会在今后的岁月中“充满敬意地”铭记这位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肯尼迪“从未让自己屈服于恐惧,行事也从未鲁莽草率”。^④他们两人携手避免了核战毁灭人类的发生,同时努力尝试实现和平共处。赫鲁晓夫的儿子回忆说,他的父亲“相信肯尼迪,同时对他的离去怀有真切的充满人情味的深深同情”。如果肯尼迪能够躲过这一劫的话,或许双方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赫鲁晓夫沉思道:“一切都

① 罗斯托致腊斯克,1963年9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8:507—510。

② 汤普森致波伦,1963年9月21日,文件箱72,法国—宏观,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肯尼迪与乔治·麦吉会谈备忘录,1963年9月1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5:578;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德国大使馆,1963年9月24日,出处同上,581—582;引文参见顾夫·德姆维尔与腊斯克会谈备忘录,1963年10月7日,出处同上,588。

③ 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在“美国国务卿政策制定会议中的重点”一文中有详细的阐述,1963年3月26日,出处同上,5:654—660。

④ S·赫鲁晓夫,《超级大国》,698;塔尔博特,《赫鲁晓夫回忆录》,500;同时可参考科勒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11月23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5:831。

会随着约翰逊的人主白宫而变得不同。”^①

然而他仍然试图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重新开始。“我想无需我告诉你，”赫鲁晓夫写信给约翰逊道，肯尼迪和我是“来自截然不同政治核心的人”。但是肯尼迪和我都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为“世界的命运”所肩负的责任。“我不知道你对我的这些话会作何反应，”赫鲁晓夫接着写道，但是苏联认为约翰逊总统“与已故的肯尼迪总统”以及罗斯福总统“是肩并肩的伙伴”。他希望约翰逊能够和苏联携手维护世界和平，同时促进双方关系良性发展。^②

赫鲁晓夫与夫人向肯尼迪遗孀致以了诚挚的慰问和吊唁。克里姆林宫官方正式派遣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代表苏联出席肯尼迪的葬礼。米高扬“在送葬的队伍中看上去是那样的沉痛不已”，杰奎琳·肯尼迪在几天后给赫鲁晓夫的去信中这样描述，对此“我非常感动……您和[我的丈夫]曾经是对手，”肯尼迪夫人接着写道，“但是你们俩却能够携起手来坚定果断地制止了能够炸毁世界的战争”。^③

米高扬将同样的讯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了新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米高扬强调说，克里姆林宫寻求和平与共存。赫鲁晓夫很乐意听取新总统关于双方将如何取得进展的想法。^④

赫鲁晓夫优先考虑的重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也体现在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表态以及那些数不胜数的演讲中。他永远都不会牺牲苏联的实力作为妥协，也不会危及到苏联的国土安全，但现在是更努力地聚焦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同志们，你们不可能把一支火箭放进自己的汤里，”他感叹道，“你们不可能靠吃火箭过日子；火箭是用来防御的。但是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改善社会生活，你们必须耕种，必须创造物质价值，这包括了面包、土豆、卷心菜、肉和黄油——这些才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⑤

① 谢尔盖·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写赫鲁晓夫：以了解内幕者的视角解读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Khrushchev on Khrushchev: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Era*），威廉·陶布曼（编译），波士顿：利特尔 & 布朗公司，1990，50—51；S·赫鲁晓夫，《超级大国》，700；舍希德（Schecter）与卢奇科夫（Luchkov），《赫鲁晓夫回忆录：解密磁带录音》（*Khrushchev Remembers: Glasnost Tapes*），181；特罗扬诺夫斯基，“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229—241。

② 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3年11月2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6：311—313。

③ 杰奎琳·肯尼迪致赫鲁晓夫，1963年12月1日，出处同上，314；同时可参见科勒致美国国务院，1963年11月23日，出处同上，5：831。

④ 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3年11月24日，出处同上，6：311—313；汤普森致腊斯克，1963年11月24日，出处同上，5：832—833；会谈备忘录，1963年11月26日，出处同上，833—837。

⑤ 在加里宁纺织厂发表的讲话，1964年1月1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月20日，BB 22。



他发起了一次新的运动以促进工业和农业的“化工化”，并相信对于这项事业的资金投入能够促使苏联经济突飞猛进。^① 赫鲁晓夫鞭策所有人努力工作，发展他们的才能并加以运用。“我梦想着有一天……到那时我们所有在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孩子们都能够享受公费的衣着和饮食，我们所有的在校儿童都能够享受公费饮食。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得好、吃得饱，所有人都能够穿得好、穿得暖、穿得美丽。”但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同志们必须转变觉悟并提高生产力。他们必须努力工作，革新进取。最终将由他们的所作所为，而非他们的言论得到人民的评价。他们的使命是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将由苏联创造。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他表示苏联并不需要对“国家变得更富有，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的期望感到羞愧，“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一件西装，愿上帝保佑他会得到第二件和第三件[鼓掌]；让人民有丰富的食品可以消费，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上学，让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更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梦想，而这一梦想正在慢慢变为现实”。^②

但是这一梦想也有可能被军备竞赛所打断，或者被核战争转化为一场噩梦。这位曾经鲁莽草率地将导弹部署在古巴的苏联领袖现在却不断地倡导着审慎这一美德。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被迫变得更为谦逊。“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不能恳请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分子，不要发动战争。我们从未乞求和平。我们也不打算通过反复念叨空洞的咒语来避免战争。”苏联坚定地相信威慑的原则，美国也一样。苏联不希望看到战争，赫鲁晓夫一再重申，但是“如果敌人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会摧毁并消灭敌人。我们拥有所有必需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让侵略者们把我们的话牢牢铭记在心”。^③

赫鲁晓夫知道有“国外的同志们”宣称他“害怕战争”。他对此并不感到害臊。他“倒要看看有哪个傻瓜不害怕战争”，他在加里宁的一次纺织工人的集会上这样说道：“只有傻瓜和孩子才是无所畏惧的……我本人也不得不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我有一个儿子，一位飞行员，死于战争。然而，同志们，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中又有多少人死于战争？我们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因

① 会议记录第 122a 号，第 126b 号，第 128a 号，1963 年 11 月 10 日，1963 年 12 月 23 日，1964 年 1 月 9 日，马林笔记；在苏共中央全体大会上的总结发言，1963 年 12 月 13 日，文件箱 217，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② 在加里宁纺织厂发表的讲话，1964 年 1 月 17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 年 1 月 20 日，BB 18；在苏共中央全体大会上的总结发言，1963 年 12 月 13 日，位于文件箱 217，苏联，国家安全文档，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③ 在加里宁纺织厂发表的讲话，1964 年 1 月 17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 年 1 月 20 日，BB 21。



此,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战争不再发生。”^①

在给约翰逊总统的去信中,有些是公开信,有些是私信,赫鲁晓夫一再表示希望能够寻求到更多的机会。他在1964年元旦那天寄给各国首脑的长信也给约翰逊总统抄送去了一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2月28日、4月2日、4月17日、4月20日、5月15日和6月5日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沟通。美苏两国都必须都“学会远离争执和对抗地和平共处下去”,他持续地表达着这一观点。^② 美国和苏联已经让太多的事件以及太多和平的敌人阻碍他们双方摆脱“冷战的枷锁”的共同愿望。他们曾经可以为同步削减钚和铀-235的产量而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来处理更为核心的事宜。^③

苏联最高领袖一再地重申他的期望:促进美苏贸易,削减军费开支,削减中欧的军队数量,在中欧设置无核区,签署一份解决德国问题的协议,以及订立一份北约与华约互不侵犯条约。“只要约翰和伊万(意指美国军人和苏联军人)仍旧手握冲锋枪在两个德国的边界针锋相对的剑拔弩张,”赫鲁晓夫在给约翰逊的信中写道,“那么局势仍然是非常危险的,无论任何人对此有任何的评论。”为了表示强调,他重申:“我们把德国问题作为核心问题的原因在于德国是当下世界各地现存的紧张局势以及危险的发展动态的根源所在……如果德国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你我双方都不再需要派遣如此巨大数量的军队和武器;也就是说,不会再有约翰与伊万之间的巨大对抗了。”^④

在1964年5月下旬,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一份友好协议,但这并非是赫鲁晓夫理想中的与美国、法国和英国签署的和平协议。当丹麦首相延斯·奥托·克拉格(Jens Otto Krag)来访并会晤赫鲁晓夫时,克拉格证实苏联最高领袖“极度仇视德国人”^⑤。但是赫鲁晓夫对德国人的憎恨并不如他对德国的恐惧来得那么

① 在加里宁纺织厂发表的讲话,1964年1月1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月20日,BB 21。

② 引文参见赫鲁晓夫的口头信息,1964年5月1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苏联》,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2001,14:71,脚注3;贺年信,参见赫鲁晓夫给全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的信息,1963年12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月6日,BB 1—12;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2月1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军备控制与裁军》,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7,11:31—34;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4月2日,出处同上,14:49—52;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4月17日与20日,出处同上,11:47—50,50—53;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6月5日,出处同上,14:85—94。

③ 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4月2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49—52,引自49。

④ 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6月5日,出处同上,85—94,引自86,89。

⑤ 布莱尔致美国国务院,1964年3月3日,文件箱1,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强烈,并且他害怕因为德国问题导致新一轮美苏冲突。在他的眼里,西德想要吞并东德,重新划定与波兰以及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重新夺回在二战后失去的领土,并染指核武器。他认为,由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领导的西德政府渴望复仇,而非渴望和平。^①

赫鲁晓夫强调说,当下存在两个德国。这一现状必须保持不变。在近期以及中长期来看,并不会发生德国统一;或许从长期来看德国还有统一的可能,但当下完全不可能正式讨论这件事。两个德国必须互相承认对方,学会彼此和平共处,同时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否则,危机仍然潜伏。

赫鲁晓夫本人却乐意与西德打交道。他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Aleksei Adzhubei),一位在莫斯科渐具影响力的人物,在1964年7月访问了联邦德国,与西德主要的政界和商界领袖进行了会晤,并且轻率地谈及了对中国的恐惧以及达成苏德和解的前景。赫鲁晓夫甚至思考如果美国能够向他保证绝不让西德染指核武器扳机的话,苏联可以默许美国所提出的多边核力量提议。他相信,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德国分裂为两个社会政体这一现状,承认东德和西德的现有边界,并保证西德不会拥有自主核实力的话,那么美苏双方还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他反复地坚持说,如果德国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冷战就将放缓,军备竞赛就可以得到遏制,同时一些地区危机上升为核战争灾难几率也会大大减小。^②

但是另一方面,在谈及欧洲以外的事宜时,赫鲁晓夫并不放弃他的好战言论。“我们反对战争,我指的是那些侵略性战争。但是,也存在另外形式的战争,比如为实现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战争,受压迫的人民奋起反抗压迫者——殖民主义者和帝

① 关于赫鲁晓夫对德国的观点,可参见以下段落,例如,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6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85—94;在苏联—民主德国友好会议上发表的演讲,1964年6月12日,文件箱228,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国会领袖时谈及德国问题,1964年9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9月21日,BB 1—9;赫鲁晓夫向军事学院毕业生所作的演讲,1964年7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7月9日,CC 1—9;同时可参见《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德国和柏林》,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9,15:8—18、142—144、191—194、204—207、210—212、322—323、335—339。

② 关于阿朱别伊访问联邦德国的内容,可参考道格拉斯·塞尔瓦吉(Douglas Selvage),“华沙条约与核不扩散,1963—1965”(“The Warsaw Pact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1963—1965”),冷战国际史项目第32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2001,9—12;关于阿朱别伊和赫鲁晓夫,参见S·赫鲁晓夫,《超级大国》,706—714;关于赫鲁晓夫重新考虑并打算接受多边核力量计划,参见备忘录[从苏联政府到波兰政府],1963年10月,收录于塞尔瓦吉,“华沙条约与核不扩散”,20—21。

国主义者的压迫所发动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和神圣的。”^①他表示，无论国家大小，美国都必须尊重它们的国家主权，并接受世界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这一事实。美国必须学会适应一些共产主义政权，比如中国和古巴，以及民族革命运动，比如在印度支那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地区。“全世界人民正在迎接新生，”苏联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赫鲁晓夫一再地宣称这一观点。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与葡萄牙法西斯主义所作的斗争，支持刚果人民抗击“占领者与叛徒”，支持南非反对种族主义以及种族压迫的斗争，以及“支持越南南方的爱国者们为他们祖国的自由而战”。^②

因此，缓和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接受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一个正朝着一种全新生活方式转变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是“所有社会体制中最完美的社会制度”，赫鲁晓夫宣称，社会主义制度拥有最高的社会生产力，是最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赫鲁晓夫在1964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论坛上自豪地宣布。^③他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毫不掩饰地写道：

人类正迈向社会主义这一事实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共识，同时也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毕竟当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使自己摆脱殖民者的奴役，并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建设新生活的决心。社会主义的理念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甚至一些非常知名的美国领袖也不得不建议资本主义是否应当改名，因为资本主义这四个字已经成为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压迫人民的代名词。^④

① 对军校毕业生所作的演讲，1964年7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7月9日，CC 1—9，引自 CC—3；同时可参见赫鲁晓夫给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信件，1963年12月31日，出处同上，1964年1月6日，BB1—12。

② 来自不同出处的引文的异文合并：在加里宁纺织厂的演讲，1964年1月1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月20日，BB 22；赫鲁晓夫在世界青年论坛上所作的演讲，1964年9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9月22日，BB 10—11；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所作的讲话，1963年12月13日，31，文件箱 217，苏联，美国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③ 赫鲁晓夫的演讲，世界青年论坛，1964年9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9月22日，尤见 BB 11—12。

④ 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6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92—93。



但是苏联的领导人们并不能只在口头上宣称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必须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都以我们国家为标尺，”赫鲁晓夫这样告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①他严令苏联的领导人要做得更好，要更有效地组织好苏联的经济。仅仅在实力上占优是远远不够的。“主要任务……是能够把这种实力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一目标，用于体现社会主义体制优于资本主义体制这一目标上来。”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组织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一切都取决于经济竞争。“共产主义将通过显示……共产主义社会体制比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来击败资本主义，”他在世界青年论坛上这样说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②

尽管赫鲁晓夫对缓和非常渴望，但是苏联的盟友国和附庸国却制约了苏联的行动。当赫鲁晓夫严肃地考虑防止核扩散条约时——“苏联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克里姆林宫照会盟友国，“当前的第一要务是”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前提是确保西德不会染指核武器——波兰总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和东德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对苏联的这一提议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西德正巧妙地利用着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分歧来谋取自主核力量。此外，多边核力量计划意味着核扩散，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哥穆尔卡在一次华沙条约国会议上激烈地抗议道，苏联必须收回这一提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将会被进一步激怒，而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将会进一步扩大。^③

苏联领导人们并不希望进一步恶化与中国之间的分歧，而这持续地制约了他们缓和与华盛顿之间紧张局势的能力。毛泽东和周恩来宣称克里姆林宫背叛了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遗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牺牲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为代价追求与美国之间的缓和。他们要求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必须时刻警惕并密切监视苏联的动向以防止苏联再次犯下类似错误。毛泽东告诉一位老挝共产党的领袖，正如你所见，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速记笔记”，1964年8月19日，马林笔记。

② 演讲，1964年9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9月22日，BB 9, 12；同时可参见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讲话，1963年12月13日，文件箱 217，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讲话，1964年2月14日，出处同上；赫鲁晓夫关于经济的言论，1964年9月22日，《来源》6(2003)：183—189。

③ 备忘录，未标注日期[1963年10月]，塞尔瓦吉，“华沙条约与核不扩散”，20—21；库兹涅佐夫与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会商摘要，1963年10月14日，出处同上，30—35；哥穆尔卡致赫鲁晓夫，1963年10月8日，出处同上，22—29；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备忘录，未标注日期[1965年1月20日]，出处同上，36—39。

“苏联已经存在了将近四十年……由列宁所建立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转变为了资本主义并[已经]采取了修正主义的路线”。^①

虽然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内部出现的分歧感到非常焦虑不安,但东欧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倒也乐意利用中苏分歧来提升他们自己与克里姆林宫谈判时的相对效力。哥穆尔卡强烈抗议苏联对西德作出任何让步,他警告赫鲁晓夫说:

我们不能以自身的弱点,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以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为代价来追求国际局势的缓和。这种缓和可能是虚幻的,事实上这种缓和可能会很快演变成一场更大规模的紧张对峙,因为帝国主义在看到由于我们内部分裂而显现出来的弱点之后,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张牙舞爪地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紧张局势]缓和,事实上并不存在遏制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以及]保卫人类免受核战灾难的可能性。^②

美国采取的一些行动也使赫鲁晓夫对美苏缓和的追求变得愈发艰难。除了华盛顿对于德国统一的支持之外,美国对古巴的威胁姿态也愈发严重,美国不断侵犯古巴领空,并增强了在关塔那摩海湾的军事实力。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越南南方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谋求摧毁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当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宣称在北部湾遭袭之后,约翰逊总统下令对越南北方进行报复性空袭时,赫鲁晓夫变得暴跳如雷。因为他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事件威胁到缓和的进程,他给约翰逊总统的去信中语气保持克制,仅仅对东南亚局势可能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表达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许多共产党人指责苏联并未给越南人民提供足够帮助,为了对这些指责他的声音作出回应,赫鲁晓夫公开宣称美国应当停止对越南使用军舰的“大

① 毛泽东与老挝爱国阵线文化团体领袖桑西弗(Sangsiv)的会谈,1964年9月4日,收录于《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进行的77次会谈,1964—1977》(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奥德·阿恩·韦斯塔等(编),华盛顿特区:冷战国际史项目第22号工作文件,1998,70;罗马尼亚首相扬·毛雷尔(Ion Maurer)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64年9月28日,为大会“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有关冷战在亚洲发展的新证据”(New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准备以及翻译的文件,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文件存于国家安全档案。

② 哥穆尔卡致赫鲁晓夫,1963年10月8日,塞尔瓦吉,“华沙条约与核不扩散”,27—28。

棒”外交政策。^①

美苏签署核禁试条约仅仅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担心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良好意愿正在逐渐被摧毁，但是他仍然需要在国内国外的公开场合表示缓和仍然在取得成效。^② 但是似乎所有人对他都不再抱以任何幻想：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罗马尼亚人、波兰人，还有东欧人。^③ 此外，在苏联内部，他声称缓和将解放资源并鼓励经济增长的言论并没有兑现。同事们对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不能再容忍他的粗鲁以及对他们的侮辱，他们厌倦了他的长篇大论，以及他对他们享受的特权的攻击。军方的官员对于他减少他们的养老金和抚恤金怀恨在心；情报分析员和秘密警察痛恨他削减了对他们的补助。党内机关职员对他把地区官员划分为工业区官员和农业区官员表示厌恶。而特权阶级反感他限制他们使用国有公车，以及削减对他们以补贴价格获得的高品质食物的数量。^④

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密谋要推翻他。他们把苏联所经历的挫折归咎于他，而不是他们自己。赫鲁晓夫大声地宣布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进步，但是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同事们确信是该正视现实的时候了。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放缓。根据他们自己的估算，在1956年到1963年期间，苏联的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11.1%下降到5.0%。在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年经济增长率远远大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但是现在这个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同样，苏联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在放缓，虽然在1950年代苏联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时，科技发展的速率曾经让苏联的领袖们引以为豪。而现在，他们私下里承认，在不少领域他们已经落后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对手了。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农业方面的表现。人民对肉类、黄油、蔬菜和谷物的需求并未得到满足。不满情绪在人群中滋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

① 赫鲁晓夫对军校毕业生所作的演讲，1964年7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7月9日，CC 3；赫鲁晓夫致约翰逊，1964年8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越南，196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2，1：636—638；赫鲁晓夫所作的评论，1964年8月2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8月31日，BB 4；多勃雷宁，《机密》，115—116。

② 赫鲁晓夫对问题的回答，1964年8月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8月4日，BB 13—14。

③ 关于幻想破灭的绝佳阐述，参见罗马尼亚对毛雷尔与毛泽东会谈的记录，1964年10月8日，为大会“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有关冷战在亚洲发展的新证据”准备以及翻译的文件，2003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文件存于国家安全档案。

④ 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传》，226—227；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Fedor Burlatsky），《赫鲁晓夫与俄罗斯第一春》（*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达夫妮·希勒恩（Daphne Skillen）（译），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1991，196—200；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十月全体大会的记录，尤其参见1—7，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 3292，国家安全档案。

取得的巨大优势被赫鲁晓夫那任意专断的干预,以及永无止息的异想天开的经济实验白白浪费了。他们对所有的经济重组表示反感;必须为这些改组画上一个休止符。^①

当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们转向外交事务时,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也是同样辛辣尖锐。赫鲁晓夫行事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在古巴愚蠢地部署了导弹,并草率地在属于美国地盘的西半球挑战美国的权威。之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作出的退让又使苏联蒙羞,同时也疏远了卡斯特罗。民族解放运动发动的战争值得苏联援助,但是赫鲁晓夫让苏联为此承担了过多的责任,硬是插手干涉那些与苏联利益关系不大的地区。他浪费了本已稀缺的资源,冲动地为那些中东和非洲的领导人提供援助,而这些人经常违背他们对苏联所作出的承诺,抑或是监禁共产党人。这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们说,列宁曾经教导共产党员要谨慎行事以免放松警惕并卷入与帝国主义分子的战争中去。赫鲁晓夫忽视了伟大导师列宁的教导,并且使所有人都身陷危险之中。^② 简而言之,这位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第三世界的行动太过冒险,他太过重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他忽视了美国对取得世界霸权的觊觎,同时未能利用好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产生的分歧。而他迎合华盛顿的行为无疑强化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他那异想天开、粗鲁欠考虑的行事风格侮辱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并且让苏联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他的行为缺乏一致性和自我克制。^③

当赫鲁晓夫 1964 年 10 月中旬在黑海附近度假时,他的同事们把他召回了莫斯科。他回到莫斯科,怀疑有什么事情出差错了。当他抵达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时候,得知他的政绩正在受到评估。他被迫只能聆听,不得打断。他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感觉孤立无助。那么多年来他所领导的许多同事出面反对他。当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我并不要求得到怜悯;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他承认自己的鲁莽,但是并不认错,同时仍然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的同事们曾经对他的决策都表示顺从。他质问他们,是否现在他们准备把过错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但是他并未作过多的挣扎。“我并不打算反抗。”^④

他想要带着自己的尊严,最好是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体面地离任。幸运的是,他已经成功地把斯大林主义的毒素从苏联体制中抽离,这也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并不是之前其他人所遭受的那种噩运,例如当年贝利亚就被处死了。赫鲁晓夫将被迫退休。

①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记录,1964年10月14日,7—24,俄罗斯文档文献中心 3292,国家安全档案。

② 出处同上,31—45。

③ 出处同上,38—45。

④ 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未标注日期[1964年10月14日],马林笔记。



他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他告诉他的同事们，苏联共产党变得成熟了；党已经能够控制其领袖了，到了该让年轻人接班的时候了。^①

但是接班的并非年轻人。这场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塞·柯西金(Aleksei Kosygin)接管了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整整30年来他们是苏共中央坚定忠实的拥护者，柯西金在经济管理方面有专长，而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国防。尽管他们猛烈地批评了缓和政策，并且致力于打造苏联强势的军事立场，但是他们立即宣布了将保持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

仅仅在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几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宣布苏联在外太空探索领域取得了又一次的成功，并且授予成功返回地球的宇航员机组极高的荣誉。然而，他们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在于向全世界通告，苏联的方针政策并不会像风中摇曳的稻草那样摇摆不定，而是会像锚定在港湾中的舰船那样稳定不变。“苏联的外交政策，”勃列日涅夫表示，“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与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和平共处，并孜孜不倦地追求巩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合作，追求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10月16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面见约翰逊总统重申了上述要点。几天之后柯西金再次向美驻苏大使科勒传递了以上讯息。^②

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所造成的艰难困苦。一位非常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下属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并不轻易相信有实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抑或是人权的价值，但是在与西方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他应当重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他需要世界和平。柯西金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击败纳粹主义二十周年纪念典礼上宣布：“没有任何任务比防止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更为重要。”^③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未标注日期[1964年10月14日]，马林笔记；P·E·谢列斯特(P·E·Shelest)的回忆，“以参与者的身份追忆我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艰难时期：关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Reminiscences of a Participant About Difficult Times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About Khrushchev, Brezhnev, and others”)，《论据与事实》4(1989年1月14日—20日)；S·赫鲁晓夫，《超级大国》，734—736；富尔先科与纳夫塔利，《赫鲁晓夫的冷战》，532—538。

② 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发表的表彰沃斯霍德宇航机组的讲话，1964年10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0月20日，CC 11；多勃雷宁与约翰逊会谈备忘录，1964年10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127；科勒致腊斯克，1964年10月23日，出处同上，152—156。

③ 关于勃列日涅夫，参见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体制：一位知情人在苏联政治界的生活》，纽约：兰登书屋，1992，171，248；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我们让美国破产”(“We Bankrupted America”)，《论据与事实》8(2001年2月21日)：1061；柯西金，“交接日”(“The Day of Deliverance”)，1965年5月7日，收录于A·S·柯西金，《柯西金讲话和文书选》(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牛津，英国：培格曼出版社，1981，37；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背景，参见本书第四章相关内容。

同样,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解释道,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苏联社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共产主义犹如暴风骤雨般席卷天空的时候,”柯西金说道,“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土地……不能忘记需要建设新的城镇和工厂,良好的家庭、学校、医院和道路;不能忘记应当提高我们农田的肥沃程度;不能忘记应当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教育、科技、艺术以及所有的人文文化……没有什么任务比确保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持续稳定发展这一目标更为崇高更为关键。”他这样补充道。如果苏联的官员们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激发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到社会各阶层团体的通力合作,并且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话,柯西金宣称,他们不仅能够继续推进祖国的经济和文化进步,同时也能够使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民确信“通往未来的道路”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①

如果缓和意味着竞争与和平共处并举,那是否还有可能实现和平?

约翰逊的痛苦与选择

美国官员和政策分析师仔细地分析了苏联针对赫鲁晓夫发动的政变。他们并不准确地知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鲁莽冲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决裂,他未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未能克服资源的短缺,未能满足苏联人民对生活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导致赫鲁晓夫被免职的表面原因是他领导的方式方法令人不满,但其真正原因不应从他的个人性格特征中寻找,而应当从苏联所面临的一大堆问题中去探究。”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得出这样的结论。^②

10月16日,当西方正在研究莫斯科所发生的政变时,共产主义中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枚原子弹。美国官员对于这条消息并不感到吃惊,但是这两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莫斯科的政局动荡和中国成功地试爆了核武器——却让人

① 柯西金在欢迎宇航员凯旋的接风晚宴上发表的讲话,1964年10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0月20日,CC 14—15。

② 引文参见情报和研究报告,“赫鲁晓夫的下台”(“The Fall of Khrushchev”),1964年11月4日,文件箱54,科默文档,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可参见科勒致腊斯克,1964年10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132—135;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1964年10月22日,出处同上,148—150;汤普森所做的简报,1964年10月22日,出处同上,144—148;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enga),“对莫斯科政变意义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Meaning of the Moscow Events”),1964年10月19日,文件箱219,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中央情报局,情报信息电报,“苏共关于驱逐赫鲁晓夫的文件”,1964年11月2日,出处同上。



极度困惑。在位将近一年,约翰逊才第一次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会研究这些事件所蕴含的潜在意义。^① 约翰逊召见了多勃雷宁大使,告知多勃雷宁他本人提高了戒备但同时愿意向苏联新领导人伸出友谊之手。他提倡世界和平与竞争中的共处。美国的社会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这样告诉多勃雷宁,但是他也知道驻美大使对此肯定会持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人民有权进行选择。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金发女郎,约翰逊这样说道。有些喜欢红发的,另外一些人喜欢棕发的。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世界和平,避免核战争的发生。这已经成为了他入主美国总统办公室之后挂在嘴边的祝祷辞。^②

尽管看上去不遗余力地宣传和平事业,美苏缓和却并非这位肯尼迪继任者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约翰逊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赢得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敦促国会把实现种族平等与消除贫困提上国内政策的议事日程,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取得更大的进展,以及避免在越战中战败。

约翰逊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离奥斯汀不远的的一个山区农庄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灵,始终雄心勃勃,经常债务缠身,偶尔酗酒。整整十年,他担任德克萨斯州的州议员,富有对民众的责任意识。林登的母亲是一位安静、内敛、略带隐居意味的女子,她逐渐疏远自己的丈夫,但是对孩子们却倾注了所有的爱。她坚信,通过教育,她的儿子和女儿可以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然而生活境遇却并不是那么乐观。林登从小在一个濒临绝望的乡间长大。年轻人鲜有机遇,农民们面临着破产,而小商贩们也勉力维持着最低标准的生计。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得更糟,那时农产品的价格一落千丈,而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的事例比比皆是,日益增多。^③

① 记录备忘录,雷·S·克莱因(Ray S. Cline)整理,1964年10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124—125。

② 约翰逊与多勃雷宁会谈备忘录,1964年10月1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27—130;关于对维持和平并且避免核战毁灭世界的重视,参见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备忘录,1963年12月5日,邦迪整理,《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8:540—542;“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总结记录”,1963年12月5日,出处同上,543—544。

③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会提及约翰逊的成长和政治生涯的发端,参见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林登·约翰逊的生平(3卷本)》(*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3 vols.*),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New York: Knopf),1992;罗伯特·达莱克,《孤星升起: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时代,1908—1960》(*Lone Star Rising: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08—196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保罗·R·康金(Paul R. Conkin),《来自佩德纳尔斯的大亨:林登·巴恩斯·约翰逊》(*Big Daddy from the Pedernales: Lyndon Baines Johnson*),波士顿:特韦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1986,1—86;兰德尔·B·伍兹(Randall B. Woods),《林登·巴恩斯·约翰逊:美国雄心的建筑师》(*LBJ: Architect of American Ambi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2006。



尽管如此,约翰逊仍努力奋斗以期获得成功。他总是为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大家庭和一个深深植根于他的生活社区的朋友交际网所围绕。他们帮助他完成了在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的学业。他并非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但是他希望能够在人生旅途中收获成功。他学会了如何结交重要的人物,比如他所就读的大学的校长,同时慢慢开始意识到他本人极其擅长于劝导和哄骗。但是,在他毕业时正值美国遭遇大萧条。人生对于德克萨斯山区乡间的人民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是大萧条给他们带来了更为悲惨的境遇。它在林登和他这一代人的心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约翰逊成了一名教师,但是他酷爱政治。1931年,仅仅在学校教了一年书后,他得到了一份文书工作,成为了一名新近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德克萨斯州富豪的助理秘书。在华盛顿,约翰逊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长时间地连续工作,极为高效地管理着这位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与其他的立法幕僚沟通良好,迅速领会了立法过程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细节,并谨小慎微地留心关注德州选民的需求。仅仅过去了三年的时间,他已经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竞选成为议员。1934年,他成为了美国全国青年事务委员会德克萨斯州分支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刚刚由罗斯福总统启动的旨在帮助年轻人的新政项目。当他老家社区的那位国会议员病故之时,约翰逊立即投身于他人生的第一次议员竞选。1937年,他赢得了选举,从此以后他的政治生涯正式启动。

从一开始,约翰逊的胸中就翻涌着雄心壮志。他始终感到不安全,始终对自己那较差的教育背景和朴实的出生有着强烈的意识,他选择夸大自己的弱点并努力尝试弥补它们。他求知若渴地搜罗各类信息,提出明察秋毫的问题,工作异常努力。他广交朋友;他阿谀奉承;他令人着迷。时而朴实无华,偶尔屈尊俯就,他同时又是机智狡黠和富有说服力的。他研究别人的弱点以此来利用他们。他能够觉察出别人的恐惧并尝试使他们恢复镇静。他凭借直觉揣测别人的梦想,并希望能够把这些梦想转化为现实。约翰逊热情洋溢地拥护罗斯福的新政,同时自诩为坚定的罗斯福派民主党人。他坚信政府在国民的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重建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复苏。政府能够为绝望中的农民提供贷款,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为乡间的国民提供电力。政府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机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为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弱势群体提供一种表面的平等。事实上,政府能够使一个已经极度疲软的经济重现生机,如果能够得到富有活力的民主基础的话,美国经济仍有能力得到复苏。约翰逊迅速地学会了通过为别人着想来为自己谋利。“我需要权力来分发物资



给国民，”他事后回想说，“把各类物资分发给各式各样的人，尤其是穷人和黑人。”^①

在1948年竭尽全力以微弱多数赢得了一个参议员的席位之后，约翰逊成功地在参议院慢慢往上晋升。1954年，他成为了参议院民主党的多数派领袖，并睿智地引领着民主党人度过了艾森豪威尔在位的年月；他拥护两党合作，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几乎是所有人的好感。林登·约翰逊就好似一股旋风——他计划周密，精于谈判与交易，富有想象力，同时雄心勃勃。他身材很高大，个性上气度不凡，政治上强而有力。但是他的权势并没有大到足以使他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几乎没有人相信一个南方佬可以赢得这个国家的最高职位，但是约翰逊仍然坚信他能够赢得他所需要的尊重与知名度来赢得一张民主党第二高位的人场券。在1952年和1956年两次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拒绝之后，他在1960年底第一轮初选之后直截了当地向肯尼迪提出他希望能够与之搭档并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最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提名。^②

但是，当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后，约翰逊对自己被排斥在白宫的决策核心集团之外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感到非常不快。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无能为力且与大局无关。他再次感到无所适从，并且很难掩饰对肯尼迪以及他身边那些人的反感——那群“哈佛帮”，他轻蔑地，同时也不无嫉妒地这样称呼他们。然而，当肯尼迪突然遇刺而约翰逊接任为美国总统之时，他宣布将维持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同时他也保留了已故的肯尼迪总统最高级别的所有外交政策顾问，包括：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以及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③

自从他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一刻起，约翰逊就将视线瞄准了196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他渴望能够赢得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来使自己的总统职务合法化，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并实现他自己所规划的国内政策目标。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知道他最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同样也知道他的打算。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约翰逊支持和平。但是缓和绝不能阻碍他的竞选计

① 引自罗伯特·达莱克，《有缺陷的巨人：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时代》(*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6。

② 施莱辛格，《一千天》，50—63。

③ 林登·B·约翰逊，《优势：以总统的视角，1963—1969》(*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与威尔逊公司(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1，18—25；达莱克，《有缺陷的巨人》，50—62；伍兹，《林登·巴恩斯·约翰逊》，375—429。

划。^① 拥护和平是一项好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如此。但是以和平的名义作出让步将会造成让国内外的批评家有机可乘的威胁。

尽管如此,约翰逊恰如其分地对外宣称他本人倡导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追求和平。但事实上,他斥责他的顾问们未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成功地吸引公众注意到他的良好意愿。“我可不希望……一早醒来看到赫鲁晓夫又向我传递了一条争取和平的讯息,”他在一次录音的电话会话中这样责备麦克纳马拉,“这让我看上去像一个好战分子。当我需要谈论和平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可以说的话题。我的提议显得空洞无物,因此我也想要提出一些和平主张。”但是约翰逊本人却完全不知道应该提出怎样的提议,或者如何回应赫鲁晓夫的提议。因此他敦促邦迪、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去征召“最好的智囊们”前来华盛顿以设计出好的提议。^②

但是,他们并未想出富有想象力或具体实际的提议来。美国已经把所有容易解决的事情都办完了,邦迪在1964年1月13日给约翰逊的信中写道。剩下来的所有事情都是棘手的,任何可能在和平进程上取得的进展不是会激起国内选民的不满,就是会招致那些不愿顺从美国提议的盟友国的反对。例如,赫鲁晓夫想要解决德国问题,但是波恩的西德政府绝不可能同意任何可能满足克里姆林宫的条件。为了克服这个僵局,多勃雷宁建议是否有召开一次首脑峰会的可能性。但是,邦迪认为这个提议从政治上而言并不恰当。克里姆林宫希望美苏之间能够扩大双边贸易,但是邦迪和约翰逊认为美苏经贸洽谈将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太多争议。^③

最终为了缓和的利益,只是采取了一些并未招致盟友国对抗,也未激起国内政治对手反对的细小步骤,比如削减可引起核裂变原材料的生产,签订领事条约,以及同意在淡化海水工作上进行合作。^④ 尽管约翰逊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直到入主白宫四个月之后他才第一次接见多勃雷宁大使。当他们会谈时,约翰逊总统和善亲切地

① 约翰逊与多勃雷宁对话备忘录,1964年4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65;多勃雷宁,《机密》,117—120。

② 电话谈话的录音磁带,(分别)与麦克纳马拉、邦迪和腊斯克的谈话,1964年1月2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同时可参考迈克尔·R·贝施罗斯,《掌权:约翰逊白宫录音,1963—1964》(*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1964*),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7,144—146。

③ 记录备忘录,邦迪整理,1964年1月13日,文件箱1,邦迪文档,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给总统的备忘录,1964年1月13日,文件箱1,给总统的备忘录,出处同上;关于贸易,参见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1964年4月14日,出处同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总结记录”,1964年4月16日,文件箱2,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文档,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④ 约翰逊致赫鲁晓夫,1964年4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69—71;约翰逊向赫鲁晓夫递出的口头讯息,1964年5月1日,出处同上,11:53—56。



谈论着和平,但是同时也不情愿地承认当下并非冒险缓和美苏紧张局势的恰当时机。美国民众支持美苏为推进和平进程做点什么,约翰逊承认这一点,但是共和党的政治对手们以及他们所掌控的那些保守主义的媒体一直渴望着伺机向他猛攻。他只是简单地欢迎赫鲁晓夫所提出的缓和提议,约翰逊说道,就被一家报纸攻击为“公开拥抱共产党人”。正如约翰逊在早几个月之前所说的那样,对苏联采取温和的姿态就好比公开宣布你“调戏了一个女孩”。^①

这位意外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并不希望对缓和的追求以他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的前程作为代价,同时也不希望缓和进程危及到他的国内政策的议程。1964年1月8日,在他发表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他大胆地宣布他希望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为提升公民权利做出比之前召开的一百次国会会议更多的贡献。他抑扬顿挫地宣布,让这次国会会议因向“美国的贫穷与失业发起一次全面总攻”而为世人铭记;让这次国会会议因致力于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以及年轻人的教育需求而举世闻名;让这次国会会议成为一次“比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国会会议更好的,为国民建立更多家庭、更多学校、更多图书馆和更多医院的国会会议”。^②

约翰逊想要彻底改造美国,消除贫困,禁止种族歧视,并使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他寻求用自己所有的权力为年轻人和老人,为穷人和弱势群体造福;希望能够通过“用机遇来取代绝望”以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1964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让我们证明我们的社会体制的成功,”他说道,“让我们证明那些质疑我们的目标和能力的国内外讽世者和批评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事情比通过民权法案更为重要的了。他事后回忆说,“我清楚地知道,作为美国总统,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必须动用我所拥有的每一盎司的力量来为美国的黑人们争取公正的对待。”对黑人的歧视是美国最大的污点,克里姆林宫从未停止利用这个事实来进行他们的政治宣传。约翰逊倾尽全力提请国会通过他的前任肯尼迪1963年向国会提出的民权法案。如果我们失败了,约翰逊承认,历史将“会对我们作出严厉的评价”。^③

① 会见多勃雷宁的内容,参见会谈备忘录,1964年4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64—66;多勃雷宁,《机密》,119;约翰逊的陈述,参见贝施罗斯,《掌权》,114。

② “年度国情咨文”,1964年1月8日,《总统公开文件:林登·巴恩斯·约翰逊,1964》,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65,112—115。

③ 约翰逊的引言,出处同上,113;约翰逊,《优势》,157;同时可参考玛丽·L·杜齐亚克(Mary L. Dudziak),《冷战中的民权:种族与美国式民主的形象》(*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203—237;伍兹,《林登·巴恩斯·约翰逊》,415—466。



下了那么大的赌注之后, 这位新任总统不容有失。但是他在海外却面临了难以应付的巨大问题。“事情糟糕得好似地狱一般,” 他在 1964 年 1 月 20 日跟他的密友兼良师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在一次电话会话中这样抱怨道,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遇到麻烦, 我们在坦噶尼喀遇到麻烦, 我们在桑给巴尔岛遇到麻烦, 我们在巴拿马遇到麻烦。”^①问题堆积如山, 每周都密密麻麻地堆在总统的办公桌上。这一周是委内瑞拉或者英属圭亚那; 下一周就是加纳或是刚果; 下下周是智利和巴西; 然后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 然后再次回到桑给巴尔岛或印度尼西亚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地区或国家, 同一种恐惧回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和白宫的午餐会上, 那就是: 共产党来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使“脆弱的国家”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②“从本质上而言,” 邦迪在写给约翰逊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出了美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们[在智利]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位非常受民众欢迎的引人注目的候选人阿连德, 与共产党人为伍, 有非常大的可能会赢得[智利大选]。”邦迪希望林登·约翰逊知晓美国已经在协同项目中选择支持阿连德的对手。^③但是在非洲, 例如桑给巴尔岛, 邦迪和腊斯克敦促约翰逊总统要求英国首相采取主动以“扭转当前事态发展的进程”。否则, “我们将面临非洲东海岸国家形成传播共产主义的中心, 这将给我们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代价和危险, 不仅仅是在东非, 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整个非洲南部也会如此”。^④

“拉丁美洲国家将走向何方?” 林登·约翰逊在 1964 年 2 月 3 日这样问到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中央情报局汇报说, 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存在着对现状进行彻底改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现象。……落后本身并未刺激革命的发展, 但是逐渐觉醒的被剥削意识却是革命发生的源动力。政治变革的走向仍旧不很明朗。可能是民主党人, 或者庇隆主义者, 抑或是共产党人将赢

① 贝施罗斯,《掌权》, 169。

② “美国政府对国内防卫的规划(BNSP 规划谈判 II E)”[1964 年 3 月],《美国外交关系, 1964—1968》, 10: 51。

③ 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 1964 年 5 月 13 日, 邦迪整理, 文件箱 1, 给总统的备忘录, 国家安全文档,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同时可参考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 1964—1968: 南美洲和中美洲; 墨西哥》, 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出版署, 2004, 31: 45, 574—575。

④ 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 1964 年 3 月 29 日, 文件箱 2, 邦迪文档, 国家安全文档,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发人深省的材料, 参见记录备忘录, 麦科恩整理, 1964 年 4 月 3 日, 文件箱 1, 约翰·麦科恩文档,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得胜利。但是，在各地日益高涨的要求变革的呼声却伴随着日益激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在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的主要外国势力来源于美国，因此拉美的极端民族主义有着极为显著的反美情绪特征。^①

无论反美主义的源头何在，约翰逊觉得他不能让左翼势力在新世界的任何角落再次大获全胜。他的前任肯尼迪曾经发誓不会再允许另外一个美洲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约翰逊决心履行肯尼迪的誓言。^② 如果卡斯特罗停止在西半球的颠覆活动的话，美国承诺不会入侵古巴，约翰逊作出保证，但是他渴望摆脱这位共产主义的煽动者，并确保他的古巴试验不会在任何其他地方被复制，无论是在智利、巴拿马、巴西，还是英属圭亚那。^③

他的顾问们花了大量时间来分析热点问题，寻求挫败民族革命巨变以及共产主义挺进的方法。例如，邦迪再次写信给约翰逊谈及英属圭亚那的左翼领袖切迪·贾根(Cheddi Jagan)：“我本人一直认定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一个独立的贾根政府，因此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推翻它。当前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的整体目标是：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避免在1964年面对这个选择。”^④

在1964这个大选年约翰逊最为希望避免作出艰难抉择的地方是越南。他不能容忍失败这个概念，但是他希望在大选年避免越南问题升级，同时避免以战争狂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事实上，他极为迫切地希望能够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对和平的热爱。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曾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是一位追求和平同时希望再次当选总统的谨慎领袖却不能容忍共产主义在哪怕是印度支那那么遥远的地方取得进展。

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约翰逊总统清楚地表示他想要赢得越南战争。1963年11月24日，仅仅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两天之后，约翰逊会见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

① 中情局的报告，参见国家情报评估 80/90—64，“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潜能”，1964年8月1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31:65；约翰逊的质询，参见记录备忘录，1964年2月3日，文件箱1，麦科恩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可参考约翰逊与托马斯·C·曼之间的电话录音，1964年6月1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31:41—50。

② 拉贝，《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79—99。

③ 参见，例如，与约翰逊总统会面的备忘录，1963年12月1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11:904—909；记录备忘录，1964年4月7日，文件箱1，麦科恩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约翰逊，《优势》，24。

④ “英属圭亚那”，无署名[邦迪]，未注明日期[1964年2月?]，文件箱1，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麦科恩、美国驻南越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洛奇首先总结了自11月2日南越的将军们推翻了长期统治南越的吴庭艳政府之后越南局势发展的现状。洛奇对最终能够击败共产主义起义持乐观态度。但麦科恩持反对意见,表示中情局对越南局势持悲观态度。

新任总统插话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对吴庭艳政府被推翻,以及吴庭艳本人被杀表示不快。此外,“国会中正有越来越强烈的呼声”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确保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必须停止越南内部的一切争斗。洛奇担任美方一切行动的总负责人。持不同政见者“应当被处理掉”。约翰逊并不相信“我们必须以美国为模版来塑造所有的亚洲国家”。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而非改造越南这个国家,尽管他也充分地认识到如果需要在越南取得胜利,经济援助是少不了的。^①两天后,他向各政府机关签发了一份正式备忘录:“美国在越南的核心目标仍然是帮助越南人民和越南政府赢得抵抗由外来的共产主义势力所主导和支援的颠覆阴谋。”^②

在1964年,没有任何外交政策问题比越南问题更为重要。也没有任何其他事务比越南问题更为占用总统的时间。越南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缓和。对于约翰逊而言,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远远比与克里姆林宫缓和紧张局势重要得多。他相信如果美国在越南“战败”,莫斯科或北京将从中受益。在他的心目中,所有这些斗争都是互相联系的,虽然这些联系并非是清晰的,或有逻辑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今日的世界是两大观念体系以及两大社会体制的巨大战场。”^③

约翰逊并不打算通过谈判来解决越南的冲突。戴高乐总统强烈要求进行和谈,但是和谈可能会导致南越的中立立场。约翰逊对此并不感兴趣。在1964年3月底,他指示美国驻法国巴黎的大使知会戴高乐说美国决心“确保由共产主义所主导的侵略不会推翻亚洲的自由国家”。他坚信,颠覆活动“对世界各地稳步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① 记录备忘录,1963年11月25日,文件箱1,麦科恩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约翰逊最初的提议,参见凯泽,《美国式悲剧》,284—290;琼斯,《一代人的消亡》,444—447;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选择开战:错失和平机会和越战的升级》(*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1—107;伍兹,《林登·巴恩斯·约翰逊》,501—506。

②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1963年11月26日,文件箱3,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第273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

③ 引文出自约翰·敦布瑞尔(John Dumbrell),《林登·约翰逊总统与苏联共产主义》(*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Soviet Communism*),曼彻斯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4,11。



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①

排除越南中立的可能性，约翰逊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将采取他们所希望的一切行动来赢得在越南南方的胜利，但是他不能冒险在大选年在越南重蹈一次在朝鲜的覆辙——至少现在还不行。只有在11月之后才能提出新的动议，但此刻他只能批准一些谨慎的措施来支持南越政权，避免美国在越南遭遇失败，以及预防中国的干预。他同时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坦白另外一件他不能做的事情：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来扩大战争的规模。虽然如果能通过这样一项决议的话会使形势变得非常有利，但是“他坦率地认为[国会]并不会为他通过一个有用的决议”，至少此刻不会。^②

约翰逊承认国会和公众都未向他施加压力以升级越南战争。1964年，参议院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福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三军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都反对美国升级在越南的战争，并对可能引发的后果表示担忧。大多数的美国人对越南一无所知，即使是在那些知晓越南的人中间，仅有少于10%的人支持美国在越南采取强硬的政策。“我并不认为美国人民会支持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在1964年5月27日的一次电话长谈中承认道。^③

内心恐惧和政治算计，而非外部压力，驱使约翰逊总统采取这一行动。在仅有4%的美国人知道美国将在印度支那采取果断军事行动的时刻，约翰逊还深受当年杜鲁门在朝鲜因对中国“战败”而受到中伤诽谤的记忆折磨。邦迪警告他，“如果我们看上去是第一个撤出西贡的话”，我们将遭受与杜鲁门同样的厄运。约翰逊相信，共和党人正急切地想利用越南问题来攻击他。^④

在与参议员拉塞尔的电话谈话中，约翰逊表达了面临两难选择时的苦恼情绪。他并不想开战但同时也不希望美国撤出越南。“我都快不成人样了。”但是他告诉拉

① 约翰逊致波伦，1964年3月2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91—193；同时可参考记录备忘录，1964年3月4日，文件箱2，切斯特·V·克利夫顿(Chester V. Clifton)文档，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② 记录备忘录，1964年3月4日，文件箱2，克利夫顿文档，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约翰逊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一次会议备忘录，1964年3月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29—130。

③ 引文参见约翰逊与理查德·拉塞尔之间的一次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东南亚大陆；地区事务》，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2000，27:127；同时可以参考约翰逊与邦迪之间的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出处同上，137；“越南”，《盖洛普民意测验3》：1882；凯泽，《美国式悲剧》，391；洛格瓦尔，《选择开战》，135—139。

④ 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邦迪整理，1964年1月9日，文件箱1，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可参考前一条注解中的引文。



塞尔说他同意一位他们俩共同好友的建议：美国民众会“原谅你的一切但是决不会原谅你的软弱”。但是让美国军队进驻越南并且作战意味着把美国的男孩们送进他们的坟墓。曼斯菲尔德已经警告过总统，如果美国不尽力削减损失的话，一场更大的战争已是迫在眉睫。拉塞尔说他和曼斯菲尔德“有着一些相同的忧虑”。“我何尝不是，”约翰逊反驳道，“但是另一方面造成的忧虑更为巨大”——他意指对政治对手报复的担忧。^①

约翰逊并不想从越南“仓惶出逃”。否则美国的荣誉和公信力将变得岌岌可危。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曾作出过承诺，他将兑现这些承诺。当八月初一艘美国驱逐舰宣称在东京湾遭到袭击，约翰逊迅速利用这个机会，提请国会通过决议授权他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应付此事件。“美国将信守诺言。”他告诉国会。必须挫败对整个越南地区以及“对我们美国”的任何威胁。“这并不仅仅是一场丛林战争，”他说道，“这是一场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前沿阵地争取自由的斗争。”^②

对于约翰逊而言，越南是“1960年代战争的表情”。在公开场合，他宣布这是一场绝对不容失败、为自由而战的战争。^③私下里，他心中充满矛盾与不安。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把我们国家的男孩子们送去越南，在1964年5月的又一个不眠之夜后他在沉思之后问邦迪道。“天知道越南对我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然后他对自己的悲叹给出了答复：“当然，如果你开始从共产党面前逃跑的话，他们会一路追着你直到你家的厨房。”^④

几个月之后，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约翰逊逐一地询问他的顶级顾问：“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努力是否真的值得？”但是，并没有人对越战持反对意见。美国绝对不能容忍河内赢得这场战争，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任美驻南越大使麦克斯韦·泰勒(Maxwell Taylor)说道。如果美国战败，那么将危及美国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地位。“如果我们在越南战败，”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Earle Wheeler)上将说道，“那么在越南周边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将垮台并可以预见共产主义中国成为该地区新崛起的权力中心。”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此深表认同。国

① 贝施罗斯，《掌权》，401—403；完整的会谈，参见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中的录音；更富启示意义的是，与拉塞尔之间的对话，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7：125—134。

② “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关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特别讯息”，1964年8月5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4》，930—932；关于他本人对先例、尊严和荣誉的担忧，参见，例如，极富启示意义的材料是与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会谈录音，1964年7月7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更为简短，同时并不清晰的版本出现在贝施罗斯，《争取荣耀》(Reaching for Glory)，387—389。

③ “向国会呈递的特别讯息”，1965年5月4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5》，495。

④ 约翰逊与邦迪之间的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7：135。



务卿腊斯克也持相同看法，他附和道：“中国将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①

约翰逊专注地倾听了顾问们的意见，接着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为在南越的“根基”提供更多的支援。他批准恢复美国军舰在东京湾的巡逻，同时恢复从南越跨越边境飞入北越对后者实施有限空袭。但是这些都只是临时措施和阻挠行动。当局势变得对美方更为有利时，他将批准对北越的进攻。但此刻在改善南越局势上绝不能吝惜任何资金的投入。“此刻绝对不能踌躇不前。”这“是他一贯的观点”。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表示“钱并非我们关注的焦点”。他补充说道：“等我们在南越打下根基之后，我已经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②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约翰逊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有着审慎的强硬态度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总统大选进行期间，当赫鲁晓夫被驱逐出苏联的权力中心，当多勃雷宁大使试图让约翰逊放心克里姆林宫的新领袖们仍计划继续推进美苏缓和进程时，约翰逊总统作出了相似的答复。他坚称，“我们的使命是维护和平。”美国希望能够同莫斯科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虽然他们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是这些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苏联人，”约翰逊说道，“需要稍稍屈尊俯就一些，同样我们美国人也必须放低姿态。”^③

在总统选举日，当预期约翰逊总统将赢得对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压倒性胜利之时，多勃雷宁在美国国务院拜见了腊斯克并转交给他一封来自克里姆林宫新领袖们的信。苏联政府重申希望能够促进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并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他们“并不希望埋葬任何人，也不希望被任何人所埋葬，同时他们[此刻]坚信对于哪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的观点分歧不应当成为进一步发展美苏关系的障碍”。克里姆林宫愿意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削减国防开支，与西德恢复邦交正常化，协调欧洲安全，推进裁军进程，并愿意与美国合作开发外层空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动情地回顾了美苏过去的愉快合作，以此作为他们来信的结尾。美国和苏联“在反抗法西斯势力的严酷战争中曾是并肩作战的盟友。苏联人民深深怀念那位伟大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他们希望在美苏传统友谊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并“达成真正的美苏睦邻友好关系，实现双边互赢合作”。^④

在之后的会面中，其他苏联官员传递了相同的讯息。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12月初会见国务卿腊斯克和约翰逊总统时，他表示克里姆林宫希望双方能够尽快

① 会议备忘录，1964年9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749—755。

② 出处同上，753—755。

③ 会谈备忘录，1964年10月16日，出处同上，14：128--129。

④ 苏联政府致约翰逊总统的讯息，1964年11月3日，出处同上，165—169。



着手解决那些威胁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德国的未来再一次成为了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葛罗米柯建议美苏两国认可德国分裂的现状，确认东德和西德现有的国界，并确保两个德国都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尽管美国向苏联保证西德永远都不会染指核武器的扳机，苏联对此仍然充满忧虑。历史绝对不能被遗忘。德国复仇主义者，虽然只是极少数，仍然渴望重新夺回德国在二战后失去的东德领土。如果他们通过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获得核武器的话，“这将为联邦德国采取冒险行动创造可能性”^①。

美国官员同样也担心一个独立的德国势力重新崛起，同时担心德国可能会谋求核武器。在这些人当中，腊斯克和他的幕僚们承认“德国人正在寻求[在核武器问题上]与美国达成更大更完善的双边协议，而最近他们正在谋求获得自己的核武器”。由于美国官员对联邦德国未来的发展轨迹充满忧虑，因此他们通过孜孜不倦地、富有创造力的工作遏制西德在自由世界的影响力。“我们不能总是把德国人当成二等公民。”副国务卿鲍尔强调说。^②

美国人并不愿因放弃对德国统一的支持而疏远了他们在波恩的盟友们。约翰逊总统告诉葛罗米柯说他不会同苏联签署一份德国分裂现状的和平条约。^③ 对德国统一的支持是维系美国与联邦德国的牢固纽带。约翰逊在1月4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谈道：“通过民族自决来实现德国统一是一个未竟的巨大使命。”^④

如果美国优先考虑这一问题会让美苏缓和变得不可能，那么就让这种可能性消失吧——尽管这个结果并非总统先生所希望看到的。在同一篇国情咨文中，他呼吁

① 会谈备忘录，1964年12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130—135；同时参见会谈备忘录，1964年12月9日，出处同上，135—140；第二条引文请参见会谈备忘录，1964年12月2日，文件箱19，情报与研究，Lot 87 D 337，第59号记录组，国家档案馆；更为简短的版本出现在《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184—189。

② 会谈备忘录，1965年1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157；同时参见防止核扩散、军备控制与裁军委员会所整理和编写的大量备忘录和材料，“欧洲，北约，德国与多边核力量计划”（“Europe, NATO, Germany, and the MLF”），1964年12月12日，文件箱1，委员会文档，防止核扩散委员会，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参见“一份核不扩散协定的价值和可行性”（“Value and Feasibility of a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1964年12月10日，文件箱2，出处同上；弗兰克·J·加文（Frank J. Gavin），“来自过去的轰炸：1960年代留给核不扩散事业的经验和教训”（“Blasts from the Past: Prolif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1960s”），《国际安全》29（2004年末2005年初的冬季）：106；科斯蒂廖拉，“林登·B·约翰逊，德国与‘冷战的终结’”，173—210。

③ 会谈备忘录，1964年12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140。

④ “年度国情咨文”，1965年1月4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5》，3；同时参见，例如，腊斯克致麦吉，1965年1月1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5:207。

改善美苏关系并提出建议,希望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互访。但是与克里姆林宫的缓和不能以牺牲联邦德国这个盟友的代价来实现。

当然,约翰逊总统并不乐意把这些事情直接告诉俄国人。他和顾问们苦苦挣扎并努力寻求折衷方案。巡回大使卢埃林·汤普森,约翰逊政府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反对美国作出任何缓和的举措。其他一些专家则认为有机会在更大程度上缓和美苏紧张对峙态势并推进军备控制,但是他们却未能有效地提出相关议程。这些幕僚们虚掷了几个月的时间考虑约翰逊政府应该对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大选日的那封来信作出怎样回应。邦迪知道苏联已经发出了一个愿意缓和的信号,但是此刻他不得不全神贯注于东南亚。当约翰逊总统最终于1965年1月14日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回信时,他只是重申了他对和平和核武器不扩散的渴望。他并未告知莫斯科他会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也未明确表示美国愿意承认民主德国或接受德国分裂的现状。毕竟,北约内部的凝聚力是他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①

同样,击败北越的进攻以及东南亚的民族解放革命也是他最为优先考虑的。约翰逊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在南越持续升级的战争是北越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援助所造成的结果。而北越调度越来越多的军队进驻南越的情报使他们更为深信这一观点。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以及南越局势的恶化,约翰逊和他的幕僚们将视线的焦点聚集在南越。美国面临极其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通过轰炸北越使战争升级并承诺向印度支那增派美国作战部队,要么通过谈判以寻求美国从越南脱身。10月副国务卿鲍尔写了一份长达67页的备忘录反对越南战争升级。^②几周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同时也是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胞弟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写了一份42页长的备忘录质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效度:“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过分简单化的。”它可能适用于某些场合;却未必适用于另外一些场合。威廉·邦迪和他的同事们在备忘录中写道:在南越的失败可能未必会像柏林的失败对

① 约翰逊致苏联政府,1965年1月14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210—212;邦迪致约翰逊,1965年1月10日,文件箱2,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给总统的备忘录,邦迪整理,1965年2月2日,文件箱8,政府首脑书信集,国家安全文档,出处同上;关于汤普森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见斯珀吉翁·基尼(Spurgeon Keeny)致邦迪,1964年12月16日,文件箱5,斯珀吉翁·基尼备忘录,人名文档,国家安全文档,出处同上;汤普森致福斯特,1964年12月10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141—145。

② 詹姆斯·A·比尔(James A. Bill),《乔治·鲍尔: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幕后》(George Ball: Behind the Scenes in U.S. Foreign Policy),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158—162;麦克纳马拉,《回忆录》,156—159。



于欧洲那样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但是“也有可能变得那样糟糕”，因此直接抽身或以弱势姿态开启谈判也会是非常危险的。^①

1965年1月底,麦克乔治·邦迪和麦克纳马拉开始确信美国政府已经走到了三岔路口。美国不得不动用“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来以武力迫使共产党作出政策上的调整”。“鲍勃和我相信,”邦迪在给约翰逊的信中写道,“如果美国继续扮演当前这一本质上被动的角色的话,事态将朝着对我们最为不利的方向发展。”^②

约翰逊总统委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前往越南视察评估局势。约翰逊并不期望越战升级。他希望西贡的局势能够更为稳定。他希望南越的军阀们能够停止互相之间的长期争斗。他极度苦恼。他仔细斟酌。“对一个总统而言,最难的任务,”他说道,“不是采取正确的行动,而是知道怎样的行动才是正确的。”^③

从越南归来之后,邦迪清楚地表示他的想法是正确的。越南的局势令人惊骇。除了南越和北越的战争之外,南越自身内部也在进行着一场准内战。不仅共产党领导的越共正通过推翻南越亲美政府的斗争日益发展壮大,同时继任吴庭艳的将军们正在密谋着要推翻彼此,其中的一些甚至正在与佛教领袖以及非共产党的中立派领袖合谋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开启谈判。面对如此混乱局面,邦迪相信除了采取行动提升士气并强化美国对西贡政权的投入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越南的前景非常严酷,”他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写道,“越共的活跃和坚毅程度异常惊人。”如果美国就这样退出越南,他说道,“那么就会激起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美国违背了曾许下的维护越南独立的承诺。这会在东南亚造成“非常巨大的”后果。对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到影响柏林士气的程度”。^④

① 引文参见,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准备的文件,“在东南亚的行动方针”,1964年11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918—919;关于邦迪,参见伯德,《真相的本色》(*Color of Truth*),292—298;比尔·邦迪致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鲍尔和麦克乔治·邦迪,1964年10月19日,凯·伯德提供了复印的版本。此时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质疑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实效性。参见哈罗德·P·福特(Harold P. Ford),《中央情报局与越战政策制定者们:三个阶段,1962—1968》(*CIA and the Vietnam Policymakers: Three Episodes, 1962—1968*),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1998,56;同时参见中情局评估是否失去越南和老挝会加速“多米诺骨牌”效应,1964年6月11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文件编号CK3100234322。我十分感激沙拉·图克(Sarah Tuke)帮我找到这份文件。

② 麦克纳马拉,《回忆录》,168;邦迪致约翰逊,1965年1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95—96。

③ “年度国情咨文”,1965年1月4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5》,9。

④ 邦迪致约翰逊,1965年2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180;“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总结笔记”,1965年2月8日,出处同上,191;麦克纳马拉,《回忆录》,170;凯泽,《美国式悲剧》,393—398;洛格瓦尔,《选择开战》,319—322。



2月7日,当邦迪仍在越南停留期间,越共袭击了美国在越南南方波来古(Pleiku)附近的一座军营和直升机基地,打死8名美军士兵,打伤126人。这次出人意料的突然袭击更强化了美国适时作出决定的紧迫性,决定是否应当让河内为南越所发生的一切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是否应当系统地轰炸北越。约翰逊立即召集了他的顶尖顾问们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开会研究。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着作出回击。但是副国务卿鲍尔强调,当前有一个因素使这件事变得错综复杂:正在此刻,苏联总理柯西金正在河内访问。尽管如此,鲍尔仍然支持对北越进行报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持反对意见。“谨慎应当成为我们的口号”,他说道,美国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招致中国的介入干预,促进中苏和解,或使克里姆林宫产生敌对情绪。他说,其结果可能比朝鲜还要糟糕。^①

约翰逊为报复北越辩护。他已经“把猎枪搁在壁炉架上,把子弹存在地下室里已经太久了”,他打比方说道,但是他的耐心现在已经耗尽了。敌人正在杀害美国军人。“保持懦弱会比迎头痛击陷我们于更多的战争,”他说道,尽管会冒“苏联人和中国人卷入的风险,但是他们两国对我们美国并不友善,而现在的问题无非是同时直面这两个国家而已”。在第二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约翰逊总统再次明确表示他“想要给柯西金以及这世界上的其他一小部分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寻求和平的机遇,但他仍然下令对北越实施轰炸。^②

在报复性空袭开始的第一个晚上,约翰逊睡得很不安稳,同时不断地被叫醒。第二天他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记载道:“昨天晚上,我们一直等着这次袭击进行得怎样的消息。凌晨一点的时候消息来了,接着两点、三点,然后五点——总是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迅速地接起电话,小声地交谈……过去的这一天笼罩在阴影中,并充满了紧张感,但是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学会在这样一种气氛中生活下去——不是区区几个小时或几天,而是在未来的很多年都可能会是这样。”^③

决策像滚雪球般接二连三地作出,而约翰逊在提升美国对越战的投入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内心的苦痛挣扎。一旦他批准了对北越的系统、逐步升级的轰炸作战,史称滚雷行动,他又会接到需要投入两队海军陆战队地面作战部队来保护在南越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建议。“我对向越南派驻地面作战部队怕得要死,”他私下里向他一直信

^① 记录备忘录,1965年2月6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159。

^② 出处同上,160;记录备忘录,1965年2月7日,出处同上,171—172。

^③ 贝施罗斯,《争取荣耀》,174。

任并尊重的麦克纳马拉透露说道，“但是我更害怕因为缺乏安全保卫措施而损失几架美国战机。”^①约翰逊的质疑和内心的疑惑表明问题的答案远非事先可以决定的。^②但是4月他又批准向越南增兵4万以协助防御一些核心飞地免受越共的袭击，7月他又派遣了5万士兵向敌人示威，表示他们绝对不可能赢得对南越的迅速胜利。虽然他寻求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就好像1950年在朝鲜时那样，但是他仍然向他的军事高官们许诺如果必要的话，他将采取更多的行动以阻止共产党在南越夺权。^③

约翰逊总统愿意追寻着前任总统们开辟的事业前进，这是一项充满了悲剧的事业，将有超过五万年轻的美国士兵在越南战死，将有一百万的越南人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更有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将遭受无法估算的艰难困苦，更将导致美苏缓和的终结。在一次与小马丁·路德·金的（录音的）电话长谈中，约翰逊解释了他在2月作出决定时是如何思考的。我并不想“与中国和苏联交恶”，约翰逊说道：

我从11月一直等到次年2月。但是他们仍然得寸进尺。他们就这样步步紧逼，现在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如果我就这样从越南撤出，那么我想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所作出的承诺都会作废。我想我们的撤出将会立即引发泰国的危机，局势可能会变得和越南一样糟糕。同样我认为我们在菲律宾也会遭遇相同的问题。我相信假设德国人知道我们对他们所作出的承诺不再有效时他们一定会惊慌失措，天知道我们在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会面对怎样的处境。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以及任何前任总统都未允许共产主义入侵这些国家并攫取这些民族的自由。所以我竭尽全力尝试……我绝对不能陷美国于这样的险境。我们曾在1954年陷入过这样的麻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曾经深陷其中。^④

① 贝施罗斯，《争取荣耀》，195；同时参见，约翰逊与邦迪的对话，1965年2月18日，出处同上，184；关于约翰逊对麦克纳马拉的大加赞赏，参见第一夫人伯德·约翰逊的日记条目，1965年2月14日，出处同上，178；约翰逊，《优势》，20。

② 关于决策的迫切性，以及不同顾问之间意见的对立和分歧，在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战时议会：麦克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160—190；关于约翰逊喜欢让自己的选择保持开放性，参见伍兹，《林登·巴恩斯·约翰逊》，499—500。

③ 所有主要越战专著都一致认为，决定性的决策是在1965年2月到7月期间作出的。一份便捷的总结，可参考乔治·C·赫林（George C. Herring），《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第2版）（*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2nd ed.*），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1986，108—143。

④ 与小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会谈录音，1965年7月7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



恐惧和实力促成约翰逊作出了决定。约翰逊总统害怕在越南战败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并侵蚀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他相信他自己正在与共产主义进行一场争夺人类心灵和头脑的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曾告诉他：“如果我们要拯救一个国家，我们不仅仅要追求满足他们的胃，还必须设法得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约翰逊非常同意这一观点，并且强调共产党人是无情残酷的竞争者，就好像曾经的纳粹那样是西方的强劲对手。“我们从慕尼黑的教训中学会，”他告诉埃弗里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当你作出退让，那些独裁者甚至会生啖你的肉。如果他们夺取了南越，他们必定会夺取泰国，夺取印度尼西亚，夺取缅甸，然后掉头直接扑向菲律宾。”^①

这是备受争议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一次卷土重来，尽管约翰逊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知道世界局势远比这个理论要复杂得多，但是他们仍然凭直觉依靠这个理论来支撑决策。他们担心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将会超出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乔治·邦迪在他为数众多的为越战升级正名的备忘录中经常引用多米诺骨牌理论，并且断言越南是美国的力量和信誉的一块试金石。邦迪与罗伯特·科默持相同观点，当时科默担任邦迪的亚非事务助理。“我认为亚非地区将发生大动荡，”科默在1964年给邦迪的信中写道，“亚非地区是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最不熟悉的地区，因此除非总统先生作出强有力的领导，否则我们必将在不久的未来在亚非地区遭遇严酷的局势。……现在已经有足够强大的越南、桑给巴尔、刚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让我们伤透脑筋，频添白发了。”这些最不发达国家构成了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竞争的主战场，恰恰是“因为这些地区发展极其落后，局势极度不稳定，同时极其容易受到攻击”。在这场竞争中，科默推断道，美国因为被人视为新殖民主义大国而处于不利地位。尽管殖民主义已经被消灭，“但鞭笞死马仍然是另外一个半球最为津津乐道的一项运动”。科默强调说，苏联和中国“正投入大量精力来拓展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但从本质上而言，这种思潮源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革命本身”。^②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改变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美国需要变得更为强硬，更为慷慨，更愿意向他们提供金额巨大的经济援助和军事力量支持，并且必须准

① 贝施罗斯，《争取荣耀》，274，181—182。

② 科默致邦迪，1964年10月6日，文件箱6，人名文档，科默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科默致邦迪，1964年10月9日，出处同上；关于邦迪非常欣赏科默，参见邦迪给总统的备忘录，1965年3月22日，文件箱3，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邦迪的其他助手，切斯特·库柏（Chester Cooper）和詹姆斯·C·汤普森（James C. Thomson），反对美国升级越战，但是他们的观点并未占上风。参见普雷斯顿，《战时议会》，191—207。



备好在任何必要时刻动用军事力量。“几乎亚洲的每一位领导人,”科默写道,“正处于观望之中……我们的[远东]盟友们——泰国人、菲律宾人、大韩民国人[南朝鲜人],以及中国人[国民党人]——都紧张得像猫一样。”^①1965年2月,当邦迪还在为延长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加以辩护时,他的助手们估算美国只有25%到75%赢得越南战争的可能性。但是仍然值得为此冒险。“[对北越]所采取的报复性政策——直到可以展示美国运用这种新形式来平定叛乱的意愿的程度——将会给将来那些准备发起游击战的冒险行为设定一个更高的代价,而由此这种强硬政策也将提升我们威慑并预先阻止这种冒险行动的能力。”^②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相信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妥善处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混乱动荡的局面。总统在1965年1月18日告诉国会说,今日的美国“已经比我国历史上任何和平时期都更为强大……我们所拥有的武器实力远比历史上任何国家所积攒的军事实力都要强大,现在更是比任何可能的敌人组合后的实力还要强大”。美国现在除了急剧增加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数量之外,约翰逊强调说,“我们的军事力量正变得更为灵活机动,以应对和平进程所面临的种种威胁”。我国“为今日那些不宣而战的边缘战争特训的特种部队人数已经增长了八倍”。无论是在质地上,还是在数量上,美国对苏联的优势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他有时纳闷“为什么就没有开展任何国会调查来研究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巨大的军事实力”。^③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需要纳闷的理由。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和邦迪都希望美国能够取得战略优势,从而使美国有能力在任何升级的危机中掌握主导权。^④然而在1965年初,他们并不希望和克里姆林宫开战,同时他们并不认为苏联正在东南亚制造混乱。“苏联并不希望在东南亚问题上与我们为敌,”腊斯克说,“我个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在亚洲陷入又一场战争僵局的话,也可能导致螺旋式上升的危机,正如当年在朝鲜那样,而且一旦中美开战,苏联也可

① 科默致腊斯克,1964年3月11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文档编号CK3100212412。我十分感激沙拉·图克提醒我关注这一文档。

② 为邦迪使团成员准备的文件,“一项持续重新评估的政策”(“A Policy of Sustained Reprisal”),1965年2月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184—185。

③ “就美国国防现状向国会呈递的特别讯息”,1965年1月18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5》,63;麦克纳马拉的陈述,参见“总统会晤国会领袖”,1965年1月22日,文件箱18,邦迪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④ 参见为肯尼迪总统准备的备忘录,[1962年8月23日],《美国外交关系,1961—1963》,8:355—358。



能会出手干预。因此约翰逊刻意强调美国压倒性实力的目的在于劝诫克里姆林宫打消干预越战的念头。^①

在他们决定升级在越南的敌对行动时，美国官员相信苏联并不打算卷入战争，而是在寻求继续与美国的缓和。多勃雷宁试图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安排一系列的首脑峰会。^② 柯西金在河内并未煽动混乱局面，相反只是向越南提供援助，以此扩大苏联的影响力，并告诫北越保持克制。迄今为止，苏联在越南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中国，但现在他们正试图“安抚那些怒气冲冲的人们”，“寻求途径阻止对抗双方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央情报局汇报道。^③

在他们决定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时，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仔细衡量了越战升级对克里姆林宫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相信苏联政府会觉得受到了一次直接的侮辱和挑战，因为柯西金现在正身处河内，”助理国务卿威廉·R·泰勒(William R. Tyler)在给他的上司乔治·鲍尔的信中写道，“苏联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国家尊严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因此他们一定会采取一些明确的行动来挽回颜面。”驻苏大使科勒从莫斯科发回了相同的警告：俄国人会感受到“与日俱增的压力迫使他们摆脱软弱无能的形象”。2月10日与约翰逊在白宫的一次会面中，乔治·鲍尔和卢埃林·汤普森劝诫总统说，对北越的进一步轰炸应当等到柯西金离开远东地区之后再行进行。但是他们俩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约翰逊说空袭仍然将持续打击北越的军事设施以及北越向南越渗透的路径。^④

① 腊斯克的证词，1965年1月8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0，17：106；关于对苏联的意图和实力的评估，参见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沃尔特·马蒂斯(Walter Matthias)，“全球局势的发展趋势”(“Trends in World Situations”)，1964年6月9日，文件箱1，国家情报评估，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国家情报评估11—9—65，“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主流趋势”，1965年1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215—227；国家情报评估11—4—65，“苏联军事政策中的主导趋势”，1965年4月14日，出处同上，10：231—232。
② 汤普森致邦迪，1965年2月1日，文件箱8，政府首脑书信集，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流产的1965年美苏峰会”(“The Aborted U.S.-U.S.S.R Summit of 1965”)，《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通讯》(SHAFR Newsletter)32(2001年6月)：1—3。
③ 乔治·C·丹尼(George C. Denney)致执行秘书，1965年2月1日，文件箱219，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反情报办公室编号0341/65，情报备忘录，1965年2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120—121；英国外交办公室所作的评估，“柯西金访问河内”，文件箱219，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伊利亚·V·盖达克，《苏联与越战》(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芝加哥，伊利诺伊州：伊万·R·迪出版社(Ivan R. Dee)，1996，3—34。
④ 泰勒致鲍尔，1965年2月8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197—198；科勒致国务院，1965年2月11日，出处同上，14：240；记录备忘录，麦科恩整理，1965年2月10日，出处同上，2：220—225。

滚雷行动让美苏缓和变得岌岌可危。美苏缓和被认为不如打击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那样重要,也不如向北京的领导人们传递美方谨慎的强硬态度来得重要。“我深信,”国务卿腊斯克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信中写道,“如果听任共产主义北越在东南亚肆虐的话,这对于美国 and 整个自由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人“有能力显示他们的政策路线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话,”他在一次国务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机密听证会上说道,那么这必将增加苏联“试图转而采用北京那种更为军事化的方式来对待世界各地民族独立革命,以此弥合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的可能性。^①

约翰逊希望能够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后仍能保持美苏缓和。苏联人和美国人拥有相同的利益,尤其是在限制军备竞赛,控制核武器扩散,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等方面拥有相同利益。然而,由于相信美苏两国正深陷于一场零和解可能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约翰逊认为他绝对不能示弱。他在童年时就学会了这样一条道理:“当你开始从一个欺负人的大孩子面前逃跑的话,他会一直追着你打,同时如果他无视你在草场划定的界线,那他同样会无视你在自家前院划下的界线。他最终会追打着你,直到把你赶出你自己家的房子。”^②

约翰逊表示他必须支撑美国的信誉,但是美国的盟友国和中立国对此表示反对,有时是公开反对,更多的是在私下场合提出反对意见。法国人滔滔不绝地提出反对;而英国人的反对意见则更为谨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Sato Eisaku)希望美国能够与越南人谈判,而不是作战。加拿大人对越战极为反感,不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民也持相同观点。约翰逊威胁说要“告老还乡”而非倾听对和平与缓解越南局势的呼吁。^③

美国公众的意见跟随着总统的导向,而非推动他作出决定。“我不认为美国国民已经为我国向越南派遣[作战]部队做好了心理准备。”约翰逊在1964年5月承认。^④七个月之后,也就是1964年12月,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反对美国向越南出兵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向越南派遣军队的人。甚至在1965年4月,仍然有更多的美国人希望美国从越

① 引文参见麦克纳马拉,《回忆录》,173;腊斯克的证词,1965年1月8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17:99—100。

② 引文参见“对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的讲话”,1961年6月5日,文件箱11,副总统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可参考,例如,邦迪与约翰逊之间的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7:135;与小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会谈,1965年7月7日,总统录音项目,米勒中心。

③ 鲍尔与约翰逊电话会谈备忘录,1965年3月6日,文件箱1,鲍尔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洛格瓦尔,《选择开战》,206,336—337,348,363;约翰·W·扬(John W. Young),“英国和林登·巴恩斯·约翰逊的战争”(“Britain and LBJ's War”),《冷战历史》2(2002年4月):67—69。

④ 约翰逊与拉塞尔的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7:125。

南撤兵或者进行谈判,而不是提升军事行动的级别或全力以赴争取越战胜利。国会的意见也并没有明显的鹰派倾向。在1965年1月对83位参议员所作的一次调查中,只有7位参议员支持对南越派遣地面作战部队或支持对北越进行轰炸;10位参议员希望能够立即开启与越南的谈判;31位参议员希望等到南越局势缓和之后开启谈判。^①

公众并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发生,但是约翰逊害怕如果将越南拱手让给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们会使他面临国内政治对手的报复和责难。“他们会弹劾一个会[从越南]转身逃跑的总统,你同意吗?”他问拉塞尔。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对此并不认同。^②但是约翰逊却不愿意为和平冒巨大的风险。桎梏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惧怕第三世界的动荡不安,担心他自己的名声以及他在国内提出的伟大社会计划的前途,约翰逊选择提升对北越军事行动的等级,而不是为了美苏缓和的利益来执政。当然他希望能够做到两者兼顾。但是他错了。

从大决战回到冷战

美国在东南亚采取的行动对莫斯科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希望能够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同时他们也需要与那些一同驱逐赫鲁晓夫的同谋们协调一致。他们两人知道自己正受到密切注视,这种关注来自亚历山大·谢列平(Aleksandr Shelepin)、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以及其他一些对改善与美国关系尝试的可行性和判断力持怀疑态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一方面他们希望能使主席团的同事们确信他们将保持行政管理上的稳定,另一方面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需要解决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解,并保持华沙条约组织各国的团结一致。^③同时,他们下定决心捍卫克里姆林宫作为另外一种可能

① 社会调查与民意测验,参见“令人困惑不解的致命战争”(“The Deadly and Perplexing War”),《新闻周刊》,1965年1月18日,34;“越南”,1965年5月16日,《盖洛普民意测验3》:1939—1940;“越南:编年史”(“Viet Nam: Chronology”),《美国国会季刊》,1965年1月22日,91。

② 约翰逊与拉塞尔的电话会谈,1964年5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27:133。

③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帝国的沦陷:冷战时期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1945—1991》(*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1945—1991*),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7章;布莱斯洛尔(Breslauer),《作为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137—178;关于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华沙条约框架内的紧张局面,参见马克·克拉默,“古巴导弹危机给华沙条约核军事行动留下的‘教训’”(“‘Lessons’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for Warsaw Pact Nuclear Operations”),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末1997年初冬季出版):348—354;塞尔瓦吉,“华沙条约与核不扩散,1963—1965”。

的生活方式的源泉的公信力。他们相信, 莫斯科, 而非北京, 应当成为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领袖们对未来的指望。^①

在 11 月和 12 月,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开始着手制定 1965 年经济计划。他们告诉同事说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 并确保“苏联人民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好”。勃列日涅夫表示, 他们怀着“喜悦”回顾之前所取得的成就, 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 我们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任务”。^② 他和柯西金希望能大幅增加苏联的国家收入, 提高农产品和生活消费品的产量。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们酝酿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在 12 月初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 表决通过了小幅削减国防开支, 并将这部分资金转而投向一些需要优先考虑的国内事务。在 12 月 9 日提交给最高苏维埃的一份报告中, 柯西金说他将把工作重心放在致力于实现美苏两国同步削减军备开支, 同时他希望能够在将来进一步推进这一项工作。他相信克里姆林宫需要“通过坚持和耐心来解决那些美苏两国存在分歧的问题”, 同时他期待与西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但是他和勃列日涅夫两人都毫不犹豫地表示, 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是否会停止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行径, 并终止在非洲的秘密行动。^③

与此同时, 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正逐渐衰退,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尽力遏制并安

① 对苏联的思维模式的绝佳分析,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分析, 参见中情局, “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政策以及越南危机”(“Post-Khrushchev Soviet Policy and the Vietnan Crisis”), 1965 年 4 月 3 日, 文件箱 220, 苏联, 国家安全文档, 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②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引文, 参见他在苏联-捷克友好会议上的讲话, 1964 年 12 月 3 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64 年 12 月 4 日, BB 4; 同时参见柯西金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汇报, 1964 年 12 月 9 日, 出处同上, 1964 年 12 月 10 日, CC 2—25; 柯西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 1965 年 3 月 19 日, 出处同上, 1965 年 3 月 28 日, CC 1—9。

③ 会议编号 179b, 1964 年 12 月 2 日, 马林笔记; 柯西金演讲的总结, 1964 年 12 月 9 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64 年 12 月 9 日, CC 2—4; 向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汇报, 1964 年 12 月 9 日, 出处同上, 1964 年 12 月 10 日, CC 2—25;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捷克友好会议上的讲话, 1964 年 12 月 3 日, 出处同上, 1964 年 12 月 4 日, BB 7—9; 有关经济改革的辩论, 参见谢尔盖·弗赖森(Sergei Freidzon), 《苏联经济决策制定的模式: 以知情人的视角来看待苏联 1965 年经济改革》(*Patterns of Soviet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 Insider's View of the 1965 Reform*), 福尔斯丘奇, 弗吉尼亚州: 特尔斐合伙人公司(Falls Church, Va.: Delphic Associates), 1987; 有关约翰逊认可美苏双方对等削减军事力量, 以及他意识到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已经陷他们于危险境地, 参见他与理查德·拉塞尔的电话交谈, 1965 年 7 月 26 日, 总统录音项目, 米勒中心; 有关与西方交易的重要性, 参见杰里米·舒里(Jeremi Suri), “‘发达社会主义’的希望与失败: 苏联‘解冻’以及布拉格之春的严酷考验, 1964—1972”(“The Promise and Failure of ‘Developed Socialism’: The Soviet ‘Thaw’ and the Crucible of the Prague Spring, 1964—1972”), 《当代欧洲史》15 (2006 年): 138—143。



抚东欧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他们的华沙缔约国盟友们不停地责难苏联忽视他们认为的来自西德的威胁，批评苏联未能弥合与中国的决裂，未能消除美国积聚常规武器力量并开展局部战争计划的潜在危险。在1965年1月华沙条约国会议上，沃尔特·乌布利希警告说，苏联应该对“美国-联邦德国核同盟”给予更大的关注。他宣称联邦德国即将获得核武器，而“他们将把核武器用于实现德国复仇二战战败这一目标”。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同意这一观点。他质问勃列日涅夫，多边核力量计划难道不是“‘核扩散’的同义词”？^①

勃列日涅夫对他们的担忧表示同意。他在一次次的演讲中援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我们决不会忘记苏联人民在二战中所遭受的苦痛。……我们将永远铭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英勇的爱国卫士。”^②“人的记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在数月后的一次华沙的集会上这样说道，“时间将会抹去对很多事情的记忆，但是有些事件将永远为人们所牢记在心，任何人都不能将这些事情从我们的脑海中抹去。在这其中，我们将铭记一举摧毁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们流芳百世的丰功伟绩。”^③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同意华沙缔约国盟友们观点：德国正热切地希望采取报复行动。他极大地扭曲了美国政策的性质，并表示美国希望利用“德国那三千万的复仇主义分子”。他强调，任何审慎的人都绝不能允许德国复仇势力再次抬头。^④

苏联领导人也不会对东南亚所发生的一切坐视不管。在1965年2月访问越南之前，柯西金给约翰逊总统发出一条讯息，“非常坦率地”表示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可能导致苏联采取应对措施，并摧毁苏联改善美苏关系的意愿，对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他表示“严重关切”^⑤。柯西金希望能改善与北越领导人的关系，之前北越领袖对苏联所提供的极少援助已经非常不满。同时他期望能够促使河内调整政策，并抵消让苏

①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摘要”，1965年1月20日，收录于沃伊泰克·马斯特尼与马尔科姆·伯恩 (Malcolm Byrne),《硬纸板城堡?:华沙条约秘史,1955—1991》(A Cardboard Castle?: An Inside History of the Warsaw Pact, 1955—1991),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出版社(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5,180,182;同样可参考208页注释③条中的相关引文。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捷克友好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12月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4年12月4日,BB 6。

③ 勃列日涅夫在华沙集会上的演讲,1965年4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4月9日,FF 1。

④ “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摘要”,1965年1月20日,收录于马斯特尼与伯恩,《硬纸板城堡?》,184—185。

⑤ 柯西金致约翰逊,1965年2月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1:186—188。

联头痛不已的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他对北越袭击美国在波来古的兵营事先并不知情,同时对北越的同志们将他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感到极度不满。但是当美国轰炸机在他访问北越的第二天对北越进行轰炸时,他勃然大怒并猛烈抨击这一行径,他宣称“美国军队正厚颜无耻地公开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南]”。帝国主义的炸弹落在了越南的领土上,造成越南人民不必要的伤亡。他说道,美国“面对持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无能为力,因此试图通过“军事投机”来挽回自尊心。当前的局势“充满了棘手的复杂性”。但同时他除了许诺将支持北越之外,迟疑着并未勾勒出任何明确的措施。^①

柯西金的不幸处境在他返回莫斯科途中访问北京时又被进一步放大。虽然他希望能够弥合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也不希望放弃莫斯科遏制军备竞赛达成美苏缓和的期望。柯西金努力尝试让毛泽东相信这些政策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我们寻求“与你们像同志那样融洽相处,我们心存敬意与你们相处”,他恳请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因为这是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中所不可或缺的。柯西金认为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因此他很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和莫斯科的同志们会持续不断地彼此敌视来内耗。“维系我们之间的纽带比造成我们之间分歧的因素要重要得多。”他说道。

毛泽东对此并不同意,同时他并不掩饰对柯西金的蔑视。毛泽东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是信奉马列主义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宣战”,“是[一个]斗志旺盛的民族”;他们并不相信有实现全面和完整裁军的可能性。毛泽东坚称,莫斯科的政策是失败主义的、退让的政策。“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革命的支持做得太少。”他对弥合中苏之间的裂痕并不感兴趣。与其出席一次由莫斯科主导的各国共产党大会来恢复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团结(以及巩固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毛泽东认为不如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考察究竟哪个国家来领导共产主义事业才是正确的。在此期间,北京不会保留对苏联的批评。

柯西金变得非常愤怒,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毛泽东说,你满口空话。“你只发表言论,但是却不采取行动”,而苏联全面致力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美国人想要在全球各地移植资本主义,我们希望能够在世界各地植下共产主义的种子。”

^① 柯西金在河内的演讲摘要,1965年2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2月9日,BB 2;盖达克,《苏联与越战》,15—34;多勃雷宁,《机密》,136;中央情报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政策”,1965年4月3日,文件箱 220,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苏联需要团结,而不是战争,柯西金一再重申。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和你们一样,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士,”柯西金在与毛泽东长谈的最后说道,但是我们“反对制造一个新的战争局面”。^①

在柯西金返回莫斯科之后,他在苏联电视上发表讲话,抨击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并对北越实施空袭。“因为越南的爱国斗士们正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帝国主义者正试图向全越南人民寻仇。”^②克里姆林宫决不会背弃越南的共产主义同志们。他们将向越南提供援助,并敦促开启谈判,但是他们绝不会迫使越南作出让步,更不会抛弃背叛南越的革命运动。他们不可能那样做。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他们犯错误,他们将会被中国共产党蔑视,同时被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民族革命运动者嘲笑。“在如今的局面下,”勃列日涅夫宣称,向我们的一个兄弟国家“给予有效的援助”,“这是一件关乎苏联荣誉的事,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份国际责任”。多勃雷宁写道,我们的双手被“我们自身意识形态上的忠诚”所牢牢束缚,事实上约翰逊又何尝不是如此。^③

美国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让莫斯科感到太过震惊。资本主义者的一言一行透露着资本主义者的本质。帝国主义者再一次显示他们“无望地渴求扭转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镇压那些为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勃列日涅夫这样说道。^④他们终将失败。“曾经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正在崩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被解放了的民族和人民的拥护,”他欢呼道,“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在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因为他们看见共产主义者是走在全球革命斗争最前沿的旗手。”勃列日涅夫接着说,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它给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平等,使同志们亲如手足,同时可以实现世界和平。没有共产党人,就没有新世界,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就没有进步。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的。”^⑤

① 所有的引文都来自毛泽东与柯西金进行的峰会的波兰文译本,1965年2月11日,冷战国际史文档,在国际大会上宣读,“追踪中国龙:美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情报评估报告,1948—1976”(“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Mao Era, 1948—1976”),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2004。

② 柯西金电视讲话,1965年2月26日,文件箱220,苏联,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③ 勃列日涅夫在纪念战胜法西斯主义二十周年典礼上的演讲,1965年5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5月10日,CC 21;多勃雷宁,《机密》,115;同时参见柯西金在蒙古友好集会上的讲话,1965年4月1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4月20日,BB 9—10;盖达克,《苏联与越战》,22—50。

④ 勃列日涅夫在华沙集会上的讲话,1965年4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4月9日,FF 6。

⑤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65年5月8日,出处同上,1965年5月10日,CC 18。

但是,现实世界仍然危机四伏。在克里姆林宫前进行的纪念战胜德国纳粹二十周年集会上,面对六万名老兵、指挥官、工人和科学家,勃列日涅夫再次重提令人熟悉的德国复仇主义势力这个主题:

时间可以改变许多事情,但是应当为过去的这场世界大战负责的元凶,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生活在时间之外;一次压倒性的失败并未让他们恢复理智和清醒。在他们的头脑中,历史显然可以在仅有的一个相同轮回中循环往复,那就是,战争,战败,重新集聚力量,然后开启新一轮的战争。在缔结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花了超过十五年的时间来为他们的军队重构起一个框架。今天的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在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北约国家的积极支持下,仅花了九年时间就重新组织起了相同的军事力量。他们现在手头上有一支整整五十万人的联邦德国国防军以及一大批的军官,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组织并训练西德军队的战略计划是基于德国将获得核武器的预测之上。联邦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们的目标是染指核武器,并在核武器的支持下重新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①

二十年如流星一般飞逝而过。但是从苏联的视角来看,这期间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巨大的恐惧犹存,然而更大的机遇就在眼前。当埃夫里尔·哈里曼七月访问莫斯科时,柯西金与他进行了长谈,向他极其详细地表达了苏联的失望情绪和期望。柯西金开玩笑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选票都给了约翰逊而不是戈德华特,只可惜他们的选票不能被计入总数”。他们希望“能够实现……彼此的互相信任”。但是现在他们的幻想破灭了。现在“非常危险的势力”正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德国势力的幽灵重新抬头。柯西金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是针对苏联设计的,因此美国正试图维护德国的军国主义势力”。更糟的是,在对统一德国这个长期目标的持续支持中,美国将“西德与东德对立,而这使我们美苏两国面临互相对抗”。欧洲没有任何人真心希望德国统一,柯西金说道。如果美国能够认可德国分立为二的现状,并保证波恩永远都不会获得核武器,这样就有可能真正解决德国问题。^②

①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65年5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5月10日,CC 19。

② 哈里曼致约翰逊和腊斯克,1965年7月15日,2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306—313;补充说明,可以参见哈里曼与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的会谈备忘录,1965年7月23日,文件箱546,哈里曼文档,国会图书馆。



但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可能性都取决于华盛顿是否愿意放弃对越南革命的干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还未巩固他们的领导地位，同时他们受到来自国防部官员和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压力，要求他们增强苏联对美国在东南亚和中美洲的“冒险主义行径”的抵制。^① 柯西金表示，美国“正试图扼杀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华盛顿必将遭遇失败。与此同时，缓解冷战的机遇也随之蒸发。^② 多勃雷宁问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你难道不认为你们与苏联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吗？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轰炸北越？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们？”^③

答案非常清楚：对于美国官员来说，左翼势力的崛起以及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尚未成形但同时风雨欲来的全球现象的一部分，美国绝对不能允许共产党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进展。例如，1965年4月底，当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骚乱升级，暴力冲突忽然爆发时，约翰逊总统派遣了2万3千名美军士兵前往维持社会秩序，并阻止了一次可能会将多米尼加转化为敌对美国的政府的政变。虽然局势非常混乱让人捉摸不透，同时总统顾问们在决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上意见有所分歧，但是约翰逊先入为主的成见却异常清晰地昭然若揭。在一次与邦迪交谈的电话录音中，他说道：“我正在看到这样一种模式，而我绝对不能就这样保持沉默……他们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所做的一切，他们在墨西哥城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做的一切，绝非是互不相关的。”^④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如果在越南战败，其后果将是异常危险的，因为这将鼓舞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⑤ 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美国对中国的版本极为反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甚至对共产主义充满狂热。他们坚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教条的正确性，以及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终胜利。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斗，最终掌握了中国大陆广袤的领土和为数众多的人口。”他们的最终目标，中央情报局写道，是“按照北京的军事革

① 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② 哈里曼致约翰逊和腊斯克，1965年7月2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309—313。

③ 会谈备忘录，1965年3月12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257。

④ 阿伦·麦克弗森(Alan Mcpherson)，“被他自己误导：约翰逊录音磁带揭示了美国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干涉的真实内幕”(“Misled by Himself: What the Johnson Tapes Reveal about the Dominican Intervention in 1965”)，《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38:第2期(2003年):137;同时参见约翰逊，《优势》，200—201。

⑤ 尤其应参见腊斯克的证词，1965年1月8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17:100。

命版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当然，他们“那强烈的作为民族、历史和文化中心的意识”也对他们的行为起到了塑造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意识都影响到了中国的政策决策，尤其是与苏联的决裂。根据美国的情报分析师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精力、战斗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们有能力在国际环境中取得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

似乎远远超出他们现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所能解释的范围。……这并非中国政策强大的结果，也不是现有国际局势异常脆弱易受攻击的结果。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帝国迅速瓦解崩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不可预测且不断变更的国家结盟关系以及持续时间较长的不稳定局面正是这个权力真空的标志。新兴国家由于政府脆弱且缺乏经验，往往非常容易受到北京的方针路线的诱惑。怀着巨大的期望和微薄的能力，这些国家的人民往往会对现状充满失望，自然就会倾向于将他们自身的不幸怪罪于一些外部因素，比如殖民主义者的剥削以及种族统治。因此，要向他们输出激进的“方案”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并非难事。^①

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必须证明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并非即将席卷第三世界的进步浪潮的一部分。国务卿腊斯克说道，如果我们不阻止越南共产党的话，柬埔寨会成为下一个“完成向着另一侧转化的旅程的国家”，很快泰国会成为再下一个。腊斯克表示，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从印度尼西亚到南美洲，都在密切关注着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试图从中寻求未来局势发展的线索。^② 如果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挺进意味着牺牲美苏缓和，那么虽然我们对此结果表示遗憾，但仍然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们曾经决心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邦迪告诉共产党人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就把越南拱手相让”。^③

约翰逊、腊斯克、邦迪、哈里曼和他们的同事们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够向河内施压，促使北越放弃在南越的革命议程，但是他们也明白如果苏联领导人真这么做的话，他

① 国家情报评估 13—9—65，“共产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1965年5月5日，文件箱4，国家情报评估，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② 腊斯克的证词，1965年1月8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17：97—100，106—108。

③ 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邦迪整理，1965年4月8日，文件箱3，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们等于是放弃对一个“对全球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运动的领导权。^① 克里姆林宫绝对不能允许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同志们标榜自己为全球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长期领袖。科勒在4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写道,如果苏联官员必须作出选择的话,他们会优先考虑保持自身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影响力,而不是发展与美国的缓和关系。^②

尽管如此,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仍然决定对越南战争进行大规模升级。虽然仍然心存忧虑,但是对于自身超强实力的优越感又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美国分析师认为,最终“苏联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求”会迫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迎合美国。^③ 苏联自身的弱点会使他们变得更容易对付。除了苏联经济的萧条不景气之外,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还面临着来自东欧的反对意见,以及与北京逐渐升级的激烈竞争。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将面对来自各方彼此互相冲突的压力和催促的围攻。他们同样也可能被卷入第三世界的泥沼,这往往会与他们自身更为明智的良好判断背道而驰。但是最终他们会寻求缓解与美国之间的竞争,以便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我们认为,”中央情报局作出判断,“在苏联政治舞台以及当前国际局势下,那些最为重要的压力将会最终提供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可能性:即苏联将会重新把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尝试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④

苏联的弱点为美国提供了机遇,尽管越南的战局还在进一步恶化。约翰逊的顾问们深信,美国要比苏联健康。一旦他们在越南取胜,他们将把自己置于一个能够在第三世界获得额外利益的位置,利用苏联集团内部的骚动,并最终赢得冷战。他们一

①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日的讲话中的内容,1965年4月2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4月23日, BB 1。

② 科勒致腊斯克,1965年4月5日,文件箱3,给总统的备忘录,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同时参见哈里曼汇报他与柯西金会谈的内容,哈里曼致约翰逊和腊斯克,1965年7月15日和21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306—313;鲍尔与杜威的电话会议,1965年3月16日,文件箱6,鲍尔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中央情报局,“后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政策”,1965年4月3日,文件箱220,国家安全文档,出处同上。

③ 中央情报局,特别报告,“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的苏联”,1965年4月9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284—285;同时可参见乔治·D·丹尼,“苏联政策的当前趋势”,1965年4月5日,文件箱54,科默,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国家情报评估11—5—65,“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前景”,1965年1月22日,国家安全档案;鲍尔与杜威的电话会议,1965年3月16日,文件箱6,鲍尔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④ 国家情报评估11—9—65,“苏联外交政策中的主流趋势”,1965年1月27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4:216;同时参见沃尔特·马蒂斯,“全球局势的发展趋势”,1964年6月9日,文件箱1,国家情报评估,国家安全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致同意,虽然权力正在逐步分散,但是只要他们能够机敏老练地运作以消弭与西欧盟友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的话,他们将掌握远胜于他们的苏联对手的能力来掌控新的世界秩序。^① 在全球历史上那充满着不祥预兆的,同时又看似刻不容缓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将很快画上休止符;反对殖民主义的热忱将逐渐被消磨殆尽;共产党人从中牟利的机会将逐步减少。“非殖民地化的进程事实上已经终结。”科默在给邦迪的信中这样写道。他预测,一旦这一进程终止,“我们将击败反殖民主义革命”。^②

的确,苏联模式的国家经济发展走着一条看似极具吸引力,实则带有欺骗性的迅速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模式已经暴露出缺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弱点正在逐渐被放大。在东欧,人们的强烈不满情绪正与日俱增,同时东欧发起了更多的社会改革实验和消除中央集权的尝试。铁幕正在生锈;并且出现了裂痕。约翰逊支持美国与东欧集团扩大贸易往来,希望借此来加大东欧与苏联之间的分裂与隔阂。^③ 美国官员希望,能够架设起美国通往东欧的桥梁,逐步腐蚀苏联对东欧的主导,并且有效地在第三世界与苏联开展竞争。事实上,如果他们能够建成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并成功消除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的话,他们将在争取全球人心的竞赛中更胜苏联一筹。

当约翰逊选择升级越南战争时,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警告他说,他正在作出一个“致命的”决定。“我对你只有表示同情了,”他写信给约翰逊总统说道,他能够理解约翰逊“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抉择”。但是据此就认为美国人希望卷入越南战争,那是大错特错的。越南可能会变成一个让美国深陷其中的泥沼,侵蚀美国在海外的信誉,并且干扰在美国国内创建伟大社会的计划。他以一名资深的政治家劝说同事的方式告诉约翰逊,事实上他们握有一个不导致任何负面政治后果就可以从越南全身而退的机遇。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得益于他们的审慎态度,而非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们的那种好战态度。“这是你上任后的第一年,”汉弗莱写道,“因为我们在面对越南问题时不必担心会忙于应付共和党右翼势力对此问题作出的政治反响。”^④

① 罗斯托,“对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些反思”,1965年3月5日,《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10:220—226;道格拉斯·卡特致约翰逊,1964年12月28日,文件箱13,卡特文档,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② 科默致邦迪,1964年10月9日,文件箱6,人名文档,科默备忘录,林登·约翰逊图书馆。

③ 对东欧局势发展的评估,参见《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东欧》,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17:1—55。

④ 休伯特·H·汉弗莱,《一位公众人物所受的教育:我的生平与政治生涯》(*The Education of a Public Man: My Life and Politics*),花园城,纽约:道布尔迪出版社,1976,320—324。



约翰逊对此观点并不认同。“我们并不需要所有这些备忘录。”他在给副总统的信中写道，并且同时将汉弗莱排斥在制定政策决策的进程之外。^①他绝不会放弃前三任总统所作出的承诺，也不愿冒被美国人民批评的风险。他绝不能采取软弱的姿态或承认犯错。他绝不能允许多米诺骨牌一连串倒下，或者允许共产主义取得更大的进展。

林登·约翰逊并未能超越他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也未能从之前遭遇的政治教训中吸取经验。他痛苦地折磨着自己，一天到晚担心他是否还需要再雇用几个智慧、忠诚、勤奋的人来帮助他拯救整个局势。但是他不能也不愿回头。他在1965年1月20日的宣誓就职演说中解释道，他拥有一个使命“来鼓舞全人类的希望”并且促进“人类的解放”。^②如果他未能在海外显示出足够的勇气，如果他不能兑现“美国的神圣誓约”的话，他害怕国内的政治对手们可能会击败他，并迫使他的创建伟大社会计划付诸东流，而在他看来，伟大社会计划将会为全人类展示一种最为优越的生活方式的典范。

苏联的领袖们也未能超越他们的过去。“伟大的列宁同志”给他们指明了道路，因此他们觉得有义务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行。他们坚信，历史的洪流是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的。美国人正寻求通过压迫遏制越南人民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来“逆转历史的进程”^③。勃列日涅夫宣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未像今日这般大获全胜，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征服越来越多的被解放了的人民的头脑。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正在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革命斗争的急先锋。”^④

虽然在第三世界推销苏联生活方式的机遇若隐若现，但是旧世界永远危机四伏。“就在此刻，”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5月8日说，“在西方列强的默认下，西德联邦议院的议员们正从他们那常坐的椅子上起身，并且非法进入西柏林并在那里召开他们的会议。”“二战后德国复仇主义渴望”一直持续存在。^⑤因此始终保持警惕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苏联的军费开支在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持平甚至有所下降，但苏联现在

① 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越战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Vietnam War)，埃塞克斯，英国：朗文出版社，2001，77。

② “总统就职演说”，1965年1月20日，《总统公开文件：约翰逊，1965》，71—75。

③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65年4月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65年4月9日，FF 6。谈及列宁的伟大，参见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日的讲话，1965年4月22日，出处同上，1965年4月23日，BB 1。

④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65年5月8日，出处同上，1965年5月10日，CC 18。

⑤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65年4月8日，出处同上，1965年4月9日，FF 8。



开始逐步恢复对国防开支进行螺旋式上升的追加投入。^①

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对旧世界德国民族主义的恐惧令人惊恐地笼罩在全球国际秩序（或无秩序）的上空。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决策层的领导人们通过自身意识形态的棱镜和历史留下的记忆来解读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让美苏缓和变得异常艰难。他们都未能超越自己的过去，未能克服自身的恐惧，未能降低自己建立丰功伟绩的雄心，也未能摆脱来自盟友国或国内政治对手的压力。他们感觉身处极大的威胁，虽然双方曾经得以匆匆一瞥获得拯救的可能。但是当他们的从世界末日的战场上逃离之后却无处可去，只能返回到冷战的局面。

^① 费思与诺伦，《苏联国防支出》，122；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全球军事支出》，56。



第四章

缓和政策的远去, 1975—1980:

勃列日涅夫和卡特

勃列日涅夫与缓和政策

1975年8月4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赫尔辛基正上演着一幕全明星阵容的表演。”本周在芬兰首都举行的这场首脑峰会蔚为壮观,可以称其为“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别”。“毋庸置疑,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莫过于苏联政坛常青树,前重量级冠军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①

《时代周刊》可能认为俏皮略带讥讽的口吻非常适用于向美国读者介绍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一幕剧”。然而这份长达一百页、三万余字,由欧洲三十三国首脑以及美国总统和加拿大首相共同签署的协议却并非是一份条约。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它代表着他作为一名政治家职业生涯的顶峰,代表着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1954年发起的争取欧洲和美国领导人承认二战后中欧和东欧领土边境,尤其是奥得河-尼斯河一线的波兰和民主德国边境合法性努力的巅峰。它同时意味着再次确认德国分立为两个国家的现状,以及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意味着在牺牲东欧邻国的代价下使斯大林所攫取的领土合法化。简而言之,它意味着苏联边界的合法化,苏联的国土安全得到保障,并且确认半

^① “众星璀璨的峰会盛典”(“A Star Studded Summit Spectacular”),《时代周刊》106(1975年8月4日): 16—22。



个欧洲接受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这样也为美苏缓和建立起一个不可或缺的框架体系。^①

在召开赫尔辛基会议之时，勃列日涅夫的健康已经开始逐渐恶化，但是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却达到了顶点。在策划了1964年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之后，他曾经有几年与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分享权力。但是他们俩逐渐清除了政治局内部的对立；而勃列日涅夫也最终将自己成功地提升为公认的最高领袖，尽管他仍然一直与同事们商讨国事，并且总是在得到他们同意之后再采取行动。他是掌控莫斯科错综复杂政局的大师，对细节非常敏感，在胜利后也不会报复对方。他非常重视分权，反感政局动荡，并且寻求政局稳定以及和睦共事。^②

作为共产党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勃列日涅夫因为太过年轻并未能亲身参与，但是他的年纪恰好能让他从斯大林发起的血腥清洗带来的职位晋升机遇中收获颇丰。1906年他出生于东乌克兰卡缅斯科耶(Kamenskoye)的一个工业小镇的矿工家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炼钢厂]这个中心，”勃列日涅夫在之后请人代笔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并且我明白……我将会进入工厂……沿着我父亲的足迹。在我们的定居点绝对没有人料想到将有另外一种命运在等待着我。”^③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大革命却将这个地区卷入冲突之中。“在我青年时期，社会生存的复杂性是非常巨大的，”勃列日涅夫回忆道，“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因为卡缅斯科耶不断被各种军事小集团所掌控，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以及他们雇

① 威廉·汤普森(William Tompson),《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伦敦:培生出版公司,2003,47—49。

② 出处同上,15—34;扬·D·撒切尔(Jan D. Thatcher),“作为领袖的勃列日涅夫”(“Brezhnev as Leader”),收录于《重新审视勃列日涅夫》(*Brezhnev Reconsidered*),埃德温·培根(Edwin Bacon)和马克·桑德勒(Mark Sandle)(编),洪兹米尔,英国:帕尔格雷夫,2002,22—37;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帝国的沦陷:冷战时期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1945—1991》(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第7章;乔治·W·布莱斯洛尔(George W. Breslauer),《作为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政坛确立权威》(*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伦敦:乔治·阿伦与昂温出版社(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2,169—199;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机密:历经六位美国冷战总统的莫斯科驻美大使》,纽约:兰登书屋,1995,218—219,228—231;哈里·格尔曼(Harry Gelman),《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以及美苏缓和的衰退》(*The 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4。

③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回忆录》(*Memoirs*),彭尼·多尔(Penny Dole)(译),牛津,英国:培格曼出版社,1982,4;巴西尔·德米特里西恩(Basil Dmytryshyn),“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现代俄罗斯与苏联史百科全书》(*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约瑟夫·L·维钦斯基(Joseph L. Wiczyński)(编),47,格尔夫布里兹,佛罗里达州:国际学术出版社(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1988,131—132。



用的经理们被军阀从工厂里驱逐,同时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他所生活的小镇是一个工人居多的小镇,“镇上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工人阶级,”勃列日涅夫写道,“因此我们始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我们的革命!”^①

勃列日涅夫的父母受过一些教育,因此他们希望儿子能够获得好的教育。他们送列昂尼德去卡缅斯科耶的男子古典语法学校学习,在革命爆发之前这所学校开始招收少量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列昂尼德本人学习积极性高,并且非常守纪律。虽然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并且当得知 17 岁的列昂尼德加入了苏联共青团,也就是苏联共产党的青年预备组织时,他非常高兴。尽管因为卡缅斯科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经济萧条,勃列日涅夫一家不得不被迫移居到库尔斯克,而革命为年轻的列昂尼德开启了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机遇之门。1924 年,他报名就读于一所技术学校,在那里他学习如何进行土地管理和土地改革。^②

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把新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党内对农村进行集体化的攻势上。“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旧的过时的生活方式正在土崩瓦解,而新生活的萌芽正在破土而出,人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追寻、支持和培育它们。”他协助消灭旧的私有财产观念的边界,“将地图上所有支离破碎的,原来属于个人的零散土地都集中起来,收归成为一整块归集体所有的土地”。尽管他对这种粗暴对待家中亲友和邻居的做法心存疑虑,但是他仍然强迫人们将土地、牲畜、农具和住宅上交给集体共同使用。他的传记代笔者宣称,他对“能够身处祖国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最高潮”而兴奋不已。地主们对此表示抗议和抵制。“那么我们将更为坚定勇敢地向[他们]发起进攻。”^③

在他刚步入成年的头几年中,勃列日涅夫开始以忠诚党员和斯大林忠实追随者的身份赢得晋升。但是他觉察到在遥远的未来将会发生一场更大的战斗,那就是实现苏联工业化的奋斗。他回到了卡缅斯科耶,现称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Dneprodzer-zhinsk),以协助复兴乌克兰的钢铁工业。他在工厂工作,同时回到学校,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工程师,他在 1931 年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在党内稳步

①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18。

② 出处同上,6—21;同时参见德米特里西恩,“勃列日涅夫”,131;关于勃列日涅夫所受的早期教育,参见勃列日涅夫的侄女卢巴·勃列日涅娃(Luba Brezhneva)充满不屑的回忆录,《我所遗弃的世界:过去的碎片》(*The World I Left Behind: Pieces of a Past*),纽约:兰登书屋,1995,13,14,18。

③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25—27;关于他内心的担忧,参见 L·勃列日涅娃,《我所遗弃的世界》,26—31。



晋升。1930年代中期,他应征加入苏联红军并被派往一个坦克营,在那里他很快就给他的上司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被任命为排长和政委。

1936年复员后,勃列日涅夫回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他首先在当地镇政府(或称地方苏维埃)供职,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省委宣传秘书。更为重要的是,他负责当地的钢铁生产,并负责协调当地的国防工业。在这些年中,勃列日涅夫结识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负责全乌克兰的党内事务。他们一起共事,并与其他斯大林主义者一起清洗本地区可能里通纳粹的人,同时对乌克兰知识分子阶层进行清洗。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勃列日涅夫的任务变为拆除高炉和工厂,然后将它们向东转运,不让他们落入向前挺进的德国军队手中。^①

在卫国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在南部战线担任政委,在那里他的工作职责是鼓舞士气,以及向军队灌输纪律观念。他坚持认为,苏联军队必须奋起反抗,英勇战斗。虽然起初纳粹的大屠杀看似是极其凶残,不可阻止的,“但是必须让每个人意识到,”勃列日涅夫说,“苏联绝对不能再次后撤。每个人都必须打心底里意识到这是一件对苏联生死攸关的事情,是一件关系到我们祖国广大人民生死的事情。……必须在一切都变得太晚之前阻止纳粹军队的前进。”^②

卫国战争对勃列日涅夫的一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③他总是喜欢复述在大战爆发之前与他父亲的一段对话: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哪一座?他父亲问他。珠穆朗玛峰,列昂尼德回答说。埃菲尔铁塔有多高?大约三百米高,列昂尼德继续回答道。我们应当在珠穆朗玛峰山顶建一座像埃菲尔一样高的铁塔,然后把希特勒和他的一小撮同谋绞死在塔顶,并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父亲这样告诉他。这次父子对话“对他本

① 关于前两段中的传记资料,参见勃列日涅夫,《回忆录》,20—41;德米特里西恩,“勃列日涅夫”,131—132;苏联科学院,《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他人生中的几页》(Leonid I. Brezhnev: Pages from His Life),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78,22—35。

② 苏联科学院,《勃列日涅夫》,49。

③ 有关世界大战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参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SALT II and the Growth of Mistrust”)一文中他的亲信对他的评价,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口述历史会议第2号(会议在佐治亚州的马斯格洛夫庄园举行,1994年5月6日—9日),13,148—149(记录稿由小托马斯·J·华生(Thomas J. Watson Jr.)提供,国际学术研究中心,布朗大学,同时可在国家安全档案(NSA)查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特区);诺贝尔研讨会95,戴维·A·韦尔奇与奥德·阿恩·韦斯塔(编),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 Savranskaya)(译),“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The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Fall of Détente”),奥斯陆:挪威诺贝尔研究所(Oslo: 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1995,229;同时可以参见,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伟人与权力:从政治视角出发》(Men and Powers: A Political Retrospective),卢丝·海茵(Ruth Hein)(译),纽约:兰登书屋,1989,3—4,46;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人,对他今后的政策,对他的意识形态,对他的心理——事实上,对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勃列日涅夫负责监督乌克兰工业基础设施的重建。在这之后,斯大林派遣他前往摩尔达维亚,这是苏联新近从罗马尼亚兼并来的一个小国。他负责协助克里姆林宫巩固对当地的控制,之后斯大林于 1952 年提名他任苏共中央书记,以此来嘉奖他的工作。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勃列日涅夫将自己未来的仕途紧紧挂钩于赫鲁晓夫。尽管被迫暂时离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仍然在推行赫鲁晓夫对哈萨克斯坦的垦荒政策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与苏联庞大复杂的军事工业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他首先担任陆军和海军政治部主任,然后于 1956 年再次当选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并对国防军事制造业、重工业、航天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握有实权。除此之外,他还协助监督核武器的生产以及导弹发射井的建设。在支持赫鲁晓夫击败他的政治对手,并且因为苏联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功而赢得巨大声望之后,勃列日涅夫于 1960 年 5 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勃列日涅夫协助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时,事实上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圈定勃列日涅夫作为他的接班人。^②

在驱逐了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立刻当选为苏共第一书记,但是他并未获得主导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当时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由苏共政治局的一个内部核心小圈子制定,其中包括阿列克塞·柯西金、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1960 年代后期和 1970 年代初,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元帅、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以及苏共国际关系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也开始对外交决策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军事问题上,军队和国防工业在勃列日涅夫担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的宏观监

① W·埃夫里尔·哈里曼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备忘录,1974 年 6 月 4 日,文件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ktor Sukhodrev)(勃列日涅夫的翻译和幕僚)所作的评论,收录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16;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缓和中的勃列日涅夫因素”(“The Brezhnev Factor in Détente”),收录于《冷战与缓和政策:问题与讨论》(*Cold War and the Policy of Détente: Problems and Discussions*),莫斯科:全球历史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Institute of Universal Histor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03,288。

②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生涯,参见德米特里西恩,“勃列日涅夫”,132—133;“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译本,第 3 版,卷 4,纽约:麦克米伦,1974,71—72;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 7 章。



督下制定军事政策；在处理与美国、主要西欧国家、日本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上，外交部握有主导权；在处理与各国在野共产党，欠发达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队革命运动的关系上，波诺马廖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他们的幕僚们最具影响力；在处理与东欧各国的关系上，中央委员会设有一个独立部门向最高苏维埃书记处和政治局作直接汇报。^①

起初，苏联的外交目标和政策远远谈不上清晰。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犯下的鲁莽错误让苏联蒙羞，同时克里姆林宫对约翰逊下令轰炸北越以及干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行径极为愤怒，因此克里姆林宫开始大规模增强军事实力。在 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苏联国防开支的增长超过了百分之三十，根据有些专家的估计，实际的增长量将近翻一番。苏联武器库中的战略武器——这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的数量急剧飙升，从 1964 年的估计值 472 件蹿升至 1969 年的 1470 件；坦克车生产从 1966 年的 3100 辆到 1970 年超过 4250 辆。在此期间苏联装甲车辆的产量也迅速增长，从 2800 辆增长到 4000 辆。但是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打算发起战争。他们期望得到美国的尊重，蔑视美国对实力的炫耀，并且要求实现双方对等的国家安全。当印度尼西亚军队在 1965 年推翻总统苏加诺并屠杀三十万印尼共产党员时，苏联对美国扩张其在东南亚的势力非常愤怒；当 1967 年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中击溃了苏联在阿拉伯的盟友国（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时，苏联更是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梦想着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影响力，但是他们觉得现在受到了美国军事行动的考验，以及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②

① 关于苏联决策制定过程的洞见，参见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Viktor Starodubov)、谢尔盖·P·塔拉先科(Sergei P. Tarasenko)、多勃雷宁和尼古拉·N·杰季诺夫(Nikolay N. Detinov)所作的评论，收录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149—160, 177—180, 187, 193, 231—242, 259, 293—296；多勃雷宁，《机密》，193—194, 218—220, 404—405；亚历山大·G·萨韦利耶夫(Aleksandr' G. Savel'yev)与尼古拉·N·杰季诺夫，《五巨头：苏联军备控制的决策制定》(*The Big Five: Arms Control Decision-Making in the Soviet Union*)，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y Trenin)(译)，格雷高里·瓦尔豪尔(Gregory Varhall)(编)，韦斯特波特，康涅狄格州：普雷格出版社(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1995, 31—53；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 7 章；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26—34；我同时非常感谢马克·克拉默向我解释苏联决策制定的过程。

② 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 7 章；关于苏联军事力量集结的统计数据，参见戴维·霍洛韦(David Holloway)，《苏联与军备竞赛》(*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 58—60, 114, 122；关于中国插手东欧事务，参见马克·克拉默，“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The Czechoslovak Crisis and the Brezhnev Doctrine”)，收录于《1968：世界巨变》(*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卡罗尔·芬克(Carole Fink)、菲利普·加瑟特(Philipp Gassert)与德特勒夫·容克尔(Detlef Junker)(编)，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德国历史研究所，1998, 119。

1968年勃列日涅夫面临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次危机。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选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为领导人。他上台后迅速推行经济改革,批准政治自由化,并任命新人担当内政部和军事部门的最高领导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团体和报纸杂志的数量激增,同时其民众开始自由地对祖国的未来发表自身见解。西方社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次改革称为“布拉格之春”,而这场变革撼动了整个东欧集团。波兰和东德的领导人直接向勃列日涅夫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苏联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持有相同的忧虑,认为这是对共产党专政极其严重的挑衅,同时也是对克里姆林宫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威胁。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佩特洛·谢列斯特(Petro Shelest),他同时也是苏联政治局委员,警告勃列日涅夫说,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正在乌克兰“引起令人不快的现象”^①。正如1965年头几个月约翰逊所面临的困境那样,勃列日涅夫内心非常矛盾,迟疑着不愿作出决定。他并不愿派军队去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但是他同样担心这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杜布切克并没有威胁说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但是他所任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部门的高级将领们却对苏联的军事战略思路进行质疑,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军事自主权。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在五六月期间在布拉格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时,勃列日涅夫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他立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他的神经绷得更紧,并且他的同事们注意到他的表情显得阴沉而苍白。“我可能有时看上去会显得软弱,”他自己评价道,“但是我有能力挥出重拳,虽然之后我可能会不舒服三天。”他开始服用镇静剂和安眠药,这个习惯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戒除。8月,勃列日涅夫批准苏联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在之后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教条中,克里姆林宫宣布: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绝不能违背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自由在国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但是如果这个政党仍然希望维持自身的共产党性质的话,就没有擅自偏离马列主义原则的自由。……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环受到削弱,都会直接影响

^① 关于谢列斯特的引文,参见马克·克拉默,“乌克兰与1968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第一部分):来自佩特洛·谢列斯特日记的新证据”(“Ukraine and the Soviet-Czechoslovak Crisis of 1968 (Part 1): New Evidence from the Diary of Petro Shelest”),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0(1998年3月):235;同时参见克拉默,“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121—145。



到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他们也不会对此坐视不管。^①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兵干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众对苏联的憎恨情绪非常强烈。中国谴责苏联的行径并且在中苏边界增派部队驻守。阿尔巴尼亚切断了与华沙条约的最后联系，而罗马尼亚奚落苏联的人侵行为。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的领导人对此非常满意，并且派遣部队参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人侵，但是这三国的人民却非常憎恨苏联的行径。苏联动用野蛮武力越过他国边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广泛的谴责。在西欧，左派政党深深感到失望，对苏联不再抱幻想；苏联的这次入侵激起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逐步争取独立并脱离莫斯科的控制，这一潮流在之后被人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们开始质疑莫斯科作为反帝国主义领袖的声誉。在俄罗斯国内，改革派也变得沮丧并惊恐不安，而统治阶级也变得不再乐意听取那些鼓励在苏联经济发展上运用新思维的专家意见。勃列日涅夫意识到，经济重组可能意味着对共产党专政的腐蚀。^②

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标志着勃列日涅夫的外交政策演变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他和他的顾问们预估西方除了抗议苏联动用武力之外并不会采取其他行动，事实上他们猜对了。美国和西德都没有威胁说要采取报复行动。不久之后，葛罗米柯自豪地告诉他的幕僚们：“政治局以前在采取任何外交政策的步骤之前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小心思忖——美国会如何应对？法国会作出什么反应？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他们发出怎样的噪音，新的力量对比态势已经让他们再也不敢向我们发起进攻。”勃列日涅夫的自信心也与日俱增。“在经受住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严峻考验之后，一个与昔日截然不同的勃列日涅夫诞生了，”他的一位演讲稿作家亚历山大·博文(Alexander Bovin)这样评价道。^③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现在觉得他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进行有效地谈判

① 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详细阐述，参见克拉默，“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168；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领导人的思考方式，出处同上，137—141；关于勃列日涅夫在整个危机期间的焦虑情绪，参见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② 关于捷克危机所引发的后果，参见克拉默，“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162—171；杰里米·舒里，“‘发达社会主义’的希望与失败：苏联‘解冻’以及布拉格之春的严酷考验，1964—1972”，《当代欧洲史》15(2006年)：150—158；托尼·朱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446—447；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36—39。

③ 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了。“没有人会愿意和弱者谈判，”安德罗波夫一语双关。^① 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来达成禁止核武器扩散的第一个条约。他们不仅对西德获取核武器的野心表示担忧，同时也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核武器实力充满忧虑。随着1968年和1969年苏中两国军队在争议不断的两国边境发生多次冲突之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他们与中国的竞争。甚至当他们忙于为人侵布拉格的行为正名时，他们都毫不含糊地指责北京的“左翼冒险主义‘输出革命’的理念，以及‘把幸福带给’其他民族的说法”^②。

当务之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希望能维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希望西德能正式承认东德的合法存在，以及接受奥得-尼斯河一线的两德边境——简而言之，他们希望各国能承认战后领土边界现状。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1969年10月组成联合政府上台之后向苏联传递了愿意与东德打交道的讯息时，勃列日涅夫看到了实现克里姆林宫长期目标的希望。1970年1月7日在一次华沙条约缔约国会议上，他表示他将正式开启与勃兰特的外交会谈。他将会保持小心谨慎，因为他并不相信西德已经发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事件发展的有利转折点，那将是非常愚蠢的，他这样补充道。^③

勃兰特开启与东德关系的政策，即新东方政策，事实上突然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勃兰特希望能够缓和紧张态势，改善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促进东德和西德之间的交流往来。他寻求推动德国家庭的团圆，而不是固执地坚持看似渺茫的统一德国的努力。他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盟友们都已经接受了德国分立为两国的现状，也并未质疑柏林墙的建造，或者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出强烈反应。如果西德希望能带来一些变化的话，那必须先和克里姆林宫达成和解。在达成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条约和协议之后，西德政府谴责使用武力来改变现有领土边界，接受并承

① 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② 引文参见勃列日涅夫发表的讲话，1968年11月13日，http://www.cnn.com/SPECIALS/cold_war/episodes/14/documents/doctrine；关于背景，参见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35—49；马修·J·维梅特(Matthew J. Ouimet)，《苏联外交政策中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起起伏伏》(*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3，36—37，67—69；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体制：一位知情人在苏联政治界的生活》，纽约：兰登书屋，1992，127—189；祖博克，“缓和中的勃列日涅夫因素”，287—288。

③ 沃伊泰克·马斯特尼与马尔科姆·伯恩，《硬纸板城堡？：华沙条约秘史，1955—1991》，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出版社，2005，361；背景参见，施密特，《伟人与权力》，3—47；祖博克，“勃列日涅夫因素”，294—296；阿尔巴托夫，《体制》，171—172；威廉·希契科克(William Hitchcock)，《争夺欧洲：一个分裂大陆的动荡史，1945至今》(*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纽约：锚版图书，2004，293—299；朱特，《战后》，496—503。



认民主德国,承认主要边界,支持核不扩散运动,同时促进和改善与所有华沙条约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尤为重要是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而相对应的,勃列日涅夫终于取得了几位前任都未能实现的目标:在西德承认两德边界现状的基础上,苏联在欧洲终于拥有了安全感。^①

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以党最高领袖的身份对缓和苏联与西方的关系以及与华盛顿及北约开启裁军条约谈判的政策给出了完整的官方批示。如果没有得到政治局核心成员们的同意,他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批示的,但是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或默认并非是一件易事。波德戈尔内、谢列斯特、苏斯洛夫和格列奇科都对此持非常大的保留意见。尽管如此,勃列日涅夫还是运用相当娴熟的手腕在政治局内部得到了成员们的一致通过。在他健康开始衰退之前的岁月中,勃列日涅夫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敏捷矫健”的印象。尽管他对学术不感兴趣,但是他拥有很好的判断力,在政治上精明老练;他“精通如何取悦别人”,历史学家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这样描述他。他允许党内的理论家和军方要员在许多问题上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务。他从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也不会以免去他们的职务相要挟,这两种方法却恰恰是赫鲁晓夫当年所惯用的。作为交换,他要求他们效忠于他,同时支持美苏缓和,因为他把这一政策看得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为重要。^②

勃列日涅夫拥护美苏缓和,因为他希望降低核战争的几率,鼓励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同时也由于他对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和苏联庞大的国防开支深表忧虑。尽管军费

① 威利·勃兰特,《我的政治生涯》(*My Life in Politics*),纽约:维京企鹅公司(Viking Penguin),1992,154—243;A·詹姆斯·麦克亚当斯(A. James McAdams),《分裂的德国:从柏林墙到德国重新统一》(*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79—105;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在缓和中发挥的作用”(“Ostpolitik: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Process of Détente”),收录于《1968: 世界巨变》,芬克、加瑟特与容克尔(编),173—192;M·E·萨罗特(M. E. Sarotte),《与恶魔打交道:东德、缓和与新东方政策,1969—1973》(*Dealing with the Devil: East Germany, Détente, and Ostpolitik, 1969—1973*),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② 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同时可参考维克托·伊斯拉埃良(Victor Israelyan),《赎罪日战争期间的克里姆林宫内部》(*Inside the Kremlin During the Yom Kippur War*),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25;阿尔巴托夫,《体制》,124—125;关于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参见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深入苏联的历史》(*The First Socialist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Within*),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376—378;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22—34;关于勃列日涅夫对和平与缓和的热衷,参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i Cherniaev),“鲜为人知的勃列日涅夫”(“The Unknown Brezhnev”),《俄罗斯政治与法律》(*Russian Politics and Law*)42(2004年5月—6月):34—66。

开支在 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迅速增长,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从大约 90 亿卢布增长到 130 亿卢布, 根据一些国外专家的估算, 实际数值可能是从 300 亿卢布增长到 420 亿卢布,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深信, 建立在与美国的战略均势前提之上的美苏紧张对峙局势的缓和, 可能会使苏联获得接触西方高科技和资本的机会, 并且能够使苏联逐步将资源转而用于生产居民所需的生活消费品, 这样就能满足失望的苏联公民持续增长的生活需求。^①

在 1971 年召开的苏共 24 大全会上, 勃列日涅夫在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上实现向缓和与和平的根本性转变”。下一步的目标是“确保一次全欧[安全]会议的成功召开”。^② 在此之前, 苏联曾经支持召开一次没有美国参与的全欧安全会议, 因为苏联相信这样的一次会议能够在西方社会内部造成分歧, 同时能够促成北约的解体, 这是苏联的一项长期目标。但是勃列日涅夫在 1972 年改变了方针路线, 变得开始迷恋于大国首脑峰会的盛况和排场。理查德·R·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 5 月莫斯科举行的首次峰会期间的一次私人会晤中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直白地对勃列日涅夫说: “让我们抛开体制, 直接谈怎样改善我们之间的双边关系吧。”^③ 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勃列日涅夫, 同时他很珍惜与尼克松总统之间的关系。他开始认识到, 让美国参与到欧洲的安全与合作会议将会对苏联有益。如果他们能够达成共识的话, 这也就代表美国接受二战后的现状, 同时也能促成当年斯大林和杜鲁门以及他们俩之后所有继任者所未能达成的和平条约的签署。^④

① 关于国防开支, 参见霍洛韦, 《苏联与军备竞赛》, 114; 关于勃列日涅夫与其他缓和支持者的动机, 参见汤普森, 《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 30—34; 祖博克, 《帝国的沦陷》, 第 7 章; 多勃雷宁, 《机密》, 209—210; 菲利普·汉森(Philip Hanson), 《苏联经济的沉浮: 1945 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from 1945*), 伦敦: 朗文出版社, 2003, 108—112; 杰季诺夫的评论, 参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 147—148; 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办公室], “政治局与缓和: 评估共识”(“The Politburo and Détente: Measuring the Consensus”), 1976 年 1 月 1 日, 信息自由法案(FOLA)。

② 引文参见, 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 24 大递交的报告, 1971 年 3 月 30 日, 收录于 L·I·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外交事务讲话与文选》(*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n Foreign Affairs*), 牛津, 英国: 培格曼出版社, 1979, 5; 同时参见多勃雷宁, 《机密》, 216—219; 布莱斯洛尔,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 179—199。

③ 引文可参考苏霍德列夫的评论, 收录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 15—16; 同时参见勃列日涅夫与杰拉尔德·福特之间的对话备忘录, 1974 年 11 月 23 日, 下午 2 点 30 分, 国家安全档案。

④ 希契科克, 《争夺欧洲》, 301; 朱特, 《战后》, 501—502。



在莫斯科峰会上，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一份限制反弹道导弹(ABM)条约，以及数量众多的贸易、科技、卫生和环境协定。其中对克里姆林宫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一份指导美苏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协定。尽管美苏两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是美国和苏联一致同意根据“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以及互惠互利”的原则来开展美苏双边关系。^① 勃列日涅夫告诉他的同志们，苏联政府现在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坚定而清晰地，同时也带着敬意地，对美国人发表意见。^②

12月在党内所作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勃列日涅夫解释说美苏缓和符合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和阶级目标是完全对立且不可调和的。”但是美国 and 苏联现在将“努力把这场历史上不可避免的斗争转向一条免受战争、危险对抗以及失控军备竞赛威胁的道路。这将使世界和平以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大受裨益”。^③

勃列日涅夫希望能和尼克松一起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军备竞赛。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只是一个过渡性协议，规定美苏双方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冻结五年。该协议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量，但是就双方不成文的约定，具体数量是苏联保有2400个导弹发射架，而美国保有1700个发射架。尽管导弹发射架数量上的不平衡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强烈反对，苏联的军方领导对此也非常不满。因为该协议并未对美国的战略空军力量进行限制，而在这方面美国遥遥领先于俄罗斯，协议也未限制美国可加载的多弹头分导式导弹的数量。协议也未限制美国设在苏联周边地区，尤其是设在西欧的前沿基地能够拥有的武器数量。勃列日涅夫提倡美苏缓和，是因为缓和有希望为苏联带来与美国之间的对等安全、战略均势，以及经济利益，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如果得不到他的传统盟友——苏联将军以及国防官员的同意，他将无法就一份更长久的军备控制协议与美国进行谈判。

许多苏联官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促使未来签署的协议为苏联的国家安全目标服

① 雷蒙德·L·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尼克松至里根任内的美苏关系（修订版）》（*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326—338。

② 关于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评论，参见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会议记录，1972年11月20日，会议记录编号10325，雅科夫列夫文档，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57—73。

③ 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会议所作的报告，1972年12月21日，收录于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文选》，9。



务,同时限制美国在军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他们已经做好接受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的准备。苏联军方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主要顾问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Viktor Starodubov)将军说,“我们苏联明白,对我们而言如果要追赶上美国,那么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将付出太大的代价,也是太过艰巨的任务。”尽管苏联拥有的武器数量急剧增长,但是苏联军方领导人承认美国的军事科技更胜一筹,美国武器的精确度更高,美国潜艇部队的素质极高。他们希望利用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来消蚀美国在这些方面的相对优势,同时他们并不认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① 在之后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中,勃列日涅夫必须试图打消苏联将军们的担忧,同时减轻军费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的巨大负担。他决心做到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酷爱首脑峰会的盛况以及他在那里受到的关注。然而在1973年至1974年,由于美国国内对缓和的批评声日益高涨,同时尼克松的声望由于水门事件而受损,勃列日涅夫对此感到沮丧。当美国国会限制尼克松总统降低关税和扩大对苏贷款的能力时,当美国表示是否扩大与苏联的经济往来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国内的犹太人向国外移民时,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失望。自由党的立法委员讥讽尼克松对苏联违反人权的行为以及那些寻求逃离苏联的犹太人所处的困境有故意漠视的嫌疑。保守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对尼克松总统未能达成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战略武器协议非常不满。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联合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之后,一个由华盛顿特区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领衔的联盟联合起来限制尼克松政府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权力。

美苏缓和并没有带来勃列日涅夫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回报,但是他并不打算放弃缓和。他在苏联国内越来越多地赋予缓和政策以合法地位。由于他不愿意支持国内的经济改革,他富有技巧地在国内扮演和平与稳定的代言人,而和平与稳定这两个词在千百万对战争的记忆还那样清晰的苏联人民心中赢得了广泛的共鸣。当尼克松于1974年夏天蒙羞遭弹劾之后,勃列日涅夫立即迫切要求同美国新一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进行会晤。^②

11月23日,这位苏联总书记横越苏联的辽阔疆域在苏联远东临太平洋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与福特进行会晤。勃列日涅夫兴致很高,同时也很热情,他热切

① 引文参见斯塔罗杜博夫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35;同时参见杰季诺夫的评论,出处同上,50—51。

② 关于勃列日涅夫致力于支持缓和,参见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关于背景知识,同时可参见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360—525;多勃雷宁,《机密》,191—359;格尔曼,《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

地渴望能够了解这位美国新总统，并且一如既往地准备着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交换善意幽默的玩笑，基辛格不仅是颇具影响力的现任国务卿也是前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最重要的是，勃列日涅夫希望能够向福特表明他的意图和打算，同时判断是否有与新总统达成另外一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可能。“让我们不要以外交家的身份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来交谈，”他对福特这样说道，“你和我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二战相对于核战争而言就好似儿戏一般。”^①

勃列日涅夫不愿纠缠于技术上的细节，他说他希望能把更为重要的观点传递给这位美国新总统：“我们希望能够拥有同美国友好、稳定、互利的双边关系。不单单是我，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及我们所有苏联人民都希望能够与美国和平相处。”^②他宣称，技术细节掩盖了一个更大的真理：“我们从未想过要向你们发起进攻。”^③整个世界“正注视着我们”，勃列日涅夫强调说，同时全世界希望超级大国能够承诺“不会发动核战争”。^④那么我们两国是否已经取得了任何进展呢？“事实上，我们并未能取得任何对军备的实质性限制，而且我们正刺激着军备竞赛朝着愈演愈烈的程度发展。这是错误的。未来的科技进步可能会为今日的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新发明，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巩固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条道路上究竟还能走多远。……我们花了成百上千亿的资金在这些军事设施上。如果这数以百亿计的资金能够被用于为人民谋福利，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⑤

勃列日涅夫满足于指出以上这些宏观问题，但是福特希望能够深入讨论细节。苏联最高领袖必须明白这位意外上任的总统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和来自立法机构的约束。在11月23日晚上一轮长达六小时的谈判期间，勃列日涅夫厌倦了听福特反复解释美国未能在核心问题上作出让步的理由。他一而再地表达了对美国强硬谈判立场的不满。他同样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他告诉福特：“军方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一切。我不认为军队中存在什么圣人。”^⑥

但是他同样希望能够推进谈判的进程。“我并不希望制造任何僵局，”他说道，“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⑦他建议谈判暂时休会，同时他打电话回莫

①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2点30分，6，国家安全档案。

②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6点30分，2，国家安全档案。

③ 出处同上，19；同时参见下午2点30分的会谈，10。

④ 勃列日涅夫和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2点30分，5。

⑤ 出处同上，7。

⑥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3日，下午6点30分，15。

⑦ 出处同上，10。



斯科给他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勃列日涅夫希望苏联军方能够作出让步；格列奇科对此表示反对。勃列日涅夫对此感到很气愤，并要求他的这位老朋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他作为苏共总书记，将飞回莫斯科出席这次会议。格列奇科作出了让步。他并不希望在整个政治局面前公开与勃列日涅夫作对。^①

当勃列日涅夫再次回到谈判桌前，他坚持认为他和福特都必须寻找解放方案而不是过多地说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他表示很欣赏福特总统能够致力于缓和政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支持一位希望推进缓和进程的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们绝不能把精力耗费在微小的细节上，他建议美苏两国都允许拥有 2400 个导弹发射架，以及 1320 枚可以装载多弹头的导弹。福特对此表示同意，并强调说美国国会也坚持双方必须在武器数量上保持均势。^②

勃列日涅夫就这次会谈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领域作出了实质性的较大让步——例如，允许美国设在欧洲的前沿基地体系不受协议约束——但是他相信他正逐步促使美国承认两国对等安全原则。在这场持续到深夜的会谈结束之际，他说道，“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导弹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我们两国之间如何更好地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勃列日涅夫说，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细节应该能在今后的六个月中制订出来。他已经开始期待他的美国之行了。^③

次日一早他和福特再次进行了会面。他们俩回顾了前一晚讨论过的一些问题，然后就中东局势以及欧洲安全会议的准备情况交换了意见。^④ 虽然在这些问题上美苏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但是这并不影响福特的好心情。“我那时心情非常愉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⑤ 在这次会谈结束之际，他表达了对勃列日涅夫的欣赏和期许：

我从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博士那里知悉了你一直致力于建设基于我们美苏两国缓和的世界和平。尼克松先生和基辛格博士告诉我的一切都在这过去的 24 小时内一一兑现。这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推动缓和，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17；阿尔巴托夫，《体制》，201—202。

②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6 点 30 分，11ff, 19，国家安全档案。

③ 出处同上，20。

④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 年 11 月 24 日，15—16，国家安全档案。

⑤ 杰拉尔德·福特，《用时光来弥合：杰拉尔德·R·福特自传》(A Time to Heal: The Autobiography of Gerald R. Ford)，纽约：哈珀 & 罗出版社，1979，218。



我们会采取我们两国共同需要的一些措施来实现缓和。在我与您当面会晤之后,我所听闻的一切关于您的人道主义作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免不了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我希望能够克服这些差异。^①

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也同样高涨。在一场较晚的午宴之后,他心血来潮地领着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了短暂的游玩。他们俩一同坐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排游历整个港口城市。然后,当他们快要驶回机场的时候,福特回忆说道:“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勃列日涅夫突然俯过身来,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他开始告诉我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他告诉我说他再也不希望让他的人民再次经历那样的苦难。”福特再次宽慰他说道,他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突破,更多的问题将会在未来的这一年中得到解决。“他更加紧握我的手,同时他转过身来直视我的眼睛,说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同时这也是我们两人的职责,既是你的职责也是我的责任,代表我们两国,把这份文件最终定稿。……这是一个机遇,不单单能保护我们两国的人民,同时,事实上,能够保护全人类。’”福特为之深深动容,当他在准备登上空军一号飞机的时候,他脱下了自己的阿拉斯加产狼皮外套,并把它送给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立即穿上它,同时“看上去极为动容”。^②

在与福特会面后不久,勃列日涅夫经历了一次中风。这次严重中风使他卧病在床长达数月,并且之后再也没能完全康复。^③然而,对于他和他的同事们而言,与美国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仅仅构成了他们的缓和战略中的一小部分,仅仅是通向一次全欧安全会议以及苏联外交史上辉煌顶点的一块里程碑。

赫尔辛基会议,作为这次全欧安全大会的预备协商会议,已经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苏联外交家们聚焦于被称为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一篮子”的那些问题。他们希望赫尔辛基会议最终法案能够承认欧洲现存国界的不可侵犯性。西欧外交家以及来自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的官员决心以承认欧洲边界现状作为交换迫使苏联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在被提议表决的协议的“第二篮子”中,他们呼吁增强双方的

①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4日,20,国家安全档案。

② 福特,《用时光来弥合》,218—219。

③ 阿尔巴托夫,《体制》,191—192;尽管有所夸张,仍可参见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与老大哥一起走下坡路:苏联帝国的沉沦》(*Down with Big Broth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社,1997,6—8;E·I·恰佐夫(E. I. Chazov),《健康与权力》(*Zdorovie i vlast'* [Health and Power]),莫斯科:诺沃斯蒂出版社(Moscow: Novosti),1992,74—91,115—148。

贸易和信息往来,这也是苏联和东欧外交家们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获取西方的科技和贷款来为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西欧以及中立国的谈判专家坚持要在最终法案的“第三篮子”中加入一组人权原则。他们表示,所有的签约国都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这包括思想自由、信教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签约国都必须同意“促进并鼓励民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有效行使,所有这些基本权利都源自于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苏联人对这些要求大为恼火。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比如苏斯洛夫和波诺马廖夫对这些人权条款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很反感这些条款,但是在接下来的多轮谈判中试图削弱和扭转这些条款未果之后,他们不得不作出是否接受这笔交易的决定:即通过承认人权条款来换取西欧和美国承认欧洲的领土边界现状。全欧安全会议的命运悬于一线。^①

勃列日涅夫决心推进全欧安全会议取得进展。尼克松和基辛格曾经向他保证美国不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一原则——即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同样也载入了赫尔辛基协议的最终法案。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有些西欧国家和中立国的过分要求得到了有效遏制,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生活构成严重威胁。1975年3月18日他发表了以上观点,当时他的健康情况恢复到足以参加一次华沙条约缔约国首脑会议。但是他的声音听上去仍然充满了疲倦。“最近的几个月我身体略有微恙。”他承认道。拒绝了这些国家要求得到更多经济援助的请求,他说自己是“两手空空来参加会议。……我们正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须严肃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国民经济效益”。但是他并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正在推动全欧安全会议的进展。他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在谈及那些在二战结束后逃离波兰和东德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以及代表这一群体的政治家,他表示,“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提出要求[希望]……根据德国人民自己的意愿来变更国界。”他们想要“贪婪地吞噬[埃里希·何内克]”,德国统一社会党[即东德共产党]主席。“德国复仇主义分子始终是贪得无厌的,”他谴责道,“他们对历史教训置若罔闻。数以千万条生命的消逝都没能

^① 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未预料到的后果: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之后苏联出现的人权运动及苏联当局的应对”(“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Emergence of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the USSR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Helsinki Final Act, and the Reaction of Soviet Authorities”),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关于背景,参见丹尼尔·C·托马斯(Daniel C. Thomas),《赫尔辛基效应:国际准则,人权,与共产主义的终结》(*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ommunism*),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引文摘自希契科克,《争夺欧洲》第301页上对赫尔辛基协定的简洁描述。



满足他们。这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在心，也是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一种危险。”我们“必须始终监控西德的局势”。^①

尽管面临着这种危险，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希望早日达成协议。“欧洲血腥的历史教会了我们许多，也将许多任务摆在了我们面前。”他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的领导人们能够予以合作：“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工作中充分运用技巧，同时投入大量精力以确保能够使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如果资本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就指导欧洲国家关系的原则达成一致，“这将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这将给所有倡导和平进步的人士注入新的力量”。他并不赞成以检阅军队游行的方式来庆祝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纪念：“没有必要在一个竭力争取和平的时刻让坦克和火箭在红场上轰隆隆地驶过。”^②

整个1975年上半年，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一直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起致力于完成赫尔辛基会议的最终协定。基辛格尝试平息苏联对美国国内对缓和日益高涨的批评声的忧虑。“把眼光放远”是非常必要的，他告诉葛罗米柯，“我确信到了1980年代利益一致性就会变得不言自明。现在对核武器的利益一致性已经不证自明；到了1980年代在许多其他政治问题上也会显露出相同的一致性。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重要事实”。^③

福特总统在7月30日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长谈中一再重申这些观点，这天正是全欧安全会议召开前一天。虽然存在着他所不能忽视的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对缓和的批评声，但是他仍然坚信缓和是正确的政策。“我可以非常坚定地告诉你我全力致力于推动缓和，而且美国人民对此深表同意。”

当他们分别时，勃列日涅夫把福特总统拉到一边。他表示非常欣赏与福特政府所建立起来的纽带，同时希望双方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勃列日涅夫轻声说道：“我想十分坦诚地告诉你我的心里话，我们苏联领导层支持你连任当选。”“我期待

① 勃列日涅夫与社会主义盟国的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在布达佩斯的会谈记录，1975年3月18日，记录编号1940，沃尔科格诺夫集(Volkogonov Collection)，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可以在国家安全档案的网站上查到)；同时参见萨夫兰斯卡娅，“未预料到的后果”，4—9。勃列日涅夫夸大了被开除国籍者组织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些组织的影响力在196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衰退。参看佩尔蒂·阿霍宁(Pertti Ahonen)，《在被开除国籍之后：西德与东欧，1945—1990》(After the Expulsion: West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1945—199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② 会谈记录，1975年3月18日，记录编号1940，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4年11月24日，20，国家安全档案。

③ 引文参见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1975年7月11日，下午1点10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1975年5月19日，1975年7月10日，出处同上。



着能够成功连任,”福特回答说,“我想这也符合……增强缓和事业的进程。”^①

7月31日当勃列日涅夫起身向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的各国首脑发表演讲时,他代表了苏联达到了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他的目的并不在于鼓吹炫耀苏联的强大实力或证明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而是为和平和缓和事业欢呼。“所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那一代人能够最为清晰地体会到今日的历史意义。”“欧洲的土地曾经在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浸满了鲜血。”现在是超越过去的时候了。他对赫尔辛基协议最终法案能够成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结果的一次总结”表示满意。但是他所传达的讯息主题却是面向未来的。“我们今日所取得的成就绝对不是一个极限。对于今天而言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最大值,但是明天它将成为一个沿着本次大会所规划的航线取得更大进展的新起点。”^②

勃列日涅夫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是他竭尽全力想要传递他对未来更为光明的信念。“现在合作的可能性正延伸到一些在冷战岁月中根本无法想象的领域。”各国政府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扩大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各国政府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都必须为本国人民谋福祉,为国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并确保国民能够满怀信心地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宣布,他的国家“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在本次大会之后进一步推进军事上的缓和”。他希望能够在未来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同时削减在中欧部署的军队和武器数量。^③几天之前,他曾经告诉福特总统,“紧张局势的缓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缓]和不仅仅对欧洲有利,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④

当他们俩在会议结束之际私下会晤时,福特祝贺勃列日涅夫作了一次“卓越的演讲”。他非常欣赏这次演讲的“语气”,同时对勃列日涅夫在演讲中强调对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削减(西方称为“双边对等军力削减谈判”,此刻正在维也纳举行谈判)表示欢迎。福特强调说,美国同样也希望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他表示期待着勃列日涅夫在秋天的访美之行,希望届时双方能够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而他们俩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这份条约草拟了框架。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赞同,并强

①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5年7月30日,早晨9点35分和中午12点,国家安全档案。

② 勃列日涅夫,“以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名义”(“In the Name of Peac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1975年7月31日,收录于勃列日涅夫,《沿着列宁所开创的道路:讲话和文集(1972—1975)》(*Following Lenin's Course: Speeches and Articles (1972—1975)*),莫斯科:前进出版社(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1975,577—583。

③ 出处同上。

④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5年7月30日,早晨9点35分,10—11,国家安全档案。



调他们俩所承担的道德义务远远凌驾于那些技术细节之上。他说道,过去我们过多地讨论导弹的发射重量,下水重量,导弹发射架的尺寸,巡航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美苏两国拥有不同的武器体系,并且使用不同的燃料。“一杯茶并不是一杯水银,”苏联总书记这样比方说,“但是如果我们动用导弹的话,那么会得出相同的一个结果:勃列日涅夫被炸死,基辛格也被炸死。”^①

然而双方却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福特总统因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以及追求美苏缓和而在美国国内备受争议。他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视为赢得苏联对人权的支持以及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机遇,但是美国的欧洲移民团体指责他出卖东欧,许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客批评他忽视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苏联国内犹太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指控福特纵容克里姆林宫并忽视了苏联那令人感到不安的军事力量集结。政府内外的国防专家对苏联的国防开支和军事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就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对比平衡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苏联在军费上的支出远远超过美国——仅 1976 年苏联就比美国多支出了大约 350 亿美元——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也使克里姆林宫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并且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此外,北越的军队装备了苏制武器打垮了南越,最终成功地击败并粉碎了美国试图遏制印度支那地区共产主义的远征。更糟糕的是,苏联现正介入非洲——将古巴军队运往安哥拉,安哥拉国内的葡萄牙殖民地,作为一块富有潜力的富饶且极具价值的土地,正在爆发内战。对福特持批评意见的观察家表示,克里姆林宫正明目张胆地违背双方订立的规则,即要求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方都必须避免在某一地区取得单边优势。^②

美国国内对美苏缓和十分不满,缓和政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围攻。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作伪证导致政府受到不信任,而福特在 1974 年 9 月特赦蒙羞的前总统尼克松的行为更加深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对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外的一系列丑闻的披露更强化了美国公众早已甚嚣尘上的批评和讥讽。而基辛格所进行的秘密谈判——无论是关于越南还是核武器——都招致公众对政府产生更大的怀疑。而他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也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不得不接受共产主义在越南的胜利,以及美

① 引自 3,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5 年 8 月 2 日,国家安全档案。
② 关于国防开支,参见美国军事控制与裁军署,《全球军事支出与武器转让,1967—1976》(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7—1976),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7,6:62,66;关于本段与下一段中提及的国内和国际局势背景,尤其可参见福特,《用时光来弥合》,306—307,345—382;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489—620;安妮·赫辛·卡恩(Anne Hessing Cahn),《谋杀缓和:右翼势力攻击中央情报局》(Killing Détente: The Right Attacks the CIA),大学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



国日益衰退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高石油价格,日益衰退的国民生产力,以及持续疲软美元使美国突然陷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同时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候选人,猛烈抨击福特的幼稚轻信,同时讥讽他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1976年3月,福特对这些指责他的攻击作出了回应,他将不再谈论缓和,将会追求“以实力谋求世界和平”。^①

与此同时,苏联的领袖们正在竭尽全力驳斥那些对他们的行动和政策进行的攻击。勃列日涅夫极其痛恨那些声称苏联正在谋求对美国的核优势的主观臆测。无论投入多少资金,苏联官员相信苏联始终落于下风,因此苏联只有通过不断努力追赶才有可能改变其根深蒂固较之于美国的弱势地位。“我们总是持落后挨打的思维逻辑。”斯塔罗杜博夫将军在1994年向一群历史学家这样解释道。“我们的领袖们上了年纪。”尼古拉·杰季诺夫将军强调说,他是限制战略武器政策推荐委员会的成员。我们的领袖“总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立场和态度来处理问题”。历史经验决定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者始终保持警惕。历史有可能会重演。苏联可能再次受到攻击。“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一点。”格列奇科元帅这样写道。^②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苏联越来越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实现美苏缓和的关键。过去当苏联处于弱势时,美国并不愿意与苏联谈判或向苏联作出妥协;在勃列日涅夫看来,美国的真正目的绝对不是威慑,而是想要恐吓或敲诈苏联。为了能够超越冷战,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觉得他们必须击溃对手的优越感。苏联的实力将向美国人证明“谈判协商而非边缘政策……和平合作而非武力对抗,才符合事态发展的自然进程”^③。实力是缓和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勃列日涅夫也将他本人的形象与追求和平、限制军备和与美国合作联系在一起。他焦急地等待着美国197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迫切地希望知道是否能重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重燃美苏缓和的希望。

与此同时,苏联驳斥了美国对苏联干涉安哥拉内政的批评。当基辛格对苏联将一万名古巴士兵运往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时,葛罗米柯反唇相讥说苏联只是在对先前南非介入安哥拉内战作出回应。他表示,设在比勒陀利亚的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

① 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604ff。

② 引文参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148—149;A·A·格列奇科(A. A. Grechko),《苏联武装力量》(*The Armed Forces of the Soviet Union*),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7,79。

③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以及全党在国内外政策中的紧迫任务”(“Report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Party in Home and Foreign Policy”),1976年2月24日,《信息简报》(*Information Bulletin*)——特刊第1期,1976年,布拉格:和平与社会主义出版社(Peace and Socialism Publishers),1976,尤其参见20,25—26。



南非政权越过国界在安哥拉境内部署军队,并且试图对这一新兴国家国内冲突的结果施加影响。1975年11月,安哥拉左翼的人民解放运动(MPLA)领袖阿戈什蒂纽·内图(Augostinho Neto)宣布安哥拉独立,并且请求古巴予以军事和物资援助。根据葛罗米柯的说法,卡斯特罗只是对内图要求古巴提供援助的合法请求作出回应。葛罗米柯坚称,克里姆林宫并未破坏美苏缓和,同时苏联对安哥拉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予以支持是无可厚非的。这和美国长期以来向盟友国和附庸国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的行为是同样的性质。基辛格反驳说:“这真是一场悲剧,因为苏联在安哥拉一无所获。”“我们并未打算在安哥拉谋求任何利益。即使是五年之后都不会改变。”葛罗米柯警告基辛格在回华盛顿后不要造谣中伤美苏关系;如果他那样做的话,可能会扼杀美苏缓和。葛罗米柯说:“我相信这绝对不符合当前世界局势的根本利益。”^①

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并非安哥拉局势发展的幕后策划人。在1975年6月之前,苏联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可谓是微乎其微。但是古巴却对内图的请求立即作出回应,并且通过斡旋迫使克里姆林宫给出了超出苏联领导人先前预期的援助。然后,正如葛罗米柯所指出的那样,南非对安哥拉的军事干预(以及中国对另外一个反对派团体的援助)迫使苏联不得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开始相信,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所支持的民主解放力量——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将被首府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摧毁。在1975年下半年和1976年上半年最为关键的几个月中,苏联的军事支持和古巴的援助对于内图取得安哥拉独立斗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苏联卷入非洲纷争会威胁到美苏缓和的进程。他一再

① 关于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之间的对话,参见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1976年1月23日,国家安全档案。

② 参见塔拉先科、多勃雷宁和孔德拉舍夫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不信任的增长”,293—301;卡伦·内雷索维奇·布鲁坚茨(Karen Neressovich Brutents)所作的评论,收录于“美苏关系与苏联1970年代对中东地区以及非洲的政策”(“US-Soviet Relation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in the 1970s”),文字稿来自1994年10月1日—3日在卢瑟布召开的一次讨论会议(奥斯陆:挪威诺贝尔研究所,1995),44—45,35;背景参见皮耶罗·格莱杰瑟斯(Piero Gleijeses),《彼此冲突的使命:哈瓦那,华盛顿和非洲,1959—1976》(*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2;W·马丁·詹姆斯三世(W. Martin James III),《安哥拉内战的政治史,1974—1990》(*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in Angola, 1974—1990*),新布伦瑞克,新泽西州:汇通出版社(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41—88;奥德·阿恩·韦斯塔,《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218—249;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556—594;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52—53。

强调,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只是为应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帝国主义行径所采取的权宜手段。^① 常规情况下,并没有必要作出主动的介入和干预,因为整个世界正不可动摇地迈向社会主义这一美好未来。^② 他表示,越南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全面胜利”^③。亚洲和非洲新近解放的国家正在将他们的工业生产转由国有部门主管并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垂死挣扎。他们的社会福利改革遭遇了失败。勃列日涅夫说道,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未来的社会制度”^④。

尽管许多学者都在论著中提及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骄傲自满和停滞不前,但是这位苏联总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对共产主义深信不疑。同样苏联人民也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即使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有时会违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对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写道,“大部分的核心价值观、理想和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都是具有真正的重要性。”^⑤ 共产主义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勃列日涅夫喜欢这么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⑥

勃列日涅夫是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深信如果能够获得和平竞争的机会,共产主义将证明其优越性。他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产上的无序混乱将被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所取代”^⑦。“几个世纪以来的落后局面”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得以克服。^⑧ 现在苏联领导人接受了历史性的使命来为人民谋福祉,推动社会正义和平等,同时努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说,他们的目标是“采取任何必要

①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16。

② 出处同上,5。

③ 勃列日涅夫在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举行的午餐会上的致辞,1975年10月2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5年10月28日,第3—5行。

④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15—41,引自34。

⑤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所有的一切都曾经是永远,直到它消失为止: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8;同时参见记者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Vladimir Konstantinov)的评论,收录于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146,同时参见83—85;关于官僚意识形态频繁发生的违纪行为,参见詹姆斯·R·米勒(James R. Millar),“小意思:勃列日涅夫对贪婪社会主义的贡献, (“The Little Deal: 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斯拉夫评论》4(1985年冬):694—706。

⑥ 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103。

⑦ 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演讲,197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1月2日,4。

⑧ 勃列日涅夫,“回答问题”,1977年6月6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6月6日,R11。



的行动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幸福安康奋斗”^①。

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10月召开的一次党内全体大会上告诉他的同志们,国防开支不应该超过“足以确保苏联安全的数额”。军事开支不应该妨碍苏联共产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追求。^②和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他对军方高官要求得到越来越多的卢布感到非常愤怒。他对自己的演讲稿作家抱怨说,当他的国防部长告诉他美国的军事动向正威胁着苏联的安全时,他究竟该怎么办?“我是否应当拨给他们1400亿或1560亿?事实上我一直在拨钱给他们,一次又一次——而每次拨给他们的钱就像是流进漏斗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作为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扪心自问,他是否能够拒绝拨付那些被他的军事顾问认为是保证苏联安全所必需的资金?^③

勃列日涅夫察觉到了那些困扰苏联经济的问题。虽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提升,但是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却在放缓,从1960年代每年增长约4.8%降至1970年到1975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2.9%。^④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苏联的食品短缺,生产效率低下,假冒伪劣商品和技术发展停滞的问题。他害怕民众会产生不满情绪,同时担心会有人指控他未能满足苏联人民的需求和期望。^⑤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勃列日涅夫详细列举了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工资的增长,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大幅度改善。但是他心里清楚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图拉市市民爆发了强烈不满情绪之后,勃列日涅夫对图拉市市民说:“你们可能会说你们需要更多的住房、学校、幼儿园,需要商店里贩售更多的商品。对,你们说得没错。我们的需求总是远

① 引文参见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104;勃列日涅夫,“回答问题”,1977年6月6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6月6日,R11;同时参见勃列日涅夫的演讲,197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1月2日,2—16。

②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体大会上所作的演讲,1976年10月25日,收录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平、缓和与苏美关系:公共演讲集》(*Peace, Détente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A Collection of Public Statements*),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9,134。

③ 引自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7章。

④ 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5;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83—84,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经济增长与放缓”(“Economic Growth and Slowdown”),收录于《重新审视勃列日涅夫》,埃德温·培根和马克·桑德勒(编),洪兹米尔,英国:帕尔格雷夫和麦克米伦公司,2002,44—52。

⑤ 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143—154;哈里森,“经济增长与放缓”,38—67;琳达·J·库克(Linda J. Cook),《苏联社会契约及其失败的原因:从勃列日涅夫到叶利钦时代的福利政策与工人政治》(*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1—81。



远超出我们实际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并非在原地踏步,我们正在取得进步。”^①

为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勃列日涅夫承认,经济发展并非易事。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断采用敦促和威吓的手段,虽然并不如赫鲁晓夫那般令人不快,但是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描述的他要严厉得多。所有人都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不断进行实验和创新。“如果一个人想要生活得更好,赚更多的钱,他就必须努力工作。这是一条源远流长但永不过时的真理。”就国家而言,苏联必须更为有效地管理资源,鼓励科技革新,促进农业生产,开发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发展与西方之间的贸易和科技往来。^②“新社会需要和平,”勃列日涅夫的亲密顾问安德罗波夫说,“让缓和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使命。”^③

1976年9月,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向苏联总书记介绍美国政坛上的一位新人物。哈里曼表示,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与福特拥有同样的机会可能当选美国总统。这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望通过哈里曼向苏联传递以下讯息,即他赞成和平、缓和、双边贸易以及削减核武器,如果他能够当选的话,他希望能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哈里曼补充道,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友善讯息或许能有助于铺平改善美苏两国关系的道路,无论福特和卡特两人谁会当选美国总统。

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聆听了哈里曼的叙述。他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不得被冻结数月表示失望。他表示,他最近正在研读卡特的演讲稿,虽然他对这些演讲并不是完全满意,但是他并未完全放弃希望。带着颇为激动的情绪,他告诉哈里曼他“毕生都致力于阻止核战争的爆发”。只要任何一方投下第一颗核弹,就等于宣告了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哈里曼插话道,既然您这样认为,那总书记您何不适时地传递出

①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演讲”,1977年1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月18日, R8。

② 出处同上, R3—13;引文参见 R7;同时参见,例如,勃列日涅夫在工会第16届大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3月21日, R1—17;勃列日涅夫向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领袖所作的演讲,1977年2月1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 D1—4;关于对苏联的经济运行现状以及流产了的经济改革计划的绝佳总结,参见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64—86。

③ 关于安德罗波夫的观点,参见 Y·V·安德罗波夫,“列宁主义:革命的科学和艺术”(“Leninism: The Science and Art of Revolution”),1976年4月22日,收录于 Y·V·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演讲与文选》(*Speeches and Writings*),牛津,英国:培格曼出版社,1983,152—170;马丁·埃博恩(Martin Ebon),《安德罗波夫文档:苏共总书记尤里·V·安德罗波夫生平及思想》(*The Andropov File: The Life and Ideas of Yuri V. Andropov,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麦格劳希爾出版社,1983,213。



一些讯息来推动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促进双方的互相信任呢？^①

在 1976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不久，苏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华盛顿约见了哈里曼。他表示勃列日涅夫希望当选的卡特总统知道“我们苏联已经做好了与美国充分合作的准备”。他希望美苏双方能早日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并且就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达成共识。通过其他一些中间人，勃列日涅夫带话给卡特表示苏联不会做任何事来羞辱或威胁新上任的卡特政府。^②

在卡特宣誓就职前两天，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一次长时间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援引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他强调说苏联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孜孜不倦地为和平事业而奋斗”以及“消除战争的威胁”。苏联并不寻求战略优势或追求先发制人的实力，但是苏联希望能够减少核武库的储备，首先通过将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共识落实为协议，然后再继续推进限核进程。“我们永远都不会走上侵略的道路，永远都不会举起剑指向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缓和会成为苏联政府一贯政策的原因。“缓和首先意味着超越冷战并回归到国与国之间正常化的稳定外交关系。缓和意味着双方愿意不诉诸武力来解决分歧和争议。缓和意味着相互信任并能够顾及对方的合法权益。”^③

勃列日涅夫的话语标志着苏联愿意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合作开创一个良好的新起点。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好意愿都会转化为现实。国际局势的动荡再次从中作梗。北越共产党人正在巩固对南越的胜利，并且开始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炫耀他们的武力。在中东地区，最近发生的两次战争——分别在 1967 年和 1973 年——使整个地区陷入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极大动荡，并且存在使超级大国卷入纷争的危险。阿拉伯各国政府拒绝承认以色列在安全边界内存在的权利，同时以色列也不愿意放弃从叙利亚、约旦和埃及所强占的领土。在中东地区之外，整个非洲大陆充斥着动荡和骚乱。1974 年在激进的军方成功地里斯本夺取政权并推翻已经统治了葡萄牙长达四十年的独裁政府时，他们宣布计划废除葡萄牙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从而终结欧洲在第三世界的殖民统治。安哥拉发生的冲突是此次事件所导致的权力真空的直接后果之

① W·埃夫里尔·哈里曼与勃列日涅夫会谈备忘录，1976 年 9 月 20 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VF)，吉米·卡特图书馆(CL)(亚特兰大，佐治亚州)。

② 来自勃列日涅夫的讯息，由多勃雷宁转达哈里曼，1976 年 11 月 21 日，出处同上；同时参见劳伦斯·S·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 Eagleburger)致托尼·雷克(Tony Lake)，1976 年 12 月 2 日，出处同上；阿莱克斯·R·赛斯(Alex R. Seith)致哈里曼，12 月 3 日，出处同上。

③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图拉发表的演讲”，1977 年 1 月 18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 年 1 月 18 日，R3-13。



一,但是动荡的局势很快就从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散布到非洲各地。在非洲南部,尤其是在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黑人解放运动正通过斗争来夺取权力,非洲国民议会并不放弃终有一天推翻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现政权的希望。其他地方,比如在非洲之角,由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领导的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埃塞俄比亚激进军事组织在1974年成功地推翻了原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并通过武装斗争来巩固其军事政权。埃塞俄比亚的邻国索马里现在已经由一个发表激进言论的总统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所统治,索马里嗅到了利用埃塞俄比亚内乱伺机侵占其领土的机遇。在所有这些地区,种族不平等以及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与地区冲突,部族纷争以及经济落后交织缠绕在一起。

对于莫斯科而言,在第三世界始终保持警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可能会死灰复燃并且露出他们的狰狞面目。但是越是充满了危险的地区,同样也充满着机遇:如果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被赋予了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力,他们将仿效苏联,“这将为全人类开辟一条通向新生活的道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从未停止如此宣传:“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是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天然和可靠盟友。”^①

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克里姆林宫的立场从未如此正确过。“苏联不会干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内政。这是我国所奉行列宁主义永恒不变的外交准则,即尊重每一个人和每个国家对自身发展方式的自由选择权。”^②但是苏联是否能够抵御诱惑,或是审慎地评估风险还尚不可知。基于这些考虑,缓和的未来再一次走向转折。尽管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并不寻求优势,不胁迫对方作出让步,不寻求政治上的主宰地位,不追求军事基础”,但是苏联仍然按照它的革命思路和共产主义信念来采取行动。^③

华盛顿的新面孔,莫斯科的老面孔

吉米·卡特是美国政坛上的一张新面孔。他的童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佐

① 引文参见苏联最高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向来访的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表示敬意所作的晚宴讲话,1977年5月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H1—4;同时参见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8—41;勃列日涅夫的讲话,197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1月2日,3;对苏联政策的分析,参见韦斯塔,《全球冷战》,207—287。

② 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的报告”,1976年2月24日,16。

③ 出处同上。



治亚州西南部农村的一个农场上度过，但他始终寻求比自己的故乡和社区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机遇让他充分施展才华。他就读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协助设计了美国最初一批核潜艇，然后，出人意料地，当1953年他父亲因癌症去世后，他从海军退役并回到了他从小长大的农场。吉米的父母并不富裕，但是与那些在他们家农场上工作的黑人劳工和小佃农相比，他们家的生活还算得上舒适，吉米童年时代也曾与这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钓鱼和打猎。像他的父亲一样，吉米立志于在经营农场上取得成功，但是他深深地关注着所生活的大社区的福利。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成为了地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并且从此以后走上了从政之路。在1960年代的头几年他供职于佐治亚州参议院，1966年他参与竞选佐治亚州州长但遭遇落选，1970年他再度竞选该州州长并最终成功当选，成为了美联邦最为贫困的州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在卡特日益成熟的历程中，他意识到美国所存在的深刻的平等和种族歧视让美国梦对美国黑人而言成为了一种讽刺。他们应当获得应有的基本权利；穷人，无论他的肤色是黑是白，都应当被赋予取得成功的机遇。政府在这方面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吉米·卡特并不热衷于庞大的政府编制或是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①

吉米·卡特是一位充满了矛盾的人物。他很谦虚同时又非常自信，他为人温和但又野心勃勃。他是一个有着深刻信仰的人，一个获得重生的基督徒，然而他的外表看上去又非常生活化，为人善良仁慈。他每天都要作几次祷告，但是祷告都是在私下不引人注目的场合进行。他曾经就读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但是他却远远避开尚武精神，同时非常反感国家动用武力。他非常亲切友善，一直散发着乐观精神，然而他又非常喜欢独处，并且在与他人的私人交往中时常显得非常冷淡。他一周会阅读几本书，但同时进行非常剧烈的运动，喜欢竞技体育运动。他能够重视互相对立的观点，但是一旦下定了决心他绝对不会回头。如果要举出一个促成他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特质，事后他回想道，认定应该就是他的“坚忍不拔，一旦我开始着手做某

^① 关于卡特的背景，参见吉米·卡特，《黎明破晓前的一小时：对在乡间度过的童年时代的回忆》（*An Hour Before Daylight: Memories of a Rural Boyhood*），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2001；彼得·G·伯恩（Peter G. Bourne），《吉米·卡特：从普莱恩斯到总统卸任后的完整传记》（*Jimmy Carter: A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from Plains to Postpresidency*），纽约：斯克莱布诺出版社（Scribner），1997；贝蒂·格莱德（Betty Glad），《吉米·卡特：探寻伟大的白宫》（*Jimmy Carter: In Search of the Great White House*），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80。

件事,没有什么事能够改变我的决定”^①。

吉米·卡特在外交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背景,并且他经常宣布说一个国家在外交上的成功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先把自家的屋子收拾干净。^②然而从第一天开始,他的顾问们就知道他打算在外交事务上成为决策制定者,而将国内事务交给他的内阁成员并鼓励他们自主管理所辖的部门。他的管理作风是为手下的顶级执行官们定下一个宏观的大方向,然后放权给他们,让他们自行组织、协调和执行。^③他更倾向于只掌控一小部分关键问题。而他的确在把握大局上做得非常出色。

吉米·卡特为人严格自律,求知欲强,勤奋努力,同时,的确,非常坚忍不拔。“我打心底里是一个工程师,因此我喜欢理解事物的细节。”他之后这样回忆道。^④但是对细节的专注并不会分散他对宏观局势的把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历史学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同时也是被卡特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一位政治家,对卡特作出以下的评价:“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他在阅读上涉猎很广,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更多的知识。”^⑤塞鲁斯·万斯(Cyrus Vance),一位被卡特任命为国务卿的律师,以相同的方式描述了他的新上司,并且补充道,即将上任的这位新总统总是偏爱使用“大胆的、全面的”方法,而非“在过去达成的共识上作谨慎渐进的积累”。^⑥

卡特的当选也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经历了水门事件、越南战败和中央情报局丑闻之后,他代表着美国政坛上一股崭新的力量,一股美国人之前都从未如此欣赏的力量。他是国家政治的局外人,并没有受到腐败、谎言和前任民主党或共

① 引文参见“访谈吉米·卡特”,1982年11月29日,卡特总统任期项目(Carter Presidency Project),夏洛特斯维尔:弗吉尼亚州:米勒中心基金会(Charlottesville, Va.: Miller Center Foundation),2003,69(后文中引为米勒中心访谈);关于卡特的人格、个性和价值观,同样可以参考吉米·卡特,《坚定信念:一位总统的备忘录》(*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82,尤其可以参见17—62;也可参考收录于唐·理查德森(Don Richardson)(编),《与卡特的对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Carter*),玻尔德,科罗拉多州:林恩·瑞恩纳出版社(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

② 参见,例如,西德尼·克劳斯(Sidney Kraus)(编),《大辩论:卡特对福特,1976》(*The Great Debates: Carter vs. Ford, 1976*),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489—490。

③ 米勒中心访谈,69。

④ 出处同上,8。

⑤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一位国家安全顾问的回忆录,1977—1981》(*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纽约:法拉、施特劳斯与吉劳克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83,22。

⑥ 塞鲁斯·万斯,《艰难的抉择: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岁月》(*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3,31—33。



和党总统失败的玷污。他对自己的廉正和能力充满自豪。“为什么不选择最好的？”他这样询问美国民众。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代表着他们心底最深处的价值观以及反映着他们的诚信和尊严的人？为什么不把选票投给一个和他们一样坚信一个有效运作的，开诚布公的，为每一个人创造机遇的，在财政上保持对国民负责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政府的重要性的人？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既务实又充满理想的人？对卡特而言，“要更好地展示美国的理想主义，就必须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同时道德准则则是发挥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最好基础”。^①

在宣誓就职之前，卡特要求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提交备忘录勾勒新一届政府的目标和工作重心，然后这位当选总统与他们俩分别就这些目标进行了深入的长时间讨论。“首先，”布热津斯基写道，“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提升美国对全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同时为我们的前景注入更多的历史乐观主义。”他希望“能重塑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并且“提升美国相对于苏联的战略地位”。布热津斯基担心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可能会使克里姆林宫更倾向于“利用第三世界的动荡或是在美国的政治竞赛中强行推行苏联的意志”。^②

万斯同样和卡特谈及了这些问题。他希望能够缓解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对峙，“同时积极地维护我们的全球利益以及维持无争议的军事实力平衡”。他希望能够继续推进缓和，但是坚持认为这必须是“双方对等的”缓和。他同时建议卡特说，我们“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处理美苏关系或是东西方关系上”以至于忽视了更为紧迫的困扰着第三世界的那些问题。^③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感受力和倾向性。布热津斯基对他的波兰裔身份有着非常深刻的意识，和许多波兰人一样，对苏联俄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他博览群书，论著颇丰，雄心勃勃，聪颖过人。他迫切地希望获得尽可能大的影响力，因此他希望能和卡特总统保持密切关系，并希望获得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机制的最大控制，之后他迅速地把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成两个子委员会：政策审议委员会和特别协调委员会。“协调是应当最为优先考虑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④

① 卡特，《坚定信念》，143；吉米·卡特，《为什么不选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纳什维尔，田纳西州：布罗德曼出版社(Nashville, Tenn.: Broadman Press)，1975。

②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3。

③ 万斯，《艰难的抉择》，23，502—520。

④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63。



万斯则是一位沉默寡言、条理清晰、深思熟虑的律师,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有供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万斯在卡特竞选总统期间担任他的顾问,卡特逐渐开始喜欢、欣赏和信任他。万斯并不寻求名声或荣耀。他非常内敛审慎,是一位卓越的谈判家,一位考虑周全的谋略家。他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对立以及第三世界甚嚣尘上的动荡非常敏感,因此他和卡特总统一样迫切希望能够超越冷战这一传统魔咒。^①

尽管后来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冲突不断,但是一开始时他们俩的分歧非常微小。卡特对他们俩之间的差异并不担心。他对能够与他们俩以及他那极有才干、成就斐然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以及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共事感到非常愉快。事实上卡特总统一周内最喜欢的时间就是星期五上午,这是他与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讨论最为紧迫问题的时间段。他并不担心大家在观点上可能存在分歧。他非常自信,同时喜欢聆听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建议,通过对事实的筛选来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卡特长期的也是最信任的政坛心腹密友和行政助理,精确地对卡特总统的立场作出了总结:“兹比格涅夫是思考者,赛鲁斯是行动者,而吉米·卡特是决策者。”^②

卡特打算把人权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之一,而非唯一主题。在他自己起草的就职演说中,卡特为美国勾勒出一个新方向。与基辛格热衷于追求实力的平衡,或者肯尼迪诉诸于强势的实力,抑或杜鲁门对遏制的追求都不同,卡特旨在恢复国民对“一个远古就存在的梦想——对人类自由的梦想”的信心。这个梦想是“源远流长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渴望着“能够在太阳底下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要求获得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世界各地对自由的热切追求正在日益高涨。……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国度,因此我们绝不会对世界其他地方自由事业的命运坐视不管。”^③

① 关于万斯前往华盛顿时想法,参见万斯,《艰难的抉择》,17—25;关于卡特对万斯的看法,参见卡特,《坚定信念》,50—51;米勒中心访谈,38;关于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参见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36—44。

② 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危机:卡特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年》(*Crisis: The Last Year of the Carter Presidency*),纽约:G·P·帕特南之子公司(G. P. Putnam's Sons),1982,46—47;卡特,《坚定信念》,55—56;米勒中心访谈,38—39。

③ 卡特总统的就职演说,1977年1月20日,《总统公开文件:吉米·卡特,1977》(*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immy Carter, 1977*),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7,1—4。

这些话语反映了他最深层的信念。“我知道要忽视别人所受到的迫害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他这样写道，暗指他从小就生活在其中，在他成年之前都习以为常的种族隔离的美国社会。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能容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人权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事实”，他坚信这一点，“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历史必然性”。^①

卡特深刻地意识到国际秩序正处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动荡的局面正有扩散的趋势。美国的盟友们，尤其是西德、法国和日本的实力正在不断增强，并且开始经常对美国的决策表示不满。他们对美国在尼克松任期内的货币政策极度不满，当时美国单方面暂时中止了对美元的兑换，并强迫他们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买单。卡特现在需要这些盟友国的支持和合作，尤其当美国面临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新挑战之时，这是一个包括了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销同盟。当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中战败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将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使整个资本主义西方都陷入一片混乱。在西欧、日本和美国，通货膨胀使物价飞速飙升，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同时失业率达到了自194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②

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了南半球新崛起的一股野心勃勃的势力。尽管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像石油输出国组织那样的天然优势，但是他们对国家独立、不受限的国家主权、更高的原材料价格，以及更公正的财富分配的强烈呼声已经为资本主义西方创造出一种新的话语权和议事日程。随着世界上最后一块属于葡萄牙的前殖民地的解体以及整个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争相夺取政权，这些国家正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的话语中充满着对公正待遇的呼吁，对种族主义的抗议谴责，以及要对殖民者进行报复的威胁。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法则充满了不信任。他们希望通过目标明确的国家行为来为他们涤荡帝国主义残留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铁律。他们拥有莫斯科这个领袖以及北京这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而这两大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由于两国互相竞争而更加提升了对全世界民族解放运

^① 卡特，《坚定信念》，141；来自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评价，“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02—203，207—208。

^② 赫尔曼·范德威(Herman Van Der Wee)，《繁荣与变革：全球经济，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50，77，81—93，472—512。

动的关注度。^①

“资本主义能存活吗?”这是卡特当选前大约一年左右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在这篇文章中,《时代周刊》指出:

一种折磨人心的恐惧正困扰着所有人:资本主义除了深度的经济衰退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来治愈通货膨胀,而任何想要让经济迅速走出萧条的联合行动只会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通胀倾向的衰退仅仅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直接的威胁;除此之外,还存在更为长期更为微妙的潜在危险。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由市场正逐步地受到无所不在的政府管理人员、大商贸行会以及超级大公司的制约。

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大企业的贪婪并且呼吁“加强探索可以更替西方主流经济的另一种经济运营模式”。这份声明表达了美国广大民众对国内经济繁荣的消逝、物价的飞涨以及他们的实际薪水结束了战后以来持续飞涨局面的低落情绪。^②

从1947年至今,美国官员从未如今日这般对西欧的动荡充满忧虑。“我们的西欧盟友们正处于一个持久的政治停滞和经济衰退期。”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3月11日警告卡特总统说。各国共产党开始越来越多地对莫斯科的政策进行批评,并逐渐增强他们自身的实力。欧洲的精英阶层们害怕他们的国民正逐渐对“曾经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系失去信心”。“欧洲几乎每一个政府都快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这其中包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布热津斯基说,“同样日本和加拿大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这种政治上的弱势由于经济停滞的关系而变得愈发严重。……各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极右政党正在逐步取得公众承认以及合

① 参见,例如,福雷斯特·D·科尔伯恩,《贫穷国家的革命风潮》,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克劳福德·扬(Crawford Young),《意识形态与非洲局势的发展》(*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尤其是1—183;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顽抗的叛乱者:革命与最不发达的比较研究》(*Reluctant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马克·N·卡茨(Mark N. Katz)(编),《苏联与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The USSR and Marxist Revolutions in the Third World*),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1990)。

② “资本主义能存活吗?”(“Can Capitalism Survive?”),《时代周刊》106(1975年7月14日):52—63;关于实际工资,参见范德威,《繁荣与变革》一书中的表格,237。



法地位。”^①

假如说欧洲局势摇摇欲坠的话，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就更为糟糕了。万斯觉得绝对不能再小觑“发展中国家那种爆炸性的变革势力”。非洲“是一块泥沼”，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4月1日给卡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整块非洲大陆“随着原有的后殖民时代社会结构的崩溃，正处在政治经济的巨变之中”。亲西方的与亲苏联的政权和党派正彼此互相争夺权力。整个非洲局势“危机重重”，昭示着“相当黑暗凶险的未来”。展望今后10到20年，“非常清楚的是，美国迫切需要重塑一个全面长期的南北战略关系”。^②

“这是一个新世界，但是美国对此并不畏惧，”卡特在就职几个月后在巴黎圣母院大学发表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这样说道，“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应当促进对它的塑造。新世界要求美国采用新的外交政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恒久尊严和美国历史观的乐观主义的外交政策。”^③

卡特的顾问们必须设计出与总统所致力“道德基准”相称的外交政策。这对于布热津斯基来说并非难事。此刻“当苏联扬言历史的天平正偏向于支持共产主义”时，当克里姆林宫宣布“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时，布热津斯基知道卡特对人权问题的许诺是一种非常好的地缘政治战略，也是绝妙的理想主义。^④总统先生您的目标“条理分明，连贯一致”，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怀着对“人类开始觉醒的意识”的关注，布热津斯基表示他将把卡特总统的愿望付诸于实际：

(1)我们将寻求与我们的主要盟友进行更为紧密的协调，从而为更稳定的国际秩序打下坚实的基础；(2)我们将开启南北对话以应对基础更为广泛的人道主义需求；(3)我们将在东西方阵营寻求和解以避免战争，同时争取扩大跨越意识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3月11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BC)，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4月9日，1977年12月2日，1978年2月9日，出处同上；理查德·N·加德纳(Richard N. Gardner)，《意大利使命：在冷战的最前线》(Mission Italy: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兰汉姆，马里兰州：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2005，19—20，42—48。

② 万斯，《艰难的抉择》，23；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4月1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在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1977年5月22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7》，954—962，引自957。

④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4月1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布热津斯基的评论，收录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02—203。



形态的合作。此外, 我们还将寻求阻止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扩散。^①

卡特本着大无畏的精神试图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够巩固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修复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委派副总统蒙代尔出访西欧和日本。为了给南北关系定下一个新基调, 他委任安德鲁·扬(Adrew Young), 一位美国黑人同时也是亚特兰大市前市长, 作为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 并且派遣他前往非洲南部执行外交使命。为了重振中东外交, 他委派万斯前往特拉维夫和开罗访问。为了解决长期困扰美国并且随时可能爆发争端的巴拿马运河问题, 他任命一名特别代表前往巴拿马就运河条约重新开启谈判。“我们需要纠正不公正的现象。”卡特一再强调说。巴拿马收回大运河主权的要求已经“在全世界成为了一种石蕊测试, 检测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究竟会怎样对待一个弱小的、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小国”。^②

1977年1月26日卡特第一次致信勃列日涅夫主席: “我希望再一次向您确认我的目标是在双方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推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我本人和国务卿万斯都会高度重视这个目标。”他强调说希望避免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消除所有的核武器是我的坚定目标”——同样我希望继续推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他希望能够达成“在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基础上的包含适量核查的条约”, 同时期待在“中欧取得双方对等的军备裁减”上取得进展。他同时表达了改善美苏经济关系的良好愿望, 但是又补充道: “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自由的命运和每个个体的人权漠视不管。”

在这封信的最后, 卡特点明了他处理美苏关系的宏观方法, 与勃列日涅夫的方法差别也不是很大:

我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体制, 同时我们两国在历史和生活经验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两国在理想和观念上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绝不能因此就妨碍我们两国协力营造一个更为和平公正、人道主义的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对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作出集体的答复,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7年4月1日, 文件箱41, 布热津斯基集, 卡特图书馆; 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7年4月16日, 出处同上。

② 卡特, 《坚定信念》, 155—156。



因此我希望我们两国能够更为紧密地合作,推动发展,为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提供更好的饮食和物质更丰实的生活。^①

尽管勃列日涅夫以一种公文式的方式对卡特作出了回应,表示他期盼着美国国务卿万斯的来访,但是美苏关系却迅速转恶。^② 卡特在会见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时,以及在给勃列日涅夫的第二封去信中表示他寻求美苏能削减比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议上双方约定的数量更多的核武器。^③ 此外,在2月5日他给闻名遐迩的苏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苏俄政权的著名批评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作出回信。卡特总统试图用一种更机智圆滑的方式来作出回应,但却只是重复了他的宣誓就职演说:“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对全世界各地自由的前途坐视不管。”^④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慨。华盛顿似乎想要推翻苏联与福特总统协商后订立的条款。勃列日涅夫对增加削减武器的数量并不反对,但是他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双方达成的共识有一种主人翁意识,为了这个共识他曾经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以权力来压制手下的军事领导人。因此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刻对该共识作出可能会在国内招致反对的变更。他和卡特必须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推动局势发展。因此他把卡特骤然跃向未来的做法看成是“扇了他一个耳光”^⑤。

苏联的领导人们对卡特给安德烈·萨哈罗夫回信感到更为不安。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i Ustinov)要求勃列日涅夫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卡特正在干涉苏联的内政,贸然轻率地推行了一个“极其不明智的”政策同时在政策方向上作出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在理解自己国内的局势上与美国官员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苏联国内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步改善而非恶化。

①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7年1月26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②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7年2月4日,出处同上。

③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7年2月14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考多勃雷宁,《机密》,383—390;多勃雷宁所作的评价,见“全球竞赛”,170—173。

④ 安德烈·萨哈罗夫,《回忆录》(*Memoirs*),理查德·劳里(Richard Lourie)(译),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社,1990,464—466,687。

⑤ 科尔尼延科(Kornienko)的评论,“美苏关系与苏联的外交政策”(“US-Soviet Relation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11—12;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6—8,16—17,58—61,73—74,96;多勃雷宁的评论,“全球竞赛与美苏关系的恶化,1977—1980”(“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U.S.-Soviet Relations, 1977—80”),卡特-勃列日涅夫项目第三次口述历史会议(the Third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of the Carter-Brezhnev Project)(劳德代尔堡,佛罗里达州:1995年3月23—26日),171—172。

克里姆林宫宣称，西方媒体谎称苏联有数以万计的政治犯，“然而实际上”只有非常少量的人因叛国罪服刑。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萨哈罗夫、尤里·奥洛夫(Yuri Orlov)、阿纳托利·夏兰斯基(Anatoly Shcharansky)和亚历山大·金斯伯格(Aleksandr Ginzburg)——受到了迫害，“但这并非我们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肃反镇压”。改革派外交政策专家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Georgi Shakhnazarov)表示。^①

安德罗波夫定期向政治局汇报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理情况。在1971年至1974年之间，克格勃警告大约六万三千人中止他们的秘密行动——包括隐藏宣称小册子，散布反动文学，里通外敌。然而这样的口头警告之中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最终锒铛入狱。截至1975年下半年，苏联全国仅有850名政治在押犯，其中261人因为散布反苏联言论的宣传资料而被捕。同一年，也就是签署赫尔辛基协议最终法案的那一年，仅有76名政治犯在刑事法庭受审；1976年，仅审判了69例政治犯；1977年仅48例。在1974年，收监的持不同政见者计178人；1975年降至96人；而1976年进一步降至60人。当莫斯科赫尔辛基观察团于1976年5月成立时，其成员受到了克格勃的长期监视，但是这个组织却被允许进行正常的运作（仅仅在1982年被迫关停了一次）。镇压肃清曾经是苏联政权的一贯做法，历史学家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 Savranskaya)这样总结道，因此“从苏联的标准而言，持续监控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处理方式”^②。

在赫尔辛基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自己转而处于防御地位，他们对此非常愤怒。^③ 自从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之后，苏联政权在文化创新和政治话语自由上的开放程度正在一步步倒退减少。然而苏联的领导人们正修订一部新宪法，并且坚信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最优越的生活方式，一种最好的社会，照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是一个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使自己成为更为有用的人的社会”^④。他们能够接受批评，但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些企图颠覆他们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的活动。在他们看来，华盛顿所重点关注的主要不同政见者并非是友善的批评

① 引文参见“1977年5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备忘录第56号的摘录：关于西方对人权的大肆鼓吹这一问题给苏联驻相关西方各国大使的指令”，R136，文件箱9，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沙赫纳扎罗夫所作的评论，“全球竞赛”，170—175，192—193；多勃雷宁，《机密》，386—390。

② 萨夫兰斯卡娅，“未预料到的后果”，21—26；安德罗波夫向苏联部长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多份报告，1975年12月29日，1976年11月15日，1977年1月20日，READD-RADD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可在国家安全档案的网站上查询到该资源）。

③ 给多勃雷宁下达的指令，指示他在与万斯讨论“人权”的会面中如何应对，1977年2月18日，出处同上。

④ 勃列日涅夫演讲集法文版前言，1976年12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1月3日，E2。

家而是“苏联政权的敌人”^①。克格勃于1977年逮捕了奥洛夫、金斯伯格和夏兰斯基，判了他们重刑；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被迫流亡或被流放。但是直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苏缓和崩溃之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都是受限的：从1976年至1980年，仅有347名政治犯被宣判定罪。^②

掌管克里姆林宫的这群老人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历过大革命，并且全部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幸存下来，因此他们希望批评家们能够理解他们曾经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伟大性。克里姆林宫指示所有被委派至世界各国的大使向外强调在历史上苏联第一次以实际行动而非仅仅以口号来捍卫人权。苏联人民享受着免费医疗和教育，拥有选举权、择业权，以及当选担任行政要职的权利。与之对比的是，美国国民并不享有就业权，年老之后也没有生活保障。多勃雷宁被高层告知要向万斯询问，如果苏联政府决定把是否推进美苏缓和与消除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失业问题挂钩，卡特总统又会作何感想。^③

苏联领导人们承认苏联社会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需要对试图颠覆他们虽然可能并不完美但是极其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任何敌人保持警惕。毕竟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一片落后贫穷的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而现在他们正在与工业化带来的挑战作斗争。他们明白，他们的任务是促使国内形势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此外，他们还在修订一部新的宪法，照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这部宪法旨在深化社会主义民主。^④ 当他的同事们都在合作起草给卡特的回信以及准备与万斯在莫斯科的会晤时，勃列日涅夫告知工会领袖们，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我们会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81。

② 萨夫兰斯卡娅，“未预料到的后果”，21—30；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描述，参见乔舒亚·鲁宾斯坦(Joshua Rubinstein)，《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争取人权的斗争》(*Soviet Dissidents: Their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波士顿：灯塔出版社(Boston: Beacon Press)，1980；保罗·戈德堡(Paul Goldberg)，《最终法案：关于莫斯科派遣的赫尔辛基观察团的戏剧化的、发人深省的故事》(*The Final Act: The Dramatic, Revealing Story of the Moscow Helsinki Watch Group*)，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88。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备忘录第56号的摘选”，1977年5月19日，R 136，文件箱9，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给多勃雷宁下达的指令，指示他在与万斯讨论“人权”的会面中如何应对，1977年2月18日，READD-RADD集，国家安全档案。

④ 勃列日涅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所作的报告，1977年5月2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5月25日，R1—3；勃列日涅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所作的报告，1978年11月2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1月30日，R3—8；同时参见安德罗波夫，“列宁主义：革命的科学与艺术”，1976年4月22日，收录于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演讲与文选》，159。

发展民主。当然，我们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覆盖了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民主，视确保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为第一要务的民主制度。”^①

尽管仍然有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捕，但是克里姆林宫希望在苏美关系中淡化人权问题。勃列日涅夫指示多勃雷宁邀请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一位倡导国防的民主党鹰派参议员，同时也是苏联国内犹太人权利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坚定支持者——访问莫斯科，如果卡特认为这样能够缓解总统在政坛上的困境。^②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宣称将尝试与萨哈罗夫达成协议，只是限制他的行动但是会允许他不用入狱服刑。这位克格勃主席同样吩咐下属解决一些美国认为非常重要的人权问题的特殊个例。^③勃列日涅夫本人曾经向福特总统提供每年从苏联向国外移民的数量的统计数据，声称98.4%的移民申请都得到了批准。^④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努力尝试打消美国人的疑虑，从而推动美苏缓和进程，并最终达成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但是当万斯1977年3月底访问莫斯科，并聚焦于要求双方削减远远大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所预期的数量的核武器时，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愤怒。“你们提出的提议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多勃雷宁警告他说。勃列日涅夫并不希望看到美国提出新的提议。他需要的是达成他与福特总统共同规划的协定。他的同事们告诉他华盛顿正试图威胁他，考验他。在万斯抵达莫斯科之前，他们怂恿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向美国人展示一下我们有多强大，我们并不把他们当回事。”^⑤

当万斯谈到人权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的情绪从愤怒转为了“鄙夷”。“突然之间，就在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里——来谈论所谓人权！”勃列日涅夫的翻译回忆说：“谈论苏联侵犯了某人的人权！这真是闻所未闻！这是一次针对个人的有意冒犯！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对此非常介怀。在人道的层面上，这的确是对苏联的

① 勃列日涅夫向工会所作的演讲，1977年3月2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3月21日，R 7；安德罗波夫，“把共产主义信念作为建设新世界的灵感源泉”(“Faith in Communism as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he Builders of a New World”)，1977年9月9日，收录于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演讲与文选》，171—189；勃列日涅夫日记片断，1977年3月5日，文件箱9，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多勃雷宁的评论，“全球竞赛”，204—205。

③ 孔德拉舍夫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4，97—100。

④ 勃列日涅夫与福特会谈备忘录，1975年7月30日，早晨9:35，12—13，国家安全档案。

⑤ 多勃雷宁的评论，“全球竞赛”，173；多勃雷宁，《机密》，380—392；同时参见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58—60，66—67，80—81。



公开侮辱。”^①

然而，万斯和他的随从们同样感到愤愤不平。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内心非常不安。“我们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万斯回忆道。他抱怨说，俄罗斯人并没有带着诚意来进行谈判，也并未提出反提案。他知道苏联官员对美国无视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非常愤怒，但是卡特本人坚持这一新立场，希望与过去作出一次大胆的告别，同时布热津斯基也并没有作出任何劝阻他的表示。^②事实上，布热津斯基鼓励美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采取坚定不妥协的立场”，寄希望于勃列日涅夫会屈从于美国的要求。^③

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事后承认在莫斯科开启的第一轮赌局设计得不好，但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以那种方式行事。^④在葛罗米柯公开攻击美国的立场之后，勃列日涅夫致信卡特，私下重申了他对一份新战略武器条约的渴望，同时再次重申他对美苏两国建设性交往和合作的真诚期望。^⑤但是美国官员并不急于采取进一步行动。布热津斯基相信他们已经迫使苏联采取防御姿态。通过表示支持广泛全面的军备削减，美国已经在全世界的面前取得了高姿态。“我的观点是，”布热津斯基写道，“皮球现在在苏联的半场，因此我们必须静观其变，等待作出反提议的时机。”“这是一个需要坚定立场的时刻。”卡特在一份备忘录上随手写道。^⑥

卡特顽强地坚持着他自己版本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然而他仍然希望保持美苏缓和。“我的希望是，”他在6月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写道，“能够欢迎阁下您早日来访美国，这样我们两人就可以继续追求裁军、和平、贸易和加强合作和友谊这些共同目标。”^⑦但是时局正不断催促着卡特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正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国际政坛上的动荡似乎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民主党内一些

① 苏霍德列夫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306，63—64。

② 关于万斯的观点，参见他的评论，出处同上，59—62；同时参见万斯，《艰难的抉择》，53—55。

③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158—160。

④ 关于他们承认自己因为所求过多而招致失败，参见出处同上，162—164；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100—102；卡特在米勒中心访谈中的评论；万斯，《艰难的抉择》，55。

⑤ 葛罗米柯召开的新闻发布会，1977年3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4月1日，B1—10；万斯，《艰难的抉择》，54；苏霍德列夫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140—141；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7年4月4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⑥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165；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4月1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保罗·沃恩克(Paul Warnke)和万斯致卡特，1977年4月27日，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6月7日，出处同上。

⑦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要员,比如参议员杰克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C·斯坦尼斯(John C. Stennis);军备控制问题专家例如保罗·尼兹(Paul Nitze);福特政府的前成员比如国防部长詹姆斯·R·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军方要员比如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托马斯·H·摩尔(Thomas H. Moorer)将军,都对苏联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要求卡特政府以强势的姿态与苏联进行谈判。^① 卡特未能成功掌控美国国内对苏联的观点,也未能引导非洲和中东局势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进行发展。“我们遭遇了历史的逆流。”万斯这样评价道。^②

“一个人如果想要逆历史洪流而上,他必须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高天赋和有条不紊的卓越领导力。”万斯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幕僚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Gelb)回忆说。^③ 然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的领袖都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卡特行事有条不紊,而且怀揣崇高的目标。他“努力试图完成丰功伟绩”,但是“并没有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盖尔布回忆道。^④ 虽然他努力地与第三世界不可控的局势进行着斗争,尽管他未能很好地掌控国内的能源危机,尽管他未能成功平息公众对他的奚落,卡特仍然始终保持自信。他对自己和他的上帝都信心满满,相信他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通过顽强和决心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坚信美国的生活方式远远优于对手苏联的生活方式。无论别人怎样向他讲述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他认为,只要他坚定立场,苏联终究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⑤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都上了年纪,布热津斯基告诉卡特。他们比美国更迫切

① 这种仇视情绪更多地来自参议院辩论是否应当任命保罗·沃恩克担任美国方面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小组组长。参见“卡特选择沃恩克领导军备控制署”(“Warnke Is Carter Choice for Arms Control Agency”),《美国国会季刊》,1977年2月5日,242;“尽管面临一致的反对意见,仍期望沃恩克能获得外交关系上的批准”(“Foreign Relations Approval Expected of Warnke Despite Concerted Opposition Effort”),出处同上,1977年2月12日,255;“对任命沃恩克展开辩论”(“Debate Begins on Warnke Nomination”),出处同上,1977年3月5日,405;同时参见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致布热津斯基,1977年4月22日和1977年4月27日,亨利·杰克逊文档,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西雅图,华盛顿州);杰克逊致卡特,1977年8月22日,出处同上。我非常感激乔希·博茨(Josh Botts)与我分享这些文档。

② 万斯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10—12,267,167;关于来自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同时可参考莱斯利·盖尔布和舒尔曼元帅的评论,出处同上,192,212—215,338—339;丹·考德威尔(Dan Caldwell),“缓和的终结与美国的国内政局”(“The Demise of Détente and US Domestic Politics”),收录于奥德·阿恩·韦斯塔(编),《缓和的沦陷:在卡特执政期间的苏美关系》(《The Fall of Dé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arter Years》),奥斯陆: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出版社,1997,95—117。

③ 盖尔布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71。

④ 出处同上。

⑤ 其中一些特征在米勒中心访谈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其余的一些特征会在下文中进行讨论。



地希望看到美苏缓和。从长远来看,历史的潮流将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在军事实力上两国现在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均势”,但是苏联的经济正在恶化,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实力正在逐步增长,苏联和中国的竞争持续不断。^①东欧的动荡正在加剧,并且会随着美苏缓和的发展而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对勃列日涅夫而言缓和仍然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为苏联正面临着国内经济恶化的考验。“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美国,拥有实力来极大地恶化苏联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布热津斯基在1977年6月24日给卡特的信中这样写道,“而正是对这一点的认识,最终,将勃列日涅夫带回到一种更为温和的外交政策。”^②

但是是否勃列日涅夫能够长期在位并继续主导历史潮流的进程还不得而知。1977年5月,他策划将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从政治局开除,勃列日涅夫本人再次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这一动向充分证明了他一直以来对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治斗争有着游刃有余的精明手腕。然而那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亲信都非常清楚他的健康和精力正在持续下滑,同时他的虚荣心和贪婪也在持续增长。勃列日涅夫酷爱奢华,收藏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并且不停地陶醉于他的同事们颁发给他的各种勋章和荣誉。他仍然喜欢玩多米诺骨牌、打猎和游泳。但是那个精力充沛、英俊潇洒的美男子,那个曾经以他的洋溢热情和俊美外表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给无数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伟人,现在早已是形影相吊,不复当年了。

勃列日涅夫在1974年11月再一次中风,1976年年初又复发了一次。他患有动脉硬化。他夜间入睡困难并且经常遭遇间歇性发作的神经疲惫。他为一些重大的场合积攒精力,比如接见万斯以及其他一些来访的政要,但平时他休假的天数越来越多。他对镇静剂的依赖越来越大。他每天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他的阅读量越来越小。他缺席了越来越多的会议。他说话时经常停顿。为他起草的演讲稿用的语句越来越短,同时用越来越大的字体打印成稿。他的视力和听力都在衰退。他的注意力不断衰退。他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一小部分密友和下属,比如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他们会为他遮风挡雨,同时也从

① 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对会议结论的总结”,1977年7月7日,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6月24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5月26日,1977年7月8日,出处同上;中央情报局,“东欧前景”(“Prospects for Eastern Europe”),1977年6月10日,文件箱1,冷战终结集(End of Cold War Collection),国家安全档案;中央情报局,“苏联的经济问题及前景预测”(“Soviet Economic Problems and Prospects”),1977年7月,出处同上。

这位总书记的庇护中受益匪浅。^①

勃列日涅夫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很难将精力集中在那些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上,同时他也未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他“根本就”不在乎非洲之角,多勃雷宁表示,但是他不能拒绝那些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作英勇斗争的革命主义者的请求,也不能压制那些有着独立思想的附庸国的领袖,比如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热情。他也不能浇灭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政治热情,或是抵御来自国防官员迫切希望动用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压力。国际体系中的动荡为这些军方要员创造了充满诱惑力的机遇,而勃列日涅夫未能有效地约束他们,为今后的局势埋下了他本人都未曾预料到的后果。这位年迈多病的总书记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勋章,越来越多的头衔,和远大于从前的权力,但是他左右事态发展的能力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②

附庸国、霸权国和同盟国

1977年春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对非洲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在那里他被当成英雄一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十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向非洲派遣医生、护士和军事顾问,最终在安哥拉问题上,向安哥拉派遣作战部队。^③卡斯特罗的行动也出自于他本人的信念,他相信自己同样也是这场人心之争的一部分。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殊死搏斗的他在3月前往非洲之角访问,先后会见了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mad Siad Barre),和刺杀了

① 恰佐夫,《健康与权力》,74—91,115—148;多勃雷宁,《机密》,397—398,L·勃列日涅娃,《我所遗弃的世界》,362—364;V·M·苏霍德列夫(V. M. Sukhodrev),《我的舌头——我的朋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Iazyk moy-drug moy: 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 [My Tongue — My Friend: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莫斯科阿斯特:奥林普出版社(Moscow AST: Olimp, 1999),190—346;勃列日涅夫日记片断,文件箱9,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Vadim Alekseevich Pechenev),《戈尔巴乔夫:到达权力的顶点》(*Gorbachev: k vershinam vlasti* [Gorbachev: To the Heights of Power]),莫斯科:戈斯波丁·纳罗德/费洛梅恩·切洛威卡出版社(Moscow: Gospodin Narod/Fenomen Cheloveka),1991,35—39;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15—25。

② 引用多勃雷宁的文本,请参考他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39;同时参见多勃雷宁,《机密》,404—405;阿尔巴托夫,《体制》,191—192,198—202,245—254;汤普森,《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17—34。这些总结性的言论都出自于“卡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岁月”口述历史大会上与会的苏联代表的陈述。参见“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全球竞赛”;“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美苏关系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③ 格莱杰瑟斯,《彼此冲突的使命》。

前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后掌控埃塞俄比亚的军官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

卡斯特罗试图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调停。索马里希望能够收复领土奥加登(Ogaden),这块土地在19世纪下半叶被并入埃塞俄比亚王国。西亚德想利用埃塞俄比亚内乱的机会收复国土,而门格斯图正努力想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此期间他谋杀了许多自己的敌人和朋友。在1970年代初,西亚德与苏联达成了同盟关系,从苏联获得了大量的援助,同时允许苏联在柏培拉(Berbera)建造军事基地,这是一个临靠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在装备了苏联制造的武器和坦克之后,西亚德已经做好了袭击埃塞俄比亚的准备。卡斯特罗的调停最终宣告失败,他未能规劝两国保持和平。

卡斯特罗访问的下一站是东柏林,他四月初在柏林会见了东德领导人埃里希·何内克(Erich Honecker),接着他又访问了莫斯科,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我给苏联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是埃塞俄比亚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卡斯特罗这样说道,土地正得到重新分配。革命也在城市中进行。“右翼分子”组织了抵抗,但是门格斯图逮捕并枪毙了他们。“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斯特罗接着说道,“他是一个沉默、诚实和令人信服的领袖,他对群众的力量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他看来,这个既独裁又运用谋杀手段的门格斯图比西亚德·巴雷更值得苏联进行援助,因为西亚德·巴雷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个虚伪的骗子,装出“一副社会主义的脸孔”以期能够获得苏联的援助。西亚德拒绝了卡斯特罗的调停努力,同时试图抢占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并威胁到门格斯图的革命政权。

“社会主义国家正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卡斯特罗这样告诉何内克。如果他们支持埃塞俄比亚,那么他们将失去西亚德·巴雷的友谊。如果他们不支持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塞俄比亚的革命就会失败”。

这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他表示,因为革命的热情正在传遍整个黑非洲。卡斯特罗刚刚访问过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同时对苏联和古巴专家在那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不已。“埃塞俄比亚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在非洲我们终于可以给予整个帝国主义政策以沉重打击。我们能够将非洲从美国和中国的势力范围中解放出来。……埃塞俄比亚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①

在莫斯科,卡斯特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亲爱的卡斯特罗同志,”勃列日涅夫

^① [东德] 埃里希·何内克同志与非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会谈记录,1977年4月3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说道,“所有苏联人民向你致以真挚的友谊、热爱和尊敬。”——这位古巴的革命英雄敦促苏联为门格斯图采取援助行动,苏联领导人在聆听了他的事迹之后对此表示赞成。他们表示,埃塞俄比亚“在受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经历了巨大的苦难和羞辱”,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并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①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表的讲话,与他的同事出访非洲时发表的讲话内容差不多。他们总是喜欢说,“我们苏联人民”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们身上看到“我们年轻时的影子”,他们所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国民的运动,他们为“迈向一种新生活所作的奋斗总是能够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②

作为对卡斯特罗的反复迫切恳求以及苏联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大使馆的建设的回应,克里姆林宫邀请门格斯图于1977年5月访问莫斯科。在他赴苏联之前,他关停了美国设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基地和研究中心。在莫斯科,门格斯图一如既往地宣称他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告诉勃列日涅夫,他的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一部分”。他请求苏联拨给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援。他表示埃塞俄比亚现在正面临着来自索马里的入侵,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分裂主义叛乱,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国内右翼势力的不断抵抗。^③

过去苏联对门格斯图的援助请求反应冷淡且缓慢,但是现在苏联领导人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支持,据估计总数在三亿五千万美金到四亿五千万美金左右,同时与索马里签署了一份两国相互关系与合作原则宣言。但事实上苏联对于埃塞俄比亚并没有远大的计划,也没有战略考虑。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军方要员反对苏联卷入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之中。但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苏共书记波诺马廖夫未能抵御住诱惑。他们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所换回的大量硬通货感到兴奋不已,此外在中东斋戒日战争之后苏联在埃及失势让他们蒙羞,因此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展示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他们俩“非常仓促地”就作出了决定,阿纳托利·格里布科夫(Anatori Gribkov)将军回忆道,他时任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格里布科夫将军讥笑道,只要门格斯图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一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立即就会屈从于他们的恳请。“他们希望那些国家能够

① 勃列日涅夫向卡斯特罗致敬的讲话,1977年4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4月6日,N2—3。

② 波德戈尔内在莫桑比克发表的演讲(在他被勃列日涅夫驱逐之前),1977年3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年4月1日,H2—6。

③ 苏共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统一社会党[东德]中央委员会,1977年5月1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62。



立即把他们的驴子换成梅赛德斯奔驰或者福特轿车。”^①

尽管他们作出了援助门格斯图的决定，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高领导人们重申了他们对美苏缓和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向海外输出武器和军事顾问并不会破坏美苏缓和。这与华盛顿在时机成熟时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虽然苏联的军火销售量正在上升，但是其数额仍然远远小于美国的军售。^② 对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而言，非洲之角只是一场穿插表演。他们并不希望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削弱缓和。他们喜欢说，缓和“应当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全世界人民……都应当有权享受缓和所带来的成果”^③。

卡特和他的顾问们并不相信苏联的这番说辞。卡特总统对苏联在非洲之角的行动充满了不信任，同时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残忍行径表示鄙夷。尽管卡特被告知苏联对门格斯图的援助是有限的，同时非洲之角“并非美国的战略重点地区”，但是他仍然把苏联向非洲派遣部队视为不祥的预兆。^④ 他治理国家的能力正在经受考验，布热津斯基在 1977 年 7 月 8 日给卡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所有人都在估量我们的实力。”^⑤

① 多勃雷宁，《机密》，404—405；格里布科夫的评论，“全球竞赛”，59—61；同时参见布鲁坚茨的评论，出处同上，49—51；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U]的部门主任 V·V·什雷科夫(V. V. Shlykov)的评论，收录于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与弗拉基米尔·康托洛维奇(Vladimir Kontorovich)(编)，《苏联经济体系的破坏：一位知情人的历史》(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n Insider's History)，阿蒙克，纽约州：M·E·夏普出版社(Armonk, N. Y.: M. E. Sharpe)，1998，42；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32—236；韦斯塔，《全球冷战》，253—279；祖博克，《帝国的沦陷》，第 7 章和第 8 章。

② 统计数据参见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全球军费支出与武器转让，1967—1976》，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8，9，10，149，153；同时参见奥拉赫·库珀(Orah Cooper)与卡罗尔·福加尔蒂(Carol Fogarty)，“苏联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54—1978”(“Soviet Economic and Military Aid to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54—78”)，收录于《在时代巨变之中的苏联经济》(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卷 2，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79，648—662。尽管卡特寻求减少美国的军火销售，但是布热津斯基还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数据让美国汗颜。例如，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 年 5 月 26 日，文件箱 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关于葛罗米柯对美国实行的双重标准的抗议，参见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致万斯，1977 年 12 月 12 日，文件箱 27(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45)，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引文参见波德戈尔内向穆罕默德·达乌德致敬的讲话，1977 年 4 月 12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7 年 4 月 13 日，J4；关于需要推广缓和的其他证据，参见，例如，柯西金向赫迪·努伊拉(Hedi Nourra)致敬的演讲，1977 年 4 月 4 日，出处同上，1977 年 4 月 5 日，F2；葛罗米柯在印度发表的讲话，1977 年 4 月 26 日，出处同上，1977 年 4 月 29 日，J2—3；关于葛罗米柯，参见克里斯托弗致万斯，1977 年 12 月 12 日，文件箱 27(参议院商务委员会 45)，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关于勃列日涅夫对非洲之角并不感兴趣，参见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30—239。

④ 总统回顾备忘录/国家安全委员会—21，“非洲之角”，[未标注日期]，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⑤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 年 7 月 8 日，文件箱 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然而,在一份总统时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仍然拥有机会“通过巩固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周边亲美邻国的地位,例如,苏丹和肯尼亚,以及提升我们在索马里的地位,从而扩大我们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① 布热津斯基提出建议,如果苏联邀请美国联手制止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行为,希望卡特不要与苏联人进行合作。克里姆林宫正处于“两难的窘境中”,一边是他们的旧盟友西亚德,另一边是莫斯科的新宠门格斯图,布热津斯基坚称美国应当利用苏联目前的困境。^② 华盛顿希望俄国人会“同时摔下两匹马”,国务卿万斯在8月访问北京时这样告诉中国领导人。^③ 卡特的顾问们估计门格斯图的政权可能会被扼杀,同时寄希望于苏联会像美国陷入越战那样卷入非洲之角这个泥沼,因此他们希望巩固美国在整个非洲之角地区的地位并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同时不断提醒苏联他们必须忠诚于缓和的精神。^④

1977年9月,非洲之角事态发展的前景与缓和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索马里开始进攻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的政权正变得摇摇欲坠;古巴人似乎开始变得迟疑;勃列日涅夫虽然仍在向门格斯图提供援助但是他呼吁该地区恢复和平。^⑤ 莫斯科和华盛顿似乎都希望能够扩张势力范围并扩大影响力,但在符合本国利益的同时又不希望危及合作的可能性。当苏联获得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正在秘密研发核武器的情报时,他们邀请美国一起制定应对方案。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冲突时,他们向华盛顿转发了一份“非常公平不偏袒的”公文。^⑥

-
- ① 总统回顾备忘录/国家安全委员会—21,“非洲之角”,[未标注日期],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未标注日期],文件箱1,非洲之角/特别,国家安全事务材料组,卡特图书馆;保罗·亨齐致布热津斯基,1977年8月15日和1977年12月9日,出处同上。
- ③ 万斯与黄华会谈备忘录,1977年8月23日,中国,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 ④ 政策审议委员会会议,1977年8月25日,文件箱34,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亨齐致布热津斯基,1977年12月9日,文件箱1,非洲之角/特别,国家安全事务材料组,卡特图书馆。
- ⑤ 文件参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73—83;亨齐致布热津斯基,尤其是1977年8月17日和1977年12月9日的两封信,文件箱1,非洲之角/特别,国家安全事务材料组,卡特图书馆。
- ⑥ [苏联]A·A·葛罗米柯与美国总统J·卡特的会谈纪要,1977年9月23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万斯与葛罗米柯会谈备忘录,1977年9月30日,早晨9:30,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美国国务院简报文件]“非洲”[未注明日期],是为“全球竞赛”大会准备的文件集中的一部分。比尔·匡特,时任布热津斯基的中东问题专家顾问,称苏联的提议是“非常均衡的”。参见威廉·B·匡特(William B. Quandt),《中东和平进程:1967年以来的美国外交和阿以的冲突(第3版)》(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3rd ed.),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2005,187;关于苏联期望能够与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合作,参见科尔尼延科和布鲁坚茨的评论,“美苏关系与苏联的外交政策”,53—72。



万斯对维护美苏缓和的生机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付出很大努力与葛罗米柯合作起草一份有关中东地区的联合声明。^① 10月1日，美国和苏联宣布他们希望在日内瓦重新召开一次会议的意向。苏联和美国政府将携手寻求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他们将携手敦促以色列归还所侵占的邻国国土，敦促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在合法边界内存在的权利。他们将携手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并谋求各方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②

葛罗米柯和万斯也恢复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工作。卡特总统希望苏联将核武器的数量减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框架所约定的最低数量以下。他寻求遏制苏联最为令人生畏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限制那些能够携带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与此同时，他希望能够让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携带空射巡航导弹，并且限制苏联制逆火轰炸机，美国将这一机型视为战略武器，而非苏联坚称的中程轰炸机。^③

当苏联外交部长于9月27日会晤卡特总统时，双方已经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虽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段时间双方都持合作态度。”卡特总统这样写道。他和葛罗米柯同意延长即将在10月到期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从而为完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预留时间，并着手设计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参数和框架。缓和仍然具有生命力。“我的总体评价是，”卡特在1977年11月4日给勃列日涅夫的去信中写道，“我们两国正朝着一种更为友好合作、和谐相处的双边关系发展进步。”^④

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却未能控制事态的发展。美国国内的犹太社区以及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组阁的政府都对葛罗米柯和万斯提出的建议嗤之以鼻。^⑤ 当以色列从华盛顿获得更大特权时，埃及总统安沃尔·萨达特(Anwar Sadat)决定把握先机。为了寻求打破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关系的僵局，

① 万斯，《艰难的抉择》，59—61，191—193。许多1977年9月葛罗米柯与万斯会谈的记录以及葛罗米柯与卡特交换意见的记录都已解密，见于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② 万斯致克里斯托弗，1977年10月1日，为“全球竞赛”大会准备的文件集。

③ 万斯，《艰难的抉择》，59；关于9月22日的两次会谈，一次在早晨，另一次在傍晚，参见万斯与葛罗米柯会谈备忘录，1977年9月22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关于逆火轰炸机的信息，参见扎洛加(Zaloga)，《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器之剑》(*Kremlin's Nuclear Sword*)，173—175。

④ 卡特，《坚定信念》，221—222；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7年11月4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关于背景，同时可参见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残局：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内幕》(*Endgame: The Inside Story of SALT II*)，纽约：哈珀科洛芬图书公司(Harper Colophon Books)，1979，88—132。

⑤ 匡特，《中东和平进程》，188—191；万斯的评论，“全球竞赛”，96—101。

他宣布将访问耶路撒冷, 并且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协议。“我们对萨达特的决定甚为惊讶。”万斯回忆道。^①

当卡特总统迅速开启与萨达特和贝京的合作时, 苏联方面觉得被排除在中东正上演的这一幕之外。勃列日涅夫于 12 月 16 日致信卡特: “此时此刻是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华盛顿不应将克里姆林宫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美国也不应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美苏在中东问题上仍然有合作共事的机会。^②

卡特回复说美国并未与萨达特合谋, 也并非事态急剧变化的幕后策划。卡特总统邀请克里姆林宫着手敦促一些激进的阿拉伯国家, 比如叙利亚, 停止对萨达特的攻击。为了能打消勃列日涅夫的疑虑, 卡特一再重申各方将最终走向日内瓦谈判, 而在这期间克里姆林宫绝对会扮演重要角色。^③

但是苏联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滋长。他们并不是傻子。他们准确地察觉到卡特正在违背他所做出的诺言, 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并未将苏联作为平等伙伴。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不应让苏联过多参与其中。”布热津斯基这样写道。^④

如果萨达特是中东局势的主要推动者的话, 西亚德·巴雷在非洲之角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他继续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侵略, 并且支持厄立特里亚争取独立的运动。他废除了与克里姆林宫的同盟关系, 将苏联军队逐出了设在柏培拉的军事基地, 并转而投靠西方和一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 比如沙特阿拉伯, 寻求他们的援助和支持。10 月下旬, 门格斯图秘密访问莫斯科。“革命的埃塞俄比亚,” 门格斯图哀叹道, 已经被包围, 因此迫切需要获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的支持。^⑤

苏联人不能拒绝一位革命同志。如果他们拒绝的话, 中国会乘机嘲笑他们并在该地区取得优势, 而古巴会对苏联感到非常失望, 并有可能受此影响而单独采取行动, 就像当初他们在安哥拉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制定者们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向门格斯图的军队提供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他们同

① 万斯的引文, 参见他的评论, “全球竞赛”, 94; 匡特, 《中东和平进程》, 188—191。

②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 1977 年 12 月 16 日, 文件箱 17, 普莱恩斯文档, 卡特图书馆; 关于苏联感觉自身被排除在外, 参见, 例如, 科尔尼延科、塔拉先科和布鲁坚茨的评论, “美苏关系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53—72。

③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 1977 年 12 月 21 日, 文件箱 17, 普莱恩斯文档, 卡特图书馆。

④ 布热津斯基, 《权力与准则》, 113; 同时参见舒尔曼元帅的评论,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 285; 关于苏联的愤恨情绪, 参见“全球竞赛”中的大量评论, 89—121; “美苏关系与苏联的外交政策”, 53—72。

⑤ 对会议的描述, 参见苏共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1977 年 11 月 8 日, 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 年/1997 年), 81—82。



时派遣约一千名苏联官员和军事顾问前往埃塞俄比亚，以协调埃塞俄比亚的军队调度，苏联还协助将超过一万七千名古巴作战部队和技术专家运往该地区。莫斯科的军方高官们想要和美帝国主义较一下劲，展示一下苏联强大的军事实力，前提是这种对抗不会走向失控。^①

尽管这是一次苏联实力输出能力的极大展示，但是葛罗米柯向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强调说，克里姆林宫正在试图控制这个新的附庸国。苏联不会允许埃塞俄比亚越过边境入侵索马里。葛罗米柯坚称，埃塞俄比亚作出的军事行动纯粹属于保卫本国领土。“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携手合作，这将成为美苏合作的一个优秀范例。”^②

1978年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再次致信卡特。“现在我们刚刚迈过了新年的门槛”，这是一个回顾全球趋势的绝佳时机。他对美苏双方在新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表示满意，但是他对美国计划开发的一种新核武器中子弹表示强烈不满——这种核武器的打击目的是杀伤人员并减少对周围设施的破坏。他同时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用时甚久表示惋惜，即使苏联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才满足了美国的立场。“非常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接着写道，“我们并没有看见美国方面向我们作出任何对等的让步表示。”他坚称，新年的第一要务是达成一份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然后他再一次抱怨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单边行动，呼吁美国回归到双方合作的轨道上。至于非洲之角，“苏联并没有在那里为自身寻求任何优势”，他对卡特提出的恢复该地区和平的观点表示赞同。在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索马里军队从埃塞俄比亚领土上撤军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必要的。最后，勃列日涅夫再次重申了他对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和促进东西方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的美好愿望。总体而言，新的一年的议事日程将会是艰巨的，但是他对未来并未失去信心。^③

卡特于10天后作出了回应，表达了他对美苏关系中建设性的“主导趋势”非常满意。他希望能够采取迅速行动来完成限制战略武器磋商，因为他担心美国公众会反对与苏联达成协议。他认为苏联的政治话语和行动颇具危害性；反对美国开发中子弹的宣传攻势听上去非常虚伪，因为克里姆林宫正在欧洲部署新一代的、杀伤力更为

① 数据参见韦斯塔，《全球冷战》，276；同时参见多勃雷宁，《机密》，405。

② 克里斯托弗致万斯，1977年12月12日，文件箱27，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多勃雷宁，《机密》，406。

③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8年1月12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强大的中程导弹 SS-20 系列。此外,苏联宣称被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的言论发出了不和谐音,因为美国并未放弃邀请各方聚集到日内瓦召开一次和谈会议的观点,苏联完全可以充分参与这次会议。卡特强调说,最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运用代理人战争来提升其在非洲之角的利益的行为正在制造动荡不安的局面。卡特总结说:“我坦诚地与您讨论这些棘手问题,并真诚地希望我们两国能进一步深入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①

但是当卡特面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他对美苏关系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美国政府正运作良好。”他开篇说道。“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生命中第一次没有被重大的国际危机或国内动荡所困扰,现在我们拥有一个史所罕见的无价机遇来解决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和负担。”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能源危机。“每一天我们都要花超过一亿两千万美金用以购买外国产的石油。”石油的低产量和高消费正在逐渐侵蚀国家的财政实力同时极大地助长通货膨胀。“因此今年我们国内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以能源作为核心元素,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②

在谈及了减税政策、财政稳健政策、行政改革的重要性以及一份全面能源项目之后,卡特最终谈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此持乐观态度。美国人民是强大的,爱好和平的,充满活力的。“我们在外交政策上已经恢复了道德基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的特征,其核心在于我们坚持致力于维护人权。”他的这届政府追求安全、和平和经济发展。如果美国必须同苏联竞争的话,美国拥有足够的竞争实力,但是美国更倾向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与苏联进行合作。“我们在谈判时充满了自信,”他表示,“并不仓促行事,谨慎地作决定,来缓解我们彼此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他着眼于更为长久的一些价值取向。近期对印度、埃及、波兰、法国和比利时的访问“使我更加明确了我们国家政策的目的所在:确保经济公正,推动人权发展,以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冲突,以及在我们伟大的民主体制下倡导我们的全世界人民都应享有自由和尊严这一永恒的信念”。^③

卡特总统仍然在寻求超越冷战,但是国内外都存在着各种阻碍因素。汇率波动和财政紊乱正导致“越来越大的忧虑”,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写道,不只是西德,所有的北约盟国都存在这样的担忧。这些问题并不是

①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8年1月25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② 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1978年1月19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90—91ff。

③ 出处同上,95,97。



“暂时的”——它们都源自于能源短缺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调高石油价格这两大原因——同时它们预示着“一场范围更广泛的危机即将到来”。全世界的经济体系正处于危急关头，施密特警告说。“这赋予能源问题以极为关键的政治意义。”^①

布热津斯基敦促卡特总统必须更为努力地巩固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北约盟国对华沙条约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 SS-20 系列导弹的部署充满了忧虑，同时他们担心美国会牺牲他们的利益与克里姆林宫达成协议。“西欧的政治动向正朝着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方向发展。”布热津斯基写道。意大利的温和派正在迅速与意大利共产党达成协议；法国的左翼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可能会赢得即将到来的大选；西德的政策正显露出中立的倾向。“总的来说，”布热津斯基写道，在 3 月底“我们能够看见共产党在欧洲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此后我们将在国内遭遇重大的对抗性反应，而我们这届政府将因为太晚采取行动和不作为而经受猛烈的批评。”^②

布热津斯基不厌其烦地警告卡特，美国国内对他的外交政策目标的支持正在衰退。人们普遍认为卡特“很软弱”，他非常直率地写道。保守派抨击卡特希望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试图治愈越南战争所留下的创痛的努力。他们嘲笑卡特取消了一些重要的武器开发项目，比如 B-1 轰炸机，以及削减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他们蔑视他与巴拿马就运河使用达成协议进行谈判，并向红色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以及与克里姆林宫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卡特的政治顾问们附和着布热津斯基的说法向总统强调，想要让国会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将会是“极其困难的”。^③

卡特寻求援手。他希望能够维持美苏缓和，并试图寻求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和南斯拉夫总统布罗兹·铁托 (Broz Tito) 将军的支持。“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让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在给铁托的信中这样写道。“正如您所知，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推动缓和进程，并在军备控制等重要领域与苏联合作来推动我们双方共有目标的实现。如果苏联在埃塞俄比亚所采取的行动让追求缓和这一目标变得更为艰难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同时也会使减缓紧张局势以及为东西方关系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的进

① 施密特致卡特，1977 年 12 月 22 日，文件箱 6，联邦德国(3)，国家安全档案，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 年 2 月 9 日，文件箱 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 年 7 月 8 日，出处同上。

③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 年 11 月 18 日，出处同上；汉密尔顿·乔丹和弗兰克·摩尔 (Frank Moore) 致卡特，1977 年 11 月 17 日，文件箱 37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1977)，陆军参谋长文档，卡特图书馆。

程变得更为复杂化。”^①

并不是所有的顾问都乐意看到卡特总统将缓和与非洲之角联系在一起。1978年2月底和3月初,在一系列的高端会议上,国务卿万斯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兹比格,你昨天和总统今天”都建议把新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与苏联在非洲的表现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他告诫道,“这样会使我们最终失去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如果我们未能在卡特总统的第一个四年任期内达成一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话,那么这将成为他政治生涯记录上永远的一个污点。”^②

布热津斯基坚决地捍卫自己的立场。一万名古巴士兵已经进驻非洲之角,而苏联人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的价值据估计将达十亿美元。“应当让苏联意识到,他们正在恶化整个局势。”他们利用地区冲突“来达到更大的目标。他们借此恐吓该地区的更多国家,同时为今后卷入世界其他地区的纷争开创了一个坏的先例。……如果我们听任苏联向国外派遣远征军队以对苏联有利的方式来解决领土纠纷的话,那么我们今后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布热津斯基希望美国采取行动。他希望美国向红海派遣一支海军特遣部队来传递出一个政治信号,向美国国内的批评家和海外的盟友们表明美国这次是准备动真格的。盟国和友国,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密切地关注着事态发展的动向。应当让他们看到美国绝不会允许苏联浑水摸鱼。华盛顿必须提高苏联和古巴介入非洲事务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调动该地区的力量行动起来,让苏联和古巴尝一尝浴血的滋味。”^③

正如副总统蒙代尔指出的那样,就埃塞俄比亚的局势而言,苏联是在帮助一个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绝大多数的黑非洲国家希望看到索马里的侵略被最终击退。事实上,布热津斯基知道没有人同情索马里。^④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不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无异于给克里姆林宫开了一盏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绿灯。古巴已经放出信号将干预罗得西亚,当地的黑非洲民族主义团体正竞相尝试颠覆由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所领导的白人少数派政府。如果卡斯特罗向罗得西亚派兵,正如他之前向安

① 卡特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埃斯坦,1978年1月27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卡特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草稿],[未标注日期],文件箱1,非洲之角/特别,国家安全事务材料组,卡特图书馆。

②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非洲之角问题召开的会议,1978年3月2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出处同上。

④ 关于蒙代尔的观点,参见出处同上;关于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的观点,参见亨齐致布热津斯基,1978年3月10日和16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派兵那样，他将再次取得道德上的优势，坚称他是在与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作斗争。尽管卡特的不少顾问都要求推迟决策并且争论不断，布热津斯基要求卡特立即采取行动。^①

“外界已经形成了一种印象，”布热津斯基警告总统说，“本届政府（以及您本人）太过倚重于理性思考，表现得太过于无动于衷。”这是非常不幸的。“一位总统不仅要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尊敬；他同时必须令人敬畏。”布热津斯基建议道，美国的对手们需要担心“在某些时刻，我们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就带着愤怒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

你应该选择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并故意选择带有一定程度的愤怒，甚至是粗暴态度来采取行动，这样的设计将会收到震慑对手的效果。……

关键点在于清晰地向对手表明在某些问题上妨碍美国就意味着挑起与美国的战斗，而作为一名总统，你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且愿意，直接给对手以当头一棒，并且坚决地把他打倒在地。如果我们不尽快对某个对手这么说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贝京、勃列日涅夫、沃斯特、施密特、卡斯特罗、卡扎非以及一大堆其他人嘲弄和藐视我们。^②

布热津斯基固执己见。其他一些分析师声称苏联人正在进行政治投机，他对此表示反对。他看出了苏联的预谋。苏联的行动预示着一个阻断输送石油管道的阴谋，而美国、西欧和日本都完全依赖于这条石油生命线。如果美国不采取强有力的对策，盟国、友国和中立国都会丧失对美国决策的信心；友国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可能会疏远与华盛顿的关系。“如果苏联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会勇于对抗他们的话，你只会在今后的岁月中发现局势会变得越来越艰难。”^③

卡特在兹比格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上草草写道：“我非常担忧，但是我们绝不能做得太过头。”^④他在等待时机。他正全力争取国会通过巴拿马运河协议。“现在很难

①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非洲之角问题召开的会议，1978年3月2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2月24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3月3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多勃雷宁，《机密》，406。

④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3月3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让我聚焦于巴拿马以外的事情。”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①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只是他众多议程中的一项,此刻并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他并未发动一场新的冷战,对缓和的渴望也不是很迫切。

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拖延和对非洲之角事态的吹毛求疵激怒了苏联。勃列日涅夫非常希望能够取得进展。2月27日他致信卡特,再次强调达成一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应当成为双方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他重申了对美国开发中子弹的打算的忧虑,同时对苏联在名义上被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表示不满。“同样让我们非常费解的”,他说,是美国宣称苏联正在非洲之角谋求单边优势。勃列日涅夫坚称,苏联的政策“唯一目标是恢复该地区的正义与和平。……如果索马里将军队撤出埃塞俄比亚,……那么冲突的根源就可以得到消除”。他总结道,我谈到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引起争论”,而是因为“在美苏关系中采取更为务实的建设性措施已经变得非常紧迫了”。^②

多勃雷宁大使向万斯国务卿重申了所有这些要点。莫斯科领导层对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感到非常不安。布热津斯基的“波兰裔背景使他抱有非常强烈的反苏情绪。”多勃雷宁告诉哈里曼。^③ 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高官们并未推行任何宏大的计划,只是作为一个大国拓展其应有的战略领域和外交影响力,而非策划扩张,寻求对抗,或操纵门格斯图。在所有的盟友中,苏联官员承认门格斯图不仅是最难控制的,同时他的残忍也是令人发指的。他们不会允许他使用苏联的军事装备越过边境去侵略索马里。他们同时试图规劝他接受厄立特里亚的独立。甚至古巴都在努力遏制,而非鼓动,门格斯图的野心。^④

1978年3月16日在哈瓦那举行的一次秘密会面中,古巴副总统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兹(Carlos Rafael Rodriguez)向卡内基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托马斯·L·休斯(Thomas L. Hughes)解释古巴的观点。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局长的休斯向古巴传递了卡特总统的非官方讯息,对苏联和古巴在非洲所采取的行动深表失望并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与卡特政府让冷战远离非洲并同古巴恢复正常双边关系的期望是相互冲突的。

罗德里格兹现在是古巴统治集团中的三号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菲德尔和他的胞

① 卡特,《坚定信念》,171。

②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8年2月27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③ 哈里曼与多勃雷宁会谈备忘录,1978年3月14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④ 多勃雷宁,《机密》,405—408;同时可参考苏联官员与东德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84—90;韦斯塔,《全球冷战》,280—281。



弟,保罗·卡斯特罗。他专注地听取了休斯所转达的讯息。他“思维敏捷,智慧过人,友好谦和,时不时流露出机智和魅力,”休斯写道,“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一个完美的政治理论家和国际战略家,正如他对自己(和别人对他)的评价那样。”罗德里格兹系统地列举了他所掌握的美国夸大古巴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所扮演的角色的程度。他详细地介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与西亚德和门格斯图的交往。西亚德违背了他所做出的不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承诺,然后试图以古巴干预为由来为他的侵略行径辩护和正名。“当西亚德声称有两万名古巴士兵在埃塞俄比亚时,事实上我们仅派遣了300名专家。”古巴并不谋求激化非洲的矛盾,罗德里格兹坚称。他们试图约束门格斯图并敦促他与厄立特里亚达成和解。“我们在非洲所参与的事务经常违背我们的意愿,我们在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们将使我们整体的政治目标变得复杂化。我们并未煽动非洲。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我们是作为温和保守派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请求作出了回应,协助他们守卫国境,保持已确定的现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捍卫原则。”

罗德里格兹表示,卡斯特罗坚信他肩负着革命的义务。但是他并不希望制造混乱。他希望能够与美国恢复正常化的双边关系。但是他也不不得不对他所不能控制的形势作出反应,响应地区革命力量的动向,并对非洲推翻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作出回应。罗德里格兹暗示,美国政府并不想面对事实。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断地收到来自非洲各国政府首脑请求支援的要求,以及来自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作着不懈斗争的革命运动组织要求援助的请求。“我们回绝了很多请求,虽然这样的决定对我们而言非常艰难。”

罗德里格兹表示,古巴并不希望进一步干预非洲事务,并且希望能够实现与华盛顿的关系缓和。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他承认这一点。“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利益上的共同点会促成国际局势的缓和。”但是如果白人种族主义者进攻莫桑比克或赞比亚,那么古巴会接到“非洲所有进步势力……要求古巴提供军事支援的请求。时代正在变化。1977年3月,也就是一年前,我们绝不会想到我们会进驻埃塞俄比亚。我们绝对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发展”。谁都无法预料将来的局势将如何发展。历史的自然进程是谁都无法阻止的。^①

^① 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兹与托马斯·L·休斯之间的会谈,1978年3月16日,文件箱10,地理文档,中国,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关于古巴的政策,参见皮耶罗·格莱杰瑟斯,“莫斯科的代理人?古巴和非洲”(“Moscow's Proxy? Cuba and Africa”),《冷战研究杂志》8(2006年秋):98—146。

尽管卡特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是他警告克里姆林宫不要利用国际局势。^① 3月17日,在他的两份巴拿马条约中的第一份在国会艰难地得到通过之后的第一天,他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讲。“我们的潜在对手现在正集结起大规模的军队,并装备有数量巨大的常规武器——坦克、空军、步兵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他警告说。“这些军队可用于政治勒索,同时能够威胁到我们的核心利益,除非我们和盟友国一起壮大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常规力量与之进行抗衡。”克里姆林宫正在显露出一种运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干预地区冲突的“不祥倾向”。美国不得不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提升威慑能力,并扩大自身的战略势力范围。卡特表示,美国需要能够迅速部署在中东地区、印度洋和波斯湾的部队。“和我们的先辈们一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些有能力摧毁自由的人更多地因为知道我们这些珍视和平的人非常强大而有所收敛,而不是因为他们对自由怀有崇敬之心。”^②

这张美国政坛上的新面孔的论调和他的前任们听上去并无差别。他仍然更倾向于同苏联合作而非竞争,但是他需要审慎行事。事实上,他不得不小心谨慎,鉴于克里姆林宫的附庸国正变得胆大妄为,同时也因为美国国内的反苏情绪日益高涨,同时他也收到了来自盟国的请求和友国的担忧。

卡特承认,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质疑声比比皆是。“不少发展中国家质问,在摆脱贫困的斗争过程中是否不应抛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自由选择政府这些理念。而工业化国家则质问,是否民主就意味着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充斥着这种疯狂变化的速度。”^③

尽管外界的质疑声铺天盖地,但是卡特并非轻易绝望的人。他表示,美国人必须“公开宣布我们对民主社会价值观的坚定信念”。自由将赋予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实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潜能”的能力。1978年1月4日他在巴黎所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民主“不仅仅是对与错的问题。它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社会体制。它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有效组织社会的最有效的方式”。^④ 根据他的理解,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无畏地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同时通过不懈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⑤。

① 万斯和舒尔曼的评论,收录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12,246—247;舒尔曼的评论,收录于“全球竞赛”,31—32。

② 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发表的演讲,1978年3月17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529—535。

③ 在法国巴黎会议大厦商廊发表的演讲,1978年1月4日,出处同上,22。

④ 出处同上。

⑤ 在北约议会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言论的书面记录,1978年1月6日,出处同上,36。



为了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他决定尝试一些新方法。1978年3月16日，卡特告知国务卿万斯和副总统蒙代尔，他将委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出访北京，会晤毛泽东的继承者们。

中国牌

1978年3月2日在卡特的顾问们之间进行的一次非常激烈的有关埃塞俄比亚的讨论过程中，国防部长布朗突然插话：“我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想法。中国人并不关心[谁才是]侵略者。我们为何不同中国走到一起，……并且签署一份有关非洲之角的联合声明，同时附加一份声明表示我们两国今后将会就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其他领域进行协商？这样做一定会引起苏联的注意。”

万斯表示反对。“这样的确会引起苏联的注意，但是我们正处在濒临与苏联交恶边缘的关键点上，如果一旦我们与苏联关系恶化，可能需要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修复两国关系，或许很多年之后都无法弥补。”因此他警告说，我们必须“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仔细考虑清楚。^①

然而布热津斯基不断催促卡特迈出这一步。从一开始，他就坚信美国和中国在“对抗苏联上有着平行的战略利益”，而这将使双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伙伴。他在1978年4月21日的一份特别尖锐的周评中向卡特提及：“过去我们未能用好中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②当然，卡特自从上任伊始就开始考虑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他曾于1977年8月派万斯访问中国试探恢复邦交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方面坚决表示美国在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必须先切断与台湾的关系，但是卡特知道这个要求会在国内招致尖锐批评，并危及到巴拿马运河条约在国会是否能够通过。因此，他把与中国建交先搁置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美苏缓和是他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巴拿马运河协议也是。^③

但是在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立法胜利并得到了国会对巴拿马运河协议中的第一

①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非洲之角问题召开的会议，1978年3月2日，文件箱28，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4月21日，文件箱4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7年2月4日，中国，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迈克尔·奥克森贝格(Michael Oksenberg)致布热津斯基，1977年2月4日，出处同上。

③ 卡特，《坚定信念》，186—193；万斯，《艰难的抉择》，45—46，75—83。1977年8月万斯与中国官员会谈备忘录可以在中国，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中找到。

份协议的批准之后,在面临着公众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失望情绪之时,卡特决定是再一次尝试与中国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和万斯一样,他并不希望因为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而损害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希望通过与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来使苏联变得更容易对付,同时也将美国置于一个能与苏联更有效地在第三世界竞争的有利地位。“我们一致同意,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协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战略武器谈判。”他在日记中写道。万斯对此表示同意。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将会“增强我们确保签署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实力”。^①

万斯并不希望卡特指派布热津斯基作为出访北京的特使,但是这位国家安全顾问说服总统,表示他是达成这次使命的不二人选。布热津斯基与卡特交换了意见,然后起草了他自己的指令,卡特详细地审阅了这些指令并署上了他自己的姓名。卡特表示,布热津斯基的这次出访并非出于战术考虑。“美国和中国……拥有相似的、长期的战略考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致反对任何一个国家推行全球或地区霸权主义。”^②

布热津斯基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出访中国。他终于击败了万斯,现在终于有机会与基辛格在知名度和个人荣誉上一较高下,因为在长达20年的双方互不承认之后,他现在握有重新建立与中国的正常化外交关系的机会。“中国在1972年的开放是非常大胆的举措,在地缘政治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布热津斯基写道,“我决心将这一仍然孱弱的美中关系成功地转化为更为持久更为广泛的外交关系。”^③

1978年5月20日至22日,布热津斯基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国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布热津斯基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他“虽然身形非常矮小,但是作风却非常大胆”。“足智多谋,思维敏捷,机敏过人,”邓小平“有着非常快的领悟能力,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强硬,而且非常直率”。他说得要比布热津斯基少得多,但总是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要点,这正是布热津斯基所期待的。“关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邓小平强调,“恢复邦交正常化应当是最为重要的议题。”美国必须再次保证遵守基辛格所作出的承诺,公开声明只有一个中国,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废止台美防御协议,并且终止对台军售。中国不会像美国希望

① 卡特,《坚定信念》,194;万斯,《艰难的抉择》,116。

② 卡特致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17日,“全球竞赛”文档集;关于背景,参见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202—209。

③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213,209。



的那样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并坚持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然而，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发表一份单边声明。邓小平表示，要达成这些协议并非难事。现在就由卡特总统来决定是否真心希望采取必要步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一旦双方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很乐意接受邀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合作“对付北极熊”。邓小平嘲笑美国试图缓和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他蔑视缓和。“苏联的战略是固定不变的，将来也很难改变。只要任何地方有空子可钻，他们一定会进行尝试。”他直截了当地说道，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不够强硬”。

“卡特总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保证道，“他行事果断，喜欢接受挑战，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充满了后来居上的例子。”现在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国拥有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但是布热津斯基并不想过多地纠缠于邦交正常化的细节或者台湾的前途。他更喜欢聚焦于宏观的政策。他为美国的缓和政策辩护，称其为坚定务实的：

美苏关系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以竞争为基调，在某些领域甚至会呈敌对关系，但是在有些领域还是存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这可能源自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出于限制或约束核战争危险这一共同需求。因此，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必须把持续的政治竞争与在特定场合进行合作或和解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很不幸的是，这些偶尔的合作或和解却被有些人误认为是美苏竞赛的终结。

布热津斯基接着说道，幸运的是，苏联最近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正在增强一些美国官员在国内的影响力，他们坚持认为“苏联的目标从本质上来说是进攻性的……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抵制。这使我想到了实现中美之间更为实际的合作这一问题”^①。

次日，即5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告诉布热津斯基，美国“不应把中国当成为改善同苏联关系而布下的一颗棋子。美方应当持一个更为长期的战略观点。”布热津斯基向他保证美国的确拥有战略远见，并且他知道苏联从根本上对美国持敌视态度。他希望能够讨论美国和中国如何在经贸、军事、科技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当布热津斯基意识到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愿意深入就细节进行协商

^① 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1978年5月21日[标注的日期为1978年5月25日]，中国，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时,他只是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重申:“卡特总统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将观察你们所作出的实际行动。”华国锋反驳道。^①

在5月20日晚上的第一场正式欢迎晚宴上,布热津斯基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的祝酒辞很好地反映出这次磋商的氛围。黄华表示:

[尽管中国和美国]拥有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尽管我们两国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是我们两国对当今国际局势中的若干问题的确持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今日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矛盾,动荡不安和急剧变化是当今国际局势的两大标志。对霸权的争夺是导致全球动荡的主要根源。[原文如此]社会帝国主义的阴影可以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所有动荡和混乱中找到。……以恐吓和威胁为手段的霸权主义,是纸老虎。

在感谢了中国人民的热情款待之后,布热津斯基回应道:

我们两国社会植根于不同的传统,并基于对人性和政府作用的不同观点之上。但是,一个人并不需要先与你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尊重你们的文明、历史和捍卫祖国,发展祖国,并增进你们国民的福祉的坚定决心。

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的赞赏和友谊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中的一部分。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我们的国民有着多样的出身,因此我们自然欢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卡特总统一再表达了他的坚定信念: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秩序能够最好地表达人类多样化的理想、传统、文化和信仰。

我们认可——并且分享——中国抵御任何国家寻求全球或地区霸权企图的决心。……

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区,美国和中国都能为和平以及阻止帝国主义的企图做出应有的贡献。……

让我们携起手来,我们一定能够推动实现全人类对尊严、自尊、自由、体面生活和享受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果实的共同理想。^②

① 布热津斯基与华国锋会谈备忘录,1978年5月22日,中国,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② 祝酒辞可以在文件箱9,中国,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中找到。



布热津斯基从中国返回时心情非常愉悦。卡特热情地祝贺了他，但是同时也告诫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说他已经被中国人诱导了。卡特的确希望恢复与北京的邦交正常化，但是他并不愿意搁置缓和政策。当布热津斯基在一系列的访谈中表露出他对克里姆林宫的不信任时，卡特对他表示不满。总统对我微笑——那是一种苦笑，布热津斯基回忆道，然后卡特说道，“我欣赏你，但是我的内心正备受煎熬。”“你不仅仅是一位教授，你是我的代言人，”卡特继续说道，“可是我认为你的一些言论太过火了。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苏联人头上。你声称他们正在全球推行一场尖酸刻薄的政治宣传攻势，企图包围和渗透中东地区，苏联还在中国边境部署军队。所有这些言论都有那么一点点过火。”^①

卡特告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说，他们应当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与中国达成邦交正常化协议，同时也应当继续推进令人难以捉摸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② 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上所发表的一次重要演讲中，他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为，军事力量集结，以及利用非洲动荡局面的企图。但是他同时也作出了愿意同苏联合作的姿态。“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使苏联认识到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好处，以及他们为破坏性行为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③当媒体批评总统所传递的讯息反映了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的较量时，卡特试图在6月26日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澄清他的观点：

我们希望能够同苏联成为朋友。我们希望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全面禁止核试验、促进双边贸易，以及推进双方更好沟通等诸多问题上与苏联取得迅速进展。然而苏联人采取的一些行动引起了我们的深切忧虑。苏联国内的人权问题是对赫尔辛基协定的公然违背，他们与古巴一起对非洲进行了入侵。……但是我深信我们与苏联的深层关系是稳定的，勃列日涅夫先生同我一样也希望世界和平并希望改善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④

5月底，卡特和万斯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葛罗米柯，7月中旬万斯在日内瓦再一次会见了葛罗米柯。这些会谈充斥着态度强硬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直接指

①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220—221。

② 卡特，《坚定信念》，193—194。

③ 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978年6月7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1052—1057，引自1053。

④ 总统新闻发布会，1978年6月26日，出处同上，1180。



控,然而双方都显露出对消除彼此分歧并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强烈渴望。万斯告诉葛罗米柯,苏联正在非洲煽风点火。葛罗米柯义愤填膺地回绝了这种说法。他坚称,苏联并未干涉罗得西亚、纳米比亚或扎伊尔的内政。苏联的确在意识形态上对非洲产生了影响。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多年来苏联都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由于气愤而一时失去自制,葛罗米柯甚至否认苏联有介入埃塞俄比亚的行动。“非洲并不存在所谓的拿破仑式苏联。”他这样告诉卡特。苏联也未谋求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些都只是苏联所期望看到的安全局势,和美国的做法并无二致。当万斯再次重申美国政府期望实现和平与缓及时,葛罗米柯要求美方作出实际行动,而非停留在空谈上。^①

除了苏联在非洲的军事行动和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斡旋之外,还有两件事拖延了美苏两国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对美国重提人权问题表示强烈不满,此外他们痛恨美国打中国牌。7月21日,卡特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今天怀着全世界都感同身受的悲伤就苏联对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判刑发表评论。”夏兰斯基,一位俄国犹太人,被苏联官方指控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他被判入狱三年然后在劳改营劳动改造十年,苏联方面声称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来煽动持不同政见者,鼓励犹太人从苏联向海外移民,并鼓动那些移民离境申请被拒的俄国犹太人寻衅滋事。^②“这件事让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卡特表示,“居然在20世纪下半叶,仍然会有人因为主张自身的基本人权而被宣判入狱。”^③当卡特总统向葛罗米柯当面提及夏兰斯基的案例时,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狂怒情绪。“我从未见过葛罗米柯像那一刻那样如此盛怒。我一辈子都未曾见过。”多勃雷宁回忆道。这位苏联驻美大使表示,葛罗米柯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一位能力卓越的外交家,平时非常自制,严于律己,偶尔还会显露出一些讽世的智慧。但是在这个场合,他是愤怒到极点的。他大声地向多勃雷宁抱怨道,卡特究竟为什么要纠缠于所谓的人权问题,而不

① 葛罗米柯与卡特会谈备忘录,1978年5月27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葛罗米柯与万斯会谈备忘录,1978年5月31日,出处同上;[苏联]A·A·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C·万斯的会谈纪要,1978年5月31日,出处同上;万斯与葛罗米柯会谈备忘录,1978年7月12日和13日,出处同上;[苏联]A·A·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C·万斯协商的会谈纪要,1978年7月12日和13日,出处同上。引文出自第33和37页的5月27日会谈。

② 关于政治局讨论夏兰斯基问题,参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78年6月22日,READD,国家安全档案(可以在国家安全档案网站上访问到该条资料);关于夏兰斯基,同时可以参见鲁宾斯坦,《苏联持不同政见者》,245—248。

③ 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宣判陈述,1978年7月14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1281。



讨论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①

国内和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发起了苏联政府未曾预料到的要求苏联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的呼声,苏联政府试图镇压这场运动。《赫尔辛基宣言》很快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倡导自由和民族自决人士中间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知识分子和“布拉格之春”的前支持者组成了“七七宪章”运动,并且呼吁政府尊重《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 在波兰,工人自卫委员会和劳工保护委员会(KOR)对食物价格上涨提出抗议,迫切要求得到更多的组织权,并强烈要求增发工资。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面对俄罗斯的主导地位,正努力想要恢复他们在文化上和种族上的独立性。苏联政府希望在不动用广泛压迫的前提下挫败这些团体。他们逮捕了这些团体的核心领导人,并深刻反感美国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表示同情的行为。②

美国在对苏联逮捕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却无视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了迫害,因此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人的立场是非常虚伪的——谴责莫斯科的同时却偏袒北京。

然而,美国恢复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并未受到阻碍。葛罗米柯警告卡特和万斯不要玩一场“肮脏的游戏”,不要和中国合谋反对苏联。③ 但是布热津斯基不断推动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经常明目张胆地将需要对此保持知情的国务院官员排除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210;苏联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美国打中国牌的愤怒,同时可参见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里希·何内克与L·I·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会谈记录,1978年7月25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22—123。

* 译者注:“七七宪章”运动是1977年1月1日由“布拉格之春”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的哈耶克、民主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克里格尔、捷共中央书记姆里纳尔等人建立的政治反对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提出保障人权、支持改革、谴责苏军入侵等政治主张,遭到捷政府的镇压。1989年该组织发起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

《赫尔辛基宣言》全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国家间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由3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参加,1973—1975年间先后举行三个阶段的会议。第三阶段会议于197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在赫尔辛基举行,35国领导人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宣言》)。宣言承认战后欧洲各国边界不可侵犯,但可以和平手段通过协议改变;责成签字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经济、科技和环境方面进行合作。宣言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各方没有实质性约束力。

② 阿列克谢耶娃,《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鲁宾斯坦,《苏联持不同政见者》,213—270。

③ [苏联]A·A·葛罗米柯与美国总统J·卡特会谈纪要,1978年9月23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在外，并规避排挤万斯。万斯则希望与中国所取得的进展必须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齐头并进。^①

布热津斯基察觉到了苏联对美中恢复外交努力的反感，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动摇。中国人“总是偏向于一边，这次他们向着美国了，”他于1978年9月1日告知卡特总统，“中国人希望这样做能够强化美苏缓和的局限性。……这对苏联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再次重申，美国能够收获“有利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会。^②

当卡特总统还在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于在戴维营调停梅纳赫姆·贝京与安沃尔·萨达特并敦促双方达成协议时，布热津斯基从未将注意力的焦点从美国与苏联的战略竞争上移开过。他援引情报部门给出的苏联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的报告，同时严厉批评国务院泄露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情报，担心有关政策将使中国重拾对立态度。布热津斯基同时对伊朗所出现的动荡以及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保持警惕，并且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努力推进与中国关系的进展。卡特总统试图降低他的这种热忱。在卡特看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拔高”中国议题了。但是，布热津斯基并不放弃，并且故意在万斯出访中东地区并准备同葛罗米柯就限制战略武器开启新一轮谈判之时就达成了与中国的最终协议。^③

12月15日，布热津斯基通知多勃雷宁大使，华盛顿和北京即将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且邓小平将于次年1月访问美国。多勃雷宁“看上去完全惊呆了，”布热津斯基事后回忆道，“他的脸色变得灰白，并且惊讶得合不拢嘴。”事实上，多勃雷宁并不是吃惊，而是愤怒。而在日内瓦与万斯会见的葛罗米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为愤怒。“那可以称得上是极端狂暴的愤怒。”万斯的苏联问题专家舒尔曼元帅回忆道。^④

与中国开启外交往来发生之前不久，卡特在戴维营成功地在贝京和萨达特之间

① 派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一道长城：一份研究史》(*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纽约: 百年基础图书公司(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 229—285; 詹姆斯·曼(James Mann),《关于颜面：美国与中国耐人寻味的双边关系，从尼克松到克林顿》(*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纽约: 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社, 1999, 81—102。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8年9月1日, 文件箱41, 布热津斯基集, 卡特图书馆。

③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8年10月6日, 文件箱41, 布热津斯基集, 卡特图书馆; 关于卡特的评价, 参见他在布热津斯基1978年10月13日致卡特的信件的页边上所作的批注, 出处同上;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8年12月2日, 1979年1月12日, 文件箱42, 出处同上; 泰勒,《六位美国总统与中国》, 259—275。

④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 232; 多勃雷宁的评论,“全球竞赛”, 131—132; 舒尔曼的评论, 出处同上, 150。



调停,并促使双方达成了令世人震惊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从西奈撤军,以交换埃及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这两项决策给美国的政策制定圈子注入了一股乐观主义的精神——尽管国内的通货膨胀仍然在愈演愈烈,道德败坏现象日趋严重,而非洲和亚洲仍处于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我相信,随着我们迈入1979年,”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的信中写道,“确切地说,你现在握有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来开始塑造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美国将在这个新体系中扮演占支配地位的协调者角色,即使美国已经不再是最强大的超级大国。”^①

布热津斯基为邓小平1979年1月历史性地访问华盛顿作了周密详尽的安排。在他和万斯递交给卡特总统的摘要报告中,他们详尽地阐述了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尊重多样性和合作抵抗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与他们在北京的新伙伴建立经贸联系,加强科技交流、技术转让和军火销售。如果苏联领导人希望参与建设这个国际新秩序,布热津斯基声明,他们决不会被排除在外。但这将是一个为美国意愿服务的世界新秩序,而不是为苏联服务。^②

卡特于1979年1月2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充满着布热津斯基的乐观主义,而非美国民众的普遍悲观情绪。我们的确面临着不少问题,这是肯定的——能源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努力,灵活的私有产业和财政上保持谨慎且不越权的政府得到解决。“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体制,”卡特总统自豪地宣布,“让我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赋予经济自行发展的机遇。”他坚称,美国国民的信心会再次增长。我们的国家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仍然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并不仅仅依靠军事实力”。全世界人民都提出了新要求、新需求和新期望。“对公正和人权的要求将会成为未来的潮流。”两个超级大国都不能支配全世界,但是双方的价值观上的竞争会一直存在,而美国将获得最终的胜利。“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代表的理念,将对全世界拥有永恒的如磁石般的号召力。”^③

卡特并未放弃美苏缓和。在一份私人讯息中,他试图安慰勃列日涅夫说,美国恢复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推动世界和平进程。……我们美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12月28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1月24日和26日],文件箱9,中国,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关于与邓小平会谈的目的,参见文件箱9中的文档。

③ 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1979年1月23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03—109;向国会发布的年度国情咨文,1979年1月25日,出处同上,163。



国政府最为优先考虑的就是加强我们美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①。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重申:“我们所寻求的国际合作的新基础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国家。与苏联的合作符合世界和平进程,因为在这样一个核武器时代,世界和平进程必须包括所有的超级大国——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核武器。”^②当一位记者指出“勃列日涅夫已经上了年纪,视力也大不如前了”,并询问如果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从政坛上引退的话,美国会如何应对。卡特回答说:“我确信,我们同苏联之间的关系会在今后的两年中得到改善。”^③

勃列日涅夫同样也未曾放弃希望。1978年12月13日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来访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即使当时他的身体尚未康复。他读了事先为他准备好的稿子,偶尔会抬起眼来作几句即兴发言。他坚称,苏联并未谋求军事上的优势,但是美国并不适应与苏联的均势状态,并且希望重新确立自身的支配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不会给美苏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带来额外的安全,搞军备竞赛是以牺牲双方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勃列日涅夫即席地否认美国对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煽动动荡局面的指控;这种指控是非常荒谬的。当哈里曼不断地表达着良好的意愿时,勃列日涅夫显然非常感动。他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他向哈里曼一再重申他希望改进与美国的关系。一旦双方达成了新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迫切地期待着与卡特再次会晤。^④

面对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同志们,他说得更为直白,但是所传达的讯息却是一致的。他对卡特期望终止军备竞赛和限制新武器的开发项目的要求视而不见,比如B-1轰炸机,勃列日涅夫表示美国人现在正无法容忍苏联在战略上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华盛顿的高官们很难容忍美苏的均势。他们希望推翻现有的力量对比格局,并“把他们的意志[以及]他们的行为模式强加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他们斥巨资打造现代化的军武库,并谋求开发新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诡计多端地运用经济杠杆,企图密谋割裂华沙条约组织的内部团结。

勃列日涅夫表示,资本主义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者面对能源短缺、失业问题和急速增长的通货膨胀束手无策。当他们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势

①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8年12月14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② 演说,1979年1月23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07。

③ 新闻发布会,1978年11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2045;新闻发布会,1979年1月26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70。

④ 哈里曼致万斯,1978年12月13日,苏联,直立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力范围被逐步缩小时,他们气愤得几乎哽咽。老挝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变,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正在进行革命,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正在逐步发展壮大,而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政权已经开始崩塌。而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动荡局势正在引起他们更大的紧张情绪。环顾全球局势,帝国主义者已经看到他们即将灭亡的证据,正如他们从1917年以来所见识的那样。而他们居然声称是莫斯科在煽动混乱局面。他们拒绝承认他们的社会体制运行的必然恶果。他们拒绝承认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已经在他们本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帝国主义者谋求阻碍历史的进程。有些帝国主义政治家企图取缔工人运动,调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且猛烈抨击美苏缓和。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种危险。“我们为我们的人民所承担的神圣使命,”勃列日涅夫表示,“为社会主义所承担的神圣职责,是绝不允许帝国主义破坏如今的力量对比,因为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和鲜血换来的,力量对比本身代表着当今世界防止核战争爆发的最为重要的保证。”^①

尽管始终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向他的盟友们解释道,他并未放弃对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其他形式军备控制的追求。既然西方对苏联在欧洲部署更多的SS-20导弹表示警觉,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会在均势对等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与西方进行谈判。“我们反对军备竞赛,”他告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盟友们,“我们并不打算攻击任何人,同时我们一直准备着解散军事集团。”在即将到来的新年,他希望能够与卡特进行会谈,签署一份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以及“为美苏关系的发展再次注入新的积极动力”。^②

勃列日涅夫并未放弃同美国改善关系的希望。“生命本身赋予我们的任务——[是]终结看似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在回答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问题时,他强调:“睦邻友好关系——无论我们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存在多大的分歧——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处理双边关系的最好路线。我深信苏美关系绝不会仅仅是实现正常化,而会实现真正的友好关系。”^③

① 勃列日涅夫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1978年11月22日,收录于马斯特尼与伯恩,《硬纸板城堡?》,418—421。

② 出处同上,420。

③ 勃列日涅夫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访谈,1979年1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月16日,B1。

伊朗和阿富汗

1978年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东南亚那样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伊朗,沙皇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自1941年登基以来一直掌握着伊朗的大权。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推翻了受民众拥护的民族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之后,巴列维国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在之后的25年里,这位伊朗沙皇成为了美国的主要盟友,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技术支援和军事设施。同时他也为美国提供了来自波斯湾的石油,以及在苏联边境监视苏联的能力。然而在1970年代中期,这位伊朗沙皇开始逐渐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他长期致力于伊朗现代化的进程,遏制伊斯兰教的影响,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提升军事实力,以及成为一个地区领袖国,这些措施招致了一片反对声。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和大地主蔑视他推动土地改革和试图改变传统习俗的努力。专业人才和中产阶级因为沙皇的经济改革提案并没有引出政治改革而普遍感到幻想破灭。工人和学生因为曾经一度飞速发展的伊朗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放缓了增长速度,随之引发的失业和通胀减少了他们的就业机会而对政府深深不满。此外,伊朗沙皇对政治敌手那虽然残忍但只是零星的镇压加剧了伊朗民众的敌对情绪。左翼、中立派和伊斯兰改革派都把愤怒聚焦于伊朗沙皇身上,同时在城市街头和乡间小镇彼此互相竞争,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

从流亡伊拉克再辗转至巴黎,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不断地倾吐着对伊朗沙皇、对美国、对现代化的憎恨。和共产党人一样,他呼唤正义并将人类的苦痛归罪于资本主义者的贪婪;和他憎恶的共产党人不同的是,他呼吁恢复真主的法典,伊斯兰教教法。政治伊斯兰终于找到了代言人。^①

卡特怀着震惊的心情关注着伊朗局势的发展。整个1978年伊朗充斥着罢工、游行和骚乱。约1万至1.2万人因此而丧生,此外有4万5千人至5万人受伤。“事实上,伊朗全国都陷入一片骚乱。”一位在1978年年底访问伊朗的伊朗问题学者詹姆

① 背景参见穆赫辛·M·米拉尼(Mohsen M. Milani),《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形成:从封建君主制到伊斯兰共和国(第2版)》(*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2nd ed.),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景出版社,1988; S·A·阿里奥蒙德(S. A. Arjomand),“从比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全球政治》(*World Politics*)38(1986年4月):383—400;韦斯塔,《全球冷战》,288—296。

斯·A·比尔(James A. Bill)写道。^① 但是直到 1978 年秋天卡特和他的顾问们才意识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力之大。他们并不责备苏联——伊朗沙皇的问题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由此引发的对美国经济、战略和外交利益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② 伊朗为西欧和日本两大经济体提供石油；而设在伊朗的检测站和空军基地使美国有能力收集有关苏联导弹开发和战略实力的关键情报；美国相信伊朗沙皇与美国之间的友谊能够提升华盛顿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声望和影响力，同时对以色列也是极其宝贵的支持。“伊朗的衰败，”布热津斯基在 1978 年 12 月 28 日给卡特的信中写道，“将会是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最为严重的失败，其实际后果甚至远远大于美国在越南的战败。”^③

布热津斯基希望卡特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来支持伊朗沙皇，或通过军事政变来使伊朗与美国重新结盟，他所设计的这两种政策都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伊朗的长期影响力。12月初，他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紧急方案，准备向伊朗部署美国军队以守卫油田。他于 12 月 2 日致信卡特总统：

如果你在地球仪上画一道弧线，从吉大港(孟加拉国港市)穿过伊斯兰堡直到亚丁，你的笔尖将指向现在我们最为脆弱的地区。……

毫无疑问，我们正在面临一场重大危机的开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欧洲在 40 年代末遭遇的那场大危机相类似。在一个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正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

接踵而至的政治权力真空可能会被与苏联更亲近的持不同政见者所填充。……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准确的，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可能会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伊朗/沙特阿拉伯的政治转向可能会对三边关系[意指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凝聚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也会促使我们的一些关键盟友在不远的将来采取更为“中立”的态度。总而言之，这将意味着全球力量对比结构的一次根本性

① 詹姆斯·A·比尔，《鹰与狮：美国与伊朗双边关系的悲剧》(*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236。

② 万斯致美国驻中东地区各国大使馆，1978 年 11 月 23 日，该文件集与口述历史会议“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有关；中央情报局，“苏联卷入伊朗危机”，1979 年 2 月 12 日，出处同上；万斯，《艰难的抉择》，326。

③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 年 12 月 28 日，文件箱 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的转变。^①

克里姆林宫预见到了美国可能出兵干涉伊朗的可能性。他们密切地监控着伊朗局势的发展,虽然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左右伊朗的事态发展,但是他们同时也知道如果伊朗沙皇被推翻,美国人被逐出伊朗,那么苏联将会是大赢家。11月17日,勃列日涅夫知会卡特说,他收到有关美国即将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的情报。“我们不愿相信这是一条真实的情报,”他写道,“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很难判断美国的真实意图。”他轻巧地忘记了克里姆林宫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他强调美国如果干涉伊朗内政,那将会违背联合国宪章并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他提议苏联和美国政府发表共同声明,谴责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这样的宣言符合联合国宪章,并有助于推动“全球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进程。^②

卡特回信表示美国不会干涉伊朗的内政,但是他仍然支持伊朗沙皇并打算与伊朗保持“牢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由于担心苏联可能会利用美国干涉伊朗的谣言来为苏联出兵干涉正名,卡特警告勃列日涅夫不要染指伊朗。“我确信你能够非常好地理解任何对伊朗干涉的行为都会对我们双方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③

1979年1月,伊朗沙皇被迫离开伊朗,并将权力移交给一个联合政府。“数以百万计的伊朗民众带着狂喜涌上街头,而他们的庆祝活动反映了他们[对伊朗沙皇]的深刻不满情绪。”詹姆斯·比尔写道。^④伊朗局势现在指向了一个极端伊斯兰占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崛起,这个政府直接或间接地由阿亚图拉·霍梅尼所领导。然而,布热津斯基轻视了政治伊斯兰的威胁,而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伊朗左翼共产党身上,在他看来,伊朗共产党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卡特拥有更大的远见。他表示,伊朗的形势表明“只要有一小撮持有非常深刻狂热信念的好战分子”,就能够成功地“与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队和牢固的政府为敌。……我认为这可能会在未来煽动或激起例如巴勒斯坦,或者其他军事组织,作出更大规模的反抗来声张自己的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8年12月2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372。

②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8年11月17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关于苏联的忧虑,同时可参见布鲁坚茨与列昂尼德·舍巴尔申(Leonid Shebarshin)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28—29,48—49。

③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8年11月21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④ 比尔,《鹰与狮》,261。



权利”。^①

然而卡特对不干涉他国深信不疑。在伊朗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越南的教训始终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美国在军事上卷入他国内战注定将遭遇失败，并且这不符合美国的信念。^② 缓和要求在面对战略挫折时必须保持自律。“在我们这一代，世界上成立了一百多个新国家。他们在摆脱殖民主义并建立本国政府时经历了异常的创痛和磨难。通常他们会先向苏联求援，但最终他们会转而采取一种更为稳定的双边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他们会变得更为民族主义。”因此，对美国而言，保持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在我肩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与苏联之间保持和平，增进相互理解、协商和沟通，因为我们两个超级大国肩负着的是保证全球和平的责任。”^③

但是问题在于苏联政府是否会同意他这种观点。即使苏联同意，他们会像美国这样保持自律吗？当卡特发表了以上言论时，苏联官员正在伊朗东面的邻国阿富汗面临着相似的危机。在阿富汗，苏联期望能够意外收获机遇，但是很快就转换为了对可能即将到来的危险的焦虑和担心。

1978年4月底，阿富汗共产党，之前被人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PDPA)，已经在喀布尔夺取了国家政权。此前阿富汗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med Daoud)已经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因此阿富汗共产党决定在被消灭之前作出回击。苏联驻阿富汗大使亚历山大·普扎诺夫(Aleksandr Puzanov)在军事政变前夕被告知这一企图。他对此表示反对，克里姆林宫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应。苏联已经同达乌德政府培养了非常友好的双边关系，因此他们并不希望看到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④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分为两大派系，人民派和旗帜派，双方素来不睦。人民派领袖穆罕默德·塔拉基(Mohammed Taraki)现在担任新政府的领导人；旗帜派领袖巴布

① 在白宫宴请各州州长的晚宴上的祝酒辞，1979年2月27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359—360。
 ② 与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问答访谈，1978年11月13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2019；在佐治亚州理工学院发表的言论，1979年2月20日，出处同上，301—302。
 ③ 在白宫晚宴上的祝酒辞，1979年2月27日，出处同上，355—356。
 ④ 瓦西里·米特罗欣(Vasiliy Mitrokhin)，“在阿富汗的克格勃”(“The KGB in Afghanistan”)，由奥德·阿恩·韦斯塔和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编)，冷战国际史项目第40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2001，21—23；格奥尔基·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Georgi Markovich Kornienko)，《冷战：一位参与者的证词》(*Kholodnaia voyna: svidetel'stvo ee uchastnika* [The Cold War: A Testimony of Its Participant])，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Moscow: Mezhdunar Otnosheniia)，1994，188—189；布鲁茨茨、瓦列尼科夫和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6—15；奥德·阿恩·韦斯塔，“通往喀布尔之路：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1978—1979”(“The Road to Kabul: Soviet Policy on Afghanistan, 1978—1979”)，收录于韦斯塔，《缓和的终结》，119。



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坐了第二把交椅;另一位人民派领袖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担任第二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从一开始,塔拉基和阿明就如大家所怀疑的那样互相紧密合作。在几天内,他们逮捕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不少都是旗帜派成员。

塔拉基和阿明对他们的成功感到兴奋不已,但是他们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脆弱。他们需要获得外援。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谴责苏联未向他们的革命热忱提供支援,但是同时声明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表示将在阿富汗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请求苏联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他们告知苏联驻阿大使普扎诺夫,他们将尽可能长地掩盖他们的真实目标。然而,莫斯科始终未曾打消对他们声称保持不结盟同时又会与苏联合作的外交政策的疑虑。^①

美国大使馆并不相信苏联在阿富汗军事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美国外交官一开始对阿富汗新领导人的身份并不了解,其中不少人看上去很年轻,左翼,而且持民族主义观点。然而,5月6日,塔拉基要求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西奥多·艾略特(Theodore Eliot)会面。艾略特报告说,塔拉基“用一个热情的握手和友好的微笑来欢迎我”。这位阿富汗的新领导人身形修长,白发,富有个人魅力,同时具有职业政治家的气质,看上去比他61岁的真实年龄要略为年长一些。他年轻时曾在美国生活过几年,会说英语。塔拉基愉快地回忆了他在美国度过的岁月,艾略特写道,并表示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拥有一些相似的性格特征。

塔拉基的真实意图是想要向美国表明他的宏大雄心,他的谈吐激情澎湃,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咄咄逼人。他表示,阿富汗将进行一场革命。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塔拉基和他的同事们“真正关心我们这个国家的穷人,并没有兴趣把钱存入瑞士银行”。他们希望能为那些需要救济的穷人提供面包、衣物和庇护所,能够实现阿富汗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并吸引广大移民海外的阿富汗人回国,他本人和阿明都曾赴海外求学。塔拉基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把他国政府是否愿意帮助阿富汗作为评判他们的依据”。^②

毫无疑问地,苏联愿意帮助阿富汗新的革命政府。克格勃和苏联国际部早就与塔拉基、阿明和卡尔迈勒有联络,尽管他们更偏爱卡尔迈勒和他的旗帜派追随者。当

① 米特罗欣,“在阿富汗的克格勃”,21—24;韦斯塔,“通往喀布尔之路”,119—122;普扎诺夫致苏联外交部,1978年5月31日,该文件集与口述历史会议“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有关。

② 西奥多·艾略特致万斯,1978年5月6日,该文件集与口述历史会议“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有关。



塔拉基和阿明故意冷落卡尔迈勒时，苏联对此感到沮丧但是并没有被吓倒。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迫切地希望能够从阿富汗局势中谋利。很快他们就向阿富汗提供了军火武器和经济援助；党内理论家和军事专家云集于喀布尔。^①到6月中旬，美国驻喀布尔的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阿富汗的新政府“极度依赖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根本就捍卫不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政府百分之一百地依赖苏联所提供的武器弹药，并越来越多地依靠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双边贸易”^②。

但是苏联领导人很快就对阿富汗的新政府表示不满。塔拉基和阿明对政府内部的旗帜派政敌进行了血腥清洗，并宣布乡村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为恐怖主义行径。苏联驻阿大使普扎诺夫嘲笑他们的方法并对他们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批评。卡尔迈勒的朋友们逃到了莫斯科，并请求苏联出面进行干预。^③9月，政治局派波诺马廖夫奔赴喀布尔劝说塔拉基和阿明停止迫害他们的党内政敌。他们正在激起更大的抵抗，并可能威胁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波诺马廖夫指出，他们应当把精力投向如何改善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如何摧毁他们的政治对手的生命。塔拉基为他的行为辩护并要求苏联提供更多的援助。他解释道，西方和美国正试图通过许诺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来诱惑他们。波诺马廖夫警告他们不要被诱骗入陷阱；克格勃已经收到情报说塔拉基和阿明可能已经同美国情报机构有所往来。^④

1978年12月，克里姆林宫邀请塔拉基和阿明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对他们的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革命意味着“阿富汗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苏阿关系现在将呈现出一种“有质的飞跃的新特征……充满了同志友谊和革命团结的精神”。勃列日涅夫表示，我们两国之间所签署的新的友谊合作协议，其目的就在于把四月革命的目标转化为现实。^⑤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该文件集与口述历史会议“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有关，14；道格拉斯·J·麦凯钦(Douglas J. MacEachin)，《预测苏联入侵阿富汗：情报团体的记录》(*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2002，8—10；韦斯塔，“喀布尔的陷落”，121—122。

② 艾略特致万斯，1978年6月13日，该文件集与口述历史会议“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有关。

③ 米特罗欣，“在阿富汗的克格勃”，24—40；韦斯塔，“喀布尔的陷落”，120—124；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利亚霍夫斯基(Aleksandr Antonovich Lyakhovskiy)，“苏联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并占领喀布尔的内幕”(“Inside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and the Seizure of Kabul, December 1979”)，冷战国际史项目第51号工作文件，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2007，3—5。

④ 韦斯塔，《全球冷战》，304—305；苏共中央委员会致何内克，1978年10月1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35。

⑤ 勃列日涅夫的晚宴讲话，1978年12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2月6日，J2。



苏联官员告诫这两位人民派领导人必须在领导工作中运用更好的判断力和更为世故的方式。他们必须赢得广大乡村的支持,减少残酷镇压,尊重各地风俗传统,并与地区领导们建立纽带关系。塔拉基和阿明表示他们将在行动中运用更多的智慧,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援助。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向他们保证会继续向阿富汗提供援助。1979年2月,他们派部长会议副主席I·V·阿尔基波夫(I. V. Arkhipov)前往喀布尔制定一份慷慨的一揽子援助方案的细节,苏联将协助建设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推动阿富汗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满足阿富汗人民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①

勃列日涅夫强调,他对阿富汗革命的援助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和平的追求。他希望进一步深化缓和进程,并将缓和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洲——亚洲推进。他表示,防止冲突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的目标,因为如果战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那么“这将会是全人类的一场可怕灾难”^②。

但是在喀布尔,塔拉基和阿明仍然推行着他们自己的议程。他们继续像冷酷无情的暴徒那样采取行动,暗中监视他们的朋友,并残忍杀害他们的敌手。旨在把一个不信教的、集体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化的社会体制强加于阿富汗,他们无视国内广大伊斯兰教徒的感受,无视当地的传统习俗、对宗族的效忠和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富汗各地的起义愈演愈烈。不同派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过去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未曾停止通过动员发展壮大,之前是反对达乌德政府,现在,他们以更为猛烈的方式试图推翻喀布尔的共产党政府。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朗发动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功让他们大受鼓舞,并且他们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支持者的援助。1979年3月15日,他们在靠近伊朗的边境城市赫拉特(Herat)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塔拉基和阿明似乎无法将他们镇压下去。他们的许多士兵都当了逃兵,他们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们的革命岌岌可危。他们请求莫斯科给予支援。^③

3月17日星期六深夜,政治局高级委员A·P·基里连科(A. P. Kirilenko)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勃列日涅夫由于病重留在自己的府邸未出席此次会议。基里连科总结了当前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一伙蓄意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已经

① 韦斯塔,《全球冷战》,305—306。

② 勃列日涅夫的晚宴讲话,1978年12月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8年12月6日,J2。

③ 韦斯塔,《全球冷战》,299—309;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幽灵战争: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和本·拉登的秘密历史,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到2001年9月10日》(*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40—41。



“从巴基斯坦领土渗透潜入了阿富汗”。“不仅巴基斯坦军队，中国、美国和伊朗都参与了对他们进行的军事训练并向他们提供了武器。”他们在赫拉特犯下了“种种暴行”。来自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暴乱分子正与阿富汗国内极端宗教狂热的反革命分子勾结。

他同时汇报说，在日间，一个子委员会——由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组成——已经制定出一套建议，现在要求政治局全体对这套方案进行表决通过。今天早些时候他已经与阿明交谈过，阿明在步兵团和炮兵团开小差之后仍能保持气定神闲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在基里连科看来，阿富汗的局势极为严峻，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葛罗米柯接管了会议。他指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已经迫在眉睫。塔拉基请求苏联提供军事装备、弹药补给，以及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支持。“我们必须把这种请求理解为要求我们在阿富汗部署地面部队和空军。”葛罗米柯应付着这些请求，并坚决认为政治局必须遵守一条基本准则：“无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在过去的六十年中我们一直与阿富汗保持友谊，和平相处。如果我们现在失去阿富汗，并且阿富汗转而反对苏联的话，这将会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接着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补充了一些来自已经驻守在阿富汗的军事顾问和克格勃情报员的信息。大约有三千名暴乱分子“正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群众中的宗教狂热分子”。尽管实际情况还不明朗，许多普通民众似乎都卷入了暴动。柯西金怀疑阿明和塔拉基隐瞒了真实情况。尽管如此，他接着总结了苏联能够立即向阿富汗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的类型。他坚称，克里姆林宫必须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但同时他也不禁问到，如果苏联向阿富汗派兵的话，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们将和谁作战？“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有着同样的信仰，而这种信念强大到足以成为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基础。”

柯西金深信需要与塔拉基和阿明进行一次更为全面的会谈，以弄清事实真相，并劝诫他们正是他们自身在喀布尔所犯下的错误造成了他们今日的窘境。“他们持续地迫害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已经杀害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仅仅是高层官员，还有中层干部——党内的旗帜派成员。”

克里姆林宫只获得了一小部分他们所需的信息。然而他们仍然觉得必须在失去阿富汗之前采取行动。然而，他们还是不愿采纳派兵的想法，他们宁愿先采取一些别的措施：比如经济援助，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争端。基里连科表示，如果我们要讨论派遣军队，“我们必须首先对问

题进行全盘考虑”。他们决定,先由柯西金和塔拉基进行对话以弄清他的真实意图。但是“必须告诫塔拉基改变他的施政策略,绝不能再大规模动用迫害、刑罚和拷打等手段”。宗教问题和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3月17日星期六深夜的政治局会议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模糊的战略。在会议临近结束之际,葛罗米柯表示:“现在阿富汗的局势对我们而言尚不明朗。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不能把阿富汗拱手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或许我们并不需要派出军队。”^①

第二天柯西金致电塔拉基,后者的态度是明确的和坚持己见的。“我们的局势很糟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他需要苏联军队来协助镇压赫拉特发生的暴动。赫拉特附近的居民并不支持革命:“该地区几乎都受到了什叶派宣传的影响。”塔拉基哀叹道,我们需要你们的武器,你们的军队。柯西金反驳道:“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塔拉基并没有兴趣了解苏联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伊朗和巴基斯坦正在合力对抗我们,他们有着相同的图谋,”他解释道,“因此如果你们现在出兵对赫拉特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就可能挽救阿富汗革命。”柯西金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整个世界会马上知道这一点。叛军有便携式无线电发射装置,他们能够立即向上级进行汇报。”

但是塔拉基一再重申,苏联的援手将会是至关重要的。他自己的军队,包括苏联协助训练的阿富汗军官,结果都成了他称之为的“穆斯林反动派……根本无法依靠他们,我们完全不信任他们”。他需要苏联向阿富汗派兵。“我们希望你们能派出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军人。……他们能够驾驶坦克。……让他们穿着阿富汗的服装并打着阿富汗的旗帜,没有人会认出他们。”

柯西金再次表示迟疑:“很显然,你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和国际问题过度简单化了。”苏联所作出的任何干预行动根本就无法隐藏。“两个小时以后全世界都会得知这条新闻。地球上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叫嚷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开始了。”但是柯西金向塔拉基保证,莫斯科将进行更多的磋商。“我们是革命同志,而且并肩作战。”^②

3月18日晚些时候,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柯西金介绍了他与塔拉基电话会谈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79年3月17日,收录于韦斯塔,《缓和的终结》,287—298。

^② 柯西金与塔拉基电话会谈的书面记录,1979年3月17日或18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45—146。



的内容。“几乎是毫无意识的，塔拉基同志回答说几乎没有人真正支持他的政府。”但是柯西金如实传达了塔拉基给出的讯息的要点：“如果赫拉特沦陷，那么整个阿富汗革命就将失败。”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汇报了他本人同阿明的通话结果。阿明和塔拉基一样坚称阿富汗革命是否能够幸存就取决于苏联是否采取行动。乌斯季诺夫对此感到很沮丧：“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如今的局面？问题就在于阿富汗的领导们未能充分认识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士兵们正是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来公开反对政府，而阿富汗国内绝大多数的人，除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之外，都是伊斯兰教信徒。”

安德罗波夫从中调解，并为进一步的讨论定下了基调：

我已经深入考虑了所有这些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肃地考虑以下问题：如果我们向阿富汗派兵，究竟会支持谁的事业？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此刻的阿富汗并未做好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准备。阿富汗的经济非常落后，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国内占主导地位，而在乡村几乎所有人都是文盲。这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革命的局势。

他坚持认为，苏联不应用苏联的刺刀来对阿富汗进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

葛罗米柯对此表示强烈赞同。如果苏联动用军队镇压阿富汗人民，克里姆林宫会被人扣上侵略者的帽子。“我们这么多年来为美苏缓和、武器削减以及很多其他事所付出的努力，全部会付诸东流。当然，中国会因此收到一份大礼。所有的不结盟国家都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总而言之，出兵干预会给我们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阿富汗“并未受到任何国家的进攻，”葛罗米柯总结道，“这是他们的内政”。

基里连科对会议作了总结。昨天，政治局几乎就决定对阿富汗出兵干预。今天“我们都坚持一个立场，即没有任何理由向阿富汗派遣军队”。我们会提供任何其他可能形式的援助，但是苏联不会出面干预。乌斯季诺夫再次重申，我们绝不能派出军队。柯西金表示同意道，这样做“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一大堆国家都会“因此跳出来反对我们”。^①

第二天，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并且勃列日涅夫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对他的同事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79年3月18日，收录于韦斯塔，《缓和的终结》，298—303。

们所作出的决定表示认可。“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我们不应卷入那场[阿富汗]战争。”苏联将邀请塔拉基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将亲自向他解释整个局势。

葛罗米柯复述了最近赫拉特的战局进展,现在局势看上去比之前更为有利。然而仍需保持警惕。“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所有这些事态,不仅是阿富汗,而且其邻国政府,包括中国,都受到了美国的指使,”葛罗米柯表示,“中国、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在这其中扮演了比过去更为积极的角色。”

但是保持警惕并不意味着放弃缓和。太多的东西将受到威胁。葛罗米柯宣称,如果苏联向阿富汗派兵,那么:

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抛弃曾经克服了巨大困难才取得的所有成果,尤其是缓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立即告吹,美苏将不会签署任何新的协议(无论你怎么看待局势,缓和对我们而言都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政治事务),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志再也不会同卡特会面,……而我们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联邦德国的关系,将会化为泡影。

安德罗波夫对此表示同意:“出兵阿富汗意味着向阿富汗人民发动战争,意味着摧毁阿富汗人民。我们会被人看作侵略者,因此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①

塔拉基被召唤到克里姆林宫,分别会见了柯西金、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接着,勃列日涅夫接见了他们。柯西金表示,我们的友谊“颇为源远流长”,但塔拉基需要使他的政权“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支持”,并且停止疏离人民的做法。然后柯西金委婉地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如果我们向阿富汗的领土派遣我们的军队,这将立即引发国际社会的剧烈反应,并且可能招致极为不利的多方面的不良后果。”^②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这些主题。他强调,主要的工作“应当是做群众的政治工作”。他补充道,镇压是一种“尖锐的武器”,因此必须“极为谨慎地使用,而且只能在有非常充分的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才能使用”。^③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79年3月19日,收录于韦斯塔,《缓和的终结》,303—310。

② A·N·柯西金、A·A·葛罗米柯、D·乌斯季诺夫以及B·N·波诺马廖夫与N·M·塔拉基会谈的记录,1979年3月2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46—148。

③ 勃列日涅夫的评论,参见他在政治局发表的言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79年3月22日的会议上,出处同上,150—151。



维也纳峰会

在1979年的冬天和春天，勃列日涅夫和卡特都作了非常艰难的心理斗争。他们都非常小心地唯恐对方会采取些行动，他们俩都不得不艰难地应付国防官员、军事将领、情报分析师，以及幕僚顾问的要求，所有这些人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预期的敌人不会取得战略优势或先发制人的能力。然而他们俩都相信缓和符合本国利益。对此他们拥有相似的观点：他们应当遏制军备竞赛，扩大双方合作的范围，并且允许他们的社会体制在和平环境中为争取人心而竞争。两人都相信本国的社会体制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勃列日涅夫怀疑美国正在开展一次迂回的马基雅维利式外交政策。帝国主义者经常干这种事。他对中国，这一苏联的盟友国，进攻越南感到非常气愤，而这发生在中国领导人访美之后不久。他警告卡特不要同北京合谋。^①

勃列日涅夫同样对卡特最近的中东之行以及他调停以色列和埃及促使双方在无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就达成和平协议的行为感到非常不满意。“如果有超过三百万应当享有不可剥夺的在头顶上有一片屋檐的权利……以及拥有自己小小的国家的权利的人，被剥夺了这最基本的权利，那么这到底算是怎样一种和平？”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已经群情激愤，勃列日涅夫预测中东地区并不会就此获得和平。他严厉批评卡特更为恶劣地在离苏联如此近的一个地区“秘密绕过苏联进行暗箱操作”。^②

在给卡特总统的其他信件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国过多进行军事演习，并且即将部署一种新型的、地射洲际导弹MX系列，这种导弹不仅能够携带多弹头，而且能够由机动车辆进行发射，使之不易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勃列日涅夫表示，建造这种新型导弹架“绝对是背离双方所起草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的相应条款的”^③。

勃列日涅夫的军事顾问向苏联外交家和勃列日涅夫本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苏联提防美国试图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就复杂的技术细节问题哄骗并智胜苏联谈判家，并且担心即使是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都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这其中的细节，甚至是

① 多勃雷宁，《机密》，418；勃列日涅夫向莫斯科鲍曼区的选民发表的演讲，1979年3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3月5日，R 5。

②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9年3月19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③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4月下旬]，出处同上。

一些基本概念。^① 苏联总参谋部对美国提出的军备控制提议所作出的回应必须接受莫斯科的两个部际委员会的专家审核, 而主持这两个委员会的都是持防御观点的高级官员。外交部通常会受到冷落和忽视。但是这些委员会成员并没有无视军备控制可能为苏联自身利益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希望阻止美国开发新型武器, 比如巡航导弹, 并且希望移除美国设在欧洲的前沿军事基地体系。作为回报, 他们知道苏联也必须作出相对应的让步。但是在仔细推敲设计政策建议的时候, 他们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大量技术和定义问题, 而其中很大一部分问题随着谈判的推进变得愈发复杂。例如, 怎样的导弹能够被准确地定义为“新型”导弹? 武器核查过程中哪些信息是必要的? 在试飞过程中传回地面的电子数据究竟允许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加密或扰频? 这些问题让带着最良好意愿的官员都觉得迷惑不解。至少在他们看来, 军事专家正试图遵从勃列日涅夫的立场, 即苏联并未谋求优势地位而是追求双方均势。但是他们认为“美国给出的提议都是期望直接摧毁我们刚取得的均势态势”, 杰季诺夫将军说道。^②

这种怀疑深深地植根于苏联领导人, 比如勃列日涅夫的思考方式中。美国人怎么会认为他期望苏联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地位呢? “我一再地重申我们并不寻求军事上的优势。”但是他相信美国人并不把他的话当真, 或者尊重他的感受、利益和目标, 除非他也凭实力来进行谈判。^③ 然而, 实力始终都是一个相对概念, 总是在动荡不安的全球形势下被快速变化的机遇和威胁的定义所模糊。

勃列日涅夫对审慎实力的理解让卡特的生活变得更为痛苦。1979年2月27日卡特总统邀请多勃雷宁前往总统办公室, 并重申了他对双方能够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期望。^④ 但是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警告卡特总统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偏向于苏联一方。“战略力量的趋势从1960年代中期就开始偏向于苏联占优势,” 布热津斯基在一个月后给卡特的信中写道, “然而, 自从1977年1月起, 这种趋势正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⑤ 六个星期后, 一份由美国国防部所作出的评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 156—158。

② 杰季诺夫的引文, 参见他的评论, 出处同上, 180; 苏联对军备控制的想法和决策制定的进一步详细阐述, 参见出处同上, 32—45, 87—88, 134—135, 144—182; 萨韦利耶夫与杰季诺夫, 《五巨头》, 15—53; 对事态的颇具说服力的总结, 参见波瓦斯基(Powaski), 《向世界末日挺进》(March to Armageddon), 162—179。

③ 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发表的讲话, 1979年10月6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79年10月9日, F 3; 恰佐夫, 《健康与权力》, 89—91。

④ 多勃雷宁, 《机密》, 417—418。

⑤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 1979年3月30日, 文件箱42, 布热津斯基集, 卡特图书馆。



估报告得出了更令人感到不安的结果。在布朗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务院的官员讨论之后,布热津斯基告知卡特总统本届政府可能无法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面对当前的发展态势,美国已经无法同苏联保持基本的均势,无法对一次可能的来自华沙条约国的进攻进行有效防御,也无法保卫波斯湾。“无论我们决定启动怎样的项目来使我们的战略力量变得更为现代化,预计到1980年代初,我们很有可能被世人认为在与苏联的军事对比中不能保持对苏的基本均势。”^①

布热津斯基坦率地告诉卡特总统,他被人视为态度软弱。“非常不公平的是,大众传媒已经激起了民众普遍认为本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缺乏决断力的观点。”^②这种观点威胁并降低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国会得到通过的几率。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支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是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表示忧虑,并且对石油短缺和物价飞涨感到沮丧。与此同时,一些权重的参议员正联合起来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卡特总统的个人支持率一落千丈,他的民众支持率降到了33%。卡特的民意调查专家帕特里克·卡德尔(Patrick Caddell)对此表示非常吃惊。他警告说:“对总统的失望情绪正在转化为对其个人的仇视。这暗示着公众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必须对此保持警觉。”^③

然而卡特继续前进,当然比之前更为谨慎,但是他仍然选择前进。他不会让民意调查的数据来左右他的外交政策。不管怎么说,他是顽强的,意志坚定的,坚韧不拔

① 政策审议委员会会议,1979年5月14日,文件箱25(政策审议委员会106),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5月14日,出处同上;同时参见维克托·乌特戈夫(Victor Utgoff)与杰克·斯图亚特(Jake Stewart)致布热津斯基和阿伦,1979年5月10日,出处同上;万斯手写的笔记,1979年4月3日,苏联,直立档案柜,卡特图书馆。这些恐惧并非出于空想,但是它们无疑是被夸大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北约和华约的军事均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要求双方立即作出补救措施”。参见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军事均势,1981—1982》(The Military Balance, 1981—82),纽约:文档史实公司(Facts on File, Inc.),1981,123。尽管出现了均势即将失衡的趋势,但是大致上双方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数据可参见霍洛韦,《苏联与军备竞赛》,58—60。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在1970年代末,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中程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并没有迅速的增长,但是苏联的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却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样苏联的军武库中的战略导弹弹头的总数量也有较大的提升。总数从1975年的3423枚攀升至1980年的6667枚。此外,苏联导弹的精度在此期间得到了巨大的提高,尽管苏联从未获得发起先发制人打击的实力。数据图表和评论可参见扎洛加,《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器之剑》,176—177,241—248。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4月12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帕特里克·卡德尔致卡特,1979年6月11日,文件箱33,陆空军司令文档,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剑桥调查研究组(Cambridge Survey Research)致民主党委员会,1979年5月24日和25日,出处同上;卡德尔,“当前公众对待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态度的备忘录”,[1979年5月],文件箱37,出处同上;卡特,《坚定信念》,236—239。

的。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品格使他得到了国会对巴拿马协议的批准通过，让他在中东地区收获颇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促成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他深信，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有意义的。他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项事业。

卡特并未对苏联正在打造的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视而不见，他决心要赶上苏联。他批准了 MX 系列导弹的开发项目，虽然他认为一想到将要在这上面浪费一大堆钱而觉得“恶心”。他屈服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的压力，要求限制苏制逆火轰炸机，并阻止苏联对核查所需的数据进行加密。他知道，如果对美国是否有能力监控苏联的合作态度存有疑虑的话，国会是不会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通过的。^①

他也未忽视苏联在第三世界采取的行动，但是他认为苏联在第三世界并未取得过多的优势。美国已经实现了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改善了同印度的关系；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在中东地区赢得了一个新盟友——埃及；并且成功调和了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分歧。虽然美国在越南和伊朗遭遇了挫折，但是这些并非决定性的因素。^②

在卡特看来，美国并没有在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竞赛中失利。苏联的经济正在遭遇大麻烦。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尽管美国经济仍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了苏联。^③“我们有所有的理由相信苏联经济增长速率的下降将会一直持续到整个 1980 年代末，”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Stansfield Turner) 预测。克里姆林宫最终将面临痛苦的抉择。“根据我们的预估，到 198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的低增长速率将会挤压他们的资源达到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的程度。”特纳并不认为苏联在国防上的过度开支会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但是他暗示从长远来看，这种巨大开销维持不了太长时间。^④

卡特并不相信美国是弱势的一方。美国要远比苏联强大得多，他在 1978 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访谈中这样告诉比尔·莫耶斯 (Bill Moyers)。他期望双方能够合作，但

① 卡特，《坚定信念》，241；万斯，《艰难的抉择》，134—135；塔尔伯特，《残局》，94—202，237—244，256—259；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889—904。

② 在一场会议问答中发表的言论，1979 年 3 月 30 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564—566。

③ “1978 年经济综合净评估报告”，1979 年 3 月 30 日，文件箱 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④ 特纳的声明，1979 年 6 月 26 日，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与经济发展子委员会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苏联和中国的资源分配——1979 年》(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1979)，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0，2，11，文件箱 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中央情报局，“消费者的失望情绪与苏联政权”，1979 年 8 月 23 日，文件箱 1，出处同上。



是他不会被竞争吓倒,前提是这种竞争必须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他深深坚信美国的价值取向,正如勃列日涅夫同样对苏联的价值观也深信不疑。卡特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民主的生活方式如磁石般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而“唯物主义的、中央集权的价值体系”永远都比不上美国的价值体系。^①

当1979年5月万斯和多勃雷宁最终敲定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细节,卡特开始仔细地为期待已久的首脑峰会做准备,这次峰会计划下个月在维也纳举行。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成了一个限制因素,卡特被建议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宣读他的声明时不要打断他;在勃列日涅夫发言之后他是否能够或愿意同卡特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尚不可知。因此万斯劝告卡特总统放低期望值。未必能够实现“对于核心议题的双边磋商”。“他已经非常年迈,相当脆弱,同时情绪化。”哈里曼告诉卡特总统。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脆弱,而他将全权领导苏联代表团。他将试图弄清卡特总统的动机,同时他也会受到卡特个人行事风格的影响。哈里曼建议,卡特总统应当以热情的、不拘礼节的方式来对待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关注细节。他最为希望看到的是让他的人民免受又一次的入侵,或者比这更遭,一次核战争,所带来的苦难。^②

卡特带着互相冲突的动机前往维也纳。他知道他必须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否则国内的批评家将会讥笑他的温顺和胆怯。他绝不能在逆火轰炸机的问题上,或是在数据加密问题上让步,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情报机构和他的国防顾问们满意。然而,他最为重要的目标,正如万斯所说,就是与苏联领导人们建立一种友好关系,这样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能够继续同苏联维持缓和。他“希望苏联知道美国始终保持着对和平的热切渴望”,同时他会平等地对待苏联,双方都不会取得核武器的相对优势,同时,在他看来,军备竞赛毫无意义。他希望苏联官员知道,他已经准备立即开始投入到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工作中去,而新一轮谈判将涵盖对欧洲布置中程导弹的限制以及对洲际导弹进行更大规模的削减。他希望苏联知道,如果双方想要维持缓和的话,苏联必须节制在非洲和东南亚所采取的行动,并且认识到波斯湾是美

① 关于莫耶斯的访谈,参见会议问答,1978年11月13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8》,2017;在杰弗森—杰克逊晚宴上发表的讲话,1979年4月7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636—637;在美国报刊出版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讲话,1979年4月25日,出处同上,693;在爱荷华州民主党大会上发表的讲话,1979年5月4日,出处同上,805。

② 万斯致卡特,1979年6月8日,与“全球竞赛”大会相关的文档集;记录出自哈里曼和多勃雷宁会谈,1979年6月4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哈里曼与卡特会谈备忘录,1979年6月9日,出处同上;卡特,《坚定信念》,241。

国的关键利益所在，因此克里姆林宫不得干涉波斯湾。

当他在维也纳会见勃列日涅夫时，他强而有力地向勃列日涅夫直接传达了以上观点，有些时候甚至是以尖锐的方式。^① 与之相反的是，勃列日涅夫身体虚弱。他的头发油亮地向后梳着，他的脸有些肿胀。他大声地朗读着事先为他准备的稿子，而必要的时候，他的翻译还会拿起他的稿子，然后指出他还需要说哪些要点。勃列日涅夫不能长时间地讨论任何问题，但是他偶尔还会表达自己的强烈观点。当事情变得复杂时，葛罗米柯就会介入。一次会议不能持续太长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小时。很难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勃列日涅夫再也不能讨论问题到深夜，当年他曾经与尼克松和福特彻夜长谈。宴会都不能拖延。他晚上就寝得很早。他是一个很容易被冒犯的老人。他抱怨说美国大使馆的菜单只印了英文。他表示，苏联人更为知性，他们会在菜单上同时印上英语和俄语。虽然他已经年迈多病，但是美国人绝对没有弄错，勃列日涅夫的同事仍然非常尊敬他。^②

勃列日涅夫向美国人强调，克里姆林宫可能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是绝不会煽动它们。认为莫斯科策划了这些解放运动的想法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些都是刻写在历史的经纬之中的。苏联也未谋求军事霸权。作为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告诉卡特，他能够明确负责地告诉美国，苏联不希望看到任何形式的战争爆发。克里姆林宫拒绝先动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勃列日涅夫强调，缓和必须建立在对等安全、互相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不多不少，就是这些原则。他不能理解美国为何要启动一个改良军备的项目。他反对北约军队的现代化步伐，以及美国保留在欧洲的前沿基地中的核武器系统。卡特总统可能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从西南亚经过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直到东非这个范围的危机，但是勃列日涅夫希望卡特能够理解对于苏联而言，欧洲才是最为重要的地区。“苏联领导层最主要的顾虑是不希望看到苏联人民或是欧洲任何国家的人民再次经历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的由希特勒的人侵所造成的苦难。”^③

这些大多可以预知的交流都被仔细地记录成文。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并没有明显地偏离两国外交家在过去的两年中所一再阐述的立场。两国政府协商的进展情况的

① 卡特，《坚定信念》，240—241；万斯致卡特，1979年6月8日，与“全球竞赛”大会相关的文档集；关于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书面记录稿，参见会谈备忘录，1979年6月16日，17日和18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② 在前一条注解提及的书面记录稿之外，参见卡特，《坚定信念》，242—265；多勃雷宁，《机密》，422—427。

③ 尤其参见会谈备忘录，1979年6月17日，下午5:30的会议，6，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同与他对应的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试图打破相互均衡裁军协商上的长期僵局，即有关如何在欧洲中心地带削减常规部队数量的磋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指示乌斯季诺夫可以在谈判桌上作出一系列的让步，但是当布朗和乌斯季诺夫开始谈判时，他们很快就到达了他们的属下多年来一直没能迈过的那道坎上。布朗坚持苏联要么澄清有关他们现有军队结构的数据，要么接受美国所得出的数据。乌斯季诺夫表示他没有义务去检查双方有争议的数据，但是希望能够讨论具体的裁军方案。然后他转达了克里姆林宫的新立场。乌斯季诺夫的副官尼古拉·奥加尔科夫(Nikolai Ogarkov)元帅表示苏联“提出削减比美国多一倍的军队数量”。这并未给布朗留下深刻印象。他仍坚持得到具体数据。苏联官员的失望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奥加尔科夫猛然打断他道：“你也是军人，具体点，给出你的建议。”然而布朗并不打算让步。美国人似乎“对力量均衡更感兴趣”，乌斯季诺夫评论道，“而我们苏联人民……更关心紧张局势的缓和”。他们俩的磋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①

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元首，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都承担着别人很难真正理解的负担。两人都希望对方能够认识到他对控制军备竞赛、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持缓和都承担着独一无二的责任。卡特在第一次会议上特地向勃列日涅夫“致敬”，“因为正是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缓和的理念”。^② 同时，勃列日涅夫清楚地表达了他本人的态度。在正式协商会议开始之前，两人都拜访了奥地利总统，当他们两人离开奥地利总统府时，他们俩私下交谈了几句。勃列日涅夫把他的手放在卡特总统的肩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那么上帝都不会原谅我们的。”卡特深受感动。“当我们走了几步准备离开大楼时，”卡特事后回忆道，“勃列日涅夫一直用手挽着我的手臂，或是搭在我的肩上来稳住他自己的步伐。这一简单而且非常自然的动作比任何官方对话都能够更为有效地弥合我们双方之间的鸿沟。”^③

在会议桌边，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苏联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官方立场，但同时清楚地表示缓和对他本人意义重大。他表示他并不喜欢美国人把苏联称为对手。美国和

① 布朗与乌斯季诺夫和奥加尔科夫会谈备忘录，1979年6月17日，会议，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多勃雷宁的评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不信任的增长”，136—138；同时参见多勃雷宁，《机密》，426—427。

② 会议备忘录，1979年6月16日，上午11点，7，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③ 卡特，《坚定信念》，245。

苏联的价值观可能会互相竞争,但是他本人希望双方能够扩大合作。^① 在会议闭幕仪式上,他拥抱了卡特,这个姿势并未被记录在册。卡特是个“非常不错的人,总而言之”,他轻声地对他的同志耳语道。^②

卡特能够感受到勃列日涅夫的热情,即使同时他也深刻地体味着来自国内批评家的灼热攻击。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作为卡特最为亲密的政治顾问,警告多勃雷宁大使说,卡特必须避免“看上去像一个草率地将自己投入苏联人怀抱的美国领导人”^③。但是卡特总统认为自己与勃列日涅夫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他能够理解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峰会之后,他回忆道,“我们之间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合作意愿。”他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份手写的短信:“我期待着……我们下一次会面,届时我们将能够扩大此次我们携手建立的新基础。”^④

尼加拉瓜和阿富汗

然而,世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并不友善。

回到美国之后,卡特向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警告说,如果国会不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通过的话,必将加剧军备竞赛,给美国的财政预算增加沉重的经济负担,增加核扩散的威胁,并激化东西方矛盾。卡特承认,这份协议并非治愈全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万灵药。它“并不会中止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这种竞争进行了规范并将其导向了和平竞争的方向,而这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人类的未来最终会是自由的,而不是受到专制统治,”卡特向国会宣告,“人类的未来不属于战争,而属于和平。”在批准通过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对冷战进行重新调整之后,美国人民可以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向国内重点,比如如何解决能源危机问题。^⑤

然而海外的动荡削弱破坏了卡特总统的计划。在卡特奔赴维也纳峰会前几天,布热津斯基通知他“现在我们需要对中美洲给予最大的重视”。在整个中美洲地区,

① 会谈备忘录,1979年6月16日,上午11点,5,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② 多勃雷宁,《机密》,426;恰佐夫,《健康与权力》,91。

③ 多勃雷宁,《机密》,421—422。

④ 卡特,《坚定信念》,261;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9年6月18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⑤ 对国会两院联合会议发表的讲话,1979年6月18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087—1092。



暴乱在逐渐升级并且出现了政治分极化的趋势。民主党政府从1960年代起开始在中美洲兜售的进步联盟并未改变该地区贫穷落后的现状；也未终止美国对该地区众多的右翼独裁领导人以及残忍的暴君的军事支持。在尼加拉瓜，“共产党游击队可能会夺取政权”，布热津斯基现在警告卡特道。他暗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该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斗争推翻美国长期支持的该国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在6月11日美国顶级领导人的会议上，中情局副局长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汇报说索摩查可能坚持不到他任期结束的1981年了。该国商界、神职人员和自由派改革者都希望摆脱他，而更多赤贫的农民、乡间的工人、学生和城市劳动者都纷纷拥护桑地诺的革命运动。卡卢奇表示，温和中立派的地位“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殆尽。而左翼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许多”。同时古巴对尼加拉瓜的介入正在逐步升级。^①

当卡特从维也纳回国之后，尼加拉瓜令人忧虑的局势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尖锐的危机。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一直试图让美国全力支持该国的温和中立派，寻求在不进行激进的政权交替的情况下支持该国的人权事业。但是现在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6月23日，布热津斯基告知卡特美国在尼加拉瓜正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要么接受一次卡斯特罗式的桑地诺胜利”或者“美国对其作出军事干预”。而第二种方案将“摧毁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并激起“全世界的一片谴责声”。^②

布热津斯基相信索摩查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了，但是他、万斯、布朗和特纳仍然试图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案来阻止桑地诺夺取政权。^③ 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卡特委派的外交官1979年7月中旬为索摩查安排下台的事宜时，桑地诺已经掌控着一个联合政府。现在更为紧要的问题摆在了美国面前。布热津斯基手下的拉美问题专家罗伯特·A·帕斯特(Robert A. Pastor)明白地勾勒出了这些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尼加拉瓜成为下一个古巴？我们怎样才能阻止中美洲其他国家成为下一个尼加拉瓜？”^④

① 总统评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79年6月11日，文件箱25，会议(总统评审委员会111)，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6月13日，出处同上。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6月23日，文件箱30(参议院商务委员会170)，出处同上。

③ 出处同上。

④ 罗伯特·A·帕斯特致布热津斯基，1979年7月19日，文件箱30(参议院商务委员会183)，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国防部长布朗向卡特总统强调了这些忧虑。卡特政府必须考虑“我们下一步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防止我们的邻国走向动荡的局面,尤其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如果桑地诺成功地在尼加拉瓜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话,那么其邻国的左翼力量将会变得更为大胆,而右翼势力将会变得更为恐慌。更多的国内冲突将接踵而至,而美国的弱点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布朗建议卡特当局放缓对人权问题的支持,转而支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中立派军方领导人。^①

帕斯特对此表示反对。帕斯特致信布热津斯基,认为布朗的论断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可能也是错误的前提之上:即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支持对稳定巩固这些政权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他强调中美洲发生的危机源自“中美洲各国人民与政府之间日益增加的疏离感和隔膜感;我们正在见证缺乏民众支持的军事政权正在大规模地丧失对国家的统治权”。他坚持认为,美国需要推动该地区的选举、人权和改革,并且美国需要对不同的国家选用不同的方案“直到我们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案”。美国绝不能丧失信心并作出退让。“我们需要对古巴做出的所有事情进行反击。”^②

7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美洲的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否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能够逐渐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更大范围的民众支持,他们必须进行各种必要的改革来应对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和不完善现状。如果不这么做,等待着他们的另外一种可能则只会是尼加拉瓜式的革命。”^③布朗的忧虑并未被忽视,所有与会者都同意这些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正如帕斯特所主张的那样,美国的支援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会作出改革。作为对这次会议的总结,布热津斯基致信卡特总统:“我们必须支持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变革力量,而在危地马拉暂缓这样的做法,从而防止这些国家重演尼加拉瓜式的危机。”^④

这条建议与卡特总统的偏好相一致。他痛恨独裁统治。他不会无条件支持他们。他也不会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来帮他们抵御来自变革力量的进攻。右翼批评家可能会声称卡斯特罗正在煽动动荡局面并谋求颠覆美国的传统盟国政府,但

① 布朗致卡特,1979年6月25日,文件箱30(参议院商务委员会183),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帕斯特致布热津斯基,1979年7月19日,出处同上。

③ 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会议结论的小结”,1979年7月20日,文件箱30(参议院商务委员会184),出处同上。

④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7月20日,文件箱30(参议院商务委员会183),出处同上。



是卡特并不这么认为。认为卡斯特罗应当为危地马拉的革命负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道。索摩查已经“失去了尼加拉瓜人民对他的信心”。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允许尼加拉瓜人民自行选择国家领导人。卡特宣布，他这一届政府将会努力改善同桑地诺之间的关系。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乘坐一架满载着救援食品和药品的特别航班返回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并向新政府递交了美国的国书。1979年秋天，卡特提请国会拨付七千五百万美元用以援助尼加拉瓜新政府。^①

然而中美洲地区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克里姆林宫知道又有新的有利可图的机遇在向他们招手。然而，卡特并未忽视他本人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尼加拉瓜发生危机期间，他于7月15日向全国发表了一次演讲：

今晚我想首先向你们介绍一个比能源危机或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问题。我想立即告知你们一个对美国民主的根本性威胁。……

这种威胁几乎是无形的。……这是一种信任危机。这是一场直击我们国家意志的心灵和灵魂的危机。在不断增长的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质疑声中，以及在我们国家的团结精神的缺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危机。

我们对未来的信心缺失可能会威胁到摧毁我们美国的社会政治经纬。^②

卡特总统现在非常清楚什么才是他最重视的问题：美国必须首先解决能源危机问题。美国必须削减对进口石油的消费，并刺激国内对替代能源资源的生产。美国人民必须克服游离、停滞和麻痹情绪，并且通过克服最为严酷的挑战来重拾信心。如果他们需要更为精简的、聚焦的、秩序井然的领导，卡特将会作出这样的领导。他很快就对自己的内阁和成员班子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但是他并未把国内的沮丧情绪归咎于国外的敌人或敌视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应当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或伊朗的伊斯兰势力崛起负责。他知道，骚乱在国际政治体系的

① 总统新闻发布会，1979年7月25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307—1308；突发事件紧急援助的声明，1979年7月27日，出处同上；美国大使提供的关于索摩查下台的第一手资料，参见劳伦斯·佩祖洛（Lawrence Pezzullo）与拉尔夫·佩祖洛（Ralph Pezzullo），《在索摩查下台之时》（*At the Fall of Somoza*），匹兹堡，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93；关于援助，参见阿兰·麦克弗森（Alan McPherson），《亲密的联系，痛苦的挣扎：自1945年以来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Intimate Ties, Bitter Struggl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Since 1945*），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图书公司（Potomac Books），2006，85。

② 向全国发表的讲话，1979年7月15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235—1241。

每一个缝隙中无所不在。

卡特面对海外动荡局势时的镇定表现激起了国内政治对手的怒火,同时也让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感到忧心忡忡。布热津斯基于7月27日警告卡特说,如果美国忽视古巴不断升级的颠覆活动的话,那将是非常愚蠢的,而这件事很快就会演变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卡斯特罗在海外的成功,以及苏联对其活动的支持,现在正将一个日益艰巨的外交政策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布热津斯基希望获得更多有关苏联向古巴进行军事输送的情报,以及古巴在中美洲和非洲活动的情报,他很肯定地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挑衅性质的。“无论古巴是作为苏联的代理人,合作伙伴,(在我看来最不可能的是)古巴只是在拖着苏联前进,其结果是非常清楚的:卡斯特罗的外交政策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并给我们制造了影响深远的麻烦——其中很棘手的就是我们的盟友国(例如,沙特阿拉伯、苏丹,以及一些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对我们产生的信任危机,他们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或愿意对古巴或苏联的干预主义作出有效回应。”美国必须非常清楚地同时通过行动和言论来表明“我们会把古巴日益激化的活动归因于苏联的指使。否则苏联等于拥有了一个完全零代价、零风险地给我们制造麻烦的工具”。^①

一旦美国的情报机构将古巴锁定为侦查目标对其活动进行跟踪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令人更为不安的事实——一支由苏联士兵组成的“作战部队”。关于这支部队的情报迅速地在卡特政府的高层官员中间传开,他们都非常担心对这支部队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威胁到国会是否会否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万斯和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得知这条消息已经被泄漏出去并很快会见诸报端,于是联系了与此事相关的参议员,比如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其时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希望能够降低国会和民众对这则令人不安的报道的反应。万斯表示,对苏联在古巴拥有一支作战部队的报道不仅会被视为苏联大胆厚颜的又一个标志,同时也是苏联背信弃义的证据,是对赫鲁晓夫1962年向肯尼迪作出从加勒比海地区撤出苏联进攻性军事力量的保证的公然违背。^②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7月27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8月1日,文件箱25,会议(政策审议委员会120),出处同上。

^② 戴维·D·纽瑟姆,《苏联驻古巴的部队:公共外交关系研究》(*The Soviet Brigade in Cuba: A Study in Public Diplomacy*),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 vii-xiii, 1—36;万斯,《艰难的抉择》,358—362。



尽管万斯对他们俩抱有期望，但是丘奇和斯通却利用这则情报来提升自己在所属州的声望，而不是支持卡特当局谋求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努力。丘奇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改选形势，并被右翼政客嘲笑他的鸽派立场，因此他宣称在苏联平息美国对古巴的忧虑之前不能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预审。在劳工节周末，美国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公之于众。卡特的反对者们兴高采烈地利用这则消息重新开始抨击指控卡特总统缺乏胆量以及美国立场过于软弱。万斯不得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克里姆林宫澄清这件事，而卡特不得不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① 这支部队真的会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吗？苏联这种行为究竟是否违背了苏联过去作出的承诺？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否不得被迫搁置？

布热津斯基发动了一场猛烈的私人攻势，敦促卡特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他希望卡特总统认真考虑，为什么本届政府在取得了实际的巨大外交成就之后居然收到了如此之少的赞誉？为什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尤其是来自我们的盟友国的评价，[认为]本届美国政府是自二战以来最为胆怯的一届政府”？在世界各地，苏联都被认为是“进攻方”而美国总被认为是“默许方”，他这样写道。而现在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究竟会对苏联/古巴问题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拉丁美洲，“革命的狂热情绪正在呈上升态势，而我们未能给那些希望能够依靠我们的人带来一丝安全感”。国内外的民众都期望看到卡特总统作出有效的领导。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整个国家“热切盼望，同时我们的国家安全也需要您在外交政策上运用更为自信的语气并采取更为坚定的实际行动。”布热津斯基列举出了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派国防部长布朗前往中国与中国就技术转让和军火销售进行谈判，放大古巴的经济问题，并加快对苏联国内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乌克兰人和穆斯林的政治宣传攻势。^②

卡特的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并不希望美国因为苏联在古巴部署的作战部队而与苏联形成对抗局面。从一开始，布热津斯基就觉察到这是一个被故意夸大的虚张声势的问题，这件事在美国国内政界产生的副作用远大于实际的军事意义。但是他坚持认为卡特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来展示实力并压制国内的政治对手，其中包括正在与卡特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布热津斯基致信卡特，我知道“你可能会被这封信激怒”，但是当务之急是强化美国的国防，建设

① 万斯，《艰难的抉择》，358—364；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346—353；卡特，《坚定信念》，262—264。

②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13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并且传递出在必要时刻会动用武力的决心。来自大都市的布热津斯基在给他来自外省的老板卡特的信中引用了一句法语的谚语:“*c'est le ton qui fait la chanson* (一首歌最重要的是曲调)。”^①

他的这封信的确激怒了卡特总统,但是并未成功地说服卡特。布热津斯基抨击了国务院的无能,但尽管如此卡特还是采纳了万斯所建议的方针,在整个九月万斯要求情报部门重新审核他们之前给出的苏联在古巴有驻军的情报。随着情报部门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苏联在古巴的这支部队已经在古巴驻扎了多年,可能从1962年起就一直秘密驻扎在古巴,而之前的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都默认了他们的存在,并不认为这支部队构成任何威胁。苏联并不是在最近才在古巴安插“作战部队”;根本就没有新的威胁。^②但是整整一个月的负面报道给国会就第二阶段限制武器协议的审批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10月1日向全国发表的一次演讲中,卡特承认苏联在古巴部署军队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或容易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的“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差异,尽管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仍将持续,但是在一些关乎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诸如遏制军备竞赛,双方寻求合作的需求应当得到最优先的考虑。克里姆林宫已经作出了适当的保证,在古巴的驻军人数并不会增加,而这支部队在古巴的唯一使命,即帮助训练古巴军队,不会改变。这是一条好消息,但是卡特宣布他本人也会采取应对措施,组建一支加勒比海地区特遣部队来监控局势的发展,并将其司令部设在基韦斯特市(Key West),以便在必要时采取迅速行动。他将授权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向加勒比海地区各国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以帮助“生活窘困的人们……抵抗社会动荡和可能的共产党夺权”;他将巩固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势力;提升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实力。

但是卡特想要表达的重点是苏联在古巴部署军队绝对不应该成为双方回到冷战局面的理由。“对抗可能会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内满足一些人的情绪,但是却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土安全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在演讲临近结束时,他强调道,“我们

① 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13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同时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17日,文件箱10,古巴,出处同上;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18日,文件箱9,中国,出处同上;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21日,文件箱42,出处同上;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346—353。

② 万斯,《艰难的抉择》,360—364;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9年9月27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79年9月27日,苏联,直立式档案柜,卡特图书馆。



绝不能以美国的国土安全为代价[,]……不能以人类种族的命运为代价[,]……不能以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为代价,来玩弄政治权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重要性远远大过这个孤立事件,因为这份协议——对我们国家,我们的盟友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进程极为关键。”^①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卡特仍然毫不动摇。他并未忽视不少人向他提出的有关苏联军事实力迅速提升的警告,但是他拒绝为此感到恐慌。他会扩大美国的国防开支,部署MX系列导弹,并组建一支能够在中东地区和波斯湾执行任务的部队。他将派国防部长布朗前往中国,以显示美国新的战略定位的进一步发展,他将提请北约盟国接受新一代的核武器,包括巡航导弹和潘兴II代导弹。但是他并未忽视缓和,也未放弃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

他在会见新教皇时感到非常高兴。怀着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与对上帝的尊崇,来自克拉科夫的前红衣主教卡罗·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是当代的标志性人物。在这场争取人心的斗争中,卡特总统和保罗二世教皇深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满足不了人们对意义、自我实现和机遇的追求和渴望。卡特在10月9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苏联强制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而我们的做法与之相反。苏联是一个持无神论的国家;而我们在本质上怀着深刻的宗教信仰。……因此我”对于同苏联进行和平竞争“心中不存一丝恐惧或惊慌”。^②

卡特很清楚东欧的动荡正在升级,尤其是在波兰。布热津斯基告诉他,波兰形势的发展代表着“整个苏维埃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化,同时也是苏联对他国控制力被削弱的标志”。尽管苏联的军事实力强大得令人生畏,但苏联只是外强中干,同时官僚主义导致社会停滞不前,而苏联正在经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布热津斯基主张,美国能够利用苏联的这些弱点,通过运用机敏的政策,美国可能还可以在苏联和一些附庸国之间制造分歧。^③ 中央情报局报告说,苏联国内的艰难时期

① 卡特向全国发表的演讲,1979年10月1日,收录于纽瑟姆,《苏联驻古巴的部队》,81—86;同时参见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言论,1979年10月9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838。

② 关于卡特在会见了教皇之后的思考,参见他的讲话以及一次问答会议,1979年10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940—1941;引文参见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79年10月9日,出处同上,1839;同时参见朱特,《战后》,585—587。

③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296—300,463—467,引自464;另一条引文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9月13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关于波兰和东欧局势的发展,参见“全球竞赛”中的讨论,237—250,263—264;同时参见本内特·科夫里格(Bennett Kovrig),《墙与桥:美国与东欧》(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1,121—130,177—180。



使此刻成为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来“激化苏联国内的种族矛盾”，“腐蚀苏联共产党的权威，并提出质疑苏联经济体系有效性的问题”。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曾经能够动员群众为崇高的社会目标而作出个人牺牲的力量正在逐步衰退”。^①

但是“萎靡不振”的情绪同样也困扰着西方社会。而卡特正视这一问题的意愿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反而招致了不少批评家的抨击，他们都将这种低迷的情绪归咎于卡特。^② 他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徘徊。民意调查专家帕特里克·卡德尔(Patrick Caddell)警告卡特说，在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泰德·肯尼迪。尽管美国人民欣赏他的个性，但是他们对他的领导却充满了不满。“民众每天都在作出判断……我们总是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我们总是在被动地对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主导事态的发展。”除非卡特能够表现得更为大胆并且采取更为有力的领导作风，否则他将在下一轮的竞选中失败。卡德尔写道：“我恳请您立即采取行动。”^③

在卡德尔结束他的调查之际，伊朗的形势却急剧恶化。几个月来，伊朗的革命正沿着一条更为激进的伊斯兰教道路发展，伊朗国内对美国的谴责也与日俱增。伊朗革命领袖警告华盛顿不要让濒死的伊朗流亡前沙皇前往美国接受治疗，但是卡特最终同意了伊朗前沙皇许多颇有权势的朋友的请求允许他入境。伊朗人对此极为愤怒。11月1日超过两百万的示威者在德黑兰的大街小巷举行游行，高呼“美国去死！”的口号。三天之后，年轻的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攻占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阿亚图拉·霍梅尼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他们。几周过去之后，52名美国人质仍然没有被释放。美国的无力和卡特的软弱变得更为突出明显。汉密尔顿·乔丹，现任总统的参谋长，致信卡特：“美国人民对我们国家居然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来解救人质，未能以一种让我们感觉更为良好的方式进行报复感到非常失望。”^④

卡特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同时呼吁伊朗政府释放人质。他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并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他表示，美国“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美国的政

① 中央情报局，“消费者的失望情绪与苏联政权”，1979年8月2日，iii-vi，文件箱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关于卡特对“社会上弥漫的萎靡不振情绪”的再次重申，参见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79年10月9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1842—1843。

③ 卡德尔致卡特，1979年11月6日，文件箱33，陆军参谋长文档，卡特图书馆。

④ 乔丹致卡特，[未标注日期；1979年11月上旬？]，文件箱34，出处同上；比尔，《鹰与狮》，294—295。



策”，同时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人质受到伤害，那么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听说阿亚图拉可能会以间谍罪为由审讯美国人质，卡特变得更为愤怒。他猛烈抨击统治德黑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伊朗所采取的行动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一个国家政府居然会为聚众暴乱和恐怖主义鼓掌欢呼，这个政府居然明目张胆地支持，事实上，参与了劫持和扣押人质，这样的行径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不仅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抛弃了人类所共有的民族和宗教传统。世界上绝对没有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会宽恕绑架行为，也绝对没有哪种宗教信仰会宽恕敲诈行为。^①

美国人民支持卡特总统，但是期望他能够作出更为勇敢的领导。当汉密尔顿·乔丹 12 岁的小外甥告诉他说“学校里的朋友们说吉米·卡特没有胆量干任何事情”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卡特知道国民是怎样看待他的。如果“我问普莱恩斯[他的故乡]的人们，我应该怎么办，他们每个人都会对我说，‘轰炸伊朗！’”^②

然而卡特仍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他要求美国国民不要粗鲁地对待在美国定居的伊朗人，同时减少对石油的消耗量。当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受到奚落——霍梅尼“相信你没有胆量来动用军事力量”——卡特对此言论作出了克制的回应。他表示，他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更倾向于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这场危机。他在 12 月 13 日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在越南已经得到了教训，即“如果我们不必要地在与我们自身安全并无关联的情况下卷入了他国内政，那么我们将铸成大错”^③。但是他并没有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布热津斯基和布朗敦促他尝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人质的安危还是次要问题，他更担心美国在波斯湾的地位受此影响而大为削弱。“我建议采取一系列步骤来提升我们维护该地区安全的实力，同时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包括可能

① 引文参见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集会上发表的讲话，1979 年 11 月 15 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2123；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79 年 11 月 28 日，出处同上，2168，2167。

② 乔丹，《危机》，69—70，55。

③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79 年 11 月 28 日，《总统公开文件：卡特，1979》，2168；讲话以及一次问答会议，1979 年 12 月 13 日，出处同上，2240；关于各方的意见，参见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 年 12 月 21 日，文件箱 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会支持伊朗反对派推翻霍梅尼的行动。”^①在布热津斯基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的页脚上,卡特写道,他的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应当考虑“所有霍梅尼不愿意看到发生的事情,同时所采取的行动不能激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谴责”^②。

卡特总统受到了来自各方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诱惑,然而他是一个自律到近乎顽固的人,同时他仍然希望能够给美苏缓和留有一丝生机。他坚持不采取行动,静候时机。他仍然希望能够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获得通过之后欢迎勃列日涅夫来华盛顿访问。^③

卡特希望克里姆林宫能够分享他所优先考虑的重点问题,并表现出相同程度的自我克制。然而他想错了。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迫切地希望利用美国在中美洲和波斯湾所面临的困境。勃列日涅夫向设在马那瓜的桑地诺政府拍去贺电,祝贺该政权所取得的英雄式的胜利。8月8日,一架苏联民航总局的伊尔76运输机满载着苏联工会捐赠的医疗设备和婴儿食品降落在尼加拉瓜。^④9月18日在一次象征性的演讲中,苏联最重要的党内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公开表示支持限制战略武器,渴望世界和平,并宣告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阿富汗、柬埔寨和尼加拉瓜,“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经历了彻底的失败”。“在世界形势发展的复杂进程中,人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要趋势——即[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以及世界革命进程的稳步发展。”^⑤

但是非殖民化、革命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混乱不仅带来了机遇,同时也滋生了危险。保持警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志之一,而苏联领导人从未停止互相告诫要时刻保持警惕。^⑥他们对阿富汗的动荡局面保持警惕。他们在喀布尔的新同志的残暴作风,缺乏领导才干和不可靠性增强了他们的受威胁感。此外,政治伊斯兰可

①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准则》,484—485;布热津斯基致卡特,1979年12月14日和21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② 参见卡特在布热津斯基致卡特的信件上作的评论,1979年12月21日,文件箱42,布热津斯基集,卡特图书馆。

③ 12月6日,多勃雷宁和布热津斯基仍然在讨论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可能性。参见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156。

④ 《苏联与第三世界》(*USSR and the Third World*)9(1979年6月1日—11月30日):83。

⑤ 苏斯洛夫的演讲,1979年9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9月21日,R 8。

⑥ 参见,例如,乌斯季诺夫的演讲,1979年11月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1月7日,F 19;B·N·波诺马廖夫,“共产国际成立六十周年纪念”(“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收录于B·N·波诺马廖夫,《波诺马廖夫讲话和文集选》(*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牛津,英国:培格曼出版社,1981,335—351。



能会呈蔓延的趋势。1979年6月12日,阿亚图拉·霍梅尼告知苏联驻德黑兰的大使:“我们希望,阿富汗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应当以伊斯兰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苏联对阿富汗的干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我们要求苏联停止干涉阿富汗的内政。”^①

克里姆林宫并不希望对阿富汗作出军事干涉。勃列日涅夫责成政治局的一个委员会全权负责这件事,这个委员会由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组成。他们在所作的报告中公开声明将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指导和经济援助,并动员更多的苏联军事顾问与阿富汗军队合作,动员更多的苏联专家加入阿富汗的政府部门以协助管理。但是他们知道阿富汗革命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喀布尔的共产党政权是否愿意扩大其政治基础,合理分配土地,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克里姆林宫希望塔拉基和阿明制订改革方案,同时停止对异己的血腥屠杀。苏联官员呼吁阿富汗“在革命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程度的法制化,并恢复社会秩序”。镇压手段的使用必须得到节制。“不应当在偶然的,无法核实的证据的基础上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应当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对待穆斯林神职人员。“可以通过鼓励宗教自由化来降低他们的影响力,同时向国民保证新政权不会把神职人员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迫害,但是如果有人采取反对革命体系的行动,他们将会受到政府的惩罚。”^②

但是塔拉基和阿明继续要求苏联在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指导之外向阿富汗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在与苏联官员的多次会议中,他们请求苏联派出空降师和地面作战部队,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伊朗、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中国和美国都在支持阿富汗国内的叛乱分子。^③ 苏联官员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程度的威胁值得苏联作出如此大的牺牲,认为不值得为塔拉基和阿明采取如此冒险的行动。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总结道,阿富汗政府的问题只是由于该国领导人滥用职权使国内矛盾变得“进一步激化”。“阿富汗共产党内和政府内部都缺乏一种平等分权的领导作风,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塔拉基和阿明手中,而这两个人总是在不断犯错并做出违法行为。”^④

① 《苏联与第三世界》9(1979年6月1日—11月30日):57。

② 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1979年4月12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3(1993年秋):67—69。

③ 参见,例如,普扎诺夫与塔拉基会谈备忘录,1979年7月10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53;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1979年7月19日—20日,出处同上;戈列洛夫与阿明的会谈,1979年8月11日,出处同上,153—154;I·帕夫洛夫斯基的报告,出处同上,154。

④ 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1979年6月28日,出处同上,152。

1979年8月底，克里姆林宫的高官们决定解除阿明的权力。他正在密谋推翻塔拉基，并且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驻喀布尔的克格勃官员已经厌倦了与他打交道。苏联认定阿明应当为镇压国民并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那些本质上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性质的问题负责。^①9月塔拉基在前往哈瓦那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途中，以及在他返回喀布尔的途中，先后两次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并与苏联官员进行会谈。9月10日，勃列日涅夫向他宣读了由克格勃拟定的，并得到了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批准的决议。勃列日涅夫表示，“如果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他人手中，即使这个人是你最为亲近的幕僚，都可能会危及阿富汗革命的前途。”他接着说道，现在这条讯息已经变得非常清晰了：塔拉基必须除去阿明。^②

克里姆林宫策划了一个非常详尽的铲除阿明的计划。在返回喀布尔之后，塔拉基和他的一些共谋者试图执行这个计划。然而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事态发生了逆火式的变化。阿明胜出，囚禁了塔拉基，并杀害了他。^③

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们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与阿明合作，尽管他们知道阿明对权力有着无法遏制的欲望，同时对待异己极其残忍。勃列日涅夫承认：“我们对阿明采取的所有方法和行动感到非常不满意。”他“对权力有着过于强烈的渴望”，同时显示出“与之不相称的残酷无情”。但是人们不能“无视当前局势的现状”，苏联高官向他们在东德的同志们这样解释道，他们希望能够遏制阿明的过火行为。他们希望阿明能够和阿富汗国内“真正的革命者”合作，这些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献身精神是不应受到质疑的。同时，他们密切地监视他，“观察他是否信守承诺”。^④

但是根本无法与阿明打交道。他不断地要求克里姆林宫给予更多的援助。苏联的官员无法控制他，也不信任他。10月29日，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向勃列日涅夫呈递了另一份报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但同时也承认他们还不打算现在就放弃阿明。阿明的镇压行动又进一步扩大。他的“行动在进步力量内部激起了更大的动荡”。他对苏联的态度和行动“更为清晰地揭露了他的虚伪和奸诈”。表面上他伪装出认同苏联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他正在煽动国内的反苏情

① 米特罗欣，“在阿富汗的克格勃”，41—45；韦斯塔，《全球冷战》，312—313。

② 米特罗欣，“在阿富汗的克格勃”，45—46。

③ 利亚霍夫斯基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77—80；韦斯塔，《全球冷战》，311—313；米特罗欣，“在阿富汗的克格勃”，45—53。

④ 勃列日涅夫与何内克会晤记录，1979年10月4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56—157；苏共中央委员会给何内克的讯息，1979年10月1日，出处同上，156。



绪。更为糟糕的是，他正在向美国主动示好。但是苏联此刻仍然对阿明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试图发挥这种影响力，因为他们最为根本的前提“是不能让反革命赢得胜利”。^①

然而，数周之后失败的阴影更为不祥地盘旋在阿富汗上空。苏联军事顾问和在阿富汗活动的克格勃成员只取得了非常小的成果。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变得更为警惕，同时也更为不安。12月2日，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送去一份手写的便条：“我们已经收到关于阿明幕后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表明他可能已经转而投奔西方。”^②阿富汗四月革命的成果正在受到威胁；苏联的安全也正受到威胁。

几天之后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苏斯洛夫。他们觉察到了危险。他们讨论了苏联南部国境缺乏有效的空中防御，研究了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建立前沿基地并且部署潘兴II导弹，将对苏联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未来伊朗或巴基斯坦利用阿富汗铀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意识到该地区各种族之间的敌对状态，并反复思考了阿富汗可能发生的分裂以及巴基斯坦的扩张。他们甚至讨论了美国所声称要创造一个“全新的大奥斯曼帝国”的计划，这个帝国将会吞并苏联南部的不少加盟共和国。^③ 时任苏联总参谋部军事计划主任的瓦伦丁·瓦列尼科夫(Valentin Varennikov)回忆道：“我们非常担心，如果美国被逐出伊朗，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把他们的基地转移到巴基斯坦并进而攫取阿富汗。……我们认为他们会尝试在阿富汗北部建立情报中心。”^④

勃列日涅夫最亲密的高级顾问们作出决定，他们必须除去阿明。他们计划扶持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替代阿明，他比阿明更为可靠，同时对苏联的忧虑和利益作出了更为积极的回应，但是他们知道卡尔迈勒可能会需要苏联提供帮助以巩固政权并维持社会秩序。虽然是很不情愿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向阿富汗部署作战部队来协助他。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他们的同事们并不打算把对阿富汗的干涉拖延很久，也不希望看到苏联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所派出的军队的职责只是确保在一次血腥的军事政变之后协助阿富

① 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委员会，[1979年10月29日]，收录于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New Russian Evidence”)，10—15；同时收录于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57—158。

② 引文出自多勃雷宁，“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90；同时参见安德罗波夫致勃列日涅夫[1979年12月初]，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8—9(1996年/1997年)：159。

③ 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3—25。

④ 瓦列尼科夫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73；同时参见韦斯塔，《全球冷战》，320。

汗维持过渡期的社会治安。卡尔迈勒将会施行他们长久以来就期望看到的社会改革。阿富汗社会将恢复秩序。然后苏联军队就可以撤离。“别担心,阿纳托利,”勃列日涅夫告诉多勃雷宁,“我们会在三到四周的时间内结束这场战争。”^①

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高级将领们却反对出兵干涉阿富汗。他们担心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可能会消耗苏联军队的实力,降低苏联军队的士气。苏联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参加了12月10日的一次最高决策层会议。他情绪激动地表示,对阿富汗的干涉将会使所有的穆斯林团结起来,让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的眼中丢尽颜面。安德罗波夫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不要管军事事务以外的问题。奥加尔科夫坚持己见,但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契尔年科、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和基里连科并未听取他的意见。勃列日涅夫表示,大家应当支持安德罗波夫的意见。^②

苏联开始为在阿富汗部署军队,颠覆阿明,并为扶持卡尔迈勒上台做准备。但是苏联的最高决策层仍然感到不安。安德罗波夫的保健医生从未见他如此紧张。勃列日涅夫非常生气,觉得阿明背叛了莫斯科的友谊。^③当苏联最终于12月12日作出干涉阿富汗的决定时,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是这项决议的主要支持者;勃列日涅夫用颤抖的手签署了向阿富汗派遣军队的指令。而对此项决定持反对意见的人,比如柯西金,并未参加最后的会议。在几个月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举棋不定和焦虑不安之后,苏联终于作出了致命的决定。勃列日涅夫最为亲近的幕僚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ksandrov-Agentov)表示:“绝不能让阿富汗落入美国人的手中。”^④

当苏联领导人作出干涉阿富汗的决定之时,他们看到的只有威胁,而非机会。绝不能相信帝国主义者。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已经决意在欧洲部署新的核力量。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美国的这一决定威胁到了对等安全的原则,而这条原则正是维持缓和的前提。勃列日涅夫曾警告说不希望看到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升级,他甚至主动提出削减SS-20导弹的数量,即使西方只发表言论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北约的领导人在12月12日给出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同苏联进行会谈,但是并不会停止在西欧部署

① 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95;同时参见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3—25;韦斯塔,《全球冷战》,316—326。

② 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4—26;格里布科夫的评论,“全球竞赛”,291。

③ 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2—23。

④ 引文参见布鲁坚茨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177;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8—40;同时参见韦斯塔,《全球冷战》,320—321。

464枚地射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108枚潘兴II代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美国人再次寻求通过实力来进行谈判。华盛顿渴望拥有先发制人的实力，从而要挟苏联。苏联的领导人总结道：“在[北约]领导人作出了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之后，苏联已经一无所有。”^①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觉得苏联已经处于易受攻击的下风，因此他们决定不能在阿富汗问题上冒险。

同时苏联认为美国可能会对伊朗进行干涉。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超级大国会让自己的外交官长时间地被另一个国家扣为人质。葛罗米柯警告美国不要在苏联的周边地区动用武力。美国人应当保持镇定，采取冷静的行动，防止情绪沸腾失控。多勃雷宁前去拜访布热津斯基，他表示：“如果美国动用军事力量对我们南部邻国进行武力干涉的话，我们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卡特“会采取些行动”。^②

伊朗的动荡局面显露出不祥的征兆。阿亚图拉·霍梅尼对共产党的敌视仅次于他对美国的仇视。驻德黑兰的克格勃情报主任回忆道：“伊朗人说有两个恶魔，大的一个是美国，小的一个是苏联。”苏联人一直担心伊朗境内狂热的伊斯兰宗教情绪会蔓延到阿富汗，而苏联无法预估这种影响的后果，尤其阿明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最终美国有可能会成功地在苏联的边境驻扎下来。^③

勃列日涅夫觉得很沮丧。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而他的同事们不断让他失望。他对党的干部能够完成本职工作充满了信任，但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尽管他已病人膏肓，但是他仍然对令人堪忧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11月27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讲。出于礼节，他总结了最近刚过去的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但是他马上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批评。苏联正在遭遇瓶颈、匮乏、低效率和不称职。我们投资了数目巨大的资金，“然而我们所取得的最终结果远比我们应当取得的成果要小得多，也远比我们所能取得的成果要小得多”。应当把更

① 引文参见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7—28；关于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战区核武器的现代化进程表示关注和焦虑，参见勃列日涅夫在东柏林发表的演讲，1979年10月6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0月9日，F 1—5；勃列日涅夫回答问题，1979年11月5日，出处同上，1979年11月6日，AA 1；乌斯季诺夫的演讲，1979年11月7日，出处同上，P18—20；波诺马廖夫，“为了缓和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In the Interests of Détent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1979年11月18日，出处同上，1979年11月20日，G 3；葛罗米柯的讲话和新闻发布会，1979年11月23日，出处同上，1979年11月26日，G 1—7；多勃雷宁，《机密》，429—433。

② 葛罗米柯的讲话和新闻发布会，1979年11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1月26日，G 4；多勃雷宁，《机密》，437；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54—55。

③ 引文参见舍巴尔申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42—43；同时参见韦斯塔，《全球冷战》，323—326。



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运输、燃油、能源和冶金上。但是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共产党未能满足苏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感到尤为不满。苏联人民对药品、肥皂、洗衣粉、牙刷、牙膏,以及针线等基本生活消费品短缺的抱怨蜂拥而至。“同志们,这是不可原谅的失职。”在谈及对新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时,勃列日涅夫告诫苏共官员,他们必须变得更富创新精神,同时更为自律。他们必须满足“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他警告道,那些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的官员将会丢掉他们的职位。绝对不能容忍管理不善现象的存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集中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而这种制度应当为底层人民的意愿开启更为宽阔的愿景。”^①

勃列日涅夫的身体愈发虚弱,但是他的头脑却没有因此而变得不清醒,即使是在他向阿富汗派遣作战部队的时候。^② 他的社会体制在国内运转不畅,而在国外则面临种种挑战。如果缓和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将有益于苏联领导层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如何解决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他们清楚地知道,军备竞赛“吞噬了极大数量的资源,损害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将沉重的负担压在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肩上”^③。但是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并未超过苏联对国家安全的顾虑。时刻对外部敌人保持警惕,是勃列日涅夫这一代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历史教训。这一点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历的核心所在。

在批准了向阿富汗派遣军队的决定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何内克分享倾吐了他内心的沮丧情绪。华盛顿和波恩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勃列日涅夫向他说道。他们作出在欧洲部署新一代中程核武器的计划是“对缓和的沉重打击”。更糟的是,现在美国看来是不会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因为美国国内对苏联在古巴驻军那歇斯底里式的大肆宣扬已经完全扼杀了该协议获得通过的机遇。美国人想要“敲诈”克里姆林宫,希望“强迫苏联作出让步”。他们同时想打“中国牌”,鼓励北京有所动作。我们必须“小心提防,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勃列日涅夫强调说。^④

带着沮丧的心情,拖着沉重的病体,怀着愤恨,勃列日涅夫终于下定决心,作出了致命的决定。当西方都在为1979年圣诞节的到来做着准备时,美苏缓和随风而逝。

①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发表的讲话,1979年11月2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1月29日,R 1—13,引文参见R 4,9,10,12。

② 利亚霍夫斯基,“新俄罗斯的证据”,22。

③ 波诺马廖夫,“为了缓和的利益,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1979年11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79年11月20日,G 3。

④ [东德]何内克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速记记录,1979年10月4日,“911资料册”(“The September 11 Sourcebooks”),国家安全档案。



缓和期的结束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与美国一起谋杀了缓和,这曾经是他十年前协助发起的一项政策。尽管他在作出决定时内心充满了挣扎,吉米·卡特在对勃列日涅夫的行动作出的反应上却没有任何犹豫和痛苦。他在电话中告诉汉密尔顿·乔丹,这“是蓄意的侵略,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缓和,以及过去十年我们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方式,这使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重新审视苏联的意图,同时也摧毁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国会获得批准通过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使得核战争的危險变得更为巨大”^①。

在12月28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卡特毫不避讳地表达他的真实想法。苏联的行为是对和平的明显威胁,违背了缓和的原则,并且是对“所有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的”侮辱。对一个不结盟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标志着你们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方式把动用武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除非你们停止当前的军事行动,否则这必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到美苏在全球的双边关系”。^②

勃列日涅夫对这样的指控无动于衷,并为苏联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表示,莫斯科只不过是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作出了回应,而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只有一个目的:帮助阿富汗抵御来自国外的入侵。苏联的军队不会在阿富汗驻扎很长时间,勃列日涅夫向卡特这样保证。同时,他建议卡特总统保持冷静。美国所发出的“无节制的言论已经是对我们的当头一棒了”。之前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不应就此白费。苏联并不希望放弃缓和,同时也希望美国能够看到维持缓和给双方带来的好处。^③

但是,对卡特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拖延含糊的机会了。一旦苏联军队踏入了阿富汗境内,就等于宣告了缓和的终结。他从莫斯科召回了驻苏大使,并减少了同苏联的外交往来。他请求国会暂缓考虑是否通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他减少了同苏联的贸易往来,停止向苏联出售高科技项目,对苏联施行了粮食禁运,同时限制苏联在美国领海外捕鱼的权利。他表示,美国运动员不会参加将于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他积极推动增加国防拨款,并加速组建一支迅速反应部队。他增

① 乔丹,《危机》,99。

②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1979年12月28日,文件箱17,普莱恩斯文档,卡特图书馆。

③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1979年12月29日,出处同上。

强了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 并鼓励沙特阿拉伯援助巴基斯坦。^①

在一系列的访谈、宣言和演讲中, 卡特一再解释了他的想法、动机和忧虑。“刚刚过去的两个月对我们国家而言是非常不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些挑战最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②“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③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离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极为接近。他们可能会控制整个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 而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石油出口来自这一地区。因此, 苏联的军事行动“构成了对一个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的盟友国利益密切相关地区的极大威胁”^④。美国的立场必须非常清晰, 卡特告诉美国人民: “任何外来的试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力量都必须被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攻击, 而这种攻击行为必须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来予以击退, 包括动用武力。”这标志着卡特主义的诞生, 遏制政策的重新抬头, 以及冷战的全面恢复。^⑤

卡特宣告道: “我们在动荡、冲突和变革中迎来了 1980 年代。”^⑥苏联握有了充分的扩张机遇; 这对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威胁是毫无争议的, 也是不可估算的。弗里茨·埃尔马斯(Fritz Ermath), 作为布热津斯基班子里的苏联专家, 生动地总结了美国的危机意识:

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极其尖锐地增加了苏联最终主导整个大中东地区, 并且将美国从该地区排挤出去的前景, 或许以色列会是唯一的例外。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由苏联参与的伊朗内乱, 也门北部发生[共产党性质的]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夺权, 从而增强苏联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制造动荡局面的能力, 同时强化苏联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实力, 以迫使这些国家朝着更符合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⑦

① 关于卡特采取的行动, 参见, 《总统公开文件: 卡特, 1980》, 11, 12, 23—24, 87—88, 106;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阿富汗问题召开的会议, 1980年1月, 收录于韦斯塔, 《缓和的终结》, 332—351。

② 在白宫为宗教领袖召开的简报会上发表的言论, 1980年1月10日, 《总统公开文件: 卡特, 1980》, 49。

③ 在白宫为国会议员召开的简报会上发表的言论, 1980年1月8日, 出处同上, 40; 在问答议程中发表的言论, 1980年1月15日, 出处同上, 87; 演讲, 1980年1月23日, 出处同上, 196。

④ 接受《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的访谈, 1980年1月20日, 出处同上, 108; 在国会两院联合会议上发表的演讲, 1980年1月23日, 出处同上, 197。

⑤ 在国会两院联合会议上发表的演讲, 1980年1月23日, 出处同上, 194—200, 引自 197。

⑥ 出处同上, 194。

⑦ 弗里茨·埃尔马斯致布热津斯基, 1980年1月2日, 与“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大会相关的文件集。



美国对苏联动机的评估就和苏联对危险的认知一样错误百出。当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时，万斯诚心地问他：苏联军队是否会进入巴基斯坦或伊朗境内？对多勃雷宁而言，这个问题是非常荒谬的。政治局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向这些国家派遣军队。勃列日涅夫远未像美国所想的那样拥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事实上他曾经询问过多勃雷宁，“所谓的‘危机之弧’究竟指的是什么地区？”布热津斯基所声称的克里姆林宫所密谋攫取的目标地区究竟在世界上的哪个位置？^① 苏联人不能理解美国人为何会如此恐惧；而美国人也未能理解苏联对危机的认知。多勃雷宁表示，“你们认为我们想要控制中东的油田；我们认为你们想要以军事实力来对我们施压——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同时美国以占优势的地位来对我们施加压力。”^②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恐惧左右着政策的制定：当然，苏联非常期望能够保卫他们周边国境的安全，同时美国非常期望保卫波斯湾的油田，但是美国并未寻求在阿富汗驻军，而苏联也并未追求掌控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困扰着美苏两国领导人的恐惧并非来自对对方真实意图的准确评估，而是源自深深植根于他们心中的有关动机和企图的意识形态准则。

尽管卡特和勃列日涅夫都相信自身的社会体系能够更好地赢得世界各地人民的支持，他们治下的社会都经历了受经济动荡和政治风波的时代影响而逐渐失去民众信任的危机。缓和对于双方只是一种暂时减轻军备竞赛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的缓兵之计，以便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能够致力于解决国内的首要问题，并确保本国能够免受核战争的威胁。对勃列日涅夫和卡特而言，缓和让他们得以一瞥一个更为理性的，能让双方和平竞争并取得经济进步的世界。然而缓和并未熄灭他们的期望，也未缓和他们的恐惧。因此当动荡世界局势中的无情变化强化了他们对自身劣势的认知时，当形势逐渐朝着对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对手有利的方向发展时（这些局外人从未相信缓和是争取人心的竞争的合理框架），美苏缓和踉踉跄跄地走到了终点。

^① 多勃雷宁，《机密》，446—447；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22—23。

^② 多勃雷宁的评论，“出兵干预阿富汗以及缓和的终结”，219。

第五章

冷战的终结, 1985—1990:

戈尔巴乔夫, 里根和布什

1985年3月13日的克里姆林宫, 副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大使阿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第一次与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举行会晤。戈尔巴乔夫的上任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在不久前卸任。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所表达出的敬意予以感谢, 并就苏联政府的目标作出了意义重大的声明。“苏联并不存在扩张主义的野心。……苏联从未想过与美国作战, 如今也并无此意。苏联领导人从未产生过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 现在也没有。苏联人民尊重贵国自由选择治国之道的权利。……至于哪种体制更具优越性, 就留给历史来评判吧。”

布什对此作出回应, 随后邀请舒尔茨发表致词。“里根总统嘱咐我要与您以诚相待, 他让我转告您: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相信, 这是人类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国务卿对戈尔巴乔夫说道, “您接过了总书记之职, 罗纳德·里根也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里根总统已经做好了与您合作的准备。”他邀请您“尽早访问美国。……若能达成重要的协议, 越早越好”。

戈尔巴乔夫于是说道: “这确实是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我已准备好将苏美关系拉回到正常轨道。我们很有必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 找时间就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商讨, 并要努力寻找增进两国关系的途径。”^①

^① 乔治·P·舒尔茨,《骚乱与胜利:我任美国国务卿的岁月》(*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纽约: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出版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3, 531—532。



美利坚的清晨

四年来，罗纳德·里根总统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内寻找谈判伙伴。对此，很少会有人持怀疑态度，由于其尖锐的言辞、坚定的信念以及稳固的防务，他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的形象是最冷面的“冷战斗士”。20世纪70年代，早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他已是对缓和政策提出最严厉批评的人之一。他攻击了由卡特总统参与谈判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并严厉谴责了苏联在第三世界中的冒险主义。但他并不仅仅对苏联的所作所为采取敌视态度。他所痛恨的其实是苏联的体制。“共产主义已存在了不下半个世纪，而一旦像共产主义这样的病毒继续蔓延，”他在1975年的一次广播准备稿中写道，“我们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它实际上是多么邪恶……共产主义既非经济体制，又非政治体制——它只是一种荒唐的形式——一次终将因其背离人性而消失于世的短暂越轨。”^①

此番言辞并不单单是为其竞选开路。当他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有人问及了苏联的长远意图。他表示，其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就是要推进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推广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里根补充道：“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保留了犯罪、撒谎和欺骗的权利。”^②共产主义者向来以“背叛、欺骗、毁灭和血腥”为信念。^③他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人类生活的圣洁。他们玷污了人类的精神。“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里根在其总统生涯里最著名的演讲中讲道，“当他们宣扬其政体至高无上的权力，宣称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无限权威，预言其终将统治全人类之时，他们其实是现代世界的邪恶轴心。”^④

虽然罗纳德·里根憎恨共产主义，他却并不像之前的历任总统那般惧怕共产主义。对于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充分相信其优越性。“西方国家不会接纳共

① 基龙·K·斯金纳(Kiron K. Skinner),安娜莉丝·安德森(Annelise Anderson),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编),《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里根》(*Reagan In His Own Hand*),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2001,10—12。
 ②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1981年1月29日,《总统公开文件:罗纳德·里根》(*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82,57。
 ③ 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里根》,15。
 ④ “在全国福音教派协会年会上的发言”(“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1983年3月8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3》,743。



产主义,”他于1981年5月17日对圣母玛利亚大学的毕业生说,“共产主义会被超越。”^①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或许正鼓吹着共产主义必将取得最终胜利,但罗纳德·里根看到的是另一种现实。1982年6月,在对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他重新演绎了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黑海的瓦尔纳,由极权主义建立起的政权花费了30年的时间为自己赢得合法权。但是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胆敢冒险进行自由选举。用武力赢得的政权是不会生根发芽的。”^②

“民主并不是一朵弱不禁风的花”,里根宣称,资本主义亦并非是行将就木的体制。他在1982年说道:“今天,我们正亲眼目睹一场革命性的重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发生了正面的冲突。但是危机没有降临在马克思主义笼罩之外的自由西方国家,而是在马列主义的故乡苏联,是苏联在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它剥夺了其公民的自由与尊严。”^③

国际体制中出现了新的动态。20世纪70年代,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解体,非殖民化时代也宣告结束。苏联无法继续利用所谓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抑或将自己塑造为成功发展的典范。民族主义革命者不再成群涌向莫斯科,到那里学习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秘诀。苏联的经济四面楚歌,而那些亏欠西方国家巨额借款的东欧国家也深陷泥潭。由于肉价上涨,愤怒的波兰工人于1980年夏举行了大罢工,要求成立独立工会并自由表达意愿。一场名副其实的团结工联运动得到了波兰人民的广泛支持,向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发出了挑战,要求波兰政府遵守《欧安会最后文件》中关于人权的相关规定。尽管克里姆林宫威胁要采取军事干涉,波兰政府也在1982年12月宣布了戒严令,这场运动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团结工会的影响不容忽视。里根宣称,“民主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聚集新生力量”,全人类正在抵抗“这个政体的专横跋扈”,人们拒绝“个人利益服从于超级大国利益”的呼声随处可闻,所有人都意识到“集体主义压制了人类最可贵的冲动”。里根预言,如果人们面临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民主而非专制。^④

里根对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颇为自信,这意味着他乐于接受与克里姆林宫的和平竞争。他并不像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般穷兵黩武,但他坚信能够通过力量优势赢得和平,更自信有能力与克里姆林宫打好交道。里根对于结束冷战的特殊贡献并非他在思

①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1》,434。

② “对英国议会议员的致辞”,1982年6月8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2》,743。

③ 出处同上,745。

④ 出处同上,746—747。



想形态上的信念，因为那并没有背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卡特的信念，也并不在于他相信美国必须通过力量优势与苏联谈判，因为该观念在冷战形成阶段的那几年已被杜鲁门和艾奇逊视作通则，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更是对其大加巩固。里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愿意与自己所憎恨的领导层、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人打交道；他愿意以欣赏的眼光看待竞争对手所关切的内容；他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里根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深信自己有能力推动形势变化。“我们意在改变一个国家，”他说，“然而，我们改变了一个世界。”^①当然，只有在天时、地利、人和（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个人品质和信念）之时，这才能成为可能。但里根拥有自己的天赋：个人魅力、核心观念，对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极为乐观。

里根将自传命名为《一个美国人的一生》(*An American Life*)绝非偶然。对他而言，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山丘上的城市，因为它赋予所有公民“触手可及并能使之实现自己梦想的自由”。在美国，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工作表现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每一天都是‘美利坚的清晨’”，这是里根1984年的竞选主题，因为任何人每天都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创业精神和个人创造来决定自己的命运。里根感到，其政治使命就是要捍卫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以及能够赋予人们机遇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他热爱自己的生活，也喜爱身肩总统一职。他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然而在他看来，他本身的人生轨迹表明了自己理想中的那个美国正是过往生活中的这个美国。^②

“他不是一个人复杂的人，”对他最为了解的第二任妻子南希·里根(Nancy Reagan)说，“他有些孤僻，但并不复杂。”他也是她所认识的最乐观的人。“你永远也觉察不到他内心的焦灼。无论有什么样的顾虑，他都从不写在脸上。沮丧？他的词典里没这个词。”^③

① 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里根》，4。

② 罗纳德·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An American Life*)，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90，28，22，27；同时参见卢·坎农(Lou Cannon)，《里根总统：终生的角色》(*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纽约：公共关系(Public Affairs)，2000；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荷兰人：里根传记》(*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an*)，纽约：兰登书屋，1999；理查德·里弗斯(Richard Reeves)，《里根总统：想象力的胜利》(*President Reagan: The Triumph of Imagination*)，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2005；约翰·P·迪更斯(John P. Diggins)，《罗纳德·里根：命运、自由、创造历史》(*Ronald Reagan: Fate,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纽约：W·W·诺顿出版社，2007。

③ 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里根》，xiii；南希·里根，威廉·诺瓦克(William Novak)，《轮到我了：南希·里根自传》(*My Turn: The Memoirs of Nancy Reagan*)，纽约：兰登书屋，1989，104，108。



里根的性格来源有点难以揣摩,但并非无法理解。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失败的鞋商,时常奔波于伊利诺伊的各个小城之间,在芝加哥作短暂停靠。他还是个酒鬼,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对里根的母亲动手,而她唯有默默忍受。^①

孩提时的里根曾四处漂泊,直到他9岁时,全家定居在伊利诺伊的狄克森。他深爱着狄克森;在这个不大的社区里,人们彼此了解,互相关心。但是里根当时并不出众。“我当时性格有点内向,”他回忆说,“可能不太擅长交朋友。”^②罗尼那时“不太合群,”南希在他回忆录中写道,“在他四周始终筑有一道墙。我是他最愿意接近的人,而就连我有时都会感到存在着那么一道屏障。”^③

罗纳德·里根的乐观、沉着和耐心得益于他的母亲。而从父亲那里,他学到了“努力工作和拥有志向的重要性,或许还有一点能言善辩的本领。而我在母亲那里体会到了祈祷的价值,以及怎样让自己拥有梦想并坚信一定能够使其成为现实”^④。南希·里根写道:“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她的信仰伴随她度过了艰难岁月;同时,她乐观得惊人。……罗尼曾说,‘我们很穷,但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一点。’”^⑤

里根的母亲告诉他“生活中万事皆有因果。她表示,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上帝的旨意,哪怕最令人心碎绝望的挫折也不例外”。她教会孩子们不要被挫折打倒。“要避免挫败,避不开的话就尽快让挫败感过去,让生活继续。”^⑥了解里根的人都知道,信仰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罗纳德·里根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⑦

当时在狄克森,不少孩子都没能读大学。里根的父亲没有能力为他支付学费,但是当时被称作“荷兰人”(Dutch)的里根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被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所录取。这是一所有基督教会背景的文理学院,规模不大,离他家乡不远。在校期间,里根获得了一份足球奖学金和一份兼职。比起主修的经济学,他更喜欢运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19—34。

② 出处同上,31。

③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106;坎农,《里根总统》,172—195;莫里斯,《荷兰人》,61。

④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2。

⑤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107。

⑥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0—21。

⑦ 迈克尔·K·迪弗(Michael K. Deaver),《标新立异:我与罗纳德·里根一起度过的30年》(A Different Drummer: My Thirty Years with Ronald Reagan),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2001,68。另参见保罗·肯戈(Paul Kengor),《上帝与罗纳德·里根》(God and Ronald Reagan),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4。



动和表演。^①

里根于1932年毕业,正值经济大萧条最盛之际。和同龄人一样,他历经艰辛谋得一份工作,在爱荷华州的得梅因(Des Moines)担任电台体育解说员。他工作非常努力,竭力完善自己的播音节奏和解说风格,而且他非常喜欢播报大学足球赛和职业棒球赛。在他开始参与选举时,他和父亲一样都站在民主党这边。里根极度崇拜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他喜欢总统的炉边谈话。罗斯福“坚定、温和、自信的声音……让我们坚信能克服任何困难”^②。

20世纪30年代中期,每年到了棒球冬训的季节,里根都会去南加州报道芝加哥小熊队的赛事。1937年,他抓住了去好莱坞试镜的机会。他的声音得到了对方的青睐,尽管他也是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签约之后,他开始了演艺生涯并重新启用了自己的名字——罗纳德。接下来的几年中,二线演员罗纳德·里根接拍了一些受欢迎的电影,收入也相当可观。虽没得到过任何奥斯卡奖项,他还是得到了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的赏识。他谦虚谨慎,诚实可靠,勤奋努力。他还是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总能很快记住台词。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正是他事业的鼎盛期。作为预备役军官,他很快被派去服役,但由于视力不佳,他并未被派往海外,战时那几年,他为空军拍摄训练影片。^③

战后,里根回归演艺事业,是演员工会中的活跃分子。这几年对他在政治上的成熟极为关键。他依然是“一个彻底的新政拥护者”,还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组织。尽管对共产主义知之甚少,对苏联更是一无所知,他很快便对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心存质疑。194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劳资纠纷,令很多制片厂面临倒闭的威胁,制片商和工会组织都颇受影响,里根希望演员工会能够从中斡旋。“仅仅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试图接管好莱坞……促使我接受演员工会的主席提名,至少可以说,这间接地令我走上了政治之路。”尽管他对这些事务的理解有失完善,但这促进了他对战后世界的思考。“从第一手的经验中,我现在懂得了共产主义者如何利用谎言、欺诈、暴力或其他手段来推进苏联的扩张事业。我也从(好莱坞)短兵相接的战斗经验中认识到,美国眼前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44—61;莫里斯,《荷兰人》,64—75。

②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6;同时参见里根致罗恩·科克伦(Ron Cochran),1980年5月12日,收录于《里根:书信传记》(Reagan: A life in Letters),基龙·K·斯金纳,安娜莉丝·安德森,马丁·安德森(编),纽约:自由出版社,2003,27—31。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75—104。

最阴险恶毒的威胁莫过于共产主义了。”^①

20世纪40年代晚期,里根的演艺事业遭遇瓶颈,第一次婚姻也宣告失败。不久以后,他遇到了南希·戴维斯(Nancy Davis),两人于1952年3月结婚。几个月后,他和南希一起乘火车抵达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一位老朋友安排里根访问小规模威廉·伍兹学院,并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他的题目是“美丽的美国”,这为他之后40年的演讲作了良好铺垫。在他看来,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思想——“完全就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对自由的热衷”。他告诉听众,美国“就是一块乐土”。他号召应届毕业生投入这场与“极权主义黑暗”的斗争,并鞭策他们要确保“这片乐土是人类最后的希望”。^②

不久之后,里根意识到他的演艺生涯即将划上句号。他不能如愿出演角色,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也越来越严重。后来他主持了一档新的电视剧节目,通用电气公司为该节目的赞助商。在新媒体问世的早期,这个节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里根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每周日晚都出现在家家户户的屏幕上。此外,他还跑遍全国为新公司发表讲话。^③

20世纪50年代期间,里根的政治信仰发生了转变。他坚决反对政府的规章制度,对日益上涨的所得税大为不满,他认为这遏制了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创造性。他因此转而追随共和党,于1964年热切地接受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邀请,成为了其在加利福尼亚的总统竞选班子的负责人。他的演讲字字珠玑,生动有力。竞选临近尾声时,戈德华特的关键支持者请里根在选举前一周参与全国性电视讲话,作一个为时半小时的发言。^④

“这份讲话”,正如后人所知,便是里根近十年来思想观点的汇总。他提醒道,美国人民面临着个人自由与极权主义之间的严酷选择,这体现于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纲领。“天意注定你我之间有个约定,”他总结道,“我们要么为子女保护这地球上人类最后的希望,要么就会把他们送入千年的黑暗之中。”^⑤

在共和党的保守派中,这次演讲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改变了里根的一生。受此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114—115;坎农,《里根总统》,242—244。

② 肯戈,《上帝与罗纳德·里根》,94—96。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126—136;保罗·莱托(Paul Lettow),《罗纳德·里根和他寻求废除核武器的努力》(*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纽约:兰登书屋,2005,10—18。

④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129—130,137—143;南希·里根,《轮到我了》,124—131。

⑤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141—143。



鼓舞,他参选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于1966年11月击败了在任的对手帕特·布朗(Pat Brown)。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连任两届之后,他在1976年获得共和党提名,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发出挑战。尽管在最后关头失败了,但他在随后四年里到处演讲,不断完善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政治思想,这为其1980年与卡特的角逐做好了准备。

里根是历来年龄最大的总统竞选者之一,但他所表达的思想却可谓推陈出新。他说,美国最辉煌的时候尚未到来。他猛烈批评了卡特的悲观思想。美国人民不应为国家的困境负上任何责任,因为他们乐观向上,精神饱满,勇于创新,活泼开朗。问题的根源不是美国人民,而是民主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民主党向美国人民征收重税,开支庞大,导致惊人的财政赤字和恶性的通货膨胀,消磨了人们对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民主党的军备谈判和防御项目对美国多加束缚,也削弱了美国的力量。“我们必须重拾梦想,寻回对自己和国家的信心,恢复那份令美国卓然于世的独特命运观和乐观精神。”投票拥护里根,便会出现一个新的“美利坚的清晨”。^①

1980年11月,里根在与卡特的角逐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民主党仍对众议院拥有掌控权,但这是共和党自1954年以来首次在参议院获得多数席位。在198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里根重新强调了他最基本的信念:“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是重新唤醒这个工业大国的时候了,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减轻税收负担。”在他的领导之下,美国将重新走向辉煌。“我们完全能够怀有英雄式的梦想。”他这样对美国人民说道。我们的对手应该注意到的是:“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发生冲突,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是上帝引领下的国度,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迈向自由。”^②

里根的优先部署显而易见:恢复国家的经济活力并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他的部下个个摩拳擦掌,积极敦促国会通过其税收削减方案。国防预算急速上涨——1981财政年度为12%,1982年度则为15%。据军事官员预计,20世纪80年代的开支达2.7万亿。增长的资金将被分配到军事训练、预备役军队、交流指挥中,还包括B-1轰炸机、100枚MX洲际弹道导弹、15艘三叉戟式潜水艇,以及B-2隐形轰炸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19。“美利坚的清晨”(“Morning in America”)是1984年竞选的主题,但同样抓住了1980年里根总统竞选的本质。参看詹姆斯·T·帕特森(James T. Patterson),《坐立不安的巨人:从水门事件到布什起诉戈尔案的美国》(*Restless Giant: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atergate to Bush v. Gor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145—151。

② “就职演说”,1981年1月20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1》,3。

机和三叉戟 II 导弹的研发工作。^①

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里根坚守着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美国必须在占有力量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相信苏联“以力量为唯一的衡量尺度”。美国在谈判时一直是趾高气扬。70年代时,他宣称华盛顿已单方面实行裁军,而这与事实严重相悖,使得克里姆林宫在谈判时诚意骤减。里根宣称:“如果对方知道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的話我们就会大幅增加军备,那么我们就成功得多。”^②

里根的思维方式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他坚信苏联的体制正摇摇欲坠。针对苏联的经济问题、国民的不满情绪和民族间的矛盾,国务院官员、国家安全顾问和情报分析家得到了大量信息。“苏联人民不再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将继续提高,”中央情报局情报机构主管在报告中表示,“民众似乎已是怨声载道。”腐败现象猖獗,经济生产力衰退,民族矛盾日益严重。^③对此,里根毫不意外。他的核心信念是:计划经济效率低下,根本无法满足人民对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憧憬。早在1977年他就曾说道:“如果伊万的不满令他走到公开反抗的地步,我们可能会缔结一个意想不到

① 大卫·A·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政治的胜利:里根革命是如何失败的》(*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86,108—109; 罗纳德·E·波瓦斯基(Ronald E. Powaski),《回到末日决战:美国与核武器军备竞赛,1981—1999》(*Return to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1981 - 1999*),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15; 约翰·M·柯林斯(John M. Collins),《美苏军事制衡,1980—1985》(*U. S.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1980 - 1985*),纽约:培格曼布拉西国际防务出版公司(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1985,19—22; 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导思想:解密美国的政治军事政策历史,1981—1991》(*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 S. Political & Military Policy, 1981 - 1991*),博尔德,科罗拉多:西景出版社,1995,46—49。

② “国情咨文”(“Add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1982年1月26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2》,78; “与沃尔特·克朗凯的访谈”(“Interview with Walter Cronkite”),1981年3月3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1》,195;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82年1月19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2》,43; 参见“与斯基普·韦伯的访谈”(“Interview with Skip Weber”),1982年2月9日,出处同上,151; 里根致约翰·马茨格(John Matzger),1982年5月11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405; 里根致欧文·S·施洛斯(Irving S. Schloss),1982年6月28日,出处同上,406—407。

③ 中央情报局,情报处,“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社会:问题与前景”(“Soviet Societ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1982年12月,文件箱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中央情报局,情报处,“苏联的社会精英对大众不满与官员腐败的关注”(“Soviet Elite Concerns About Popular Discontent and official Corruption”),1982年12月,出处同上; 罗伯特·M·盖茨(Robert M. Gates),《从暗处探索:五任总统的终极内幕以及他们是如何赢得冷战的》(*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96,194—197。



的联盟。”^①

里根想着要排挤苏联。他坚持美国要尽一切所能在军备竞赛中领先于克里姆林宫。“我们永远都有能力超过他们的开支。”克里姆林宫的人知道“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工业力量转移到军备竞赛中，他们将是望尘莫及的”。^②

然而，要从力量优势角度促成谈判，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有对话的意愿。里根抓住这一基本现实，意在让苏联加入对话：

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认为核均衡既无价值又无保障，我们也无意侵犯他们的领土……我想在克里姆林宫中一定也有人已经意识到：我们双方就像两个牛仔一样站在那儿，持枪指着对方的脑袋，摆出一副为了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而殊死决斗的架势。克里姆林宫必须有人意识到，在他们武装到牙齿的同时，苏联的经济问题正在加剧恶化，而这正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最好例证。^③

1981年3月30日，里根遇刺，伤势严重，病榻上的他左思右想。“或许是因为跟死亡擦肩而过，我感到在上帝所赋予的生命中，我应该竭尽所能减少核战争的威胁；我死里逃生肯定是有原因的。”^④他告诉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他想解除粮食禁运，并以个人名义写封信给勃列日涅夫。黑格对这两个主意都表示反对，这让里根相当生气，他想把苏联领导人当成“人”进行交涉。按照总统典型的妥协方式，他允许黑格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正式信函，表达美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但里根还是固执地写了封亲笔信，以突出自己的诚意。^⑤

在这封信中，总统强调了十年前苏联领导人所点燃的希望之光，那是在勃列日涅夫与理查德·尼克松首次会晤之时。“全世界都对那些会晤众说纷纭。”里根提醒勃列日涅夫，那时他们曾在尼克松的故乡圣克利门蒂(San Clemente)见过面。“你握着我的双手，向我保证……你会全心全意去实现那些希望和梦想。”里根继续道，无论属于哪个种

① 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里根》，147；“与《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编委的访谈”，1982年3月23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2》，368；里根致杰伊·哈里斯夫人(Mrs. Jay Harris)，1982年4月26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402—403。

②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67；莱托，《里根与核武器》，35。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68；对话的记号参见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机密：历经六位美国冷战总统的莫斯科驻美大使》，纽约：兰登书屋，1995，490—493。

④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69。

⑤ 出处同上，270—271；同时参看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737—741。

族、哪个民族,全世界人民都不曾放弃这些梦想,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怀有类似的期许:

他们希望保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尊严。他们希望自由选择行业和职业并得到公平回报。他们想在平和的环境中养家糊口……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便民,仅此而已……我们能任由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模式和政府政策阻挠我们对人民日常现实问题的思考吗?

里根最后表明,他希望结束粮食禁运将会促使“双方就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这一共同责任而进行积极有益的对话”。^①

这封信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一方面在于勃列日涅夫的回答颇为冷淡,那时的勃列日涅夫无论从体力上还是精力上都没有能力采取新举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里根自己也不清楚该如何推进自己的政府。从就职那一刻起他在国家安全方面就处理得一团糟,境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总统的决策风格、冷漠孤高、对冲突的反感、对细枝末节的不屑以及对意识形态的一再强调,所有这些都对混乱局面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那些对他最为了解的人,无论是他的崇拜者还是诽谤者,都对其管理方式表示赞同。“他从不盛气凌人,也几乎不曾下达指令。”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说道。他是里根长期以来的拥戴者,也是里根时期最具影响的经济顾问。“基本上他就对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作回应,表示行或不行,要么就是我会考虑考虑。”据总统的首任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所言,里根“从不发号施令,从不询问消息,也从不催逼强求”。据曾服务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问题专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说,在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真的是不知所措,茫然不已,很不自在”。“和他的前任不同,”黑格写道,“里根不会当场定夺,不会轻易表现自己对事务的立场。”^②

他的外交和国防顾问经常争执不下,有时出于个人原因,有时出于制度上的斗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72—273。里根取消谷物禁运的真正原因是“自由世界的国家没有加入我们,之前的做法是在损害我国农民的利益”。里根致弗朗西斯日科·拉霍维奇(Franciszek Lachowicz), 1982年12月9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377—378。

② 马丁·安德森,《革命:里根的遗产》(Revolution: The Reagan Legacy),斯坦福,加州:胡佛研究所出版社(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289—290;斯托克曼,《政治的胜利》,76;理查德·派普斯,《Vixi: 无归属者的回忆录》(Vixi: Memoirs of a Non-Belonger),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 166;小亚历山大·M·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告诫:现实主义,里根和对外政策》(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4, 77。



争,而有时则是因为政策。曾任将军及北约指挥官的国务卿黑格认为,他被授予了足够的权利进行策略的制定。可以说他从未与总统走得太近。里根在白宫最亲近的顾问和朋友——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和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都不喜欢黑格,黑格对他们也有同感。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是里根的老朋友,黑格和他也有颇多分歧,其中既有派系之争,也有个人反感成分。理论上说,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应该能化解这些纷争,但他知识水平有限,与总统的私交也很一般——事实上,他甚至与总统没有直接接触。而且艾伦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安插了许多强硬的反共分子,这些人谈不上鄙视国务院官员,但对他们也是颇为不屑。“最初的整整一年半时间里,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始终处于紧张的气氛之中。”派普斯写道。^①

长期不合的政府机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新政府出台了一份战略声明。1982年5月20日,里根总统通过此项声明。这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件强调:

目前,石油等资源日益匮乏,恐怖主义日趋猖獗,核扩散威胁重重,苏联政权更替不定,一些西方国家保持缄默,苏联外交政策过分自信,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国际环境的不稳定,由于这些原因,整个80年代我们可能会面临二战以来对生存和幸福的最大挑战。^②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绝望,苏联有其不攻自破的弱点。“苏联及其大部分盟国的经济社会体制都不断暴露出严重的体制结构弱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减弱,就连苏联阵营本身也不例外。”1979年对阿富汗进行武装干涉之后,苏联的军事危机显示出在运筹帷幄方面克里姆林宫已是捉襟见肘。波兰的局势动荡也表现出了华沙条约的缺陷。在苏联内部,非俄罗斯民族构成了对“占优势的俄罗斯人口”的潜在威胁。

战略声明中还规定,当局政策应偏重经济发展,加固工业和技术基础,推进开拓

① 派普斯,《Vixi》,153; 罗伯特·C·麦克法兰(Robert C. McFarlane),佐菲亚·斯马兹(Zophia Smardz),《特别的信任》(Special Trust),纽约:卡德尔与戴维出版公司(Cadell and Davies),1994,171—183; 黑格,《告诫》,80—86,311—315。

② 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1982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决策指示32,执行秘书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



海外市场和引进资源。美国应维系并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在方方面面都尽最大努力”鼓励和加强“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法治、经济发展和民族独立”。至于苏联，美国必须能够阻止战争并占据上风。战略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不会发动战争，但鉴于他们的军事实力有所攀升，他们很可能会冒险发动挑衅行为，自以为能够恫吓或胁迫到美国。目标应当是“中和”这番努力，牵制并扭转苏联在全球的控制和军事力量，提高苏联支持傀儡政权、恐怖分子和颠覆力量的开支。^①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是里根的老朋友，或许也是他除了妻子之外最为亲近的人，克拉克声称总统非常关注这个文件。^② 1982年1月1日，正值一桩不大不小的丑闻令艾伦名声扫地，总统任命克拉克为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对共产主义充满敌意，但对国际事务知之甚少。他的任务是改善各部门及其与白宫之间的沟通问题。和里根的许多顾问一样，他相信一旦黑格不再担任国务卿，他的任务就能达成。1982年6月，里根厌倦了顾问间争论不休的状况，不喜炒人鱿鱼的他还是免去了黑格的职务，任命乔治·舒尔茨为国务卿。曾经身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舒尔茨在商务、政体和学术方面都极具能力和经验，尼克松任职期间他曾担任劳工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现任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总裁。^③

但是，舒尔茨的到来并没有对国家安全程序上的困扰起到缓和作用。他随即感到，“一股近乎诡谲的暗流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已深深扎根”。他赞同里根所有的信条。在舒尔茨看来，挑战在于“将自由和开放市场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组织原则，长此以往直至共产主义暴露出所有的弊病，然后自动出局”。但舒尔茨同时也认为美国应该和苏联谈判，建立起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他知道总统与他观点一致，但他很清楚克拉克、温伯格、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等人正对总统的意愿加以阻挠，使之无法得到执行。^④

舒尔茨认为自己实际上是里根的高层顾问中唯一与苏联打过交道的。作为财务部长，他与苏联的外贸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进行过全面的贸易谈判，那是一位坚定不移的老共产党，二战中曾负责坦克生产。在1973年的

① 国家安全决策指示 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982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决策指示 32，执行秘书处，里根图书馆。

② 莱托，《里根与核武器》，61—70。

③ 免职黑格与任命舒尔茨，参看黑格，《告诫》，311—315；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255—256, 360—362；舒尔茨，《骚乱与胜利》，3—15。

④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2, 10(引言), 162—167, 268—270, 309—322。



莫斯科之行中，帕托利切夫曾带舒尔茨去过列宁格勒的一处公墓，百余万士兵长埋于此。当舒尔茨和帕托利切夫庄严肃穆地走在坟墓之间时，帕托利切夫生动地描述了列宁格勒战役。此行给舒尔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体会到了苏联有人情味的那一面，我意识到二战——苏联人称之为抵抗法西斯的爱国主义战争——对他们来说意义深远。我也认识到苏联是强硬的谈判者，但还是存在谈判成功的可能性。以我的经验，他们做足了功课，有技巧，有耐性，也有持久力。我敬重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有能力的谈判者，而且因为他们是能够达成协议且会坚持到底的人……他们是否当真有意愿参与其中，这取决于他们理解其利益所在。我相信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即苏联人断定我们不仅强大坚定，而且愿意在互惠的基础上达成协议。^①

比尔·克拉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并不这么认为。1982年，理查德·派普斯和他的同事努力出台一份新文件，以求更精确地制定美国对苏政策。在这份代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75名为“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文件中，细述了里根政府将寻求达成三大目标：“遏制并逐渐扭转苏联的扩张主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苏联推向更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让苏联参与谈判进程……遵守严格的互惠互利原则”。^② 克拉克向里根解释说，该文件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二个目标，即“鼓励苏联内部向反极权主义发展”^③。不能指望短期内就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派普斯和克拉克都认为这并非是一个粉碎苏联共产主义的策略。虽然他们的期望并不过激，但却意义非常：“在今后的几年里，出现体制性巨变的希望不大，(但是)政策性变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为今后长期的体制变化做好准备。”^④

克拉克和派普斯之所以与舒尔茨不同，就在于他们并未对谈判的重要性给予过多关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随之上台。舒尔茨提醒里根这位新任领导人将会给苏联政策注入更多活力。“在安德罗

①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19。

② 国家安全决策指示75，“美国与苏联的关系”(“U. 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1983年1月17日，收录于辛普森，《国家安全指导思想》，255—263；同时参见与国家安全决策指示75有关材料，文件箱91644，威廉·克拉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③ 克拉克致里根，1982年12月16日，国家安全决策指示75，执行秘书处，里根图书馆。

④ “对国家安全决策指示11—82的回应：美国与苏联的关系”(“Response to NSSD 11—82; U. 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13—14，1982年12月6日，出处同上；莱托，《里根与核武器》，75—79。

波夫的带领下,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呈现出活力和完善,”舒尔茨在1983年1月15日写给里根的信中提到,“显然苏联人将明显处于攻势。”美国需要用“力量、想象和活力”予以应答。需要复兴经济和军事力量,推进联盟的凝聚力,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在意识之争中身手敏捷,此外还要调停中东、美洲中部和其他地区的冲突。舒尔茨强调说,要想获取成功,美国还需要和安德罗波夫进行对话。苏联不会立刻土崩瓦解,也不会迅速丧失竞争力。“尽管意识到了我们与莫斯科关系的对立,美国强硬的政策还是可能使苏联发生行为上的变化,并以此改善彼此关系,不能排除上述可能性。”^①

里根赞同舒尔茨的政策,但他还是继续在言行上加剧对克里姆林宫的攻击。波兰宣布了戒严令,这令总统大为恼怒。他斥责苏联协助卡斯特罗,支持桑迪诺政权,间接煽动萨尔瓦多的叛乱,并使阿富汗的战事升级。他谴责他们加强军备,实施宗教迫害,对犹太移民加以限制,还违反了赫尔辛基协议中关于人权的规定。1983年3月8日,在给基督教新教徒的演讲中,里根尖锐的言辞再攀新高,他将苏联称之为“邪恶的帝国”。“让我们为生活在极权主义黑暗中的人们祈祷吧,”他说,“祝愿他们能够发现相信上帝而得到的喜乐。”他相信“宗教”可能“会成为苏联的致命弱点”。^②

舒尔茨和总统一样厌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但他知道里根的措辞过火了。白宫还没告诉他总统会将苏联谴责为“邪恶的帝国”,舒尔茨感觉到自己正被排挤出决策圈。3月10日他与里根在白宫会面,决意提出一个新的途径以劝服总统转变方法,他认为总统已经成了“他那些幕僚的囚徒”。但是里根向他保证,他支持舒尔茨的想法,他鼓励舒尔茨继续努力参与到和克里姆林宫的积极对话之中。^③

里根不是任何人的囚徒。不管在执行的方式上有多欠妥,他自己对国家安全问题还是有复杂多变的想法的。3月23日,在几乎没有和国防部长或国务卿商讨的情况下,他宣布打算发起一项计划,它“有望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他想建立起一个防御机制,使美国及其盟友免受携带核武器弹头的导弹的袭击,而此事已令他思忖多年。他知道那要花很长时间,也知道他需要让同盟和对手都相信该提议既不会危及他们的安全,也不会违反先前的条约。但是总统坚信,靠“确保同归于尽”(MAD)

① 舒尔茨致里根,1983年1月19日,文件箱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在全国福音教派协会年会上的发言”,1983年3月8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3》,359—364;里根致约翰·O·凯勒(John O. Koehler),1981年7月9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375;里根致苏桑·马西(Suzanne Massie),1984年2月15日,出处同上,379;同时参见多勃雷宁,《机密》,517—520;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59—171。

③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267—271;克拉克致舒尔茨,1983年5月26日,文件箱91644,克拉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的信条来维持和平是疯子的举动。这样不负责、守旧的看法已然过时。里根有意避免与他认为会持反对意见的顾问进行讨论，他宣布自己正在发起“一项长期的研发计划”，用以“达到销毁战略性核导弹带来的威胁这一最高目标。这可能为采用军备控制法消灭武器铺平道路。我们寻求的既不是军事上的超越，也不是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寻找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方法”。^①

里根不希望看到，他对于战略防御计划(SDI)(后来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支持会加速军备竞赛，或加剧冷战的紧张状态。他坚持表示愿意与苏联分享预期可见的技术——天基激光武器、反射器、粒子束以及动能技术——这样苏联领导人也能得到保障。^② 资深外事官员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现接替派普斯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问题专家，根据他的观点，里根不想破坏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谈判；他希望能够拉拢苏联新的领导层。马特洛克后来回忆道：

自 1983 年加入国家安全委员会起，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划与苏联的谈判策略。里根政府中的很多人……都怀疑苏联领导人对谈判是否有诚意，但里根对此持乐观态度。尽管他很厌恶苏联体制，但他相信如果对其施加足够压力，加之他个人的谈判技巧，情况会有所变化。^③

纵观 1982 年到 1983 年，里根反复重申他要和苏联领导人谈判。尽管苏联领导人克格勃背景，态度也极为强硬，他都已准备好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参加峰会。获悉勃列日涅夫去世时，里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要强调的是，我打算与苏联继续合作，以期推进两国间的关系。”^④他坚决表示，美国正在积聚力量，但不是为了开战，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谈判。我们希望能“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如果苏

① 莱托，《里根与核武器》，81—121，引言出自 111—112 页里根的演讲；约翰·L·加迪斯，《牵制的策略：对冷战期间美国安全问题的评估（修订增补版）》（*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ised and expanded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356—359。

② 莱托，《里根与核武器》，117—121。

③ 小杰克·F·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对一个帝国的尸检：美国大使对苏联崩溃的回忆》（*Autopsy of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兰登书屋，1995，77；莱托，《里根与核武器》，124—126；对里根和星球大战计划的全面评论，参见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Frances Fitzgerald)，《蓝天下的出路：里根，星球大战计划及冷战的结束》（*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纽约：西蒙和舒斯特，2000。

④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1982 年 11 月 11 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2》，1450。

联停止在阿富汗的杀戮并认可波兰的改革, 谈判一定会有所进展, 但“我们不会坚持要求苏联放弃其超级大国的形象或其合法的国家利益”。^①

里根与安德罗波夫互通了信件, 反复谈到他想要维护和平、消除核威胁的愿望。“你我都有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责。我相信我们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 但这需要我们建立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积极的交流。我们能谈的内容有很多。……过去, 我们的前任通过坦诚相见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你愿意参与到这样的沟通中来, 你会发现我已准备就绪。我等候你的答复。”^②

安德罗波夫的书面回答很是鼓舞人心, 然而, 苏联的言行却并不一致。^③ 1983年9月1日, 苏联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在苏联领空飞行的韩国民用客机, 导致269人死亡。里根“勃然大怒”。他中止了在加利福尼亚的假期, 于劳动节的周末回到华盛顿, 写了一份演讲稿表达自己“不加掩饰”的感受: 击落飞机“是一种野蛮行为, 出自一个漠视人权及人类生命价值的国家, 这个国家一直在寻求扩张并凌驾于他国之上”。^④

但是里根拒绝中断与苏联的对话。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其他人坚持认为舒尔茨应该取消他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维也纳的会面。温伯格想要暂停军备控制方面的会谈, 直到对方就毁机事件给出一个诚恳可靠的解释。里根“不理睬”这个想法。“我能感觉到总统在对苏关系上想采取强硬立场,” 舒尔茨回忆道, “但在重要事务上, 他不想与他们彻底决裂。”^⑤

里根想继续保持对话, 但也不想减缓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1983年秋, 他竭尽全力让英国、西德和意大利部署自1979年就开始设想的中程核武器。他回绝了所有关于冻结美国和苏联现有核武器储备的讨论, 坚持要求进行削减, 而不是维持现状(在他看来, 苏联处于优势)。^⑥ 由于苏联拒绝了他关于销毁欧洲所有中程导弹的建议, 即所谓的零-零选择(zero-zero, 核武器暂缓建议, 即美苏两国暂时停止增加核武器的建议——译注), 里根坚决主张北约的部署。美国第一枚陆射巡航导弹于11月

① “广播演说”, 1983年1月8日, 《总统公开文件: 里根, 1983》, 23—25。

② 里根致尤里·安德罗波夫, 1983年7月11日, 执行秘书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元首, 苏联, 文件箱38—39, 里根图书馆; 里根, 《一个美国人的一生》, 576—582。

③ 安德罗波夫致里根, 1983年8月27日, 执行秘书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元首, 苏联, 文件箱38—39; 舒尔茨致里根, 1983年8月29日, 出处同上。

④ 里根, 《一个美国人的一生》, 584。

⑤ 舒尔茨, 《骚乱与胜利》, 365。

⑥ 参见“在田纳西州议会联合会议发表的演讲”, 1982年3月15日, 《总统公开文件: 里根, 1982》, 296—299。



中旬被送往英国；一周后，第一枚潘兴 II 号导弹到达了西德。

里根也批准了 1983 年的北约例行演习，一次北约用来测试战时核武器发射指令和通讯程序的军事演习——套用总统的话，“正如我们所知，这可真是一个会导致文明终结的设想啊”^①。北约例行演习仅仅是一系列愈发具有挑衅性的试验之一。中情局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解释说，美国飞行器“测试”了克里姆林宫的防御系统；美国海军探察了它的领海水域；太平洋舰队围绕苏联水域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②

1983 年 10 月 24 日，在没有咨询国会的情况下，里根将美军部署到了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Grenada)，以挫败左翼分子的继任掌权，他们比新近被杀的领导人更为激进。表面上这次部署的动机是救援美国学生并回应格林纳达那些惧于卡斯特罗主义发展的邻国所提出的提议。但里根的真实目的是显示实力。有 241 名美国人在贝鲁特美国海军总部恐怖袭击事件中遇难。国防部官员想让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在那里他们面临着可怕的袭击，他们的任务也刚开始部署，但管理层中没人愿意示弱。在黎巴嫩，美国官员努力应对国内纠纷和地区冲突；在加勒比海，他们希望能处理好古巴的冒险主义问题。里根决意克服越南综合症，不允许分毫额外领土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后来回忆道：“美国不能因为越南的经历就不敢站起来保护国家合法的安全利益。”^③

同时，里根开始在第三世界展开反苏宣传战。他有一个基本原则。尽管第三世界过去为共产主义的前进提供了无尽的机会，但今时不同往日了。苏联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范了。^④ 随着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瓦解，马克思列

① 唐·奥伯道夫(Don Oberdorfer),《转变:从冷战迈向新纪元》(*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纽约:波塞冬出版社(Poseidon Press),1991,65—66;本·B·费希尔(Ben B. Fischer),《冷战的困惑:1983 年苏联对战争的恐惧》(*A Cold War Conundrum: The 1983 Soviet War Scare*),华盛顿特区:情报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7,24。

② 道格拉斯·麦凯琴(Douglas MacEachin)的评论,收录于尼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编),“认识冷战的终结,1980—1987:口述历史会议,1998 年 5 月 7 日—10 日”(“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0—1987: An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7—10 May 1998”),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事务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临时抄本,1999 年,国家安全档案可查阅,262,242—243;费希尔,《冷战的困惑》,6—12。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449—451;舒尔茨,《骚乱与胜利》,323—345;麦克法兰,《特别的信任》,257—267;坎农,《里根总统》,339—401。

④ 国家情报评估 11—18—85,“影响苏联体制的国内压力”(“Domestic Stresses on the Soviet System”),1985 年 11 月,5,文件箱 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宁主义者的措辞就发生了变化。如今, 游击队力量向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开战, 比如在尼加拉瓜和阿富汗, 美国对这些叛乱给予支持, 正如苏联之前支持民族主义革命者反对殖民或新殖民政权的运动那样。1981年12月, 里根签署总统令, 暗中支持尼加拉瓜的一个小规模反革命团体(或称反政府武装人员), 他们正与激进的桑地诺政府作战以图将其推翻。^① 与此同时, 他开始在阿富汗给予穆斯林游击队员和其他暴动组织更多援助, 这些组织试图推翻苏联控制下的喀布尔政府, 与阿富汗境内的苏联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②

苏联领导人既藐视里根的措辞, 又害怕美国的决策。在1983年10月19日召见大使哈特曼时,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表现得理性达观而又异常热情。葛罗米柯坚持认为, 总统的话语似乎有欠得体。里根是在抨击苏联体制的合法性。苏联领导人不能理解总统过激言论的原因。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民用飞机坠毁一事上逃避责任的做法激怒了美国人, 也让苏联人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11月5日正值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 苏联政治局成员格里高利·罗曼诺夫(Grigory Romanov)发表演讲时宣布, 全球氛围自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以来不曾如此恶劣。“同志们, 现在的国际形势处于白热化阶段的彻底白热化。”^③

当安德罗波夫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 他把助手叫到了病榻前。“国际形势极为紧张,” 他说道, 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美国想要改变现有的战略形势, 力求抓住机会先给我们战略性的一击。”^④ 苏联短期内必须做好充足准备以应对不测, 长期内则要提高经济能力。苏联政治局认为国内的人权支持者正与国外的情报机构合作, 密谋颠覆苏联政权, 因此要加大力度反对并解散莫斯科

① 盖茨,《从暗处探索》,245;坎农,《里根总统》,306—307。

② 国务院,“抵抗运动”(“Resistance Movement”),[1985年11月中旬],“1985年日内瓦峰会”(“1985 Geneva Summit”),文件箱2,出处同上;同时参见盖茨,《从暗处探索》,346—356;奥德·阿恩·韦斯塔,“里根对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进攻”(“Reagan’s Anti-Revolutionary Offensive in the Third World”),收录于奥拉夫·恩乔斯塔(Olav Njolstad)(编),《冷战的最后十年:从冲突升级到冲突转化》(*The Last Decade of the Cold War: From Conflict Escalation to Conflict Transformation*),伦敦:弗兰克·卡斯,2004,241—261。

③ 罗曼诺夫的声明参见雷蒙德·L·加特霍夫,《大转变:美苏关系以及冷战结束》(*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1994,135—136;阿瑟·哈特曼致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1983年10月19日,文件箱90888,杰克·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苏联自身的反思参见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251—252。

④ 奥列格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5—16。



人权组织。^①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强调,美国的威胁并不是什么幻觉。他的部下奉命加速军队训练。^② 到了11月,北约例行演习付诸实施,克格勃官员带着惊惶予以关注。一些苏联情报分析家相信这预示着一场货真价实的进攻。^③

美国情报分析家追踪了苏联的行径。“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大为疑惑,“这些人疯了吗?”^④一开始,他们不了解苏联为什么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也无法想象苏联的万分惊恐。而当得知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他们马上报告了白宫。^⑤

里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苏联人戒心太重,甚至于偏执地认为自己会遭受袭击而不会被宽厚地对待,以至于我们应该明确告诉他们这里没人会那样做。”他让即将前往莫斯科的退役将军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私下传达他关于推进两国关系、减少武装力量的希望。^⑥

里根正在吸取经验。“三年的时间让我看到俄罗斯人有些地方令我吃惊。”他后来回忆道,“苏联统治集团中有不少人发自内心地害怕美国和美国人。或许这不该让我太过惊讶,但结果确实如此。”而在与外国领导人及自己的顾问谈及这些事时,他感到自己长见识了。1984年初与南斯拉夫总统米卡·兹皮拉克(Mika Spiljak)会面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向他请教苏联问题。他在那里做过一阵子的大使。他认为苏联人在实行扩张的同时,其实非常缺乏安全感,对我们心存恐惧。他还相信如果我们对他们放松一些,他们的领导人可能更敢于在其体制中作出一些改变。我将致力于这个方向。”几周后,里根和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举行了会谈,3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证实了我的想法,即苏联的动机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不安全感 and 疑心,认为我们和盟友意欲对其不利。”^⑦

① 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签署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之后苏联出现的人权运动及苏联当局的应对”,未发表的论文。

② “乌斯季诺夫元帅在华沙条约国防部长委员会会议上的声明”(“Statement by Marshal Ustinov at the Warsaw Pact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of Defense”),1983年12月5日—7日,出自沃伊泰克·马斯特尼与马尔科姆·伯恩(编),《硬纸板城堡?:华沙条约秘史,1955—1991》,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出版社,2005,490—493;弗拉基米尔·斯利普琴科(Vladimir Slipchenko)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264。

③ 费希尔,《冷战的困惑》,12—16;奥伯道夫,《转变》,66。

④ 道格拉斯·麦凯琴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26。

⑤ 加特霍夫,《大转变》,134—141;费希尔,《冷战的困惑》,25。

⑥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588—589;里根致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未标注日期],文件箱23,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⑦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588,589,595。



总统仍然想要有力量优势,但获取力量优势的目的是展开对话,缓和紧张气氛,推进苏联体制的改变,阻碍苏联的冒险主义,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核战争。1983年10月10日,他观看了美国广播公司出品的电影《翌日》的预告片,该片将于11月20日全国公映。在影片中,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在一场对苏的核战中化为废墟。里根评论道:“这部影片制作强大,而我看完后感觉很沮丧。”十几天后,国务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简要汇报了美国关于核战的计划,即著名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他才有所平静,对里根来说,这似乎预示着“一系列事件可能导致世界文明的结束”。他对五角大楼里仍有人“声称可以赢下核战争”而惊讶不已,“我想他们都疯了”。苏方也同样如此。^①

同时,里根再次撤换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舒尔茨和克拉克很难相处,迪弗和南希相信克拉克的强硬态度不仅影响了里根,同时也使他的民众支持率下降。总统提拔了前海军官员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cFarlane),此人曾是克拉克的助手。加入黑格的团队之前麦克法兰曾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工作,后效力于国会参谋团,1982年进入白宫工作。他与传统的冷战专家态度一致。但和里根、舒尔茨一样,他也认为美国人能够从力量上与苏联交涉,并可以从其脆弱的经济上挤兑对方。麦克法兰曾和舒尔茨及副总统布什合作,帮助里根更明确地表达与苏方谈判和竞争的愿望。考虑到反核武器运动的影响,作为对呈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和新近在欧洲的中程导弹部署的反应,反核武器运动的成员成倍增加,里根的助手们深知国内外民众会欢迎白宫采取更为温和的政策。^②

1984年1月16日,里根对全国和全球发表讲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里根在讲话伊始时说道,“我们和苏联都不希望抹去两国社会和思想的特征”。但“双方都不喜欢对方体制这一事实,不应成为我们拒绝谈判的理由。生活在这个核时代,展开对话非常必要”。从今以后,他会寻求“可靠设防、和平竞争和积极合作的政策”。他强调说:“我们要的不只是威慑,而是真正的合作。我们寻求和平的

① 引言参见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585—586;更深入的发展参见贝丝·A·费希尔(Beth A. Fischer),《里根的逆转:对外政策和冷战的结束》(*The Reagan Revers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7。

② 麦克法兰,《特别的信任》,188—189,193—194,200—205,217—218,254—256,294—296;反核武器运动和里根政府的反应,参见劳伦斯·S·维特纳,《走向核武器废除:全球核裁军运动历史,1971—至今》(第3卷)(*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71—Present*, vol. 3),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尤其参见252—268。



进展。合作始于对话。”^①

然而，对话却是困难重重。安德罗波夫于2月9日去世，由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任，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之一。副总统布什和参议员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代表美国参加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他们与契尔年科会了面。布什发现他“并没有安德罗波夫那样顽固暴躁”。贝克也有同感。“契尔年科总书记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他给总统这样写道。里根在他日记中记录道：“我有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我愿意就我们之间的问题跟他面对面交谈。”^②

里根马上与契尔年科建立起了联络关系，一封封信函的内容远比当时人们所知的更为丰富。“我的最高目标便是，与贵国建立起以建设性合作为特征的关系。”里根在2月11日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希望双方能够在减少战略武器和传统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也希望能在从阿富汗延伸到南非的地区争端中“减少进一步对抗的危险”。“美国非常注重保护本国和盟国利益，”他最后说，“但我们并无意威胁苏联和其他人民的安全。”^③

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里根反复强调同样的观点。我们“应该寻求在特定领域中积极推动我们两国的关系”。他这样写道，并列举了各种军备控制决议、地区性冲突，以及他认为能取得进展的双边会谈。里根在给契尔年科的信中写道，布什副总统告诉我，你们也希望让历史记住“我们的仁慈、英明和友善。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为重要，我们应该为此行动起来”。^④ 在4月16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期待着彼此的工作关系富有成果。“至于我本人，我也会重新认真考虑你们的顾虑，即使我觉得那些内容难以理解。”但里根还是努力去更好地理解。他在这封6页长的信末又附了一笔：

在写这封信时，我仔细回想了这么多年来苏联在战争中的悲剧和损失。当然这些无可估量的损失一定会对你如今的想法有所影响。我希望你知道，我和美国人民对你和苏联人民绝无冒犯之意。……我们一直以来的当务之急便

①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致辞”(“Address to the Nation and Other Countries”), 1984年1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4》,40—44;参见与卢·坎农,大卫·霍夫曼,胡安·威廉(Juan Williams)等人的访谈,1984年1月16日,出处同上,62。

②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592;霍华德·贝克致里根,1984年2月17日,文件箱2,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③ 里根致康斯坦丁·契尔年科,1984年2月11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8—39,里根图书馆。

④ 里根致契尔年科,1984年3月6日,出处同上。

是……不断改善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向你保证会坚守这一承诺。^①

舒尔茨和麦克法兰一直辅佐着里根一步步前进。他们想“推一推”总统。1月28日,麦克法兰发给马特洛克一篇由著名苏俄历史学家詹姆斯·比林顿(James Billington)所撰写的文章,让马特洛克向总统作这篇文章的总结。“我想让总统从历史的角度充分理解我们两国关系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对苏联领导层(目标和策略)该有怎样的期许。”即便与契尔年科的合作进展缓慢,麦克法兰还是想“寄希望于事态到了下一代能有新的发展”。^② 在随后的几年中,麦克法兰让马特洛克给总统写了两打以上的备忘录,都是关于苏联历史、战略和政治的。里根如饥似渴地细细读来,添加了评注,并让其顾问们传阅这些备忘录。他不喜欢大活页笔记本上那些干巴巴的要点,人人都知道他会把它们搁在一边,但是他的确是一心想要将对手了解得一清二楚。^③

他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温伯格、凯西及其他高级助手的观点互相矛盾,他为此大为头痛。根据国务卿的说法,凯西和温伯格“不想与苏联打交道,而且一旦确定了谈判立场,就不愿作出任何改变”^④。当里根在考虑第二任期时,麦克法兰建议他作一些人事上的变动。温伯格和舒尔茨总是针尖对麦芒,简直水火不相容。(助手们建议)总统不得不在两者中作出选择。里根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他告诉麦克法兰,“你们要更卖力工作。”^⑤

然而,舒尔茨不会让事情就此平息。他告诉总统:“要想成功,我们必须要有统一的队伍:而现在还没有。卡普(系卡斯帕尔的呢称——译注)·温伯格、比尔·凯西(Bill Casey)、珍妮·柯派翠克(Jeane Kirkpatrick)(驻联合国大使)和我的观点都不尽相同。”舒尔茨说他受够了情报泄漏、回避躲闪以及拖延战术。这让我们一事无成。“我感到心灰意冷,”他告诉里根,“我已做好了引退的准备。”^⑥

① 里根致契尔年科,1984年4月16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8—39,里根图书馆。

② 麦克法兰致马特洛克,1984年1月28日,文件箱90888,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③ 麦克法兰,《特别的信任》,308—309;小杰克·马特洛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Reagan and Gorbachev: How the Cold War Ended*),纽约:兰登书屋,2004,132—134。

④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490。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面纱: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争,1981—1987》(*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87*),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87,此书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的态度进行了描述,尤其参见125—126,135—136,162—163,293—295。

⑤ 麦克法兰,《特别的信任》,286—287;讽刺的话语参见“与詹姆斯·贝克的访谈”,2004年6月15日—16日,总统口述历史项目,米勒中心,弗吉尼亚大学(以下引用形式均采用“贝克访谈,米勒中心”)。

⑥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497—498。



里根始终都不想放弃卡普·温伯格，他是他长久以来的朋友和助手，但他知道自己不得不作出选择。“起初与俄罗斯人的公开谈判中，卡普不如乔治那么投入，”里根回忆道，“在五角大楼中，他的一些顾问强烈反对我关于军备控制的部分观点，而乔治则很支持我，其中包括我希望最终消灭世上所有核武器的想法。”温伯格和国会中的保守派同盟告诉里根，舒尔茨“对俄罗斯的态度变得温和了”。里根知道这是无中生有，但他也很清楚，一方面他必须要解决麦克法兰和舒尔茨之间的争端，另一方面还有舒尔茨、凯西以及埃德·米尔斯(Ed Meese)的不和。“争端没法得到控制，以至于乔治似乎有了去意。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那样的事发生，”在1984年总统竞选获胜后，里根随即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乔治在履行我的政策。我要见一见卡普和比尔，跟他们解释清楚。那不是件乐事，但我必须去做。”^①

同契尔年科的交流进展了了，但里根决心已定。他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学到了很多，也相信一旦时机到来，他便能与俄罗斯达成和平议程。“保持强硬，不要脱离轨道，”他对自己及顾问们说，“强硬的美利坚回来了。”苏联人也深谙这一点。最终他们会报以合作态度的。^② 里根是一个有耐心而且固执的人。他想讨价还价，但是要从力量优势出发。他似乎和哈里·杜鲁门有些相仿，杜鲁门曾说，只要85%的时间遂了他的愿，他便会和俄罗斯合作。^③

里根对自己的谈判技巧信心十足，他能以一种轻松、镇静、谦和而又低调的方式打消敌友的顾虑。他很会煽情，但又不伤感，“是个温和但冷酷的人”，马丁·安德森如是写道。^④ “里根有让人完全放松的本事。”大卫·斯托克曼写道。他是“亲善外交的高手”，舒尔茨这样说，“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⑤ 他经常会出现事实和知识储备不足的状况，但用理查德·派普斯的话来说，他“还是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⑥ 但他决不好对付。他心思缜密、乐于竞争、意志坚强、严于律己。他能够凭借直觉把握住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05—606。

② 出处同上，590,587。

③ 哈里·S·杜鲁门，《回忆录：1945，决策之年》，纽约：印章出版社，1955，72；里根致艾伦·布朗(Alan Brown)，1985年1月22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安德森，《书信传记》，413；里根致马默杜克·贝恩(Marmaduke Bayne)，1983年9月12日，出处同上，410。

④ 安德森，《革命》，288；参看迪弗，《标新立异》，86,169；麦克法兰，《特别的信任》，21—22,269。

⑤ 斯托克曼，《政治的胜利》，74；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31。

⑥ 派普斯，《Vixi》，167；多勃雷宁，《机密》，605—612；赫尔穆特·施密特，卢丝·海茵(译)，《伟人与权力：从政治视角出发》，纽约：兰登书屋，1989，241—246；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未来属于自由》(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纽约：自由出版社，1991，81—90。

谈判节奏。他那不懈的耐心、简洁的语言、坚定的信念,同他善用幽默和轶事一样,都成为他强有力的武器。^①

到了1984年,里根急切地想把他的谈判技巧应用在俄罗斯人身上。“这里呈现出一派全新的乐观主义氛围,”里根在1月25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讲道,“强大的美国回来了,高高耸立着,带着勇气、自信和希望观望着80年代。”对于新的一年和新的任期,他有着极为宏伟的计划,并已下决心要赢得决定性的竞选胜利。“只要我们勇敢无畏,美国便是无与伦比的。”他现在邀请苏联人民与他共同设想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在当今这个时代保护我们的文明”。里根宣称“不能赢得核战,也永远不许有核战”。这席话表面上讲给坐在前面的国会委员听,但显然里根意在让这席话飘洋过海,希望“苏联人民”能和美国人民一起追求和平。“只要你们政府向往和平,和平就会出现。我们要同心协力、互信互爱,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②

里根不屈不挠的行动和日益成熟的言辞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尽管人们极力反对他对尼加拉瓜反政府人员的支持,也不赞同他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有违人权行为的无视,他的国防建设、中程导弹部署、对格林纳达的干预和对阿富汗圣战组织的援助还都是深得人心的。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些政治顾问,如迈克·迪弗,都帮助总统软化其措辞,以消除民主党人士对其好战形象的抨击。但里根并没有迎合民意。他痛恨那些为政治而政治的争论,他相信自己比任何人更能读懂美国人民。^③

1984年选举中,里根获得完胜。他的对手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只赢得了家乡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胜利。在整个竞选运动中,里根承诺“美利坚的清晨”富含更多意义:更精简的政府,更少的条条框框,以及更充分的自由。在1985年1月21日的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提出在国内创造一个“机遇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无论肤色、贫富、年龄,都能一起肩并肩向前进”。他认为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国内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而自由正向全世界进发。他提出要在力量优势的基础上坚定地追求和平。通过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他决定削减核武器数量,力求让它们“在地球表面……荡然无存”。他强调道,他在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安全之盾”是一种极为切合实际的运作之道。“它不会伤害人们;而是会销毁武器。它不会

①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114;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45;安德森,《革命》,285;迪弗,《标新立异》,71;施密特,《伟人与权力》,241—256;多勃雷宁,《机密》,605—612;贝克访谈,41—42,米勒中心。

② “国情咨文”,1984年1月25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4》,87—94。

③ 里根对政治迎合的蔑视,参看南希·里根,《轮到我了》,111;迪弗,《标新立异》,26—27;坎农,《里根总统》,390。



令太空发展军事化,而是会令地球上的军火库向非军事化方向发展。”^①

契尔年科和他的助手们都不是太清楚该如何理解里根的新言论。在1984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契尔年科给予里根的回复都相当友好。^②他正式恢复了一度因潘兴II号导弹被部署在西德而搁置的对话。虽然对话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葛罗米柯还是接受了于1984年9月底到白宫与里根进行会晤的邀请。正如里根在他日记中写道的,总统“开门见山,提到我们双方都感对方是一种威胁”。双方都承认彼此拥有的核武器已是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危险。“我试着让他明白,”里根回忆道,“苏联没理由害怕我们。”对里根来说,葛罗米柯表现得“坚如磐石”。在舒尔茨看来,他似乎“没对冷战感到有任何不适”。但是,在午餐前的欢迎会上,葛罗米柯把南希请到一旁,开玩笑似地轻声问道:“你丈夫信奉和平吗?”南希给予肯定回答。“那每晚都在你丈夫耳边低语‘和平’吧。”葛罗米柯说道。^③

舒尔茨和麦克法兰不断催促里根向契尔年科提议,但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了。他已是第三位在里根关注下辞世的领导人了。总统曾设法拉拢他们中的每一位,但成效颇微,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还有部分原因则是,当他的言行表现出威胁感时他们没有觉察出总统的真正意图。^④

而当副总统布什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并与新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谈时,里根和舒尔茨在为其准备好的论点中清楚阐明了他们对于未来的希冀。“我带来了一个和平讯息,”布什将事先准备好的话说给戈尔巴乔夫听,“我们知道这是个艰难的时期;但我们希望这同时也是个充满机遇的时期。”苏联和美国有着不同的体制,而这样的差异并不会即刻消失。“我们的关系注定我们之间会有竞争。但那是出于两国利益的考虑,以和平方式相互竞争并解决问题,建立起更为稳定、积极的两国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某些言行在你们看来是有威胁、有敌意的。而我们也深有同感。”但是布什要强调的观点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对你们

① “就职演说”,1985年1月21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5》,55—58;选举参见帕特森,《坐立不安的巨人》,188—192;吉尔·特洛伊(Gil Troy),《美利坚的清晨:里根是如何创造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的》(*Morning in America: How Ronald Reagan Invented the 1980s*),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契尔年科致里根,1984年3月19日,1984年5月7日,1984年6月6日,1984年7月7日,1984年7月26日,1984年11月8日,1984年12月20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8—39,里根图书馆。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04—605;舒尔茨,《骚乱与胜利》,471,484。

④ 多勃雷宁,《机密》,605—612。

都没有敌意”。他们意识到“你们在历史上饱经沧桑,也始终在不屈地奋斗着”。他们也意识到,二战对苏联来说既是伟大的胜利也是莫大的悲剧。胜利在于开创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悲剧则在于错失了很好机遇。而现在新的机会就在眼前了。“我们准备与你们共同开启征程,一条谈判的征程。”双方已签署了一些协议,但以后还会有更多。“我们都认为是更加意气风发地应对更大挑战、制定更高目标的时候了。……(我们)应当致力于将核武器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两国都应力求“以非核国防为基础的稳固威慑。……(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精力和远见来探讨我们之间的其他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在国际关系方面消除使用武力的威胁。”^①

但布什在会上并没有说这些,而是就地区争端和人权问题发表了些许言论。但之后国务卿舒尔茨面见戈尔巴乔夫,向他传达了总统的意思:“里根总统嘱咐我要与您以诚相待,他让我转告您:‘罗纳德·里根相信,这是人类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②

莫斯科的黄昏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给舒尔茨和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活跃敏锐,精力充沛,充满才智,乐于倾听,善于提问,还很富于探索精神。他健谈、机敏而又自信。“他思想有深度,洞察力很强。”葛罗米柯在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他总能分清主次。……他仔细剖析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他不会浅尝辄止——他懂得抽丝剥茧,擅长总结。他为人有原则、有信念。……待人坦率……不去迎合别人的口味……但和各种各样的人都合得来。”^③舒尔茨准确地抓住了这些特点。“戈尔巴乔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他这样跟布什说道。戈尔巴乔夫反应机敏,精神饱满,魅力非凡,影响广泛。舒尔茨回忆道:“当我离

① 尼古拉斯·帕拉特(Nicholas Platt)致麦克法兰和唐纳德·P·格雷格(Donald P. Gregg),1985年3月11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9,里根图书馆。

②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531—532。

③ 引自阿纳托利·S·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罗伯特·D·英格利希(Robert D. English)和伊丽莎白·塔克(Elizabeth Tucker)(译),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20;同时参见亚历山大·A·别斯梅尔特内赫(Alexander A. Bessmertnykh)的评论,收录于威廉·C·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见证冷战的终结》(*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巴尔的摩,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106—107,184。



开的时候，这位现任领导人的思想、激情与悟性都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①

1931年3月2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生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地区一个叫普里沃尔诺(Privolnoe)的村庄。他的祖父辈都是农民。他的外公是一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大为支持的共产党员，也是名集体农场的组织者；他的爷爷安德烈·戈尔巴乔夫一心希望能独立耕作。在1933年的大饥荒中，安德烈和全家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随后几年里又因未完成政府的播种定额而遭逮捕。20世纪30年代，两位老人在不同时期被定为“人民的敌人”，在回到他们曾辛勤劳作的斯塔夫罗波尔集体农场之前，他们都被监禁在集中营里。戈尔巴乔夫的祖母、外婆和母亲都笃信宗教。戈尔巴乔夫也秘密接受了洗礼。他记得“圣像下方那张小小的自制方桌上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像”^②。

纳粹入侵时，戈尔巴乔夫10岁。“战时的印象和经历始终都铭刻在心。”他写道。1941年8月，他的父亲和村里其他人都受到征召。“家家户户都陪着家中的男人号啕大哭，一路上述说着离愁别绪。我们依依不舍地在村子中心道别。妇女、孩子、老人一个个都哭碎了心，泪水融入在催人断肠的悲恸之中。”^③

村里只留下了妇女和孩子。米哈伊尔接过本属于父亲的家务，耕耘菜地养活家人。“战争令孩子们一夜长大了。”他写道。1942年夏末，德军占领了村庄。“到处都能听到有关邻村惨遭屠杀以及毒瓦斯机器的谣言。”米哈伊尔与母亲、祖母和外婆都非常害怕。但1943年初苏联部队回来了，把德国人赶到了西部，他们得救了。那一年，村里的一切都被毁了——“机器没了，耕牛没了，种子没了。要耕地就只能牵出自家的牛。妇女悲泣洒泪，老牛的眼中透出悲伤，”戈尔巴乔夫继续写道，“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时正是饥荒肆虐的时候，他的母亲卖掉了父亲的衣服和靴子，换回了一袋谷物。他们播下了种子，后来下了雨，他们得救了。^④

1944年夏末，他们收到一封信，信上说米哈伊尔的父亲阵亡了。而事实上消息传错了。他还活着。他在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和其他战场上作战；他所在的那个旅中

①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532，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1984年12月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时候，对他印象较好。她向里根传达了她的观点。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会谈备忘录，1984年12月28日，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网站，<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

②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emoirs)，纽约：道尔布迪出版公司(Doubleday)，1995，22—28，引自23；关于洗礼，参见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戈尔巴乔夫之因素》(The Gorbachev Factor)，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27。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8。

④ 出处同上，31。

有440名战士阵亡,120人受伤,651人失踪。但他活了下来,于1945年中期带着伤回到了家中。^①

战争意味着破坏,也意味着创伤。那些因为年纪尚幼而未参战的人不曾经历最不堪忍受的苦难,但偶尔,他们也会在目睹战争的残酷时惊愕不已。1943年3月,冰雪开始消融,年轻的米哈伊尔和朋友们在乡间漫步时“被红军战士的尸体绊倒了”。他们的“恐惧难以言述:腐烂的尸体被动物噬去了大半,生了锈的钢盔下露出了颅骨……他们没被埋起来,只是在深沟堑壕中静静躺着,阴黑、洞开的眼窝瞪视着我们。我们在万分惊恐中回了家”。米哈伊尔永远不会忘记那情景。“战争结束时我14岁。我们这群孩子是历经战争的一代。战争就像大火一样烧炙着我们,在我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上都留下了烙印。”^②

战后俄罗斯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旱灾来袭,颗粒无收,1946年至1947年的饥荒毁掉了大片村庄。“我们唯有艰辛地劳动并坚守一个信念,那就是一旦完成了重建工作,我们最终就会过上正常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写道,“在这种希望的鼓舞下,再苦再累的活也要干下去。”^③

戈尔巴乔夫很有雄心壮志。在学校里,他表现优秀,加入了共青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校的体制,他后来评论道:“对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用尽一切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正生活在最讲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之中,并让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其他任何社会形式都无法代替它。”^④

当然他也明白,周遭的现实与灌输给他的理论并不一致。但理想总能鼓舞人心。“革命所带来的推动力产生了强大的效果:自由、土地、……受尽屈辱后重获的尊严——无论发生过什么,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积极向上的。”^⑤此外,父亲在战场上成为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32。

② 出处同上,33—34;关于战争的影响,参见赖莎·戈尔巴乔夫(Raisa Gorbachev),《我的希望》(*I hope*),大卫·弗洛伊德(David Floyd)(译),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12,97。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38—39。

④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兹德内克·姆利纳日(Zdenek Mlynar),《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会谈,布拉格之春,及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on Perestroika, the Prague Spring, and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ism*),乔治·施赖弗(George Shriver)(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17—18。

⑤ 出处同上,18,145—150;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和世界》(*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乔治·施赖弗(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28—29。



共产党员也让他很有触动。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许多人而言，“那场战争不仅仅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更证明了我们国家的事业是正确的”。他回忆道：“同样也证明了共产主义事业是正确的。”战胜纳粹之后，“整整一代人都对苏联社会怀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竞相将自己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希望和计划紧紧维系在这个社会的成功之上”。^①

少年时的戈尔巴乔夫与父亲在夏日的农田里耕作，父亲是位机械师兼拖拉机手，他的智慧、勤劳、勇敢与求知欲令米哈伊尔钦佩不已。1948年他们与另一对父子一同工作，创下的丰收记录是平时的五六倍。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赢得了列宁勋章，米哈伊尔则获得了红旗劳动勋章。年轻的戈尔巴乔夫非常珍视这个荣誉，而这为他被莫斯科国立大学录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对一个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农家孩子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会，而他的爷爷和外公还曾是人民的敌人。^②

学习法律改变了戈尔巴乔夫的一生。刚开始，他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的预备期教育与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学生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他刻苦，有抱负，好奇心强，天赋又好。他喜爱钻研自己不曾探究过的话题。根据课程设置，要想学习法律，就必须了解支撑法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比起更为实用的法律课程，戈尔巴乔夫更喜欢历史、外交、政治经济和哲学等课程。尽管不断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洗脑，他还是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同学和激励人心的老师。“课堂将一个全新世界展现在了我面前，而我那时对其中的知识还一无所知。”^③

1953年，斯大林与世长辞，那是“我们难以忍受的沉重打击”，戈尔巴乔夫多年后承认，“人们整夜涌向他的灵柩，我们也是其中之一”。但随着这位独裁者的去世，大学生活变得更为美好。讲座变得更有趣了，研讨会也更生动了。“人们能够表达出怀疑态度了——开始时小心翼翼，但渐渐也就变得坦率起来了。”传统的观点受到了挑战。戈尔巴乔夫学会了“该如何思考。……进大学前我只是囿于自己的信仰体制之中，接受什么都认为理所应当，从不会有所质疑。而在大学里，我开始了真正的思考，看事物的角度也不同了”。^④

他在大学里遇到了灵魂伴侣赖莎·季塔连科(Raisa Titorenko)。她是个有才华的哲学系学生，她的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遭遇过肃清和恐吓。戈尔巴乔夫感

①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15，150。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38—42；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28。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3—46；莫斯科法律学校的毕业生通常在国家惩罚机构供职。

④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21，23；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8。



到面对赖莎时他可以谈顾虑、谈抱负,畅所欲言。他们在1953年结了婚。她不像他那样善于交际,但她很聪明,看问题也很透彻,而当丈夫在追求自己的事业时,她也致力于改善苏联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包括妇女地位和农民阶级的落后条件等等都是她正在研究的课题。^①

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在之后的20年里,他可谓是稳步上升,先是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后来调到了地方上的党组织,再就是地区的党组织。因为主要从事党务和农村工作,加上在这一地区到处行走,他很清楚自己国家的贫穷落后。斯塔夫罗波尔的基础设施——医疗保健、教育、交通、供水系统——条件都非常糟糕。“污物常倒入沿街敞开的边沟中。”当地官员的呆板讲话让他很是失望。所有指令都来自莫斯科。他和别人一样,“因为中央发来的指令而束手束脚”。戈尔巴乔夫渴望着莫斯科能出现开明的领导,刚开始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激起了一线希望,但那希望很快便冷却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也是举步维艰。“每双眼睛都盯着中央,”戈尔巴乔夫回忆道,“而它拒绝任何革新,要不然就是榨干了任何首创的精力和活力。我最早对体制是否有效产生怀疑就是在那个时候。”^②

在国外的游历则加剧了他的这种怀疑。随着党内职务的不断上升,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出国考察的权利,比如去东德和保加利亚。1969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个月后,他访问布拉格,遭到了令他为之震惊的冷遇。1971年他去了意大利,1972年去了比利时和荷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去了意大利和西德,还游历了法国的很多地方。作为斯塔夫罗波尔的省级官员,他对世界了解甚少,所以他欣喜地将这些行程视作学习的机会。这些旅游本身就反映了领导对他的重视,因为在当时很少有苏联官员能享有走进西方考察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很喜欢与外国人交谈,交换不同的看法,比较彼此的生活方式。他为苏联的教育体制感到自豪。他相信他的国人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和公共交通系统。但他的海外考察也让他产生了怀疑:

当我观察到城市社会和不同政治体制的运作时,我先前对社会主义民主优

① 赖莎·戈尔巴乔夫,《我的希望》,47—52,70—72;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32—34;关于赖莎·戈尔巴乔夫的负面观点,参见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动荡的十年:其参谋长见证的戈尔巴乔夫时代》(*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The Gorbachev Era as Witnessed by His Chief of Staff*),爱芙琳·罗赛特(Evelyn Rossiter)(译),纽约:基本书局,1994,特别是83—91;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36—364。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77;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47—48,30—31;同时参见赖莎·戈尔巴乔夫,《我的希望》,107—119。



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最后,我从国外考察中得出了最有意义的结论:人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好,生活更富足。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中:为什么我国的生活水平比那些发达国家要低?①

对制度的怀疑并不意味着就要拒绝该制度。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看到苏联的共产主义运作得并不理想,但他仍然深信其价值观,也欣赏它已取得的成就。他后来想到:

多年来,人们经历了迅猛的工业增长,不可否认,我们从一个落后国家实实在在地发展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来自边远地区的人们进入新工厂工作,他们对自己的成就很是骄傲。……在遭受彻底的毁坏和饥饿之后,我们扫除了文盲,降低了教育门槛,大众生活水平也明显提升——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宣传,而是人民真实的经历。

效率低下问题严重,腐败更是几近成风,但人民的基本需求还是得到了满足,社会并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道,“人们并没有生活在缺乏社会流动的无望状态中,正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那样。”②

作为党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加快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条件。他充满活力,风度翩翩,适应性强。他尽量委派一些有天赋、有创意的年轻人。“我认为支持新生事物是我的责任,还应当鼓励我们地区民主氛围的发展。”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不是通过管理方式”,而是通过鼓励地区自治并采取科技革新。他还试图激励地方企业的独立。③

他的活力和果断引起了莫斯科领导人的注意。逐渐对他有所了解的人包括了农业部长菲德尔·库拉科夫(Fedor Kulakov)、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安德罗波夫以及意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02—103;赖莎·戈尔巴乔夫,《我的希望》,116;马修·埃万杰利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没有武装的力量:终结冷战的跨国运动》(*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9,260—263;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政治抱负和个人信念:苏联共产主义的衰亡》(*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102。

②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150—151;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和世界》,27—28,50,53。

③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49;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46。



意识形态主管和党中央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他们都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密切联系,还喜欢在那儿大大小小的胜地度假。当库拉科夫任地区第一书记时,戈尔巴乔夫就在他手下工作。当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访问斯塔夫罗波尔时,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见到了他们并且在他们面前毛遂自荐。安德罗波夫对他很有好感。1970年戈尔巴乔夫被委任为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第一书记。第二年,40岁的他已成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1978年库拉科夫去世时,勃列日涅夫把戈尔巴乔夫带到了莫斯科,任命他为农业部党书记。此后不久,他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起初作为候选委员,后来就转正了。那时他年近50,比同僚的平均年龄小了差不多25岁。^①

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急切希望有所改变。他会见了农业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参观了多个政治学院,询问探究了许多相关内容。他希望做到下放权力,授予农民更多自行组织工作的责任,根据他们的产出给予相应报酬。^②但是只要勃列日涅夫还活着,他就很难达成这些事。勃列日涅夫如今已是年老体弱,无法组织政府或党内工作,无法有效地与人交流,也无法思考新的举措或倡议。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政治局完全是“一团糟”。党内的最高领导人脱离了群众,彼此之间也相互孤立。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例会上,他们很少谈及工作,也几乎不探讨新想法。很有必要进行重新分配,从国防机构中划拨出部分资源,但“问题得不到分析。有关军工业的数据都是绝密的,甚至连政治局成员也无法获悉”^③。对于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来讲,除了等勃列日涅夫归天就没别的事好做了。

同时,戈尔巴乔夫继续自我发展。身为党内高官,他现在可以看到先前无法读到的书。他仔细阅读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6—107;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36—52;马丁·麦考利(Martin McCauley),《戈尔巴乔夫》,伦敦:朗文出版社,1998,21—39;赖莎·戈尔巴乔夫,《我的希望》,113;霍兰德,《政治抱负和个人信念》,103。

② 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58—60;关于观念和专家的影响,参见莎拉·E·门德尔森(Sarah E. Mendelson),《变化的过程:观念、政治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Changing Course: Ideas,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78—91;杰弗里·T·切克(Jeffrey T. Checkel),《观念和 international 政治变化:苏联/俄罗斯的行为和冷战的结束》(*I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Soviet/Russian Behavio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77—90;罗伯特·D·英格利希,《俄国和西方:戈尔巴乔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结束》(*Russia and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36(引用),同时参见109—121,134—136;赖莎·戈尔巴乔夫,《我的希望》,120—124。



Mitterrand)的文章,接触到了思考社会主义的新方法。^①他还与外交及原子武器专家取得了联系。他会见了叶夫根尼·维列科夫(Yevgeni Velikhov)等科学家,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等院士,以及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i Chernyaev)、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Georgi Shakhnazarov)等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一次加拿大之旅让他与早前认识的驻渥太华大使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重叙友情。两人发现彼此可谓是志趣相投。“我们的谈话毫无保留,极为坦直。”雅克夫列夫回忆道,“主要观点就是这社会必须有所改变,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原则之上。”^②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此时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位前克格勃掌门人希望使体制呈现出生气,加速工业生产。他指望戈尔巴乔夫能为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得知自己患病之后,他开始培养这个年轻人作为继任者。他指派戈尔巴乔夫在列宁逝世6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励他在所有事务上都要拓宽思路。“把这当成是你要承担下所有的重任……”安德罗波夫说。^③

安德罗波夫所设定的路线对戈尔巴乔夫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他“坚决谴责了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相关的一切特征,那就是保护主义、内讧密谋、腐化舞弊、道德败坏、官僚主义以及无组织纪律”^④。他呼吁“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他坚持质变应当不只是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上,还必须体现在上层建筑上。他提出必须增强劳动生产力,并要采纳包括电脑和机器人在内的新技术。和他的前任一样,安德罗波夫强调商品质量必须得到提高。他提醒同志们:“我们在经济领域为之努力的最高目标便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条件。”甚至在他要求整风严纪的情况下,他也仍然认为应当拓宽社会主义民主,“党与政府组织的活动(必须)要与人民的需求利益紧密相连”。^⑤

安德罗波夫毫不犹豫地表示,挑战是很考验胆识的。“坦率地说,我们还没有彻底分析过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会,还没有充分揭示出决定其发展的那些法则,尤其是有关经济的方面,”他在1983年6月15日党内全会的发言中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还必须依靠实际经验行事,可以说是用了缺乏理性的尝试错误法。”生活中总

① 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49—50。

② 英格利希,《俄国和西方》,184(引用),同时参见180—186;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89—105。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40,146;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51。

④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53。

⑤ 安德罗波夫全体会议讲话,1983年6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3年6月16日,R5, R7。

会冒出新的问题,因而有赖于科学研究。但是科学技术引发了新的挑战新的威胁。^①

没有一种威胁比核战争更可怕。“在两大社会制度之间,一场前所未有的争锋已然上演。”安德罗波夫说,“(但是)试图通过军事冲突来解决两种制度间的历史争端,对人类无疑是灾难。”因此,维护和平是他的主要目标。他坚持表示,这件事是如此重大,以至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价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同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及剥削”作斗争总是受到压倒一切的关注,但是现在的共产主义者“还必须为保存人类文明、为人类生存权而奋斗”。资本主义面临着更严重的危机,正为“国内及洲际的对抗、动荡及冲突”而大伤脑筋。但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总有些派别和运动意识到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安德罗波夫希望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和平共处的看法与他们别无二致,因为这符合“世界两大社会阵营双方各国人民的利益”。^②

安德罗波夫仍然“相信将来属于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会进行‘输出革命’”。社会主义会“在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争中最终证明其优势所在。我们决不主张军事领域的竞争,那是帝国主义正在强加给我们的”。虽然他不会牺牲苏联或其盟友的安全,并准备加强国家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他还是愿意“双方减少军备数量和军事开支,着手裁军事宜,那就是我们所积极寻求的”。苏联的目标,他最后说,不仅是防止战争,更是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关系。^③

这些想法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兴趣,但是当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早期去世时,这些想法都被搁置了下来。戈尔巴乔夫简单地认为他可能会被选为总书记,可老一辈政治家站在了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一边,后者的治国时间为一年。73岁的他体弱多病,在向往活力与创新的人眼中是个累赘。虽然他口口声声要沿着安德罗波夫所指引的方向前行,但他缺乏魄力、创造力和决断去改组党的核心,催化经济变革,刺激生产,或是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契尔年科太过虚弱无法参加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便习惯于主持会议。之后,随着契尔年科死期临近——他在1985年3月11日(此处可能是原作者笔误,应为1985年3月10日——译者注)过世了——戈尔巴乔夫向他的支持者发起了动员。他急于掌控大局,不能眼看着对手再次获胜了。他想要推行改革,重振体制;对于如何前进,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再这样

① 安德罗波夫全体会议讲话,1983年6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3年6月16日,R8。

② 出处同上,R9—R10。

③ 出处同上,R11—R12。



生活下去了。”掌权前夕的他对赖莎悄声说。他认为“这个体制行将式微；它年迈的血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生机了”。^①

第二天，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这一选举结果赢得台下一片喝彩。^② 那正是莫斯科的黄昏，但戈尔巴乔夫让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

军备裁减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被正式任命为新的总书记，他概述了自己的长远计划。在不否定过去的前提下，他强调苏联经济必须恢复活力，社会必须重焕生气。他要求加速生产，整顿经济管理，推进开放和民主。^③ “加速”意味着将科技革新迅速融入苏联工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与酗酒作斗争。戈尔巴乔夫表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过程必须佐以更多纪律和秩序。个体工人必须重新投入生产，在此过程中培养主人翁意识。加大自我管理的力度，就要求有更多的透明度（开放性）。^④ 戈尔巴乔夫相信，在工作场所越是民主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更多社会公正，这正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以更好地满足个人对成就感和创造力的需求。^⑤

转到外交事务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声明，军备竞赛必须得到控制。“这个时代从未出现过这般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可怕危险，”他告诉同志们，“要走出现状，唯一理性的方法就是对方同意立即停止军备竞赛——首先便是核武器竞赛。”^⑥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断加剧的核武器储备毫无意义可言。这完全无助于国家安全，他相信核战争不可能赢下，也永远都不能开战。“在掌握原子能和宇宙空间技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54—168，引自 167—168；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65—66，171—180。

② 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9—20。戈尔巴乔夫的选举迫在眉睫，他不得不施展策略以赢得选举。参见马克·克拉默，“苏联体系改革和苏维埃国家的衰亡”（“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tate”），《斯拉夫评论》63（2004 年秋）：511。

③ 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121—129。

④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4 年 12 月 10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5 年 3 月 28 日，R1—R4；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会谈》，199—200；“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会议”（“Conference of the Secretaries of the CC CPSU”），1985 年 3 月 15 日，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⑤ 强调社会正义，参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86 年 2 月 25 日由戈尔巴乔夫呈交第 27 届苏联共产党大会，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 年 3 月 28 日，特别是 O19ff, O37。

⑥ 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180；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67。

术的时代,”他在 1986 年 5 月说道,“世界大战绝对是万恶的。”^①他也认为遇到危机的时候,不能出于政治目的用核武器敲诈或威胁对手。冒这样的险简直是自取灭亡,如果对方不放弃,任何判断错误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核武器“不该继续被视作政治工具,因为那样我们不可能利用(它们)达到目的”^②。

然而,对苏联共产主义最大的危险并非来自外在威胁,戈尔巴乔夫“认为没人打算攻击我们,”著名外交政策专家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说道,他于 1986 年 2 月成为这位苏联新领导的助手。苏联军事力量之强大足以“击退侵犯的欲望”。^③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确认为苏联陷于内在衰败的危险之中。军事竞赛必须加以控制,国际关系必须得到缓和,因为这些举措对于他国内计划的成功必不可少。“(我们)明白如果外交政策不作改变的话,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国内变化便会止步不前。”戈尔巴乔夫回忆道。切尔尼亚耶夫强调:“每个重大的国内问题都和外交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④

戈尔巴乔夫的想法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帝国主义仍令人担忧;警惕是必要的。^⑤在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常会说美国总试图把苏联拖垮,“就等着我们溺死”^⑥。他不会允许自己国家遭受美国强权的威胁,起初准备把更多资源转向苏联国防能力的现代化。在军事上有备无患“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⑦。但主要威胁来

- ① 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 年在 5 月 28 日,REEAD 3486,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尼古拉·杰季诺夫所作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51—152。
- ② 引文见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39;同时参见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的评论,出处同上,69;及沙赫纳扎罗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见证冷战的终结》,37。
- ③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威廉·C·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Cold War Endgame*)(大学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3),21;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 年 5 月 28 日,REEAD 3486,阿纳托利·S·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沃尔福斯,《见证》,5。
- ④ 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66;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55。
- ⑤ 参见,例如,戈尔巴乔夫在斯摩棱斯克的演讲,1984 年 6 月 27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4 年 6 月 29 日,R9;戈尔巴乔夫在与埃里希·何内克和契尔年科会见时的评论,1984 年 8 月 17 日,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497—498。
- ⑥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 年 10 月 16 日,REEAD 2953,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 年 9 月 22 日,REEAD 2956,出处同上;同时参见,例如,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 年 5 月 28 日,REEAD 3486,切尔尼亚耶夫集,出处同上;戈尔巴乔夫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会谈文本,1986 年 7 月 7 日,REEAD 3366,出处同上。
- ⑦ “为筹备第 27 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1985 年 11 月 28 日,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戈尔巴乔夫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努力》(*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9,15—16;诺埃尔·E·费恩和詹姆斯·H·诺伦,《苏联的国防开支:中央情报局评估历史,1950—1990》,柯利奇站:德克萨斯 A&M 出版社,1998,98—110;斯蒂芬·柯特金(Stephen Kotkin),《避免大战:苏联解体,1970—2000》(*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 - 2000*),牛津,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61。



自内部,来自共产主义体制未能满足苏联人民期望的现状,即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资,保证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革新是社会主义吸引力复兴的关键。“当代世界政治就是对人心的争夺,”戈尔巴乔夫相信。^①在这场竞赛中,社会主义展现了社会公正和个人成就感的辉煌远景。但是“社会主义的国际推动力变小了”^②。他通过恢复社会主义在国内的活力而得以提升其在国外的吸引力。被选为总书记时,他明确表示要集中解决国内问题。1985年3月15日,他在党书记会议上表示苏联“应该重视国内事务以及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在1986年2月25日召开的第27届党代会上,他在报告中重申党的主要“国际责任”是保证国内革命的成功。^③

但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认识到,不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就无法达成他在国内的目标。据切尔尼亚耶夫所说,戈尔巴乔夫明白“要想奉行某种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就必须停止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在任职一年后谈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尽全力……减少在防御上的支出”。在1986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即将与里根总统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会晤,他谈到了策略问题,当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下一轮军备竞赛。如果无法如愿……我们将被卷入自己力不能及的军备竞赛之中,而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虽然国防工业的非军方管理人员不同意,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志们,甚至包括大部分的军官们都表示赞同。^④

为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推进有助于削减军备的氛围,戈尔巴乔夫想要改变苏联的形象。“从一开始,”切尔尼亚耶夫强调,“他……很清楚,如果你不能改变别国对苏联的态度,你就不能改变社会。”“我们国家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眼中,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是最为糟糕的。”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外交顾问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说。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个国家为一群年长孱弱且对当代国内外需求一无所知的人所掌管。入侵阿富汗,军备竞赛逐步升级,波兰宣布戒严令,与中国

① 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年在5月28日,7, REEAD 3486,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4日,23。

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会议”,1985年3月15日,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在第27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中作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86年2月2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年3月28日,O32。

④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78—79;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年10月4日,READD 2954,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年5月28日,4, REEAD, 3486, 切尔尼亚耶夫集,出处同上;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见证》,33。

争端不断, 韩国民用航班坠毁, 经济停滞不前, 所有这些都毁了克里姆林宫的声誉, 也给其领导人脸上抹黑。“最令戈尔巴乔夫政府担心的事情之一,” 塔拉先科继续道, “便是如何改善苏联的形象, 从而让苏联不被视为‘邪恶帝国’。”^①

戈尔巴乔夫旋即着手改变苏联的形象, 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面对副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舒尔茨, 他说服力十足地讲述了对一个全新开始的需要, 几天之后, 即 1985 年 3 月 24 日, 他给里根写了第一封信:

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也不同。可我们相信, 这不该成为敌对的理由。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各自生存的权利, 但不能用武力或军事手段来证明其优势, 而是应当与其他制度走和平竞争的道路。所有人有权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任何人都不能从外界对其强加任何意愿。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道, 两国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不能让事态发展到爆发核战争的那一步, 否则会不可避免地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领导人需要停止“激起仇恨”, 需要冷静地评估彼此间的差异, “营造一个两国相互信任的气氛”。戈尔巴乔夫乐于和美国总统进行个人会晤。^② 和里根一样, 他相信跨越意识形态界限的“正常关系”应建立在“以人为本这一基础上”。^③

里根很快就回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信中邀请戈尔巴乔夫与身为众议院发言人的国会议员托马斯·P·(“TIP”)奥尼尔及其他几位曾到访过莫斯科的立法成员见面。戈尔巴乔夫随即照做了。4 月 10 日, 他坦率地跟奥尼尔说, “两国的关系现处于冰期”, 但不会一直这样僵持下去。“两国利益上的致命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有一个解决办法, 也就是和平共处, 认识到各民族有权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没有其他选择。^④

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戈尔巴乔夫需要开辟新的意识形态基础。他已经开始接受“公共安全”或“同等安全”的概念, 此概念得到了研究国际关系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和

①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 收录于坦嫩瓦尔德, “认识冷战的终结”, 78—80; 谢尔盖·塔拉先科的评论, 出处同上, 75。

②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 1985 年 3 月 24 日, 执行秘书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元首, 苏联, 文件箱 39, 里根图书馆。

③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 收录于坦嫩瓦尔德, “认识冷战的终结”, 78。

④ 戈尔巴乔夫, 《我的国家》, 181; 里根致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4 月 4 日, 执行秘书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元首, 苏联, 文件箱 39, 里根图书馆。



理论家的广泛讨论，这同样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成分，使得苏联对国际关系的概念脱离阶级上的冲突。^① 当然，动动嘴皮子是很容易的，戈尔巴乔夫也知道言行必须一致。他开始寻求从阿富汗撤军的途径。^② 他告诉华约的盟国他会通过谈判削减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或者，更好的是，将中程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都在欧洲清除”^③。1985年7月，他宣布单方面延期苏联核试验，也希望美国能够予以配合。^④

1985年底，戈尔巴乔夫罢免了安德烈·葛罗米柯已担任了二十余年的外交部长一职，由此，外国人开始明白他是要动真格的了。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位干练、坚定的老外交家“严格死板”、想法“一成不变”。^⑤ 葛罗米柯长期承受着纳粹侵略记忆的重压，患有“6月22日综合征”，始终认为苏联会永远被帝国主义敌人包围和攻击，他的儿子后来这样承认道。^⑥

戈尔巴乔夫任命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接任葛罗米柯的职务，这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年轻政治局委员并无外交经验。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很熟悉。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年代，都忍受过大后方的艰难，也是同时从党组织等级制度中提升上来的，谢瓦尔德纳泽来自格鲁吉亚，戈尔巴乔夫来自斯塔夫罗波尔。他们在开会时认识，之后便感到志趣相投。戈尔巴乔夫知道，指派谢瓦尔德纳泽接任，实为委任了一名会接受他新思想的外交部长。^⑦

二战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想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样的影响不如6月22日那代人那么持久。但“这场战争决定了我的一生，正如它决定了与我同时代的千百万人一样，”他回忆道，“它促成了我生活中的信念和目的。”他的哥哥在战争早期去世了；另一个哥哥也旋即被召去了前线。“过去的伤痛刚发生，新的灾难却又将来临，于

①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参见《我的国家》，171—190；戈尔巴乔夫，《回忆录》，237—240，401—462；进一步全面了解，参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对国家和世界的新思考》(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87；关于背景，参见埃万杰利斯塔，《没有武装的力量》；英格利希，《俄国和西方的思想》；切克，《观念和 international 政治变化》。

② 参见戈尔巴乔夫与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第一次会谈，1985年3月14日，“黄金储备”，国家安全档案；切尔尼亚耶夫和杰季诺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95—97，275—277；也可参见下面的分析，389—399。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5年4月26日，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509。

④ 埃万杰利斯塔，《没有武装的力量》，264—265。

⑤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66。

⑥ 阿纳托利·葛罗米柯(Anatoli Gromyko)的评论，“莫斯科冷战会议”(“Moscow Cold War Conference”) (口述历史会议，由俄亥俄州立大学莫尚中心(Mershon Center)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和理查德·K·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组织，1999；国家安全档案有文本记录)。

⑦ 谢瓦尔德纳泽，《未来属于自由》，23—39。

是我母亲就一直穿着丧服。”纳粹的进攻证明了“那些外人想要消灭我们, 完全将我们毁灭。亲友纷纷离世, 千百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切都坚定了我的选择(共产主义)”。对谢瓦尔德纳泽来说, “对法西斯的战争变成了一场私人的战斗。……法西斯主义者攻击了共产主义, 而共产主义正是我们的信仰”。^①

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 他没有对自己的信念感到羞愧。“我一心所效力的集体主义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使不毛之地改头换面, 击败了法西斯主义, 让国家从废墟中站了起来, 其权威傲然矗立。”但和戈尔巴乔夫一样, 谢瓦尔德纳泽能看到制度中的缺陷——这种制度无法无纪, “把一个人降格成一个小零件, 任意欺凌”。作为格鲁吉亚的党内领导, 谢瓦尔德纳泽已取得了更多自治权, 规避命令系统, 在自己的地盘上独行其是, 但他还是备感挫折。“一切都糟透了。”1984年后期他向戈尔巴乔夫吐露道。^②

谢瓦尔德纳泽对自己被提升为外交部长大为吃惊。他不了解世界, 也不会说外语。格鲁吉亚语是他的母语, 他说俄语时还带有明显的口音。但戈尔巴乔夫恳求他接任, 因为他需要革新、勇气和干劲。他需要有人能和他一样以人情为基础与美国人打交道, 并能超越思想上的鸿沟。^③

1985年7月底, 谢瓦尔德纳泽在赫尔辛基会见国务卿舒尔茨, 当时他对多年来军备控制谈判的细节知之甚少。但他对自己的无知未加掩饰。他告诉舒尔茨, 他只是把准备好了的谈话要点读了一遍而已。他的真诚与坦率给舒尔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这也恰恰是谢瓦尔德纳泽的意图。他主要目的是根除“敌人的形象”。“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隔着一道道墙, 用怀疑的碎砖和思想体系的石块所砌成的墙。”他回忆道。^④

赫尔辛基协议十周年纪念会在芬兰首都举行, 谢瓦尔德纳泽与会时的发言包含了苏联思想的新种子。克里姆林宫, 谢瓦尔德纳泽说道, 如今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集中改善国内生活。苏联领导人想要加快社会 and 经济发展, 为人民谋取更多福祉, 创造“个人和谐发展”的条件。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从这些国内需求出发的。“为了

① 谢瓦尔德纳泽,《未来属于自由》, 13—14。

② 出处同上, 19, 14, 34—35, 37; 霍兰德,《政治抱负和个人信念》, 117—125。

③ 谢瓦尔德纳泽,《未来属于自由》, 38—39。

④ 出处同上, 48, 81; 同时参见帕维尔·帕拉琴科(Pavel Palazchenko),《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 一个苏联译员的回忆录》(*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 The Memoir of a Soviet Interpreter*), 大学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7, 33—35; 塔拉先科的评论, 收录于坦嫩瓦尔德, “认识冷战的终结”, 190—191。

推行大规模的计划，”谢瓦尔德纳泽最后说，“苏联需要欧洲的持久和平与全世界的长治久安。”^①

戈尔巴乔夫传递了同样的讯息。1985年10月上旬，他告诉法国电视观众，他首要考虑的是“发展经济、社会关系和民主”。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自信十足地表示：“我们的政治观不同，价值观也不同，但我们仍有不少共同之处。”毕竟“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需要合作”。当被问及苏联是否有四百万政治犯时，他怒斥谈这样的数字太“荒谬”。“我们知道该怎样进一步发挥这一社会制度最好的方面。我们所追求的核心是人以及人的需求。”^②

10月22日与华约领导人见面时他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尽管当时他还对美国试图加快军备竞赛进行了抨击。“他们企图通过战争或军事胁迫战胜社会主义。”他毫不保留自己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反对：“其军国主义本质昭然若揭。……目的是获取西方技术的永久优势，不仅要超越社会主义社会，还要超过（美国的）盟国。”必要的话，克里姆林宫会反驳美国的动议，而且已在军事研究和战略防御方面投入了更多财力。但他倒不希望那样，代价太过高昂了。“我们应当迫使帝国主义对军备裁减和国际形势正常化采取实质性步骤。”他的目标在于消除西方人眼中“苏联军事威胁”这一形象。^③然而，新的调子别有特色，其中明显涵盖了大量讯息：苏联和美国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正如他给里根的信中写到的，但“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上且必须学会共同生存，要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④。

里根急切盼望着与新任总书记在11月中旬的首次会面。总统“活力四溢，”他回忆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峰会的准备工作早在五年前已然开展，那时起我们开始加强经济实力，恢复民族的意志，重建我们的国防。我感到准备就绪了。”^⑤

他和舒尔茨知道戈尔巴乔夫特别关注军备削减，也希望阻止战略防御计划。^⑥

①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5年7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5年7月31日，CC1—6。

② 戈尔巴乔夫在法国电视台的演说和采访，1985年9月30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5年10月2日，G1—11，引自G5和G11。

③ 戈尔巴乔夫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10月22日，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网站，<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2/851022.htm>；关于1985年到1987年间战略国防开支增加，参见费思和诺伦，《苏联的国防开支》，107。

④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1985年10月12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9；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22；舒尔茨致里根，1985年11月7日，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⑤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34。

⑥ 舒尔茨致里根，1985年11月7日，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人士在多个报告中强调,苏联是个“处于麻烦之中的国家”。尽管不太会即刻瓦解,但不再是不安的民众和民族主义革命者寻求飞速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典范。事实上,美国人认为苏联政权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也无法积聚起足以达到戈尔巴乔夫那宏伟经济目标的资财。^①

了解这一切之后,里根希望在一些他所感兴趣的事务上得到认可:苏联的人权状况,阿富汗的战争,中美洲、南非及其他热点地区的骚乱。他认为军备谈判与这些事务都有关联。在他看来,美苏之间的紧张和敌意并非出于军备问题,而是由不信任造成的。如果苏联和他一样意欲削减军备,他们就要摒弃这样的不信任,帮助解决地区争端,准许持不同政见者更加畅所欲言、移居国外也更容易。^②

里根总统愿意谈判——除了谈战略防御计划。1985年9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以换取苏联的武器削减。”^③他希望解决其他问题——不过并不是马上。不像他的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他急于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④但是舒尔茨建议他调整他的期望;戈尔巴乔夫的确魅力非凡,但他同时又是个强硬而聪慧的人。最重要的是建立起融洽的个人关系,由此迈出第一步。^⑤里根对此完全赞同。他相信自己知道该如何谈判。“你不可能得

① 国务院,情报与研究,“苏联:一个陷入困境中的社会”(“USSR: A Society in Trouble”),1985年7月25日,文件箱1,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中央情报局,“戈尔巴乔夫对待社会问题的处理方法:有效管理下的振兴”(“Gorbachev's Approach to Societal Malaise: A Managed Revitalization”),1985年7月24日,文件箱1,出处同上;中央情报局,“戈尔巴乔夫的经济议程:希望,潜力和陷阱”(“Gorbachev's Economic Agenda: Promises, Potentials, and Pitfalls”),1985年9月,出处同上;盖茨,《从暗处探索》,342—344。

② 参见里根1985年9月27日对谢瓦尔德纳泽的评论,“美国对谢瓦尔德纳泽来访主题的草稿和苏联的反对提议”(“Draft U. S. Themes on the Shevardnadze Visit and Soviet Counter-Proposal”),文件箱92129,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关于信任的重要性,见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会见时里根的开场致辞。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10:20—11:20 a. 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舒尔茨致里根,1985年11月7日,出处同上。

③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28。

④ 出处同上;关于管理上的不同意见,参见奥菲拉·塞利克塔尔(Ofira Seliktar),《政治,模式和情报失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苏联的解体》(*Politics, Paradigms,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s: Why So Few Predict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M·E·夏普出版社,2004,136—138;舒尔茨,《骚乱与胜利》,578—580;盖茨,《从暗处探索》,341—343,199—213;肯尼斯·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致麦克法兰,1985年7月3日,文件箱90706,唐纳德·弗堤尔(Donald Fortier)文件,里根图书馆。卡斯帕尔·温伯格的态度在卡斯帕尔·温伯格和格雷琴·罗伯特(Gretchen Roberts)的《世界舞台上:20世纪回忆录》(*In the Arena: A Memoi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有所体现,华盛顿特区:莱格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1,269—286。

⑤ 舒尔茨致里根,1985年11月7日,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31—632。



到想要的一切；如果你不发布最后通牒，让你的对手有机可施的话，你得到的可能比你所想要的会更多；你不该把对手逼得太紧，给他难堪或羞辱他；有时最容易的解决方法是高层在私下里独自处理。”^①

1985年11月16日，里根夫妇飞往日内瓦与戈尔巴乔夫夫妇会面。他们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握手时，我得承认……戈尔巴乔夫有种很讨人喜欢的气质，”总统回忆道，“在他的脸上和作风上能找到一种温暖的感觉。”里根马上建议不需要顾问在场，让他们两人自己聊，这是他精心准备好的想法。他想营造一种亲密感。他们谈了半个小时，只有翻译在场。^②

“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上，这是里根的开场白。他们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但愿他们能消除两国间的怀疑与隔阂。总统建议他们首先要建立信任；只要建立了信心，随之便有了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里根煽情地表示他很理解二战对苏联的影响，而对于苏联用蛮横的暴力手段传播马列主义，他深感忧虑。美苏之间，里根说道，应该协作解决困扰第三世界的问题。^③

戈尔巴乔夫也同样想要建立和谐关系，但他比里根更急于在减少核军备和阻止太空军备竞赛方面达成协议。他的讲话充满温暖和真诚，他告诉总统他希望得以平和、互敬地会谈。苏联人民毫无嫉恨之心，也希望美国并无恶意。他相信他们能够改善两国关系，但也强调了他们有义务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一首要问题。起点就是削减军备。虽然他和里根一样关注第三世界的冲突和骚乱，但他提出苏联对那些动乱没有任何责任。莫斯科并非“权力无限”。他不是每天一早醒来就考虑“他现在要在哪个国家安排一场什么革命”。革命有其固有的起因；克里姆林宫支持民族自决，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在任何人头上。^④

最初的这次会晤立刻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接。显然，双方都希望建立起彼此间的人际交往，在不摒弃各自原则的前提下逾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两国代表团规模更加大了，他们继续阐释在首次会谈中所提出的诸多关键议题。

双方领导人各自表达了他们对另一方扩张主义倾向的担忧。戈尔巴乔夫留意到里根关于建立互信的首个议题。但他要的不单单是信任：他想让里根放弃“战略防御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37。

② 出处同上，11—12；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40。

③ 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10:20—11:20 a. 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④ 出处同上。



计划”。苏联认为美国力图通过“星球大战计划”获取霸权，这是一项攻击性而非防御性的措施。“战略防御计划”并不能有效保护美国免受苏联导弹的大量进攻；因此它的用处在于，美国若在苏联本土先行发动进攻，便能阻碍苏联的报复行动。

戈尔巴乔夫说，他知道一些美国人巴不得抓住一切机会展示技术上的优越性，加剧军备竞赛，以为这样便能拖垮苏联的经济。他坚持认为这一战略不会奏效：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会蓄势鼓劲，粉碎你们的盾牌”。但那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他想要做的是——他在阐明这一想法时出乎意料地直率——将军备竞赛的经费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军事无疑在“吞噬大量资源”。^①

在接下来一天半的时间里，里根再三指责苏联支持全球范围内的革命，侵犯人权，以及正在建造一个庞大的核武器兵工厂。他表示，戈尔巴乔夫应当消除美国对这些发展方面的不安。作为交换，美国总统也希望能够减轻苏联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担心，他仍然坚持这一计划并不是一种攻击性战略；他无意促成一场太空军备竞赛。为了证明美国的合作态度，里根还说美国将与苏联共享战略防御计划的技术。由于双方的防御能力不相上下，还是存在着大量裁减战略性武器甚至消灭所有核弹头的可能性的。^②

美国的立场使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大惑不解。下午的时候，当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进行另一次私人会谈时，谢瓦尔德纳泽对舒尔茨说，里根总统关于“星球大战计划”的想法实在是“异想天开”。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Georgi Kornienko)表明克里姆林宫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提议。苏联官员如何保证接任的美国总统会履行里根所作的承诺？“不幸的是，我们深知历史上诸如条约签订后便被扔进废纸篓的例子屡见不鲜。”整个设想“幼稚不堪”。^③

在为期两天的会谈中，“战略防御计划”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戈尔巴乔夫继续解释“战略防御计划”何以不可接受，而里根则坚持该计划是为防御性目的量身定做的。苏联人为什么不能信任里根？“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戈尔巴乔夫强调太空技术的核查工作将会极其困难，他呼吁里根总统反思一下自己的态度。“在一个新

① 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11:27 a.m. - 12:15 p.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出处同上；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2:30—3:40 p.m.，出处同上；会谈备忘录，3:40—4:45 p.m.，出处同上；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20日，11:30 a.m.—12:40 p.m.，出处同上；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20日，2:45.—3:30 p.m.，出处同上。

③ 会谈备忘录(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及其助手之间)，1985年11月19日，3:35—4:30 p.m.，文件箱92137，马特洛克文件，里根图书馆。



领域中展开一场军备竞赛用意何在？”^①

在“战略防御计划”上的分歧意味着在战略性武器、中程武器或常规武器方面无法达成共识。而在地区纠纷的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如此，无论是里根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对彼此抱有信心，赞成之后再聚首，先去华盛顿再去莫斯科。令戈尔巴乔夫失望的是：在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他就离开了日内瓦，但在会谈结束时他感觉到里根“是一个你‘可以跟他打交道的’人”。^②反过来，里根也很喜欢戈尔巴乔夫。南希·里根回忆道，就在第一天会谈结束时，“我就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了一份显而易见的融洽”^③。

这种融洽在晚上的觥筹交错之时尤为引人注目，戈尔巴乔夫令总统夫妇对他印象极佳。他很放松，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提问，诙谐幽默。“他会拿自己甚至自己的国家开玩笑，”里根写道，“我对他越来越有好感了。”^④在戈尔巴乔夫温暖人心且引人共鸣的祝酒辞中，他引用了一段圣经故事：“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现在是堆聚过去抛掷的石头的时候了。”里根则提醒在场的宾客，他们正在为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43周年举杯欢庆，那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折点。他说希望这次会谈能成为“全人类的又一转折点——一次会使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成为可能的转折点”。^⑤第二天晚宴结束之际，两位领导人都对会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进行了反思，然而双方都表达出了乐观的心声。“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立场、价值观念和见解，”戈尔巴乔夫表示，“但是我们仍然期待双方能够凭着耐心和智慧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里根总统也予以赞同。他打趣道，这次弥足珍贵的峰会似乎要无果而终了，但是“‘让过去见鬼去吧，’我们还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办事，来成就一些事情”^⑥。

戈尔巴乔夫激起了总统的兴趣。返回华盛顿后，里根向他的前任助手迈克尔·迪弗吐露：“迈克，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认为他崇尚更高的权力。”^⑦里根好友、演

① 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3:40—4:45 p.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根据杰克·马特洛克，里根总统从未领会“SDI(定题情报提供)可以用来进攻”的含义。参见马特洛克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83—184。

② 戈尔巴乔夫，《备忘录》，405；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15。

③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42。

④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39。

⑤ 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19日，8:00—10:30 p.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⑥ 会谈备忘录，1985年11月20日，8:00—10:30 p.m.，出处同上。

⑦ 迪弗，《标新立异》，118；也可参见里根致艾伦·布朗，1985年12月10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和安德森，《书信传记》，415。

员乔治·墨菲(George Murphy)概述了他的想法:这次会晤“颇有价值,但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戈尔巴乔夫]对他们的制度有着坚定的信仰(她[赖莎]也是如此),而且他也相信苏联宣传中对我们的那些谰言。同时,他很讲求实际,他很清楚苏联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我认为我们目前要做的并不是试图劝导他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而是向他证明,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些切实可行的协议,他和他的国人便会逐步摆脱困境。”^①

为取得快速进展,里根在会议结束一周后便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长信。这封信体现出了典型的里根笔锋:字里行间暖意融融,实质却是毫无妥协。他写道:“我认为我们的会谈意义重大。”他们的谈话坦率而真诚,双方都申明:“我们有诸多争议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但是,双方都已意识到他们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国间的关系。于是,他继续为“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护,并重申该计划与达成第一次核打击的力量无关。“我们应该寻求一条切合实际的途径,来缓解你们所予以担心的问题。”他们在日内瓦必须嘱咐自己的谈判代表要勇敢地“直面”刁钻的议题,而且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方占据优势地位。里根进而转向了地区性问题:为了向戈尔巴乔夫证明自己对他的提议洗耳恭听,里根再次强调,“我可以保证,美国决不认为苏联是世界的万恶之源”,但苏联确实“利用并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紧张”。如果苏联能够从阿富汗撤军,这将会减轻美国的忧虑并展示出苏联的真实意图。他的结语加上了一些个人色彩,敦促戈尔巴乔夫与他一起合作,以实现唯有他们才能企及的崇高目标。“我们各自都有顾问和助手,但是……维护和平、促进合作的责任却在我们肩上。我们的人民指望我们担起领导责任。”^②

戈尔巴乔夫渴望担起这领导责任,但是他想让里根作出让步。他对里根在“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很失望。“相信我,总统先生,”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亲笔信中回复道,“我们对美国的核系统实在是非常担心。”戈尔巴乔夫政府对美国在诸多第三世界地区的行动也是忧心忡忡。华盛顿和莫斯科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凭什么断言苏联的援助导致了地区性紧张局势而美国的援助就裨益良多呢?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双重标准?”苏联是在援助那些受外来干涉所困扰而前来寻求帮助的合法政府。而美国则经常“煽动反对政府的行动,支持那些危害社会的组织,

① 里根致乔治·墨菲,1985年12月19日,收录于斯金纳,安德森和安德森,《书信传记》,415—416。

② 里根致戈尔巴乔夫,1985年11月28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39;里根图书馆。



并给这些名副其实的恐怖主义者提供武器”。他提到了华盛顿在尼加拉瓜的行动，也在暗指美国在阿富汗对圣战组织的支持。不论总统的意图如何崇高，他都不会对美国的力量置之不理。然而，和里根一样，戈尔巴乔夫也试图使这封信显得不那么尖锐：请接受我的来信，戈尔巴乔夫在结语中说道：“同样作为我们的‘炉边谈话’的一部分。我真心希望我们不仅要保持日内瓦谈判的精神，而且能在对话上取得更大进展。”^①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里根正试图利用苏联的弱点迫使苏联在“战略防御计划”、地区性冲突及人权方面作出让步。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② 他对里根关于苏联人权状况的谴责也非常敏感，同时也并不反对放宽移民限制。^③ 然而，他最渴望的是能够打破“战略防御计划”的僵局，加速裁军进程。这对苏联改革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也决定了他对重建国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划，该规划准备在2月份召开的第27届党代会上提出。

凭借着八面玲珑的能耐，戈尔巴乔夫将自己的领导班子置于苏联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中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上。他竭力提拔像雅克夫列夫这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引进像切尔尼亚耶夫这样的专业人士加入他的政治队伍。在当权的早年，他对政党机器的掌控可谓是高超不凡。与外国政要的会谈、充沛的精力以及应对西方记者时表现出的自信，这些都无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日渐攀升。政治局会议上，他总是大唱主角，他的领导班子都对他极为遵从。一些人对他的长篇大论嗤之以鼻，但大部分人从他的阐述中意识到了为重振社会体制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他们认可了戈尔巴乔夫限制军备竞赛以及最终缩减军费开支的决心，前提是苏联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威望不会受损。^④

①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1985年12月24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40，里根图书馆；关于第三世界的激烈竞争，参见盖茨，《从暗处探索》，345—356；韦斯塔，“里根的反革命攻击”，241—261。

② 关于阿富汗，见下面的章节，389—399。

③ 关于人权问题，参见政治局会议，1986年9月25日，相关会议文献包“认识冷战的终结”，布朗大学，1998年5月；马克斯·M·坎佩尔曼(Max M. Kampelman)，《迈入新世界：一个平民的公共生活回忆录》(Entering New Worlds: The Memoirs of a Private Man in Public Life)，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374。

④ 关于人事变动，参见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89—129；关于外交部变动，见卡罗琳·麦克吉福特·埃克达尔(Carolyn McGiffert Ekedahl)和梅尔文·A·古德曼(Melvin A. Goodman)，《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战争(第2版，修订和更新)》(The Wars of Eduard Shevardnadze, 2nd ed., revised and updated)，华盛顿特区：布拉西出版公司(Brassey's)，2001。关于1985年到1988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两次口述历史会议文本作了阐述和说明，关于其大多数拥护者，参见“认识冷战的终结”；关于其多数反对者，见“莫斯科冷战会议”。



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 他不能对军事顾问和军工部门负责人的顾虑置之不理。他与他们巧妙周旋着, 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信服, 让他们感觉他在为他们办事。他让麾下的指挥官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解决欧洲中程导弹问题。总参谋长谢尔盖·F·阿赫罗梅耶夫(Sergei F. Akhromeyev)元帅签署了一项由外交部发起的核裁军综合方案, 他们深信此项方案最终会是不容商榷的, 军事官员也将躲过他们一向反对的裁减。然而, 戈尔巴乔夫欣然接受了这项综合方案的提议, 因为这正中他的下怀, 也是改变苏联形象的一个契机。在1985年年底的一次重要会议上, 政治局通过了这项新议程, 给予戈尔巴乔夫更大的施展空间。“一旦你口袋里有了由政治局通过的彻底摧毁核装备的文件, 坚持这一方针也就有理可依了,” 主要军备控制专家尼古拉·杰季诺夫将军回想道, “一旦有了这份文件, 跟军方说话就会变得容易一些。”^①

1986年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提出一项大胆的前景规划以促进核裁军事业的进程, 号召显赫的政要们都支持在2000年前摧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里根手下的不少顾问对此只有蔑视, 而戈尔巴乔夫的众多追随者则认为他被自己的武装力量蒙蔽了, 这无非是老生常谈。戈尔巴乔夫本人则对此非常认真。“我感觉他真的是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结束这场军备竞赛,” 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 “就他的理解而言, 他之所以冒这个‘险’, 是因为这根本谈不上是冒险——因为即使我们彻底裁军, 也不会有人来攻击我们。况且, 要使这个国家根基稳固, 我们就必须摆脱军备竞赛的包袱。”^②

里根的顾问建议他不要理睬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议案。军备控制专家爱德华·罗尼(Edward Rowny)将军建议总统不必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太过当真。苏联决不会改变立场; 它会施展骗术。总统胸有成竹地表示罗尼无需担心。“我不会手软。……但是……我也梦想这个世界能够没有核武器。我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远离这些可怕的武器。”^③

戈尔巴乔夫的梦想跟里根的不谋而合, 但两位领导人既是空想家又是实战家。

① 杰季诺夫和格里涅夫斯基(Grinevsky)的评论, “认识冷战的终结”, 112—113, 120—123。

② 切尔尼亚耶夫, 《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 45—46; 关于一般美国“专家”的反应, 参见保罗·H·尼采(Paul H. Nitze), 《从广岛到苏联的开放政策: 决策的中心——回忆录》(*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A memoir*)和安·M·史密斯(Ann M. Smith)及史蒂芬·L·瑞尔登(Steven L. Rearden), 纽约: 格罗夫·韦登菲尔德, 1989, 421。

③ 爱德华·罗尼的评论, 收录于坦嫩瓦尔德, “认识冷战的终结”, 132—133; 也可参见尼采, 《从广岛到苏联的开放政策》, 422;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管理成员马克斯·坎佩尔曼也详细叙述了同一会议。参见“投弹完毕”(“Bombs Away”), 《纽约时报》, 2006年4月26日。



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改革,加速经济增长。2月底,他在第27届党代会上呈现了他的规划,党代会是苏联一直以来的盛事。总书记在一份繁复冗长的报告中概括了他的观点,开头是社会主义的赞歌,紧接着便开始讨论资本主义,谈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憎恶以及它的内部矛盾——都是些陈词滥调。随后,戈尔巴乔夫调节了一下气氛,他打趣道:“资本主义世界那些统治阶级的精英”会不会作出明智的评价?“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他继续说道,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否定的答复:人类会不会幸存呢?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程,必须也必将延续……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始终需要国家和人民之间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对于避免核战争带来的灾难以及解决其他难题都至关重要。“如今的现实主义辩证发展体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势头。正是通过对立双方的斗争……这个世界才日趋相互依存,在很多方面都形成一个整体。”^①

这是共产主义思想上的一个转变——认为历史将会朝着相互依赖、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但这也是阐释戈尔巴乔夫规划的先决条件。什么是“加速”?他问道。“发展中出现的新特征是其实质所在:在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全面的生产集约化,经济结构的重组,以及有效的经营、管理和刺激劳动方式。”改变行政管理方式和消灭政府腐败都是当务之急。工人必须进行自我管理,他们的自我约束力和生产能力也必须有所提升。企业必须获得更多的自主经营权。粮食短缺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生活消费品必须多样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加以改善。社会公平必须得到推广。社会必须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从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得到发展。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总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重组”,在此被他用作整个社会经济计划的标签。^②

戈尔巴乔夫随后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议程必然会决定这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我们的目标直截了当:和平共处必须“成为国家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逾越意识形态上的鸿沟,这两种制度必须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同时我们必须设计出“一个国际安全的综合体系”。所有国家都有选择各自社会制度的权利,地区性冲突也必须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③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86年2月2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年3月28日,08。

② 出处同上,09,024;关于对他经济思想的评价,参见,如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130—154;阿斯伦德,《戈尔巴乔夫为经济改革所作的努力》;菲利普·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1945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史》,伦敦:培生教育出版公司,2003,177—192。

③ 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86年2月2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年3月28日,033,029。



党代会后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再次重申了这些议题。他说,“加速发展和坚持和平的方针”必须双管齐下。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①此后,他和谢瓦尔德纳泽试图改善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努力改变苏联的国家形象。但他们从未忽视的事实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伙伴是美国。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将会是最大的战利品,是重塑国际政治关系、实现裁军、把资源优先调配到国内建设上,以及重新激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所在。4月3日,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尽管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仍然模棱两可,但现实就是我们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我们。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离开美国说和平,只能是纸上谈兵。”^②

可戈尔巴乔夫还是深受挫折。日内瓦的军备限制会谈停滞不前,里根并没有改变对“星球大战计划”的态度。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谈道:“他们在对我们施压——想拖垮我们。”^③国内的改革进程也不合他的心意。他在国内进行巡回演讲,试图赢得各界人士对其提案的支持,时而声色俱厉,时而恳切相求。在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他对坚定的政党拥护者谈道,苏联人民决不能容忍那些“阻碍我们发展,……破坏我们的环境、生活及社会主义制度”等违背时代潮流的行为。他们所需要的是“少一点夸夸其谈、喋喋不休的大道理,多一点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的切实之举”。^④

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导致至少30人死亡,116000名当地居民紧急疏散,戈尔巴乔夫对此勃然大怒,局促不安。尽管他最初试图掩盖这次事故的严重性,但很快他便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熊熊的烈火燃烧了数天之久,加剧了大量核熔毁的恐惧。辐射云横扫欧洲大陆,其中携带着的放射性物质比广岛和长崎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还要多。这次事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损耗了几十亿卢布,夺走了成千上万条生命,严重威胁着整个中欧和西欧的食物链。^⑤手下干事的无能令戈尔巴乔夫反感不已,这也正是苏联体制腐化的又一表现,而西方国家以此次事故为契机,对苏联大加蔑视并阻碍军备限制谈判的进程,他对此更是怒火

① 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54(引文),也可参见50—60。

② 出处同上,57。

③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年3月24日,1986年4月15日,REEAD 2966和2963,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致里根,1986年4月2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40;里根图书馆。

④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1986年7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年8月12日,R4—17,引自R4, R13。

⑤ 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不可分割的世界:自1945年始的世界历史》(One World Indivisible: 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纽约:W·W·诺顿公司,2000,534。



中烧。尽管如此,这个彻头彻尾的教训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为苏联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这次极严酷的警告也再次说明,在这样一个核时代中需要有新的政治思想和政策。”他宣布暂停苏联的核试验,并再一次请美国与之合作。切尔诺贝利事故已经清楚地表明:“一旦核战争的厄运降临到人类身上,这个世界将会陷入怎样的深渊啊……核时代要求在国际关系中出现新的处理方法,要求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彻底根除会招致灾难的军备竞赛。”^①

戈尔巴乔夫8月份在克里米亚(Crimea)度假的时候一直都心神不定。“我们一起度假时,”切尔尼亚耶夫回忆道,“戈尔巴乔夫真的很担心……改革开始走下坡路,他引导全党致力于改革,努力让整个社会觉醒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将功亏一篑了。”^②他感到自己正在经受考验,也正在受到排挤。美国人“在利用我们对裁军的诚意[作为反对我们的工具]”^③。在9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地发泄了他的怒气。他说,美国人想把苏联拖垮,想使克里姆林宫陷于地区争斗的漩涡中,就像在阿富汗的情形那样。他们渴望雄霸天下,恃强凌弱。他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破坏苏联的改革。他们“不想让我们的体制恢复活力”。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称霸。^④

尽管怒气冲冲,他却并没有背离自己的战略。他依然固执己见,认为国内的改革取决于国外的进展。他决定取消前往华盛顿的计划,因为这可能会被当作是苏联在示弱。他转而表示想在两国的中间地点与里根再次会谈。9月15日,他又给里根写了一封亲笔信:“在裁军协议方面,我们仍然岿然不动,未能取得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已设法宽容迁就,但美方谈判家却寸步不让。日内瓦会议后的一连串事件“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困扰”(他意指美国逮捕苏联间谍,以及美国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由于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遭苏联囚禁)。戈尔巴乔夫说,双方政府都应该静下心来,缓和各自的辞令,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白里根不会改变在“星球大战计划”上的立场,于是建议双方应在某种程度上巩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议,允许对“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研究,但15年内仅限于实验

①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1986年5月1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6年5月15日,L1—4,引自L3, L4;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在外交部的讲话,1986年5月28日,REEAD 3486,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95;同时参见沃尔福斯,《见证》,5,166—168。

③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55。

④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议,1986年9月4日,REEAD,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也发表在《来源》2[1995]);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年9月22日,REEAD 2956,国家安全档案。

室内;如果美国对此予以接受,克里姆林宫将十分乐意大量削减所储备的战略武器。而且他还重申如果美国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合作,他将销毁苏联在欧洲的所有中程导弹。最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要求里根接受暂停核试验的提议。谈判就这样艰难进展了将近一年。“没有我的调停,他们将一无所获。”^①

里根也希望有所进展,但他坚决要求首先要释放丹尼洛夫。他向谢瓦尔德纳泽谴责克里姆林宫对个人自由的无视,又再次公开斥责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在非洲南部和中美洲地区性争斗中对左派分子的支持以及对人权的漠视。里根的目的是顶住压力,让克里姆林宫先沉不住气,对任何协议都提出自己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他是在从强势出发进行谈判;而苏联则是从弱势出发的。^②

在他的顾问之间,意见出现了分歧。舒尔茨同意里根的想法,而且很高兴“苏联开始被我们牵着鼻子走了”^③。而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其颇具影响力的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却对达成协议的任何举措都小心翼翼。苏联真会改变他们的立场吗?他们对此表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意义重大?情报分析家并不这样认为。更进一步说,即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获得成功,他当真会使苏联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吗?他们担心总统会被诱人这一并不高明的交易中。里根痛恨核武器,而且相信一旦世界彻底销毁了核武器,“星球大战计划”可以保护美国免遭一些流氓国家在签署协议时的欺诈行为。虽然温伯格和珀尔对里根的个人想法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深知不得不站在他这边,于是他们建议里根同戈尔巴乔夫达成将销毁所有弹道导弹的协议。(这一计划听起来能起到改造作用,但温伯格和珀尔算准了苏联会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它意味着将要销毁苏联占有绝对优势的一种武器。)这样做,里根便可以居高临下,遏制谈判进程——这也正是温伯格和珀尔希望达成的目标。^④

10月11日和12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里根写道:“我在雷克雅未克时对无核世界的渴望急切之至,但却在我任期中一段最漫长、最令人沮

①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1986年9月15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40;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同时参见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年10月4日,REEAD 2954,国家安全档案。

②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68—674。

③ 舒尔茨致里根,1986年10月2日,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④ 罗尼和马特洛克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43—148;尼采,《从广岛到苏联开放政策》,424—425;舒尔茨,《骚乱与胜利》,718—727。



丧——最令人愤慨的——日子里，这样的热盼逐渐烟消云散了。”^①

双方领导人展开了他们的私人谈话，他们都认为进展比他们想象中缓慢。里根表达了他对苏联人权记录的失望。他说，如果美国的公众舆论没有被“[像俄罗斯和波兰]这些国家发生的事激发起来，要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与克里姆林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将会容易得多。但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军备竞赛上来。“苏联支持旨在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提议，而且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苏联和美国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和同等安全。”里根表示对这一目标非常赞同，只要验证得当即可。他笑着说：“Doveray no proveryay(信任但须验证)。”^②

把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召进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的具体提议：削减50%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摧毁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所有中程核力量，不包括英国和法国的武器，这是苏联作出的一个主要让步；并且冻结近程(1000千米以下)导弹。至于“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说，只要试验限于实验室层面，而且双方政府同意在十年内不退出现有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这一计划就可以继续下去。另外，他们应该取缔核试验，同意包括现场检验在内的验证程序。^③

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印象颇佳，但在“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上又费了一番口舌。他建议双方“都不应打破反弹道导弹的限制，如果试验不得不在条约限制之外进行，美国将会在其他国家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如果试验表明这样的防御是可行的，那么在协议中应加入美国的防御系统这一条。为此，美国将同意销毁所有战略导弹”^④。随着会谈的进一步展开，里根逐渐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一直在强调的是弹道导弹弹头的削减，而不是所有战略核武器。他还澄清了自己的意图在于，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都将在现有的反弹道导弹协议范围内进行“战略防御计划”试验，这一观点引发了激烈辩论，在美国国防部官员看来，实验室以外的试验是不可少的。

第二天上午的谈判火药味十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美国人并不愿作出任何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75。

② 会谈备忘录，1986年10月11日，10:40 a.m.—12:30 p.m.，引自2—3,4，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引文来自美国文本，但是也有一份俄文会议记录译文。参见布朗会议文献(Brown Conference Documents)，国家安全档案。

③ 出处同上。

④ 出处同上，10。

让步。反过来,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提出的分享“星球大战计划”的承诺心存猜疑,这也让里根耿耿于怀。他说,共产主义者总是充满了不信任,尽管他们自己的目标——戈尔巴乔夫除外——从来都是寻求世界霸权。戈尔巴乔夫否认任何想争霸的意图,还指控道,比起他的苏联前辈们,里根的措辞更为恶意相向,他坚持表示自己对讨论各自国家的人权问题非常坦然。舒尔茨不得不中途调停,让双方平心静气一些。^①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一直争执不下,似乎难以找到解决方案。12日下午,他们进行了计划中的最后一次会晤,竭力想要打破僵局。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苏联没有试图取缔‘战略防御计划’”,只要美国在十年内都将试验限于实验室内,而不在太空中试验,这一计划便可继续。同时,双方应当大量销毁战略武器,有信心“在销毁这些武器期间遵守反弹道导弹协议”。^②但两位领导人随后又陷入了到底是在讨论销毁所有弹道导弹还是战略武器的纠葛之中。里根表示他在谈论攻击性弹道导弹,戈尔巴乔夫则坚持要销毁海陆空所有战略攻击性武器。

最后,里根说道,那么,“最好是……我们销毁所有的核武器”。舒尔茨随即插话说,“我们就这么干吧。”^③戈尔巴乔夫非常激动地宣称他随时准备在两分钟之内签署这份协议,只要他们能在最后一项提议上达成一致——即“战略防御计划”在十年内限于实验室阶段。而里根则坚持美国必须持有进行太空试验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对里根说,只要他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么距离“伟大”也就只有三步之遥了。整个世界都会为之“欢呼雀跃”。里根一边表示很想与戈尔巴乔夫展开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一边解释道:“如果他照着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行事,他在自己的国家将体无完肤。”他将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谴责。戈尔巴乔夫反驳说如果他作出让步,他的同僚们会称他为“傀儡”。他再一次向里根重申,他并不是反对“战略防御计划”,“但研究仅限于实验室”。里根恳请道:他在请求“帮忙”。他很愿意十年内都遵守反弹道导弹协议,但是不能同意试验只在实验室中进行。苏联领导人“请他放弃他早就承诺不能放弃的东西”。里根重申他在请求“帮忙”。戈尔巴乔夫声称他无法做到。^④

① 会谈备忘录,1986年10月11日,3:30—5:40 p.m.,文件箱2,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会谈备忘录,1986年10月12日,10:00 a.m.—1:35 p.m.,出处同上。

② 会谈备忘录,1986年10月12日,3:25—6:00 p.m.,文件箱3,出处同上,引自3,4。

③ 出处同上,引自9。

④ 会谈备忘录,1986年10月12日,3:25—6:00 p.m.,文件箱3,出处同上,10—15。



双方领导人都将这次会晤推向一个僵持不下的局面。身在华盛顿的南希·里根收看电视新闻时一看到自己丈夫的表情便明白“事情不妙。他看起来满脸怒容，脸色苍白，牙关紧闭”^①。“当时的压力真是超乎想象。”切尔尼亚耶夫回忆道。戈尔巴乔夫看上去非常不高兴。但是，在分开之前，两位领导人还是转向对方，互相拥抱了一下。“他们把手搭在对方肩膀上，”切尔尼亚耶夫说，他也看得出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就此结束。里根乘车离开，戈尔巴乔夫则缓步走入两百米开外的一间会议室，那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每个人都急切地想了解会谈的进展。他宣布，“这不是一场失败；而是一次突破。”听到这句话，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戈尔巴乔夫仍心存希望，把希望给了全人类。”^②

里根和舒尔茨都是心烦意乱，而他们的助手却抱有不同看法。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问舒尔茨：“究竟为什么要把这次会谈称作是一次失败呢？”怀特黑德坚持此次会晤“是成功的”。在几乎所有的军备控制议题上，苏联都已向美国的立场靠近。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也对里根最亲密的白宫助理道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主要的保留意见在于戈尔巴乔夫未能成功解决地区性争端，也未能消除总统对人权问题的顾虑。^③

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后很快召集了政治局的同僚们。他的态度颇为倨傲。“成功就在不远处。如果我们采纳了削减和摧毁核武器的决定，这将会是国际事务进步的一个转折点。”更重要的是，这些协议能使苏联得以在国内推行新的规划，加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脚步。然而，里根还是坚持着“战略防御计划”，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国内危机会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提议”。12月1日，灰心丧气的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跟政治渣滓打交道。”他不会就这样被吓住。他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此刻拥有了一个利用里根强硬政策的绝佳机会，他会保持冷静，在西欧赢下一场漂亮的宣传战。^④

①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45。

②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99。

③ 马特洛克和约翰·怀特黑德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175—177，184—185；对会议更好的回顾，参见舒尔茨，《骚乱与胜利》，751—780。

④ 引文参见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6年10月14日，文件箱9，沃尔科格诺夫集，国家安全档案；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年12月1日，1987年2月23日和26日，REEAD 2949和2944，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切尔尼亚耶夫对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记录，1986年11月17日，REEAD 2948，出处同上。



同时,戈尔巴乔夫将会坚持到底,甚至加速这一进程。他不仅对经济现代化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越来越重视政治民主化。他向切尔尼亚耶夫吐露,美国想看到“我们身陷困境,不可自拔。吸引他们的不是我们的外交政策,而是社会主义将会遭遇到什么……我们这代人别无选择,唯有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任务是发掘出如何引领 2.8 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①。

美国人发展“战略防御计划”将会困难重重,对此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深信不疑。即使他们取得成功,苏联也可以凭借小得多的代价进行反击。^② 但面对手下的将军对其计划提出反对意见,戈尔巴乔夫非常不满。他向政治局同僚表示,绝对不能“像这些将军一样”“自己吓唬自己”,“自己内讧”。他们对分配到的资源大发牢骚,而“2500 万[苏联公民]却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线以下”。^③ 1987 年 5 月,一架德国私人飞机滑入苏联领空并在红场着陆,戈尔巴乔夫因貌似软弱的国防力量无力保卫莫斯科中心地带而备感屈辱。面对随后对此次事件的调查,他借机改组了现有的领导班子,提拔了一批积极响应其思想、政策和目标的官员。^④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安全并未处于险境。他告诉同僚“我不想发动战争”^⑤。“在这样一个核年代中,”他在一次华约会议上表示,“这个世界再也经不起战争和强权政治了。”他决不会主动发起战争,也决不希望以核武器先发制人。^⑥ 他宣称,所必需的就是要有足够的武器“使我们的国防有可靠的保障”。他向政治局强调,没必要去数“那里有一杆枪,这里有一杆枪”。如果不改变行事方法,他们将不得不“停止

① 切尔尼亚耶夫对中央委员会各部门首长会议的记录,1986 年 12 月 12 日,REEAD 2946,国家安全档案;关于政治改革不断增长的推动力,见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155—172;乔治·W·布莱斯洛尔,《领导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41—78。

② 杰季诺夫和格里涅夫斯基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37—45;门德尔森,《变化的过程》,70;M·A·格里夫(M. A. Gareev)和 V·V·什雷科夫的评论,收录于迈克尔·埃尔曼和弗拉基米尔·康托洛维奇,《苏联经济体系的破坏:一位知情人的历史》,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98,56—57。

③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 年 12 月 1 日,REEAD 2949,国家安全档案;关于戈尔巴乔夫对其军事机构的态度,见罗杰·R·里斯(Roger R. Reese),《红色指挥官:苏联军队军官团的社会史,1918—1991》(*Red Commande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Officer Corps, 1918 - 1991*),劳伦斯:堪萨斯州大学出版社,2005,238—245。

④ 威廉·E·奥多姆(William E. Odom),《苏联军队的瓦解》(*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104—117;埃克达尔和古德曼,《谢瓦尔德纳泽的战争》,83—85。

⑤ 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43—44。

⑥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1987 年 5 月 28 日,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563。



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军营，也不能向“我们的人民”强取豪夺。他们不能被那些欲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美国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不能让自己看起来像傻瓜。他的同志们对此完全赞同。^①

雷克雅未克会谈后，戈尔巴乔夫令他的军事长官们重新审视华沙条约组织的战略，专注于国防。他还决定把中程核武器协议的讨论从有关“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谈判中分隔开来。他公开和自己的军事顾问唱反调，甚至愿意销毁 SS-23 奥卡(Oka)导弹，这是一种美国人申明任何中程核武器(INF)条约中都必须包括在内的武器。^②他对政治局表示，“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和美国打交道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们必须去和他们打交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消除对峙状态”。1987年2月，他邀请舒尔茨来到莫斯科，重新启动他们的会谈。^③

然而，雷克雅未克会谈过后，里根政府完全被卷入了一起吸引华盛顿所有人目光的丑闻中。总统被控暗地里向伊朗温和派分子非法贩卖武器，以此换取黎巴嫩人质获释，并非法挪用款项援助尼加拉瓜叛军（他们正在发动推翻桑地诺政权的战役）。里根否认为交换人质而贩卖武器，但就连舒尔茨国务卿私下里都承认了相关证据是无可辩驳的。舒尔茨把不满转嫁给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他认为这些计划是由这些部门秘密策划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受伤的总统”使得重新启动与戈尔巴乔夫及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谈雪上加霜，舒尔茨认为他为达成中程核武器协议所付出的努力受到了温伯格的阻挠。关于苏联人悄悄潜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报道被添油加醋后在华盛顿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正中温伯格下怀。舒尔茨回忆说：“整个城市[1987年3月]群情激昂。”然而里根再次决定继续谈判进程。虽然他还是派舒尔茨前往莫斯科，但是这一次舒尔茨的权力有所缩减。^④

4月13日，舒尔茨带着里根给戈尔巴乔夫的信抵达莫斯科。里根承认道：“距离我们上次直接交流已时隔良久。”总统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为世界事件的未来进程作出改变”的希望。“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已有所进展的裁军

①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7年5月8日，布朗大学会议文献，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33,223。

② 杰季诺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204—207,286—289；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551—571；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126—135；斯蒂芬·库克斯(Stephan Kux)，《苏联核威慑的新思想》(*New Soviet Thinking on Nuclear Deterrence*)，日内瓦：战略和国际安全研究项目(Program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不定期出版论文 No.3, 1990,30—45。

③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7年2月23日和2月26日，REEAD 2944，国家安全档案。

④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863—886，引自881；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84—687。

对话”让他“备受鼓舞”。如果双方政府能够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如由苏联在美国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报道所引发的猜忌,那么将会有更大的进展。里根鼓励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撤军,遏制苏联对美洲中部、非洲南部以及东南亚的庇护国的援助。^①

在莫斯科,舒尔茨在与政府官员及反对派人士的会谈中看到了显著的进展,对此,他欣喜不已。当听到戈尔巴乔夫向他保证苏联在美国大使馆行动的报道被过分夸大时,他备感欣慰。^② 国务卿和未获准离境的犹太人共同参加了逾越节家宴,还会见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虽对这些会见颇多微词,但还是予以接受了。他和舒尔茨激烈地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而舒尔茨更是抓住机会跟他的苏联东道主大谈信息时代自由市场的好处。舒尔茨表示,如果苏联的革新未能培养人民的创造力和个人的自主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不会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则更倾向于认为他的国内发展议程要求进行裁军,绕了这么一圈又回到了原先的议题上。他想在彻底摧毁欧洲的中程核力量方面达成最后协议。他说,北约的潘兴 II 型导弹“就像一把指着我们脑袋的枪”,而苏联的 SS-20 导弹则“吞噬了”重要的资源。当舒尔茨回应道,美国想销毁所有中短程核武器,包括苏联在亚洲领域内所部署的武器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否认这样的可能性。^③

舒尔茨从莫斯科向总统致电,告诉里根“此次谈判并不是完美和谐的”。戈尔巴乔夫不好对付,但毫无疑问“苏联正在改变立场”。舒尔茨强调:“您所坚持的强硬政策已有显著起色。”他希望为下一次峰会铺平道路,里根告诉他,他可以主动提及年底在华盛顿举行一次这样的会晤,在此期间或许可以签订一项《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INF 条约)。^④

国务卿回到华盛顿时,国家安全局仍陷于伊朗军售丑闻的漩涡中,国会听证会仍在耗费总统及其高级顾问的精力。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官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深表怀疑。倾向于防御的民主党人士,如来自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对舒尔茨正在苦思冥想的计划一笑置之;而实力政策的设计师,如亨利·基辛格,声称里根是在使北约组织涣散。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谈到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部下不是在试图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① 里根致戈尔巴乔夫,1987年4月10日,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41,里根图书馆。

② 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会谈记录,1987年4月14日,REEAD 3337,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③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44;舒尔茨,《骚乱与胜利》,886—900。

④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896。

而是在“加强苏联内部建设,推进他们自己的力量发展,并进一步巩固和扩张苏联在国外的力量”^①。

舒尔茨以迥异的方式诠释了戈尔巴乔夫的动机,但当他 10 月份回访莫斯科时,却发现心情急躁的戈尔巴乔夫争辩不休。这位苏联领导人透露他不会仅仅为签署《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而奔赴华盛顿。他还想看到双方裁减远程战略武器,并同意禁止太空的军事化。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所提出的新挑战,戈尔巴乔夫认为似乎危及到了本受到双方领导人推崇的峰会。^②

但戈尔巴乔夫很快便改变了主意,派谢瓦尔德纳泽带着勾勒出他的思想的给里根的亲笔信来到华盛顿。他写道,雷克雅未克会谈是裁减核武器这一艰难协商过程中的“里程碑”,必须要抓住其中所营造出的机会。那么华盛顿为什么如此强硬,要坚持“显然是单边主义的立场”呢?戈尔巴乔夫对此很不解,并指出他在多数问题上已非常包容美国的立场:他愿意对英法两国的核武器数量不予过问;他同意销毁苏联在亚洲及欧洲的所有中短程核武器,其实也就是接受了里根一直以来所说的理想协议,即零零协议(核武器暂缓建议)。“我们的立场很明确也很诚恳:我们要求摧毁所有射程在 500 到 5500 千米之间的导弹以及这些导弹的弹头。中短程导弹的协议将何去何从,如今完全取决于美国领导层,取决于总统先生您是否愿意达成这最后的协议。”^③

舒尔茨对这封亲笔信充满信心。总统现在有了一个能达成历史性协议的机会,可以销毁一整类核武器。他告诉里根,只要美国在“星球大战计划”以及战略武器方面的立场不妥协,签订这份协议就不会影响大局。^④“我感觉到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他后来回忆道,“苏联正在情愿或不情愿、有意或无意地发生变化:他们不单单只是在第二轮冷战中寻求喘息的机会。”他们正屈服于美国的力量。11 月 18 日,舒尔茨对里根说,“只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路顺着我们的方向,我们可以

^① 备忘录,盖茨整理,1987 年 11 月 24 日,文件箱 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中央情报局,“戈尔巴乔夫和军队:管理国家安全政策”(“Gorbachev and the Military: Manag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87 年 10 月,出处同上;舒尔茨,《骚乱与胜利》,899—924,988—989;盖茨,《从暗处探索》,420—426。

^② 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的会谈,1987 年 10 月 23 日,REEAD 2942,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舒尔茨,《骚乱与胜利》,995—1002。

^③ 戈尔巴乔夫致里根,未标注日期[1987 年 10 月],执行秘书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元首,苏联,文件箱 41,里根图书馆。

^④ 舒尔茨致里根,1987 年 10 月 30 日,出处同上。



继续让[他]做这个革新者。”^①

12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签署《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并加速美苏之间有关战略武器协议的进程。除了表达信心和祝愿外,他还谈起了和平及国际和谐。他建议,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应该同心协力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让理智和相互理解取代政治对立和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②他这一番话的反响非同一般。美国资深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说:“他所说的简直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著名福音传道者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评论道,他勾勒出了一幅“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美丽世界图景”^③。

在与里根和舒尔茨的会谈中,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挑战,如解决地区性争端,从阿富汗撤军,推倒柏林墙,以及在苏联境内允许更多的言论自由等,戈尔巴乔夫处变不惊。他应对这些问题时泰然自若且充满智慧。“总统先生,你不是检察官,我也不是在这里接受审讯。和你一样,我也是在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我希望我们的会谈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④他强调,他也希望能够在区域性问题上,特别是在阿富汗问题上,达成协议。他尤其期待在战略性武器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并希望他和里根能够在下次会谈中签署这份协议,该会谈将于暮春时节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声称,美国和苏联必须架设“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⑤。

在华盛顿峰会接近尾声时,整个会场都充满了善意。就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为他们所取得的进展而骄傲之际,双方领导人彼此间的暖意也有所增长。在里根看来,《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是“战后历史的里程碑”,是第一份削减核武器的协议。^⑥

但是总统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尽管他谨慎对待保守派人士与日俱增的批评,但他进一步声明,他想在“更广泛的议事日程”上取得进展,不仅包括军备控制问题,也包括“苏联扩张主义、人权侵犯以及我们对产生此类行为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

①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003。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48—450。

③ 奥伯道夫,《转变》,264--265。

④ 会谈备忘录,1987年12月9日,10:55 a. m.—12:35 p. m., 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引文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47。

⑤ 引文见会谈备忘录,1987年12月8日,2:30—3:15 p. m., 10,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会谈备忘录,1987年12月9日,10:55 a. m.—12:35 p. m., 出处同上。

⑥ “全国演讲”,1987年12月10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7》,1501;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98—701;切尔尼亚耶夫,《见证》,49。



的反对”。^① 他向戈尔巴乔夫谈道：“我们之间存在着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激烈竞争，这使我们在对全人类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幕中担起了主角。”^②但是，他强调：“我们从对抗转向合作的时候到了。……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像同一竞技场内的两名摔跤选手一般共存，当然我们更加希望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和朋友共存。”^③

为了拥有如里根所描述的友谊，苏联仍需进一步改变国内外境况。6月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里根向戈尔巴乔夫发出挑战：“如果你谋求和平、寻求繁荣，……那么就推倒这道墙吧！”^④无论这件事有多不切合实际，里根仍寄希望于事情会有转机。他告诉美国人民，未来“不属于压制自由或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属于伟大的自由事业”。这一事业仍需要美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里根呼吁美国人民支持政府的防御计划和外交政策。如果国会停止削减军费开支，暂停限制“星球大战计划”研究，支持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的“自由战士”，更多的事情会得以顺利实现。但他认为此次峰会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与乐观”^⑤。

戈尔巴乔夫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向苏联人民吐露：“此次峰会达成的协议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开始摆脱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沉重负担，这一负担不但使无数人失去了生命，而且拖了经济发展和物质文化的后腿。”虽然还不至于让他说出这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但他确实深受鼓舞。^⑥

他对政治局的同志们也抱有乐观谨慎的态度。在华盛顿时他已懂得，“可能第一次懂得了……人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领导人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期望”。他和里根就是这种“被……普通人的渴望和情感激励着”的领导人。^⑦此外，华盛顿峰会也证明了近来苏联政策的明智之处。国内的改革和国外紧张关系的缓和齐头并进：

① “全国演讲”，1987年12月10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7》，1501。

② “国宴上的祝酒词”(“Toasts at the State Dinner”)，1987年12月8日，出处同上，1487。

③ “对苏联《消息》报提出的问题的书面答复”(“Written Responses to Questions Submitted by the Soviet Newspaper *Izvestiya*”)，出处同上，1441；“欢迎仪式上的致辞”(“Remarks at the Welcoming Ceremony”)，1987年12月8日，出处同上，1452。

④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683。

⑤ “全国演讲”，1987年12月10日，出处同上，1504；同时参见“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午餐上的致辞”，1987年11月30日，出处同上，1389—1394；“地区中学高年级学生答问会上的致辞”，1987年12月1日，出处同上，1398—1405。

⑥ 戈尔巴乔夫的演说，1987年12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2月15日，14—16。

⑦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7年12月17日，REEAD 2940，国家安全档案。

我们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我们的国家在改革中所发生的诸多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刻板的华盛顿在友好的氛围中与我们举行会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高涨的热忱,这标志着西方开始显现出转变的迹象,也意味着“敌对形象”开始逐步消除,“苏联军事威胁论”也在逐渐被削弱。这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整个世界都已注意到了这一点。^①

戈尔巴乔夫向新闻媒体解释道,《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只是一个开始。要削减战略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尚需进一步努力。苏联应该为“大量削减”做足准备。关于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并不是要[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权。但是美方必须明确宣布,他们也不会争取建立一个亲美政权。”为达成协议,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他不会逃避自己的职责。美国人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视为他们未来关系的关键。^② 如果不撤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不会取得成功。

撤 军

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宣布,如果能够签署协议,苏联将于次年从阿富汗撤军。他说,地区性冲突“是鲜血淋漓、会在人类身上留下坏疽的伤口”。当时约有十万苏联军队驻扎在阿富汗。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戈尔巴乔夫就认识到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了太过沉重的负担,牺牲了苏联人民太多的利益,严重败坏了苏联在第三世界中立国和不结盟国家眼中的声誉,破坏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他一直想从阿富汗脱身。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③

1985年3月14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数天之后,他与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举行了会谈,卡尔迈勒是苏联前任领导人在喀布尔所扶持的。戈尔巴乔夫对卡尔迈勒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表达了同情与关切,他也明确表示,“苏联军队不能永远都驻扎在阿富汗”。卡尔迈勒解释说,巴基斯坦和伊朗正在支持叛乱行动,美国和中国也从中推波助澜,戈尔巴乔夫立场坚定地表示,卡尔迈勒必须要改善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拓宽政府的社会基础,团结其所领导的

①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7年12月17日,REEAD 2940,国家安全档案。

② 戈尔巴乔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1987年12月10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2月15日,16—21,引自19和21。

③ 引文见门德尔森,《变化的过程》,117;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71。

到 1986 年夏,你们将不得不学会独立进行革命。我们暂时还会援助你们,但不是以军队的形式——而仅仅以空军、炮兵和武器装备的形式。想要坚持下来,你们就必须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暂且把社会主义置于脑后吧,跟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联合起来,包括一些现在反对你的军阀。要恢复伊斯兰教的地位;恢复盛行的风俗和传统,寻求那些传统道德权威的支持;努力让人们看到他们能从这场革命中获益的机会。

卡尔迈勒听得目瞪口呆,戈尔巴乔夫开政治局会议时说:“无论有没有卡尔迈勒,我们都会坚持我们的决策:尽快从阿富汗撤军。”^①

一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与里根会晤,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他想要调停第三世界的争端。“你们是可以伸出援手的,但美国却没有。你们说苏联应该[从阿富汗]撤军,但事实上你们却想让他们留在那儿,时间越长越好。”^②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想让苏联陷入持久的游击战,耗费苏联的资源,摧毁苏军的士气,就像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那样大伤元气。针对“不结盟的阿富汗、苏联撤军、难民重返以及不对外干涉的国际保证”等问题,他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卡尔迈勒政府将会予以合作,但如果人民圣战组织和其他抵抗者仍继续进行斗争,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戈尔巴乔夫向里根保证,苏联“不会利用阿富汗夺取不冻港,扩大在波斯湾的影响力,或以任何方式损害美国的利益,根本没有那样的计划”^③。

里根反驳道,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应归咎于克里姆林宫。苏联入侵邻国,强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府,迫使 300 万难民背井离乡。也许联合国能够帮助找出解决办法。“特别是,”他打趣道,“我们召集各方所撤出的全部军事力量,然后成立一个伊斯兰联盟来管理由阿富汗人民选出的政权怎么样?”^④

戈尔巴乔夫深知这个建议不是认真的。美国政府并不渴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达成协议。里根和他的助手们巴不得看到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变得血迹斑斑。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强烈支持者,他也在那些建议秘密援助人民圣战组织的重要议员中得到了支持。1984 年早期他对一位助手谈道:“苏联过分扩张其势力,因而易受攻击。”如果美国处处向苏联提出挑战,最终会将他们“一举拿

① 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32—33;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42。

② 会谈备忘录,1985 年 11 月 19 日,2:30—3:40 p. m., 文件箱 3, 冷战终结集, 国家安全档案。

③ 出处同上。

④ 出处同上,6。



绕,苏联领导人选择让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取而代之。纳吉布拉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普什图家庭,极富雄心和智慧,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还不到40岁的纳吉布拉早在1965年就加入了阿富汗共产党的旗帜派,当时他还是喀布尔大学医学院一名18岁的学生。1978年政变后不久,他便成为政府革命委员会的一员,其后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直到苏联于1979年进行干预他才得以重返阿富汗。1980年到1986年间,纳吉布拉执掌着阿富汗国家安全机构,与驻喀布尔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有着密切的工作往来。1986年5月,克里姆林宫提拔纳吉布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希望他能够比卡尔迈勒更加合作。^①

在1986年11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一股脑儿吐露出他的失望之情:“卡尔迈勒的政策非常简单:坐守其位,把战争留给我们[苏联人]。”戈尔巴乔夫无法容忍这般态度。“我们的战略目标是结束这场战争,一年内把军队撤离出来,最多用两年时间。”没有人表示异议。“我们不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身为克格勃头目的维克托·切布里科夫(Viktor Chebrikov)说道。谢瓦尔德纳泽也坚持说,“我们该结束这场战争了。”“我们失败了,”阿克罗梅耶夫元帅表示,“如今多数阿富汗人都支持反革命分子。”戈尔巴乔夫完全赞同。他认为,应大力加强阿富汗共产党的重组力度。“毕竟,我们不是冲着社会主义去的”,而是冲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不结盟且摆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的国家。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已准备好同巴基斯坦开展会谈。^②

从1986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一直都在为找出一个切实的撤军方案而绞尽脑汁。尽管诸多政治局同僚和军事顾问认为如果他们继续支持纳吉布拉,战争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但戈尔巴乔夫似乎还不想“休兵撤军”,他坚持认为不该就此踢开纳吉布拉。“不管怎样,我们只能带着伤疤离开阿富汗了,但是我们尽量减少疼痛。”他赞成政治上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美国人也该参与其中;他们应当成为问题解决的一员。^③同时,他希望加快苏联军事行动的部署,以便在谈判进程中获得有利的政治砝码。事实上,苏联军队已开展了简单的进攻性行动,旨在阻断输往阿富汗的物资,

① 关于纳吉布拉的背景,参见格勒乌(原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档案,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韦斯塔,《全球冷战》,375。

② 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35—37。

③ 政治局会议记录,1987年5月21日—22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48—149;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40—41。

并以越境空袭和炮兵袭击恫吓巴基斯坦。^①

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纳吉布拉改变革命政策。他必须认识到“没有伊斯兰就没有阿富汗”。戈尔巴乔夫说，反对党代表至少要占新政府的50%。纳吉布拉会发现遵循和平原则并非易事，但他不得不学会离开苏联的庇护实施管理。“再次提醒他，”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和其他跟纳吉布拉打交道的同僚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那么频繁请示我们。”^②谢瓦尔德纳泽往返于喀布尔，试图劝服纳吉布拉接受苏联的战略，而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7月20日在莫斯科会见了纳吉布拉。“阿富汗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国家和解的基础上，”他强调，“不经过国家民主改革就想跃到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和中国人都经历过‘大跃进’。我们知道那样的下场会是怎样的。”在当前形势下，阿富汗共产党必须扩大其影响力，包容多元文化，建立一个以纳吉布拉为首的联合政府。戈尔巴乔夫重申，只有贯彻这一策略，阿富汗共产党才得以存活下去，在未来才保有竞争力。^③

11月的时候，当纳吉布拉重返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庆典时，戈尔巴乔夫又向他简要重述了克里姆林宫现阶段的思想动态。为了推行国内的改革，克里姆林宫迫切需要一个安定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国家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我们需要一个正常的国际形势。”^④

纳吉布拉努力消除戈尔巴乔夫的疑惑。他正采取措施迈向国家的和谐。“我们打算一个月后举行一次大国民议会，届时我们将通过一项国家宪法，并推选出一名总统。”他告诉戈尔巴乔夫，“其后，将为国民议会进行选举。”纳吉布拉在寻求“所有的政治力量和各方面民众的积极参与”。戈尔巴乔夫提醒他，尊重贫农至关重要，而且如果他不安抚敌人、拉拢反对派，他将无法立足。如果他遵循这一原则，即使苏联军队撤出了阿富汗，克里姆林宫仍会支持他。^⑤

戈尔巴乔夫在与纳吉布拉会谈时提到他正在努力赢得美国的合作。谢瓦尔德纳泽早在9月时便告诉舒尔茨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欲让美国劝阻

① 韦斯塔，《全球冷战》，367—369；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苏联外交决策和阿富汗战争：从‘第二个蒙古’到流血的伤口，” (“Soviet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the Afghanistan war: from ‘second Mongolia’ to bleeding wound”)，《国际研究评论》25(1999年10月)：683—686。

② 政治局会议记录，1987年5月21日—22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49。

③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同志会谈记录，1987年7月20日，出处同上。

④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会谈记录，1987年11月3日，出处同上，162。

⑤ 出处同上，163—166。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乘苏联撤军的机会夺取政权。^① 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并不确定美国人是否愿意这么做,但他告诉纳吉布拉,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要建起一个联合政府。^②

苏联在阿富汗采取的新方针对于重整第三世界的零和游戏起到了一定作用。戈尔巴乔夫深知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日渐式微,国内的“新思维”要求抹去往日的相互对抗。^③ 11月,苏联的非洲问题专家告诉国务院官员,他们希望解决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问题,那是长久以来令华盛顿决策者费尽心思的地区性争端之一。^④ 当尼加拉瓜总统、桑地诺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当月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鼓动他减轻美国人的顾虑。“让我们步调一致吧,”戈尔巴乔夫说,“我和里根见面时会告诉他,不仅你们不想把尼加拉瓜变成苏联的一个基地,我们也不打算建立这个基地。”当奥尔特加请求更多的援助时,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他已提供不出额外的贷款了。油价的跌落意味着预期税收的大幅度滑落。他说:“我们有太多的国际主义,但却没有足够的财富。”事实上,就连苏联的五年计划也是“岌岌可危”。^⑤

直到1987年年底,戈尔巴乔夫仍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给国内改革方案注入新的活力。他惦念着的是在国内进行改革,而不是在国外实施冒险主义。^⑥ 但要想国内改革顺利开展,他需要让美国相信,克里姆林宫并不是在利用当地纠纷和地区争端来扩大苏联的影响力。1987年12月里根宣称,阿富汗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告诉他苏联愿意在所有地区性问题上合作——中美洲、柬埔寨、中东以及阿富汗。里根表示已经听够了各种承诺,他要的是实际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而戈尔巴乔夫

①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987;舒尔茨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见证》,145—146。

②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同志会谈记录,1987年11月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65。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4日,22—24;切克,《观念和 International 政治变化》,77—105。

④ 马特洛克致舒尔茨,1987年11月3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关于苏联为和平解决非洲西南部问题所作努力,参见阿纳托利·阿达米申(Anatoly Adamishin),《安哥拉白色太阳》(*Beloe Solntse Angoly* [The White Sun of Angola]),莫斯科:瓦格里斯出版社(Vagrius),2001,特别是23,58—60,65,63,88,93,我很感激阿伦·林奇的翻译;同时参见切斯特·A·克罗克(Chester A. Crocker),《非洲南部的巅峰:在恶劣的环境中求和平》(*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Neighborhood*),纽约:W·W·诺顿公司,1992,348—349,409ff。

⑤ 戈尔巴乔夫与丹尼尔·奥尔特加会谈记录,1987年11月4日,REEAD 3346,切尔尼亚耶夫集,国家安全档案;关于对桑地诺更加缓和的方式,参见斯科特,《决定干预》,184—185。

⑥ 参见戈尔巴乔夫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198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3日,38—60。

回应道，如果联合政府成功建立，美国也停止对反苏抵抗势力的经济援助，那么苏联乐意在12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内撤离阿富汗。“苏联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戈尔巴乔夫说，“他们并不想把阿富汗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莫斯科没有打算对一个孤立的政权置之不理。拥有一个不结盟的独立政府，阿富汗便能够自力更生。”戈尔巴乔夫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苏联和纳吉布拉展开会谈，美国则与反对派展开会谈。”^①

然而，1988年2月8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之时，仍有多种迹象表明美国仍在继续支持人民圣战组织。戈尔巴乔夫对此深表失望，他在莫斯科对舒尔茨表示，“我感到你们抱有一种消极态度”，对“我们想跟你们合作解决问题的真挚愿望”视而不见。他重申阿富汗不会成为苏联控制不冻港或波斯湾的跳板：“这都是无稽之谈。”^②

眼看着舒尔茨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改变美国立场的倾向，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重新审视撤军的决定。他担心纳吉布拉政府可能会垮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会像在伊朗那样控制阿富汗。^③他还担心苏联在他的友国和附属国中的信誉会大打折扣。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他说，“你们在放弃阿富汗；这意味着你们在放弃我们。”^④然而，他仍决定继续撤军。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政治意义是我们难以估计的。这将会让我们在解决国际问题的新方式上吃颗定心丸。我们会以此堵上我们的敌人和反对者的嘴。”^⑤

纳吉布拉对苏联的决定心怀不满。他的政权已是如履薄冰，但正是这一弱点赋予了他有力的杠杆。戈尔巴乔夫不希望看到喀布尔的共产党政府垮台，而是想让它立足存活。他想利用它打败死硬的穆斯林。他想让纳吉布拉扩大他的联盟基础，吸纳对抗力量的中间派，他想要的是一个和平的非伊斯兰邻国，既不与美国也不与巴基斯坦结盟。随着时间的临近，1988年4月中旬，为了签订有关苏联撤军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在塔什干会见了纳吉布拉。他答应纳吉布拉给他援助、资金和军事顾问。他鼓励纳吉布拉坚持下去。然而，他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苏联军队必须撤离阿

① 会谈备忘录，1987年12月9日，10:55 a.m.—12:35 p.m.，15ff，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戈尔巴乔夫与舒尔茨会谈记录，1988年2月22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71。

③ 出处同上，172。

④ 出处同上，173。

⑤ 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41—42。

富汗。^①

4月14日,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签订了日内瓦一揽子协议。苏联将撤出自己的军队,巴基斯坦将停止干涉,阿富汗政府将允许难民重返家园,华盛顿和莫斯科将保证不加以干涉。与会的各方中,只有戈尔巴乔夫真正会言行一致。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Mohammed Zia ul-Haq)向里根保证,巴基斯坦不打算停止对阿富汗反抗力量的支持。“我们会说些谎话的。这就是我们八年来所做的事。……穆斯林有权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撒谎。”对此,里根没有反对。舒尔茨公开声称:“向反抗力量提供军事援助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执行这一权利,但我们也准备好了对策。”^②

美国人看到了一个可以利用苏联弱点的机会。他们认为一旦苏联撤出自己的军队并停止对喀布尔的援助,纳吉布拉政府便会垮台。国会中保守党的支持者不想让里根仅仅因为苏联被赶出阿富汗而放弃人民圣战组织。纳吉布拉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垮台。他们并不关心反苏联势力正逐渐受制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那些原教旨主义者的打算和他们是天壤之别的。^③

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也为推翻纳吉布拉政府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对阿富汗共产党领导人为吸收昔日对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感兴趣。只要纳吉布拉成为政府首脑,苏联便会在喀布尔有一个朋友,确切说是苏联所任命的僚属,是极权主义的象征。尽管里根和舒尔茨也想对戈尔巴乔夫伸出援助之手,鼓励改革,签订协议,但他们更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舒尔茨对里根说:“在试图签订有利于我方利益的协议时,我们应该继续养精蓄锐。”^④

纳吉布拉深知自己的困境。他重返莫斯科,请求戈尔巴乔夫不要对他撒手不管。他想“通过对不可调和的派系力量发动攻击……使人民的心理情绪产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为取得成功,他需要更多的援助和一些苏联军队,他会号称将苏军力量部署在“第二、三梯队”中以鼓舞士兵的士气。胜利会让他的支持者“自信能最

①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会谈记录,1988年4月7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74—181;关于苏联的目标,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与阿雷桑德罗·纳塔(Alessandro Natta)会谈记录,1988年3月29日,出处同上,173。

② 奥伯道夫,《转变》,280—281。

③ 科尔,《幽灵战争》,170—186。

④ 舒尔茨,《骚乱与胜利》,1003。



终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①

戈尔巴乔夫深表同情，他知道巴基斯坦公然背叛了不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援助的承诺。戈尔巴乔夫让纳吉布拉继续为国家的和解努力。由于起义军已四分五裂，互相残杀的同时还袭击政府，他鼓励纳吉布拉要消除那些可能纳入联合政府的派系间的隔阂。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他都应该澄清苏联在阿富汗没有任何自私目的，苏联会尊重阿富汗人民的传统和风俗习惯。克里姆林宫的目标非常简单：“一个苏联南疆边界忠诚而又有着悠久友谊的邻邦。”戈尔巴乔夫向纳吉布拉保证苏联不会对他撒手不管。克里姆林宫将会增加援助，但苏联军队必须撤出。他不能食言。^②

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希望纳吉布拉充分理解苏联正在经历些什么。他强调：“我们正在经历苏联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我们不能失败。”这位阿富汗领导人也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很清楚：“我们把国家的和解政策视为改革政策的一部分。……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具有国际意义，远远超越了国家界限。”^③

然而，纳吉布拉继续使戈尔巴乔夫的国内议程复杂化。随着苏联定于1989年2月全面撤军日期的临近，他请求调用苏联一个旅的兵力来攻破坎大哈起义军的封锁。一直在和纳吉布拉打交道的谢瓦尔德纳泽对他的这一请求予以支持，而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助手们却持怀疑态度。“他[谢瓦尔德纳泽]疯了吗？”切尔尼亚耶夫大发脾气，“他难道不明白纳吉布拉正在设陷阱阻止我们撤军，并让我们跟美国和全世界对立起来吗？还是他[谢瓦尔德纳泽]根本就是一个不会拒绝请求的窝囊废？”在1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很是不屑：“从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幼稚的儿语，是雄鹰徒劳的尖叫。”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iuchkov)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都支持戈尔巴乔夫，其他人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④

谢瓦尔德纳泽已与纳吉布拉培养出了一份私人的感情，他认为克里姆林宫是在背叛一个忠实的附属国。3月2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纳吉布拉提出的又一请求，这次是想让苏联增援空军力量，谢瓦尔德纳泽声称苏联不能放弃这位朋友。他振振有词地问他的同僚们：“‘第三世界’会怎么看呢？”这次他的观点博得了些许支

①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会谈记录，1988年6月1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85。

② 出处同上，181—186，引自186；关于圣战者组织之间的内部纷争，参见科尔，《幽灵战争》，176—186。

③ 出处同上，引自182和186。

④ 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45。

持,但戈尔巴乔夫插了进来。切尔尼亚耶夫在日志中写道,他“面红耳赤,异常激动”。“我坚决反对什么空袭或类似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一天是这里的主席,我就不会让任何人违背我在全世界面前许下的承诺。”^①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对谢瓦尔德纳泽所担心的苏联信誉受损问题无动于衷,也不是对纳吉布拉的困境冷淡无情。但他最关心的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注入活力,而不是寻求在国外的扩张。对苏联共产主义最大的威胁是在国内而非国外。在3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了自己对于阿富汗的政策:“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阻止一个敌国的产生。至于其他的……管它是什么政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②

苏联于1989年2月撤军后,纳吉布拉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耐力和后劲,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放弃他。他相信阿富汗在1989年到1990年间努力扩大联盟基础、拉拢昔日的敌人仍然是一个明智之举。当他们在1990年8月23日进行最后一次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已是筋疲力尽,对自己国家日益增长的不稳定因素甚为担心。“我们可以算是任重而道远,”他对纳吉布拉说,“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阿富汗比这里[莫斯科]还要平静些。”在苏联政治经济改革中,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旧的民族争端渐露端倪。但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无愧悔。他告诉纳吉布拉,对左翼激进主义和战争共产主义的依赖“没有经住时间的考验”。尽管在改革中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骚动与混乱,但“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为社会的革新”而努力才是一条正道。

他又补充了一句,美国人是靠不住的。尽管华盛顿官员也意识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但他们决不会放过任何推翻纳吉布拉统治和煽动苏联成百上千万穆斯林的机会。美国人“自始至终都是美国人”。戈尔巴乔夫对纳吉布拉说,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削弱苏联。他们希望“[通过]利用我们的危机获取更多的利益”。^③

但是,他义无反顾。

① 切尔尼亚耶夫,“阿富汗问题”,46—48。

② 出处同上,48。

③ 戈尔巴乔夫与纳吉布拉会谈记录,1990年8月23日,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4/15(2003年冬—2004年春):188—189;詹姆斯·A·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和托马斯·M·德弗兰克(Thomas M. Defrank),《外交政治:革命,战争和和平,1989—1992》(*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1992*),纽约:G·P·帕特南之子出版社,1995,74。

新思维,旧思维

戈尔巴乔夫不会走回头路,因为他已下定决心要重塑苏联的形象。在1988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提议并且愿意建立一个新世界。”他的目标是要打破西方国家关于苏联穷兵黩武的论调。这一途径存在风险。美国人认为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国力俯首称臣,而不是按照苏联自己的改革需要制定战略,美国人可能会试着作出额外的让步,而美国的冒险主义势头也可能有所增长。但鉴于戈尔巴乔夫对实现国内改革的决心和不断增长的忧患意识,这种风险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① 1987年2月,他自豪地声称:“苏联是一个有着无限成就的现代国家。……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反之,我们会使之更加美好。”^②

1987年11月,在戈尔巴乔夫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他与苏联的过去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对其未来进行了展望。他的助手们准备了一份长篇累牍的报告,试图从历史视角出发,叙述苏联受人诟病而又气壮山河的历史,政治局在1987年10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份报告。除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外没有人对此发表意见,戈尔巴乔夫对这份文件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辩驳。

他想要承认过往历史中所犯下的错误,但又不能予以夸大。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列宁主义思想的框架里为平衡市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多元化与计划经济、共产主义与民主共和之间的关系而拼力奋斗。没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但民主需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这听起来有些含糊其辞,戈尔巴乔夫也承认他一直在设法搞清楚一些难以捉摸的概念和尚不确定的路线。虽然他还没有找到所有的答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制度的价值所在。无论斯大林的镇压运动有多么“罪恶滔天,不可宽恕”,无论克服勃列日涅夫统治晚期所造成的停滞要花多长时间,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一直在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结论”。^③

①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8年12月27日—28日,REEAD 2922,国家安全档案。

② 戈尔巴乔夫和法国公众代表的会议,1987年9月2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9月30日,35。

③ 综合引言引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1987年10月15日,REEAD 10012[?],140—141,国家安全档案;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讲话,198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3日,引言参见第45页。

11月2日, 他向苏联人民和众多来宾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在开场白中说: “今天, 我们从曾经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中……找寻精神支柱和经验教训。” “十月革命的主要意义是创造了新生。” 几小时后他总结出, 这个新生命“是集体主义而非利己主义, 是自由平等而非剥削压迫, 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而非少数派的暴政, 是发扬理智与人性而非各种社会力量间残酷的相互斗争, 是全人类的统一与和平而非分歧与战争”。如今, 社会主义需要改革, 需要重组:

重组的目标是在理论和实践上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中将劳动者及其理想和利益列于首要位置……重组后的社会主义能够且应该充分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体系的各种潜力, 服务人民, 提升人民。它将是一个人民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 人民将能感到是自己的主人翁。^①

就像亚历山大·雅克夫列夫所说的, “今天我们是在重塑人民的灵魂和肉身”^②。

戈尔巴乔夫声称, 为实现这一目标, 和平共处必不可少。“尽管现代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但它是一个唇齿相依的统一体。”^③ 苏联外交政策的任务在于塑造一个能使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蓬勃发展的国际环境。^④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愿意让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体制发挥自己的潜力。

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复, 戈尔巴乔夫重新审视了苏联关于资本主义性质、国际体制运行以及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等方面的意识形态见解。他没有改变共产主义是一种优越社会制度的信念, 但他确实改变了人们对苏联威胁论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在冗长的讲话中就资本主义能否与社会主义共存展开了诘屈聱牙而又意义深远的讨论。他本人认为这样的分析极为重要, 在第二天的另一次公开会议上重新强调了其重要性。这些问题触及了共产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必然性及阶级斗争的理论本质。科学技术和核战争威胁会改变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吗? 资本主义会从军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吗? 资本主义能离

① 戈尔巴乔夫演说, 1987年11月2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87年11月3日, 引自61和49。

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 1987年10月15日, REEAD 10012[?], 166—167, 国家安全档案。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 1987年11月2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87年11月3日, 54。

④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 1987年6月27日, 对外广播新闻处, 1987年10月27日, 52; 戈尔巴乔夫演说, 1988年2月18日, 出处同上, 1988年2月19日, 58。

开新殖民主义吗?^① 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其答案都顺势而定,没有人能够预料。但戈尔巴乔夫所得出的结论对苏联未来的外交政策和冷战的最终结束都有着深远意义。

他表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本质上的转变。“战后,各种矛盾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调和,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进程。”他对于西德和日本将军费开支缩减到最小而获得的长足发展印象颇深。他坚信“把人类的生存问题摆在最前沿的”恰恰是核时代而非其他。他强调,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者已准备好了面对这些新的现实问题,但资本主义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明白,人类的命运有赖于不同社会制度下国家关系的调整:“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是生活会迫使[我们的阶级敌人]对现实予以重视,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条船上,不论我们如何行事,都必须保证船不能翻。”^②

苏联必须要让资本主义国家相信,苏联并无可怕之处。军事帝国主义并非主要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规律和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领域的矛盾同样是可以调和的。”^③ 戈尔巴乔夫解释道,苏联的军事威胁是西方军国主义得以助长的主要原因。^④ 如果苏联领导人能够减轻这一威胁论所带来的疑虑,他们就能够让敌国重新制定其外交政策。如果克里姆林宫能够证明共有的价值观念能够团结而非分裂全人类,它可能会缓和紧张状态,建立更平和的国际关系。但是只有确定自己的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才可能冒这个险。

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不会攻打苏联。谢瓦尔德纳泽也表示,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不同,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很自信他们的国家

①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3日,55—57;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4日,出处同上,1987年11月4日,22—24;同时参见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88—117;切克,《观念和国际政治变化》,77—105。

②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4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4日,22—24;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演说,1988年2月18日,出处同上,1988年2月19日,特别是57—58;同时参见贾尼斯·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在实践中学习政治:独立的思想家和积极的学习者戈尔巴乔夫”(“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1994年春):156—183。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2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7年11月3日,57。

④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年11月4日,出处同上,1987年11月4日,23。

安全不会濒危。^① 美国不会把报复和自毁当成赌注。苏军总参谋长阿克罗梅耶夫元帅也说道,在一个核世界中,“战争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东西了”^②。同样,也不可能发生会将苏联牵涉其中的资本主义内部战争。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使其经济非军事化,保证以“民用为立足点”^③。因此,苏联的新计划必须着眼于如何缓和紧张局势,增进和平,削减军费开支,促进改革和重组。“我们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真正的价值观,绝对不会,”戈尔巴乔夫宣称,“相反地,我们会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扫清所有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中人道主义精髓的曲解。”^④

通过重新定义威胁的实质并聚焦于共产主义的人本价值观——“使社会主义能够服务于人民,提升人民”——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开展了越来越有效的交流与对话。在里根 1988 年 5 月赴莫斯科访问时,他们之间那种相互交谈、彼此理解的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总统来到了他所谓的“邪恶帝国”的首都,然而自 1981 年上任以来,他第一次发现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此谈得来,他所预期的苏联领导人可不是这样的。发生转变的不是里根;而是戈尔巴乔夫。他的“新思维”使他在处理国际关系及与美国关系的方式上发生了改变。

5 月 29 日下午,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晤时,总统“表示自从他 1985 年给戈尔巴乔夫写下第一封信以来,双方已经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他对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表示赞赏:“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戈尔巴乔夫说:“那是一个艰难但必需的开端。……但显而易见,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能靠军事手段解决。战争只会让事情变得深不可测。”不同的意识形态必须和平共处。^⑤

接着,戈尔巴乔夫交给里根一项声明,陈述了他认为应该指导两国未来关系的准则:

基于双方对目前世界上成型的现实的理解,两位领导人认为任何有争议的问题都不能也不该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他们认为和平共存是国际关系处理中颠扑不破的准则。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自由进行社会政治选择,

①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安全感,参见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见证》,5,37;同时参见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21;关于谢瓦尔德纳泽,见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9 年 10 月 23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 年 10 月 24 日,45;谢瓦尔德纳泽,《未来属于自由》,54—55。

② 阿克罗梅耶夫演说,1988 年 5 月 6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8 年 5 月 10 日,75。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8 年 2 月 18 日,出处同上,1988 年 2 月 19 日,57—58。

④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7 年 11 月 4 日,出处同上,1987 年 11 月 4 日,23。

⑤ 会谈备忘录,1988 年 5 月 29 日,文件箱 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这都是处理国际关系时不可或缺且必须遵守的标准。

里根对此非常赞赏,表示他的顾问会对此进行认真仔细的研究。接着,他让戈尔巴乔夫看一份人权案一览表。他说,由于他对此非常重视,在之前的会议中已做好了准备工作。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有一个“梦想”。他不会进行公开讨论,如果这件事泄露给了媒体,他也会否认曾提过。但是戈尔巴乔夫是否可以规定:

宗教自由是人民权利的一部分,任何宗教信仰者——不管是拥有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信仰,还是新教或乌克兰教会——都有选择他们信仰教派的权利。……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看清前方的路,按照总统所说的去做,他坚信他[戈尔巴乔夫]会成为一个英雄,对其国家的敌对情绪也会如烈日下的水那般蒸发。^①

魄力超群的总统以温和的言辞提出了足以颠覆苏联生活方式中关键因素的大胆请求,敦促戈尔巴乔夫实践他的“新思维”和自称的理想。^②总书记平和但又不乏强硬和自信的回复同样精彩。“戈尔巴乔夫面带微笑地说,他感到作出回应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想让总统或其他人认为每每触及人权问题他便“走投无路”了。他已经做好了对话的准备,不仅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而且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甚至包括与美国国会对话。他“呼吁召开一次后续讨论会,让双方的官员、立法人员以及学术人士都参与进来”。戈尔巴乔夫说,美国自身就有很多人权问题,尤其是在黑人和有色人种方面,而且也不仅限于此。社会经济权利、反战人士的待遇还有其他问题又作何处理?“他不是想给美国上一课,教他们怎么管理国家”,但是总统也不该想当然地认为他对苏联了如指掌。“近来,苏联在积极地自我反省,而美国却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不是事事“尽如人意”。他们应该进行更多的讨论。还有许多事等待实现。糟糕的是,总统不久便要离任了。^③

接下来的几天内,戈尔巴乔夫失望地发现他递交给总统的准则声明看来无法被接纳。里根的顾问主张总统不要签署提及和平共处的文件,他们认为这是“带有政治

① 会谈备忘录,1988年5月29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肯戈,《上帝与罗纳德·里根》,298—320。

③ 会谈备忘录,1988年5月29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包袱”的措辞。他在国内的政治拥趸不会喜欢这样的用语,它意味着另外一种制度是合法的,会唤起人们对缓和的回忆,或是在强调国际关系的阶级性,和平共存(在苏联的词汇中)一直以来都建基于这样的国际关系。^①

戈尔巴乔夫对此颇为恼怒,但还是没有偏离既定的路线。那年春天,他在克里姆林宫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指责,这种指责并没有蔓延开来也没有恶意相向,但总归是指责。政治局中的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等人吹毛求疵地说,他对计划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阶级基础的批判几乎是矫枉过正了。戈尔巴乔夫却不这么认为。党组织官员激烈反对他所提出的改革,但他却想发起更多更彻底的政治改革。政党需要民主化,选举势在必行。他提倡设立一个部分由投票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赋予人民权利,这样才能使中层人员对他们的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戈尔巴乔夫吐露,他的顾问们——切尔尼亚耶夫、梅德韦杰夫、沙赫纳扎罗夫、雅克夫列夫——必然会最终割断“那根将我们与计划管理体制及整个斯大林主义遗产联系起来的脐带”^②。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样的热望本身就激励着人们为重塑苏联外交政策作出更大努力。6月20日,即他们就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加以讨论的当天,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宣称,军备竞赛是一种“愚蠢的”对立逻辑。“我们就像上紧了发条一样。……我们总是忙着追赶,却没有通过政治手段恰如其分地达成目标。”纯粹数字上的平等毫无意义。“和世界各国一门大炮一门大炮、一架飞机一架飞机地比武器的多少”是非常愚蠢的。苏联的领导集体已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军营。实行新思维是当务之急。几周以后,戈尔巴乔夫再次向华约组织领导人强调,他们必须转变“西方所树立的那个敌国形象”。^③

对这一切,甚至都没有一套确切的词汇来表达,只能慢慢积累相应的语言了。如果里根和他的顾问认为和平共存这一言辞难以接受的话,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将会保证他们并不是在以一种隐晦的形式鼓吹阶级斗争。1988年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外交部长在一次备受关注的演说中强调说明,苏联政府正在放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我们眼中的和平共存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① 谈话备忘录,1988年6月1日,10:05—11:20a.m,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60ff;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8年6月20日,REEAD 2939,国家安全档案;关于政治改革的背景,参见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166—186。

③ 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8年6月20日,REEAD 2939,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讲话,1988年7月15日,收录于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611。



谢瓦尔德纳泽宣称，“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三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在同样的听众面前宣称他要致力于各民族自决、法制以及军备限制的践行。“国家间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一個新要求。”他说，“我们并不是在放弃我们的信念、宗旨和传统；也不是在呼吁别人放弃他们的这些东西。然而，我们不会幽闭在自己的价值观范围内，这会致使精神贫乏。”^①

由于戈尔巴乔夫自己对于威胁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加之他在努力改变西方国家对于威胁的认知，所以他利用在联合国的机会宣布苏联会单方面裁减常规武器，以此震惊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苏联将裁减 50 万士兵，1 万辆坦克，8500 门大炮以及 800 架战斗机。6 个坦克师将从东欧的华沙条约组织各国撤离。这一削减意味着将有 5 万名士兵、5000 辆坦克及其他攻击性武器从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在东欧剩下的几个苏联师将会沿着防御线进行重新规划。亚洲也会进行更广泛的裁军。戈尔巴乔夫宣称：“世界已发生了改变。”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都建立在敌对冲突的旗帜下”，但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因华盛顿和莫斯科沿着更正常的路线重新审视彼此间的关系而松了一口气。^②

罗伯特·凯泽(Robert Kaiser)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中写道，这是一场震人心扉的成功演说，“与联合国的历次演说一样精彩绝伦”。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坦言其意义在于，彻底改变了由于温斯顿·丘吉尔 1946 年 3 月在密苏里的富尔敦演讲而植入西方国家心目中的铁幕形象。他树立的是与丘吉尔讲话中描绘的形象截然相反的形象。^③

此次演说一结束，12 月 10 日，亚美尼亚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造成 4.5 万人死亡，至少 50 万人无家可归。戈尔巴乔夫被迫立刻返回苏联，但他还是和当选总统乔治·H·W·布什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并与即将离任的总统告别。他和里根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关系。他们同是生性乐观的人，都坚信人的能动作用，也都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之间的亲切交流充满了幽默与坦诚；他们肯互相聆听，互相学习；他们充分理解那些把他们分隔开来的基本信念以及能让他们团结起来的价值观

①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8 年 9 月 27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8 年 9 月 28 日，2—10，引自 6；戈尔巴乔夫演说，1988 年 12 月 7 日，出处同上，1988 年 12 月 8 日，11—19。

②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8 年 12 月 7 日，出处同上，1988 年 12 月 8 日，17—18。

③ 关于对演说的讨论和反应，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459—462；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参见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8 年 10 月 31 日，REEAD 2924，国家安全档案；关于更多反应，参见奥伯道夫，《转变》，318—319。

念,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核武器恨之入骨,对和平渴望至极。里根从上任以来便渴望能遏制并转变一个邪恶帝国,但他却带着对苏联恐惧的理解和对苏联改革的欣赏离任了,并心存与戈尔巴乔夫共同投身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信念。^① 戈尔巴乔夫最初以加速苏联经济增长、重塑苏联形象为出发点,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开始寻求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致力于改变苏联威胁论的观点,超越冷战思维。罗纳德·里根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②

1989年新年的除夕,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国人:“世界的新前景正在形成。……冷战的硝烟开始消逝散去。”苏联人民必须抓住机会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在追求“政治领域彻底改革”的过程中,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利益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能得以保证”。这一挑战艰难之至。“我们并不奢望天上掉馅饼,也不会开出空头支票。但我们都已意识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们的路很不好走,可我们都已经作出了抉择。”^③

然而,他还不知道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是否会与他的新思维产生共鸣。纽约之行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尽力调整他们的期望。他认为新任总统不会恶化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他也不会在国外冒这个险。但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并不确定布什是否已准备好“为两国关系作出重大转变……这将会与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相呼应”。他认为,美国官员将会“故意拖拉”。^④

戈尔巴乔夫的顾虑不是多余的。这位新任总统为人谨慎,思维缜密。出身于新英格兰贵族家庭的乔治·H·W·布什曾是耶鲁的高材生,之后作为议员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曾担任驻华大使,在成为里根的副总统之前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在任期间,他一直是个典型的冷战专家——担心共产主义的势力扩张,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时刻保持警惕,致力于结盟,努力实施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他相信只有通过实力才能达到和平。像里根一样,布什也认为一场民主革命正横扫全球。“我们知道

① 里根,《一个美国人的一生》,720;了解里根对苏联威胁逐渐演变的观念的评价,参见芭芭拉·法纳姆(Barbara Farnham),“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革命:感知威胁的结束”(“Reagan an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Perceiving the End of Threat”),《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16(2001年夏):225—252。

② 关于戈尔巴乔夫对里根的欣赏,参见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坦嫩瓦尔德,“认识冷战的终结”,221;戈尔巴乔夫,“一个愿意聆听的总统”(“A President Who Listened”),《纽约时报》,2004年6月7日;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55—356。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8年12月31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月3日,41—42。

④ 政治局会议,1988年12月27日—28日,REEAD,2922,国家安全档案。

什么是有效的方法，”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知道如何才能保证全人类过上公平富足的生活：只能通过自由的市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选举，以及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意志的践行。”^①

布什很欣赏戈尔巴乔夫所成就的变革，也希望与他建立起积极的关系，但是他对苏联的真正意图并无把握，他认为美国不得不谨小慎微。上任三个星期后，他在一次国会的联席会议上说：“最根本的是，苏联仍然持有非常强大的军事机器，其目的仍时常与我们相抵触。因此，让我们认真对待这次新的开放，但也要立足于现实，同时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②

布什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经验丰富的行政部门前负责人，他做过亨利·基辛格的助理，后来成为杰拉尔德·福特的国家安全顾问；里根执政时期，他在多个顾问委员会供职。但他愈发感到里根被戈尔巴乔夫的个人魅力蛊惑了。在斯考克罗夫特答应加入新政府之际，他认为“东西方四十多年来的对抗”仍然没有结束。“我对戈尔巴乔夫的动机和执政前景都颇为怀疑，”后来他写道，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历任中最精明且富于想象的：“他正试图用温柔的手段来干掉我们，而非采取强硬手段。”斯考克罗夫特选择苏联分析专家、前中情局副局长罗伯特·M·盖茨为其高级助理，盖茨甚至比他的顶头上司对戈尔巴乔夫抱有更大的怀疑态度。^③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A·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倒是持有更温和的观点，但他认为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革。他很快开始注意人们对苏联真实意图的辩论，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论调。……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使我们的外交利益最大化而风险最小化”。和他的同僚一样，贝克也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先发制人地抓住外交政策的主动权，控制整个议事日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名望愤恨不已，担心他会分裂西方联盟。^④

而对戈尔巴乔夫疑心最重的莫过于布什的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他同样经验丰富，曾任杰拉尔德·福特的白宫总参谋长。在五角大楼任

① “就职演讲”，1989年1月20日，《总统公共文件：乔治·H·W·布什，1989》，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署，1990，1。

② 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1989年2月9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79；同时参见“总统新闻发布会”，1989年1月27日，出处同上，23；乔治·布什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A World Transformed)，纽约：古典书局(Vintage Books)，1998，8—11。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3；盖茨，《从暗处探索》，449—461。

④ 贝克，《外交政治》，69，70，83。

职期间,切尼说:“有人想宣称冷战告终。他们认为威胁已大幅减少。……但在我看来,我们仍应该备加谨慎。……我们坚决不能因为最大劲敌暂时失常的行为就拿我们的国家安全冒险。”^①

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从莫斯科发来的消息也没在华盛顿引起对“新思维”的好感。马特洛克说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实质性的重大改变。“事实上,苏联已经宣布了其制度的破产,而且……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马特洛克一再要求苏联进行更多经济政治改革,但是苏联改革在随后几年中不可能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大有作为”。然而马特洛克告诫道,克里姆林宫在国内事务上的专注“并不会放弃积极的外交政策……反而,它的外交政策会受到国内需求的严重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②。戈尔巴乔夫迫切想要缓和国际紧张状态以将注意力、精力和资源都转到国内问题的解决上,这样一来,在中短期内苏联的威胁可能会减小,但长期效果未必好。马特洛克解释道:“苏联长期以来都倾向于为达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器,这一潜能不会消失。”

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也不会因为苏联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脱轨而衰退。马特洛克警醒道,随着克里姆林宫日渐式微的威胁和积极的合作态度,苏联的威望可能会有所提升。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学乖了,他们认为可以靠“微笑和鞋油走上很长的一段路……他们指望着将微笑转化为政治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的和平、单方面裁军以及防御性军事战略都是为了“让莫斯科在军事缩减、经济滑坡期间仍保持强国地位和影响力”。美国会发现“这种笑脸相迎反而会比挑衅叫嚣更能引起不和”。^③

马特洛克建议华盛顿抓住这次“历史性机遇”并利用这一优势,不是要帮助戈尔巴乔夫或苏联,而是要“扩大美国的利益”。在苏联这方面,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转变苏联的政治体制,使之有效限制苏联在境外使用武器”。末尾时,马特洛克敦促新政府不要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继续停滞不前,而是应该向苏联施压,结束其在中美洲的军事行动,并削减其在古巴的驻军。尽管华盛顿“不能强迫他们丢弃这块肥肉”,也不会给莫斯科任何经济援助,他建议美国“应该给苏联领导人以巨大的动力,让经济朝着非集权化、多元化和非军事化方向发展”。^④

布什、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他们的同僚们都渴望能在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留下自

① “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1989年3月21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277。

② 马特洛克致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2月3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③ 马特洛克致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2月13日和1989年2月22日,出处同上。

④ 马特洛克致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2月22日,出处同上。



军事机构和军事行动的根本性变革。”苏联的军事力量必须削弱,使其威胁性减小。苏联必须不再声称阶级斗争是造成“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并依照这一承诺行事;允许东欧国家享有自主决定权,并且摒弃勃列日涅夫思想;苏联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必须非军事化,为“缓和对抗”作出真正的努力;向苏联在各地的代理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停止侵略性行为;禁止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展示出与美国在解决如恐怖主义和国际毒品贸易等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意愿;以及使“民主的法律体系、人权的实践、政治多元主义和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制度化。如果莫斯科能够接受这些条件,它将会“发现美国非常愿意与它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①

简言之,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重整他的军事机构,正式放弃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他的“新思维”能适应一个基于传统美国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秩序,冷战就会结束。

柏林墙的倒塌

美国的新政府知道不能忽视军备控制议事日程;大量削减核武器的思想受到热烈欢迎,尤其在西欧国家,其中尤以西德的反响最为强烈。但是布什、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和切尼都想在军备控制问题上耍点手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认为更重要的议题上。他们想促进西欧的团结统一,把东德从共产主义的统治和苏联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我们最终的目标,”布什声称,“就是结束欧洲的分裂,达到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念上的统一。”^②

在最初的几次战略会议中,他们讨论了正席卷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克里姆林宫对那里的反对呼声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但这样的自我克制会维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既然戈尔巴乔夫已经提议裁减欧洲的常规军事力量,布什和他的助手们便想借此机会削减北约组织的军事能力,侵蚀苏联的国力。斯考克罗夫特坚持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把苏联的军事铁蹄从东欧各国的脖子上移开。”^③

为了战胜克里姆林宫,转变戈尔巴乔夫另一项受欢迎的提议——废除欧洲的战

① 国家安全决策指示 23,“美国和苏联的关系”(“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89年9月22日,口述历史会议文件集,“欧洲冷战的结束,1989:‘新思维’和新证据”(“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New Thinking’ and New Evidence”)(穆斯格鲁夫,佐治亚州,1998),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② “总统新闻发布会”,1989年5月30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638;贝克,《外交政治》,71—72,156;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40—45,59,81。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44;贝克,《外交政治》,93—94。



术核武器——布什和他的助手们设计出一个强调常规武器削减的提案。他们向苏联发起挑战，要苏联签订一项协议，在他们看来该协议将会重塑军事布局，消除双方可能遭到对方突袭的恐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亲善之意，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应该在欧洲中部裁减 32 万 5 千名士兵，以此平衡美国裁军 3 万、让 27 万 5 千名士兵驻留的行为。正如布什所言，这一“革命性的”提案缓和了美国的盟国德国与英国间的争论，把球高高地抛给了苏联。^①

布什和他的助手们为再次维护了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而振奋不已。在上任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们受到了外界的严重批评，说他们无精打采、犹豫不决。然而到了 6 月份，他们沉浸于对一项外交政策的讨论中，该政策超越了遏制政策的框架，囊括了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并将欧洲视作一个自由的整体。^② 眼看着戈尔巴乔夫如此赢得欧洲人民的心，他们的目标是与其一争高下。

那时，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焦头烂额，而在国外却声名鹊起。他的国内政治改革使得政治局内部观点产生严重分歧，他的政策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然而国外却盛行着戈尔巴乔夫热。在 6 月和 7 月间，他走访了法国和西德，并在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向欧洲委员会发表演说。在他所到之处，欢呼的人群都蜂拥而至。他声称要为建立一个欧洲共同家园而奋斗，要摧毁战术核武器，承诺要尊重所有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这让他的听众们备受鼓舞。戈尔巴乔夫相信他对开放、民主以及全人类价值观念的谈论会重燃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说，苏联不会固守其道，但仅仅靠资产阶级社会并不能代表“永恒的价值观”。人民应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③

布什很乐意迎接这个挑战，他在 7 月份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历经着举世瞩目的变化。在经济困顿、债务累累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迫使下，波兰共产主义政府不得不寻求与团结工会领导下的反对派进行合作，后者长期以来都受到压迫。“圆桌会议”过后，双方通过了一项新的选举法：在色姆国会，即立法院下院提供三分之一的席位进行公开角逐。波兰人民在 6 月份举行了自由选举，共产主义惨遭失败。但当布什 7 月抵达华沙时，波兰的政治局势、权力的真正分配等问题尚未明了。

① “关于《常规武器控制协定》的谈话”(“Remarks Concerning a 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Initiative”), 1989 年 5 月 29 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618;贝克,《外交政治》,94;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73;奥伯道夫,《转变》,349—351。

②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83。

③ 引自本内特·科夫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1,153;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演说,1989 年 7 月 6 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 年 7 月 7 日,29—34。



匈牙利的未来也无法预测。匈牙利共产党仍在进行改革,容许公开讨论,酝酿私有市场,允许自由选举,并在5月份突然开放匈牙利边界。这意味着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能够越过匈牙利边界进入奥地利并继续向西。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样做,匈牙利人对东德领导要求制止非法出境的请求置之不理,这让埃里希·何内克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政府很是尴尬。

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醉心于公民社会和自主权力的重生。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当地的繁荣发展和大国间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会允许多大的变革呢?他会接受多大的风险呢?西方国家会提供多少援助来支持这场对社会主义的背离呢?

布什很想提醒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但是他又不想惹怒戈尔巴乔夫,也不想激起苏联的干涉,或是造成一些不现实的期望。总统还记得1956年苏联进入布达佩斯,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就此幻灭。就像埃里希·何内克当时所说的,“我们打下江山,就是为了永保江山”^①。

因此,布什在华沙和布达佩斯的记者面前还是对自己的措辞斟酌再三。“他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眼中钉。”美国“不该过分承诺,也不该力劝别国和自己一样”。他不是要干涉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而是要给予支持。他们要自行推进改革,他们的未来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也不想“挑起苏联和东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他很赞同戈尔巴乔夫关于欧洲共同家园的提议,“但是我们要确保人们可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让我们确保这个门是敞开的”。让我们确保这些国家“能够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朝着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②

在向波兰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提到了正在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轮严重动乱与深刻变革正横扫从波兰到太平洋沿岸的整个地区。它们有时振奋人心,但有时却令人痛苦……但我们认为全世界的这些变革非常重要,驱使我们自省,仰望上帝,以铸就气概与自控的非凡结合体。”

这些动乱与无常、风险与机遇让总统想到了二战前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现代世界的分裂始于此地——就在这里,就在波兰——那是在五十年前的夏天。”然而在

① 关于何内克的引言,参见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与埃里希·何内克会谈备忘录,1989年5月3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革命:前提,进程和直接影响,1987—1989”的口述历史会议“简易本”(“Briefing Book”),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② “白宫记者团访谈录”(“Interview with Members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Corps”),1989年7月13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951—953;“匈牙利记者访谈录”(“Interview with Hungarian Journalists”),1989年7月6日,出处同上,914;“总统新闻发布会”,1989年7月6日,出处同上,899,900;“总统巴黎新闻发布会”,1989年7月16日,出处同上,973。



彻底打败法西斯主义后,美国人民和波兰人民都盼望着一片光明的前途。《大西洋公约》勾勒出了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框架,该框架基于民族自决和远离恐惧的自由,保证人民享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然而,三分之一的欧洲大陆处于斯大林主义的笼罩之下,冷战拉开了序幕。“你们曾是争端的熔炉,”布什对波兰人民说道,“现在你们已成为变革的熔炉。”总统引用了戈尔巴乔夫的话,提醒波兰人民,所有人都有权“选择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道路”。波兰的命运必须掌握在波兰人民的手中。尽管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应被置于险境——意指苏联不该惧怕变革——波兰理当有权与欧洲其他国家建立关系。这一历史时刻承载着大好的机遇,布什说道:“民主捕捉了我们时代的脉搏。……[这是]人类的命运所在。”^①

这样的公开声明令苏联领导人极为恼火。布什似乎是一副袖手旁观的姿态,希望看到苏联分崩离析。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布什对苏联政治经济改革的支持并不是他的真正意图。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布什说他欢迎苏联从波兰撤军。戈尔巴乔夫对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这一声明似乎“奇怪至极”^②。

然而在6月初,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会议上对华约领导们发表讲话时显得非常乐观。他强调冷战已是声势俱下。在他看来,第三世界的地区争斗在减少,“东西方国家间正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华沙条约组织的力量必须得以削弱及重组,以求与新的防御战略原则保持一致。华约组织应该成为一个政治联盟,而不是军事联盟。他说:“通过自身的变革,我们激励着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投身于变革之中。”他希望北约也能进行改革。最终,两大阵营将会逐步瓦解,欧洲共同家园将会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都有发展空间。^③

但并非所有同盟国都在国内改革和国际协调方面与他观点相同。埃里希·何内克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提出了他们的顾虑。他们抨击帝国主义伺机动摇和推翻社会主义。齐奥塞斯库坚持说:“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他没有把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看成是他的国家应当赶超的典范,戈尔巴乔夫也没有那样说。尽管苏联领导人支持改革,但他希望改革必须

① “在波兰国会上的讲话”(“Remarks to the Polish National Assembly”),1989年7月10日,《总统公开文件:布什,1989》,920—924,引自920,923。

② 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的最后会谈记录,1989年7月6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与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会谈记录,1989年6月12日,出处同上。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9年7月7日—8日,收录于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644—646。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①

东德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Heinz Kessler)写道:“此次[华约]会议似乎有点精神分裂的意味。”^②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波兰和匈牙利已转向资本主义议会制度和自由市场体制。但戈尔巴乔夫也正在面对一个事实: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需要改革,这一点他很清楚。8月份,当问及他的观点时,他建议波兰共产党接受华沙新政府的少数派位置。他在9月份告诉匈牙利人,他不会反对他们开放边界,当然这样的举措可能导致成千上万的东德人逃出东德,给何内克政府带去巨大的压力。^③

戈尔巴乔夫对何内克的不满显而易见。东德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国,它的经济地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无可取代。但何内克是个难以驾驭的人,加上他的教条主义,这都触怒了苏联领导人。东德人民愤恨不满,整个夏天都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的大街小巷进行和平集会。一个被称为“新论坛”的反对派集团虽没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教条发起挑战,但呼吁政治改革及整顿弊病。一些更为大胆的组织也纷纷涌现——如社会民主党和今日民主党——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支持政治多元化、自由贸易同盟以及市场经济。布达佩斯和华沙的发展,以及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莫斯科发起的改革,都使这些组织备受鼓舞。当这位苏联领导人在10月初抵达柏林参加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四十周年庆典时,他受到了夹道欢迎。在他的公开演说中,他为东德共产党即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就而非领导阶层喝彩。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何内克,但他私下里要求改革,并暗示像何内克这样盛气凌人地维持现状不仅会适得其反,而且是在背叛社会主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和行动都不明朗,但很可能就是在鼓励柏林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10月18日颠覆何内克政权。^④

① 齐奥塞斯库、何内克和戈尔巴乔夫演说,1989年7月7日—8日,收录于马斯特尼和伯恩,《硬纸板城堡?》,650,646,652。

② 海因茨·凯斯勒回忆录,出处同上,653。

③ 戈尔巴乔夫和科尔会谈记录,1989年6月12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雅克·莱维克(Jacques Levesque),《1989年之谜:苏联以及东欧的解放》(*The Enigma of 1989: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125,153;关于背景知识的最新资料,参见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1989年之逻辑:苏联撤出东欧”(“The Logic of 1989: Soviet Withdrawal from Eastern Europe”),未发表论文。

④ 莱维克,《1989年之谜》,155—156;关于对戈尔巴乔夫矛盾思想的评价,参见汉斯·阿多迈特(Hannes Adomeit),《帝国跨越: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政策下的德国》(*Imperial Overstretch: Germany in Soviet Policy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巴登巴登:诺摩斯(Baden-Baden: Nomos),1998,401—417;查尔斯·S·梅尔(Charles S. Maier),《瓦解:共产主义的危机和东德的终结》(*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155—156。



何内克的继任者及亲密助手,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没能逃脱他所接手的混乱。他被街头的动荡不安、政党的道德败坏、政府的濒临垮台缠得喘不过气来。11月1日,他抵达莫斯科,告知戈尔巴乔夫其政府糟透了的财政状况。到1989年底,东德政府对西方国家的欠款将高达265亿美元;现阶段的年度财政赤字则超过了12亿美元。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他鼓励克伦茨向西德贷款,但要小心谨慎,不能作出过多让步。克伦茨担心游行示威者可能会试图冲破柏林墙。他强调会谨慎行事,还说他和同僚在考虑承认“新论坛”,他们之间已经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谈判。戈尔巴乔夫鼓励宽容,不赞成使用武力。他明确表示苏联在东德的驻军不会支持政权动用武力,建议不要把人民当成敌人。但他也开不出能获得成功的灵丹妙药。他提倡改革,漫无目的地讨论了由政治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问题。他说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马已经上好了鞍,但尚未跑完全程,还是有摔下马背的可能的”^①。

克伦茨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措施。11月9日,他们同意正式放弃德国统一社会党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享有的权力垄断。他们宣布将会接受自由选举,让东德人民能够更自由地出国。

就在同一天,西德总理科尔在华沙与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举行会谈。瓦文萨担心在东德的发展会一发不可控制。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全开放他的边界,推倒柏林墙”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它会意味着德国的统一吗?瓦文萨提醒科尔,波兰仍对他们的邻居德国心存戒备,情势仍是危机四伏。科尔表示赞同,说道:“一旦有一个人开火,一切就都完了。”^②

还是同一天,即11月9日,莫斯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讨论了日益严重的动乱局势——不是东德的,而是苏联的。他的开放政策并没有让那些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释放其积怨。从波罗的海到克里米亚甚至更远,他们现在会表达对自主和独立的渴望,还会表达对彼此的憎恶。苏联内部的绝对支配权岌岌可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民族主义革命情绪与他们之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所利用的如出一辙。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同僚们透露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想脱离苏联,还在威胁他。他说克里姆林宫必须告诉他们,谁想寻求独立,谁就会面临经济崩溃。但他仍然想保持主动权,在国家联盟、物价改革以及私有财产保证方面采取一系列积极措

① 戈尔巴乔夫与埃贡·克伦茨会谈记录,1989年11月1日,REEAD 2885,国家安全档案;引言参见梅尔,《瓦解》,223;同时参见莱维克,《1989年之谜》,156;阿多迈特,《帝国跨越》,425—429。

② 科尔和莱赫·瓦文萨会谈记录,1989年11月9日,关于“波兰1986—1989:制度的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简易本,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施,以此让他们继续忠贞不渝。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说,一旦选举在波罗的海共和国进行,他们就会脱离苏联,继而便会发生混乱。这一影响将会波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我们该怕的不是波罗的海共和国,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雷日科夫说,“我已经嗅到了将要全面溃败的腥味。”^①

11月9日到10日的那天晚上,在柏林,德国人推倒了那堵墙——真正意义上推倒了。

西德总理科尔次日致电布什总统向他描述上述事件。他简直难以抑制心中的狂喜之情。“我刚从柏林回来,如同见证旷世盛典,洋溢着节庆的气氛。”东西柏林间的界限完全开放了,人们欣然地走过来走过去。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柏林、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街头。“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冷静和平静。”布什也这么说道,“我希望……能避免可能错误引发问题的激烈言辞。”布什和科尔为他们的精明审慎和所见证的成绩互表庆贺。柏林墙倒了,波兰和匈牙利人民获得了自由,自由之风吹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德国统一的梦想已在科尔的脑袋里打转,但布什还是提醒他要继续小心谨慎。^②

“柏林墙倒了,”当天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代结束了。……这是雅尔塔体系[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实上,他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他已觉察到了历史的脚步,帮助历史找到了一条自然发展的道路。”^③

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感与他对于威胁的认识始终纠缠在一起。他喜欢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在发生变革。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可能会产生分歧并进行竞争,但他一直“深信”美国决不会攻打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时“人们心中没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感,战争被视为是一触即发、甚至不可避免的事实”。变化最大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克里姆林宫有能力把这一无法想象的破坏施加给对手。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顾问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写道,我们“现有的核武器能确保我们免受直接攻击”。^④

① 政治局会议,1989年11月9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也可参见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26—232。

② 电话会谈备忘录,1989年11月10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③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节选,1989年11月10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④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9年1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月19日,8;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见证》,5,37;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45—46;切尔尼亚耶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21;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0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0月24日,44—45;沙赫纳扎罗夫,“评论V·G·库利科夫的报告”(“Comments on the Report of V. G. Kulikov”),1988年5月25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就连戈尔巴乔夫那些在军事和国防建设方面尖酸刻薄的批评家也表示同意。他们中没有人向他施压让他在波兰、匈牙利和东德动用武力。只要德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就没有理由担忧东欧的迅速发展。国防部长亚佐夫回忆道:“多亏核力量均衡,我们才得以生活在和平之中。”^①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和平与安全不会受到东欧发展的威胁。1989年初,苏联共产党外联部和重大政策研究机构的几位顾问已经推测出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重新定位他们的优先发展项目,他们将经济发展列在议程首位。波兰和匈牙利很可能会采用多党制,允许建立私有市场,抛却原有的意识形态。“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现]自己正处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的强大磁场内。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取得的成就[变得]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所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几乎察觉不到。”^②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专家顾问认为克里姆林宫不应该干预。只有当外国政府对东欧予以干预时,苏联的国家安全才会受到影响。“国内权力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国外军事势力的威胁。”既然波兰和匈牙利在短期内都不可能离开华约组织,苏联的安全就没有受到威胁。过去那种被西方世界包围孤立的前景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被可能出现的核武器大屠杀“永远彻底”地铲除。“我们需要把自己从固执的意识形态圈中解放出来,”秉承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论的学者们写道,“比如说,只有共产党执政才能为苏联边境安全提供保障的这一思维假设。”^③

戈尔巴乔夫确实从这个思维假设中解放了出来。他没有对波兰和匈牙利(或其他地方)进行干预,非要把共产主义的权力垄断强加于对方,因为这与改变苏联在西

① 引言和分析参见安德鲁·O·本内特(Andrew O. Bennett),“信任荡然无存:德国统一问题中的苏方”(“Trust Busting Out All Over: The Soviet Side of German Unification”),收录于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199ff;同时参见加特霍夫,《大转变》,605;亚佐夫演说,1988年5月9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8年5月10日,69—72。

②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致雅克夫列夫,1989年2月,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③ 异文合并引言来自博戈莫洛娃研究所(Marina Sylvanskaya)致雅克夫列夫,1989年2月,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以及阿列克谢·伊久莫夫(Alexei Izyumov)和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i Kortunov)的评论,收录于肯尼思·A·奥耶(Kennety A. Oye),“诠释冷战的终结:对核年代的和平在形态与行为上的适应?”(“Expla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orp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daptations to the Nuclear Peace?”),收录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终结》(*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理查德·内德·勒博和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76。

方国家中的形象这一首要目标存在严重冲突。他正寻求建立一个禁用武力、尊重民意的欧洲共同家园。如果要消除对抗阵营的壁垒——这是个长期目标,就应该公开放弃武力。^①

他也不会考虑在苏联境外动用武力,因为他已经完全沉浸于保持团结的思想之中。他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接踵而至的内部危机。国家主义情绪高涨;血流成河;纷争更是四处蔓延。在政治局,戈尔巴乔夫要面对对手不留情面的批评,认为他是在这种骚乱的情况下妥协的人。然而,在国内动用武力无异于在国外施展暴力,都会损坏他的形象。4月9日,苏联军队残酷镇压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的示威游行,造成20人死亡。他后来坚持说,类似事件决不会再发生。^②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仍然受制于他的国内议程。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他在给学生的一次讲话中开头便说道:“我们先谈谈最主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他说,“通过改革重组,我们想让社会主义重新振作,从各方面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人文发展潜力。”在这种制度下,人不会被看作微不足道的齿轮,相反,这种制度将会为人的利益而得以改革重组。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将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苏联将会大踏步跨进一个以微电子技术、信息科学及生物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时代”。应当将资金转投到这些领域之中,以此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生产更多的粮食和消费品,带动服务业的发展。^③

由于这些原因,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在国家安全未受威胁的情况下腾出手来管东欧事务。波兰和匈牙利欠西方国家大量外债。在本国由于油价和原材料价格下降而苦苦挣扎之时,他是无法救那些国家于累累负债之中的。^④ 当他的军队满身血污、士气低落地撤离阿富汗,纳吉布拉仍在无休止地请求更多卡车、燃料、军火以及武器增援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考虑在国外进行干涉。^⑤

科尔总理于11月11日致电戈尔巴乔夫,向他保证西德并不想掀起东德的国家动荡,戈尔巴乔夫对此甚为感激。他和科尔都同意他们需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戈尔

① 这一观点同莱维克,《1989年之谜》;萨夫兰斯卡娅,“1989年之逻辑”。

② 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24—232;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252—269。对由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使用武力的失败激起的怨愤在1999年举行的莫斯科口述历史会议上他的反对者的污蔑之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参见“莫斯科冷战会议”。

③ 戈尔巴乔夫演说,1989年11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1月16日,64—75。

④ 戈尔巴乔夫与克伦茨会谈备忘录,1989年11月1日,REEAD 2885,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与毛诺·科伊维斯托(Mauno Koivisto)的会谈记录,1989年10月25日,REEAD 2886,出处同上。

⑤ 纳吉布拉致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5日,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巴乔夫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而且“或深或浅”。但是，各国都需要保持稳定发展，都必须“负责行事”。^①然而，他还不确定科尔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三天后，戈尔巴乔夫向法国总统密特朗致电。事情的进展除了一个方面外都还比较合他的意，他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议题方面，围绕德国统一问题，我充满了兴奋之情……”^②

11月17日，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最高苏维埃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为清晰的阐述。他说，东欧的发展进程“受到了自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民主化、社会主义的蜕变、人民自由选择权利的践行都在行进中”。但是战后的领土现状不应被打乱；两个德国必须继续维持现状。“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欧洲和整个世界已为过去犯下的错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苏联人民没有也不会忘记历史的沉痛教训。”^③

苏联领导人把德国的分裂看成是保证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④长时间以来，德国的分裂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危机感。事实上，这种威胁的消失开阔了进行改革的机会，而对改革的渴望又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必须减轻自己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威胁。但是德国问题又变得魅影重重。^⑤国务卿贝克写道：“显然，德国问题触及了其他任何欧洲问题都没有触及的情感之弦。”^⑥

东西德的合并

1989年11月28日，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加强了这方面的论调。在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出了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他谈到了要规范两国人员往来和共享技术，但他强调只有东德同意举行自由选举，废除集权计划，西德才会向其提供经济援助。一旦采取这些措施，两德便可以建立一个“条约联盟”，并最终建立一个两德共同的联邦体制。这些举措应与为完善泛欧洲框架和削减武器所作出的努力相一致。“现在没人知道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最终会是怎样，”他说，“但

①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电话会谈记录，1989年11月11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

② 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的电话会谈记录，1989年11月14日，出处同上。

③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9年11月17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1月20日，46。

④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17。

⑤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9年10月23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89年10月24日，特别是45；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89年11月17日，出处同上，尤其是44—46。

⑥ 贝克，《外交政治》，149。

我确信,如果德国人民需要,德国便会统一。”^①

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人想看到德国统一。过去的沉痛记忆仍笼罩着整个欧洲。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向布什总统明确表示反对此事。荷兰和意大利外交部长也持相同立场。密特朗对于科尔的提议也颇为不满,但由于担心激怒这位西德朋友阻碍他进一步的欧洲统一计划,他迟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②

布什总统是个特例。他唾弃东德政权,认为德国的国家主义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自然冲力。“撒切尔、密特朗和其他人都害怕德国会导致更多麻烦和悲剧的产生,”布什回忆道,“而我不担心。”在布什看来,新统一的德国“将会完全不同”。它将会是一个民主国家,尊重现有的边界,被纳入北约联盟,加入其他超国家机构,并与华盛顿合作。科尔发表讲话后第二天,布什即致电这位德国总理。科尔承诺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继续留在北约。布什也保证他会支持科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和科尔频繁通电话。在他们都致力于改变欧洲发展蓝图之际,他们间的友谊也日渐深厚。布什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也知道该去向何方。他很高兴科尔带这个头。^③

布什的助手们并不是都对此事热心关注。他们担心会出现危险和不可估量的境况。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假如[科尔]决定这样做,他只能通过重新确立中立立场来达到统一。”在欧洲中部,中立、强大、统一的德国从冷战伊始便是反复萦绕美国和欧洲政治家心头的梦魇。当然,布什坚定认为不会出现一个中立的德国。但是他们凭什么有此把握呢?^④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担心苏联会对科尔的计划作出什么反应。戈尔巴乔夫难以忍受一个统一的德国,更别提是留在北约的统一德国,贝克写道,这将会“彻底改变欧洲的地缘战略、政治和经济框架”。斯考克罗夫特意识到,丧失东德加之其被吸纳入

① 菲利普·泽利科和康多莉扎·赖斯,《德国统一和欧洲转型》(*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120。

②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岁月》(*The Downing Street Years*),纽约:哈珀·柯林斯,1993,794—798。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93;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的电话会谈记录,1989年11月14日,关于“欧洲冷战终结”的口述历史会议,冷战国际史项目档案资料;大卫·S·贝尔(David S. Bell),《弗朗索瓦·密特朗:政治传记》(*François Mitterrand: A Political Biography*),剑桥,英国: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2005,138—139;弗雷德里克·博佐(Frédéric Bozo),“密特朗的法国,冷战终结和德国统一:重新定位”(“Mitterrand's Fra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 A Reappraisal”),《冷战史》(即将出版,2008年1月)。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82—195,引自187;电话会谈备忘录,参见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

④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82—203,引自195;贝克,《外交政治》,158—168。

北约，“这将会对战后苏联的军事战略造成致命一击，相当于联盟本身的地壳结构正在移动变位。东德是二战的战利品。……丧失这一战利品，继而接受这一损失，将意味着苏联在东欧势力的终结，由莫斯科的卫星国所构成的安全缓冲地带也彻底消蚀，而这正是其安全计划的核心”^①。

国际舞台上的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钻天觅缝，与此同时，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正在准备他们12月初在马耳他的首次会晤。尽管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让人凝神屏息，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也在经历转型，但美国官员仍对戈尔巴乔夫保持谨慎。他们认为他的改革不会取得成功，他们也尚未明确他的意图。“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可能是一个并不执着于将两种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对抗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人，但他却时刻准备着抓住任何机会利用我们。”戈尔巴乔夫可能只是正好将计就计把西方国家哄得骄傲自满。理查德·尼克松在写给布什的信中说，戈尔巴乔夫正在将某种必然性化为对其有利的条件，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高尚的领袖。敬请提防！^②

布什则更为乐观，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为自己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做着精心的准备，想让戈尔巴乔夫采取守势。正当他们各自的行船将要停靠在马耳他港时，一阵猛烈的风暴席卷而来。船内的氛围“友好但并不轻松”。布什告诉戈尔巴乔夫他支持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并想在6月份召开另一次峰会。他提到几起苏联的人权案件，讨论了扩大贸易的可能性，并敦促苏联领导人支持美洲中部的自由选举，限制卡斯特罗的冒险主义。^③

戈尔巴乔夫则从哲学角度简要回顾了冷战。“如今，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新出现的问题必须得以解决，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中，合作必须代替竞争。“美国和苏联注定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放弃敌对意识。”苏联永远都不会攻打美国。

戈尔巴乔夫又将话题转向德国。他说：“科尔先生操之过急了……这可不太好。”戈尔巴乔夫仍然寄希望于延续一个经过改革和重组的东德政权。“历史的发展让它成为了两个国家，”他告诉布什，“因而就让历史来决定它们的命运吧。”布什承诺美国不会鲁莽行事，但他并不反对德国统一。戈尔巴乔夫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他含糊

①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86；贝克，《外交政治》，23—32。

②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54—155；贝克，《外交政治》，169—171。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60—164，引自162。



其辞地谈到要坚持在赫尔辛基达成的一致原则: 维持稳定, 尊重欧洲的力量均衡, 沿着更多政治路线重组他们的军事联盟。但是他没有任何蓝图。^①

在德国问题上, 他们没有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但他们在马耳他还是以诚相待的。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谈。戈尔巴乔夫感到布什已准备好了与其合作, 扩大交易, 并帮助他在国内的改革。布什也感觉到戈尔巴乔夫谈话直截了当, 甚至谈到了最敏感的话题, 比如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暴乱, 布什一度认为苏联若在该地区使用武力, 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合作的机会也会随之消失殆尽。贝克给驻北约各国首都的美国大使拍发了电报说: “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全心致力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进行彻底改善——甚至转变——东西方关系。”^②

重返莫斯科后,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他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垂死挣扎——它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而非改善。他的政治改革也触发了分歧, 威望就此日渐消逝。他努力顺应附属国的要求, 这受到了波罗的海和克里米亚民族激进分子的鄙夷以及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取笑。他最亲近的同党也对他失去了信任。^③

现在他不得不处理关于德国未来的问题。12月5日, 当他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西德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时, 他失望透了, 事实上, 已经勃然大怒了。他告诉根舍, 他感觉遭到了背叛。在之前的会议中, 他和科尔已达成协议: 他们讨论了二战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如何造就了他们国家的命运; 他们对治疗旧创伤的共同义务以及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创造机会进行了反思。而现在, 科尔却在没有跟他商量的情况下抛出了一个德国统一计划, 彻底粉碎了这些希望。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 东德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科尔却在干涉其内政, 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对待民主德国的人民。这是“公然的复仇主义”。谢瓦尔德纳泽插话说: “即使是希特勒也不会让自己这么做。”根舍试图要解释, 戈尔巴乔夫抢过话来

①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64—172,引自164,167;同时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10—515。

② 贝克致北约各国首都,1989年12月6日,文件箱3,冷战终结集,国家安全档案;贝克、斯考克罗夫特和切尔尼亚耶夫,《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45—48;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73;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10—515;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33—234;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54—158。

③ 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42—266;博尔金,《动荡的十年》,175—300;布朗,《戈尔巴乔夫之因素》,155—211;麦考利,《戈尔巴乔夫》,92—232。



行调节。在一次向加拿大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谢瓦尔德纳泽清晰地概括出了处理“两个事实”时会遇到的挑战:“没有人会怀疑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人民自主决策的权利。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德国的邻国和欧洲国家的权利也必须得到保障,要保证德国的统一不会对这些国家构成威胁,不会造成欧洲边界的重新划分,而且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死灰复燃。”^①

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赞成必须由超国家的机构和框架对一个统一的德国进行约束。戈尔巴乔夫对贝克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护我们和欧洲其他国家免遭德国‘突袭’的安全网。”但是合理的安全机制,他强调说:“不应由北约提供,而应该在泛欧洲框架下制定新的制度。”他的意图并不明朗:他自己没有真正的计划。^②

德国统一问题向苏联政治投下了阴影。保守派的共产主义者控诉戈尔巴乔夫,说他在破坏党的领导地位,想建立多党制,允许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任由苏联解体。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上,反对改革者无情地攻击了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德国问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而尤为令人不安。在政治局中颇具影响力的叶戈尔·利加乔夫说:“我们不该忽视加速中的德国统一进程即将带来怎样的威胁。”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与日俱增。“一个有着可怕经济和政治潜能的德国正隐现于世界的地平线上,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何等鼠目寸光、愚昧无知啊,简直不可原谅。”不可以再出现另一个慕尼黑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认为,该意识到我们这个年代的新威胁并清楚将它告诉给党和人民了。”^③

这一批评动摇了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5月,他们断然驳斥了国务卿贝克带到莫斯科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提议。贝克说,在北约的框架下,统一的德国不能开发或拥有任何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军队的规模将会受到限制;与波兰的现有边界将会得到保障。此外,北约将重组成为一个更加政治化而非军事化的联盟,北约的军事力量在数年内都不得进入前东德领土。德国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将会逐渐培养起来,并将根据与“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相一致的程序建立起一个新的泛欧洲框架。^④ 尽管这些安全保障意义重大,但并不能满足仍受到外交部和苏联军事建设官员攻击的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5月,在戈尔巴乔夫庆祝战胜纳粹四十五周年之际,许多强

①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90年2月15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90年2月21日,913,引自10。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29;关于计划的缺失,参见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的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68。

③ 引自阿多迈特,《帝国跨越》,490—491;同时参见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58—183。

④ 贝克,《外交政治》,208,250—252;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84—187。

硬派和一些中间派人士嘲弄道：“苏联在战争结束 45 年后又向德国投降了。”^① 贝克 5 月 19 日离开了莫斯科：

我深深感到戈尔巴乔夫正在受到挤压……德国问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认为谢瓦尔德纳泽在德国问题上比他的上司多了几分感性而少了几分理性，但……他们二人都转不过弯来。我感觉他们信任我们，也信任德国的领导阶层，有数次似乎都要接受德国加入北约了，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历史回忆又把他们拉了回去。^②

戈尔巴乔夫于 5 月底飞抵美国，参加与布什总统的峰会。现在他在华盛顿的朋友比在莫斯科的还要多，他急需美国的帮助。几天以来，包括在戴维营的间歇期，他都坦诚地谈到他的问题。他想让美国人知道他已经走到了哪一步，以及他还希望怎样进一步重塑社会主义，发展苏联民主。他深陷于立陶宛想脱离苏联的威胁，又受困于对手提出的确保苏联统一的要求。就其个人而言，他也是左右为难——理解一个国家人民自主决策的权利，但又无法接受自己管理下的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机。他赢得了布什的共鸣，请求对方伸出援手。他希望能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还在寻求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削减协议能有所进展。听到戈尔巴乔夫这番话的人不会认为他把美国看作是敌人，或怀疑他相信这两国的共同利益会超越他们的差异。但他是站在一个弱者的立场上进行谈判的，他迫切需要取得一些外交成就来维系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苏联的改革正在经历一个关键阶段，”他告诉布什，“困难将会很大。……不同共和国可能有不同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基本决策都是为发展市场经济而制定。”^③

当双方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德国问题时，戈尔巴乔夫的绝望之情尤为明显。“德国人要么就加入两个联盟，要么就一个都不加入，”戈尔巴乔夫说，“这两种情况苏联都可以接受，但如果德国只加入北约，欧洲就会形成不平衡的局面。”布什反复争辩，竭力想要劝服戈尔巴乔夫。难道他不同意人民有权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吗？难道他不同意“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中所规定的国家有权选择联盟吗？难道他不认为一个统

① 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87。

② 贝克，《外交政治》，252。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279—289，引自 280；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84—194；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72—275；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36—542。



一的德国的人民应该有权选择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吗?^①

“令我吃惊的是,”布什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耸耸肩,给出了肯定回答”,德国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整个房间顿时鸦雀无声,布什继续重复发问,戈尔巴乔夫又一次表示赞成。众人哗然,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开始互相低声怒责。“苏方明显开始意气消沉,”布什写道,“阿克罗梅耶夫眼冒怒火。”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谈话继续着,此时苏方代表团已是怒不可遏。布什回忆说:“当时的场面令人难以置信。”斯考克罗夫特也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②

随着异议的激化,戈尔巴乔夫竭力想护住他的地位。他没有否定自己的言论,而是谈论起他们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需要减轻德国力量重生带给苏联的不安全因素,不管德国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还是一个与对抗阵营关系紧密的国家。^③这一思维唤起了苏联在冷战开始时的恐惧感。

然而改观还是非常大的。戈尔巴乔夫的心态不同于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他没有把所有资本家都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也没有把美国看成是未来的死对头。和谢瓦尔德纳泽一样,他已经把自己从意识形态的成见中解放了出来。“伪意识形态”已经让他的国家一穷二白了。^④美国应该被看作是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相应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也完全改变了。他说,让美军继续留在欧洲是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尽管他的部下可能对这样的观点嗤之以鼻,但他现在把北约当成让美国介入欧洲事务的工具,这将会为抵御统一德国的潜在力量上了一份保险。^⑤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问题上的想法有着长足的发展。这在他与科尔总理和外交部长根舍的会晤,以及和布什的会谈中显而易见。科尔 11 月 28 日在德国联邦议院的讲话已经让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但现在他之所以能与根舍展开激烈讨论,正是因为他认为他们间已逐渐建立了互信,尽管这种互信可能非常脆弱。然而,出于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同,以及戈尔巴乔夫对其重塑威胁观并寻求另一条历史道路的能力的自信,这种互信关系得以维系。“德国是可以信任的,”布什向戈尔巴

①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281。

② 出处同上,282—283;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273。

③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283。

④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90年4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90年4月26日,5—11,引自10。

⑤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33;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281—282;贝克,《外交政治》,234—239;科尔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1990年7月15日,REEAD 2669,国家安全档案。



乔夫保证，“德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有 50 年历史了，这一点不可忽视。”戈尔巴乔夫承认，德国人已经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邻国，不管它多么强大，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是能够抵制其军国主义的过去的。^①

科尔于 1990 年 7 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想要确定是否能达成一个协议，探讨统一的德国与正在迅速变化中的苏联之间的关系。北约领导人在几周前已经同意沿着更为政治化和防御性的路线来重组联盟，而且西方工业国家的政府也作出决定，如果东欧国家政府和苏联能够继续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他们将会提供信贷。因此，科尔现在比 5 月时的布什有更大的砝码来跟戈尔巴乔夫谈条件。但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也得到了巩固——至少暂时得到了巩固。在 7 月初的苏共第 28 届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的部下对他的政治改革予以支持，并重新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② 当科尔再一次与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几个月来前所未有的自信。

他的自信并不是自大。他和科尔情绪激昂地谈论着要逾越过去，消除长期存在的敌意。“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肩上，落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民身上，”科尔说道，“我们没有参与这场战争，……但我们不能忘却这场战争，我们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悲惨。”戈尔巴乔夫深表同意：“当今这代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随之而来的机会。我们这代人将会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种文明的孕育之下成长的。”过一会儿，他重复道，“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悲剧曾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中。……但是到我们面向欧洲的时候了，到我们走上与德国合作之路的时候了。”^③

戈尔巴乔夫在与科尔的谈话中重申了他对驻欧美军的新态度。他们可以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更何况北约国家已同意重组联盟，这让他高兴不已。“北约的转型是显而易见的，”戈尔巴乔夫说，“是按照一直以来所强调的政治方向进行的，这为摆脱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33, 516—522；关于戈尔巴乔夫和科尔于 1990 年 2 月 10 日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晤，参见赫斯特·特尔施克 (Horst Teltschik)，《329 天：从内部看统一》(329 Tage Innenansicht der Einigung)，柏林：席德勒出版社 (Berlin: Siedler)，1991，140；赫尔穆特·科尔，凯·迪克曼 (Kai Diekmann) 和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 (Ralf Georg Reuth)，《我要的是德国统一》(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柏林：普罗普里昂出版社 (Berlin: Propylaen)，1996，273；阿多迈特，《帝国跨越》，554—555；关于科尔与戈尔巴乔夫间关系的进展，也可参见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198—200, 223；在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中也有阐释，1989 年 6 月 14 日，REEAD 2902，国家安全档案。

② 马克·克拉默，“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及其对苏联的影响”(“The 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the Repercus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冷战研究杂志》7(2005 年冬)：27—39。

③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1990 年 7 月 15 日，REEAD 2669，国家安全档案；关于稍有出入的会议总结，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34。

历史的枷锁[迈出]了一大步。……西方国家不把苏联当成敌人了,这对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①

重新塑造国家形象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在国内有更大的机动空间,能够把更大的力气花在改革上,有更多回旋余地将资源从军事建设转移到各行各业中去。1990年4月,谢瓦尔德纳泽提醒他的同僚们,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就是“为国内改革创造最有力的条件”。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决不让外界环境阻碍到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②

这一态度使得戈尔巴乔夫决定了与科尔的谈判协议。他想保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转移国内批评界的注意力,获取经济援助,而最重要的,则是维系苏联步履维艰的经济改革。他同意了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作为回报,科尔承诺德国和北约将会遵照贝克几个月前提出的承诺:德国军队的规模将会受到限制;只要苏军在撤离前这三四年留在德国东部,北约的行动范围将只限制在前西德之内。德国将承诺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尊重现有的德波边界,而新的泛欧洲体制也将会用来确保欧洲共同家园的安全。德国还会向戈尔巴乔夫提供大量经济援助。^③ 戈尔巴乔夫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他不仅同意德国沿着资本主义民主路线进行统一,而且同意德国加入一个原本就旨在遏制苏联的联盟。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在我看来,苏联接受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便意味着冷战的终结。”^④

戈尔巴乔夫提前让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退出了国际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争,停止了在第三世界诸多不安定地区的争斗,接受了国内的自由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改革,也默许了东欧共产党政府的垮台,这一切都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苏联已无力也无心为人类的灵魂进行任何意识形态或军事上的竞争了。戈尔巴乔夫政府对国际事务采取了新措施,苏联的势力范围退缩到了战前的状态。不久,随着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原加盟共和国接连脱离苏联,其势力进一步被削弱。1948年,遏制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乔治·F·凯南评论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冷战便将宣告结束——如今已然发生了。

①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1990年7月15日,REEAD 2669,国家安全档案。

② 谢瓦尔德纳泽演说,1990年4月18日,对外广播新闻处,1990年4月26日,5—11,引自11。

③ 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1990年7月15日,REEAD 2669,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回忆录》,534;科尔,《我要的是德国统一》,418—440;特尔施克,《329天》,321—341;安杰拉·E·斯滕特(Angela E. Stent),《俄罗斯与德国的重生:德国统一,苏联瓦解,新欧洲》(*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134—150;阿多迈特,《帝国跨越》,524—528,539—555。

④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299。



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

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在历届苏联领导人中，要数他的思想转变得最为彻底。他开始感到资本主义对手并不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共产主义在国外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重建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上来。

如果他没有在华盛顿的谈判者身上找到共鸣，他不会这么坚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对结束冷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在于他所引起的恐慌，而在于他所激发出的信任感。在戈尔巴乔夫走马上任之时，他就获悉美国在重整军备上的努力已达到顶峰，极有可能受到其后的经济灾难、财政危机和政治偏见等牵制。^① 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畏惧于美国的实力或是里根对意识形态的狂热，但他却为总统的个人魅力、政治魄力和毁灭核武器的愿望所折服。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里根似乎想和我们建立某种私交。戈尔巴乔夫也写道，总统“在坚持自身信念的同时，也并不教条独断”。他想谈判，也想合作。最重要的是，美国人民信任他。戈尔巴乔夫深知如果和里根达成了协议，那将会非常稳妥。^②

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这位美国最知名的思想家交往的过程中施展了不少个人技巧。他竭力粉碎邪恶帝国的形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做到了。^③ 但由于里根不肯作出大幅度让步，所以实质性的进展往往都有利于美方。只是，由于这种外交手法赋予了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良好的形象，戈尔巴乔夫也就没有感到不满。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以找到机会转移苏联国内资源的利用，促进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典范。

戈尔巴乔夫想和里根的接班人继续打交道，对布什在1988年大选中的胜出表示欢迎。尽管他对布什的政策变更心怀怒意，但他们二人之间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布什不是像里根那样的思想家，他也没有同样的政治基础。但是戈尔巴乔夫欣赏他那谨慎稳健的举止。这位新总统不会揭戈尔巴乔夫的伤疤，言语间也没有浮夸或傲慢。“我控制自己的行为方式，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复杂，”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在柏林墙问题上阴晴不定。”戈尔巴乔夫接言道：“是的，我们已经看到这

① 雅克夫列夫，“里根”，1985年3月12日，REEAD 10867，雅克夫列夫集，国家安全档案。

② 谢瓦尔德纳泽，《未来属于自由》，81—86；戈尔巴乔夫，“一个愿意聆听的总统”，《纽约时报》，2004年6月7日。

③ 南希·里根，《轮到我了》，355—356。



一点了,对此‘感激不已’。”^①

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关系中热诚友爱的特点,更进一步,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间的融融暖意,都是以苏联在国内外的劣势为条件的。^② 他们有求于人。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冷战伊始,杜鲁门就说过,当美国的路程行进到 85% 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便会展开合作,现在事情真的发生了。戈尔巴乔夫并非为了赢得人心在全球竞争中进行角逐,他最向往的,是为苏联共产主义——现在被重新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真正承诺找一条重新振兴的出路。要达成这一点,他需要做的就是结束冷战。

① 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转变的世界》,164—165;切尔尼亚耶夫评论,收录于沃尔福斯,《冷战最后阶段》,48—49;帕拉琴科,《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194。

② 参见贝克的回忆录,《外交政治》。



结语

冷战并非预先注定，而是各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二战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约瑟夫·斯大林和温斯顿·丘吉尔纠缠于你争我夺的冲动，争执什么事情最先需要他们去做。他们彼此间互不信任。然而在战时会议上，他们作为同盟国还是竭力调和分歧，为胜利与和平出谋划策。随着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接近尾声，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包括缺乏教养、意见褊狭的杜鲁门和邪恶残暴、多疑妄想的斯大林，都意识到合作胜于对抗。他们的继任领导人也持同样的观点。

这样的合作意味着当核武器可能使战争变本加厉时仍能保持和平；意味着同心协力牵制惩办敌人，后者最终的死灰复燃不可避免，而且长此以往他们的行径将骇人到不可估量；也意味着共同调整战时经济，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莫斯科将会收到来自德国西部的赔款，还将会得到华盛顿的贷款，但条件是莫斯科必须接受建立在开放市场和民族自决基础上的自由和平。如果冲突能得以避免，军备竞赛也得以缓和，美苏领导人都将能够全心全意投入国内建设，把资金投资在社会需求上，这也正是他们各自的政策导向。斯大林和杜鲁门；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卡特；里根、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都从未怀疑过自己代表了组织起人类社会的两种方式。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排除意识形态的差异，认识到并追求共同利益。

然而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他们仍没能如愿以偿。这些领导人深囿于各自的观念和理想，受国际体制中潜在危险和机遇的百般困扰，因而冷战便持续了 40 年。他们的信念更是加重了他们的危机感，激发了他们做救世主的冲动。他们的辞



令和计划将国内选民都动员了起来，一些反对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也增加了权重，这使得他们更加步履维艰。国外，同盟国和附庸国经常在两极体制上下赌注，为了自身的利益操纵美苏两国，这使得两种力量更难放松敌对状态，重新调和关系。两国领导人虽然也经常关注共同利益，但仍成为了各自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麾下之臣，而非改革的代言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人，他重新构想了威胁的本质，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的复苏而不是国外的机遇。里根也是一位非凡出众的政治家，集内心信念、个人魅力和国内政治力量于一体，迫使对手作出让步，来保持自己国家的世界霸权并使其制度化。

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和苏联错综复杂的外交方式令冷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美苏领导人都认为各自代表了人类社会生存最优越的组织形式。克里姆林宫一直都打心眼里认为他们在改造人类社会，在根除人类的剥削。通过消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能把人类的贪念转化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计划经济将会取代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工人将不再任由雇主摆布，受压迫的人民也将不再屈从于皇室统治。共产党将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殖民地人民的大救星。历史的发展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平必将得到永存，公平正义必将得以实现，全人类必将得到解放。

白宫却对历史如何进展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旨在沿着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一个世界秩序。他们希望人民得到自由，市场加以开放。政党应该在代表公民利益的政府中展开权力竞争。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是人类进步和个人机遇的关键所在。上帝赋予人们自由的权利是他们一贯的观点。当然，如果没有自由，人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

关于人类的未来，美国和苏联的观点大相抵触，这与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不可分割。历史的记忆和意识形态的设想塑造了他们对威胁和机遇的不同看法。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领导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既摆脱不了你争我斗的局面，也无法抵御消灭意识形态敌手的诱惑。他们认为，自1917年以来，历史见证了资本家难以平息的敌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以及像德日那样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政府的仇恨。尽管苏联人民经历了无尽的痛苦与磨难，他们乌托邦式的试验还是得以存活，还被认为显示出了优越性。如果克里姆林宫继续保持警觉，历史的发展轨迹将预示着一个共产主义的辉煌未来。

和莫斯科的官员一样，美国的官员也受到了理想的激励和鼓舞，他们的观点受到了过往经历的左右。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过去证实了不论是法西斯主义、纳粹政



权还是共产主义,任何集权主义政府都有可能进行扩张,粉碎人类的自由之梦——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以及贸易自由。美国人已经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了经验,如果在国外的处境岌岌可危,国内的自由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一个极权主义的对对手掌控了人类资源、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和欧亚大陆的技术知识,并利用这些向美国的生活方式发起挑战的话,美国便不会有安全感可言。

国际环境将危险和机遇同时摆在了莫斯科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面前。在欧洲,多年来的萧条、战争、种族灭绝等遗留下的苦难是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将近四千万人在战争中丧生,然而枪声虽已悄然,苦难仍在蔓延。对于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饥饿、痛苦、骚动、混乱,这些才刚刚开始。欧洲人民急切渴望一个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为此进行着激烈有力的竞争,尤以法国和意大利为甚。斯大林并没有因自身的残酷无情而名声受损,反而因为战时的胜利而声名鹊起。欧洲人民想要改革与安全,想要安宁与和平。“他们已经遭受了太多的罪,”迪安·艾奇逊说,“他们会要求国家调控和国家干预起到更大的作用。”^①对于斯大林来说,西欧的机遇正在向他招手;而对于杜鲁门来说,那无疑是祸患——并不是害怕苏联军队会挺进大西洋沿岸,而是担心意志消沉的人们可能会选择另一种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社会。

当美国官员在为西欧政治结构的形成忧心忡忡之时,斯大林对东欧版图也保持着警惕。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总有一番抢掠。他们的强盗行径加剧了俄国与多个邻国间本就存在的不信任。苏联类似的行径往往遭到反感;活生生的经历与乌托邦式的幻想大相径庭。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人为数甚少;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东德,他们几乎没有在自由选举中胜出的机会。若在这些被占领的土地上举行自由选举,是几乎不可能建立亲苏联的政府的。这些国家过去曾支持过苏联的敌国,将来也有可能重蹈覆辙。就连苏联的附属国和代理国也都是墙头草,随时都可能向资本主义卑躬屈膝,马歇尔计划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被资本主义侵扰的世界上,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难以控制他们频于斗争的本性,也难以抵挡包围挤压、甚至粉碎斯大林重组人类社会这一乌托邦幻想的诱惑。他认为战后苏联对东欧和中欧其他国家的占领,为苏联提供了一个进行深度防御的机会,正如美国认为他们的安全防线一直延伸至大洋彼岸,包括西半球所有国家在内一样。^②

① 艾奇逊证词,1945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与货币委员会,《布雷顿森林协议》,1:35。

② 强调斯大林对安全的关注的近期论述,参见托尼·朱特,《战后:1945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117—121。



在德国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国家安全不能依仗他国。国际力量的分配取决于德国的未来。关于这一点,美苏领导人均无异议。几十年来,他们都认为如果放任德国自行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会变得不可信任。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对德国力量心怀畏惧;从杜鲁门到布什,他们都代表西方国家对德国力量进行了牵制。当柏林墙似乎解决了德国问题之时,当两德主权——一为资本主义民主,一为共产主义——得到承认之时,欧洲的紧张局势得以缓解;1975年的《欧安会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赫尔辛基宣言》减轻了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担忧,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极大地缓和了国际关系,在苏联看来,它值得让他们付出同意重新考虑人权合法性问题的代价。此后,苏联领导人便能够集中注意力商讨战略武器协定,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但令他们懊恼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同志们发现,《赫尔辛基宣言》中关于人权的条款对其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远比解决德国问题会面临的威胁要大得多——这很好地解释了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如何被埋葬在对过去的恐惧中,而不是建立在对未来的理解之上。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官员也是如此。在《赫尔辛基宣言》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结束后,他们的担忧并未减退,冷战也并未结束。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和第三世界的政治骚乱仍令他们无比忧惧。苏联在非洲之角、波斯湾及亚洲西南部的斩获所带来的威胁如梦魇般缠绕着他们;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说,地球的这一端环绕着一条危机带。如果美国没有平息地区动乱并阻挡苏联侵袭,西方国家将无法控制石油等重要资源和其他原材料,西欧和日本的工业也将面临危难。随着五六十年代经济进程的停滞——廉价石油消失,失业率攀升,通货膨胀加剧——社会安宁有瓦解迹象,就像《时代》杂志所提出的,人们很想知道:“资本主义能继续存活吗?”^①

克里姆林宫的元老们大受鼓舞。体制上的条件似乎在肯定他们关于历史发展轨迹的观念。尽管他们的社会进步比过去要慢,但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正经历的痛苦,他们振作了起来。7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共产主义在欧洲甚至有过转瞬即逝的获胜希望,那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推翻了各自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府,左派政党为夺权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欧、亚、非、拉美人民似乎又一次奋起斗争。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印度支那、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也门发生的动荡也令克里姆林宫激动不已。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新任领导人在他们的莫斯科庇护人面前卑躬屈膝,滔滔不绝

^① “资本主义能存活吗?”,《时代周刊》106(1975年7月14日):52—63。



地谈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那些上了年纪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理论家那里诱取更多援助,而后者正看准机会想要再次进行革命。

冷战贯穿了六七十年代始终,究其原委,是这些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掀起动荡,地区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莫斯科产生了过高的希望,同时也引起了华盛顿的过分恐惧。在莫斯科,军工部门的官员和政治理论家们都迫切希望能利用好新出现的机会,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多年来也埋首于石油美元之中,用以支持在海外的一系列行动。他们在遥远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门等地部署军队,派遣特工,赋予代理人以权力。在美国,政界对苏联的海外行动普遍抱有反对情绪。心怀不满的自由党人——他们很快会成为新保守主义的先驱——联合了传统保守派团体、东北部的少数民族工人、南部和西南部的国防工业家和企业家以及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这些商业、民族、宗教团体几乎没什么共同点,但此时他们都惧怕苏联的实力,都反感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都认为美国政治出现了一股错误的自由之风,希望把美国政治拉回正轨。他们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重新壮大其军事实力。“耶稣不是娘娘腔”出自杰里·福尔维尔(Jerry Falwell)之口,他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所谓“道德多数派”领导者。对于这些团体——以及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来说,同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作斗争,保护传统文化,抑制政府过于庞大,巩固商品、资本、人力得以通畅流转的全球经济的基础,这些都与美国在国外“为争夺人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①

在莫斯科和华盛顿,那些政客、官僚、军工部门官员和政治理论家们的希望与恐惧掩盖了国际局势的潜在趋势。在美国、日本、西欧,深刻的科技发展使资本主义在潜移默化中转型。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削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也给莫斯科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这同时还转移了国际视线,使人们不再那么关注美国、日本、西欧深刻的科技变革,而正是那些变革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电子学、微处理器、制药、生物技术等正建立起以知识为基础的各项产业,这不仅会为美国的生产力重新注入活力,还会革新美国的军事力量。然而,在20世纪

^① 弗雷德·哈利迪,《冷战第二阶段之风云》(*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伦敦:韦尔索出版社(Verso),1983,104—133,引自116;关于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参见加里·多润(Gary Dorrien),《新保守主义思潮: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之争》(*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费城,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93;默里·弗里德曼(Murray Friedman),《新保守主义革命:犹太人知识分子与公共政策的制定》(*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70年代,美国看起来多少有点脆弱。经济停滞不前,相对军事实力有所削弱,联盟状况很不可靠,在第三世界的地位更是空前低下。

全球的发展似乎都在朝着有利于莫斯科的方向进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大范围远离民主的现象十分明显。”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道。^①在谈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抱负时,苏联的领导人充满自豪。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第25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世界在我们眼前改变,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从不为人类所知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危机、经济稳定增长的社会。……一个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引导下的社会,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社会,一个拥有光辉共产主义前景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未来将会取得全面的进步。”^②

但苏联领导人永远也不应放松警惕,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伺机挫败苏联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阻挠历史的发展轨迹。美国曾试图阻挠印度支那的革命力量,结果失败了。伊朗国王被推翻时,帝国主义随之遭到驱逐;而在拉丁美洲,帝国主义也受到了桑地诺政府的挑战。即便如此,美国还是密谋与反叛苏联的中国一起包围苏联,还计划派遣人员进入阿富汗——1978年的人民民主革命已使阿富汗当局深陷无能、镇压和腐败的局面。由于苏联嗅到了威胁,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趋于缓和的关系再次紧张。苏联之所以派部队到阿富汗,不是因为想要攫取波斯湾的石油,而是怕受到包围。如果喀布尔的共产主义运动被颠覆,那么还能阻挡得了反动的势力吗?

意识形态决定人们的观念——这是冷战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不断被强调的恐惧与机遇,是对美苏利益关系理性判断的歪曲。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从恐惧逐步走向机遇。美国官员察觉到克里姆林宫变得更加脆弱了。苏联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③苏联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在逐渐消失,中国已经将其摒弃,几乎各地的“革命风尚”都在消逝之中。“对革命的失望在拉美、中东、非洲、亚洲蔓延开

①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诺曼: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出版社(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21。

② L·I·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及全党在国内外政策中的紧迫任务》,《信息简报》——特刊第1期,多伦多:进步图书出版社(Toronto: Progress Books),1976,5,103。

③ 菲利普·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1945年以来的苏联经济史》,伦敦:培生教育出版公司,2003,5,241—253。



来,人们不再坚守革命的理想——社会主义。”^①比如在印度,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被指为导致效率严重低下的罪魁祸首。当亚非的第一代民族主义革命领袖纷纷离去,“反殖民与民族主义情绪”声势俱下,新上任的领导人乐于开放经济,向西方学习。^②由政府发动的“人海战术”计划惨败,比如毛泽东对重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诸多尝试,使更多人意识到“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某种社会状态……[是]对人民福祉的致命威胁”。^③在西方学者看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和苏联战胜纳粹的英雄之举所带来的希望在近二十年后终于消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巴黎和伦敦求学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所接受的思想已和上一代人大相径庭。^④

苏联专家和官员的机密报告推翻了苏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乐观情绪,特别是在1980年到1981年波兰危机期间。当时波兰人民已显然无法容忍共产主义政府了,他们要求变革。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捍卫人权而斗争,将教会视为自由与良知的守护者。教皇1979年6月的波兰之行吸引了大量目光。他宣称:“无论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都不能把基督与人类历史分隔开来。”聚集在华沙胜利广场的人群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⑤

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才不想要上帝呢,但他们也明白主教的声望以及人们对团结工会的狂热。苏联政府担心波兰的运动“令苏联工人产生躁动……进而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自由以及独立的贸易联盟”,苏联政府知道必须对团结工会加以阻挠。同时,苏联政府也知道武力入侵太过劳民伤财,于是策划让波兰政府强制实行军事戒严,但共产党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的统治再也不如以前了。^⑥

① 福雷斯特·D·科尔伯恩,《贫穷国家的革命风潮》,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89,14。

② 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印度经济自由化的政治”(“Politic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India”),《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17,第3期(1989):307。

③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看作一个国家:一些改善人类环境的计划是如何落空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7。

④ 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法国知识界反对左翼分子:20世纪70年代反极权主义时刻》(*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纽约:波尔干图书出版社(Bergahn Books),2004;科尔伯恩,《贫穷国家的革命风潮》。

⑤ 迈克尔·多布斯,《与老大哥一起走下坡路:苏联帝国的沉沦》,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普夫出版社,1997,92—93;朱特,《战后》,586—587。

⑥ 引言参见马克·克拉默,“苏联在波兰危机中的考量,1980—1981”(“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 1980—1981”),冷战国际史项目,第1号特殊工作文件,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1999,25—26;朱特,《战后》,585—586ff。



然而，政府食言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相对美国而言有所增长，人均产值从美国的1/4上升到了1/3多一点，但到1980年，苏联的经济已经衰退。而与此同时，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都缩小了与美国人均产值的差距，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优于苏联模式。^①

对苏联人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明显下滑。20世纪60年代末，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也在此时达到顶峰，透支率高达5%左右。70年代中期，虽然多数苏联人民（74%左右）认为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政府在社会建设上的花费——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已经锐减；很快，政府在教育 and 医疗上的花费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要求。食物供应也没有多大改观。相比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或日本人民，苏联人民面包土豆吃得多，鱼和肉却太少。工人们已经开始表现出不满情绪。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通常被禁止的工人罢工也比以往“更广泛、更频繁”，特别是在高尔基（Gorky）、陶里亚蒂（Togliatti）、车里亚宾斯克（Cheliabinsk）的大型汽车制造厂。许多苏联人民之所以愿意接受或默许一党专政和政府集权，图的是能有就业保障、医疗、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更公平的生活条件。当政府无法实现人民的愿望，不满情绪自然会滋生。^② 克里姆林宫已无法赢得人民的信任，它也无能为力再为争夺人心而斗争了——冷战的又一启发。

对于这种日渐增长的消沉状态，戈尔巴乔夫心知肚明。他不愿缩减苏联的军事力量，但他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在苏联国内赋予共产主义新的内涵，这样才能让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具有吸引力。为此，他必须把资源从军事转向国民生产，过去当他

① 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244—245。

② 关于苏联人民对他们的生活环境的观点，参见伊莲娜·勃尔腾科（Irene A. Boutenko）和基里尔·E·拉兹洛科夫（Kirill E. Razlogov），《俄罗斯近期社会的发展趋势，1960—1995》（*Recent Social Trends in Russia, 1960 - 1995*），蒙特利尔：麦克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330；关于消费数字，出处同上，235；尤其是哥特鲁德·E·施罗德（Gertrude E. Schroeder），“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Soviet Living Standard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收录于《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赫尔斯特·赫勒曼（Horst Herlemann）（编），博尔德，科罗拉多州：西景出版社，1987，16；关于工人的期待和觉醒，参见库克，《社会契约》，19—93；关于背景，也可参见亚历克斯·英克勒斯（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A. Bauer），《苏联公民：在一个极权社会的日常生活》（*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377—398。



们面对强敌包围的威胁时，这种做法是无法想象的。^① 改变冷战时期的零和游戏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他最伟大的成就。苏联不能再对敌人的威胁过分紧张，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个看法；这也需要他本人在如何看待威胁的问题上有一个巨大的态度转变。

大致说来，戈尔巴乔夫觉得苏联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并不是来自资本主义敌对国；而是来自共产党官员、经济管理者和心灰意冷的工人，内部威胁远比外部威胁更致命。死板僵化的控制、平均分配的体制、嗜酒成性，这些都消磨了个体创造力，降低了生产力，妨碍了国家计划体制发挥其应有的潜力。当他决定要调整军事装备的时候，他已发现自己对国家的江河日下感到恐惧。他说：“包围我们的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更为先进的经济制度。”^②

虽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他对威胁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看法，他却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不过没必要将资本主义视为不可和解的仇敌，也没必要认为美苏的经济冲突比美苏的共同利益更加重要，就是这样的共同利益，将美国与其对手联系在了一起，与社会主义经济体也同样联系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感受到，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越了阶级限制。

戈尔巴乔夫并非孤立无助，但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个人层面的。身为一个独裁政党的总书记，他可以称得上是只手遮天。戈尔巴乔夫在国际政治中摒弃意识形态问题，任由柏林墙倒塌，同意德国统一，反对向苏联内部那些分离主义共和国动用武力，结束非洲南部和中美洲的地区争端，当他作出这些对未来影响重大的决定时，他很少征求政治局的意见，也很少咨询国防委员会。他也会的确会同专家、顾问、官员商讨，但多为临时召集，也没有繁杂的过程和详细的方案。他总是坐立不安。与其贯彻严格的政策，他宁可坚持自己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即使这种判断在一开始非常模糊，但随着他前行跋涉，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朗。

虽然戈尔巴乔夫是总书记（后来成了总统），但他的地位并非坚不可摧。马林

① 他还想利用军事部门来为民用生产服务。参见布鲁斯·帕罗特(Bruce Parrott)，“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国家安全”(“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Gorbachev”)，《共产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37(1988年11月—12月):1—36;同时参见克利福德·G·加迪(Clifford G. Gaddy),《历史的代价:俄罗斯与军事化经济后遗症的搏斗》(*The Price of the Past: Russia's Struggle with the Legacy of a Militarized Economy*),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1996,47—48。

② 引自加迪,《历史的代价》,49。



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也曾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因为这些人在他看来只是离经叛道之徒，却吸引了太多的目光。对苏联镇压人民的指控让戈尔巴乔夫大为光火，他认为这些指控都不属实，只是属于过去那已经被否定了的斯大林时代的。当戈尔巴乔夫从克格勃处得知政治犯人数（大约只有 250—300 人），他一点也不介意和里根、舒尔茨争辩各自制度的优点。^① 不变的是，里根和舒尔茨始终以一种带着技巧与尊重、但又十分有利的方式让戈尔巴乔夫时刻铭记着苏联的社会主义现状和政府承诺之间的差距。

里根在意识形态上的激情在结束冷战这一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这让他对自己所信仰的生活方式充满信心。里根的前任们也相信民主资本主义适合美国，代表了政治经济的最佳制度，但他们不确定别人是否也怀有同样想法。共产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国家规划、国有工业、马列主义的辞令、民族主义的革命热情，这些都让他们始终心存芥蒂。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断变化，里根的信念紧跟处于动态中的国际现状。舒尔茨常常就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科技创新的速度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计划经济永远也跟不上信息通信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有民主社会下的自由人民，在自由市场和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才能利用先进的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当钢铁和煤产量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基准时，也许计划经济和国有工业会取得瞩目的成绩，但如今，电子学、计算机、数据处理、生物技术等已经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生产的概念。在非殖民化时期，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也许会受到民族主义革命人士的青睐，共产主义辞令也还能吸引那些战后沮丧、饥饿的欧洲人，但如今，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里根曾宣布全世界的人民都发现“民主

^① 关于政治犯的讨论，参见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1986 年 9 月 25 日，国家安全档案。里根在雷克雅未克提出人权问题以后，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同僚们坚持要规划一个人权观，并允许持不同政见者——“愤青”——那些没有构成安全威胁者离开。参见切尔尼亚耶夫对政治局会议的记录，1986 年 11 月 13 日，REEAD 2951，国家安全档案。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峰会中关于人权问题的交涉，参见切尔尼亚耶夫日记中记录的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的论述，1987 年 12 月 17 日，REEAD 2940，出处同上。国际特赦组织代表 1986 年苏联 530 位良心犯，但实际数量可能要大得多。参见《国际特赦组织 1987 年的报告》（*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7*），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1987，320。1989 年的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仍有 140 名良心犯，他们中大部分将成为移民，而且自从 1987 年以来已有 374 名予以释放。参见《国际特赦组织 1989 年的报告》（*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9*），纽约：国际特赦组织美国总会，1989，237。



是最好、最有成效的制度”^①。

里根相信,如果可以选择,谁都会选择个人自由、私募市场以及创业机会。就这一点来讲,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他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显然他为全人类的灵魂带来了救赎。因此,他既不怕与对手竞争,也不怕与对手谈判。况且,他心里清楚美国人民对他充满信任,知道他不会背叛他们的利益或理想。里根可以放心地与邪恶帝国斡旋,而不必担心有反对党的指责,也不必担心保守派的批评。与杜鲁门不同,他所面对的国会并不受控于恶毒的反共产主义反对党;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用对付麦卡锡主义带给美国的政治风气;与肯尼迪和约翰逊不同,他不用担心国内政策会由于外交政策的软弱而受到不良影响;与卡特不同,他不用担心别人指责他鲁莽。里根可以带领美国人民接受冷战的落幕——当然,是由美国来开条件的。

里根留下了颇具启发性的思想。他相信要靠实力说话。美国强大的实力浇灭了敌人的野心,粉碎了敌人的美梦。但发挥实力的目的是为了谈判。甚至就在他谴责一个邪恶帝国的暴君之时,他也主动开展谈话。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里根让美国人民想象一个场景,当伊万和阿妮娅在候车室里偶遇吉姆和萨莉,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为各自政府的差异争论不休吗?”还是会谈论他们的爱好、孩子和事业?所有人“都想在一个没有恐惧与战争的世界中抚养自己的孩子”,里根说,“人们都希望能有超越物质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有意义。人们希望能有门手艺,做点生意,希望有一个能带给自己成就感和价值感的职业。人类的共同利益能跨越任何界限”。^②

里根认为,领袖应该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付出努力。“不喜欢对方的制度并

① 关于里根的引言,参见“告别演说”,1989年1月11日,《里根:总统公开文件,1988》,1720;关于舒尔茨,参见乔治·舒尔茨,“在一个充满改革的时代中的国家成功和国际变革”(“National Success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 in a Time of Change”),3,1987年12月4日,《当前政策》(Current Policy)1029,公共事务局,美国国务院;舒尔茨,“一手好牌:美国领导体制和全球经济”(“The Winning Hand: American Leadership and the Global Economy”),1988年4月28日,《当前政策》1070,出处同上;舒尔茨,“国际变革气候”(“The Ecology of International Change”),1988年10月28日,《当前政策》1120,出处同上;乔治·P·舒尔茨,《骚乱与胜利:我任美国国务卿的岁月》,纽约:查尔斯·斯克莱布诺家族出版公司,1993,586—587,712—716,887—893。诸多学者认为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缺乏创新性和竞争力。参见,如,汉森,《苏联经济的沉浮》,240—255;查尔斯·梅尔,《瓦解:共产主义的危机和东德的终结》,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59--107;丹尼尔·奇洛特(Daniel Chirot),“1989年的东欧怎么了”(“What Happened in Eastern Europe in 1989”),收录于《1989年之革命:改写历史》(The Revolutions of 1989: Rewriting Histories),弗拉基米尔·蒂斯马内奥(Vladimir Tismaneau)(编),伦敦:罗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9,20—26。

②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致辞”,1984年1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4》,44。



不能成为拒绝谈话的理由，”他说，“身处这样一个核时代，意味着我们必须谈。”^①在他寻找谈话机会的同时，他还发现敌人的恐惧并非伪装，敌人的愿望有时也与里根的一致——比如废除核武器。^②抱着耐心和决心，伴着尊严和风度，里根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同时也坚守了自己的信念与理想。1988年6月2日，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请向苏联人民转达来自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深切友谊。”^③几个月后，在他对美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他建议：“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但同时我们也要继续协作，减少对立，消除猜忌。”^④

里根最精明的见解体现在他认识到，唯有拥有优越的制度才能赢取冷战的胜利，这种制度能满足人们对生活舒适、环境平和、言论自由、宗教虔诚、个人发展的追求。二战结束以后，关于民主资本主义是否有能力避免另一场经济萧条、维护和平、满足亚非各国对独立自主的渴望，还是一个未知数。冷战正好检验了两种不同制度的统治模式应对后殖民与后工业时代挑战的能力。

美国在冷战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在于，领导人在与苏联斡旋时能随时保持耐心与谨慎。虽然在危险逼近或机会出现的时候，意识形态和历史经验会让领导人强化危机感并且反应过激，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威胁让军事大国之间的任何冲突都变得欠缺明智。他们也认识到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亚欧各国间建立起有利的相互关系——并且远离战争。在这一点上，战后初期的美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美国领导人小心地权衡了利益关系，重建德国和日本，帮助西欧恢复建设，促成了北大西洋军事联盟，避免了卷入中国内战。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情况就有所不及了，对革命民族主义和局部动荡的恐惧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合理认识。美国领导人总是担心敌人会在某一场危机中趁火打劫，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伺机下手，或是缩减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因此他们生产并存留了超出美国需求的核武器，卷入耗竭美国资源的冲突（比如越南战争），支持那些蔑视美国理想的独裁者（比如伊朗国王）和叛乱分子（比如阿富汗的人民圣战者组织）。诸如此类的冷战政策并未明显削减美国对付弱小对手的实力——比如在阿富汗，美国的政策确实在短期内使美国受益——但这些政策却令亚、非、拉千百万人民不得不遭受巨大的痛苦，他们的国家当时还在为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而苦苦挣扎。

① “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致辞”，1984年1月16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4》，42。

② 保罗·莱托，《罗纳德·里根和他寻求废除核武器的努力》，纽约：兰登书屋，2005。

③ “苏美峰会后的讲话，1988年6月2日”，《总统公开文件：里根，1988》，715。

④ “告别演说”，1989年1月11日，《里根：总统公开文件，1988》，1721。



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样,美国领导人心里也知道,他们的国家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最终还是要看这个制度能否为人民带来安全保障、机会和高品质生活。而与苏联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还要善于应付已然根深蒂固的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进程。在冷战的关键时期,公众的意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主观臆断的——和立法倾向使总统在努力调节冲突、缓和对立时面临更复杂的情况。但在冷战末期,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情况有了180度的转变:国会严格控制了国防和情报机构,因为它认为里根在国防上的开支过多,夸大了星球大战计划的价值,对出现在拉美的共产主义威胁反应过激,还认为里根事实上已违反了法律(如在伊朗门事件中)。虽然里根对此非常愤怒,但法律限制却很有可能会有助于他与克里姆林宫的交往:他的军备计划和干预政策其实已经让戈尔巴乔夫的敌人占了上风,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更难达成自己的目的了。

既然如此,冷战结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便在于苏联领导人了。里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戈尔巴乔夫才是促成变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马列主义曾对国际关系里威胁和机会的性质下了定义,戈尔巴乔夫已经超越了马列主义这一假设,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他用自己的职权缩减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而这在他的前任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他认识到核武器如何改变了苏联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而经济上的弊端则要求政府重新审视什么才是苏联的当务之急。他的前任们偶尔也会触碰到这些问题,但他们对威胁和机遇的看法始终未变,而他们始终如一的使命感也令他们无法改向开拓新的大业。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外部威胁很小,外部机遇更少。在他看来,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社会主义民主化,使之更有利于苏联人民。不幸的是,他的努力失败了,但他终于认识到,保障人民的福祉和赋予人民对自己命运的决定权,这远比向全世界鼓吹苏联生活方式重要得多。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了维护国内的集权统治而对外树敌。相反地,他需要的是友好的政府和外国的援助,以支持社会主义的复兴大业。对他而言,世界各国各政治集团对立的真正缓和,将会是基于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这种复杂的关系把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而当盟军1945年在易北河(Elbe River)会师时,当斯大林和杜鲁门初次思考战后全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时,这样的联系尚不可想象。



参考书目

United States Archival Materials

MANUSCRIPT COLLECTIONS AND ORAL HISTORIES

- Kenneth Adelman Interview, Ronald Reagan Oral History Project, 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a.
- James Baker Interview, Reagan Oral History Project, Miller Center
- James F. Byrnes Papers, Clemson University Library, Clemson, S. C.
- Jimmy Carter Interview, Carter Presidency Project, Miller Center
- Joseph Davies Dia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 John Foster Dulles Papers, Seely G.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 J.
- James V. Forrestal Papers, Mudd Library
- W. Averell Harri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 Emmet John Hughes Diary, Mudd Library
- George F. Kennan Papers, Mudd Library
- William Leahy Diary, Library of Congress
- George Shultz Interview, Reagan Oral History Project, Miller Center
- Henry L. Stimson Diary, Sterling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 Record Group 56, Records of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 Declassified Documents from Secretary Dillon's and Fowler's Classified Files, MLR No. 198G
- Office Files of Secretaries and Undersecretaries, 1932 - 1965, Files of Henry Fowler, 1961 - 1964, MLR No. 198F
- Record Group 59,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 Papers of Charles E. Bohlen, Lot 74 D 379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ubject Files, 1945 - 1960, Lot 58 D 776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Lot 78 D 394



***** 人 心 之 争 *****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Lot 87 D 337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1949 - 1959, Lot 60 D 403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1950 - 1959, Lot 58 D 528
-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 of the Director, 1949 - 1955, Lot 59 D 27
- Records of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61 - 1963, MLR 3063A
-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1947 - 1953, Lot 64 D 563
-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1962, Lot 69 D 121
-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ot 66 D 95
-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 and the NSC, 1947 - 1953, Lot 66 D 148
- Records of State/JCS Meetings, 1959 - 1963, MLR 1604
- Records of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1961 - 1963, MLR 3055A
- Records of the 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Subject Files, 1961 - 1963, HM 1993
- Record Group 107,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War, Robert P. Patterson Papers
- Record Group 165, Records of the War Department General and Special Staffs, Records of American-British Conversations
- Record Group 218,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 Geographic Files
 - William Leahy Papers
 - Arthur Radford Papers
 - Maxwell Taylor Papers
- Record Group 273, Record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Record Group 319, Records of the Army Plans and Operations Division
- Record Group 330,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End of the Cold War Collection

PRESIDENTIAL LIBRARIES

Harry S. Truman Library

Clark M. Clifford Oral History

Matthew J. Connelly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Library

Ann Whitman File, Cabinet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iary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Dulles-Herter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International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Legislative Meetings Series

Ann Whitman File, NSC Series

Papers of John Foster Dulles, Telephone Conversation Series



- Papers of John Foster Dulles, White House Memo Series
- Papers of C. D. Jackson, 1931 - 1967
- Records of C. D. Jackson, 1953 - 1954
- White House Memo Series, General Foreign Policy Subseries
- White House Office, NSC Staff: Papers, 1948 - 1961
 -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Central Files
-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 Administrative Subseries
 - Briefing Notes Subseries
 - Policy Paper Subseries
 - Status of Projects Subseries
 - Subject Subseries
- John F. Kennedy Library
 -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 McGeorge Bundy Correspondence
 - France-General
 - Meetings and Memoranda
 - Staff Memos
 - Standing Groups Meetings
 - United Kingdom
 - U. S. S. R.
 - Papers of Theodore Sorensen
-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 Cabinet Papers
 -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 Agency Files
 - McGeorge Bundy Files
 - Douglas Cater Files
 - C. V. Clifton Files
 - Committee Files, Committee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 Country Files — USSR
 - Head of State Files
 - Intelligence File
 - Spurgeon Keeny Files
 - Robert Komer Files
 - Meetings
 - Memos to the President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 Special Head of State
 - Papers of George Ball
 - Papers of John McCone
 - Papers of Bromley K. Smith
 - Vice President Security File
- Jimmy Carter Library



***** 人 心 之 争 *****

Zbigniew Brzezinski Collection
Chief of Staff Papers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Staff, Horn/Special
Plains File
James Schlesinger Oral History
Vertical Files
China
U. S. S. R.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Countries

Ronald Reagan Library
Coordinating Office: NSC Records
Executive Secretaria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untry
Executive Secretaria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ad of State
Executive Secretaria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s
Executive Secretariat,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ystem Files
Executive Secretariat,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s
Papers of William Clark
Papers of Donald Fortier
Papers of John Lenczowski
Papers of Richard Linhard
Papers of Jack Matlock
Papers of Colin Powell
Presidential Briefing Papers

PRESIDENTIAL TAPES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Project, Miller Center
Lyndon Baines Johnson,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Project, Miller Center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http://foia.state.gov/SearchColls/CollsSearch.asp>.

RUSSIAN, EAST EUROPEA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ARCHIVAL MATERIAL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Washington,
D. C.

Document Collections and Oral Historie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organized by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the Council of European Stud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at Yale University, 23 – 26 September 1999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Its Precondition, Course, and Immediate
Repercussions, 1987 – 1989,”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ague, 14 – 16 October 1999,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the Czechoslovak Documentation Centre, and
the (Czech)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参考书目

- “Documents from the ‘Other Side’”: A Document Reader Compil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Mao Era, 1948 – 1976,”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and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8 October 2004
-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New Thinking’ and New Evidence,” a Critic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1 – 3 May 1998
- “Poland: 1986 – 1989: The End of the System,” Miedzyszyn-Warsaw, Poland, 20 – 24 October 1999,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9 – 199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une 12, 1999, Budapest,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Cold War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Budapest),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1979 – 1989,” organized by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29 – 30 April 2002

LAMONT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RGANI), “Plenumy Tsentral’nogo Komitet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iuz, 1941 – 1990,” *fond 2, opis’ 1* [Russian State Archiv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Plenum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 – 1990,”] collection 2, catalog 1, Microforms, Film A1059
- Ross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RGANI), “Obshchii otdel TsK KPSS, 1953 – 1966 gody,” *fond 5, opis’ 30*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1953 – 1966,”] collection 5, catalog 30, Microforms, Film A1046
- Ross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RGANI), Otdel TsK KPSS po sviaziam s inostrannymi Kompartiiami (Mezhdunarodnyi otdel TsK KPSS), 1953 – 1957 gody,” *fond 5, opis’ 28*, [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for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1953 – 1957,” collection 5, catalog 28], Microforms, Film A1050

MI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ranslation of Vladimir Malin’s notes of the Presidium Meetings, in A. A. Fursenko (et al.), ed., *Prezidium TsK KPSS, 1954 – 1964: Chernovye protokol’nye zapisi zasedanii, stenogrammy, postanovleniia* [The Presidium of the CC of the CPSU, 1954 – 1964: Draft Records of Session Proceedings, Stenographic Transcripts, Resolutions], vol. 1 (Moscow: ROSSPEN, 2003). Accessible on the Internet at <http://millercenter.virginia.edu/scripps/digitalarchive/kremli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Anatoli Chernyaev Collection
Russian Archives Documents Databas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Archives Database

The September 11 Sourcebooks

Dmitri Volkogonov Collection

Aleksandr Yakovlev Collection

Zoltoi fond

Oral History and Conference Documents Collections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U. S. -Soviet Relations, 1977 - 1980,” a Conference of Russian and U. S. Policymakers and Scholars, Fort Lauderdale, Fla., 23 - 26 March 1995, sponsored by the Carter-Brezhnev Project, Thomas J. Watson Institute, 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Fall of Détente.” Ed. David A. Welch and Odd Arne Westad. Trans. Svetlana Savranskaya. Nobel Symposium, Oslo, 17 - 20 September 1995, organized by 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Moscow End of Cold War Conference: U. S. -Soviet Military and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8 - 1991,” organized by the Mershon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15 - 17 October 1999

“New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Budapest, 31 October - 1 November 2003,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and the Cold War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Budapest)

“SALT II and the Growth of Mistrust,” a Conference of Russian and U. S. Policymakers and Scholars, Musgrove Plantation, 6 - 9 May 1994, St. Simons Island, sponsored by the Carter-Brezhnev Project, Watson Institute, Brown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0 - 1987,” an oral history conference. Ed. Nina Tannenwald. Watson Institute, Brown University, May 7 - 10, 1998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Oral history, “U. S. -Soviet Relation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in the 1970s”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

Published U. S. Government Document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Vol. 2, 1979.

—. Subcommittee on Priorities and Economy in Governm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1979*. 96th Cong., 1st sess., 1980.

SENATE

Appendix to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93.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 79th Cong., 1st sess., 1945.



参考书目

——.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Agreement*. 79th Cong., 2nd sess., 1946.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ogether with Joint Sessions with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Historical Series)*, 17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EXECUTIVE BRANCH

Cabinet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 *Current Policy*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s. 2,3,5,1972.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s. 2,3,5,1973,1974,1975 – 1976.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s. 2, 5, 7, 8, 12, 14, 1984, 1983, 1986, 1988, 1984, 1985.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 – 1963*. Vols. 5 – 8, 11, 13, 15, 1998, 1996, 1995, 1996, 1997, 1994, 1994.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 1968*. Vols. 1, 2, 10, 11, 13, 14, 15, 17, 21, 27, 31, 1992, 1996, 2002, 1997, 1995, 2001, 1999, 1996, 2000, 2000, 2004.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Berlin (Potsdam), 1945*. 2 vols., 1960. Nelson, Anna Kasten, ed.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s*. Vols. 1 – 3. New York: Garland, 1983.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de, 1963 – 1973*.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7 – 1976*.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 C. : 197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ystem
 Steury, Donald P., ed.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Estimates on Soviet Strategic Forces, 1950 – 1983*. Washington, D. C.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6.

White House

Bush, George H. W.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89*. Washington, D. C. : GPO, 1990.
 Carter, Jimmy.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77, 1978, 1979, 1980*. Washington, D. C. : GPO, 1977, 1978, 1979, 1980 – 1981.
 Eisenhower, Dwight D.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53*. Washington, D. C. : GPO, 1960.
 Johnson, Lyndon Baine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64, 1965*. Washington, D. C. : GPO, 1965, 1966.
 Kennedy, John F.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61, 1962, 1963*. Washington, D. C. : GPO, 1962, 1963, 1964.
 Reagan, Ronald.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7, 1988*. Washington, D. C. : GPO, 1982, 1983, 1984, 1987, 1988, 1989, 1990.
 Truman, Harry S.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1945, 1947, 1949, 1952 – 1953*. Washington, D. C. : GPO, 1961, 1963, 1964, 1966.

Magazines and Periodicals

Argumenty i fakty



***** 人 心 之 爭 *****

-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Bulletin*
-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 Current History*
- Istochnik*
- New Republic*
- Newsweek*
- The New York Times*
- Pravda*
- Time*
- U. S. News & World Report*
- U. S. S. R. and the Third World*
-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Other Cited Sourc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 Abrams, Bradley.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Czech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ommunism*. Lanham, Md.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Leonid I. Brezhnev: Pages from His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 Acheson, Dea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1969.
- Adams, Michael C. *The Best War Ever: America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Adomeit, Hannes. *Imperial Overstretch: Germany in Soviet Policy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Baden-Baden: Nomos, 1998.
- Ahonen, Pertti. *After the Expulsion: West Germany and Eastern Europe, 1945 -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Aldrich, Richard J. *The Hidden Hand: Britain, America, and Cold War Secret Intelligence*. Woodstock,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2001.
- Alexeyeva, Ludmill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Trans. Carol Pearce and John Glad. Middletown, Conn. :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Alliluyeva, Svetlana. *20 Letters to a Friend*. Trans. Priscilla Johnson McMill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 . *Only One Year*. London: Hutchinson, 1969.
- Ambrose, Stephen E. *Eisenhower*. Vols. 1 - 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and 1984.
-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7*.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87.
- .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9*. New York: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1989.
- Anderson, Martin. *Revolution: The Reagan Legacy*. Stanford, Calif.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 Andropov, Y. V. *Speeches and Writings*. Oxford, Eng. : Pergamon Press, 1983.
- Applebaum, Anne. *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 London: Allen Lane, 2003.
- Arbatov, Georgi.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92.
- Arjomand, S. A.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38 (April 1986): 383 - 414.
- Aslund, Anders.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aker, James A. III, with 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 - 1992*.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5.
- Bekes, Csaba. "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10 (March 1998): 135 - 137.
- Bell, David S. *François Mitterrand: A Political Biography*. Cambridge, Eng.: Polity Press, 2005.
- Bell, Jonathan. *The Liberal State on Trial: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in the Truman Yea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ennett, Andrew O. "Trust Busting Out All Over: The Soviet Side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Cold War Endgame: Oral History, Analysis, Debates*. Ed. William C. Wohlforth, 175 - 204.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eria, Sergo. *My Father: Inside Stalin's Kremlin*. Ed. Françoise Thom. Trans. Brian Pearce.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and Co., 2001.
- Beschloss, Michael. *Kennedy v. Khrushchev: The Crisis Years, 1960 - 1963*.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1.
- . *Taking Charge: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Tapes, 1963 - 1964*.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 . *Reaching for Glory: Lyndon Johnson's Secret White House Tapes, 1964 - 1965*.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 Bill, James A. *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George Ball: Behind the Scenes in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ird, Kai. *Color of Truth: McGeorge Bundy and William Bundy, Brothers in Arms: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 Blight, James G., and David A.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90.
- Bohning, Don. *The Castro Obsession: U. S. Covert Operations, 1959 - 1965*.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5.
- Boldin, Valery.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The Gorbachev Era as Witnessed by His Chief of Staff*. Trans. Evelyn Rossi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Borhi, Lazlo. "Rollback, Liberation, Containment, or Inaction? U. S. Policy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1950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Summer 1999): 67 - 110.
- Bourne, Peter G. *Jimmy Carter: A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from Plains to Postpresidency*. New York: Scribner, 1997.
- Boutenko, Irene A., and Kirill E. Razlogov.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Russia, 1960 - 1995*.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Boyle, Peter G., ed. *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3 - 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 Bozo, Frédéric. "Mitterrand's Fra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 A



Reappraisal." *Cold War History* (forthcoming, January 2008).

Brackman, Roman. *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 A Hidden Life*. London: Frank Cass, 2001.

Brandenberger, David.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 - 19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andt, Willie. *My Life in Politic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2.

Breslauer, George W.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s: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

———. "Ideology and Learning in Soviet Third World Policy." *World Politics* 39 (April 1987): 429 - 448.

———. *Gorbachev and Yeltsin as Leaders*.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rezhnev, L. I. *Following Lenin's Course: Speeches and Articles (1972 - 197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 *Report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Party in Home and Foreign Policy, Information Bulletin — Special Issue No. 1* Toronto: Progress Books, 1976.

———. *Peace, Détente an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A Collection of Public Statemen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n Foreign Affairs*. Oxford, Eng.: Pergamon Press, 1979.

———. *Memoirs*. Trans. Penny Dole. Oxford, Eng.: Pergamon Press, 1982.

Brezhneva, Luba. *The World I Left Behind: Pieces of a Pa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Broadwater, Jeff. *Eisenhower and the Anti-Communist Crusad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Brooks, Jeffrey.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talin's Ghost: Cold War Culture and U.S. -Soviet Relations." In *After Stalin's Death: The Cold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Ed.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1 - 35. Harvard Cold War Seri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Brown, Archie.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Brugioni, Dino A. *Eyeball to Eyeball: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Brzezinski, Zbigniew.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 - 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Bundy, McGeorge.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Burds, Jeffrey. "The Early Cold War in Soviet West Ukraine, 1944 - 1948."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o. 1505.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 "The Soviet War Against 'Fifth Columnists': The Case of Chechnya, 1942 - 194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2): 267 - 314.

Burk, Robert F. *Dwight D. Eisenhower: Hero and Politicia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6.

Burlatsky, Fedor. *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 Trans. by Daphne Skille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1.

Burr, William, and Jeffrey T. Richelson. "Whether to 'Strangle the Baby in the Crad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Nuclear Program, 1960 - 196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Winter 2000): 54 - 99.



- Bush, George, and Brent A.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 Cahn, Anne Hessing. *Killing Détente: The Right Attacks the CI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aldwell, Dan. "The Demise of Détente and US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Fall of Dé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arter Years*. Ed. Odd Arne Westad, 95 - 117.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annon, Lou. *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 Caro, Robert.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Vols. 1 - 3. New York: Knopf, 1992.
- Carter, Jimmy: *Why Not the Best?* Nashville, Tenn.: Broadman Press, 1975.
- .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London: Collins, 1982.
- . *An Hour Before Daylight: Memories of a Rural Boyh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B),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Short Cour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 Chang, Ju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Knopf, 2005.
- Chazov, E. I. *Zdorovie i vlast'* [Health and Power]. Moscow: Novosti, 1992.
- Checkel, Jeffrey T.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hange: Soviet/Russian Behavior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ernus, Ira. *Eisenhower's Atoms for Peace*.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Operation Candor: Fear, Faith, and Flexibility." *Diplomatic History* 29 (November 2005): 779 - 809.
- Chernyaev, Anatoly.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40 (May-June 1999): 50 - 65.
- . *My Six Years with Gorbachev*. Trans. and ed. by Robert D. English and Elizabeth Tuck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The Unknown Brezhnev."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42 (May-June 2004): 34 - 66.
- . "The Afghanistan Problem."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42 (September-October 2004): 29 - 49.
- Christensen, Thomas J.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 - 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hristofferson, Michael Scott. *Frenc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Left: The Antitotalitarian Moment of the 1970s*. New York: Bergahn Books, 2004.
- Clay, Lucius D.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 Clay: Germany, 1945 - 1949*. Vols. 1 - 2. Ed. Jean Edward Smi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Clayton, Will. *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 Ed. Frederick J. Dobne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 Colburn, Forrest D. *The Vogue of Revolution in Poor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oll, Steve.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 New York: Penguin, 2004.
- Collins, John M. *U. S. -Soviet Military Balance, 1980 - 1985*. New York: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se Publishers, 1985.



- Conkin, Paul R. *Big Daddy from the Federnales: Lyndon Baines Johns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6.
- Conquest. Robert. *Stalin: Breaker of Nations*. New York: Penguin, 1991.
- Cook, Linda J. *The Soviet Social Contract and Why It Failed: Welfare Policy and Workers' Politics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ostigliola, Frank. "Lyndon B. Johnson, German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3 - 1968*. Ed. Warren I. 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173 - 19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ousins, Norman. *The Improbable Triumvirate: John F. Kennedy, Pope John, Nikita Khrushchev*. New York: Norton, 1972.
- Crocker, Chester A. *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Neighborhood*. New York: Norton, 1992.
- Cullather, Nick. *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 - 195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Dallek, Robert. *Lone Star Rising: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1908 - 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Flawed Giant: Lyndon Johnson and His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An Unfinished Life: John F. Kennedy, 1917 - 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3.
- Dean, Robert D. *Imperial Manhood: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 Deaver, Michael K. *A Different Drummer: My Thirty Years with Ronald Reag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 Diggins, John P. *Ronald Reagan: Fate,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2007.
- Dimitrov, Georgi.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Ed. Ivo Banac.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s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 - 1953*. Eds.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New York: Macmillan, 1996.
- . *Stalin's Cold War: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mocracy, and Communism in Bulgaria, 1941 - 1948*.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Divine, Robert A. *Blowing on the Wind: The Nuclear Test Ban Debate, 1954 - 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Dobbs, Michael Down. *Down with Big Brother: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Knopf, 1997.
- Dobrynin, Anatoly.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Dorrien, Gary. *The Neoconservative Mind: Politics, Culture, and the War of Ideolog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udziak, Mary L. *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umbrell, John.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and Soviet Communism*.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Duskin, J. Eric. *Stalinist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a New Elite, 1945 - 1953*. Houndsmills, Eng. : Palgrave, 2001.
- Ebon, Martin. *The Andropov File: The Life and Ideas of Yuri V. Andropov,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3.
- Ehrenburg, Ilya. *The War, 1941 - 1945*. London: McGibbon and Kee, 1964.
- Eisenhower, Dwight. *The Eisenhower Diaries*. Ed. Robert Ferrell New York: Norton, 1981.
- . *Ike's Letters to a Friend, 1941 - 1958*. Ed. Robert Griffith.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4.
- .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NATO and the Campaign of 1952*. Ed. Louis Galambos.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The 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Middle Way*. Ed. Louis Galambo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kedahl, Carolyn McGiffert, and Melvin A. Goodman. *The Wars of Eduard Shevardnadze*. 2nd ed. Washington, D. C. : Brassey's, 2001.
- Ellman, Michael, and Vladimir Kontorovich, ed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An Insiders' History*. Armonk, N. Y. : M. E. Sharpe, 1998.
- Engerman, David C. "The Rom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w Historie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8 (January 2004):23 - 54.
- English, Robert D. *Russia and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tzold, Thomas H. , and John L. Gaddis, 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 Strate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Evangelista, Matthew. *Unarmed Forces: The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o End the Cold War*.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air, John D. "The Intellectual JFK: Lessons in Statesmanship from British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30 (January 2006):119 - 142.
- Farnham, Barbara. "Reagan an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Perceiving the End of Threa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 (Summer 2001):225 - 252.
- Ferrell, Robert. *Truman and Pendergas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9.
- Filtzer, Donald. *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Firth, Noel E. , and James H. Noren. *Soviet Defense Spending: A History of CIA Estimates, 1950 - 1990*.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Press, 1998.
- Fischer, Ben B. *A Cold War Conundrum: The 1983 Soviet War Scare*. 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1997.
- Fischer, Beth A. *The Reagan Reversal: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7.
- Fitzgerald, Frances. *Way Out There in the Blue: Reagan, Star War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 Foliot, Denise, ed.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Ford, Gerald. *A Time to Heal: The Autobiography of Gerald R. For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Ford, Harold P. *CIA and the Vietnam Policymakers: Three Episodes, 1962 - 1968*. Washington, D. C.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8.

Forrestal, James.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New York: Viking, 1951.

Frankel, Max. *High Noon in the Cold War: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Freeland, Richard M. *The Truman Doctrine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l Security, 1946 - 1948*.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Freidzon, Sergei. *Patterns of Soviet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An Inside View of the 1965 Reform*. Falls Church, Va. : Delphic Associates, 1987.

Friedman, Murray. *The Neoconservative Revolution: Jewis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haping of Public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Fukuyama, Francis. *Moscow's Post-Brezhnev Reassessment of the Third World*. Santa Monica, Calif. : Rand Publication R - 3337 - USDP, 1986.

Fursenko, Aleksandr,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97.

———.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Norton, 2006.

Gaddis, John 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 -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Gaddy, Clifford G. *The Price of the Past: Russia's Struggle with the Legacy of a Militarized Economy*.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6.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ll. : Ivan R. Dee, 1996.

———.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 - 1963*.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allup, George H.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 - 1971*. 3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Gardner, Richard N. *Mission Italy: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 Lanham, Md.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Gartenschlager, Uwe. "Living and Surviving in Occupied Minsk." In *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Eds. Robert W. Thurston and Bernd Bonwetsch, 13 - 28.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Garthoff, Raymond.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rev. ed.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4.

———.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4.

———. "The Aborted U. S. -U. S. S. R. Summit of 1965." *The SHAFR Newsletter* 32 (June 2001): 1 - 3.

Gasiorowski, Mark, and Malcolm Byrne, eds. *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 N. Y. :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Gates, Robert M. *From the Shadows: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Gavin, Frank J. "Blasts from the Past: Prolif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196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Winter 2004 - 2005): 100 - 135.
- Gelman, Harry. *The 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étent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Getty, J. Arch, and Oleg V.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1932 - 193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iauque, Jeffrey Glen. *Grand Designs and Visions of Unity: The Atlantic Power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55 - 1963*. Chapel Hill, N. 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 Gibienskii, Leonid. "Stalin's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ominform, and the First Split in the Soviet Bloc," 17 - 22,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1999.
- Glad, Betty. *Jimmy Carter: In Search of the Great White House*. New York: Norton, 1980.
- Gleijeses, Piero.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 - 19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 . "Moscow's Proxy: Cuba and Africa, 1975 - 1988."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8 (Fall 2006): 98 - 146.
- Goncharov, S. N.,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Gooding, John. *Socialism in Russia: Lenin and His Legacy, 1890 - 1991*. Houndsmills, Eng.: Palgrave, 2002.
- Gorbachev, Mikhail.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 . *Memoirs*. New York: Doubleday, 1995.
- . *On My Country and the World*. Trans. George Shriv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orbachev, Mikhail, and Zdenek Mlynar. *Conversations with Gorbachev on Perestroika, the Prague Spring, and the Crossroads of Socialism*. Trans. George Shriv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orbachev, Raisa. *I Hope*. Trans. David Floy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 Gori, Francesca,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 Gorlizki, Yoram, and Oleg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 - 195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orodetsky, Gabriel. *Grand Delus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Granieri, Ronald J. *The Ambivalent Alliance: Konrad Adenauer, the CDU/CSU, and the West, 1949 - 196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3.
-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Translation of the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 Grechko, A. A.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Soviet Un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 Greenstein, Fred I. *The Hidden-Hand Presidency: Eisenhower as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 Griffith, Robert S. *The Politics of Fear: Joseph R. McCarthy and the Senate*.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70.
- Griffith, Robert W. F.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the Corporate Commonwealth." *American*



*** ** * * * * * 人 心 之 爭 * * * * * ** * * * * *

- Historical Review* 87 (February 1982): 87 – 122.
- Gromyko, Andrei. *Memoirs*. Trans. Harold Shuk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 Gross, Jan.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Grossman, Vasily. *A Writer at War: 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 – 1945*. Ed. Antony Beevor and Luba Vinogradov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5.
- Guhin, Michael A. *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sman and His Tim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 Hahn, Werner G. *Postwar Soviet Politics: The Fall of Zhdanov and the Defeat of Moderation*.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aig, Alexander M.,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 Halliday, Fred.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London: Verso, 1983.
- . "Soviet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the Afghanistan war: from 'second Mongolia' to 'bleeding woun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October 1999): 683 – 686.
- Hamby, Alonzo. *Man of the People: A Life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amilton, Nigel. *JFK: Reckless Yout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 Hanhimaki, Jussi,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nson, Philip.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from 1945*. London: Longman, 2003.
- Hara, Teruyuki, and Kimitaka Matsuzato, eds. *Empire and Society: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History*. 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
- Harriman, W. Averell, and Eli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 – 1946*.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Harris, Jonathan. *Subverting the System: Gorbachev's Reform of the Party's Apparatus, 1986 – 1991*.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 Harrison, Hope M.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Soviet-East German Relations, 1953 – 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segawa, Tsuyoshi.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aslam, Jonatha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Stalin." In *Empire and Society: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History*. Ed. Teruyuki Hara and Kimitaka Matsuzato, 167 – 179. 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
- . "The Cold War as 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6(2003): 77 – 98.
- Herf, Jeffrey. "Amnesty and Amnesia." *The New Republic* 231(10 March 2003): 33 – 35.
- Herken, Gregg. *The Winning Weapon: 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Knopf, 1980.
- Herlemann, Horst, e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7.
- Herring, George 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 2nd ed. New York: Knopf, 1986.
- Hershberg, James G. "More on Bobb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 History Program *Bulletin* 8-9 (Winter 1996/97):274,344-347.
- . “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More Documents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gram Bulletin* 8-9 (Winter 1996/97):270-343.
- Hilty, James W. *Robert Kennedy: Brother Protecto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itchcock, William. *France Restored: Cold War Diplomacy and the Quest for Leadership in Europe, 1944-195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 .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 Hollander, Paul. *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olloway, Davi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Stalin and the Bomb*.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oopes, Townsend.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 Hopf, Te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oscow, 1955 and 1999*.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osking, Geoffrey. *The First Socialist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With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ughes, Emmet John. *The Ordeal of Power: A Political Memoir of the Eisenhower Years*. New York: Atheneum, 1975.
- Humphrey, Hubert H. *The Education of a Public Man: My Life and Politics*.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6.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Iatrides, John O. “Revolution or Self-Defens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Summer 2005):3-33.
- Immerman, Richard H. *John Foster Dulles: Piety, Pragmatism, and Power in U. S. Foreign Policy*.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99.
- ,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India, Government of India Planning Commission. *Second Five-Year Plan*. New Delhi, 1956.
- Inkeles, Alex, and Raymond A.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81-1982*.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1.
- Jacobs, Meg. *Pocketbook Politics: 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James, W. Martin III.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in Angola, 1974-1990*.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 Jarausch, Konrad H. *The Rush to German 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Johnson, Lyndon Baines.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n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Jones, Howard. *Death of a Generation: How the Assassinations of Diem and JFK Prolonged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Jordan, Hamilton. *Crisis: The Last Year of the Carter Presidenc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2.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5.

Kaiser, David. *American Tragedy: Kennedy, John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Kampelman, Max M. *Entering New Worlds: The Memoirs of a Private Man in Public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Katz, Mark N., ed. *The USSR and Marxist Revolu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Eng.: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Kengor, Paul. *God and Ronald Reag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 *The Crusader: Ronald Reagan and The Fall of Communism*. New York: Regan, 2006.

Kennan, George F. *Memoirs, 1925 - 1950*. New York: Bantam, 1967.

Kennedy, David M.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nnedy, Robert F. *Robert F. Kennedy: In His Own Words*. Eds. Edwin O. Guthman and Jeffrey Shulma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8.

Khlevniuk, Oleg. *In Stalin's Shadow: The Career of "Sergo" Ordzhonikidze*. Ed. Donald J. Raleig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Kathy S. Transchel. Trans. David J. Nordlander.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5.

———. "The Reasons for the 'Great Terror': The Foreign-Political Aspect."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Eds. Silvio Pons and Andrea Romano.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Khrushchev, Nikita S. *Khrushchev Remembers*. Ed. and trans.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Ed. and trans. Jerrold L. Schecter with Vyacheslav V. Luchkov.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Khrushchev, Sergei N.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Trans. Shirley Bens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night, Amy. *Beria: Stalin's First Lieutena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Kohl, Helmut, with Kai Diekmann and Ralf Georg Reuth. *Ich wollte Deutschlands Einheit*. Berlin: Propylaen, 1996.

Kohli, Atul. "Politic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17 (March 1989): 305 - 328.

Kornienko, Georgiy Markovich. *Kholodnaia voyna: svidetel'stvo ee uchastnika* [The Cold War: A Testimony of Its Participant]. Moscow: Mezhdunar otnosheniia, 1994.

Kosygin, A. N.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Kotkin, Stephe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 - 2000*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error and Tea Leaves in the Kremlin," *The New Republic* 234



(13 February 2006); 28 - 34.

Kovrig, Bennett. *Of Walls and Brid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Kramer, Mark. "Lessons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for Warsaw Pact Nuclear Operation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 9 (Winter 1996/1997): 348 - 354.

———. "The Czechoslovak Crisis and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Ed.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 1)."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Winter 1999): 3 - 55.

———.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 2)."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Spring 1999): 3 - 38.

———.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50 Years Later - A Review Article," *Europe-Asia* 51 (September 1999): 1093 - 1106.

———. "The Early Post-Stalin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Upheavals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ternal-External Linkages in Soviet Policy Making (Part 3)."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 (Fall 1999): 3 - 66.

———. "Soviet Deliberations During the Polish Crisis, 1980 - 198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Special Working Paper No. 1*.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9.

———. "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tate." *Slavic Studies* 63 (Fall 2004): 505 - 512.

———. "The 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the Repercus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 (Part 3)."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7 (Winter 2005): 3 - 96.

Kraus, Sidney, ed. *The Great Debates: Carter vs. Ford, 1976*.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Krebs, Ronald R. *Dueling Visions: U. S. Strategy toward Eastern Europe Under Eisenhowe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1.

Krylova, Anna. "'Healers of Wounded Souls': The Crisis of Private Life in Soviet Literature, 1944 - 1946."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 (June 2001): 307 - 331.

Kuromiya, Hiroaki. *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 A Ukrainian-Russian Borderland, 1870s-199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talin*. Harlow, Eng.: Pearson, 2005.

Kux, Stephan. *New Soviet Thinking on Nuclear Deterrence*. Geneva: Program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umber 3 (1990): 30 - 45.

Larres, Klaus. "Eisenhower and the First Forty Days After Stalin's Death: The Incompatibility of Détente and Political Warfare."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6 (July 1995): 431 - 469.

———. *Churchill'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 Diplom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arson, Deborah Welch.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Lawrence, Mark Atwood. *Assuming the Burden: Europe and the American Commitment to War in*



***** 人 心 之 争 *****

-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Lebow, Richard Ned, and Thomas Risse-Kappe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effler, Melvyn P.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eighton, Richard M. *Strategy, Money, and the New Look, 1953 - 1956: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 Lettow, Paul. *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 Levesque, Jacques. *The Enigma of 1989: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Lewin, Moshe. *The Soviet Century*. Ed.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5.
- Logevall, Fredrik. *Choosing War: The Lost Chance for Pea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 War*. Essex, Eng.: Longman, 2001.
- Loth, Wilfried. *Stalin's Unwanted Child: The Soviet Union,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D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 Lukacs, John. *June 1941: Hitler and Stali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undestad, Geir.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 - 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 (September 1986): 263 - 277.
- Lyakhovskii, Aleksandr.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risis and War in Afghanista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51.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7.
- McAdams, A. James. *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cCauley, Martin. *Gorbachev*. London: Longman, 1998.
-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 MacEachin, Douglas J. *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 Washington, D. 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2002.
- McFarlane, Robert C., and Zophia Smardz. *Special Trust*. New York: Cadell and Davies, 1994.
- McMahon, Robert J. *The Limits of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cNamara, Robert S., with Brian VanDeMark.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 McPherson, Alan. "Misled by Himself: What the Johnson Tapes Reveal about the Dominican Intervention in 1965."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38 (June 2003): 127 - 146.
- . *Intimate Ties, Bitter Strugg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Since 1945*.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6.
- Mahan, Erin. *Kennedy, De Gaulle, and Western Europe*. Hampshire: Palgrave/Macmillan, 2002.
- . "Public Opinion and Détente During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Un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 Maier, Charles. *Dissolution: 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lia, Martin. "The Archives of Evil: Soviet Studie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New Republic* 231 (November 29 and December 6, 2004): 34 - 41.
- Manchester, William. *One Brief Shining Moment: Remembering Kenned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3.
- Mann, James.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Knopf, 1999.
- Mark, Eduar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 - 1946: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8 (September 1981): 313 - 336.
- . "The War Scare of 1946 and Its Consequences." *Diplomatic History* 21 (Summer 1997): 383 - 415.
- . "Revolution by Degrees: Stalin's National Front Strategy for Europe, 1941 - 194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31.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1.
- Mastny, Vojtech.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stny, Vojtech, and Malcolm Byrne, eds. *A Cardboard Castle?: An Inside History of the Warsaw Pact, 1955 - 1991*.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atlock, Jack, Jr. *Autopsy of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 *Reagan and Gorbachev: How the Cold War End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 May, Ernest R.,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3.
-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 Medvedev, Roy.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Trans. Ellen de Kadt.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 *Khrushchev: A Biography*. Trans. Brian Pearce.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84.
- Medvedev, Roy A., and Zhores A. Medvedev. *The Unknown Stalin*. London: I. B. Tauris, 2002.
- Megargee, Geoffrey P. *War of Annihilation: Combat and Genocid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 Mendelson, Sarah E. *Changing Course: Ideas,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erridale, Catherine. *Night of Stone: Death and Memory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New York: Vintage, 2001.
- . *Ivan's War: Life and Death in the Red Army, 1939 - 1945*.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 Messer, Robert L. *The End of an Alliance: James F. Byrnes, Roosevelt,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 Milani, Mohsen M. *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 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 Millar, James R. "The Little Deal: Brezhnev's Contribution to Acquisitive Socialism." *Slavic Review* 4 (Winter 1985): 694 - 706.
- Miner, Steven Merritt. *Stalin's Holy War: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Alliance Politics, 1941 - 194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Miscamble, Wilson D., C.S.C.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 Potsdam, Hiroshima,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itrokhin, Vasili. "The KGB in Afghanista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gram Working Paper No. 40. Introduced and Edited by Christian F. Ostermann and Odd Arne Westad.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2.

Mitrovich, Gregory.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Montefiore, Simon Sebag.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3.

Morris, Edmund. *Dutch: A Memoir of Ronald Reag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Mukhina, Irina. "New Revelation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Archives: The Kremlin, the Warsaw Uprising,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6 (August 2006): 397 - 411.

Murashko, Galina P., and Albina F. Noskova. "Stalin and the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roversies in Eastern Europe, 1945 - 1947 (Part 1)." *Cold War History* 1 (April 2001): 161 - 172.

Murphy, David E.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Naimark, Norman M. "The Soviets and the Christian Democrats: The Challenge of a 'Bourgeois' Party in Eastern Germany, 1945 - 1949."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9 (Fall 1995): 369 - 392.

———.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old War Studies and New Archival Materials on Stalin." *The Russian Review* 61 (January 2002): 1 - 15.

———. "Stalin and Europe in the Postwar Period, 1945 - 1953: Issues and Problems."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2(2004): 28 - 56.

———, and Leonid Gibianskii, ed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1944 - 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Newsom, David D. *The Soviet Brigade in Cuba: A Study in Public Diploma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Niedhart, Gottfried. "Ostpolitik: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the Process of Détente." In *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 Ed. Carole Fink, Philipp Gassert, and Detlef Junker.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itze, Paul H., with Ann M. Smith and Steven L. Rearden. *From Hiroshima to Glasnost: At the Center of Decision — A Memoir*.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9.

Njolstad, Olav, ed.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old War: From Conflict Escalation to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4.

Noonan, Norma C. "Malenkov." *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89), vol. 50 (Supplement).

Oberdorfer, Don. *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 New York: Poseidon Press, 1991.

O'Brien, Michael. *John F. Kennedy: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St. Martin's Press, 2005.

Odom, William 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Offner, Arnold. *Another Such Victory: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参考书目

- Osgood, Kenneth A. "Form Before Substance: Eisenhower's Commitment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Negotiations with the Enemy." *Diplomatic History* 24 (Summer 2000): 405 - 433.
- . *Total Cold War: Eisenhower's Secret Propaganda Battle at Home and Abroa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 , and Klaus Larres,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 Oshinsky, David M. *A Conspiracy So Immense: 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 Ostermann, Christian F., ed.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1.
- Ouimet, Matthew J.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 Overy, Richard J.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 . *Russia's War*. London: Penguin, 1997.
- Oye, Kenneth A. "Explain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orp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daptations to the Nuclear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Ed.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Kapp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ach, Chester J., Jr., and Elmo Richardson. *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1.
- Palazchenko, Pavel.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 The Memoir of a Soviet Interprete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arker, John W. *Kremlin in Transition: Gorbachev, 1985 - 1989*, Vol. 2. Boston: Unwin Hyman, 1991.
- Parrott, Bruce.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Gorbachev." *Problems of Communism* 37 (November-December 1988): 1 - 36.
- Patterson, James T. *Restless Giant: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atergate to Bush v. Go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echatnov, V. O.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5.
- . "'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 . .': 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September 1945 - December 194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26. Trans. Vladislav M. Zubok.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9.
- . "Averell Harriman's Mission to Moscow." *The Harriman Review* 14 (July 2003): 1 - 47.
- Pechenev, Vadim Alekseevich. *Gorbachev: k vershinam vlasti* [Gorbachev: To the Heights of Power]. Moscow: Gospodin Narod/Fenomen Cheloveka, 1991.
- Pezzullo, Lawrence, and Ralph Pezzullo. *At the Fall of Somoz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3.
- Pickett, William B.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and American Power*. Wheeling, Ill.: Harlan Davidson, 1995.
- Pipes, Richard. *Vixi: Memoirs of a Non-Belong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leshakov, Constantine. *Stalin's Folly: The Tragic First Days of World War II on the Eastern Fro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 Pollock, Etha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on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33. Washington D. C.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1.
- Ponomarev, B.N.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 Pons, Silvio.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Ed. Silvio Pons and Andrea Romano, 277 - 307.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 .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3 (Spring 2001):3 - 27.
- . *Stalin and the Inevitable War, 1936 - 1941*. London: Frank Cass, 2002.
- , and Andrea Romano, eds.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 Porter, Gareth. *Perils of Dominance: Im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Road to War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Powaski, Ronald E. *Return to Armagedd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1981 -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Powers, Richard Gid. *Not Without Hono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Commun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 Preston, Andrew. *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ruessen, Ronald W.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 Quandt, William B.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3rd ed.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 Rabe, Stephen G.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The Foreign Policy of Anti-Communis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 . *The Most Dangerous Area in the World: John F. Kennedy Confronts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 Ragsdale, Hugh.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Revolutions: English, French, and Russian."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3 (Summer-Fall 2003):323 - 371.
- Reagan, Nancy, with William Novak. *My Turn: The Memoirs of Nancy Reag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 Reagan, Ronald.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 . *Reagan in His Own Hand*. Ed. Kiron K. Skinner, Annelise Anderson, and Martin Anders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 . *Reagan: A Life in Letters*. Ed. Kiron K. Skinner, Annelise Anderson, and Martin Anders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3.
- Reed, Thomas C. *At the Abyss: An Insider's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4.
- Reese, Roger R. *Red Commander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Officer Corps, 1918 - 1991*.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 Reeves, Richard. *President Kennedy: Profile of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 . *President Reagan: The Triumph of Imagin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5.
- Resis, Albert, ed. *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Chicago, Ill. ; Ivan R. Dee, 1993.

Richardson, Don, ed. *Conversations with Carter*.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Richardson, Rosamond. *Stalin's Shadow: Inside the Family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Tyran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Rieber, Alfred J. "Stalin, Man of the Borderlan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 (December 2001): 1651 - 1691.

Roberts, Geoffrey. "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Europe-Asia* 46(1994): 1371 - 1385.

———. "Ideology, Calculation, and Improvisation: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39 - 1945."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October 1999): 655 - 673.

———. "The Fascist War Threat and Soviet Politics in the 1930s."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Ed. Silvio Pons and Andrea Romano.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 "Sexing Up the Cold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Molotov-Truman Talks of April 1945." *Cold War History* 4 (April 2004): 105 - 125.

———. *Stalin: His Times and Ours*. Cork, Ireland: Irish Association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2006.

———.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 - 1953*.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Romano, Andrea. "Permanent War Scare: Mobilisation, Militarisation and Peasant War."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Ed. Silvio Pons and Andrea Romano.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Rostow, W. W. *Europe After Stalin: Eisenhower's Three Decisions of March 11, 1953*.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Rubenstein, Joshua. *Soviet Dissidents: Their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0.

Rzheshesky, Oleg A. , ed. *War and Diplomacy: The Making of the Grand Alliance: Documents from Stalin's Archives*.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Sakharov, Andrei. *Memoirs*. Trans. Richard Lourie. New York: Knopf, 1990.

Samuelson, Lennart. "Wartime Perspectives and Economic Planning: Tukhachevsky and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1925 - 1937." In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 1945*. Ed. Silvio Pons and Andrea Romano.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Sarotte, M. E. *Dealing with the Devil: East Germany, Détente, and Ostpolitik, 1969 - 197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Savel'yev, Aleksandr'G. , and Nikolay N. Detinov. *The Big Five: Arms Control Decision-Making in the Soviet Union*. Ed. Gregory Varhall. Trans. Dmitriy Trenin. Westport, Conn. :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Savranskaya, Svetlana. "The Logic of 1989: Soviet Withdrawal from Eastern Europe." Unpublished paper.

———.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Emergence of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the USSR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Helsinki Final Act, and the Reaction of Soviet Authorities." Unpublished paper.

Schaller, Michael. *Alter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nce the Occupation*.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Greenwich, Conn.: Fawcett/Houghton Mifflin, 1965.
- . *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 Schmidt, Helmut. *Men and Power: A Political Retrospective*. Trans. Ruth He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 Schroeder, Gertrude E. "Soviet Living Standard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Quality of Life in the Soviet Union*. Ed. Horst Herleman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7.
- Schwarz, Hans-Peter. *Konrad Adenauer: A German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in a Period of War, R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Vol. 2: The Statesman, 1952 - 1967*. Trans. Geoffrey Penny. Providence, R. I.: Berghahn Books, 1997.
- Schweizer, Peter. *Reagan's War: The Epic Story of His Forty-Year Struggle and Final Triumph Over Communism*.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2.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cott, James M. *Deciding to Intervene: The Reagan Doctrin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eaborg, Glenn T.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Seliktar, Ofira. *Politics, Paradigms,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s: Why So Few Predict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M.E. Sharpe, 2004.
- Selvage, Douglas. "The Warsaw Pact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1963 - 196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32.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1.
- Service, Robert.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London: Penguin, 1997.
- . *Stalin: A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hamberg, Vladimir. "Stalin's Last Inner Circle." *The Harriman Review* 10 (Spring 1997): 29 - 41.
- Shapoval, Iurii. "The Ukrainian Years." In *Nikita Khrushchev*. Ed. William Taubman, Sergei Khrushchev, and Abbott Gleason, 8 - 4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heng, Michael J.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evardnadze, Eduard.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 Shultz, George P.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Scribner, 1993.
- Sibley, Katherine A. S. *Red Spies in America: Stolen Secrets and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 Simpson, Christopher, ed.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 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 1981 - 199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5.
- Small, Melvin. *Democracy and Diplomacy: The Impact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U. S. Foreign Policy, 1789 - 1994*.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nead, David L. *The Gaither Committee, Eisenhower, and the Cold War*.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orensen, Theodore C. *Kennedy*. New York: Bantam, 1965.



- Spalding, Elizabeth Edwards. *The First Cold Warrior: Harry Truman, Containment, and the Remaking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6.
- Stalin, Joseph.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Postwar Interview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1.
- .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 – 1952*. Ed. Bruce Frankli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 Stein, Janice Gross. “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Motivated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Spring 1994): 156 – 183.
- Stent, Angela E.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tern, Sheldon M.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Stickle, D.M., ed. *The Beria Affair: The Secret Transcripts of the Meetings Signaling the End of Stalinis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2.
- Stockman, David A.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
- Stueck, William W.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udaplatov, Pavel, and Anatoli Sudaplatov, with Jerrold L. and Leona P. Schecter. *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 A Soviet Spymaster*.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 Sukhodrev, V.M. *Iazyk moy — drug moy: ot Khrushcheva do Gorbacheva* [My Tongue — My Friend: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Moskva: AST: Olimp, 1999.
- Suri, Jeremy. “The Promise and Failure of ‘Developed Socialism’: The Soviet ‘Thaw’ and the Crucible of the Prague Spring.”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5(2006): 133 – 158.
- Swain, Geoff. *Between Stalin and Hitler: Class War and Race War on the Dvina, 1940 – 1946*.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 Talbott, Strobe. *Endgame: The Inside Story of SALT II*.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9.
- Taubman, William, ed. *Khrushchev on Khrushchev: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Er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 Taubman, William, Sergei Khrushchev, and Abbott Gleason, eds. *Nikita Khrushchev*. Trans. David Gehrenbeck, Eileen Kane, and Alla Bashenko.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 The Free Press, 2003.
- Taylor, A.J.P.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The Listener* 34(22 November 1945): 576.
- Teltschik, Horst.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Berlin: Siedler, 1991.
- Thatcher, Ian D. “Brezhnev as Leader.” In *Brezhnev Reconsidered*. Ed. Edwin Bacon and Mark Sandle, 22 – 37. Houndsmills, Eng.: Palgrave, 2002.
- Thatcher, Margaret.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 Thomas, Daniel C. *The Helsinki Effect: International Norms, Human Rights, and the Demis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urston, Robert W., and Bernd Bonwetsch. *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人 心 之 争 *****

- Tismaneau, Vladimir, ed.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Rewriting Hi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9.
- Tompson, William. *The Soviet Union Under Brezhnev*. London: Pearson, 2003.
- Toulouse, Mark 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From Prophet of Realism to Priest of Nationalism*.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 Trachtenberg, Marc.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 - 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roy, Gil. *Morning in America: How Ronald Reagan Invented the 1980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rojanovsky, Oleg.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Nikita Khrushchev*. Ed. William Taubman, Sergei Khrushchev, and Abbott Gleason, 209 - 241.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ruman, Harry S. *Memoirs: 1945: Year of Decisions*. New York: Signet, 1955.
- . *Memoirs: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 - 1952*. New York: Signet, 1956.
- . *Truman Speak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Ed.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 . *Dear Bess: The Letters From Harry to Bess Truman, 1910 - 1959*. Ed. Robert H. Ferrell. New York: Norton, 1983.
- Truman, Margaret, ed. *Letters from Father: The Truman Family'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South Yarmouth, Mass.: John Curley and Associates, 1981.
- Tudda, Chris. *The Truth Is Our Weapon: The Rhetorical Diploma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Tyler, Patrick.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 Great Wall: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A Century Foundation Book, 1999.
- Ulam, Adam B.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Viking, 1973.
- Uldricks, Teddy J. "The Icebreaker Controversy: Did Stalin Plan to Attack Hitler?" *Slavic Review* 58 (Fall 1999): 626 - 643.
- Valkenier, Elizabeth Kridl. "New Soviet Thinking About the Third World." *World Policy Journal* 4 (Fall 1987): 651 - 674.
- Vance, Cyrus.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 Van Meter, Robert H.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 General Clay, and the Moscow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1947: A Response to Philip Zelikow."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6 (2005): 139 - 167.
- Van Ree, Erik.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ary Patriotism*.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 Volkogonov, Dmitri.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88.
- Volkov, Vladimir K. "The 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 Draft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1999.
- Wallace, Henry A.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 - 1946*. Ed. John M. Blu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 Walton, John. *Reluctant Rebel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Revolu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Watson, Robert J.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1953 - 1954*. Washington, D.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 Weinberger, Caspar W., with Gretchen Roberts. *In the Arena: A Memoir of the 20th Century*. Washington, D.C. : Regnery Publishing, 2001.
- Weinstein, Allen,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9.
- Westad, Odd Arne, e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 -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ed. *The Fall of Détente: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arter Year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8.
- . “Reagan’s Anti-Revolutionary Offensive in the Third World.”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Cold War: From Conflict Escalation to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Ed. Olav Njolstad. London: Frank Cass, 2004.
- .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Eng.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Jian Chen, Stein To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s.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 - 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22. Washington, D.C. :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8.
- , Sven Holsmark, and Ivers B. Neumann, eds. *The Soviet Union in Eastern Europe, 1945 - 19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Westoby, Adam. *Communism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 Wieczynski, Joseph, ed. *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Gulf Breeze, Fla. :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88.
- Wittner, Lawrence S. *Resisting the Bomb: 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54 - 1970*, Vol.2.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71 - Present*, Vol.3.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ohlforth, William C., ed. *Witnesses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ed. *Cold War Endgame: Oral History, Analysis, Debat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oods, Randall B. *LBJ: Architect of American Amb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006.
- , and Howard Jones. *Dawning of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Quest for Orde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1.
- Woodward, Bob. *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 - 1987*.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 Young, Crawford.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Young, John W. “Britain and LBJ’s War.” *Cold War History* 2 (April 2002): 63 - 93.
- Yurchak, Alexei.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人 心 之 爭 *****

- Zaloga, Steven J. *The Kremlin's Nuclear Sword: The Rise and Fall of Russia's Strategic Nuclear Forces, 1945 - 2000*. Washington, D. C.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2.
- Zelikow, Philip, and Ernest R. May, eds. *John F. Kennedy: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The Great Crises*. Vols. 1 - 3. New York; Norton, 2001.
- ,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Zhang, Shuguang, and Jian Chen.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1944 - 1950*. Chicago, Ill. :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6.
- Zubkova, Elen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 - 1957*. Ed. and trans. Hugh Ragsdal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 Zubok, Vladislav. "New Evid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gram Bulletin* 5 (Spring 1995): 59, 89 - 109, 159.
- . "The Brezhnev Factor in Détente." In *Kholodnaia voina i politika razriadki: diskussionnye problemy* [Cold War and the Policy of Détente: Problems and Discussions]. Ed. Nataliia Ivanovna and Aleksandr Oganovich. Moskva: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In-t vseobshchei istorii [Institute of Universal Histor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3.
- .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forthcoming.
- . "Limits of Empire: Stalin and the Lean Year of 1946." Unpublished paper.
- ,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译后记

冷战作为 20 世纪最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进程，缘何而起？何以结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为热战？美国冷战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梅尔文·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教授在本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给予读者详尽的解释。

梅尔文·莱弗勒，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 20 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政治经济关系，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专家。曾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外交历史档案委员会委员，担任过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机构的高级或特聘研究员。除了本书以外，莱弗勒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实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曾荣获班克罗夫特奖、弗雷尔奖和胡佛奖)、《共产主义的幽灵：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17—1953》(*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 - 1953*) 等。

本书是莱弗勒教授的精心之作，可被视为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甄选出冷战过程中的五个关键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斯大林和杜鲁门的全球战略目标和政策；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探索实现和平的可能；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林登·B·约翰逊尝试缓和紧张局势；1975 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议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旨在维持美苏缓和；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的努力及里根、布什



的反应。书中着重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冷战缘起和终结；冷战的持续未升级；以及为何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都欲寻求和平的机会而和平迟迟未能到来。

莱弗勒教授认为，冷战起源于二战结束前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它“衍生出了杜鲁门和斯大林都不能接受的危机，以及双方都不能抵挡的机遇”。在危机面前，两大阵营的领导人都担心己方的权力遭到侵扰，便采取咄咄逼人的策略迎接挑战；在机遇面前，他们都曾考虑缓和，规避或终止双方的敌对态势。但是，这些领导人受到了意识形态、政治对手的压力、同盟国和附庸国的期望、动荡且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以及昔日大战给他们个人留下的深刻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合力使他们深陷于一个循环往复、永无终结的敌意怪圈之中不能自拔。尽管世界政坛见证了诸多的固步自封和壮志未酬，然而，1980年代的里根、老布什和最为重要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最终成功地将美苏双方从曾经桎梏了所有前任领袖的政策和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莱弗勒教授在终章的分析中详尽地阐述了两极世界格局重构的成因，以及双方在经历了数十载的对抗之后赢得世界和平是如何地来之不易——这场人心之争的和平落幕不仅对两个超级大国，乃至对全球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书具有众多显著的特点。莱弗勒教授采取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他站在冷战结束后的“局外人”的位置上，不仅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冷战全过程中加以考察，而且从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动中研究，将冷战的整体性和历史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方法论上，他突破了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研究中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权力政治学派”所倡导的以“权力分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软权力”之间的较量看作决定冷战发生、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中占有中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在史料运用上，莱弗勒教授广泛而深入地挖掘了美国各大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和俄方档案，大量运用了美国外交关系文件(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DR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数字国家安全档案(DNSA,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真正作到了多边档案互证。同时，他引证了美国、俄国、德国、东欧国家、中国学者所发掘和引用的各种新资料，完整而清晰地诠释了多方资料互引互证在“冷战史新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重要价值，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性。

因此，本书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翔实而新颖的



史料,很多一手资料对于研究者梳理史实、进行客观判断具有重要作用。且莱弗勒教授将众多相关历史事件纳入本书考察的范围,并非就苏美关系而论苏美关系,冷战不再仅仅被视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东亚、南亚、非洲和中东也被囊括在其中。这种多角度、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对于研究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变动不居的 20 世纪,美国与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关系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双方关系的演变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变化产生着重大影响。纵观这段变幻莫测的历史,先是苏美从二战时精诚合作的盟友演变为冷战时期水火不容的对手,后是俄美从冷战结束之初的“蜜月”之旅发展到目前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每一次变化无不轰轰烈烈,震撼世界,每一次无不将盟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席卷进历史的漩涡中,每一次无不将全球的资源 and 人力动员起来。冷战结束已近二十年,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冷战的遗产仍然无法消除,与冷战相关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无法解答,值得深思。比如:在整个冷战进程中,为什么热战(如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均发生在亚洲?柏林墙倒塌已有二十余载,为什么冷战所造成的国家分裂局面在亚洲各国尚未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冷战史研究者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尽快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答案。

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学者同仁和朋友的帮助,尤其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余伟民教授、饶淑莹老师、陈弘老师和李秀芳博士,在此我们谨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编辑夏海涵老师仔细校读了译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我们非常感激她所做的大量工作。

本书翻译费时两载,译者力图深入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想法,并努力准确地把握冷战史研究领域中的专业术语,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作者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但由于译者才疏学浅,加上翻译的局限性,遗憾在所难免,恳请各方面专家、同仁以及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1 年 7 月